



# 马克思和 世界文学

柏拉威尔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封面设计：尹 凤 阁



书号 10002·21

定价 1.95 元



# 马克思和 世界文学

希·萨·柏拉威尔著

梅绍武 苏绍亨 译  
傅惟慈 董乐山



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



**S. S. Prawer**  
**KARL MARX AND WORLD LITERATURE**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76

译自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七六年英文版

**马克思和世界文学**

[英]希·萨·柏拉威尔著

梅绍武 苏绍亨  
傅惟慈 董乐山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9号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9.5印张 483,000字

1980年4月第1版 1980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书号 10002·21 定价 1.95元



## 译 序

“学习！学习！这就是他经常向我们大声疾呼的无上命令；他自己就是这方面的榜样，”<sup>①</sup>李卜克内西回忆马克思时说。

确实，马克思一生好学不倦，学识极其渊博，读书之多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涉猎之广也是罕见的。他为了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在伦敦英国博物馆阅览室里阅读了一千五百多种有关经济学、文化史、技术史等许多领域的科学著作，还作了大量的摘要。《资本论》第一卷初版发行之后，马克思虽因患病，工作经常中辍，却读书不懈，并作大量笔记，“他的读书摘录填满了五十本左右的笔记本——几乎有三万页，都是密密麻麻地写的小字。他所消耗和收集的成吨材料，使恩格斯感到惊异。”<sup>②</sup>

马克思毕生不仅专门研究政治经济学、哲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等学科，而且自青年时代起就酷爱文学，也读过大量的文学作品。他在中学毕业考试的一篇题为《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的作文里，曾设想作一名诗人，一名富于想象力的文学家；他写过诗和剧本，还译过奥维德的《哀歌》。从年轻时起，他就扎实地掌握了希腊文和拉丁文，此后一生孜孜不倦地精读希腊和拉丁文学；他对荷马十分崇敬，经常高声朗诵《伊利亚特》和《奥德

---

① 见《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5页。

② 见马·鲁贝尔和马·马那尔，《没有神话成分的马克思。他的生平和著作的编年研究》，牛津大学出版社，1975年，第287页。

4653 / A 01



赛》。他还读过索福克勒斯、修昔的底斯、柏拉图、西塞罗、维吉尔和塔西陀的原作。1865年，马克思在一份征询表上填写他最喜爱的诗人是莎士比亚、埃斯库罗斯和歌德。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说，“他特别热爱莎士比亚，曾经专门研究过他的著作，连莎士比亚戏剧中最不惹人注意的人物他都很熟悉。马克思一家对伟大的英国戏剧家有一种真诚的敬仰。”<sup>①</sup>埃斯库罗斯的《被缚住的普罗米修斯》这部作品正象对歌德和雪莱那样，也对马克思起过深远的影响，他每年都要读一读埃斯库罗斯的原著。在德国文学方面，马克思精读歌德的作品，经常在自己的文章里摘引《浮士德》里的靡非斯托斐勒司辛辣的嘲讽。他和诗人海涅的诚挚的友谊更是世人尽知的一段佳话。

马克思精通希腊、拉丁、英、法、意、西等多种语言，是位卓越的语言大师。他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机会到外国去生活，阅读伟大的文学作品便是掌握那些国家的语言最有效的途径。他本人就通过莎士比亚和科贝特学习英语，通过但丁和马基雅弗利学习意大利语，通过塞万提斯和卡德龙学习西班牙语。晚年，他还通过阅读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和赫尔岑的回忆录（尽管他对赫尔岑并无好感）来学习俄语。他曾经责备李卜克内西不懂西班牙文，并且立即从书堆里抽出一本《堂吉珂德》给他上了一课，让他每天必须翻译几段直到认为他足以掌握这种语言为止。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也是马克思最喜爱阅读的书籍，他曾计划写一部研究巴尔扎克的专著，只因工作繁忙而未能实现，他认为《人间喜剧》“用诗情画意的镜子反映了整整一个时代。”<sup>②</sup>

马克思不但熟悉古典文学，而且也关注同时代的文学作品。他

---

① 见《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0—71页。

② 见梅林，《马克思传》，人民出版社版，第642页。



对当时流行的法国小说《巴黎的秘密》的评论，对如何评论一部畅销书迄今仍是最富指导性的文学分析；马克思在这篇文章里深刻地阐述了他对文学性质和文学研究的看法。他认为要完整而公正地评价一部作品，就必须把自己各方面的丰富知识和见解协调起来。他又在一封评论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的信中，提倡剧作家与其“席勒化”，不如“莎士比亚化”，这封著名的信后来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发展成为一份极其重要的文献。

对于书籍，马克思常说，“它们是我的奴隶，必须按我的意志为我服务。”<sup>①</sup>我们在阅读马克思著作时，经常可以发现他运用自如地使用他那丰富的文学典故和知识，旁征博引，有时还顺便对一些作品加以评论，这使得他的笔锋极为犀利生动。他喜爱借用往昔最伟大作家笔下的人物和生动的词藻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借以刻画同时代人物的性格，并通过对比的方式来讽刺他的敌人，使他们的原形毕露。文学成为他的一个十分有力的战斗武器。

英人希·萨·柏拉威尔1976年出版的这本《马克思和世界文学》一书，就是围绕着马克思一生和文学的渊源，按年代顺序加以探讨。它阐述了马克思在他一生各个阶段所发表的有关文学的言论，分析了他如何把自己阅读过的小说、诗歌和剧本的丰富知识运用到自己的著作当中去，同时也阐明了马克思的文艺和美学观点。作者是当今牛津大学日耳曼语文系泰勒讲座教授，发表过《德国抒情诗》、《海涅：悲剧性的讽刺作家》、《比较文学研究概论》和《十七个近代德国诗人》等著作。

过去国外编纂的马克思美学论集往往混淆了马克思不同时期的言论。柏拉威尔这部著作按年代顺序、比较有系统地进行阐述，

---

<sup>①</sup> 见拉法格：《同时代人心目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莫斯科，1972年），第24页。



使读者对马克思美学观点的形成和发展，能有一个全面而完整的认识。例如，我们可以在本书中了解到，马克思的美学观点起源于文克尔曼、海德、歌德、席勒和黑格尔等人的美学；他最初对浪漫主义发生兴趣，继而产生怀疑，最后厌恶它的唯美成分。又如他1859年提出的那句名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全部过程”，后来在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法译本时经他亲自过问下把其中“决定”一词译为“支配”之意，强调了人的实践在意识形态的起源中的作用。

通过本书，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十分尊重各民族的宝贵的文化遗产，从中汲取有益的养料。他常借助文学阐明他所提出的新观点。他利用莎士比亚和歌德的著作来阐发货币的本质和作用，就是一个著名的范例。通过阅读歌德和莎士比亚等的著作，使他更清楚地观察到他自己所处的那个颠倒而混乱的世界。马克思也十分重视民间文学、民歌民谣等读物。他反对自然主义，但并不排除幻想，《一千零一夜》也是他喜爱阅读的作品。他不喜欢资产阶级的田园诗式的文学，也跟那种宣扬神秘、靠神灵启示或不可思议的彼岸世界的文学理论格格不入，同时他认为文学不应被孤立地看待，而应连同人类其他的活动和产品一起来看待，文学研究应成为“人类科学”的一部分。马克思对文学作品的要求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重视思想性。“如果形式不是有内容的形式，那么它就没有任何价值了”<sup>①</sup>，但马克思又不赞成把文学和哲学或抽象思维混淆起来。马克思毕生以不同方式把对文学的关注同对政治的关注紧密结合起来，他号召人们不仅要思考和体验，而且要阅读和研究。

我们也会注意到马克思要求作家在语言表达上必须精确而明

---

<sup>①</sup> 见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



朗，语言要纯洁，而且应该逻辑地思考和明确地表达思想。他经常对一些文章中出现的字句混乱、语法上的不当、臃肿而笨拙的语句、浮夸的空话和空洞辞藻的堆砌，乃至诗歌中缺乏韵律等方面给予严厉而讽刺的批评。马克思 1860 年写的《福格特先生》一文，不仅极为突出地显示出他对世界文学的渊博知识，大量引用了世界伟大作家的语句，而且也对一些作者的语言笨拙和思维逻辑的混乱作出了精辟的分析和批判。马克思有句名言：“如果就是这个意思，那就应当明说。”<sup>①</sup>他本人就在这方面作出了典范，从幸存下来的一页《共产党宣言》的手稿可以看出他花费了多大的精力来补充和润饰《宣言》的论述，甚至一位西方学者 S·E·海曼也不不得不对此叹服道，“《共产党宣言》几乎是革命修辞学的一部选集。”<sup>②</sup>

从《马克思和世界文学》这部著作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马克思喜爱的作家是荷马、埃斯库罗斯、奥维德、卢克莱修、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歌德、海涅、但丁、狄德罗、科贝特、巴尔扎克、狄更斯……

马克思厌恶的作家是哥特谢德、盖斯纳、拉马丁、沙多勃利昂、金克尔、道梅尔、后期的弗莱里格拉特、古斯达夫、弗莱塔格、马丁·塔波尔……

此外，本书第一章阐述了马克思早期的一些诗歌、一部未完成的小说和一部未完成的戏剧；这些作品国内迄今尚无译文出版，读者可由此章看到片断。

马克思曾说，“我是一个世界公民”，<sup>③</sup> 他一生对世界文学的广

---

①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 19 卷，第 34 页。（此处译文有改动，原译文为“如果指的就是这点，那就应当加以说明。”）

② 见 S·E·海曼：《缱绻的组合，富于想象力的作家达尔文、马克思、佛拉采尔和弗洛伊德》，纽约，1966 年，第 100 页。

③ 见保尔·拉法格：《忆马克思》。（《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 年，第 69 页。）



泛爱好可为佐证。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柏拉威尔教授认为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存在于马克思的头脑之中，马克思的头脑正是许多世纪和许多国家的文学经验和回忆的一个宝库。”<sup>①</sup>

读者在阅读这部长达四十余万字的著作之前，不妨先看《结论》一章，可对此书内容有个大致的轮廓概念，这里便不再赘述。

这部著作出版后在西方获得好评，1977年获英国艾萨克·道切尔纪念奖，1978年又发行了简装本。它出自一位资产阶级学者的手笔，当然掺杂了作者一些不尽恰当的论点，如说马克思没有离开从圣经开始、经过席勒而传递下来的“一千年至福”说<sup>②</sup>的老传统（见原著第289页），另外也引述了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值得商榷的言论。但总的说来，作者为写此书而阅读了马克思发表的和未发表的全部著作，包括他那卷帙浩繁的书信集，参考了大量有关文献，且对马克思所引用的大量文学作品也比较熟悉，在整理和分析的过程中还是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态度也比较认真，尚不失为一部内容丰富的学术性著作。因此，在目前国内尚无类似的专著出版之前，将它译成中文提供给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者、外国文学工作者和其他文学艺术工作者参考，仍有一定的价值，相信读者自会以分析的眼光看待书中某些不当的言论。《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曾对此书发表一篇评论文章，认为作者在谈论马克思时的“语调有点过分赞美了”。马克思渊博的知识和精湛的论点，确实使柏拉威尔教授不得不多次流露出赞叹的语气。我们把这篇题为《马

① 见本书第220页（边码）。

② 指世界末日后一千年耶稣当再来统治世界。

克思读过的书》的书评一并译出，附在卷末以供参考。

书中凡是马克思原作词句，大都沿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译文，过去尚无译文，则自行译出，但也有多处因本书原引文同已有的中译文出入较大，则作了一些改动，以提出商榷，并在脚注中说明。这些改动之处主要根据原书所引英译文译出，恐也不完全准确，读者转引时务请核对马克思著作原文。

书中提到的近千人和文学作品中的众多人物，除少数未能查到出处，一般均在首次出现时略加注释，希望能对读者有所助益。凡译者增添的均标“译注”两字，其他皆为作者原注。

全书第一至四章系梅绍武译，第五至八章苏绍亨译，第九至十一章傅惟慈译，第十二章至结论董乐山译，全书由梅绍武校阅。

在翻译过程中，承蒙文艺界和出版界许多老前辈的亲切关注，谨致深切谢意。由于我们的马列主义水平不高，知识浅陋，译文中难免出现谬误之处，尚祈读者不吝赐教，以便再版时加以更正。

梅绍武



#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普罗米修斯	3
第二章 第欧根尼的灯笼	44
第三章 夏洛克,泰门,靡非斯托斐勒司	77
第四章 巴黎的秘密	118
第五章 实践和意识形态	139
第六章 从《粗俗的人》到《杨·瑞日卡》	167
第七章 世界文学和阶级冲突	184
第八章 俾克史涅夫、克勒维尔和克拉 普林斯基的王国	221
第九章 历史的悲剧	266
第十章 演说家和文化英雄	312
第十一章 模式和隐喻	372
第十二章 《资本论》	415
第十三章 啃书本	469
结论	537
年表	567
参考文献选目	569
附录:马克思读过的书	579
索引	592

## 序 言

这不是一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也非试图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另作一套解释。本书力图按作者意向的许可，尽可能公正而完整地把下列几方面呈现给英国读者，即马克思在他一生各个阶段发表过什么有关文学的言论，他把自己欣赏的以及为了取得教益或消遣而阅读的许多小说、诗歌和剧本作何用途，他怎样把文艺批评领域的概念和术语引进那些明显与文学无关的著述里去。这项工作看来很有必要，因为大量评论和阐释渐渐遮没了马克思本人的言词，也因为现今编纂的马克思美学论述的标准本往往混淆了马克思不同时期的言论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的见解<sup>①</sup>，从而产生混乱现象，另外也因马克思涉及文艺作品的言论迄今只有一小部分译成了英文并为人所知。本书则按照年代顺序对马克思有关文学的言论作一详尽的探讨，期望这一微薄的贡献有助于了解一种曾经——好也罢、坏也罢——促进我们这个世界发展的思想，了解十九世纪的文艺鉴赏史，了解马克思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的起源，了解文学可以被那些并非以文艺评论为专业和首先不是文艺批评家的伟大人物加以“运用”的方式。另外，也期望

---

<sup>①</sup> 马克思在一封致恩格斯的信中，谈到一位他同时代的评论员时抱怨道：“最奇怪的是，这个家伙把我们俩人看成是单数：‘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等等。”（这句话的动词“说”按德语语法应用复数Sagten，而此处却用了单数“Sagt”。——译注）（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65页。）我当然并不想否认马克思和恩格斯有许多观点一致的想法，也不想断言有可能把他俩各自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这种合作的著作所做的贡献区分得一清二楚。



通过从马克思卷帙浩繁的全部著作里摘引完整的词句并把它们译成英语这一方式，能在那些与我观点不同、但迄今只接触到一小部分有关这方面的文献的英语读者当中，推进关于马克思文艺理论、文艺爱好和文艺观点的讨论。

我在把马克思的德语原著译成英语的过程中，受益不浅地而且十分感激地参考了鲍多莫尔、麦克莱兰、尼古劳斯、李温斯通、米利冈、霍克、巴克森达尔和唐纳·道尔等人的英译本——当然也包括恩格斯以及莫斯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英文版的无名译者在内。至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sup>①</sup>在我这部文稿付印时只出版了第一卷。在协助我寻找一些罕见的资料方面，我谨向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M·W·H·施劳德博士，柏林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R·德卢贝克博士，R·S·李温斯通先生，以及柏林自由大学图书馆和牛津大学泰勒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致以谢忱；在给予我两次出外进行研究的费用资助方面，我谨向牛津大学中古和近代语言教学委员会致谢；另外，在提出宝贵的批评和意见方面，我特别要向罗伊·巴斯卡尔教授、T·J·里德、保尔·富特、詹姆斯·鲍尔敦和泰·F·伊格尔顿诸位先生致以深切的谢意。

---

<sup>①</sup> 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莫斯科、纽约和伦敦，1975年起出版）。



## 第一章

# 普罗米修斯

“普罗米修斯<sup>①</sup>是哲学历书上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sup>②</sup>

### (1)

马克思童年时代的许多表现好象预言他将来要从事文学创作似的。正如他的女儿爱琳娜<sup>③</sup>后来回忆道：

“他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讲故事能手。我听姑妈们说过，他小时候对待几个妹妹很蛮横，他会把她们当做马儿从特里尔的马尔库斯山坡上飞快地‘驱赶’下来；更糟糕的是，他还非让她们吃他用脏手脏面团捏的‘蛋糕’不可。但是，她们一声不吭地任他‘驱赶’，吃下那种‘蛋糕’，为的是要听卡尔为奖励她们这种美德而给她们讲的故事。”<sup>④</sup>

---

① 普罗米修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神，名字的希腊文原意是“先知者”。普罗米修斯盗取天上的火给予人间，被宙斯下令锁在高加索的悬崖上，令鹰啄食他的肝脏，以示惩罚。——译注

② 马克思：《博士论文》，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页。

③ 爱琳娜·马克思（1855—1898），英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马克思的小女儿，1844年嫁给爱·艾威林为妻。——译注

④ 见李·巴克森达尔和斯·莫劳斯基合编《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选》（密尔沃基，圣·路易斯，1973年），第147页。（以下简称《马恩论文艺选》）



他的同学也怕他，因为他不费什么力气就能编出一些挖苦人的讽刺诗文。在中学里，他经老师的指点，接触到奥维德<sup>①</sup>、西塞罗<sup>②</sup>和塔西佗<sup>③</sup>的作品，以及荷马、索福克勒斯<sup>④</sup>、柏拉图和修昔的底斯<sup>⑤</sup>的作品。一位天赋非凡的教员威特斯·罗埃尔斯出版过奥维德的作品评注，成功地促使他的这个学生也对这位古罗马诗人发生浓厚的兴趣，使他也跟着试把奥维德的《哀歌》译成德文，后来马克思在他一生中还可能曾多次赞赏地提到这部诗集。培养他对十八世纪德国古典文学的爱好是他的父亲（他特别举出席勒让儿子欣赏）；同时，马克思一家人在特里尔的邻居、后来成为马克思的岳父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sup>⑥</sup>，则引导马克思分享他本人对莎士比亚的赞赏<sup>⑦</sup>。爱琳娜曾对威廉·李卜克内西<sup>⑧</sup>说过：“他（马克思）常常跟我们滔滔不绝地谈起威斯特华伦男爵，谈他对莎士比亚和荷马的知识多么惊人的渊博，说他能从头到尾背诵荷马史诗中的许多篇章，还能用德语和英语背诵莎士比亚的大部分剧本。”而马克思的父亲，爱琳娜添说道，“则是一位真正十八世纪的‘法国人’。就象威斯特华伦背诵荷马和莎士比亚的作品那样，

① 奥维德(公元前43—公元27)，古罗马诗人。——译注

② 西塞罗(公元前106—43)，古罗马作家，国务活动家，折衷主义哲学家。——译注

③ 塔西佗(约55—120)，古罗马历史学家。——译注

④ 索福克勒斯(公元前497—406)，古希腊杰出的剧作家。——译注

⑤ 修昔的底斯(约公元前460—395)，古希腊历史学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译注

⑥ 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1770—1842)，燕妮·马克思的父亲，特里尔的枢密顾问官。——译注

⑦ 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说：“他特别热爱莎士比亚，曾经专门研究过他的著作，连莎士比亚戏剧中最不惹人注意的人物他都很熟悉。马克思一家对伟大的英国戏剧家有一种真诚的敬仰。马克思的三个女儿都能背诵莎士比亚的作品。”（见《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0—71页）。——译注

⑧ 威廉·李卜克内西(1826—190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译注



他能背诵伏尔泰<sup>①</sup>和卢梭<sup>②</sup>的作品。”<sup>③</sup>年轻的马克思中学成绩单上表彰他文学课程成绩优秀，翻译能力非凡，尽管德语作文犯有一个毛病——“过分追求文词的华丽和生动。”<sup>④</sup>

1835年，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考试的一篇作文里，论述了《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这个题目；在设想的许多职业当中至少有一项是顺便提一下的，那就是 Dichter<sup>⑤</sup>——富于想象力的文学家。年轻的马克思在1835年表明青年选择的职业应该是：

“一种与我们的尊严最为相称的职业，我们对于这种职业所依存的思想的正确性必须具有绝对的信心，我们就可以选择这样的职业，它开辟为人类进行活动、使我们接近共同目标的广阔场所；对这种目标来说，任何职业都只是手段——接近完美的手段。……如果人只是为了自己而劳动，他也许能成为有名的学者、绝顶的聪明人、出色的诗人，但他绝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完人和伟人。”<sup>⑥</sup>

这里略为触及到马克思后来在著作里还曾提到的两个论题：一个是选择的职业，即使是诗人，也不应当以此谋生度日就算完事

---

① 弗一马·伏尔泰(1694—1778)，法国著名作家，自然神论哲学家，历史学家，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著名代表，反对专制制度和天主教。——译注

② 让-雅克·卢梭(1712—1778)，杰出的法国启蒙运动者，民主主义者，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译注

③ 见《摩尔和将军，回忆马克思和恩格斯》(柏林，1970年)，第157—158页。

④ 见德·麦克莱兰：《马克思主义之前的马克思》(哈蒙斯沃斯，1972年)，第50—52页。另见彼·戴麦兹：《马克思，恩格斯和诗人》(法兰克福和柏林，1969年)，第52页，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法兰克福，柏林，莫斯科，1927—1935年)，第1卷，第2分册，第167页。(以下简称《马恩全集》)

⑤ 德语：诗人。——译注

⑥ 《马恩全集》第1卷，第2分册，第164页；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补编》(柏林，1968年)，第1卷，第593—594页。(以下简称《马恩全集补编》)



大吉,而还应当怀有为别人和为整个人类福利工作的强烈愿望。这一点又联系到歌德时代常见的另一论题,也就是歌德的小说《维廉·麦斯特》、席勒的《美育通讯》和荷尔德林<sup>①</sup>的小说《徐培里昂》里都曾令人难忘地发挥过的论题:渴望人的全面发展,克服近代社会活动所不能缺少的那种劳动分工所造成的种种限制。其实,这种思想感情并非特别新颖,当时许多中学生毕业时都会有这类想法。马克思的考虑亦是如此,他在这篇毕业作文里考虑到种种约束人在选择职业时所遇到的不可避免的限制。有些限制是由于个人和体质的因素所造成的,不过马克思也强调迫使青年适应预先存在的结构的那种**社会决定**:“我们并不总是能够选择我们自认为适合的职业;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能够对它们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之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规定了。”<sup>②</sup>这种观察就其本身来说也是平淡无奇的,但做出这种结论的却是马克思;我们倘若结合马克思一生事业来看待这种观察,则至少会赞同弗兰茨·梅林<sup>③</sup>那种(常被人嘲笑的)观点,即他认为从马克思毕业作文这句话里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萌芽。事实上,梅林或许会进一步领悟到马克思当时写的另一篇同一目的的拉丁文作文是旨在解释罗马人在布匿战争<sup>④</sup>前由于注重农业而有意忽视艺术和教育。年轻的马克思在这篇文章里接下去解释道,口才是不必要的,因为古人对该做的事只说几句话,重视话的内容而不在乎形式的优美典雅;远古时期,罗马史在斜述事实方面也毋须精心修饰,因为它只录史实,

---

① 弗利德利希·荷尔德林(1770—1843),18世纪末期、19世纪初期歌德、席勒以外最优秀的德国抒情诗人。他的信札体小说《徐培里昂》被誉为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的继续和发展。——译注

② 《马克思全集补编》(柏林,1968年),第1卷,第590页。

③ 弗兰茨·梅林(1846—1919),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杰出的理论家,政论家,历史学家和文艺评论家,著有《马克思传》。——译注

④ 布匿战争:公元前3至2世纪,古罗马与迦太基之间为了争夺地中海西部霸权而发生的三次战争。——译注



局限于年史的编纂而已<sup>①</sup>。马克思后来还常常谈到那种把精神和艺术的探索同民族经济相联结起来的事物；叙述修辞和文字润饰在历史编纂学中的地位这个问题也不止一次占据他许多时间来进行研究，因为他试图估量一下“纯文学”的长处和真理的探求两者之间的关系。

作为一个大学生，马克思先在波恩、后在柏林念书那一阶段（1835—1841），利用很多时间不仅研究历史、哲学和法律，而且也研究文学。他听奥·威·施莱格尔<sup>②</sup>讲授荷马和普罗佩尔提乌斯<sup>③</sup>，弗·格·韦尔凯尔<sup>④</sup>讲授希腊和拉丁神话，以及布鲁诺·鲍威尔<sup>⑤</sup>讲授《圣经》中的《以赛亚书》；他摘录莱辛、佐尔格尔<sup>⑥</sup>和文克尔曼<sup>⑦</sup>的美学著作；他企图阅读所有文学新作（alles Neueste der Literatur）<sup>⑧</sup>以跟上形势；他翻译塔西佗<sup>⑨</sup>和奥维德的作品以锤炼自己的文体；他参加一个拥有诗人埃马努尔·盖贝尔<sup>⑩</sup>和卡尔·格

① 《马恩全集补编》（柏林，1968年），第1卷，第595页。又马克思中学毕业考卷和教员的评注批改的原件见《马恩全集》第1卷，第2分册，第164—182页。

② 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1767—1845），德国作家，批评家，反动的浪漫派中的热奈派创建人之一。——译注

③ 普罗佩尔提乌斯，一译普罗波士（公元前49—公元15），古罗马的哀歌诗人。——译注

④ 弗·格·韦尔凯尔（1784—1868），德国波恩等大学古代语言与考古学教授，著有《荷马时代的诗人》、《希腊悲剧》等书。——译注

⑤ 布鲁诺·鲍威尔（1809—1882），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最著名的青年黑格尔分子之一，著有一些有关早期基督教史的著作；后来是民族自由党人。——译注

⑥ 卡尔·威廉·斐迪南·佐尔格尔（1780—1819），德国神秘主义哲学家，艺术理论家。——译注

⑦ 约翰·约阿希姆·文克尔曼（1717—1768），德国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家，在18世纪先进的美学思想发展方面起过巨大的作用。——译注

⑧ 见《马恩全集补编》（柏林，1968年），第1卷，第8页。

⑨ 马克思翻译过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译注

⑩ 埃马努尔·盖贝尔（1815—1884），德国浪漫派诗人，风格典雅，但无创新，另外也写过剧本。——译注



律恩<sup>①</sup>的诗社；他还做了不少诗。1837年11月10日，他在写给父亲的一封信中，总结了当时的感受，他注意到转变时机和抒情的情绪之间存在着一种自然的亲合力：“在这样的转变时机中……单个人在这样的时机会产生抒情的情绪的，因为每一个变形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临终的杰作，在某种程度上则是新的伟大诗篇的序曲，这种诗篇力图使光彩夺目的丰富色泽具有持久的形式。”<sup>②</sup>年轻的马克思在这里借助各种艺术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以取得一种比喻的效果，诸如文学方面有“抒情的”和“新的伟大诗篇”，音乐方面有“序曲”，视觉艺术方面有“光彩夺目的丰富色泽”。

马克思用他所回顾的那种情绪写下的诗篇，有几首直接反映了艺术灵感的过程。在他献给父亲两首诗中，第二首提供了一个典范：

## 诗

创作的焰流潺潺流畅  
从您胸襟涌向我心田，  
崇高广阔，叙谈衷肠，  
而我抚育它们在心间。  
您的形象光辉屹立，犹如风神之声，  
慈爱的羽翼轻柔地覆盖上鲜艳色彩。

我倾听悄悄声响，我望见霞光一道，

---

<sup>①</sup> 卡尔·格律恩(1817—1887)，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40年代中期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他从所谓“人的观点”来看歌德，把歌德的庸俗方面也加以赞美，曾受到恩格斯的批判。——译注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1卷，第165页。(以下简称《马恩论艺术》)

在那遥远的苍穹,缓慢地漂泊荡漾,  
时而显现,时而俯冲低降,  
低降只为再次直冲云霄上。  
内心的斗争一旦得到宁静,  
我用诗歌抒发痛苦和欢畅。

依傍着温柔的体形,  
我的心灵欣喜若狂,  
形态滋长在我心间,  
经受您那烈火锤炼。  
它们抖擞精神,舒展爱抚的羽翼,  
再次欢快闪烁在创作者的心田里。<sup>①</sup>

这首献给父亲的奇特的赞辞里显现了四种想法:(1)灵感的“火花”从诗人外部而来,但他必须加以抚育;(2)诗的创作开始处于混沌状态,但最终涌现出一首凝炼的诗;(3)在完工的艺术作品当中,既包含痛苦也包含欢乐;(4)这首完成的诗篇通过形式的柔和力量,给人以强烈的感染,而且又是一种(由最后一节诗中性的比喻所表达出来的)感应。

年轻的马克思作为一名诗人,以自己体验的灵感,在这里试图从内心谈论诗作。然而这首诗本身,则具有得之于席勒<sup>②</sup>和德国浪漫派诗歌的陈旧形象,韵律机械呆滞,叙述也显呆板,明显地打

---

① 见《马恩全集补编》(柏林,1968年),第1卷,第603页。我在这里用散文译诗,目的是尽可能准确地再现原诗词汇的字面含意。诗体译文有时修饰了原作,可参阅《马恩全集》英文版(莫斯科,纽约和伦敦,1975年),第1卷,第517—615页。

② 关于马克思早期诗篇的席勒式格调,米·里弗希兹在《卡尔·马克思的艺术哲学》(伦敦,1973年,英译者R·B·威恩)一书中有详尽的阐述。



着虚幻的印记。至于诗中所表达的思想，我们也没有发现与当时的美学思潮有什么不同的想法。这种印象由诗人献给未婚妻的十四行组诗(Schlusssonette. An Jenny)<sup>①</sup>而得到进一步的证实。在那首诗里，“抒情的我”认为他的诗篇是受爱情的鼓舞而写成的，是向对方表白爱情，是唤起爱人的反应，从而再转过来激励他的一言一行(尽管也激起缠绵悱恻的感情)：

于是我能越加英勇奋发战斗，  
于是我的诗歌更加清澈自由，  
于是我的歌声敢于翱翔天际，  
于是我的竖琴低声哀怨泣诉。<sup>②</sup>

青年诗人知道他的感情和言词表达都显得不够明朗：

话语不过是迷蒙烟云，含混声响，  
又怎能明确体现  
那无穷无限，诸如精神上的骚动，  
您本人和那浩瀚寰宇。<sup>③</sup>

这类情诗所能做到的，不过是有助于结合分隔两地的恋人的感情，彼此取得联系罢了；赞词最后一节向一位心爱的读者发出动人的呼吁，表明这些诗篇存在的一个理由：

---

① 德语，即《献给燕妮的十四行组诗》。——译注

② 《马恩全集补编》(柏林，1968年)，第1卷，第614页。

③ 见梅林编：《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斐迪南·拉萨尔的文学遗著》，第1卷，马克思和恩格斯1841年3月至1844年3月的著作(斯图加特，1902年)，第27页。(以下简称《文学遗著》)

但是暖！我希求的是热泪，  
希求的是您应倾听这歌声，  
您应使它灿烂生辉焕然一新，  
它便可暗中隐去而化为烟云。<sup>①</sup>

这种通俗赞辞（经由十八世纪哥亭根林苑派<sup>②</sup>诗人文雅忧郁的倾诉直到佩特拉克<sup>③</sup>风格），确实预言马克思早期诗歌有一段时期是滞留在家庭事务中，而较少涉及外部更广阔的天地。

另外还有一些更为浪漫的激进行吟诗人的形象出现在这些早期诗篇里，例如那首对话体诗《行吟诗人》(Der Spielmann)；这首诗和另一首《黑夜之爱》(Nachtliebe)，与其他诗篇不同之处，在于它们是在马克思生前发表的，尽管只刊载在一个很不出名的刊物上<sup>④</sup>：

“行吟诗人，你的嘲弄撕扯你的心灵，  
你的艺术，乃是光明之神恩赐与你，  
你应遨游天涯海角，闪烁声波音浪，  
你应努力攀登高峰，达到群星欢舞！”

“‘什么，什么！我必定要猛力冲刺，

---

① 《马恩全集补编》(柏林，1968年)，第1卷，第615页。

② 哥亭根林苑派(Göttinger Hain)：18世纪70年代德国哥亭根大学年轻诗人组织的一个浪漫派诗社，以通俗的文体写诗，间或也做些爱国诗歌。——译注

③ 弗兰契斯科·佩特拉克(1304—1374)，意大利杰出诗人、人道主义者，他以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化为基础努力建设早期文艺复兴时代的非宗教文化。他的拉丁文信札和诗体函件，抨击了僧侣阶级和教廷。《歌集》和十四行诗广泛闻名，其中歌颂对劳动和对自然界美丽的爱，促使意大利和欧洲的诗从神秘主义和经院哲学中解放出来，其非宗教性主题(民谣曲《我的意大利……》等)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译注

④ 指1841年柏林出版的《艺文》杂志。——译注



将我利剑血污斑斑地刺入你的灵魂，  
上帝不明此事，上帝从不过问艺术；  
艺术是由烟雾腾腾的地狱升入头脑。”<sup>①</sup>

我们在这里遇到从瓦肯罗得尔<sup>②</sup>到恩·泰·阿·霍夫曼<sup>③</sup>这些德国浪漫派作家所熟悉的两种关于灵感的相互冲突的观点，一种是艺术乃天赐之福，引人向上；另一种是艺术乃地狱所赠，把人们拖向疯狂、精神错乱和死亡。马克思诗中行吟诗人所特有的那种嘲弄和自我分裂（“行吟诗人，你的嘲弄撕扯你的心灵”）使我们想起海涅甚于任何其他德国诗人，尤其使我们想起海涅的《歌集》<sup>④</sup>起首《梦境》那一部分<sup>⑤</sup>。

8 另有两首保存下来的诗歌显示马克思以独特的手法变换一下布伦塔诺<sup>⑥</sup>、爱沁多尔夫<sup>⑦</sup>和海涅作品里常见的一个主题。一首是

① 《马恩全集补编》（柏林，1968年），第1卷，第604页。

② 瓦肯罗得尔（1773—1798），德国浪漫主义作家，他与鲁德维希·蒂克合著《一个爱好艺术的僧侣的衷心倾叙》（1797）宣传了浪漫主义的艺术纲领。——译注

③ 恩·霍夫曼（1776—1822），德国作家，反动的浪漫主义者，在他的作品中，现实的因素和幻想、神秘主义以及对认识的不合理性的宣传纠缠在一起。——译注

④ 海涅的《歌集》于1827年出版，轰动一时，其中许多诗歌被音乐家配上乐谱，在海涅生前曾重版十三次。——译注

⑤ 参阅尼·瑞夫斯：《海涅和青年马克思》一文，载于《牛津日尔曼研究》第7卷（1973年），第45—72页。另外，W·M·约翰斯敦在这首诗中发现“马克思极其敏锐地表达了艺术家的孤独”，同时还让读者注意这一事实，即这个行吟诗人不仅带着一把提琴，也佩带一把长剑，“可以毫不牵强附会地说，一个革命家正从这行吟诗人身上孕育诞生出来。”但也应当记得佩带武器的行吟诗人是19世纪德国文学中常见的人物。约翰斯敦还对这首诗的戏剧性形式作出评论，“马克思在他许多抒情诗里，运用一种对话体，其中一个无名的对话者向主要主人公提出挑战。”（见《作为卡尔·马克思早期哲学先兆的1836—1837年诗歌》一文，载于《思想史杂志》第28卷（1967年），第266—267页。）

⑥ 克雷门斯·布伦塔诺（1778—1842），德国浪漫主义诗人，小说家。他对德国文学的贡献是与阿尔宁合编了一部民歌集《儿童的奇异的号角》。——译注

⑦ 约瑟夫·冯·爱沁多尔夫（1788—1857），德国浪漫主义抒情诗人，小说家。他的诗歌特色接近民歌风格，小说常美化游手好闲，反对一切工作。——译注

歌谣《海妖之歌》(Sirenengesang), 其中描述一个浪漫的行吟诗人拨响竖琴, 被水妖所惑, 跟一些早期的诗歌中的主人公被洛列莱<sup>①</sup>诱惑一样。在马克思的诗里, 这位主人公能使自然陶醉, 迷住水妖, 而水妖却不能伤害他:

我, 你永远甬想攫住,  
也攫不住我的爱和憎,  
和我内心燃起的向往;  
在娓娓动听的旋律洪流里,  
温柔力量凌霄举起这向往,  
犹如霹雷闪电般划破长空。<sup>②</sup>

这种以不大活泼的韵律和陈旧形象来赞颂那种表达憎恨或爱情向往的诗歌的柔和力量, 看来确实是真诚的。另一首同样主题的诗《海上船夫之歌》(Lied eines Schiffers auf der See), 起首和结尾都有一节这种类似的自信:

“你可以演奏, 拨响你的竖琴,  
你可以在我的小船周围跳跃,  
但是你必须让它安抵目的地,  
你受我的支配!”

那些从布伦塔诺到海涅的浪漫主义“莱茵”派诗歌往往充塞许多在

---

<sup>①</sup> 洛列莱(Lorelei): 德国传说中的一个妖女, 出没于莱茵河岩石上, 以她的美貌和歌声诱惑船夫触礁沉没。关于洛列莱传说的作品甚多, 最著名的是海涅的诗《洛列莱》(1823)。——译注

<sup>②</sup> 《马克思全集》, 第1卷, 第2分册, 第14页。



自然和超自然力量下漂泊不定、无能为力的牺牲者，而马克思这首诗里那个信心百倍的船夫则与他们形成强烈的对比；鉴于马克思后来的发展，另有一点也值得注意，那就是马克思诗中的人物也从对上帝的祈祷中汲取一部分力量：

“于是我搏斗在大风大浪里，  
向上帝祈祷，  
让船帆鼓起，  
安全向前驰。”<sup>①</sup>

马克思在波恩听过德国浪漫主义创始人之一奥·威·施莱格尔讲授的课程；在柏林居住期间，他还跟这个流派的另一位不大出名的代表人物蓓蒂娜·冯·阿尔宁<sup>②</sup>有过来往。她是阿契姆·冯·阿尔宁<sup>③</sup>的妻子，克雷门斯·布伦塔诺的妹妹，年轻时荣幸地同歌德建立了友谊，而且不久前刚在她的一部著作《歌德和一个儿童的通讯》(Goethes Briefwechsel mit einem Kinde, 1835)里记述了这段不朽的友谊。1839年，蓓蒂娜在特里尔甚至还访问过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和卡尔·马克思，不过这次会见的结果并不愉快，只使马克思在一首以前写的讽刺诗《新奇的浪漫主义》(Neu-modische Romantik)中对蓓蒂娜所持的怀疑态度<sup>④</sup>进一步得到证实。这位德国浪漫派活动家，由于她的著作和生活作风而给德国浪漫主义增添了一点独特的风韵；年轻的马克思当时对浪漫主义

① 《马恩全集补编》(柏林, 1968年), 第1卷, 第613页。

② 蓓蒂娜·冯·阿尔宁(1785—1859), 德国浪漫主义女作家, 在40年代迷恋于自由主义思想。——译注

③ 阿契姆·冯·阿尔宁(1781—1831), 德国浪漫主义作家, 参加过反拿破仑的解放战争, 反对城市文化和一切进步思想, 曾与布伦塔诺合编过德国民歌集。——译注

④ 参阅《马恩全集》, 第1卷, 第2分册, 第11页。

的写作和思想方法的信念已经渐渐衰退，这次会见只促使他那种献身于浪漫派的想法进一步趋于消逝。

马克思早期的一些诗篇勾勒了一种更加崇高的生活轮廓： 10

“诗人，你也许认为我不能领会  
你灵魂里的斗争，内心的光芒，  
奋起向上的形象吗？  
它们光芒四射，纯洁如灿烂群星，  
它们波涛汹涌，炽热如火焰洪流，  
它们朝一种更加崇高的生活迈进；”

另有一些诗表明现实的生活，没有爱情来温暖和丰富的生活，是冷酷而贫瘠的：

生活对她过于冷酷，  
大地对她过于贫瘠。<sup>①</sup>

这两行诗摘自他的《支离破碎》(Die Zerrissene) (这是十九世纪早期流行的一个表示自我斗争和内心分裂的词汇)；马克思写过几首诗表明他十分关切青年诗人往往感兴趣的那种处于疯狂和绝望边缘的境况，上面引证的就是其中一首。<sup>②</sup>

早期的抒情诗中另有一首显得特别重要，诗名为《人类的尊严》(Menschenstolz)，篇首呈现一幅现代城市特有的高楼大厦和麇集的惶惑不安的人群的景象。青年诗人发现城市带给人们的压

<sup>①</sup> 《马恩全集》，第1卷，第2分册，第37页，48页。

<sup>②</sup> 另两首是《失望的人的祈祷》和《狂歌》(见《马恩全集》，第1卷，第2分册，第30—31页和25—26页。)



抑感——也就是他后来称之为“异化”和“物化”那种感觉——可以通过这样一种思想感情得以减轻，那就是想到高楼大厦并非自行产生，而是靠人的机敏智慧才能使之形成；人的灵魂（尤其是一个正在恋爱的人的灵魂）通过对自己无穷无尽的力量和丰富性的认识，可以摆脱砖块灰泥、云石和大量紧迫的活动而升华到超凡的意境。诗人这时觉得自己犹如神明一般，超脱凡间，可以带着轻蔑的嘲弄口吻把俗界称之为“巨人一侏儒”：

燕妮！倘若允许我冒昧直言，  
我们彼此爱慕相恋，  
炽热的心同拍搏动，  
同一条溪流激荡着壮阔波澜，

于是我蔑视地脱下我的手套，  
掷向俗界那张丑脸提出挑战，  
让那巨人一侏儒倒坍呻吟吧，  
它的摧毁窒息不了我的热情。

我便能神明般阔步前进，  
胜利通过它的断垣残壁；  
句句话语热情而且欢愉，  
胸怀象造物主那般旷达。①

这位诗意盎然的青年或“抒情的我”，在吐露爱情而写这首诗的时候，觉得自己既似普罗米修斯，又似丘必特②。

① 《马恩全集》，第1卷，第2分册，第48—52页。

② 丘必特是罗马神话中的众神之父，有权支配雷电风雨。——译注

这首诗结尾的情调，以及对行动和创造的讴歌，不止一次回响在这些早期诗歌里。马克思在谈到一种驱使他行动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时，显然最能表白他自己： 12

所以让我们敢于面对一切艰险，  
永不停留，永不歇息，  
永不陷入呆滞的缄默，  
永不无所希冀，永不无所作为。

在那沉重压榨我们的枷锁下，  
不要郁郁沉思，焦虑地徘徊，  
因为向往和愿望，  
还有行动，依然归属于我们。<sup>①</sup>

这种迫切需要行动和实践的要求，也包括征服诗歌艺术领域的愿望：

我一向不能平静地追逐  
头脑中滚滚袭来的思潮，  
我一向不能悠闲地无所事事，  
我永不停歇，暴风雪般前进。

我愿为自己征服一切，  
一切神明美好的赠与，

---

<sup>①</sup> 《文学遗著》，第1卷，第28页。另参阅《马恩全集》英文版（莫斯科、纽约和伦敦，1975年），第1卷，第526—527页。



勇敢向知识进军，  
左右诗歌和艺术。①

- 13 然而，马克思深感自己没能像一位艺术家那样完全征服了诗歌和艺术。他的女儿劳拉②在马克思逝世后曾对弗兰茨·梅林说：“我必须告诉您，我父亲对这些诗歌是很不重视的；两位老人家每当谈到这些诗歌时，就对青年时代那种蠢事发出由衷的微笑。”③

文学和文学创作者还以另一种方式出现在马克思早期诗歌里。马克思对于从黑格尔到普斯特库亨④这些哲学家和批评家给予伟大作家的评价，凡是认为不当之处都以嘲讽的方式加以揭露。他让我们感觉到，要求伟大作家提供恰恰是他们特殊的天赋拒绝给予的东西，这种作法是何等的荒谬！

所以对这种说法应该加以反对，  
什么席勒不能给人足够的享受，  
他把一切推向过于崇高的境界，  
他在俗务的羁绊下没尽力而为。  
他过分耍弄霹雷闪电，  
而市井情趣荡然无存。⑤

另外，要求他们符合宗教和道德的正统观念，又是何等荒谬绝伦！

① 《文学遗著》，第1卷，第27—28页；另参阅《马恩全集》英文版（莫斯科、纽约和伦敦，1975年），第1卷，第525页。

② 劳拉·马克思（1845—1911），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马克思的次女，保·拉法格之妻。——译注

③ 《文学遗著》，第1卷，第26页。

④ 约·弗·威·普斯特库亨—格兰佐夫（1793—1834），德国文学批评家和编辑，著有《青年诗歌》（1817），并仿歌德《威廉·麦斯特》一书写成《威廉·马斯特的旅程》（1821—1828）。——译注

⑤ 《马恩全集补编》（柏林，1968年），第1卷，第609页。

应该反对这种说法：

什么歌德引起妇女的恐怖，  
他一点也不中老太婆的意，  
他干的事只是掌握自然界，  
而没把它修饰成道德形式，  
他本应研究路德教义问答，  
把它编成抑扬顿挫的诗文。  
说实在的他有时也考虑美，  
但忘记说：“上帝的创造。”<sup>①</sup>

14

这是马克思后来要开拓的一个领域，即对哲学家和文人雅士论述古今文学的方式，通过敏锐的观察，揭露出其中毫无条理的“虚假意识”和庸俗的期望。他在早期诗篇里也对凡夫俗子接受艺术的方式给以嘲讽，例如那首海涅式诗歌《骑士格鲁克的阿尔米达》(Armida von Ritter Gluck)，嘲笑了一位坐在诗人身傍观赏格鲁克<sup>②</sup>的歌剧《阿尔米达》的小姐愚蠢的唠叨，并把诗人对美妙声音的世界的关切，同小姐的自命不凡加以对比：

她惊叹道：“这出歌剧难道不美妙吗？”

“天呐，”我说，“报上有什么新闻？”

然后我安静地沉浸在音乐中。

---

① 《马恩全集补编》(柏林,1968年),第1卷,第610页。

② 克里斯朵夫·威里巴德·格鲁克(1714—1787),奥地利歌剧作曲家。他创作了一些新型的意大利歌剧,摒弃传统的音乐精湛技巧,而注重戏剧的真实性。《阿尔米达》为1777年所作。——译注



她嘲笑说：“这家伙可真蠢！”①

诗人避开那种关于艺术的自命不凡的唠叨而转向当日新闻，然后又安静地欣赏艺术，这段描写堪称海涅《旅途景色》中常见的那种反布尔乔亚的讽刺诗文的延伸。

鉴于马克思艺术观后来的发展，还有一首诗也值得顺便提一下。这首诗题名为《柏林的维也纳猴戏》(Wiener Affentheater in Berlin)：

15

我坐在剧院里，平静地观赏  
畜生们演的话剧，  
自然界的什锦样样齐全，  
遗憾的是还没看到他们冲墙壁撒尿……②

由此我们可以觉察到马克思写过这首诗以后，不会再赞成舞台上污秽的自然主义，那种把自然界原始材料随意切下一片就要求视之为艺术的、“目的使观众感到惊奇和意外的毫无意义的演出”。

1837年，马克思着手写一部幽默小说《蝎子和费里克斯》(Scorpion und Felix. Ein humoristischer Roman)③，但只完成若干篇章；小说的整个结构，散文格调，情节突然故意急转而下，以及漫画式的表达，都受到斯特恩④的小说《特利斯川·项狄》和海涅的

① 《马恩全集》，第1卷，第2分册，第9页。

② 同上书，第8页。

③ 马克思这部小说的若干篇章(第1卷，第10至48章)见《马恩全集》，第1卷，第2分册。

④ 洛伦斯·斯特恩(1713—1768)，英国感伤主义作家，著有《特利斯川·项狄》、《感伤的旅行》等小说，力图揭露当时生活中的矛盾和资产阶级道德的虚伪。——译注

特写集《旅途景色》的影响<sup>①</sup>。而且一遇时机便引证《圣经》、奥维德的《哀歌》、文克尔曼的著作、歌德的《迷娘曲》、哥尔斯密<sup>②</sup>的《威克菲牧师传》著名的开宗明义的一节、霍夫曼的《魔鬼的仙丹》以及其他许多文学作品和人物。其中莎士比亚显得特别突出，有一处显然模仿《理查三世》，另一处（无数次的首次！）暗喻《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里的忒耳西忒斯<sup>③</sup>的性格<sup>④</sup>。第29章和第30章戏谑地谈论黑格尔使之流行的一个论题<sup>⑤</sup>，这个论题促使马克思作出一句关于艺术的最著名的声明：“当今时代不可能写出史诗”<sup>⑥</sup>；此外，另有一章以浓厚的海涅式风格，横溢的情趣，但并不全都恰当的比喻，来评论十九世纪政治、哲学和文学的衰退：

“有巨人，从而有长达二十行文字的章节来描述，随之也必然有侏儒，有天才必然有枯燥无味的庸人，有海潮必然有污泥，前者一旦消逝，后者就会占据他们的位置，傲慢地伸开长腿。前者对这个世界太伟大，因此被撵开，而后者却扎根留下，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在下列事实中屡见不鲜：香槟酒留下一股持久不散而令人讨厌的余味，因此爱出风头的屋大维<sup>⑦</sup>追随英雄凯撒，平庸的布尔乔亚路

① 参阅尼·瑞夫斯，《海涅和青年马克思》，载于《牛津日耳曼研究》第7卷（1973），第49—51页；戴麦兹，《马克思、恩格斯和诗人》，第57页。

② 奥利弗·哥尔斯密（1728—1774），英国18世纪感伤主义作家。他在《威克菲牧师传》里讨论了许多社会生活和伦理问题，宣扬启蒙主义，并肯定人性中善的本质。——译注

③ 忒耳西忒斯，一译瑟息替斯，是莎士比亚的《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里的丑陋而好谩骂的希腊人。——译注

④ 参阅《马恩全集》，第1卷，第2分册，第77页。

⑤ 指长子继承制。马克思在第29章里戏谑地拿洗澡间与长子继承制相比，称“长子继承制的权利是封建贵族的洗澡间”。——译注

⑥ 见《马恩全集》，第1卷，第2分册，第83页。“当今时代不可能写出史诗”是马克思的《蝎子和费里克斯》这部幽默小说第30章的头一句话。——译注

⑦ 屋大维（前63—公元14年），罗马皇帝（公元前27至公元14年）。——译注



易—菲力浦<sup>①</sup> 追随拿破仑皇帝，游手好闲的骑士克鲁格<sup>②</sup> 追随哲学家康德，宫廷枢密官劳巴赫<sup>③</sup> 追随诗人席勒，课堂里的沃尔弗<sup>④</sup>  
16 追随天国的莱布尼茨<sup>⑤</sup>，我这一章节追随狗儿邦尼法斯<sup>⑥</sup>……”<sup>⑦</sup>

从莱布尼茨到克利斯提安·沃尔弗，从康德到威·特·克鲁格，从拿破仑到路易—菲力浦，从席勒到海涅喜爱嘲笑的一位对象、戏剧家厄恩斯特·劳巴赫——全是一派衰退的趋势。《蝎子和费里克斯》仅留下若干篇章，因此很难说整部小说在它幽默的正文里将会把这种阴郁的判断推论到何等程度。

《蝎子和费里克斯》显著之处或许在于试图借助斯特恩和海涅的文学形式来谈论政治事务。第29章里包括首次对限定继承权和长子继承权法律的攻击，这种法律黑格尔则在《法的哲学》一书里捍卫过；普鲁士政府也想应用于莱茵各省<sup>⑧</sup>。这部未完成的作品充满臃肿的反布尔乔亚的讽刺，但具有它的政治涵义。

① 路易—菲力浦(1773—1850)，奥尔良公爵，法国国王。——译注

② 威廉·特劳戈特·克鲁格(1770—1842)，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译注

③ 厄恩斯特·劳巴赫(1784—1852)，德国戏剧家。1816—1822 前曾任圣彼得堡皇家美术院历史与文学教授，曾改编席勒的剧作。——译注

④ 克利斯提安·沃尔弗(1679—1754)，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莱布尼茨的信徒。他否认事物和思想中的矛盾，而到处寻求外在的目的。恩格斯曾嘲笑浅薄的沃尔弗式的目的论说：“照这种目的论，猫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吃老鼠，老鼠被创造出来是为了给猫吃，而整个自然界被创造出来是为了证明造物主的智慧。”——译注

⑤ 哥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1646—1716)，德国数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主要著作有《人类理性新论》。——译注

⑥ 邦尼法斯是马克思这部小说中人物裁缝麦尔顿的一条狗的名字。邦尼法斯原为英国传教僧侣与圣徒之名，人称德意志使徒；他716年起在日耳曼各城邦传教，723年被罗马教皇任命为主教，754年被异教徒所杀。他曾在一封致卢卢斯的信中把自己比拟为一条狗，见到主人住宅被盗贼劫掠而无能为力相助，只能在一旁嗥嗥吠叫。——译注

⑦ 《马恩全集》，第1卷，第2分册，第85—86页。

⑧ 参阅阿·科尔纽，《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他们的生活和著作》(巴黎，1955年)，第1卷，第95页。

马克思早期还写过一个命运悲剧《奥兰尼姆》，也只写了几场。就象《蝎子和费里克斯》受斯特恩和海涅的影响一样，这出戏显然受到歌德和阿道夫·默尔奈<sup>①</sup>的影响（这两位作家的名字混在一起显得有点奇怪，而事实确实如此）。戏里的主要角色贝尔蒂尼，是歌德的《浮士德》里的靡非斯托斐勒司<sup>②</sup>苍白无力但可辨认出来的翻版。其实，贝尔蒂尼本人在戏里对这种相似下了评论，起到一种贬低的作用<sup>③</sup>。德国浪漫派诗歌和诗人往往激起愤世嫉俗的人发出责难，马克思在这出戏里让贝尔蒂尼把这些非难全部吐露出来：

他是个德国人，一遇时机  
便滥肆炫耀“旋律”和“灵魂”……

或是：

……听起来倒挺浪漫蒂克，  
可是亲爱的小伙子，那不过是声音罢了……

17

再有：

是不是有位非凡的诗人，  
暗中玩弄美学的捉迷藏，  
他会奇思遐想，瞬息万变，  
想把生活变为韵律，

---

① 阿道夫·默尔奈(1774—1829)，德国剧作家与杂志编辑，著有《命运的悲剧》等剧本。——译注

② 靡非斯托斐勒司，歌德的悲剧《浮士德》中的魔鬼。——译注

③ 见《马恩全集》，第1卷，第2分册，第63页。



## 化生活本身为诗歌?①

马克思把这部流产的戏剧许多尚待交代的東西，交托给这位反浪漫主义的人物绝非偶然，因为贝尔蒂尼反对德国浪漫主义梦想的、现实原则的主张，显然符合马克思本人头脑里出现的一些强烈想法。

伊安·比尔恰最近对《奥兰尼姆》里的一段话作出正确的论断。马克思那段话把永恒不朽的宇宙比作一件艺术品或一件工艺品(Kunstwerk)：

嘿，永恒！那是一种万世永存的苦难，  
一种言语难以名状、无法估量的死亡！  
拙劣的工艺品，制造出来供我们嘲笑，  
我们是时钟装置，盲目机械地上好弦，  
作为历书，时间的傻瓜，  
存在，于是有些事物发生，  
腐朽，于是有些事物腐朽！②

- 18 比尔恰认为这段话可以用来说明马克思有些想法是先以形象出现在他的头脑中的，因为在这几句台词里，《奥兰尼姆》的主人公仿佛在预示马克思后来所论述的“物化”这个关键概念③。研究一下马

---

① 《马恩全集》，第1卷，第2分册，第70、61、65页。

② 同上书，第68页。另参阅伊安·比尔恰：《全面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文（载于瓦尔顿和霍尔合编《马克思的位置》一书中，1972年，第136页）。

③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那末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37页。）——译注

克思的诗就可以证实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到《人类的尊严》最后一节在抒发普罗米修斯式热情之前，还有一段展示人们对十九世纪城市不相适应的景象（见本书第10页<sup>①</sup>）。但是应该指出马克思所运用的一些形象化描述，在德国文学里是有其因袭传统的；那些有关痛苦、死亡、时间、永恒，艺术、工艺品和时钟装置的概念，可与许多浪漫主义作品里的概念相媲美。这类意象也可以在启蒙运动作家和巴洛克风格<sup>②</sup>的作品里找到，不过感情涵义不尽相同罢了。然而，马克思是从丰富的德国文学宝库中选择这些意象的，他本人尽管没有什么新的增添，他的选择却依然发人深省。

马克思原来并非很认真地打算出版一部诗集，但是这个计划幸而有他父亲的劝告和出版家的拒绝而告吹，此后马克思便把批判的智力转向剖析自己的诗作，这并不是说他对这些诗在他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产生任何怀疑。他对父亲解释道，人们在重要转折时刻往往创作抒情诗，以便“我们给一度体验过的东西建立一座纪念碑，使它在我们的感情上重新获得它因行动而失去的地位。”<sup>③</sup>这种诗歌，这种往昔经验的结晶，于是问世，打动好心的读者的心弦。虽说马克思对其他伟大的诗篇造诣很深，他对自己诗作的美学价值一度所存的幻想却不能再长久维持下去：

“对我当时的精神状态来说，抒情诗应当是第一个题目，至少也是最惬意和最亲切的题目。然而由于我的处境和我从前的整个发展，它当然是纯粹理想主义的。我的天国、我的艺术，同我的爱情一样变成了某种非常遥远的彼岸的东西。一切现实的东西都扩散开了，而一切扩散开的东西又都失掉了界限。对现代生活加以

① 指原书页码，请查本书边码，下同。——译注

② 指十七世纪欧洲出现的结构复杂、形象奇特而又模糊的文学作品。——译注

③ 《马恩论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4卷第165页。



责难,抱着空泛的和不定形的感情,缺乏自然的本色,凭头脑编造一切,充满现有的东西和应当有的东西之间的矛盾,没有富于诗意的思想而只有修辞上的考虑,也许还有某种感情的热力和对大胆飞驰的渴望,——这就是我赠给燕妮的头三册诗的内容的特点。整个毫无边界的广阔的憧憬,在这里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形式,所以诗句失去了必要的凝炼,变成了一种散漫的东西……到学期终了,我又转向缪斯的舞蹈和萨蒂尔<sup>①</sup>的音乐。在我寄给您的最后一册笔记中,理想主义渗透了那勉强写出来的幽默小说《蝎子和费里克斯》,还渗透了那写失败了了的幻想剧本(《奥兰尼姆》),最后它却发生了完全的转化,变成一种在很大程度上没有鼓舞人心的对象,没有令人振奋的奔放思想的纯粹艺术形式。

但是,只有在最近的这些诗中,好象受了魔杖的一击似的——啊!这一击在最初是令人痛苦的,——突然在我眼前出现了真正诗的王国,宛如远方的仙国那样,把我创作的一切都化成云烟消失不见了。”<sup>②</sup>

这段精彩的话阐明马克思此后一生恪守的一些批判原则:文学应当接近真实和实际领域,而不应漫无边际的飞驰遐想;文学应具有形式、尺度和凝炼;人们可以从伟大的文学作品里觉出一种真正诗意的特性(“真正的诗的王国”),这些作品可以说是提供了一块试金石,用它来衡量较次的作品欠缺之处,修辞的把戏不能代替诗意的幻想;再也没有什么比通篇充塞形式主义(reine Form Kunst)更能败坏一个艺术作品了,它既没有鼓舞人心的对象(beegeistende Objekte),也没有令人振奋的奔放思想(schwunghaften

---

<sup>①</sup> 萨蒂尔在希腊神话中是半人半仙的神,酒神的淫荡的伴侣,身上长有尾巴、角和山羊的腿。——译注

<sup>②</sup> 《马恩论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4卷,第166—168页。



Ideengang)。

马克思自己的诗作经不起他本人写作时逐渐形成的这些批判原则的考验。他现在明白自己永远不会成为一个真正诗人。生过一场病之后,他就把存留的小说和诗稿统统付之一炬,(他写信给父亲说)“我以为我能把它们丢得一干二净;直到现在,我丝毫没有发生过与此相反的情况。”<sup>①</sup>然而,他并没有完全放弃出版文学作品的愿望;就在刚刚摘引的那封1837年11月10日写给父亲的信中流露了他和阿达尔·别尔特·冯·夏米索<sup>②</sup>之间的不快,夏米索拒绝了马克思投寄给他的一篇为一个文学年鉴写的诗稿。<sup>③</sup> 20

那位渴望而感激地接受马克思许多诗作的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又怎么样了呢?她并没有完全被剥夺掉诗意的爱情纪念品。马克思虽然没有再寄给她自己的诗作,却寄给她一种稍有不同的敬献品作为代替,那就是手抄的一部民间诗歌,其中大部分并非摘自最为明显的来源——阿尔宁和布伦塔诺的《儿童的奇异的号角》<sup>④</sup>,却是摘录埃尔拉赫、克雷契麦尔和祖卡马利奥稍为加工的改写本。马克思抄录这些民间诗歌,(偶而把“卡尔”和“燕妮”这两个名字代替其中的“汉斯”和“罗莎”),寄给他的未婚妻,让那些创作或修订日耳曼民歌的无名诗人替他说话。随同抄本附去的一封信

---

① 《马恩论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4卷,第171页。

② 阿达尔·别尔特·冯·夏米索(1781—1838),德国浪漫派诗人,《彼得·施莱米尔的不平常的故事》的作者。1837年10月,马克思建议在《德国缪斯年鉴》中发表他的几首诗。这些诗没有被当时已经筹备停当的《年鉴》接受,退给了马克思,并附有夏米索的一封信。——译注

③ 见《马恩论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4卷,第172页。

④ 阿尔宁和布伦塔诺1806—1808年间共同搜集出版的民歌集《儿童的奇异的号角》是献给歌德的,只选了一些人民安于古老的生活方式和甘心忍受封建压迫、安贫知命等方面的诗歌,很少有对于专制政体、贵族和教会抱反对态度的诗歌,但保留了民歌的朴素和单纯,在语言和形式上对当时诗人发生不少影响,引起人们对于民间文学的重视。歌德和海涅一般是反对浪漫派的,但对此民歌集却给以很高的评价。——译注



短笺还使她领会到他常和一些值得尊敬的诗人在一起，因为他解释道，有一首源自阿尔巴尼亚的诗歌已经收进拜伦的《查尔德·哈洛德游记》。<sup>①</sup>

那封写给父亲的信，提供许多关于马克思早期活动的实据，中间还有一段记载马克思服膺黑格尔的经过，而更早一些时候黑格尔哲学曾经使他感到厌恶。这桩事显然是用一种得之于德国浪漫派诗歌的意象讲出来的：

“……我的这个在月光下抚养大的可爱的儿子，好象阴险的妖女一样，把我引到敌人的怀抱里了。”<sup>②</sup>

马克思非但没有背离却转向黑格尔，从而使他感到苦恼，对父亲说他就象犯人一般在“洗心烹茶”的施普累河污水旁边的花园里乱跑<sup>③</sup>。那带引号的词汇是摘自海涅《北海》组诗中《和平》(Frieden)一节，海涅后来由于感到这一节讽刺性太强而把它删除了。马克思显然开始发挥特别敏捷的记忆力，引用语言大师们所创造的词句来增强自己观点的表达。正如尼格尔·瑞夫斯颇为有理地提出：

“这段引语虽短但具有说服力，因为《和平》一诗也许是海涅全部早期抒情诗作里最为嘲讽的一首……诗人在第一部分幻觉救世主在水上行走那副庄严形象，同那种把如此虔诚的思想放入激烈的社会斗争中去的伪善作法，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对比……这首诗

---

① 见《马恩全集》，第1卷，第2分册，第96页。

② 《马恩论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4卷，第170页。

③ 同上。

早在海涅批判基督教是社会和政治体制的侍女之前就已经出现。”<sup>①</sup>

因此,马克思早期引用《和平》这首诗,可以看成是个线索,表明在他自己写诗那个时期以后,有些事物把他吸引到海涅那方面去了,表明海涅的思想和表达方式将会在某些方面影响马克思后来对社会的批判和对社会的阐述。

“分清包括黑格尔在内的德国古典哲学外在的晦涩难解和内在暗含的革命内容;德国哲学自康德以来的阐释在精神方面的贡献堪与法国大革命相媲美;相信思想决定世界的进展,哲学革命会带来一场德国政治和社会革命;认为哲学本身并无价值,它的真正价值在于对现实的影响,在于**实践**;断言基督教同专制主义同人的内心自我分裂的起因有关联;宣告一个主观主义的时代正在上升……”<sup>②</sup>

——这些只是马克思和青年黑格尔派在阐述自己这类观点之前都在海涅著作里找得到的一部分思想。但是,海涅注重的那种见解,即决定世界进展最有效的是观念,随着马克思自己的观点逐渐形成,他越来越对这种见解难以接受,例如马克思后来对历史发展过程的想法使他不能赞同海涅对罗伯斯庇尔<sup>③</sup>的看法,海涅把罗伯斯庇尔比拟为一只“血腥的手”从时代的子宫里拽出一个身体,

<sup>①</sup> 见瑞夫斯:《海涅和青年马克思》一文,《牛津日耳曼研究》第7卷,第52—53页。马克思在描绘柏林庸人伪装自由的英雄时,再次引用了海涅这句诗(见1842年11月30日致卢格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7卷,第435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57页。

<sup>③</sup> 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1758—1794),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杰出活动家,雅各宾派的领袖,革命政府的首脑(1793—1794)。——译注



而其灵魂乃由卢梭所造。<sup>①</sup>

22

马克思早期写过一首讽刺短诗，其中有一节幽默地提到黑格尔的美学：

原谅我们这些编造讽刺诗文的家伙，  
倘若我们哼得不那么搭调，  
我们是从黑格尔那里学来的，  
还没有把他的美学涤除干净。<sup>②</sup>

米哈依·里弗希兹<sup>③</sup>在他的著作里援引了这节诗，认为马克思在皈依黑格尔主义的过程中，“彻底研究了黑格尔的《美学》，他无疑是在1837年夏季读的。”<sup>④</sup>马克思通晓黑格尔的文艺观，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他的笔记和著作却提供很少证据表明他直接阅读过1835年首次出版的美学讲稿、后来通称之为黑格尔的《美学》。马克思自己偶而论述美学时所引证的黑格尔大部分见解，不是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德国美学的一般思潮<sup>⑤</sup>，便是黑格尔在其他著作（主要是《精神现象学》）里已经阐明的见解，这些著作我们

---

① 见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第3卷。

② 《马恩全集》，第1卷，第2分册，第42页。W·M·约翰斯敦再一次评论得很中肯：“马克思在这里设想如何实际应用黑格尔的美学。如果它不能帮助诗人写得更好，那又有什么用途呢？”（见《卡尔·马克思1836—1837年的诗作》，第261—262页）。

③ 米哈依·里弗希兹（1905—），苏联哲学家、美学家及文艺批评家，1925年起在莫斯科各高等院校讲授哲学与美学。1938—1941年主编《名人传记丛书》，1938年主编《马恩论艺术》与《列宁论文化与艺术》，二次大战后，主要研究苏联文学与外国文化的问题。——译注

④ 见米哈依·里弗希兹：《卡尔·马克思的艺术哲学》，R·B·威恩译（纽约，1938年；再版本，伦敦，1973年），第12页。

⑤ 参阅S·帕祖拉：《马克思和德国古典美学》（华沙，1967年）。

知道马克思曾经深入细致地研究过<sup>①</sup>。

## (2)

想成为诗人的愿望破灭之后，马克思有段时间想把文学和哲学结合起来，他草拟了一篇柏拉图式对话体的文稿《库列安特斯，或者关于哲学的出发点和必然的发展》<sup>②</sup>，但是他发现这篇对话虽然没有把他带回到诗歌创作方面去，却使他越发坚定地倾向黑格尔和哲学：“我最后的提纲成了黑格尔体系的开端……”<sup>③</sup> 几年之后，也就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他打算写一出题名为《鞭挞费歇尔》(Fischer vapulans)的笑剧来反对克·柏·费歇尔在《神学思想》(Die Idee der Gottheit)一书里证实有神论的企图，但这个计划没有实现<sup>④</sup>。他还计划办一个剧评刊物，也没有成功。于是马克思以更大的热诚投入哲学研究，1839到1841年间，他致力于撰写博士论文《德谟克里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这篇完成的论文的序言清楚地说明马克思发现文学在这一阶段起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作用：

“哲学，只要它还有一滴血在它的征服世界的、绝对自由的肝脏中跳动着，它将永远象伊壁鸠鲁那样向着它的反对者叫道：‘那摒弃群氓的神灵的人，不是不诚实的，反之，那同意群氓关于神灵的

---

① 参阅格·黑尔曼：《马克思和黑格尔，从思辨到辩证》(法兰克福，1966年)。

② 据马克思写给父亲的信中说，这篇稿子写了将近24张印刷页。这篇对话没有保存下来。——译注

③ 《马恩论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4卷，第170页。

④ 见《马恩全集》，第1卷，第2分册，第237页。另参阅麦克莱兰：《马克思主义之前的马克思》一书，第94页。



意见的人才是不诚实的。’

哲学并不掩藏这一点，普罗米修斯自己承认道：

说老实话，我痛恨所有的神灵。

这是他的自白，他自己的格言，借以表示他反对一切天上和地下的神灵，因为这些神灵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不应该有任何神灵同人的自我意识并列。

对于那些以为哲学在社会中的地位似乎日益恶化而为之欢欣庆幸的可怜的懦夫们，哲学再度以普罗米修斯对诸神的奴仆赫耳墨斯<sup>①</sup>所说的话来回答他们：

你要知道，我宁肯忍受痛苦

也不愿受人奴役；

我宁肯被缚住在崖石上，

也不愿作宙斯的忠顺奴仆。

普罗米修斯是哲学历书上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

柏林，1841年3月<sup>②</sup>

于是，往昔伟大的文学跨越时代向人人发言，这里摘录埃斯库罗斯<sup>③</sup>的《被缚住的普罗米修斯》的词句就是打算向那些阅读博士论

---

① 赫耳墨斯，希腊神话中众神的使者，亡灵的接引神，以神通广大，多才多艺著名。——译注

② 参阅马克思，《博士论文》，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页。

③ 埃斯库罗斯（公元前525—456），杰出的古希腊诗人和悲剧作家。恩格斯称他为“悲剧之父”。保存下来的有七个悲剧，他所创造反对神的暴虐的战士——普罗米修斯的雄伟形象（《被缚住的普罗米修斯》，约公元前470—460年），以后成为争取人类解放斗争的象征。——译注

文的十九世纪德国读者说的。希腊戏剧的中心人物，特别是泰坦式<sup>①</sup>的反叛人物普罗米修斯，可以作为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人们表达愿望的代言人。在马克思的早期诗歌里，例如在《人类的尊严》里，尤其是在《失望的人的祈祷》(Des Verzweifelnden Gebet)里，那种概括性的普罗米修斯式造反精神，现在体现在一个文学的象征身上了。<sup>②</sup> 普罗米修斯这里说的是埃斯库罗斯让他说的话(马克思用希腊原文摘引了这几行对话)，但埃斯库罗斯几乎不大可能承认那种认为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神性的想法是他的普罗米修斯的想法。德意志狂飙时代的普罗米修斯，特别是歌德著名的挑衅性诗篇，连同新黑格尔派哲学，恰恰形成一个三棱镜，原始神话和埃斯库罗斯的词句则通过它而折射出来。

马克思在那一部分没有附入他的论文最后定本中的笔记里，确实有意识地把埃斯库罗斯和黑格尔联系在一起：

“正如传说中丢卡利翁在创造人们的时候把石块往背后一扔<sup>③</sup>，哲学在决心创造世界的时候，也是把自己的眼光投向身后(哲学的母亲的尸体在那里分化成了发光的孤岛)；但是如同从天上偷了火来的普罗米修斯开始建筑房屋和在地上定居下来那样，那掌握了整个世界的哲学也挺身出来反抗现象的世界。现在的黑格尔哲学就是如此。”<sup>④</sup>

① 泰坦，希腊神话中传说曾统治世界的巨人族的一成员，力大无比。——译注

② 《马恩全集》，第1卷，第1分册，第30—31页、48—50页。另参阅R·桑瓦尔德：《马克思和古代文艺》(苏黎士，1957年)，第70—72页。

③ 丢卡利翁，希腊神话中的王，地上洪水时，他和妻子仅存。他往身后丢一块石子即成男，他妻子往后丢一块石子即成女，因此世界上人类又复增殖。——译注

④ 《马恩论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2卷，第51页。



至于清楚地提到埃斯库罗斯《被缚住的普罗米修斯》一剧中第453和454两行，马克思是想把普罗米修斯的神话，象丢卡利翁的传说那样，转变为他那个时代的哲学状况的一个象征。他在古代伟大的诗人所铸造的神话里，发现一些形态可以用来比拟后世人们的经验。马克思希望通过这种比拟，让我们更清楚地观察我们当代世界，同时对它表示态度，在精神和感情上作出反应。

25 马克思本着这种精神，选择希腊哲学的一个时期作为论文的中心论题；这个时期的哲学出现在他称之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博大的”哲学体系之后，在他看来，同黑格尔之后的德国哲学情况极为相似，因此可以指望用它来阐明现时的情况。关于这种相似之处，阿·恰·麦肯泰尔<sup>①</sup> 阐发得特别清楚：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是他对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希腊哲学状况进行的研究的一部分。希腊哲学当时发生的情况是趋向实际，它从思辨的形而上学转向伦理学。这一点启发了马克思来解决自己的问题。黑格尔原则上完成了思辨哲学体系，但是黑格尔哲学依然停留在思辨和理念的领域内。而应该做的是在世界上实现这种理想，不光是停留在思想上不动，而要体现在物质现实上面。黑格尔的理论必须转变为马克思的实践。这就是马克思要解决的问题。”<sup>②</sup>

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时代，可能有些阶段相互符合。这种符合性可以而且应当加以承认，就象承认每种文化每个时代有其独具的特

---

<sup>①</sup> 阿·恰·麦肯泰尔(1929—)，当代英国哲学教授，曾先后在里子、牛津、哥伦比亚等大学讲学，著有《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1954)、《伦理学简史》(1965)、《理论和哲学分析》(1971)等书。——译注

<sup>②</sup> 参阅阿·恰·麦肯泰尔，《马克思主义阐释》(伦敦，1953年)，第39页。

色一样。这种符合性甚至可以为当前和将来提供重要的借鉴和教益。

所以，马克思在博士论文里试验了一种把古今紧密相连起来的文学重迭技巧，这是毫不令人感到奇怪的。受到卢克莱修赞扬的那位使人摆脱沉重宗教负担的伊壁鸠鲁，马克思称他为“最伟大的希腊启蒙思想家”（der grösste griechische Aufklärer）<sup>①</sup>；这就在读者眼前同时闪现了古代世界和最近的启蒙运动——那鼓舞过他的父亲并使马克思越来越感到自己固守其传统的欧洲启蒙运动。有这种感觉的并非马克思一人，莫泽斯·赫斯<sup>②</sup>当时描绘马克思时说，“想想看，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sup>③</sup>、莱辛、海涅和黑格尔这些人熔合成为一个人——我说熔合，而不说并列——于是您就有了马克思博士。”<sup>④</sup>

马克思谈到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古希腊哲学，也就间接地谈到黑格尔以后的德国哲学；谈到伊壁鸠鲁和希腊多神教的关系，也就间接地谈到他本人和近代欧洲的犹太—基督教信仰的关系。可是，除了相似性之外，他也让我们看到差别性；类似性和同型性必须鲜明地揭示新情况和旧情况之间的差别。<sup>⑤</sup>

26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从而对历史中的独特现象及其再现性提供了一个敏锐的辩证看法。许多思想史学家赞同那种历史的生物—有机体系的想法，即“发生、繁荣和衰亡是每一个人事方面的事物

---

① 马克思：《博士论文》，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8页。

② 莫泽斯·赫斯（1812—1875），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40年代中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译注

③ 保尔·昂利·霍尔巴赫（1723—1789），法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无神论者，法国革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之一。——译注

④ 见《马恩全集》，第1卷，第2分册，第261页（1841年9月2日致贝特荷尔德·奥尔巴赫信）。

⑤ 参阅格·黑尔曼：《马克思和黑格尔，从思辨到辩证》一书，第357—358页。



所注定了必定要走通的一环，”<sup>①</sup> 马克思则认为这纯属老生常谈，他指责这种体系的概念太不明确太一般化；它可以容纳一切事物，但用这些空泛的观念却什么事物也不能得以理解。就连每次历史事件中的衰亡情况也是不尽相同的，所以他计划提出他已经着手研究的现象的特殊性，即古代世界的伊壁鸠鲁主义、斯多葛主义和怀疑主义<sup>②</sup>。然而，特殊性也还不足以说明问题，还应当把伊壁鸠鲁主义、斯多葛主义和怀疑主义看成是“希腊迁移到罗马去的形态”，罗马精神的“原型”(Urtypen)，以及那种取得近代世界充分公民权的、充满特性而凝聚的永恒“本质”。<sup>③</sup>

诺·戴·李威古德<sup>④</sup>令人信服地指出马克思赞扬伊壁鸠鲁的原子论甚于与之有关的德谟克里特<sup>⑤</sup>的唯物论哲学，是因为他可以在其中发现一种“自由运动”，有可能对他一向厌恶的那种机械唯物主义加以缓冲。李威古德评论道，“马克思正是在伊壁鸠鲁的原子脱离直线的倾斜运动概念中找到了对他的问题的部分解答。原子往下降落的这种‘倾斜’理论，可以作为一种唯物主义体系中有

---

① 马克思：《博士论文》，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页。

② 伊壁鸠鲁主义创始人伊壁鸠鲁(公元前341—270年)是古希腊哲学家、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奴隶主民主制的思想家。他认为哲学的目的是追求人的幸福，为了获得幸福，就必须摆脱偏见，掌握自然规律的知识。斯多葛主义是古代奴隶占有制社会的一个哲学派别(公元前4世纪末到公元6世纪)。它鼓吹人完全听从命运的宿命论观点，其伦理思想对于基督教思想的准备过程发生过很大的作用。怀疑主义在古代社会中的创始人一般认为是皮浪(约公元前365—275年)，是对可靠地认识客观世界的可能性表示怀疑的哲学观点，它盛行于奴隶占有制衰落时期。伊壁鸠鲁主义、斯多葛主义与怀疑主义这三个古代希腊哲学学派一般统称为自我意识的哲学。——译注

③ 参阅马克思：《博士论文》，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页。

④ 诺·戴·李威古德(1933—)，当代美国加州大学教授，著有《马克思哲学中的行动》(1967)等书。——译注

⑤ 德谟克里特(公元前约460—370年)，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他是“希腊人中第一个知识最渊博的人”。——译注



关自由运动的依据。”<sup>①</sup>在马克思看来，哲学中对世界概念的改变，也同样可以在文学艺术中找到。荷马的美丽、一体化世界是伊壁鸠鲁以前的概念，正如卢克莱修的世界是伊壁鸠鲁以后的概念，两者都同样彰明较著；伊壁鸠鲁的神灵“和人相似，居住在现实世界的世界与世界之间的空间，没有躯体，但有某种类似躯体的东西，没有血，但有某种类似血的东西，优游在幸福的宁静之中，不听取任何祈求，不过问人间和世界的事务，这些神灵之受到尊敬，是由于它们的美丽、它们的庄严和它们优秀的本性”——这并不是这位哲学家虚构的事物。“它们本是存在着的。它们乃是希腊艺术里面所塑造成的神灵。”<sup>②</sup>

27

上面引证的一段话说明了两个问题。首先表明年轻的马克思对十八世纪的美学和艺术史造诣很深，因为他这里说的关于伊壁鸠鲁的神灵的话显然是在重复文克尔曼对希腊雕塑那种“怡然自得”的赞颂。文克尔曼在他的《古代艺术史》(Geschichte der Kunst des Altertums 德累斯顿，1767年版)中说，这种怡然自得的神情“促使伊壁鸠鲁明白地表示出他对于神灵的形体的看法，他给它们一个象身体的身体，象血的血，但西塞罗则认为这种说法含混不清，且不可理解。”

上面引证的马克思那段话还提出一个有力的、也许是主要的原因，说明为什么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会成为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的中心论题。他们在他们的著作里找到一种手段，可以借以排除单纯的宗教信仰；这项任务他同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左派都认为是当前时代最迫切的任务之一。卢克莱修在他的《物性论》中不是确实声明过，伊壁鸠鲁企图表明“那些由之万物才被创造的原素，以及

<sup>①</sup> 参阅诺·戴·李威古德：《马克思哲学中的行动》(海牙，1967年)，第44页。

<sup>②</sup> 马克思：《博士论文》，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2页。



万物之成如何未借神助”吗？<sup>①</sup>（重点系本书作者所加）

毋庸置疑，这篇博士论文显示马克思即使在早期也不能设想哲学仅属于思维领域；哲学家内心的光亮点燃了外部世界的火焰：

“那本来是内在的光的东西就成为转向外面的燃烧着的火焰。”<sup>②</sup>

由此我们已经可以辨认出马克思后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结尾阐发的论点<sup>③</sup>，潜伏在这种普罗米修斯式的形象里。

28 但是，马克思撰写博士论文时所作的笔记，也十分清楚地显示他当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名黑格尔信徒，所以他认为古希腊时代是自然和艺术时代，而近代则是精神和哲学时代：

“古代人的前提是自然界的活动，而现代人的前提则是精神的活动。古代人的斗争只有在可见的天国、生活的实体的联系、政治生活和宗教生活的吸引力被打破的时候才得以告终，因为要达到精神在自己内部的统一，自然就不得不被打碎。希腊人创作雕像，用赫淮斯托斯<sup>④</sup>的艺术锤子把自然打碎；罗马人把自己的宝剑直接刺入自然的心脏；这两个民族都灭亡了。但是近代哲学撕下了神的言词的封条，把它投到精神的圣火中销毁了；近代哲学不是脱

---

① 见莫里斯·康福斯：《唯物主义与辩证法》（《辩证唯物论导言》第1卷修订版，伦敦，1968年），第30页中的摘录。（中译文引自卢克莱修：《物性论》（方书春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9页。）

② 马克思：《博士论文》，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5页。

③ 指马克思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8页。）——译注

④ 赫淮斯托斯，古希腊神话中的火和锻冶之神。——译注

离了自然引力的单个背教者，而是同精神战斗的精神战士……”<sup>①</sup>  
(着重号系本书作者所加)

马克思谈到“赫淮斯托斯的艺术锤子”击碎自然的统一这句话，再一次显示他的思想受希腊神话的影响有多么强烈，他多么经常借助它来描绘历史进程和艺术工作过程。

这篇博士论文和为此而作的笔记还显示马克思从文学里洞察那些消逝的民族的思想感情，这些民族的哲学他也已开始研究。他把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作品并列，试图阐明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和思想家以及他们所隶属的人民的显著特征。于是，卢克莱修被安排来反对荷马和普卢塔克<sup>②</sup>。

“卢克莱修是真正罗马的史诗诗人，因为他歌颂了罗马精神的实体；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已经不是荷马的充满人生乐趣的、强有力的、完整的形象，而是健壮的、身披甲冑的英雄，他们身上再没有其他任何的品质；我们看到的是‘人对人象狼一样’的战争，是自为的存在的凝固形式，是丧失了神性的自然和脱离了世界的神。”<sup>③</sup>

上面摘录的这段话表明年轻的马克思企图解释伟大作家如何代表和表达他们所生活的那个世界的“精神”。同时用一种看来不会使文克尔曼、海德<sup>④</sup>或歌德感到惊奇的方式，重新阐述了那种由欢乐

29

---

① 《马恩论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2卷，第45—46页。

② 普卢塔克，古希腊历史学家和道德学家，他在《希腊罗马伟人传》中生动地描绘了四十六位著名人物。另外著有带有折衷主义的哲学著作《道德》。——译注

③ 《马恩论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2卷，第56页。

④ 约翰·哥特弗利德·海德(1744—1803)，德国作家和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文艺理论家，对进步的“狂飙”文学思潮的形成起过一定的作用。——译注



恬静、力量、全面发展和自我完整的形象所构成的古典理想的典型——(die) heitern, kräftigen, totalen Gestalten des Homer。这里重点主要放在作品本身上，把它们作为理解世界的一种荷马—希腊方式和一种卢克莱修—罗马方式；但是这些笔记的其他段落则更重视这些作品在不同的读者身上可能引起的反应。

“正象自然在春天就脱去外衣，仿佛它意识到自己的胜利，把自己所有的魅力都显示出来，而在冬天就用冰雪来遮盖自己的屈辱和寒伦，——朝气蓬勃、叱咤世界的大胆诗人卢克莱修跟用道德冰雪来掩盖卑微渺小的“自我”的普卢塔克是完全不同的……什么人感到更道德和更自由呢，是那刚走出普卢塔克的教室，反复考虑善人随着死亡而就失去自己生命的果实这种不公平的事情的人呢？还是那洞察永恒的完满境界、用心倾听卢克莱修的豪爽的宏亮的歌唱的人呢？……”<sup>①</sup>

马克思发现在探讨古代哲学时经常要与诗学的探讨相结合；在近代，他也发现在对待黑格尔那种苏格拉底式佯装无知法<sup>②</sup>的态度时，不能不瞥视一下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sup>③</sup>那种从文学引伸出来并反过来为之服务的理论。<sup>④</sup>

马克思后来在著述里突出运用文学的另一种方式，在他这篇博士论文里也已经显露出来，论文劈头第一句话就是：“希腊哲学看起来似乎遇到了一个好的悲剧不应遇到的结局，即暗淡的结

① 《马恩论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2卷，第57页。

② 指辩论中佯装无知，接受对方的结论，然后用诘难的方式逐步引到相反的结论而驳倒对方。——译注

③ 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1772—1829)，德国文学批评家，语言学家和诗人，浪漫主义理论家之一。——译注

④ 参阅《马恩全集补编》(柏林，1968年)，第1卷，第221页。

局。”<sup>①</sup> 马克思原来打算编辑剧评杂志但受挫的那种抱负，好象正被他的哲学吸收进去了。戏剧文学提供了隐喻或结构上的类比，而且可以用来澄清许多与文学毫无关联的问题。

最后，这篇博士论文显示马克思喜欢引证他所敬仰的古今作家的词句，或是用来表达他自己想说的话，或是适应他自己的目的。伊壁鸠鲁之所以吸引他，可以用卢克莱修的话语来很好地说明： 30

“没有什么神灵的威名或雷电的袭击  
或天空吓人的雷霆能使他畏惧……”<sup>②</sup>

他对希腊哲学的衰亡所发的感触，可以用席勒剧本《强盗》第三幕第二场中的一个形象同伊索寓言里的一个形象相对比的方式来绝妙地表达出来：

“不过英雄的死亡与太阳的西落相似，而不象青蛙鼓胀了肚皮而破裂致死那样。”<sup>③</sup>

他对“基督教化”的希腊哲学家的印象，也能以海涅式的话鲜明地表达出来；海涅在他那部关于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著作《Die romantische Schule》<sup>④</sup>，1833年)中写道，“贞洁的僧侣用围裙围住

---

① 马克思，《博士论文》，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页。

② 同上书，第48页。马克思说：“因此伊壁鸠鲁是伟大的希腊启蒙思想家，他是值得卢克莱修的称颂的。”这里引证的是卢克莱修称颂伊壁鸠鲁的两句话。——译注

③ 同上书，第2页。

④ 《浪漫主义派》。——译注



维纳斯雕像”，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里同声附和道：

“伽桑第<sup>①</sup>……竭力要使他的天主教的心和他的异教的知识相协调，使他的伊壁鸠鲁和教会相适合，这当然是白费气力的。这正如一个人要想在希腊名妓雷伊丝皎洁美好的身体上披上一件基督教尼姑的道衣。”<sup>②</sup>

“……als wollte man der griechischen Lais einen christlichen Nonnenkittel um den heiter blühenden Leib werfen”——甚至连副词“heiter”（皎洁）和形容词“blühend”（美好的）都是海涅喜欢用于描绘希腊世界的词汇，海涅常把希腊的“肉欲主义”同基督教的禁欲态度相对比<sup>③</sup>。

综上所述，从1835到1841年间，马克思有以下几方面的表现：他所怀有的那种从事文学创作的欲望，本国有才具的人没有哪个在这方面比得上他；他倾向于批判别人对待生活和学识的态度，从而在这过程中建立起自己在这方面的态度。他对于文学作品的影响、对于它所体现作者意图和时代的方式感到兴趣；他把文学批评的术语转用到人类活动其他领域去的那种爱好逐渐增长；他对于文化历史中既包含特殊性也包含再现性的那种观点日渐形成。我们还看到他对古代诗歌的爱好，尤其爱好埃斯库罗斯<sup>④</sup>和卢卡

① 比埃尔·伽桑第（1592—1655），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学说的拥护者和宣传者，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译注

② 马克思：《博士论文》，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页。另参阅前引桑瓦尔德一书，第70页。

③ 关于马克思这篇博士论文的哲学涵义，以及其中对希腊雕塑的阐释，标志着他朝否定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方向迈进一步，请参阅米·里弗希兹前书，第21—32页。

④ 据拉法格说，马克思每年要把埃斯库罗斯的原著读一遍。他始终是古希腊作家的忠实的读者，而且他恨不得把当时那些教唆工人去反对古典文化的卑鄙小人挥鞭赶出学术的殿堂。（见梅林：《马克思传》，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41页。）——译注

莱修的作品；在马克思看来，这两位作家既表达了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文化氛围，也流露了后代人可以认为是他们自己的渴望；他喜爱希腊神话；他尊重歌德和席勒的诗歌，而蔑视那些批判他们的十九世纪评论家；德国浪漫主义的某些方面曾引起他的兴趣（如浪漫派对民间诗歌和有关这方面的许多论题的关注），但很快就被怀疑和厌恶所抵销了；他跟海涅有亲密友好的关系；他能从他所喜爱而尊敬的作品里找到词句、形象和象征，借以表达自己的思想，若无它们的相助是不会表达得那样有力的。这些象征当中最突出的就是普罗米修斯，那个在《被缚住的普罗米修斯》剧本中讲出埃斯库罗斯赋予的话语的普罗米修斯，但显然是年轻的歌德和德意志狂飙时代的作家心目中的那个普罗米修斯。



## 第二章

### 第欧根尼的灯笼

“至于莱茵著作界的例子……那是打着第欧根尼的灯笼①走遍五个专区也无法找到的‘真正的人’。”②

1841年4月，马克思获得博士学位以后，有一阵子想去大学执教。但是不久就很明显，德国没有一家大学愿意接纳他。他于是计划写几部书，有的主题是关于美学的；其中有一部关于宗教和艺术的稿子，似乎已经写得相当可观，可是后来由于马克思对文中显露的黑格尔学派倾向感到不满意，因此从未发表③。但是，他为准备写这部著作而做的研究工作，却使他受益不浅。查尔斯·德·布罗塞斯④那部关于拜物教的著作启发他后来变换一下主题，对“商品崇拜”进行了富有独创性的分析；卡·威·勃蒂格⑤、约·雅·

---

① 第欧根尼(公元前约404—323)，古希腊哲学家。据说第欧根尼轻视安乐而住在桶内，白昼点灯笼寻找正人君子。——译注

②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5页。

③ 见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7卷，第419页起。

④ 查尔斯·德·布罗塞斯(1709—1777)，法国历史与地理学家，曾任迪容和巴黎议会议长，研究过澳大利亚与波利尼西亚土著风俗习惯，著有《澳洲大陆航行记》等书。——译注

⑤ 卡·威·勃蒂格(1807—1878)，瑞典美学史家，1839—1840年访问德国，1845年任新欧洲语言学、近代文学与美学教授。——译注

格隆德<sup>①</sup>和卡·弗·冯·卢莫尔<sup>②</sup>的著作则对马克思的古希腊和古罗马艺术观的形成发生过影响。1842年上半年，马克思摘录卢莫尔的《意大利研究》里的一段话，很富有代表性：

“我们如果不带宗教或美学迷信来探讨希腊艺术中的英雄和神明……无疑便在自然界一般生命当中找不出什么没有发展过或不能再发展的东西。因为在这些塑造的形象当中凡是属于艺术范畴的东西，都是那些对壮丽的体型赋予人类优美姿态的描绘。”<sup>③</sup>

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对于这种说法没有什么不完全同意的地方。

马克思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直到五十年代这段期间阅读美学著作的情况，已由里弗希兹、卢卡契和帕祖拉等学者很好地考证落实下来；至于哪些作家和作品对马克思本人艺术观的形成可能发生过影响，现在也有人开始探索。康德，文克尔曼，莱辛，歌德，席勒，奥·威·施莱格尔，（当然也包括）黑格尔都被人引证过；格奥尔格·福斯特<sup>④</sup>和费希特<sup>⑤</sup>关于“间离”艺术的想法也被引证过；此

---

① 参阅米·里弗希兹：《卡尔·马克思艺术哲学》一书第58页，里弗希兹着重指出，马克思阅读约·雅·格隆德的《希腊绘画》时所作的笔记中的一段话：“我们看到在某些具有艺术全盛特征的时期往往出现大批伟大人物。不管这种全盛的特征是什么，它对人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它们用它们生气勃勃的活力丰富了他们。而当这种单方面的文化消耗殆尽时，平庸也就接踵而至。”（格隆德是19世纪德国美术史家。——译注）

② 卡·弗·冯·卢莫尔（1785—1843），德国艺术与文学史学家，著有《意大利研究》三卷（1826—1831年）等。——译注

③ 《马恩全集》德文版，第1卷，第2分册，前言第27页与正文第114页起；另参阅里弗希兹前书第35页。

④ 格奥尔格·福斯特（1754—1794），德国作家，民主主义者，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参加者。——译注

⑤ 约翰·哥特利勃·费希特（1762—1814），德国哲学家，主观唯心主义者，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德国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译注



外,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直到卢梭、狄德罗和斯塔尔夫夫人<sup>①</sup>这些非德意志思想家和作家的文艺和社会观点,也同样有人引证过<sup>②</sup>。马克思没有必要——的确也不可能——把这些在某种程度上先于他本人思想的作家的著作全部阅读过,但是我们将会在阅读本书过程中发现他是一位求知欲极强、博览群书的读者。他对于各种思潮也非常敏感,有的思想他可以汲取过来,而(更经常的是)有些思想他可以予以驳斥。

1842年,马克思开始进入新闻界。那年二月完稿的一篇关于普鲁士书报新检查令的文章,本来是为青年黑格尔派阿尔诺德·卢格<sup>③</sup>主编的《德国年鉴》写的,但由于在检察官那里通不过而未能刊登,一年以后(1843年2月)卢格才在瑞士出版的《轶文集》<sup>④</sup>上予以发表。这个文集还刊载了几篇涉及当时一些问题的文章而招致德国检察官的不满。1842年3月,马克思加入新创办的自由派报纸《莱茵报》(《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编辑部;同年10月,他成为该报主编。这份报纸在他的领导下,销行份数巨增,但是对普鲁士检察官来说,他的方针太过激进,只因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1840年登基后似乎有起色的日子里<sup>⑤</sup>,曾有短暂时期放

① 斯塔尔夫夫人(1766—1817),法国女作家,她发展了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尤其是卢梭的思想,在《论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2卷,1800年)一书里从历史上阐明文学对社会和时代的联系。另著有《论德意志》(1810年)及书翰体长篇小说《得尔芬》(1802年)和《克林娜》(1807年)。——译注

② 参阅李·巴克森达尔和斯·莫劳斯基编:《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选》(密尔沃基,圣·路易斯,1973年),其中第40—45页有一段精彩的概述。

③ 阿尔诺德·卢格(1802—1880),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资产阶级激进分子,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主义者。

④ 《轶文集》全名是《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卢格主编的这个《轶文集》还包括马克思另一篇论文:《路德是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的仲裁人》。(据最近的研究证实《路德是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的仲裁人》一文非马克思所写。——译注)

⑤ 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登基后曾许诺颁布新宪法,但后又食言,采取更加反动的措施。——译注

宽检查尺度，《莱茵报》直到1843年3月才被查封。

马克思在报章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一篇关于书报检查制度的论文，这是對著述至关重要的问题。他在分析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的新法令背后隐藏的糊涂概念时，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其中之一是检查制度安插了一批平庸之辈对具有才能的人妄加评断，并剥夺了作家的一种基本权利——一种充分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一种采用自己独特风格的权利，这种风格必然同即使是最有见识的检察官的风格也会迥然不同。

“其次，真理是普遍的，它不属于我一个人，而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风格就是人。’可是实际情形怎样呢！法律允许我写作，但是我不应当用自己的风格去写，而且应当用另一种风格去写。我有权利表露自己的精神面貌，但首先应当给它一种指定的表现方式！哪一个正直的人不为这种要求脸红……？”<sup>①</sup>

因此，马克思觉得他不仅在为新闻事业而且也在为整个著作界而战斗。

不过，马克思在这篇关于检查制度的论文里对著述和著述评论的探讨更重要的一点，在于他热情断言作家的“真理”不是一种施与的、恒久不变的东西，“作家的一切活动对象”不能都实用地被归纳为“真理”这个一般的概念。马克思争辩道，同一个对象在不同的个人身上会获得不同的反映，并使自己的各个不同方面变成同样多不同的精神性质，但每一个著述对象也由于它的特征而需要一种合乎它的特定探讨方式。有些人忽视这种复杂性，而要求

---

<sup>①</sup> 《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7页。



著作提供一种抽象而恒久不变的“真理”，年轻的马克思告诫他们：“你们就象损害主体的权利那样，也损害了客体的权利。你们抽象地理解真理，把精神变为枯燥地记录真理的检察官。”<sup>①</sup>他还  
35 用一句莱辛式的透彻的话声明道：“Zur Wahrheit gehört nicht nur das Resultat, sondern auch der Weg”——“不仅探讨的结果应当是合乎真理的，而且引向结果的途径也应当是合乎真理的。”<sup>②</sup>

普鲁士书报检查令当中有一段特别引起马克思反感的文字，那就是责成检察官不仅要注意叛逆的情绪，也应注意语调上的冒犯。任何作品如果因“激烈、尖锐和傲慢”而带有有害的倾向，他们就应禁止其发表。换句话说，普鲁士检察官将成为文章风格的仲裁人。马克思对此表示反对，认为这种检查制度众所周知是用来专门对付反对派作家的，而支持政府的作家则不管他们的主张多么“激烈”也不会遭到丝毫粗鲁的对待。“这样一来，检察官就必须时而根据形式去判断倾向，时而又根据倾向去判断形式。如果作为检查标准的内容过去就已经完全消失了，那末，形式目前也正在消失中。”<sup>③</sup> 检察官不仅可以剥夺一位作家的主题，而且也可以剥夺他那种独特风格的形式。他可以把平庸的准则强加给那些必须呈交自己的作品由他审查的作家。

年轻的马克思还试图以其他方式把新闻工作者关切的问题同批评家关切的问题连结起来。1842年12月11日，他让《莱茵报》读者相信：“对一个国家制度的描绘并不等同于那个制度。所以，反对那种描绘的论战，并非是反对那个制度本身的论战。保守派报纸经常提醒读者注意批判性的报纸的观点是不能接受的，因为

---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9页。

② 同上书，第8页。

③ 同上书，第28页。



它们不过是个人的意见罢了，而且还歪曲现实，但保守派报纸一向忘记观点本身并不能构成主题，而仅代表对那个主题所发表的一种意见罢了，所以对观点的攻击并不一成不变地意味着对那些观点所涉及的主题的攻击。报章提出的每个对象，赞扬也好，谴责也好，从而都成为一个著述的对象，一个提供著述讨论的对象。”马克思总结道，“促使报章达到文化最高权威的水平并对人民起精神教育作用，恰恰在于它变物质斗争为思想斗争，变肉体斗争为精神和理智斗争，变对生活必需品、贪欲和经验主义的斗争为理论、认识和形态上的斗争。”<sup>①</sup>

马克思深感他对检查制度的斗争，对那种产生检查制度并由此而变得越加强硬的态度斗争，对于著述界的将来极端重要。因此，他自文章之首就求助于世界伟大的作家，看来是很恰当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劈头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不是那种心怀不满的人，在普鲁士新的书报检查法令还没有公布之前就声明说，Timeo Danaos et dona ferentes（即使希腊人带来礼物，我还是怕他们）。”<sup>②</sup> 此处引用维吉尔<sup>③</sup> 这句诗原是表示怀疑的，却得到有力的肯定；紧接着在这同一篇文章里还出现引自毕丰<sup>④</sup>、歌德、席勒、劳伦斯·斯特恩和伏尔泰的话语。马克思博览群书，兴趣广泛，加以记忆力强，因此一遇时机便能引证世界许多作家的言论；他试图使自己热情坚持的见解所包含的真理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便在各种著作里寻找对这种见解透彻的阐述、支持和肯定的

① 《马克思全集补编》，德文版（柏林，1968年），第1卷，第405页。

② 《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3页。

③ 维吉尔（公元前70—19），古罗马史诗诗人，《伊尼特》的作者。这里引用的诗见《伊尼特》第2部，一译“我害怕达耐人，甚至是送礼的达耐人”。达耐人是古希腊的部族之一，亦泛指希腊人。“达耐人的赠礼”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维吉尔《伊尼特》中所述希腊人计陷特洛伊城时所使用的木马，喻指危险的赠品。——译注

④ 乔治·路易·毕丰（1707—1788），杰出的法国自然科学家。——译注



语句。

但是，引语在马克思早期文章里还起着另外一些作用。他在1842年5月5日《莱茵报》上发表的另一篇有关书报检查制度的文章里写道：

“歌德曾经说过：画家要成功地描绘出一种女性美，只能以他至少在一个活人身上曾经爱过的那种美作为典型。出版自由也有它自己的美（尽管这种美丝毫不是女性的美），要想能保护它，必须喜爱它，我感到我真正喜爱的东西的存在是必需的，我感到需要它，没有它我的生活就不可能美满。”<sup>①</sup>

37 连歌德专家们都难以肯定马克思提出的歌德这几句话是从何处引证而来，也许马克思想到的是歌德《艺术简评》里的这句话：“一个画家没有爱过的，一个画家不爱的，他就不应当描绘，他就不能描绘。”但是在这里，马克思的动机却不难推测：他正在把以往倾注于美学研究和爱情诗篇的那股精力导向政治途径。他在设想一个完美的形象：画家、情人和为摆脱政治干预而斗争的战士溶为一人，溶为同一个人。

马克思倾注于早期讽刺小品和格言警句的那股精力，在这篇报刊文章里也并非显得不那么突出。他对《普鲁士国家报》评论新检查法令的那种作法给以冷嘲热讽，但间或好象离开了主题而言它：

“不过，读者会打断我们说：我们本来打算谈谈‘莱茵省议会的辩论’，而现在却给我们抱出一个‘无罪的天使’——新闻界上了年纪的孩子《普鲁士国家报》，并且反复地唱起了老练的摇篮曲。《国家

---

<sup>①</sup>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1页。

报》一再用这支摇篮曲使自己和姊妹们安静地沉入冬夜的梦乡。

但是，难道席勒没有说过：

智者看不见的东西，  
却瞒不过童稚天真的心灵。<sup>①</sup>

普鲁士《国家报》‘以它天真的心灵’提醒我们说，普鲁士的情况并不比英国差，我们有等级会议，而这个会上的辩论，只要日报能这样做，它是有权进行讨论的。因为《国家报》充分自豪地意识到自己的优点，它认为普鲁士报纸缺少的不是权利，而是能力……”<sup>②</sup>

文中加引号的“无罪的天使”这个词汇，是用歌德《浮士德》第一部中对甘泪卿姑娘<sup>③</sup>的两种描绘字眼，即靡非斯托斐勒司的“ein gar unschuldig Ding”和浮士德的“ahnungsvoller Engel”<sup>④</sup>，拼凑起来的。甘泪卿对靡非斯托斐勒司的疑虑和不祥之兆全被排除了，剩下的只是坦率正直。除了这个在《浮士德》原著上下文中故意自相矛盾而极为天真的形象之外，马克思还增添了另一个相关的形象，即席勒在《信仰的话》一诗中所创造的那个靠直观指导行动、视理解为羞耻的童稚天真的心灵。马克思这种不相称的并列，表面上显得天真坦率，看来骨子里暗指《国家报》也想使普鲁士臣民保持“天真”，并想鼓励那种不存任何疑虑而乐意遵从父辈权威的“孩子般的单纯”。

38

① 摘自席勒的诗《信仰的话》。——译注

②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0页。

③ 见歌德《浮士德》第一部“街道”和“玛尔特之花园”。

④ 德语：“一个完全无罪的尤物”和“疑虑重重的天使”。——译注



席勒描绘童稚的心灵在实践上超过智者的理解这句名诗，从此成为马克思的文学引语基本库存。文章中凡是引用这两句诗的段落，总是带有讽刺性的。

如果说，我一直在摘引的5月5日那篇文章，其中有歌德和席勒的支持；那末，11月30日那篇文章，莎士比亚则占了优势。开篇引语就是摘自《奥瑟罗》第一幕第三场伊阿古说的那句话：“那不过是在意志的默许之下一阵情欲的冲动而已”<sup>①</sup>；文章中对当时另一报纸《奥格斯堡总汇报》的攻击由于摘引了《李尔王》第四幕第四场的一些台词而显得颇具刺激性<sup>②</sup>。马克思把那种喜爱关切政治“丑闻”的作风归咎于《奥格斯堡总汇报》，而这种丑闻可与邪恶的伊阿古和疯狂的李尔王头脑里迷恋的性的“丑闻”相媲美。马克思指出这一点以后，又摘引《李尔王》里的其他词句对该报更加明显的一个谬误给以讽刺的称赞（“那家伙弯弓的姿势，活象一个稻草人……”<sup>③</sup>）或对该报无视事实的作风给以隐晦的评论（“即使每一个字都是一个太阳，我也瞧不见”<sup>④</sup>）。有趣的是《奥格斯堡总汇报》接受这场莎士比亚文字论战，反唇相讥，把《莱茵报》比作毕斯托尔<sup>⑤</sup>；《莱茵报》又在1843年1月12日予以回击，让它的同行把自己比作桃儿姑娘<sup>⑥</sup>也好，快嘴桂嫂<sup>⑦</sup>也好，谈论荣誉的福斯塔

---

① 见《莎士比亚全集》（9），朱生豪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300页。  
——译注

② 《马克思全集补编》，德文版，第1卷，第399页起。

③ 见《莎士比亚全集》（9），朱生豪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245页。  
——译注

④ 同上书，第247页。——译注

⑤ 毕斯托尔是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下篇、《亨利五世》、《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的人物，骗子手，胆小鬼和吹牛家。——译注

⑥ 桃儿是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里的一个轻佻的妓女。——译注

⑦ 快嘴桂嫂是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里的一个多嘴多舌的酒店女店主。——  
译注



夫<sup>①</sup>也好，悉听尊便。马克思在这里参加了新闻记者相互展开的一场活泼生动的游戏，他们确信读者毫不费劲就能理解引用这些莎士比亚人物的内在涵义，而且会参照原剧来看待他们。为了达到这场游戏的目的而利用伟大的文学，也不能说一点意义都没有。莎士比亚剧作在这里提供了人们对于人间境遇的各种反应和态度；这些都体现在伟大的角色身上，一提到哪些人物的名字就会使人联想到各式各样的反应和态度，从而便可从中审慎地选择合适的加以引用。

对于另一位伟大的作家米格尔·德·塞万提斯的情况而言，亦是如此。马克思在《铁文集》发表的那篇关于普鲁士书报检查制的文章里，对于凭仗剥夺报章目前享有的和可能享有的权利以期望改善今后文章的语调和题材的这种作法，评论道：“它遭到了可怜的桑丘·潘沙<sup>②</sup>的命运：御医剥夺了他的全部食物，使他不致因消化不良而不能很好地去完成公爵交给他的任务。”<sup>③</sup>《堂吉珂德》从此在马克思的辩论文章里很少有久不露面的时候。

另外也不光是伟大作家虚构的作品才能呈现给我们各种对待生活和经验的典型态度，单单一个作者的名字也能起这种同样的作用，因为它可以使我们联想到该作者的全部著作或其中的某些方面。马克思在1842年8月9日《莱茵报》上发表的那篇关于“法的历史学派”<sup>④</sup>的文章里，专门讨论一位著名的法学教授古斯达

① 福斯塔夫是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和《温莎的风流娘儿们》里的一个爱吹牛的儒夫，谐谑者和酒徒。——译注

② 桑丘·潘沙：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中的人物，堂吉珂德的诙谐的侍从。——译注

③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22—23页。

④ 一译“历史法学派”，是18世纪末产生于德国的法学中的一个反动学派。这一学派把国家和法看成是所谓“人民精神”自我发展的结果，反对对现行的法进行任何批判，说什么法的来源不是法律而是习惯。马克思在谈到这一学派时说它“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把农奴反抗的鞭子——只要它是陈旧的、祖传的、历史性的鞭子——的每个呼声宣布为叛乱”。该派创始人是古斯达夫·胡果，著名代表人物是萨维尼。——译注



夫·胡果<sup>①</sup>时就这样试行过：

“胡果曲解自己的先生康德，他认为：因为我们不能认识真实的事物，所以在逻辑上我们就应当承认不真实的事物（只要它是存在的）是某种确实的事物。胡果象怀疑论者那样去对待事物的必然本质，同时又象一位霍夫曼<sup>②</sup>那样去对待事物的偶然现象。”<sup>③</sup>

40 **一位霍夫曼**——马克思在这里请读者回忆恩·泰·阿·霍夫曼的鬼怪故事，想一想这些故事迫使他们心甘情愿暂且不表任何怀疑的态度。“一位霍夫曼”，他能使我们在光天化日之下看到妖魔鬼怪行走在辨认得出的德国城市街道上，因此霍夫曼恰恰是一位“怀疑者”的对立面。马克思提起这位作家另有一种在他的文章中显得十分重要的意义，那就是他尽管不那么显眼的、但仍然相当坚定地强调“法的历史学派”和“德国浪漫主义”之间存在着毋庸置疑

① 古斯达夫·胡果(1769—1844)，德国法律学家，哥亭根大学法学教授，法的历史学派创始人。——译注

② 恩斯特·泰·阿·霍夫曼，见第一章注。

③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98页。这篇论文再一次显示马克思组合自己论点的方式，他在文章结尾摘引了一句读者一眼就能辨识出是莎士比亚的话来作终结。上述引文接下去是：“因而，他根本不想证明，实证的实物是合乎理想的；相反地，他却力图证明，实证的事物是不合乎理性的。胡果自鸣得意地从各方面搬出证据来企图证明下面这一事实是显而易见的，即理性的必然性，并不能鼓舞各种实证的制度；他把所有制、国家制度、婚姻等都算做这种制度。在胡果看来，这些制度甚至是和理性矛盾的，它们至多也只不过容许在拥护自己或者反对自己的问题上空发议论。我们决不应该把这一方法看做胡果的偶然的个人特性，这是他的原则的方法，这是历史学派的一种坦率天真、不怕做出任何结论的方法。如果说实证的事物之所以应当有效，就因为它确实是实证的，那末我就必须证明：实证的事物之所以有效，并非因为它是合乎理性的，肯定不合乎理性的事物是实证的，而实证的事物是不合乎理性的，同时，实证的事物之所以存在，并不是由于合乎理性，而是由于违背理性，此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能更清楚地证明这一点呢？假如理性是衡量实证的事物的尺度，那末实证的事物就不会是衡量理性的尺度。‘这些虽然是疯话，却有深意在內。’”（《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98—99页；另参阅莎士比亚：《哈姆莱特》第2幕第2场。）（莎士比亚语引自《莎士比亚全集》（9），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45页。——译注）



的联系。

马克思对浪漫主义日益增长的怀疑和憎恶，我们由此不可能没觉察到。他在《轶文集》刊载的那篇关于检查制的文章里坦率地声明：“浪漫主义总是带有倾向的诗篇。”<sup>①</sup> 他让读者相信他的信念，即浪漫主义的倾向预示它不会给德国和世界带来什么好处。那篇关于“法的历史学派”的文章具有明显的反浪漫主义的涵义，但这篇文章对于浪漫主义以前的小说，主要是十八世纪流行的人的“自然状态”的概念，也投以怀疑的眼光。

“十八世纪流行过的一种臆想，认为自然状态是人类本性的真正状态。当时有人想用肉眼去看人的思想，因此就创造了自然状态的人的形象——巴巴盖诺<sup>②</sup>，他们纯朴得居然用羽毛去遮盖自己的身体。在十八世纪最后几十年间，曾经有人这样想：自然状态的人是具有非凡的才智的，捕鸟者到处都在模仿北美土著和印第安人等的歌唱法，以为用这种圈套就能诱鸟入网。所有这些奇谈怪论都是以这样一种真实思想为根据的，即原始状态只是一幅描绘人类真正状态的纯朴的尼德兰图画。对于历史学派来说，胡果也是那种还没有接触到浪漫主义文化光辉的自然状态的人。”<sup>③</sup>

十八世纪那种“自然状态”的概念显然并未被全部排斥，马克思还让它保留一点精髓，但也受到嘲讽。为了表达这种嘲讽，马克思诉诸文学和音乐创作里的一个人物，即莫扎特和埃马努埃尔·希肯纳德共同的天才创作《魔笛》中的奇异捕鸟人——巴巴盖诺。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26页。

② 巴巴盖诺，莫扎特的歌剧《魔笛》中的人物，捕鸟者，身穿用鸟的羽毛做成的衣服。——译注

③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97—98页。



我们刚才听到马克思表达了他对浪漫主义带有倾向的诗篇所持的怀疑态度。但是，他作为《莱茵报》的编辑，也没有放松注意另一种“倾向”。路德维希·白尔尼<sup>①</sup>在德国使这种倾向变得很时髦，那就是把政治观点和争论伪装成文学评论，特别是戏剧和演出评论，以滑过检察官的注意。马克思发现有几位打算给他那份报纸小品栏撰稿的人也想模仿白尔尼的作法。马克思对此表示反对，他在1842年11月30日写给卢格的信中说，“我声明我认为通过偶而写写的剧评之类的文章暗自偷运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原理，即一种新的世界观，显然是不适当的，甚至是不道德的。”<sup>②</sup>马克思本人这时显然是个中间偏左派，但在当时他对一些同事试图在报章上偷运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原理”尚不表赞同；这一时期，他也还没有开始系统地阐述后人一向把他的名字与之联系在一起的那种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

马克思作为一位编辑，在工作中体会到对一个优秀的文艺专栏应当意识到它的价值。《莱茵报》在头一版上，以浓线把新闻与政治评论文章同小品栏截开，登载当时对自由派事业持赞同态度的罗伯特·普鲁茨<sup>③</sup>和其他知名作家的诗篇。马克思设法吸引到他的小品栏里来的主要撰稿人是格奥尔格·海尔维格<sup>④</sup>，他的诗（公开与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sup>⑤</sup>的作品相对抗）宣称投入政治斗

① 路德维希·白尔尼(1786—1837)，德国政论家和批评家，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的卓越代表人物之一，晚年成为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拥护者。白尔尼曾指责海涅的作品缺乏所谓“倾向性”。海涅则对这种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浅薄和偏激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译注

② 《马恩全集》，德文版，第1卷，第2分册，第286页。马克思此处接下去说：“我要求他们，如果讨论共产主义，那就要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更彻底地加以讨论。”

③ 罗伯特·普鲁茨(1816—1872)，德国诗人，政论家和文学史家，资产阶级自由派，曾与青年黑格尔派有联系。——译注

④ 海尔维格(1817—1875)，德国名诗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译注

⑤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1810—1876)，德国诗人，最初为浪漫主义者，后来成为革命诗人，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50年代脱离革命斗争。——译注

争是诗人的权利和责任<sup>①</sup>，一些别的呼吁自由的诗篇也很快跟了上来，措词含混一般，但激动人心：

贵族老爷们让开路，  
让自由的灵魂翱翔远飞！<sup>②</sup>

在马克思视为同路人的现代德国诗人当中，海尔维格是头一个，而绝非末一个，可是海尔维格后来的事业和发展使马克思感到很失望。

我们无论阅读马克思早期哪篇报刊文章，都能发现他试以不同的方式把他对文学的关注同对政治的关注紧密结合起来。那篇署有他的名字、竟刊载在青年黑格尔学派<sup>③</sup>喉舌刊物《德国年鉴》（《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上的文章，就是一个有趣而恰当的例子。这篇文章训斥一位不幸的哲学家兼时事评论员奥托·弗里德里希·格鲁培<sup>④</sup>，这人曾力图证实普鲁士政府为了反对布鲁诺·鲍威尔<sup>⑤</sup>而采取的措施是适当的：

“如果德国打算写一出描写一知半解的人的喜剧，奥·弗·格鲁培博士当然是该剧中一个不可缺少的角色。命运给这个家伙安

① 参阅海尔维格诗：《党，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② 见《莱茵报》（1842年9月），另参阅H·甘姆劳等著：《卡尔·马克思传》（柏林，1968年），第51页。

③ 在黑格尔逝世后，黑格尔学派分为左右两派，右派称老年黑格尔派，左派称青年黑格尔派。青年黑格尔派代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利益，企图从黑格尔哲学中做出无神论的和革命的结论，来论证德国有进行资产阶级改革的必要。主要人物有施特劳斯、卢格、鲍威尔兄弟等。——译注

④ 奥托·弗里德里希·格鲁培（1804—1876），德国政论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1842年写了一本反对布·鲍威尔的小册子。——译注

⑤ 布鲁诺·鲍威尔，见第1章注。



排了伟人们办事所不能缺少的——一知半解的伟人尤其不应缺少的——那种刚强的坚韧性。即使他那些类似桑丘·潘沙的奇遇大致上已告结束，并有迹象得到模棱两可的恩宠，但是由于格鲁培先生接受桂冠所表现的那种令人好笑的不自觉和动人的天真烂漫，那种千篇一律的胜利还是变化多端地提高了一大步。人们甚至不得不承认灵魂中具备这种符合逻辑的坚韧性真可谓了不起，它教导格鲁培先生得出如下结论：‘因为我被踢出语文教室，’他好象在争辩，‘我预感早晚也将被踢出美学的舞厅和哲学的大厅。尽管如此遭难，也没什么了不起。不到我被踢出宗教庙堂为止，我扮演的角色那场戏就绝不会演完’，格鲁培先生认真得足能把他的戏演到底。”①

凡是读过马克思博士论文的人，都不会对上述一事感到什么惊奇。在《莱茵报》上，年轻的马克思也正在试用各种方法把诸如“喜剧”、“人物”、“桑丘·潘沙的奇遇”、“提高和变化”等等文学和戏剧评论惯用的术语和概念应用到仅与文学稍有关联而与哲学、政治和社会思想密切相关的论战上去。方法有了，下一步便是程序问题，这在马克思领导下出版的最后一期《莱茵报》的一篇文章里作了阐明；那篇文章显示马克思把文学批评与文体分析的技巧运用到剖析一份敌对报纸《莱茵—摩塞尔日报》专栏上的题材上去。这种分析同尼采后来在《不适时的看法》一书中对大·弗·斯特劳斯②的分析程序极其相似，由于再次广泛使用文学引喻而具有讽刺性，取得击

---

① 《马克思全集补编》，德文版，第1卷，第381页。

② 大卫·弗里德里希·斯特劳斯（1808—1874），德国哲学家和政论家，著名的青年黑格尔分子之一；《耶稣传》的作者，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尼采的《不适时的看法》写于1837—1876年，共四部，是他对德国缺乏文化一事有感而写的。——译注

中要害的效果：

“真正荷马风格！只消瞧一瞧这部史诗的广度就够了。还有那种对兽性心理学所阐发的透彻的见解，我猜想大概是伊索式的吧……”<sup>①</sup>

荷马和伊索提供了一个尺度，既可以衡量敌对的新闻记者那种狂妄自大的作风，也可以衡量他们失败的程度。

至于当代报刊在风格上应当受到这种剖析的文章，马克思在《莱茵报》1842年5月8日一篇文章里提供了一个实例。他主要揭露的对象是德累斯顿《晚报》，该报主编多年来一直是泰奥多尔·温克勒<sup>②</sup>，笔名为“泰奥多尔·赫尔”(Theodor Hell)。

“在严格遵守书报检查制度的1819—1830年间……我国著作界处于‘晚刊阶段’。我们可以把这个阶段称为‘真实的、高尚的、生动的和充分发展的’阶段，正象《晚报》的编辑‘温克勒’可笑地用‘光明’这一笔名称呼自己一样，虽然他身上的光芒比夜间沼泽上的磷火还要微弱。这位以‘光明’作为笔名的愚昧的乡下佬(Krähwinkler<sup>③</sup>)就是当时著作界的原型。当时精神上的大斋期一定会向后代证明，如果说只有少数的圣徒才能把四十天的斋期坚持过去，那末，整个德意志，即使不是圣徒，却能在既不生产也不需要精神食粮的情况下活到二十年以上。出版物堕落了，很难说是智力不足和形式缺乏，甚于特性不足和内容缺乏呢，还是恰恰相反。如

① 《马恩全集补编》，德文版，第1卷，第435页。

② 泰奥多尔·温克勒(1775—1856)，德国反动作家和记者，笔名泰奥多尔·赫尔，“赫尔”意即“光明”。——译注

③ 双关语，Winkler是姓，“Krähwinkler”是“穷乡僻壤的居民”。——译注



果批判能够证明这个时期根本没有存在过，应当说这对德意志最有利了。当时著作界中唯一还有生命跳动的领域——哲学思想领域，已不再说德国话，因为德意志的语言已不再是思想的语言了。精神所用的语言是一种无法理解的神秘的语言，因为被禁止理解的事物已不能用明白的言语来表达了。

44 至于莱茵著作界的例子……那是打着第欧根尼的灯笼走遍五个专区也无法找到的‘真正的人’。我们根本不认为这是莱茵省的缺陷，相反地，我们认为这是它具有实践政治意义的证明。莱茵省可以办‘自由的出版物’，但是要办‘不自由的出版物’，它既欠圆滑又缺乏幻想。

刚告结束的著作时期，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严格检查制度下的著作时期’，总之，这一时期从历史上清楚地证明：书报检查制度无疑给德意志精神的发展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惨重损失。”<sup>①</sup>

马克思使用“著作界”这个词汇，不仅包括纯文学，也包括哲学，而且连泰奥多尔·赫尔的小品文这类通俗读物也统统包括在内。马克思告诉他的读者，风格上的晦涩难懂使人可以测出犯这类毛病的作者所处的政治和社会的气候。这种结论同海涅口头讽刺黑格尔的那种结论相似，海涅指出黑格尔每逢说出一些能让人理解的话，便焦虑不安地环顾四周，唯恐他会在当局的眼中被看成是有失自己的身份。<sup>②</sup>分析一下形式和表达上的缺陷，就可以导致承认思想和精神上的缺陷。通俗读物的风格，对它的首创者来说，可以成为探测他的读者政治和社会思想健康程度的尺标。高压政策给著作界带来一些后果，一片沉寂就算其中最不错的一种了。

---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4—45页。

② 参阅海涅：《自由》（1854年）。

上面摘引的马克思那段叙述,表明他在德国境内寻求优秀、平易而诚实的写作;年轻的马克思把自己比作第欧根尼,在白昼打着灯笼四处走动,声明是在寻找一位诚实的人。这个形象比得再恰当不过了,他打着灯笼各地走访,去的次数最频繁之处莫过于莱茵省议会了。在那里,他发现一种演说术,其特性与其说来自发言人个人,毋宁说来自发言人所代表的等级。年轻的第欧根尼从而对他后来称之为“阶级”利益的事物首次进行了分析:

“辩论向我们显示出诸侯等级反对出版自由的论战,贵族等级的论战、城市等级的论战,所以,在这里论战的不是个别的人,而是等级。还有什么镜子能比关于出版的辩论更正确地反映省议会的内在实质呢?”<sup>①</sup> 45

没出多久,马克思又为他这种反诘找到另一个不同的答案;他发现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的辩论越发清楚地反映了阶级的性质,在那场辩论中,林木占有者扬言他们有权反对穷人。另一方面,他从早期作为一名议会采访记者和批评家开始,就一直对演说的风格发生兴趣,这种兴趣也由于他博览群书而进一步增长:

“法国革命时期最伟大的演说家的米拉波 *Voix toujours tonnante*(永远响亮的声音)直到现在还在轰鸣;他是一只狮子,你想要和人们一起叫一声‘吼得好,狮子!’<sup>②</sup>就必须亲自倾听一下这

---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2页。另参阅L·戈德曼:《马克思主义和人文科学》(巴黎,1970年),第137—138页。

② 此句摘自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第五幕第一场中的一句台词(见《莎士比亚全集》(2),朱生豪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363页。)—译注



只狮子的吼声。米拉波<sup>①</sup>是在监狱里受到教育的，这样，监狱岂不是变成培养口才的高等学校了吗？”<sup>②</sup>

我们从上面摘引的这一节里可以注意到马克思本人别致的文章风格（他在处理这个复合句时，把米拉波的名字一直留到临近结尾时才透露给读者，接着便是一个简单的问句）；另外也可以注意到他已经从法国革命时期的演说术中取得一种衡量标准，这种演说术他后来还曾更加精心地研究过；再者可以注意到他通过一种“归谬法”，批判了不合逻辑的争辩；此外，他还摘引了《仲夏夜之梦》第五幕里的一句名言来表达幽默的赞许。

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写的文章在本文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因为这些文章显示马克思首次试图对职业作家同他不得不在其内工作的社会经济环境之间的关系作出公开的阐述。

“为了保护（甚至仅仅是为了理解）某种特定范围的自由，我应当从这一范围的主要特征出发，而不应当从它的外部关系出发。难道降低到行业水平的出版物能忠于自己的特征吗？难道它的活动能符合自己的高贵天性吗？难道这样的出版物是自由的吗？作家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写作，但是他决不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

贝朗热<sup>③</sup> 唱道：

---

① 奥诺莱·加比利尔·米拉波（1749—1791），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贵族的利益的代表者。——译注

②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4页。

③ 比埃尔·热·贝朗热（1780—1851），法国最著名的民主主义大诗人，政治讽刺文的作者。他在七月王朝时代写了许多关于贫民和无产者的歌谣，攻击资产阶级，带有强烈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马克思曾在民主联合会致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的贺词中称他为“不朽的贝朗热”（参阅《马恩全集》，俄文第1版，第5卷，第578页）。——译注

我活着是为了编写诗歌，  
呵，大人，如果您剥夺了我的工作，  
那我就编写诗歌来维持生活，

在这种威胁中隐含着嘲讽的自白：诗一旦变成诗人的手段，诗人就不成其为诗人了。

作家绝不把自己的作品看做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无论对作家或其他人来说，作品根本不是手段，所以在必要时作家可以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自己个人的生存。宗教的传教士也是一样（虽然在不同的意义上来说），他也遵循一种原则：‘多服从上帝，少服从人们。’这些人们中也包括具有人的要求和愿望的他自己。如果我向一个裁缝定做的是巴黎式燕尾服，而他却给我送来一件罗马式的长袍，因为他认为这种长袍更符合美的永恒规律，那该怎么办呵！

出版的最主要的自由就在于不要成为一种行业。把出版物贬为单纯物质手段的作家应当遭受外部不自由——检查——对他这种内部不自由的惩罚；其实他的存在本身就已经是对他的惩罚了。

当然，出版也作为一种行业而存在，不过那已不是作家的事，而是印刷厂主和书商的事了。但是这里所谈的不是出版商和书商的行业自由，而是出版自由。”<sup>①</sup>

这段话对一场关于出版自由的辩论所作的贡献，是鲜明而有力的，而且令人难忘的是马克思在谈到著述的想法时，第一次试图把诗人的工作视为一种非异化的活动——当然并没有摆脱商业的压

---

<sup>①</sup>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87—88页。



力,但摆脱了商业价值的从属性。然而,由此而提出的问题要比答案来得多。在一个象十九世纪欧洲那种忙于错综复杂的商业交易的社会里,作家处于什么地位?即使作家是为写作而生活,而不是为生活而写作,他的作品又如何仰赖经济实力情况——生产实际情况呢?诗人和新闻工作者之间的利益的一致性确实达到了什么程度?另外,在何等意义上,可以象马克思让他的裁缝所做的那样,合法地谈论“美的永恒规律”呢?

但是,至少有一个问题马克思非得设法答复一下不可,那就是他在那篇有关检查制度的辩论文章里,不得不提到每逢一讨论检查制度就必定牵涉到区别对待这个问题。难道不应该——无必要——在伟大的作家(检察官应当赋予他们全面的特权)和为金钱而写作的拙劣的作家(他们不在这种特权的考虑之内)之间加以区别吗?马克思中肯地问道,由谁来做此区分呢?由谁来把作家划分为“够资格的”和“不够资格的”,“特权的”和“无特权的”呢?德高望重的作家,即使他的伟大获得公认,也不能担当此事,因为他不见得会赏识那些与他本人的观点迥然不同的作家。康德不会全心全意地承认费希特是够资格的哲学家,托勒密<sup>①</sup>不会承认哥白尼是够资格的天文学家,贝尔纳·德·克莱沃<sup>②</sup>也不会承认路德是够资格的宗教家。那末,是否把这种判断干脆交给那些对各行专业没有什么突出贡献的人来做呢?答案倒是不少,荒谬也层出不穷。

“但是要知道,阅读和写作一样重要;因此,读者有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称号也是必要的,这是古代埃及的产物,在那里祭司被认

---

① 克罗狄乌斯·托勒密(第2世纪),古希腊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宇宙的地球中心说的创立者。——译注

② 克莱沃(约1091—1153),法国神学家,狂热的天主教徒。——译注

为是唯一够资格的作家，同时也是唯一够资格的读者。”<sup>①</sup>

马克思确实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那些经官方鉴赏领导人从当代作家中间挑选出来并加以承认具有才能、“够资格的”德国作家，往往成为国家的一种灾难：

“德国人只要回顾一下自己的历史，就会知道造成本国政治发展缓慢以及在莱辛以前著作界贫弱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够资格的作家’。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职业的、行会的、有特权的学者、博士……以及大学的平庸作家们，他们头戴呆板的假发，学究气十足，抱着毫无价值的烦琐的学位论文横亘在人民同精神、生活同科学、自由同人的中间。我国的著作界是由那些不属于够资格之列的作家创立的。你们把哥特谢德<sup>②</sup>和莱辛两人在‘够资格的’和‘不够资格’的著者中间加以抉择吧！”<sup>③</sup>

莱辛这位热诚寻求真理的人，撰写战斗小册子的作者，无所畏惧、48  
诙谐而热情洋溢的理性战士，擅长于戏剧的结构，并紧密结合他对社会紧迫形势的理解，能够运用当代语气表达当代生活的形象——他显然在马克思的文学贤人祠中踞于高位。马克思后来在《莱茵报》上撰写的一篇文章（1843年1月13日），正是由于引用莱辛一本反对密尔希奥尔·哥采<sup>④</sup>牧师的小册子的话语而达到高

<sup>①</sup>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89页。

<sup>②</sup> 约翰·克里斯托夫·哥特谢德（1700—1766），德国作家和批评家，18世纪德国早期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曾努力整理德国的文学语言；他的著作表现了当时德国文学界代表人物的落后，闭塞和奴才相，因而受到18世纪进步作家（莱辛等）的批判。——译注

<sup>③</sup>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91页。

<sup>④</sup> 约翰·密尔希奥尔·哥采（1717—1786），德国神学家，路德教的牧师，莱辛启蒙观点的激烈反对者。——译注



潮，年轻的马克思用这些话来向自己的敌手挑战：“写吧，牧师先生，也鼓舞别人写吧，随便你写多少都行。我也要动笔写。如果我放过你的即使是一点小错误而不加反对，那就是说，我已无力再挥动笔杆了。”<sup>①</sup>另一方面，莱辛的对手——莱比锡大学教授约翰·克里斯托夫·哥特谢德，马克思则让我们通过莱辛敏锐的目光把他看成是一位官方支持的、承办过时法则的冬烘先生。

马克思为《莱茵报》撰写的一系列文章充满文学引语和譬喻。这些譬喻对事物起到一种概括性的作用：

“愚昧无知是一股魔力，因而我们担心它还会造成更多的悲剧。难怪最伟大的希腊诗人在以迈锡尼和忒拜的王室生活为题材的惊心动魄的悲剧中都把愚昧无知描绘成悲剧的灾星。”<sup>②</sup>

马克思还经常让读者注意一些非凡的作家和作品。有些引语声明是摘自《圣经》，摘自卢克莱修、琉善、莎士比亚、莫利哀、莱辛、歌德和乌兰德<sup>③</sup>的作品，摘自吕凯特译的波斯诗人哈利利<sup>④</sup>的诗篇<sup>⑤</sup>；此外，还有许多偶而运用的引喻旨在使德国读者联想到文学原作的情节：

“你们报纸上的废话不是早已把最坏、最下流的东西强加在宗教和哲学的身上吗？既然如此，哲学还能说它们什么坏话呢？哲

---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207页。马克思这几句话引自莱辛的《箴言》。

② 同上书，第129页。（原译中“不学无术”改为“愚昧无知”。——译注）

③ 路德维希·乌兰德（1782—1862），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译注

④ 阿卜·穆罕默德·哈利利（1054—1122），杰出的阿拉伯作家。——译注

⑤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108页（琉善），119页（莎士比亚），199页（莫利哀），160—161页（歌德），62页（乌兰德的诗《复仇》中的一句诗的改写），82—83页（哈利利）。

学只应该重复你们这班非哲学的修士们<sup>①</sup>关于宗教曾千百次用各种方式唠叨过的话——因而，哲学关于宗教所要说的将是最坏的话了。”<sup>②</sup>（着重号系本书作者所加）

这段话里提到的唠叨的修士，肯定会使德国读者想起“Kapuzinerpredigt”<sup>③</sup>，也就是席勒剧本《华伦斯坦》三部曲起首那位修道士粗俗而生动、颇多双关语的愚民布道词。而迴响在这些文章里的马克思本人的布道和告诫，则是号召人们不仅要思考和体验，而且要阅读和研究：“读一读西塞罗的著作吧！”他号召他的读者，Leset den Cicero<sup>④</sup>，或是“请读一读圣奥古斯丁<sup>⑤</sup>的《论神之都》，研究一下教会的教父和基督教的精神，然后再来谈：什么是‘基督教国家’——是教会还是国家？”<sup>⑥</sup>这些早期文章流露出来的是一个酷爱读书的人的语气，他同有学识的读者分享德国和外国古典文学的丰富知识，并且借助于这些知识；他向他的对手挑战，要求他们不仅应该掌握更好的逻辑性，而且应该掌握书本可以给人们带来的更多的经验和见解。

在他为《莱茵报》写的文章和后来写的更成熟的著作里，马克思显示了一种机敏的智慧，往往联系到众多的作品。他需要摘引或引证一些文学作品来论述他所见到的人类各种活动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相互之间的联系。因此，他这种擅长于摘引或引证文学作品的习惯，有助于使他的社会哲学成为一种真正的人类

① 马克思此处用的是“Kapuzin”这个词汇，意即天主教方济各会的托钵僧。——译注

②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123页。

③ 德语：方济各会托钵僧的布道。——译注

④ 德语：读一读西塞罗的著作吧！——译注

⑤ 圣奥古斯丁（354—430），波希主教，曾对教会应负罗马帝国衰亡之责的谴责进行辩解。

⑥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113、125页。



学，但这并非意味着他要把人类用以表达创造能力和愿望的各种不同的领域搞得混淆不分。马克思就弗里德里希·冯·萨勒特<sup>①</sup>写的一首哲学诗《俗人的福音》，同另两名新闻记者进行争辩的过程中，谴责对方没有注意到萨勒特不仅够不上是个神学家和哲学家，而且还是个蹩脚的诗人；《莱茵—摩塞尔日报》所引证的那些段落……有一个根本的缺点——缺乏诗意。总之，用诗意来说明神学的争论，这是多么愚蠢的想法！难道会有一个作曲家想到要为教条谱曲吗？”<sup>②</sup>马克思讨论到他称之为“这种反艺术的邪说”时，才乐意分析一下萨勒特作为思想家的缺陷。

马克思后来于1859年对他在《莱茵报》工作那段期间的回顾时，指出他所写的那一系列有关林木盗窃和摩塞尔区葡萄酒酿造者所面临的问题的文章是他思想方法转折的一个分水岭。他在50 《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中提到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他在这里声明他首次被推动去研究经济问题<sup>③</sup>，不过他还是把文学引以为重要的辅助。第一篇关于林木盗窃问题的文章（1842年10月25日）一开始就有“大戏”这类文学词汇，显出这种并行不悖的现象：

“我们在前两篇论文中已经描写过省议会演出的两场大戏，一场是讨论出版自由问题时的纠纷，一场是讨论纠纷问题时的不自由。现在演的是现实生活的戏。在谈到极其重要的真正的现实生活问题，即地产析分问题之前，我们先给读者看几幅生活画，这些画多方面地反映了省议会的精神，也可以说是反映了省议会的真

---

① 弗里德里希·冯·萨勒特（1812—1843），德国诗人，自由主义者，反对宗教迷信。——译注

② 《马恩全集补编》，德文版，第1卷，第432页。

③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7页。

正本质。”<sup>①</sup>

Haupt-und Staatsaktionen<sup>②</sup>是涉及国家大事和王公贵胄生活的大戏,这些戏是在高台上演出的;马克思接下去第二句话便请我们回到更切合实际的问题上来。下面又出现“生活画”这一引喻,更把这种比拟推进一步,并加以变化。“生活画”虽是视觉艺术上的一种术语,但在马克思那一时代也泛指文学上对日常生活的描绘,大戏所摈弃的生活各方面的描绘。马克思运用戏剧、文学和艺术的形象,诸如大戏啦,高台啦,现实生活的戏啦,真正的现实生活啦,生活画啦,本质的反映等等,不但旨在描绘,而且把政治上的体验同文学上的感受联系起来,表示态度,或作出评价。

伟大的戏剧家的作品,尤其是莎士比亚的剧作,以两种明显的方式出现在这些有关林木盗窃的文章里。首先,马克思发现这些剧作具有极其丰富、意义深刻的阐述可以单独抽出来引用而不顾其原有的上下文,因此他摘引了《李尔王》第二幕第二场康华尔公爵描绘那用“坦白”的外表包藏着极大的奸谋祸心的家伙那段话,而不提说话的那个人物本人恶劣的品格,不提说这话时那种不公正和暴虐的境遇<sup>③</sup>。但在其他场合,马克思又显然让读者联想起他的引文出处原有的上下文:

51

“然而利益是讲求实际的,世界上没有比消灭自己的敌人更实际的事情了。夏洛克就曾经教训过:‘谁不想消灭自己憎恨的东西

---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135页。

② 德语,意即阐述重大历史事件的豪华而说教的戏剧。——译注

③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119—120页。(康华尔公爵是李尔王的女婿,为人奸诈,自私自利,与妻合谋迫害老王,而他指责的那用坦白的外表包藏着极大的奸谋祸心的家伙,是为人正直、忠诚于李尔王的肯脱伯爵。——译注)



呢？”<sup>①</sup>

这里无疑涉及到《威尼斯商人》里的夏洛克的性格以及行为中结合着的贪婪和残酷。马克思进一步摘引该剧第四幕第一场中的一些台词来把这一论点说得让大家更加理解，那就是鲍细娅、夏洛克和葛莱西安诺之间的那段对话：夏洛克很不自在地问：“法律上是这样说吗？”鲍细娅答道，“你自己可以去查查看。”马克思胜利地共鸣道，“现在，你们也就看到它了。”<sup>②</sup>从而也就对他的论证作出结论：林木占有者为反对林中捡柴火的人而提出的权利是不合法的，归根结蒂是不人道的。这种非犹太封建地主同犹太人夏洛克含蓄地等同起来的作法，无疑给马克思和他的志同道合的读者一种敌意的快感。

史诗较之戏剧当然更能如此加以运用，例如马克思在有关林木盗窃的文章里，把拥护林木占有者权利的人所提出的争辩同一段摘自歌德《列那狐》<sup>③</sup>的引文并列，从而给以冷嘲热讽。马克思对这首诗怀有深厚的兴趣，因为它挖苦了形形色色的政客，而且因为它的法语、佛兰芒语和低地德语的蓝本（Roman de Renart, Van den Vos Reinaerde, Reinke de Vos）除了雅致或具有深邃的政治涵义之外，还可以从中辨认出民间艺术和通俗动物寓言的根源。如果说，德国浪漫主义作家的作为还有一点使马克思全心全意赞同的，那就是他们试图保存并研究日尔曼民间文学。1843年1月1日《莱茵报》刊载的一篇马克思的文章里，有一句生动而离

---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149页。

② 同上书，第173页。

③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160—161页。《列那狐》是歌德把高特舍特根据中世纪列那狐故事写的散文改编为六步格诗体的长诗，通过动物的言谈动作对当时封建社会的腐败现象进行了讽刺。——译注

题的话,提到“一个真正的童话”(ein wahres Märchen)是特定的人民本质的表达,是人民的思想、恐惧和希望的具体表现。<sup>①</sup>

然而,在《莱茵报》登载的马克思文章里,文学并非总是作为真理的盟友面貌出现的,例如,在他那篇《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一文里,马克思指责古斯塔夫·胡果没有分清虚构幻想的作品的论据和别种权威的论据之间的差别:

“胡果的论据,也和他的原则一样,是实证的,也就是说,是非批判的。这种论据并不知道什么是差别。凡是存在的一切事物,他都认为是权威,而每一个权威又都被他拿来当做一种根据。所以,他在某一段文章里曾引证了摩西<sup>②</sup>和伏尔泰、理查逊<sup>③</sup>和荷马、蒙台涅<sup>④</sup>和阿蒙<sup>⑤</sup>,引证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奥古斯丁的《论神之都》……”<sup>⑥</sup>

因此在使用文学引喻时,也应象在别处那样警觉地运用批判的观点,历史的观点,区分差别的观点。在马克思看来,胡果没能正确利用荷马和理查逊堪称享有的那种权威,这可以跟他分不清高级和低级的道德形式之间的区别,“皮肤上的疹子”和“皮肤本身”之间的区别相媲美。

所以,在古斯塔夫·胡果的著作里提到文学反倒使人感到迷

①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188页。(译文略有改动,“杜撰”改为“一个真正的童话”。——译注)

② 摩西:基督教《圣经》中传说率领希伯来人摆脱埃及人奴役的领袖,犹太教的教义、法典多出自其手。——译注

③ 赛缪尔·理查逊(1689—1761),英国作家,曾创文学中小市民的伤感的风格。——译注

④ 米歇尔·德·蒙台涅(1533—1592),法国哲学家,作家。——译注

⑤ 克里斯托夫·阿蒙(1766—1850),德国神学家,新教徒。——译注

⑥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99页。



惑,而没有起到启发的作用。这个论题还以另一种基调在“林木盗窃”那篇文章中的其他几个段落里加以引伸。马克思告诉《莱茵报》的读者:

“林木占有者……不仅要求小偷单是赔偿一般价值。他还要使这种价值具有个性,并根据这种**诗意的个性**要求特别补偿。”<sup>①</sup>  
(着重号系本书作者所加)

另外又对林木占有者和那些维护他们的事业的人戏剧性地说:

“由于你们**朦胧地**想象着自己的优越性并沉溺于**诗意的自我陶醉**之中,因而建议有关方面把你们个人的品质当做对付你们的法律的工具。我要承认,我不同意这种对林木占有者的**浪漫看法**。”<sup>②</sup>(着重号系本书作者所加)

53 这种得之于文学的概念:“诗意”和“浪漫看法”,可以用来掩饰残酷的现实:压迫和不公正;可以产生一种虚假的自身形象;可以感伤地支持兽性的行为。文学可以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用来作为一种自私自利的工具:

“自私自利用两种尺度和两种天平来评价人,它具有两种世界观和两副眼镜,一副把一切都染成黑色,另一副把一切都染成粉红色……当问题是要粉饰自己的两面手法时,自私自利就戴上粉红色眼镜,这样一来,它的工具和手段就呈现出一种非凡的色彩;它就用轻信而温柔的人所具有的那种渺茫、甜蜜的幻想来给自己和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141页。

② 同上书,第157页。

别人催眠……它把自己的敌人的手握得发痛，但这是出于信任。然而突然情况变了：现在已经是关于本身利益的问题，关于**在后台**（这里，**舞台的幻影已经消失**）谨慎地检查工具和手段的效用问题。”<sup>①</sup>（着重号系本书作者所加）

马克思显然意识到他有责任把那些由诗篇、小说和戏剧中的概念衍生出来的或粉饰过的幻觉驱除掉；他在1843年9月写给阿尔诺德·卢格的信中谈到更广阔的意图时提到了这项任务：

“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末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sup>②</sup>

因此文学，人们对文学的接受和利用，也都在马克思rücksichtslose Kritik<sup>③</sup> 审查之列。

在这方面，尤其重要的一点是马克思在那篇林木盗窃的文章里，首次提出一个很快在他的思想里起中心作用的概念——“意识形态”的概念<sup>④</sup>。关于那些为维护林木占有者的权利而要求私人自由意志的人，马克思讽刺地写道：“我们究竟应如何来了解这一突转急变的意识形态呢？要知道，我们在思想方面所遇见的只是

① 《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156页。

② 同上书，第416页。

③ 德语：无情的批判。——译注

④ 这个词汇从德斯托特·德·特拉西和孔狄亚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发展过程，可参阅昂利·勒弗勃夫勒著：《马克思的社会学》（英译者N·古特尔曼，哈蒙斯窝斯，1972年），第59页起。



些拿破仑的追随者。”<sup>①</sup>我们都记得拿破仑拾起“idéologues”（意识形态）这个词汇（在他之前，这个词汇原指一种从感性衍生出思想的哲学学派）是来嘲笑他所认为的那些“不切合实际”的思想家，他们生活在虚无飘渺的幻想中，而对现实状况则茫然无知<sup>②</sup>。这个词汇后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特别是在他和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也点出了这种“虚假意识”，但马克思还增添了这样一种概念，即“意识形态”反映物质状况和阶级利益；它们的社会功能，不管它们包含多少真理，不管它们的作者和传播者的目的和幻想是什么，都是“维护社会上一些阶级和集团的利益或者为他们的主张而辩护的。”<sup>③</sup>

马克思为《莱茵报》撰写的文章还有一点也很重要。他告诉我们，他意识到自己在描绘摩塞尔区葡萄酿造者的贫困境遇时带有一种粗犷甚至粗鲁的特色：

“谁要是经常亲自听到周围居民因贫困压在头上而发出的粗鲁的呼声，他就容易失去美学家那种善于用最优美最谦恭的方式来表述思想的技巧。他也许还会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有义务暂时用迫于贫困的人民的语言来公开地说几句话，因为故乡的生活条件是不允许他忘记这种语言的。”<sup>④</sup>

马克思在这里主要关注的是，把“美学技巧”的准则应用到那些旨

---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158—159页。

② 参阅P·斯达德勒：《卡尔·马克思。意识形态和政治》（哥亭根，1971年第2版），第49页，和J·普拉麦纳兹：《意识形态》（伦敦，1970年），第15页。

③ 参阅J·普拉麦纳兹：《德意志马克思主义和俄罗斯共产主义》（伦敦，1954年），第313页。

④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210页。



在激发公众良心的报刊文章上去的作法是荒谬的。与此同时，马克思也象海涅和格奥尔格·毕希纳<sup>①</sup>这些不同风格的作家那样，对当时文章的“优美而谦恭的方式”流露出不满的情绪。要表达十九世纪的现实情况就需要一种比过去曾对马克思早期诗歌发生过影响的哥亭根的林苑派诗人的措词用语更加激烈而粗犷的语言。

马克思出任新闻记者的头一年，就发现文学引语和文学隐喻能使他如何同读者取得文化知识上的交流。新闻记者在同读者分享文学感受的基础上，还能同他们作文字游戏，以往昔伟大作家的语句和塑造的人物来抒发感情，迅速刻划性格，并通过对比或对照的方式加以嘲讽。他自己说他打着第欧根尼的灯笼漫步通过著作界以寻求正直的人。他发现在他那一时代这种正直是很难达到的，因为存在着检查制度，因为社会条件迫使许多作家为了生活而写作，而不是为了写作而生活。他对著作所包含的“真理”的复杂性作出断语：同一部作品在不同的读者身上会得到不同的反映，每部著作的“对象”需要一种合乎它的特定的探讨方式。他也提出作家得到他的同时代的社会承认这一问题：哪些作家是“够资格的”或“具有能力的”(befugt)，足以作为他们的时代和社会的代言人；哪些作家没有这种资格？“够资格的”或“具有能力的”读者又该怎么样呢？他一面加深对浪漫主义的怀疑，一面继续分享德意志浪漫派对人民精神，对人民在文学上的表达所表示的尊敬。<sup>②</sup>他首次表露对唯美主义的怀疑，这种主义所采取的态度使那些境遇舒适的作家对人类乱糟糟的生活感到厌恶，而导致采用一种纤巧优雅的写作方式来回避现实，以致几乎毫不触及它。他对议会演说术产

55

<sup>①</sup> 格奥尔格·毕希纳(1813—1837)，德国剧作家和作家，革命民主主义者，1834年黑森秘密的革命组织人权协会的组织者之一，《告黑森农民书》的作者，提出了“给茅屋和平，对宫廷宣战”的口号。——译注

<sup>②</sup> 见《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187页。



生一种新的兴趣，试图把个人演说的方式和内容同它背后隐藏的社会利益联系起来。他学会搜寻那种作为虚假的自身形象并掩饰真凭实据的缺乏而滥用文学材料的实例。文学协助他执行他自愿承担的任务：让理性发挥至高无上的权威。卢克莱修的《物性论》、琉善的《对话》、莫利哀的《讨厌的人》、伏尔泰的《流浪儿》、莱辛的《反对哥采》和歌德的《列那狐》等等，都是他在往昔文学中找到的一些同盟者。作为《莱茵报》的编辑，他也在当代作家队伍中寻找同盟者；他一面跟那些想要利用他的文学专栏暗自宣传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一面高兴地采用格奥尔格·海尔维格激动人心的诗篇。第欧根尼的灯笼好象在这里找到了一个正直的人。

## 夏洛克,泰门,靡非斯托斐勒司

“货币……是看得见的神性，它使人和自然界各种属性转化为对立面，使各种事物普遍混淆和颠倒；它使许多不可能的事紧密结合起来。”①

#### (1)

1843年3月，马克思退出《莱茵报》编辑部，到荷兰亲戚家里消磨了一段时间，②然后移居克罗茨纳赫，同年6月他在那里和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完成婚礼。这当儿，他的朋友、青年黑格尔派阿尔诺德·卢格打算在德国境外创办一个崭新的政治性刊物，并说服马克思同他合作。马克思一边等待刊物计划成熟，一边认真从事历史和政治理论研究。五本保存下来的笔记显示他在那一时期阅读过英、法、德、意、美和瑞典等国家的历史，并做了摘录。他特别对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感兴趣。这一时期，他研究过的政治理论学家当中有马基雅弗利、孟德斯鸠、卢梭和尤斯图斯·麦捷尔③，此外还包括一位后来成为他所厌恶的人物之一：弗朗斯

① 《马克思全集补编》，德文版，第1卷，第565页。

② 指到他的一位舅父菲力浦斯家去。马克思的母亲是荷兰人。这位舅父曾在马克思生活困难的时刻在物质上帮助过他。——译注

③ 尤斯图斯·麦捷尔(1720—1794)，德国政治活动家，历史学家和政论家，德国市民阶级利益的代理人，著有《爱国幻想曲》等作品。——译注



瓦—勒奈·德·沙多勃利昂<sup>①</sup>。

1843年春夏两季，马克思主要忙于写一篇批判黑格尔法律和政治观点的论文。他研究黑格尔，很大程度上是受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影响；在那本登载马克思两篇论文的《轶文集》中，费尔巴哈在一篇文章里提出黑格尔没能看到“思维”和“存在”之间的真正关系。费尔巴哈写道，“存在是主体，思维是谓语。思维从存在中产生出来，而存在则不能从思维中产生出来。”马克思评论道，“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唯有把两者结合起来，现今的哲学才能成为真理。”<sup>②</sup>（着重号系本书作者所加）如果说，费尔巴哈使他走向批判黑格尔的道路，莫泽斯·赫斯<sup>③</sup>则使他趋向对费尔巴哈的批判<sup>④</sup>。

1843年3月到8月，马克思着手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篇文稿显示他不仅在作评注，而且也象是在翻译。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试图把黑格尔文章里的“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译成”<sup>⑤</sup>更切合实际、从而更接近真理的东西——但是这里应当象乔治·李赫特海姆<sup>⑥</sup>正确指出来的那样强调一下：对马克思和黑格尔来说，现实“不是象经验直感所感觉的那样，而是象

① 参阅L·I·高尔曼等著，《卡尔·马克思传》（柏林，1973年），第56—57页。（弗朗斯瓦—勒奈·沙多勃利昂（1768—1848），法国作家，反动浪漫派的首脑。马克思不喜欢沙多勃利昂的故作高深，拜占庭式的夸张，感情的卖弄和文字上的过火的矫揉造作。见马克思在1873年11月30日给恩格斯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102页。——译注）

②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7卷，第442—443页（马克思1843年3月13日致阿诺德·卢格信）。

③ 莫泽斯·赫斯，见第一章注。——译注

④ 参阅德·麦克莱兰，《马克思主义之前的马克思》（英文版），第142页；彼·戴麦兹，《马克思、恩格斯和诗人》（德文版），第64页。

⑤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249—250页。

⑥ 乔治·李赫特海姆（1912—1973），德国出生的社会历史学家，研究马克思主义，晚年悲观，于1973年在伦敦自杀。——译注

哲学反映所显示出来的那样。”<sup>①</sup> 例如，关于《黑格尔法哲学》里的第262节，马克思颇为讽刺地说，“如果我们把这一命题译成普通的话，那就是这样……”<sup>②</sup> 除此之外，因为黑格尔的文章往往表现出文法分析的格调，马克思于是也结合着对黑格尔的语言加以密切的注视。他在印张页中间用竖栏分开，左边摘下黑格尔的一个命题，右边加上“译文”，并作出如下评注：

“很明显，黑格尔是把进一步的各个规定同两个主体——‘机体的各个方面’和‘机体’联系在一起了。在第三个命题中，‘被划分的’不同方面被规定为‘各种不同的权力’。由于插入了‘由此可见’这几个字，便造成一种错觉，好象这些‘各种不同的权力’是从关于机体（理念的发展）的中间命题引伸出来的。”<sup>③</sup>

马克思从一系列这种逻辑上的和文法上的分析得出来的结论，恰与费尔巴哈已经做过的结论相符合。马克思说，“他（黑格尔）把身为理念的主体的东西当成理念的产物，当成理念的谓语。他不是从对象中发展自己的思想，而是按照做完了自己的事情并且是在抽象的逻辑领域中做完了自己的事情的思维的样式来制造自己的对象。”<sup>④</sup>

马克思重新查阅黑格尔采用这种方式所写的法哲学时，脑中又涌现出文学的譬喻，例如，黑格尔对君主权的概念是君主忽而充当中介人，忽而又充当本身需要调解的极端，这使马克思想起《仲

58

---

① 参阅李赫特海姆：《马克思主义，历史和批判的研究》，第2版（伦敦，1964年），第8页。

② 《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249页。

③ 同上书，第257页。

④ 同上书，第259页。



夏夜之梦》里的狮子，“这里也不禁使人想起莎士比亚的喜剧《仲夏夜之梦》里面的狮子，它大吼道：‘我是狮子，我又不是狮子，而是斯纳格。’这里的情形也正好一样，每个极端忽而是对立面的狮子，忽而是中介的斯纳格。”<sup>①</sup>他还指责黑格尔对继承制的看法是受“长子继承制的伟大之处所造成的浪漫热狂”<sup>②</sup>的影响。Der romantische Kitzel der Majoratsherrlichkeit<sup>③</sup>——马克思这句双关话，不禁使我们想起历史法学派所看重的限定继承权曾在德国浪漫主义作家两部著名的作品的书名上出现过，即阿尔宁的《长子继承制》和霍夫曼的《长子继承》。马克思对于私人财产继承制表示反对时，从笔下又畅流出文学理论的术语：

“和独立的私有财产这种荒诞无稽的东西相比，职业的没有保障是凄惨的，追逐利润是悲壮的（戏剧性的），财产的可变性是真正不幸的（悲剧性的），对国家财产的依赖是合乎伦理的。一句话，在所有这些特质中我们透过私有财产听到了人心的跳动，这就是人对人的依赖。”<sup>④</sup>

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文学类型和样式，尤其是席勒和黑格尔做出的那种分类，能以多种方式来表达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显示人们如何跟他们助以形成的世界交往，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同时，文学类型又可以用来充当人的各种态度的速记符号：

“我亲爱的朋友，您的来信是一支出色的哀曲，一首使人心碎

---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354页。

② 同上书，第371页。

③ 德语：长子继承制的伟大之处所造成的浪漫热狂。——译注

④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372页。

的挽歌，可是它毫无政治内容……”<sup>①</sup>

或者可以用来划分不同的社会和政府制度的尊严等级：

59

“专制制度拿我们来演的这场喜剧，对它本身说来就象当年悲剧对斯图亚特王朝和波旁王朝一样危险。就算人们甚至经过一个长时期还不明白这场喜剧究竟是怎么回事，不过无论如何在这种意义上说它已经可以算是革命了。国家是十分严肃的东西，要它演什么滑稽剧是办不到的。”<sup>②</sup>

马克思这里借助的惯用语 (topos)<sup>③</sup> ——国家似剧场——后来又以许多变换方式出现在他的著作里。他在计划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时给卢格的信中，又有两个欧洲文学中常见的惯用语：

“满载傻瓜的船只或许会有一段时间顺风而行，但是它是向着不可幸免的命运驶去，这是因为这些傻瓜根本就没有料想到这一点。这命运就是即将来临的革命。”<sup>④</sup>

又如：

---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08页。（马克思1843年5月致卢格信）。这封信是答复卢格的来信，卢格在信中引用了荷尔德林的小说《徐培里昂》倒数第二章中那段对德国处境的著名的哀伤。马克思不同意卢格引用这段话：“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陷于绝望的境地，即使它只是由于愚蠢而长期地期望着某种东西，然而在很多年后，总有一天会突然变得聪明起来，实现它的所有的良好愿望。”但是没有什么证据表明马克思本人曾经读过荷尔德林的任何作品。

② 同上书。

③ Topos（希腊语），意谓“地方”或“老生常谈”。不只是相同的意象，还有相同的辞句以及类似的思想等皆有规律地出现于各种不同的作品内。——译注

④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08页。



“我不能担保一船傻瓜的命运；但是我敢肯定说：只要这个颠倒了的世界存在一天，普鲁士国王总还是当代的一个人物。”<sup>①</sup>

这里的两个譬喻是引用十六世纪赛巴斯蒂昂·布兰特<sup>②</sup>的《愚人船》里的主要形象，以及黑格尔用过的、海涅也于1842年用来描绘过当代普鲁士的那个惯用语：这个颠倒了的世界<sup>③</sup>。正当马克思象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在把黑格尔颠倒了哲学纠正过来的时候，这后一种形象显然对他很有吸引力。

60 上面几段引文摘自卢格编辑发表在《德法年鉴》里的马克思、卢格、巴枯宁和费尔巴哈相互来往的一系列信件；当时卢格和马克思共同负责编辑这个刊物，刊名象征着一个纲领，即德国人和法国人应该联合起来对抗十九世纪许多德国人视为一种与爱国主义不可分离的仇法情绪，而共同实现一个更加公正的世界。1843年10月，马克思离开德国，在巴黎和卢格会合之后，便以惯有的热情投入《年鉴》的编辑工作，并为之写作。他和卢格邀请一些法国知名作家投稿，其中也包括阿尔丰斯·德·拉马丁<sup>④</sup>。拉马丁允诺投

---

① 《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11页。

② 赛巴斯蒂昂·布兰特(1458—1521)，德国人道主义者与讽刺诗人。他的《愚人船》是1494年出版的，讽刺和鞭挞了当时的社会。一只大船上载满了各种愚人，驶到“愚人天堂”去，愚人自己陈述自己的愚行或由作者给他们揭发。这些愚蠢的行为是：好时髦、好吃、好跳舞、好打猎；忘恩负义、贪婪、轻浮、骄傲、憎恨、嫉妒、荒淫；学者的空虚和僧侣的虚伪以及同时代大大小小的毛病。出版后立即受到广大读者欢迎，接着出现了“愚人文学”，汉斯、萨克斯、艾拉斯姆斯等作家都受到它很大影响。但布兰特本人思想并不先进，也不是基督教改革运动的先驱者，他毋宁说是中世纪思想和理想的最后一个体现者。——译注

③ 杰·霍普纳在他重新编订出版的《德法年鉴》(莱比锡，1974年)，第401页上指出，傅立叶也曾在他的社会批判文章里使用过这个意象。——原注

④ 阿尔丰斯·德·拉马丁(1790—1869)，法国诗人、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1848年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和实际上的首脑。——译注



稿<sup>①</sup>，可是后来他和其他法国作家都没有投来只言片语。所以，1844年2月出版的《年鉴》第一期（也竟是唯一的一期）清一色是德国作家的文章，包括卢格写的一篇纲领性的出版说明，一首海涅的热情洋溢的政治诗和一首海尔维格的绮靡雕琢的诗，费尔巴哈、巴枯宁、卢格和马克思相互来往的信件，斐·卡·贝尔奈斯<sup>②</sup>对德国报纸文章的一些评注（看来马克思在其中加进不少简朴而机智的妙语）<sup>③</sup>，几件有关普鲁士约翰·雅科比<sup>④</sup>的叛国和侮辱陛下罪行案件的文献，年轻的恩格斯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一篇评论托马斯·卡莱尔<sup>⑤</sup>的《过去和现在》的文章；另有马克思两篇重要论文，一篇是借以评论布鲁诺·鲍威尔的两部著作而论述犹太人问题的文章，另一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竟是马克思于1848年发表《共产党宣言》之前的一个最重要而具有影响的政治原则的声明。

马克思在《德法年鉴》<sup>⑥</sup>刊载的他给卢格的一些信中，对庸人 61

① 参阅《马恩全集补编》，德文版，第1卷，第437页。

② 斐迪南·卡尔·路德维希·贝尔奈斯(1815—1879)，德国激进政论家，1844年参加德国流亡者的报纸《前进报》编辑部，后流亡美国。——译注

③ 参阅《马恩全集》，第1卷，第2分册，前言第28—40页。大·梁赞诺夫在前言中指出，最后一个评注是评比两名新闻记者的文章，巧妙地指出其中一位设法把措词和结构处理得恰是官方记者所能理解之意的反面，因此，这个评注颇有马克思个人文风的印记。这个评注下列一段话当会引起读者想到马克思对文学和神话中的人物的引用：“如果不来梅报社那位记者粗鲁得象阿喀琉斯，奥斯贝格报社那位记者则文雅得象尤利西斯。他有西塞罗的文风和一个修道院学生的独出心裁。他是新皇家救世主的、乏味的克罗卜史托克。”另参阅杰·霍普纳编，《德法年鉴》，第360、460页。

④ 约翰·雅科比(1805—1877)，德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普鲁士国民议会左翼领袖之一，70年代参加社会民主党。——译注

⑤ 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英国作家，历史学家，宣扬英雄崇拜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发表近于40年代封建社会主义的观点，站在反动的浪漫主义立场上批判英国的资产阶级，后来倾向托利党，1848年成为彻头彻尾的反动分子，工人运动的露骨的敌人。——译注

⑥ 恩格斯在一封致威廉·李卜克内西的信中说：“马克思不只一次对我说，卢格改编他的文章，并加进各种胡言乱语。”（引自霍普纳编，《德法年鉴》，第368—369页）。——原注



市侩统治的世界作了描绘。他借助歌德来证实他的看法<sup>①</sup>，揭露这个世界象一个“政治动物的世界”(politische Tierwelt)，象一个“使世界不成其为人的世界”(entmenschte Welt)<sup>②</sup>，只有“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rücksichtslose Kritik des Bestehenden)<sup>③</sup>才能得以改进。马克思的信也包括对浪漫主义的糊涂概念的批判：当他攻击普鲁士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那种“自由主义的演讲和衷心倾叙”的特征时，他所使用的这个词汇不由得使读者想起德国浪漫主义的一部主要作品的书名：瓦肯罗德和蒂克的《一位爱好艺术的僧侣的衷心倾叙》<sup>④</sup>。信中也批判了现成的乌托邦，象体现在埃蒂耶纳·卡贝<sup>⑤</sup>刚刚出版的《伊加利亚旅行记，哲学和社会小说》(巴黎，1842年)一书里的那种乌托邦。因此，可以用马克思的话来总结这个新年鉴的总方针是“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批判的哲学)。”<sup>⑥</sup>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这篇论文应当看成是他对他那一时代的“政治动物的世界”——“使世界不成其为人的世界”进行批判的一部分，其中对犹太教和犹太精神的分析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误的印象，因为他抱有一般人的偏见，认为犹太人是彻头彻尾、从不懈怠的重商主义者，而忽视了犹太人的唯灵论、精神上的喜好冒险、利他主义和喜好预言的嗜好等传统，其实他本人也无可奈何地正

---

① “庸人所希求的生存和繁殖(歌德说,谁也超不出这些)”——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09页。——译注

②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10页。

③ 同上书，第416页。

④ 同上书，第413页。

⑤ 埃蒂耶纳·卡贝(1788—1856)，法国政论家，空想的和平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在《伊加利亚旅行记》中描绘了他虚构的国家伊加利亚的共产主义社会，相信人的善意和强者的宽大，以为一切改革靠道德和正义感就可以和平地实现。——译注

⑥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18页。

是这种传统的后裔。在这方面，马克思和弗洛伊德<sup>①</sup>形成鲜明的对照，弗洛伊德有一次对他的同胞犹太人演讲时说，他发现犹太民族和犹太人的吸引力是“无法抗拒的”：

“每当我感到有一种民族热情的倾向时，我便力求抑制它，觉得那是有害而错误的，而且我们相处的犹太同胞的前车之鉴也使我感到震惊，但是仍然有其他许多方面使犹太民族和犹太人的吸引力变得不可抗拒，例如许多模糊的感情力量，越是不能以言语来表达，越发变得无比强烈，另外还有一种内在身份的明确意识——内心安藏着的共同的精神结构感。除此之外，我还感到自己有两个特点在我一生艰苦的旅程中变得须臾不可缺少，这都亏得我的犹太性格，那就是别人在利用自己的才智时受到种种限制，我因为是犹太人，所以觉得自己摆脱了这种偏见，而且我作为一个犹太人，准备加入反对派，我个人的所做所为无需征得‘紧密的大多数’的同意……”<sup>②</sup>

62

然而，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这篇文章的重要之处在于它不仅显示马克思能够放过一些不适合他的论争的事实，而且也显示他当时对那种变一切为商品的货币力量作出了最富持久性的分析。他逐渐相信现代社会越来越被“财迷”所统治；在 Geldmensch<sup>③</sup> 那些“品行”当中，马克思举出他们（除了蔑视理论、历史和作为自我目的的人之外）也蔑视艺术（Verachtung……der Kunst）<sup>④</sup>。这个

---

①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反动的资产阶级精神病学家，首创精神分析学说。——译注

② 参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伦敦，1964年），第20卷，第274页。

③ 德语：财迷。——译注

④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49页。



命题在这里首次简短地出现,此后还在他的其他著作里屡见不鲜。现代是不利于艺术的,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使人们同他们的艺术传统(从而同他们的文学传统)疏远,就象它使人们同人类劳动的其他许多产品疏远一样。

《论犹太人问题》一文还显示马克思颇为重视现代文献小说。他在论证的过程中,描绘了北美的宗教状况,资料主要取自三个来源,即德·托克维尔<sup>①</sup>的著作、托·汉密尔顿<sup>②</sup>的《美国人和美国风俗习惯》和古·德·波蒙<sup>③</sup>的小说《玛丽或合众国的奴役制》(1835年,布鲁塞尔版)。马克思无拘无束地摘引波蒙小说里的词句,而并未指出他的作品在类型上不同于德·托克维尔和汉密尔顿这两位提供情况的人的著作。<sup>④</sup>

63 马克思在论述犹太人问题的文章里,还分析了货币的力量和作用,因此夏洛克再次登场,使人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但是,从特征的角度来看,夏洛克并非在马克思讨论到他那种令人误解地称之为“犹太精神”的过程中出场的,而是在讨论黑格尔和德国法律时露面的。在我们面前,夏洛克被召唤出来支持一场对历史法学派的驳斥,其实德国法理学家这个最保守、自觉而自豪的德意志“历史学派”,马克思早在《莱茵报》上就已经驳斥过了:

“有个学派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把农奴反抗鞭子——只要它是陈旧的、祖传的、历史性的鞭子——的每个呼声宣布为叛乱;历史对这一学派,正象以色列上帝对他的

---

① 阿列克西斯·德·托克维尔(1805—1859),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译注

② 托马斯·汉密尔顿(1789—1842),英国军队的上校、作家。——译注

③ 古斯塔夫·波蒙(1802—1866),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译注

④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24—425、435、436—437、447页。

奴仆摩西一样，只是表明了自己的 a posteriori (过去)，因此，这个法的历史学派本身如果不是德国历史的产物，那它就是杜撰了德国的历史。这个夏洛克，奴仆式的夏洛克，发誓要凭他的期票、历史的期票、基督教德意志的期票来索取从人民心上剜下来的每一磅肉。”<sup>①</sup>

这段话直接涉及《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另一争议的问题，即犹太人的敌人归咎于犹太人的那些品行，在十九世纪绝非只局限于犹太人所独有。马克思无疑希望用犹太人突出的典型(夏洛克，再加上以色列上帝和他的奴仆摩西的增援)来激怒那个“历史学派”，正如海涅喜欢用这同一手段激怒他的反犹派对手一样。但是，与此同时，马克思把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创造的那个人物有意识地变化一下，以控制这场论战。一些伟大的夏洛克阐释者在剖析这个角色时一向试图提出来的那种品德，也就是海涅在他那部评论莎士比亚的著作里涉及夏洛克时所强调的那种品德——尊严，受难时所表现的尊严，自豪时所表现的尊严，被说成正是“历史学派”所缺少的品德。不管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绝不是一个“奴仆”。因此夏洛克出现在马克思的文章里，不仅作为他那类人物的一个例证，而且可以作为评断当代与他类似的人物的标准。

下面我开始摘引的论文，题名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是马克思思想上和政治上发展的纲领性文献之一。他在篇首称赞费尔巴哈和他的追随者：“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实际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sup>②</sup>文章声明实践的极端重要性<sup>③</sup>，表明最终会产生一个马克思自此后将与之共命运的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54页。

② 同上书，第452页。

③ 同上书，第460页。



新的阶级，这个阶级将在德国的“复活日”扮演主宰地位的角色，而且这个“复活日”会由“高卢雄鸡的高鸣”<sup>①</sup>来宣布：

“无产阶级宣告现存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sup>②</sup>

马克思在这篇论文里还巧妙地引用《圣经》和宗教传统的词汇来攻击宗教：“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世界——宗教是它的灵光圈——的批判的胚胎。”<sup>③</sup>

他也用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常用词汇来表达他对历史进程的看法。他说社会各阶级相互之间的关系“不是戏剧式的，而是史诗式的，”以表明他对当代德国缺乏革命大无畏精神<sup>④</sup>的感觉；同时，马克思把黑格尔对于历史顺序以及悲剧和喜剧之间的关系看法，适应于他自己的目的：

“这些国家如果看到，在它们那里经历过悲剧的 *ancien régime* (旧制度)，现在如何通过德国的幽灵在演它的喜剧，那是很有教益的……现代的 *ancien régime* (旧制度) 不过是真正的主角已经死去的那种世界制度的丑角。历史不断前进，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喜

---

① 高卢是法国古称，“高卢雄鸡”是法国在第一共和国时代用在国旗上的图案，标志着当时法国人民的革命意识。——译注

②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67页。

③ 同上书，第453页。

④ 同上书，第464页。

剧。”<sup>①</sup>

马克思还再一次提出他在博士论文里称之为哲学“守护神”的那个人物：埃斯库罗斯的被缚住的普罗米修斯：

“在埃斯库罗斯的《锁链锁住的普罗米修斯》里已经悲剧式地受到一次致命伤的希腊之神，还要在琉善的《对话》中喜剧式地重死一次。历史为什么是这样的呢？这是为了人类能够愉快地和自己的过去诀别，我们现在为德国当局争取的也是这样一个愉快的历史结局。”<sup>②</sup>

65

那种能从文学史中（经黑格尔之助）观察到的悲剧和喜剧的顺序，也可以用来澄清政治史中类似的顺序。其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文学史和政治史那样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致最终合而为一。埃斯库罗斯和琉善在他们的杰作里呈现了他们的时代各个重要方面，呈现了古人看待他们的神明的各种不同的方式。因此，这样的对比可以阐明寓于显著顺序之中的显著差别。比较文学从而可以成为一种认识历史的工具。

鉴于马克思后来对于希腊文学同希腊神话的关系作出更为著名的阐明，他对埃斯库罗斯的评论特别令人感兴趣之处在于，他并没有认为埃斯库罗斯只是天真地仰赖神话。希腊诸神在《被缚住的普罗米修斯》一剧里受到“致命伤”的那种夸大的描写，照马克思的看法，意味着埃斯库罗斯的剧本构成一种对神话对希腊万神殿的批判，尽管剧本是在极其严肃地处理一个神话主题。至于主题

---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56—457页。

② 同上书，第457页。



本身，马克思在评论黑格尔的这篇论文里阐明了他这时对神话的作用的看法，他写道，“古代各族是在幻想中、神话中经历了自己的史前时期。”<sup>①</sup>

《德法年鉴》的编辑阿尔诺德·卢格在出版的最后阶段病倒了，因此马克思担当起编辑重担，这使他有会同两位当时最著名的德国诗人进行了接触。一位是格奥尔格·海尔维格，马克思曾经不同意卢格对这位作家奢侈的生活方式的看法而为他进行辩护，认为那是具有才智的人的特权。另一位是亨利希·海涅，海涅不仅允许《德法年鉴》重印他那首描绘巴伐利亚卢德威格一世<sup>②</sup>的极不尊敬的欢闹组诗，而且1843年12月在德国境内旅行期间还为这个刊物约稿。<sup>③</sup>马克思和海涅都给这个寿命短暂的刊物撰稿，马克思还审阅海涅的讽刺诗篇的校样，他一家人和海涅友好互访；后来，马克思被迫离开法国时，感到自己同海涅的友情甚笃，无妨说出他很想把海涅装进自己的行囊一起带走这句话<sup>④</sup>。关于他们这一时期的交往，另有两段记载，一处是在卢格1870年2月18日写给E·卡柏的信里，卢格温和地抱怨海涅从未承认自己怎么会写起那些最能给人深刻印象的著名政治讽刺诗篇：“这一次他应归功于马克思和我。我们对他说，‘撇开你那永恒的爱情怨诉吧，给那些写韵文的(poetical)(卢格这里可能是笔误，似应为‘政治的’(political)——作者注)抒情诗人看看，这些东西是怎样写出来的——一挥而就嘛！’”<sup>⑤</sup>另一处是从爱琳娜·马克思1895年写给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58页。另参阅普莱沃斯特，《文学、政治、思想意识》(巴黎，1973年)，第16页。

② 巴伐利亚卢德威格一世(1786—1868)，1825—1849年为德意志一邦巴伐利亚的国王。——译注

③ 参阅杰·霍普纳编《德法年鉴》，第37页。

④ 见马克思致海涅信(1845年1月12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7卷，第457页。)——译注

⑤ 参阅H·H·胡班编《同海涅的谈话》(波茨坦，1948年第2版)，第506页。



卡尔·考茨基使用的一些摘记里得来：“毫不夸大地说，摩尔<sup>①</sup>（马克思）不仅欣慕作为诗人的海涅，而且对他怀有一种诚挚的感情。他甚至会找出种种理由来为海涅政治上古怪的想法辩护。摩尔坚持认为诗人都是古怪而难以应付的人物，不能用常人或者甚至非常人的尺度来衡量他们。”<sup>②</sup>爱琳娜接着叙述海涅如何征求马克思对他的诗篇的意见，商量改善的可能性；马克思多么不忍心看到海涅对批评所持的那种病态的敏感，即使批评来自他有理由极端蔑视的那些人物；以及海涅有一次如何沉着地搭救了马克思的婴孩燕妮。她结论道，“就我所理解，在政治方面，他俩很少加以讨论，但是肯定摩尔很亲切地批评海涅，他不仅喜爱他的作品，而且也热爱他本人。”不过，马克思后来的信札和弗兰契斯卡·库格曼<sup>③</sup>的作证，使人有理由怀疑马克思是否一向象热爱海涅作品那样热爱他本人。但是这种交往无疑对他俩都发生影响，一方面鼓励了海涅把他的讽刺政治诗写得比以往更激进，一方面促使马克思继续阅读海涅的作品，以致使他自己的文体在某种程度上留下使人觉察得出的影响痕迹。马克思那两篇登载在《德法年鉴》上的论文常

67

---

① 摩尔（来自希腊文，意为黝黑的）在8世纪前原指北非各国的原住民，后欧洲人亦用以泛指黑皮肤的人。爱琳娜在《卡尔·马克思》一书中说：“‘摩尔’这个名字是常用的，几乎成为他正式的名字了。不仅我们这样叫马克思，所有亲密的友人也这样叫他。”（《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5页。）——译注

② 见巴克森达尔与莫劳斯基编《马恩论文艺选》（密尔沃基，圣·路易斯，1973年），第148—150页。

③ 弗兰契斯卡·库格曼，路德维希·库格曼的女儿。路德维希·库格曼是德国医生，1848—1849年革命参加者，第一国际委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弗·库格曼1928年应苏联马列主义研究院的邀请，写了一篇《伟大的马克思的二三事》，其中说“马克思在评价海涅时，认为他的性格很不好。他严厉地斥责海涅以忘恩负义的态度对待别人对他的善良和友谊。例如，海涅曾经写过一首叫《这位殷勤的少年能博取人家的欢心》的诗嘲弄克利斯提安，马克思认为这种行为是不可宽恕的。”（见《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19页。）——译注



常会令人想起海涅,诸如一些个别新创的词汇(“人的糟粕”<sup>①</sup>显然是从海涅《新春》组诗末一首摘来的),又如他那篇批判黑格尔的纲领性论文末一句让人想起海涅《评路德维希·白尔尼》<sup>②</sup>里的一句诗:

高卢雄鸡再次高鸣,德意志也即将破晓。

——海涅

一切内在条件一旦成熟,德国的复活日就会由高卢雄鸡的高鸣来宣布。<sup>③</sup>

——马克思

尼格尔·瑞夫斯曾对马克思和海涅这一时期思想发展过程的种种相似之处加以探索,正确地评论道,“这清楚地显示海涅和马克思1844年沿着相同的路线进行工作,可以看出相似之处达到了什么程度,但试图决定谁影响了谁,却是白费心机的。”<sup>④</sup>不过,在语言表达和文章结构方面,显然马克思受益于海涅。就我们现已知晓的马克思,他在巴黎写的论文里,不言而喻,还有许多地方引证了其他作家,特别是歌德,他那部《浮士德》提供了“超人”和“非人”这类极性的词汇,马克思把它们用于《德法年鉴》那篇批判黑格尔文章之首。<sup>⑤</sup>

---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33页。

② 路德维希·白尔尼(1786—1837),德国政论家,详见第2章注。——译注

③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67页。

④ 参阅尼格尔·瑞夫斯:《海涅和年轻的马克思》,第63页。

⑤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52页。另参阅彼·戴麦兹:《马克思、恩格斯和诗人》一书,第60页。

(2)

1844年出现一部文学作品，对马克思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那就是该年西里西亚织工起义<sup>①</sup>时写的为织工们进军时歌唱的一首诗歌。马克思觉得这样一首诗歌证实了他对无产阶级“灰姑娘”<sup>②</sup>的创造能力、阶级觉悟和最终革命意志的信念，他预言她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成为一个“大力士”：

“法国和英国的工人起义没有一次象西里西亚织工起义那样具有如此的理论性和自觉性。首先请回忆一下织工的那支歌吧！68这是一个勇敢的斗争的呼声。在这支歌中根本没有提到家庭、工厂、地区，相反地，无产阶级在这支歌中一下子就毫不含糊地、尖锐地、直截了当地、威风凛凛地厉声宣布，它反对私有制社会。西里西亚起义一开始就恰好做到了法国和英国工人在起义结束时才做到的事，那就是意识到无产阶级的本质。”<sup>③</sup>

这首织工歌（德文名为《Das Blutgericht》，可粗略译为《血腥的屠杀》）从而在马克思的文学长廊里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在他看来，这意味着从旧民歌到新型的无产阶级诗歌的转变。但是，在他急切希望德国工人阶级进入现代文学领域的愿望中，他过高评价了——或者至少夸大了——厄运的西里西亚织工思想上的自我意

---

① 指1844年6月4—6日西里西亚织工的起义，这是德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阶级搏斗。——译注

② 灰姑娘是格林童话里的一个受继母虐待、日与煤渣为伴的美丽姑娘，后忽得仙姑相助，成为王子的爱人。——译注

③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83页。



识。他也可能不知道早在十三年前法国就出现过一首与《血腥的屠杀》极其相似的诗歌——《里昂丝织工之歌》(Chant des canuts), 这首诗至少也表现出同样“意识到无产阶级的本质”<sup>①</sup>。值得注意的是, 海涅在写他那首描写西里西亚织工的苦难和愤懑的著名诗篇时, 就是以《里昂丝织工之歌》作为范本的。

马克思对《血腥的屠杀》的评论和海涅的《穷苦的织工》(后改名为《西里西亚织工》)都刊载在1844年初巴黎创办的一个激进的德文报纸上。报名是《前进报》(Vorwärts!), 执行编辑是亨利希·波恩施坦<sup>②</sup>, 撰稿人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海涅、海尔维格、格奥尔格·维尔特<sup>③</sup>和巴枯宁。马克思跟这份报纸有四重性联系。他经常和波恩施坦讨论政治局势, 从而在该报社论和政治评论文章里留下了他的印记。他劝使那位编辑摘要刊登他正在阅读的一些书籍的片断, 相信这会有助于增强当前出现的一些可取的态度和倾向, 这些书籍包括从十八世纪启蒙主义作家的作品直到费尔巴哈的著作, 范围极其广泛。他又是波恩施坦和海涅的中间人, 海涅那首《德国, 一个冬天的童话》的校样就是先传到马克思手中, 然后才允许转给波恩施坦过目。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 就是马克思本人也给《前进报》写了两篇署名的“短评”和一篇未署名的、对普鲁士议会发布的一条法令的评论, 其中以种种不同的方式对

---

① 指1830年11月和1834年2月爆发的里昂丝织工人的两次起义, 但都被残酷镇压下去。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到里昂起义时说,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开始在欧洲最先进国度的历史上进居于前列了。”(《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第24页)——译注

② 亨利希·波恩施坦(1805—1892), 德国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巴黎报纸《前进报》的创办人(1844), 1848年后移居美国, 在那里参加了国内战争(1861—1865)。——译注

③ 格奥尔格·维尔特(1822—1856), 德国无产阶级诗人和政论家,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4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译注



文风问题进行了探讨。<sup>①</sup>

马克思的“短评”（《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是为驳斥卢格的一篇文章而写的，其中提出作家如果只集中精力注意润饰他的文体而不去仔细思考他该写的内容，则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马克思宣称这种唯美主义等于是拆自己的台，并且导致庸俗（Gemeinheit）：“那些把任何事物都当成作文练习题目来写文章发表的人们，由于用这样的形式主义方法看问题，所以就把事物的内容歪曲了，而被歪曲的内容反过来又给形式打上了庸俗的烙印。”<sup>②</sup>照马克思的说法，那位引起这场指责的卢格喜欢文体上的对比形式，并且使用一种“浸透着无聊的自我欣赏气息的巧妙词句”<sup>③</sup>，结果和真理完全背道而驰。这显然进一步发展了他过去在《莱茵报》上议论过的两个论题。头一个是马克思曾在1842年11月3日那篇有关德国财产法的文章<sup>④</sup>里声明过的信念：“如果形式不是有内容的形式，那末它就没有任何价值了。”<sup>⑤</sup>第二个是已经注意到的他对唯美主义的不信任，马克思此后一直对于漂亮词句和过分关切文体优美的作法表示不信任。但是与此同时，马克思又喜欢以模拟的方式回击那位辞章家，通过仔细的分析指出思想上的欠缺必然导致文体上伴随而来的欠缺。<sup>⑥</sup>

这种偶而出现在“短评”里的检验，在马克思给《前进报》写的第二篇文章《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最近的内阁文体练习解说》里则居于主位。在这篇文章里，马克思对普鲁士国王和他的顾问写

---

① 参阅夏克·格朗容：《马克思和1844年巴黎的德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诞生研究文稿》（巴黎，1974年），其中详述了《前进报》的史话。

②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84页。

③ 同上书，第484页。

④ 指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译注

⑤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179页。

⑥ 同上书，第485—489页。



的一份告普鲁士人民书所采用的文体进行的分析是那样犀利、有趣而有力，堪与卡尔·克劳斯<sup>①</sup>的作品相媲美。

70

这篇关于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论文，是以国王逃脱一次未遂暗杀后于1844年8月发布的议会法令为出发点的。国王在那篇措词生硬的文告里，感谢上帝保佑了他，下诏答谢普鲁士人民以各种方式向他表示的忠诚。马克思照录国王的文告，然后开始如下讽刺的评论：

“顿时就能使人觉察到的激情，对文体拙劣的信函大有裨益。一位正在恋爱、满怀激情的人给他爱人写的信，绝对成不了优秀文体的范例。但是那种混乱的表达恰恰极其明显而动人地显示那股征服笔者的爱情力量。这种力量是她施加给他的一种力量。热情而文字欠缺清晰，文体也紊乱不堪，从而使他的爱人打心坎里感到宠悦，因为迂回曲折、仅能使人大致理解、因而靠不大住的语言，具有一种紧迫感、亲密感、美感和强迫感，把那封信变为感情完全可靠的标志。他对于自己向爱人表明的一片真情毫不怀疑，这种信念从而变为那个女人最大的自我享受，自信的表达。

我们正是遵循这种前提来排除一切对国王法令表达的那种谢意内在真实性所存的怀疑，从而为普鲁士人民出一把不可估量的大力。我们能够指出王室作家袭上心头的那种感激心情的力量，以排除对于这种真实性所存的一切怀疑；我们能够指出国王下诏答谢的议会法令文体上的混乱，以证实那种力量。由此，我们这种爱国热情的分析，其效劳的目的便不会为人所误解。”<sup>②</sup>

<sup>①</sup> 卡尔·克劳斯(1874—1936)，奥地利新闻记者、批评家与诗人，尤以讽刺文章著称。1899年创办刊物《火炬》，对奥地利社会进行尖刻的讽刺，讽刺的对象主要为中产阶级与自由派报刊，但他后来逐渐较少关切政治争论而转为注意保存奥地利文化传统的问题。——译注

<sup>②</sup> 《马克思全集补编》，德文版，第1卷，第438—439页。

紧接着这段讽刺的导言而作的细致分析，揭示了文体和文法上的缺陷，很可能导致国王和他的顾问变得十分荒唐可笑。马克思同时还试图把议会法令的词句“译成”王室作家头脑里原有而又不便直接表达出来的想法。例如，国王最后一句措词勉强的话，在“und meines Volkes Liebe verdient……”之后嘎然而止，原意显然是“堪值吾民之爱”，却不幸给人造成另外一种印象而变成“吾臣民之爱堪值……”后面还需加些话来把它完成。因此，马克思评论道：

71

“这个最后被孤立的分句，由于一个逗点而缩了回去，仿佛指出后面还应有一句隐而未露的补充句；这句话也许是：‘堪值姐夫尼古拉<sup>①</sup>的一顿皮鞭子，或者爱卿梅特涅的严厉制裁’，也许是：‘堪与布恩逊男爵<sup>②</sup>奉献的那部幼稚可笑的宪法相媲美。’”<sup>③</sup>

马克思的分析，假借讽刺的赞扬，向人们暗示：国王那帮人的愚蠢和恶意。他对文体的批评，不仅是想揭露愚笨的头脑，而且想揭发那种打算处置人和欺骗人的狡黠计谋。

### (3)

《德法年鉴》只出版了一期双刊号，《前进报》也同样寿命短暂。不过，马克思在为这些报刊工作期间，阅读了一些典范的政治演说

---

① 指俄罗斯沙皇尼古拉一世(1825—1855)。——译注

② 克里斯蒂安·卡尔·约西阿斯·布恩逊(1791—1860)，普鲁士外交官，社会活动家，神学家，1844年4月和8月曾上书国王建议改革宪法。——译注

③ 《马克思全集补编》，德文版，第1卷，第441页。



(主要是圣一茹斯特<sup>①</sup>和罗伯斯庇尔的讲话)、回忆录(如勒奈·勒瓦瑟尔<sup>②</sup>的回忆录)、政治小册子(巴贝夫<sup>③</sup>的作品)、官方报告和法国历史编纂学的书籍<sup>④</sup>,从而加深了对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理解。他对这些著作的写作形式发生的兴趣,自此后经久不衰,而且后来对他自己写作的风格和论题也产生了影响。与此同时,他还开始首次系统地阅读古典经济学著作,这一方面也对他所写的、生前未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发生过影响,这些论文包含着 he 的一些最深刻而不朽的见解。他的巴黎手稿(《经济学—哲学手稿》)是受恩格斯的一篇论文的深刻启发而写的。恩格斯那篇论文题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主要由于这篇论文的激发,才开始认真阅读英法具有代表性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并把从中得来的见解,同从莫泽斯·赫斯和其他法国作家那里汲取来的共产主义思想,以及直接或间接得之于黑格尔的思想方法结合起来,成为一种历史上富有成果的结合。另外也是恩格斯,通过他那篇登载在《德法年鉴》上对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一书的评论文章,引起马克思注意到卡莱尔对那种使“现钱成为人与人之间唯一关系”的“玛门教的福音”<sup>⑤</sup>的谴责。卡莱尔从而成为马克思1844年写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一个虽未被承认却是强有力的出场人物。三年后,马克思试图澄清他对工资同劳动的关系的想法时,又阅读了卡

① 路易·安都昂·圣一茹斯特(1767—1794),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卓越的活动家,雅各宾派的领袖之一。——译注

② 勒奈·勒瓦瑟尔(1747—1834),医生,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雅各宾党人,著名的法国革命回忆录的作者。——译注

③ 格拉古·巴贝夫(1760—1797),真名为弗朗斯瓦·诺瓦勒,法国革命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杰出代表人物,“平等派”密谋的组织者。——译注

④ 参阅《马恩文库》德文版,第1卷,第3分册,第419—434页;另参阅阿·考尔努:《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生平和著作》(巴黎,1962年),第3卷,第11页。

⑤ 玛门教意即拜金主义。——译注

莱尔那篇关于宪章主义的文章里有关这方面的观察，并详细地作了笔记。<sup>①</sup>

我们从马克思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期阅读的书籍笔记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即使埋头于经济研究，内心还是经常与文学互相参证。例如，我们可以在他阅读詹姆斯·穆勒<sup>②</sup>著作时所做的笔记（他在这时期读的是法译本）里发现下面这类独特的语句：

“让我们不要管这种‘信任’的内容，即一个人贷款给另一个人，‘相信’那位同胞不是个‘流氓’而是个‘好人’——他给以最优厚的条件，不要利钱，也就是说他不是一个小高利贷者。这位表示这种信任的人等于——犹如夏洛克！——是个‘好人’，在跟另一个付得起钱的人打交道。”<sup>③</sup>

看起来，他在考虑十九世纪工业家的行为和十九世纪经济学家的原则的时候，夏洛克从未远离他的头脑。

文学艺术以许多不同的方式进入巴黎手稿的领域。首先，它们作为一种“人的族类行为”（*menschlich Gattungsakte*）出现，它的产品对人们来说似乎不象其他许多具体而功利的客体那样陌生，因此吸引一批以往的思想家撇开对工业和物质生产的研究而去注意它。世界象一本“书”，人们生活在这世界应该阅读上帝的作品，马克思则把工业视作一本能教导我们理解人的本质的书；由此，那种旧有的惯用语在马克思的想象中起了显著的变化：

“现在已经看到的工业的历史和客观存在是一部有关人类能

<sup>①</sup>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636页。

<sup>②</sup> 詹姆斯·穆勒（1773—1836），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李嘉图理论的庸俗化者；在哲学上是边沁的追随者。——译注

<sup>③</sup> 《马恩全集》，第1卷，第3分册，第534页。



力开卷的书；它是人类的心理学，可以由感性来检验。至今人们一直还没有在它和人类本质存在不可分离的关系中，而只在一种实用功利的外部关系中理解它，因为人们在异化的领域内活动，只能理解政治、艺术和文学等抽象而普遍的形式里的人、宗教或历史的普遍化的存在，而且只有这些才被理解为特定的人类活动中的人类能力的现实表现。<sup>\*</sup> 在一般的物质工业中（人们可以把工业当作那种总发展的一部分，同样也可以把总发展当作工业的一个特殊部分，因为人的一切活动迄今都是劳动，即工业，自身受到异化的活动），我们面前有异化形式下的人的客观化的能力，它们是感性的、陌生的、功利的客体。如果对心理学来说，它依然是一本合起来的书，那末这个心理学便没有接触完美无缺地呈现在感性面前、最易接近的那部分历史，这个心理学也就不能成其为一个具有真实内容的真正科学。”<sup>①</sup>

因此，文学不应该被孤立地看待，而应该连同人类其他更“平凡的”活动和产品一起来看待。文学研究应该成为“人类科学”的一部分。

文学也在巴黎手稿反浪漫主义的论争中占有一席之地，马克思企图驱散浪漫主义作家围绕资本主义之前的德国和十九世纪依然存在的封建主义状况而编造的诗歌的气氛。在一段精彩的段落里，马克思批驳土地所有者和工业家那种与自身紧密相连的陈规陋习，在某种程度上使人毫不怀疑浪漫主义诗歌到底站在哪一方面。他采用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第二幕第七场里的一句话<sup>②</sup>，

<sup>\*</sup> 或“具有作为一种物种的人类的特征的行动”，“人的族类行动”。

<sup>①</sup> 《马恩全集补编》，德文版，第1卷，第542—543页。

<sup>②</sup> 原书此处误记为《皆大欢喜》第二幕，第一场。莎士比亚这句原话是“sans teeth, sans eyes, sans taste, sans everything.”（“没有牙齿，没有眼睛，没有口味，没有一切。”）——译注

把它改为：“没有信誉，没有原则，没有诗意，没有一切”，作为土地所有者反对工业家的人生观的看法，同时夸耀那种固守封建主义的、“缅怀往事的诗篇”(Poesie der Erinnerung)。另外，又唤出世界文学另一杰作塞万提斯的《堂吉河德》，来描绘工商业巨擘对抗那种莎士比亚式的提法。具有动产的人

“叹息他的对手是个傻瓜——这一点说得很对——这个傻瓜不知道自己有多大能耐，却想用粗野而不道德的力量和农奴制，来代替有道德的资本和自由的劳动市场；他把他的对手描绘成一个堂吉河德，在正直坦率、维护共同利益和坚定不移的幌子下，掩盖现实中截然相反的事物：贪得无厌的享乐主义，一个小集团的私利和邪恶的意图。他宣称他的对手是个狡猾的垄断者；他用历史和讽刺的手法，把那事实上在他的对手浪漫主义的城堡中产生的卑鄙、残暴、孤傲排外、卖淫、丑闻、无政府状态和反叛等等一一列举出来，以贬低他的对手的缅怀往事、诗歌和概念不清的道德激发。”<sup>①</sup> 74

文学看来能把原形丑陋的事物遮盖一层外表美观的纱幕，但是文学，象伟大作家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的作品，也能帮助人们弄清人和物的真实面貌。它也能帮助人们判断是非。马克思在这里再一次采用他在那篇黑格尔论文里有关夏洛克的段落中所试用的“变换”手法(见本书第105页)让塞万提斯那位高贵的堂吉河德出来协助“列举”人类不光采的本性，而实际上他的原型则象是其他方面的类型。

但是，不管现代资本家怎样对抗土地所有者(马克思承认这种情况是令人生畏的)，资本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不近情理的、阿谀

<sup>①</sup> 《马恩全集补编》，德文版，第1卷，第527页。



奉承的自身形象，一点也不比他的对手表现得差。那个以他为代表的社会使人同他的劳动成果疏远，其中也包括同人类的艺术创作疏远。他本人耽于赚钱，没时间去理会书籍和戏剧这些“捞什子”：“你越是吃得少些，喝得少些，少买些书，少到剧场和舞会去，少到酒馆里去，少思维，少谈情说爱，少搞些理论，少唱歌，少画画，少作诗，少斗剑等等，那末，你就能更多地节约起来，你那蠢虫蛀不了、强盗抢不着的财富——你的**资本**就会更大。”<sup>①</sup>另一方面，他的工人则毫无选择的余地，他们为了生活急需，劳动得难以脱身，无暇培养自己对艺术的兴趣：“音乐首先必须唤醒人的音乐感……因为最优美的音乐对于不能欣赏音乐的耳朵是毫无意义的……忧心忡忡而愤懑胸怀的人对最美丽的景象是无动于衷的。”<sup>②</sup>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最容易被看成是腐朽的、奴仆似的东西：“政治经济学是财富的科学……同时也是禁欲主义的科学，这种科学的真实理想是人间应有禁欲而贪暴利的守财奴和禁欲但从事生产的奴隶。它的道德理想是劳动者把他的一部分工资存放到贮蓄银行里去；这种科学为了表达它这个特别喜爱的念头，甚至还找到一个奴仆似的艺术，以一种感伤的方式拿到舞台上表演。”<sup>③</sup>因此，在马克思看来，继李罗<sup>④</sup>的《伦敦商人》之后出现的戏剧可以看成是一个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上的感伤情绪的表达。

巴黎手稿中最令人难忘的无疑是那几段涉及人类劳动的“异

---

① 《马克思全集补编》，德文版，第1卷，第549页。

② 同上书，第541—542页。

③ 同上书，第549页。

④ 乔治·李罗(1693—1739)，英国戏剧家，原是一有钱的伦敦珠宝商人。他所写的8篇戏剧，至今仅有他那出感伤的资产阶级悲剧《伦敦商人》尚被人记得。在这篇戏剧的献词里，他阐明了新的资产阶级戏剧的原则：悲剧不但应该揭示出在社会中居于高位的人们，而且也应该揭示出普通的人们生活中的事件。他提议创作一种描写资产阶级生活的悲剧，并提出了创造资产阶级家庭生活劝善戏剧的纲领。——译注

化”、“外在化”和“客体化”(Entfremdung, Entäusserung和Vergegenständlichung) 的篇幅。我们从下面摘引的段落里仍然可以清楚地辨认出马克思的社会—经济批判和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之间的联系：

“劳动者在生产中越使自己外在化，他所创造的面前的、陌生的客观世界就变得越发强大，他本人在内心世界里就变得越加贫乏，他能称之为自己的东西就变得越少。宗教中也有这种类似的情况。人向神明供奉得越多，他自己就保存得越少。劳动者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客体，意味着他的生命已经不再属于他本人而属于客体了。所以，这种活动越大，劳动者就越发变得身无一物。他的一切劳动生产品都不属于他所有。生产品越大则他本身越小。劳动者在他的生产品里的外在化，意味着不仅他的劳动成为一个客体，成为一个外在的存在，而且这外在的存在离开了他，独立而陌生，成为他对面的一股自足的势力，这就是说，他贡献给客体的全部生命，敌意而陌生地同他相对抗。”<sup>①</sup>

马克思又说：

“劳动者生产得越多，他就不得不消费得越少。他越多创造价值，他本身就越加失去价值，失去尊严；他的生产品越成形，劳动者越变得畸形；他的生产品越文明，劳动者越沦于野蛮状态；劳动越实力强大，劳动者越变得软弱无力；劳动越文明，劳动者越加失去文明而成为自然界的奴隶……劳动生产美，但是使劳动者变成畸形……劳动生产文化(智慧)，却为劳动者生产愚昧和痴呆。”<sup>②</sup>

<sup>①</sup> 《马恩全集补编》，德文版，第1卷，第512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513页。



在所有这些谴责中，美学广泛的相对矛盾的概念——“美”对“畸形”，“文明”对“野蛮”——起着一种重要的作用。因此怪不得马克思在巴黎手稿里为了表达他觉得丧失的东西和“异化”的实践意义，一再求助于伟大作家的创作：

“对于劳动者来说，甚至对新鲜空气的需求都已经终止为一种需要。人倒退到穴居状态，但是现在穴居也已经被文明的臭气熏天的瘟疫疠气所污染，而且他只是不安稳地住在那里，象是一种陌生的力量；如果不付钱，每天都有可能被赶出来。劳动者必须出钱租这种死气沉沉的住屋。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把‘光明的住所’称之为他的伟大的赐赠之一，他依靠这光明的住所把蛮子变成人，而这光明的住所对劳动者来说也不存在了。动物最简单而清洁的亮光、空气等等都不再列为人的需要了。”<sup>①</sup>

埃斯库罗斯那种“光明的住所”的想象，歌德那种“基础稳固的大地”<sup>②</sup>的想象，都使人们想起他们所丧失的东西。

然而，伟大艺术家也能毫不逊色地用令人难忘的、悲天悯人的方式向我们表达那些助长“异化”现象的事物——正如里·贾·伯恩斯坦正确地提醒我们，马克思把这方面视为“一种社会范畴，一种理解‘政治经济’的范畴，而不是一种根源于人性的本体论范畴。”<sup>③</sup>歌德的靡非斯托斐勒司被召唤出来解释金钱如何能“弥补”

① 《马恩全集补编》，德文版，第1卷，第548页。

② 同上书，第131页。（马克思此处不太准确地摘自歌德的诗《人类的极限》。）

③ 见里·贾·伯恩斯坦：《实践和行动》（伦敦，1971年），第49页。（里查·贾考伯·伯恩斯坦（1932—），美国哲学家与大学教授，著有《约翰·杜威论经验、自然与自由》（1959）、《约翰·杜威》（1966）等书。——译注）

严重的缺陷；我如果买得起六匹马，就如何不仅有我自己的手、脚、脑袋和屁股的力量，而且还有那几匹马的力量。靡非斯托斐勒司向浮士德解释道：

“什么诨话！你的脚，你的手，  
你的屁股<sup>①</sup>，你的脑袋，这当然是你的所有，  
但假如我能够巧妙地使用，  
难道就不等于是我的所有？  
我假如出钱去买了六匹马儿，  
这马儿们的力量难道不是我的？  
我驾御着它们真是威武堂堂，  
真好象我有二十四只脚杆一样。”<sup>②</sup>

77

这很象是对于金钱力量的一种**真实的**写照，很多方面也确实如此。但是，马克思小心地指出我们听到的不过是靡非斯托斐勒司的声音罢了，他挑出其中一些远不够令人赞赏的涵义，这包括对性格和个人特征的玷污，对道德和精神之间的区别的抹杀，特别是方才所提到的歌德的“马儿”的涵义——对两性之间的自然吸引规律的歪曲：

“通过货币媒介而为我存在的东西，我可以付钱买的东西，也就是货币可以买的东西，是我作为货币持有者的身份。我的力量跟货币的力量一般大，货币的各种属性是我这个持有货币的人各种属性和本质的力量。所以，我的身分，我能够干什么，决非由我

<sup>①</sup> 歌德此处原文是“H—”，马克思引伸为“Hintre”，等于“Hintern”（屁股）。歌德原意当指“Hoden”（睾丸）。

<sup>②</sup> 见歌德：《浮士德》第一部《书斋》（二）。（此处摘引的是郭沫若的译文。——译注）



个人的特征所能决定。我丑陋，但是我能给我自己买到人间最美丽的女人，所以我并不丑陋，因为丑陋的作用，它那使人厌恶的力量被货币抵销了。按我个人的特征，我是个跛子，但是货币使我获得二十四条腿，所以我并不是跛子。我是一个邪恶、不老实、不讲信义、迟钝愚蠢的人，但是货币是受人尊敬的，所以它的持有者也受人尊敬。货币至高至善，所以它的持有者也至高至善。除此之外，货币还使我不会让人说我不诚实，因此大家设想我诚实可靠。我头脑迟钝，但是货币是万物的真正头脑和精神，所以怎么能说货币的持有者没有头脑呢？再者，他还可以为自己买到富有智慧的人，如果他对那些富有智慧的人具有控制大权，那末，他本人岂不比他们更富有智慧吗？我通过货币能办到人的心灵所希求的一切，我岂不掌握一切人的能力了吗？所以我的货币岂不是把我的一切无能转化为它的对立面了吗？”<sup>①</sup>

在马克思看来，他这种评论货币的否定力——货币把一切转化为对立面的那种力量，被莎士比亚那位陷入幻灭和愤世嫉俗最低深渊的雅典的泰门<sup>②</sup> 阐发得更加清楚：

“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不，天神们啊，我不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信徒，我只要你们给我一些树根！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就可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

---

<sup>①</sup> 《马恩全集补编》，德文版，第1卷，第564—565页。此处《浮士德》英译文是巴亚德·泰勒所译，斯图亚特·阿特金斯校订的。

<sup>②</sup> 泰门是莎士比亚的《雅典的泰门》中的一雅典贵族受人谄媚，后欠债却无人相助，悲愤离城，遁入森林，发现金库，城中元老又来仰求他协助退敌。——译注

……嘿，这东西

它会把你们的祭司和仆人从你们的身旁拉走；

它会把壮士头颅底下的枕垫抽去；

这黄色的奴隶

它会使异教联盟，同宗分裂；

它会使受咒诅的人得福；

它会使害着灰白的癞病的人为众人敬爱；

它会使窃贼得到高爵显位，同元老们分庭抗礼！

它会使鸡皮黄脸的寡妇重作新娘，

即使她的尊容会使身染恶疮的人见了呕吐，

有了这东西也会恢复她的三春娇艳。

来，该死的土块，

你这人尽可夫的娼妇，

你惯会在乱七八糟的列国之间挑起纷争，

我倒要让你施展一下你的神通。”

接下去又说：

“啊，你可爱的凶手，帝王逃不过你的掌握，亲生的父子会被你离间！

你灿烂的奸夫，淫污了纯洁的婚床！

你勇敢的战神！你永远年轻韶秀，

永远被人爱恋的娇美的情郎，

你的羞颜可以融化了狄安娜女神膝上的冰雪！

你有形的神明，你会使冰炭化为胶漆，仇敌互相亲吻！

你会说任何的方言，使每一个人唯命是从！

你动人心坎的宝物啊！



你的奴隶,那些人类,要造反了,  
快快运用你的法力,让他们互相砍杀,  
留下这个世界来给兽类统治吧!”<sup>①</sup>

79 “莎士比亚极其出色地描绘了货币的本质,”<sup>②</sup> 马克思评论道,而没有明确地把这归功于泰门。他并不打算讨论这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莎士比亚本人的观点。马克思认为理所当然的是(他很可能是这样想的!),谁读到这一段话都会明白这是愤世嫉俗的泰门在说话,是泰门讽刺地把货币说得“可爱”、“年轻韶秀”、“被人爱恋”和“娇美”,是泰门思忖他能使人尽可夫的娼妇按她自己的本性活动。马克思也无意探索这里表达的思想源自何处,无意去考察这种思想在莎士比亚那一时代或更早一些时候普遍到了什么程度。他接下去在他的评注里指出这一段落多么令人难忘地表达了他本人逐渐感兴趣的货币作用的某些方面:它那种代替神明的力量,它那使一切为之转化、贬低和退化的力量,以及它在人类各民族中间干着娼妓和拉纤的力量:

“莎士比亚特别举出货币的两个属性:

(1) 它是看得见的神性,它使人和自然界各种属性转化为对立面,使各种事物普遍混淆和颠倒;它使许多不可能的事紧密结合起来;

(2) 它是人类和各民族的普遍的娼妓,普遍拉皮条勾当的家伙。

---

① 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第4幕,第3场(见《莎士比亚全集》(8),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176,187—188页。个别处稍有改动。——译注)见《马恩全集补编》,德文版,第1卷,第563—564页。

② 《马恩全集补编》,德文版,第1卷,第564页。

货币使一切人和自然界的各种品质颠倒和混淆、使许多不可能的事紧密结合的那种神力，在于它的本质实质上是人的异化、外在化和自身外在化的‘族类本质’。它是人类外在化的各种能力。

凡是我作为人所不能办到的事，从而凡是一切我个人本质能力所不能办到的事，我都能通过货币来办到。所以货币使每一个本质能力变成原来不是它的东西，也就是变成它的对立面。”<sup>①</sup>

泰门在极端落魄时所采取的这种对待货币的中世纪态度，正如劳伦斯·莱纳<sup>②</sup>所说，在本质上同乔叟那位赦罪教士在布讲“贪财乃万恶之源”这句经文<sup>③</sup>时所采取的态度如出一辙。这种态度一直和马克思的态度极相吻合，尽管他的经济研究已经向他表明现代货币经济有许多方面还是在为进步发展事业服务。

文学使我们想起我们已经丧失的健康状况（埃斯库罗斯的“光明的住所”），文学诊断了我们的腐败堕落（泰门的“人尽可夫的娼妇”），而且文学还将扮演治愈我们痼疾的角色。马克思认为异化现象可以得到克服，可以靠一种包罗万象的科学之助来把它克服，这种科学他称之为“人类科学”，其中包括自然科学、经济学和美学：“将只会有一种科学。”<sup>④</sup>

不难看出马克思对当代人类困境的分析和席勒在《美育通讯》对这方面的分析有许多共同之处。英国一些最杰出的阐释者把席勒那部作品概括为一份起诉书，它指控了下列各个方面：

① 《马恩全集补编》，德文版，第1卷，第565页。

② 劳伦斯·莱纳（1925—），出生于南非，曾在南非、英、美等国讲学，著有《英国文学》（1959）、《记忆的方向，近代批评文选》（1964）等书。——译注

③ 见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中乡村教士那篇劝谕性的布道文。——译注

④ 参阅德·麦克莱兰，《马克思主义之前的马克思》一书，第244页。



“不管是知识或技艺的专业化、还是损人利己的精神功能的专业化给人带来的弊病；感性和思维、情感和道德、肉体和精神过去一度相连而现在却出现分离的现象；各学科之间，科学和艺术之间，个人发展和集体福利之间，以及那些为争取生存而劳累得无暇顾己的劳苦大众和那些闲散得都不愿创造性地利用悠闲时间的人之间的各种分裂现象；过度发展的社会把人贬低仅仅是它那个巨轮上的一个轮齿；公民在一个只看重他所起的作用而不尊重他作为人的存在的国度里被剥夺了人格性，他被当作一种可分等级的抽象概念来对待，受着那看来同他作为人毫无关联的法律的管辖。”<sup>①</sup>

但是，席勒的论文也涉及到巴黎手稿中所想象的将来的人那种“博大”、“全面”和“非异化”的形象。在克服异化现象而达到一个较公正的社会的过程中（马克思与席勒不同，在这点上已经设想需要有个共产主义社会），文学艺术起一个重要作用。文艺是人类需要的自身创造的一部分，它引起人的各种感性，而正是靠这种感性，人才得以享受：

81 “音乐首先必须唤醒人的音乐感……只有通过人的本质具体展开的丰富多采性，才能达到人的主观的——或是培养出来的，或是产生出来的——感性的丰富多采性：一个能欣赏音乐的耳朵，一个能鉴赏造型美的眼睛，简言之，人的各种可供享用的感觉，各种证实为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无论从理论观点还是从实践观点来看，人的本质的具体展开都是必要的，那就

---

<sup>①</sup> 参阅席勒：《美育通讯》（E·M·威金逊和L·A·威劳贝编辑与翻译，附导言、评注和词汇表）（牛津，1967年），第12页；另参阅麦克莱兰：《马克思主义之前的马克思》一书，第243—244页与瑞夫斯：《海涅和年轻的马克思》一书，第72页。

是使人的感觉真正是人的感觉，并引起那同人类和自然存在的全部丰富多彩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sup>①</sup>

这些使人想起德国古典人本主义的传统词句后面，还隐藏着一种忧虑，强烈地表达在巴黎手稿有关货币那一章节的末尾：

“让我们设想人之为人，他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于是，恋爱只能和恋爱交换，信任和信任交换，等等。如果你想欣赏艺术，你必须是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如果你想影响别人，你必须是个对别人真正有激励和鼓励作用的人。你跟人的每种关系，你跟自然界的每种关系，都必须是符合你个人的现实生活和你的意愿的对象的特定表现。”<sup>②</sup>

里昂奈尔·特里林<sup>③</sup>评论道：“‘让我们设想人之为人，他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这种说法真是骇人听闻，任何其他历史时代都没感到有必要把这种设想阐述清楚。整个十九世纪贯穿着这样一种忧虑的思路，即人可能不成其为人，他同世界的关系也可能终止为一种人的关系。马克思把这种忧虑表达得非常强烈，但是人们毋需抱着他的这种见解来分担这种忧虑。那一时代的布尔乔亚道德学家的特点是觉得存在受到占有的威胁。马修·阿尔诺德<sup>④</sup>说，‘文化不是一种所有物，而是一种存在和生成发展的过

---

① 《马恩全集补编》，德文版，第1卷，第541—542页。

② 同上书，第567页。

③ 里昂奈尔·特里林(1905—1975)，当代美国资产阶级文学批评家，大学教授，著有《马修·阿尔诺德》(1939)、《自由派幻想》、《反对自身》、《超越文化》和《真实性与确实性》等书。——译注

④ 马修·阿尔诺德(1822—1888)，英国诗人和批评家。——译注



程。’奥斯卡·王尔德<sup>①</sup>也在他那篇著名的论文《社会主义下的人的灵魂》里附合阿尔诺德的说法：‘人的真正完备不在于人占有什么，而在于人是什么。’”<sup>②</sup>

特里林这里提出的论点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解说。如果文学艺术符合特定的需要，人们在为满足这种需要的行动当中必须自己来形成这种需要，那末随之而来的是这种需要很容易被歪曲，或者虚假的需要会被那些为商业利益而钻营的人制造出来。因此，巴黎手稿还针对十九世纪欧洲社会那种“虚构的欲望”进行了强烈的批判：

“每人都盘算着给别人创造一种新的需要，以便驱使别人成为一个新的牺牲品，把他置于一种新的从属地位，并且把他引诱到那些招致经济上毁灭的新的享乐方式上去。每人都企图为满足自身的私欲而产生一种支配别人的陌生力量。所以，对象的数量增长，支配别人的陌生事物的领域也随之扩大。每个新产品都蕴藏着人们用来相互欺诈、相互掠夺的一种新手段……产品和需要的扩展，客观上把人变成种种非人的、异常狡猾的、反常而幻想的欲望所控制下的总在为自身打算而标新立异的奴隶。”<sup>③</sup>

一百三十多年前马克思首次做出的这种分析，可以认为对于今日甚至比之当时还要恰当。

在巴黎手稿中，海德、席勒和歌德的人本主义，正同一种得

---

① 奥斯卡·王尔德(1845—1900)，英国戏剧家、诗人、小说家及批评家。——译注

② 见里昂奈尔·特里林：《真实性与确实性》(伦敦，1972年)，第124—125页。

③ 《马恩全集补编》，德文版，第1卷，第546—547页。另参阅伊·麦斯扎罗斯，〈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伦敦，1970年)，第115页。

之于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治目的，以及一种已经从中受益的英国和苏格兰古典经济学家的经济分析相结合。麦克莱兰正确地评论道：“恩格斯称之为马克思思想的三个组成要素——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法国的社会主义和英国的经济学，在这里首次同时出现，尽管尚未结合。”<sup>①</sup> 他不妨再加上歌德时代的古典文学，但是应该记住，正如卢卡契所指出来的那样，马克思从来不相信那些根源于社会条件的弊病能够通过改进艺术意识的办法得以治愈。<sup>②</sup>

巴黎手稿另有三个方面值得我们在本文中提一下。第一方面是马克思不仅仔细甄别书籍和作者，而且也注意考察那些被吸引和打动心弦的读者。歌德时代出现过一部称不上古典的作品尤斯图斯·麦捷尔的《爱国幻想曲》(Patriotische Phantasien, 1775—1786)，马克思形容这些幻想的“特点在于一瞬间也没有超越市侩庸人那种无聊的、小市民的、驯服了的眼界，而且纯粹是些幻想罢了。这种矛盾使它们很能吸引德国人的心灵。”<sup>③</sup> 我们知道书籍有书籍的来历，它们不仅是那些受到自己阶级和社会思想感情方式影响的人写出来的，而且是写给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的各个阶层人士看的。因此，对于巴黎手稿的作者马克思说来，人们对于著作的评价和接受情况自有它的重要意义。

第二方面是我们可以从巴黎手稿里一个不是涉及文学而是涉及哲学的章节里发现的论点，那一章节论及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现象学是……一种自己本身还不明确、隐晦而神秘化的批判，但是单就它牢固地抓住人的异化这一点来说——即使‘人’假借‘思想’和‘精神’的面貌出现——所有批判的因素都已经隐藏在

① 参阅麦克莱兰，《马克思主义之前的马克思》一书，第265页。——原注

② 参阅卢卡契，《歌德和他的时代》(英译者R·安考尔，伦敦，1968年)，第84页。

③ 《马恩全集补编》，德文版，第1卷，第527页。



这里面，准备就绪，而且详尽地阐述过了，在某种程度上远远超过了黑格尔自己的观点。”<sup>①</sup> 这里表明的原则是一位作家可能叙述得比他自己所了解的更加真实，这个原则也可以很容易地从哲学转用到文学上面去。

最后一个方面就是靡非斯托斐勒司除去在前面摘引的一段著名而重要的段落里以现身说法的面貌出现过之外，还可以在其他段落里，在一些马克思没有明确引人注意他的段落里被辨认出来：

“每个产品都是一个把别人的本质——他的货币引诱过来的钩饵；每个现实而可能的需要都是一种会导致苍蝇扑向粘锅而去的那种癖好……每一个需要都是一种可以装出一副极其和蔼可亲的样儿去接近邻人的机会，并且对他说：亲爱的朋友，我可以给您需要的东西，不过您知道必须有个条件：**您明白您得用哪种墨水来签字，把您抵押给我；我提供乐趣给您来骗取您。**”<sup>②</sup>（着重号系本书作者所加）

魔鬼引诱人们同它达成交易的声音，可以从上面我加重点的语句里清晰地听到。在一个金钱交易的社会里，人们面对邻人所扮演的角色就象靡非斯托斐勒司面对浮士德所扮演的角色。马克思的  
84 学识和他早期想搞文学创作的愿望，在这种戏剧性叙述的段落里，同他对社会—政治方面的关切，达到一个同生共栖的境界。

马克思在巴黎手稿里写道：

“固然动物也生产，象蜜蜂、海狸、蚂蚁等能为自己建筑巢穴居

---

① 《马恩全集补编》，德文版，第1卷，第573页。

② 同上书，第547页。（此处末几句是模仿魔鬼靡非斯托斐勒司为骗取浮士德博士灵魂而说的话。——译注）

所。不过动物只生产自己或后代所急需的东西；它单方面生产，而人则广泛生产；动物只在直接物质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则甚至在摆脱物质需要而获得解放的情况下也生产——事实上，他只有在摆脱这种需要的情况下才真正生产……动物按照它们隶属的物种的需要和标准来制造东西，而人则知道如何按照一切物种的标准来生产，并且知道如何到处应用客体的内在标准。因此，人类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形成事物。”

另外还写道：

“只有通过人的本质具体展开的丰富多采性，才能达到人的主观的——或是培养出来的，或是产生出来的——感性的丰富多采性：一个能欣赏音乐的耳朵，一个能鉴赏造型美的眼睛，简言之，人的各种可供享用的感觉，各种证实为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因为不仅五官感觉，而且那些所谓的精神感觉，实践的感觉（意志，爱情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各种感觉的人类性，只有凭借它的对象，凭借人类化了的自然界才能得以形成。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全部人类历史的工作。”<sup>①</sup>

伊斯特万·麦斯扎罗斯<sup>②</sup>论证道，巴黎手稿在这里为我们对于文学的理解做出最富持久性的贡献：它阐明艺术由于人的特定需要而产生的情况，这种需要远远超出纯粹物质和经济上的需要；阐明艺术能够在满足这种需要的行动当中创造并加强这种需要的情况；阐明艺术在人的自身创造过程中的地位；阐明甚至在马克思把

---

① 《马恩全集补编》，德文版，第1卷，第517页和541页。

② 参阅伊·麦斯扎罗斯，《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一书，第190—214页。



85 艺术看作“异化”和“物化”的一种产品的时代，艺术也可以形成一个比较自由的王国而达到何等程度，人的迫切的创作欲望可以在这个王国里找到一种合乎他的人类性的倾泻的途径。即使马克思在前面摘引的头一段落里再一次谈到“美的规律”而没有进一步加以阐释，他还是对这种“规律”的基本特征提供了一个线索，因为“Mass”这个词汇一次再一次地迴响着，它的意思不仅是“标准”，而且也有“比例”、“尺度”和“适度”的涵义。马克思称赞人的审美感，称赞“überall das inhärente Mass dem Gegenstand anzulegen”<sup>①</sup>——“到处应用客体的内在标准”、“保持每种事物适当的比例”，很清楚地意味着形式和内容之间的紧密统一。但是，巴黎手稿宣称要能做到这一点，人必须从压力下解放出来，那种压力迫使他占有客体仅仅是为了满足原始的物质需要；他必须不仅在思想上而且用五官来体验美的客体是与己有关的，并以此证实自己本质的人类性——这对马克思来说，意味着人自我证实为社会的存在，而不单纯是个人的存在。

歌德的靡非斯托斐勒司对货币能带来邪恶堕落这一点怀有魔鬼般局外人的欢乐；莎士比亚的夏洛克和泰门是这种邪恶的牺牲品，哪怕是他们从中获利或为此而欢欣鼓舞时，也是如此。歌德和莎士比亚所发现并塑造的这些人物的话语，帮助马克思构思并形成自己的词句。他们帮助他更清楚地观察他自己所处的那个世界的面貌，帮助他诱导别人分享他对这个颠倒而混乱的世界的看法，

---

<sup>①</sup> “Mass”这个词汇经常被人指出是马克思美学思想的一个关键性的术语。斯蒂芬·莫劳斯基曾对巴黎手稿中这个词汇的一些涵义解释为：“（1）物质现实结构的复制（它们的形态主要是……）；（2）对称、规律性、比例和和谐的各种属性，它们提供了一种具有吸引力和凝聚的整体，例如，那与物质现实各种形态有所不同、或更准确地说可相匹敌的整体。但是不管‘Mass’对马克思说来还有什么意思，这个词汇在他的论述美学的文字里明确地表明为艺术作品的一种内在的紧密的结构。”参阅巴克森达尔和莫劳斯基合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选》（密尔沃基，圣·路易斯，1973年，第15页）。

从而他便可以设想一个将来的国度的形象来同它相对照。在那将来的国度里，靡非斯托斐勒司无法欢乐，夏洛克既找不到压迫者，也找不到受害者，泰门那种愤世嫉俗的态度也因缺乏养料而消逝。艺术内在的“量”或“度”既是我们期望更美好更公正的将来所出现的非异化的国家的轮廓，也是我们期望的一种锦绣前程。



## 第四章

### 巴黎的秘密

“施里加—维什努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把《巴黎的秘密》<sup>①</sup>崇奉为神。欧仁·苏被誉为‘批判的批判家’。要是他知道这件事，一定会象莫里哀的醉心贵族的小市民一样惊叫起来：‘天哪！我原来说了四十多年的散文，自己一点还不知道呢，您今天把这个告诉我，我对您真是万分的感激’。”<sup>②</sup>

《德法年鉴》只出版一期就停刊了；《前进报》的一些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主要撰稿人也招致普鲁士当局强烈的不满，乃致向法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把他们驱逐出境。法国当局屈从了，于是马克思不得不在1845年2月迁往布鲁塞尔。他在动身前的一个月，写信给海涅说：“在我要离别的人们中间，同海涅离别，对我来说是最难受的。我很想把您装进我的行囊一起带走。”<sup>③</sup> 他的行囊里并没有把海涅装进去，而确实装进一部《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

① 《巴黎的秘密》是法国浪漫主义小说家欧仁·苏(1804—1857)在1842年发表的一部风行一时的小市民感伤的社会小说。书中叙述一个贵族公子鲁道夫怎样在青年时代过着放荡的生活，后来为了弥补自己的罪恶，怎样化装成各种不同身分的人物，在巴黎各个社会阶层中游历，在“堕落的灵魂中撒布善良的种子”。欧仁·苏还写过《流浪的犹太人》、《人民的秘密和世界的秘密》等许多社会小说和历史小说。——译注

②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68页。

③ 同上书，第27卷，第457页。（此处译文加进“装进我的行囊”六字。——译注）

所做的批判》的手稿，这是他后来同恩格斯密切合作而写成的若干著作的头一部。事实上，恩格斯很快就赶到布鲁塞尔跟马克思会合，两位朋友一起到英国做了一次短期的旅行，考察一下那里的状况。在英国，马克思遇到一些德国政治流亡者，其中包括原是裁缝、后成为作家的共产主义者威廉·魏特林<sup>①</sup>，马克思在《前进报》上热情赞扬过他的著作<sup>②</sup>，可是后来很快就对他那种有必要立即举行工人起义和他对最终目标的观点不表赞同。马克思回到布鲁塞尔，再次埋头于研究工作，投入“书海”之中，正象卢格所说的那样，“书海”是马克思赖以生存的真正要素，脱离了它他简直没法活。他也开始在一些社会主义者的集会上发表讲话，并成立了一个“德意志工人协会”，招募一些居住在欧洲其他国家的通讯员，以便使他自己了解并跟上各地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当时伦敦成立了一个“共产主义同盟”，合并了旧有的“正义者同盟”，当即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两人都欣然同意，恩格斯还出席了这个新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1847年11月又在伦敦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时，他把马克思也邀请来了。在这次大会上，这两位朋友被授与一项重大的委托来制定一个新的共产主义运动宣言，即如今众所周知经他俩卓越而成功地完成的那项工作。<sup>③</sup>

1844年完成的那部《神圣家族》里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署名的一篇序言，和一些主要由马克思执笔的论述青年黑格尔派各个方面的文章。这些文章绝大部分是由《文学总汇报》<sup>④</sup>的文章

① 威廉·魏特林(1808—1871)，德国工人运动萌芽时期的卓越活动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理论家之一，他的职业是裁缝。——译注

② 参阅《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83页。——译注

③ 参阅德·麦克莱兰：《卡尔·马克思的思想》(伦敦和纽约，1971年)，第29—30页，第41页。

④ 《文学总汇报》是青年黑格尔派布·鲍威尔主编的德文月刊，于1843年12月—1844年10月在沙洛顿堡发行。——译注。



所挑起来的，该刊编辑就是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里已经驳斥过的青年黑格尔分子布鲁诺·鲍威尔。《文学总汇报》提供马克思不少素材来批判思辨唯心主义，批判那种步黑格尔后尘而想把“自我意识”和“精神”这类概念代替马克思当时已经设想为物质的、以经济为基础的实际存在的事物的企图。鲍威尔主编的这份刊物，如刊名所指，大体上是一种评论各种书籍的刊物；因此无怪乎马克思收集在《神圣家族》里的文章竟有一篇是他专门对一部小说所做的唯一而极其详尽的评论，那部小说是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

88 这部大受推崇的作品，起先是以报章连载的通俗小说形式问世的——这本身就是一种具有魅力的新现象！——其连载部分曾使巴黎《辩论日报》<sup>①</sup>的读者从1842年到1843年一直悬挂在心。全书出版后，被译成多种文字，顿时成为世界闻名之作；马克思在巴黎为之撰稿的那份激进的德文版《前进报》的编辑也对这部小说热烈赞扬，不仅在报纸上大肆宣传，促成德译本的出版，而且还写了一部续集<sup>②</sup>。这部小说提供给《文学总汇报》的一个轻浮无知的撰稿人做一次新黑格尔学派释评的练习机会，他以笔名“施里加”撰稿，真名实姓是“弗兰茨·齐赫林·冯·齐赫林斯基”。正是这篇释评当即激起马克思的批判，但欧仁·苏那种把动人的奇遇、荒唐的巧合、感伤的效果、怪诞的歪曲和平庸的人物同一种随着小说发展而变得越发刺耳、喋喋不休的社会说教相结合起来的作法，显然引起马克思的注意，同时也引起他的反感。

马克思从五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他把施里加的阐释同我

---

① 《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是法国资产阶级报纸《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的简称，1789年于巴黎创刊。在七月王朝时期是政府的报纸，奥尔良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译注

② 亨·波恩斯坦译欧仁·苏，《盖罗尔斯坦》(柏林，1843年)。



们在小说中所看到的实际情况相对比；他不难指出这位批评家犯了以下几个毛病：1.对一些简单的事件给予荒谬绝伦或者显而易见的错误的阐释，以符合他那种黑格尔思辨哲学的规范；2.对小说中许多段落的涵义，甚至表面上的涵义，都做出错误的理解，因为他对欧仁·苏小说中许多事件得之于法国的那种城市生活一无所知；3.没有领会文学的常规惯例的力量，如那种（几乎非采用不可的）汇集作者一直密切注视的许多人物的舞会场景；4.把陈词烂调说成是深邃的见解；5.过分重视欧仁·苏本人对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夸大其词的阐述表面上的价值；6.面对欧仁·苏自己宣扬的社会目标没有提出适当的怀疑和批判的态度；7.过高评价欧仁·苏作品的文学价值；8.用一种语言来隐饰他那种过高的评价或错误的阐释，而这种语言又暴露他既无清醒思考的能力，又无优秀德文写作的本事。施里加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很容易招致责难，而马克思也恰恰箭中鹄的。这种分析无疑证实鲍威尔那份刊物至少有一位撰稿人其蠢无比，同时足以表明思辨唯心主义在那些逊于黑格尔之人的笔下，会变得多么荒唐可笑。

马克思分析的第二个方面也相当重要，也是本书比较着重探讨的一面。在这里分析的不是施里加的阐释同欧仁·苏小说原意的对比，而是作品中显示的欧仁·苏本人的估计同作品实际的反映之间的对比。《巴黎的秘密》留给读者的印象无疑是，小说主人公鲁道夫·德·盖罗尔斯坦尽管有些被夸大的缺点，仍然可以被看成是个令人赞美的人物，他的行动被认为是促进正义。马克思分析了这种行动的根源，指出这个故事正与叙述者的原意相违背，小说显示的只是个不足道的德国贵族公子披着正义的外衣在放纵邪恶而自私的情感。马克思说：

“好一个‘善良的’Rudolph（鲁道夫）\* 呵！他那狂热的复仇



心，他那嗜血的欲望，他那不动声色的深思熟虑的盛怒，他那诡诈地掩饰自己心灵的每一种恶念的伪善，凡此种种，正是他用来作为挖出别人眼睛的罪名的那些邪恶的情欲。”<sup>①</sup>

马克思在这里提出一个论点，即这种耸人听闻的小说之所以获得成功，主要原因在于它能满足读者想象中的较低级的感情，同时又能在小说家让他们亲身体现的那种道德幌子下得到不费代价的道德提高。马克思以一系列的分析进一步对这一论点加以补充，指出这个故事所表达的正同叙述者的原意相违背。我们应该羡慕——欧仁·苏看来要求我们这样做——书中那个屠夫<sup>②</sup>的道德发展吗？马克思参照原文揭露这纯粹是一种从独立的人格降为顺从的看家狗的转变。我们应该为玛丽花<sup>③</sup>“灵魂的拯救”而高兴吗？马克思指出欧仁·苏起先对这个重要人物大胆地描绘一番之后，又如何越来越拙劣地迎合旧有的道德和宗教的规范：

“欧仁·苏超出了他那狭隘的世界观的界限。他打击了资产阶级的偏见。现在他把玛丽花交到主人公鲁道夫的手中，以便弥补自己的孟浪无礼，以便博得一切老头子和老太婆、所有的巴黎警察、通行的宗教和‘批判的批判’的喝采。”<sup>④</sup>

\* 马克思这里把欧仁·苏小说主人公的名字德语化，或重新德语化，是他借此取得文章效果的一部分，故我这里的译文仍保留名字的原样。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265页。

② 屠夫是《巴黎的秘密》中的一个绰号为“刺客”的杀人犯，后为鲁道夫公爵感化，变成他的看家狗似的奴仆，并充当了奸细，把旧时的同伴“校长”诱入了致命的陷阱。最后他为了搭救主人被人刺死。——译注

③ 玛丽花是《巴黎的秘密》中的一个心地善良的妓女，由于她仍然保持着人类高尚的心灵，在她成为罪犯的圈子里获得一个含有诗意的“玛丽花”的名字。鲁道夫公爵使她成为修女，后又成为修道院院长，但后来她知道自己原来是鲁道夫的私生女，忧郁而死。——译注

④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218页。

欧仁·苏既能放纵读者的性虐待狂，又能迁就他们的社会所能接受的传统道德观，这种本领确实是使他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马克思十分清楚而迅速地揭露了这一点，是值得称赞的。

马克思最后指出欧仁·苏之所以能如此放纵他的读者，是由于他本人的自我放任。马克思有一处提到欧仁·苏“对人的自暴自弃有僧侣般的、兽性的偏爱，以至于让‘校长’<sup>①</sup>跪在老泼妇‘猫头鹰’和小恶棍‘瘸子’的跟前”<sup>②</sup>，另一处又提到那位被称为“校长”的人物时说，“在鲁道夫把‘校长’的眼睛弄瞎——这也就是把人同外界隔绝，强制他陷于深沉的灵魂孤独之中，把法律的惩罚同神学的折磨结合起来——这种做法中所运用的刑罚观念，最突出地体现在单人牢房制之中。因此欧仁·苏先生（在《巴黎的秘密》一书中）也就歌颂起单人牢房制来了。”<sup>③</sup>这种自我放任往往有性的根源，马克思在评论“校长”被弄瞎眼睛那段情节时揭露了这种根源；在这方面，马克思的分析先于弗洛伊德对俄狄浦斯<sup>④</sup>的分析和霍夫曼在《睡魔》那篇小说中的分析；马克思说，“‘校长’曾经滥用自己的力气，现在鲁道夫则麻痹、摧残、消灭这种力气。”“要治愈人性的疾病，就必须消灭人性。”“鲁道夫给‘校长’的惩罚也就是奥力金<sup>⑤</sup>自己给自己的那种惩罚。鲁道夫阉割了‘校长’，夺去了他

① 《巴黎的秘密》中的一个绰号为“校长”的杀人强盗，鲁道夫用诱骗手段把他拿获，挖去了他的眼睛。——译注

② 《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231页。

③ 同上书，第237页。

④ 俄狄浦斯，古希腊传说中的底比斯王子，曾解怪物斯芬克斯的谜，后误杀父亲，并娶母亲，发觉后自刺双目，流浪而亡。弗洛伊德对俄狄浦斯的分析见《精神分析引论新编》第33讲，《妇女心理学》（1933年）。——译注

⑤ 奥力金（约185—254年），基督教神学家，所谓“教会的祖先”之一。为了禁欲，割去了自己的生殖器官。——译注



的一个生殖器官——眼睛。‘眼睛是身体的明灯’。”<sup>①</sup>

91 在分析的第三个方面，马克思试图掌握《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结构、事件和言词，不是为了对照一个有缺点的批评家的误解，也不是为了对照作家宣称或暗示的意图，而是为了同当代生活的现实状况相对比，因为作者宣称他要在这部小说里揭示生活的“秘密”。这一分析表明欧仁·苏采用了边沁<sup>②</sup>和傅立叶<sup>③</sup>关于刑事裁判的想法，马克思揭露这种采用既肤浅又不当<sup>④</sup>。他又通过对比，指出欧仁·苏为他那位公证人雅克·弗兰<sup>⑤</sup>所设置的那种耸人听闻的事件里可能隐藏着多少社会上的真理，“公证人在欧仁·苏的小说中所处的地位是和他的职位密切相关的。‘公证人在世俗事务中，就如僧侣在宗教事务中一样，他们都是我们的秘密的守护者。’（蒙泰<sup>⑥</sup>：《法兰西各等级……的历史》第9卷第37页）”<sup>⑦</sup>马克思评论道，怪不得巴黎公证人事务所认为这个人物是对他们自己的一种恶意诬蔑，并坚持要从已经搬上舞台的《巴黎的秘密》中删去这个人物。但是，在其他方面，欧仁·苏又巴不得向他的读者的偏见让步，马克思特别指出他描绘丽果莱特<sup>⑧</sup>这一人物时的手法，是用谎言把巴黎浪漫女子的那种性自由一笔勾销：“由于对资产阶级恭顺，而生性又好夸大，他就一定要在道德上把浪漫女子理想化。他一定要把她的生活状况和性格的尖锐的棱角磨掉，也就是消除她对结婚的形式的轻视、她和大学生或工人的纯朴的关系。正是在这种关系中，她和那些虚伪、冷酷、自私自利的资产者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227页。

② 耶利米·边沁(1748—1832)，英国社会学家，功利主义理论家。——译注

③ 沙尔·傅立叶(1772—1837)，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译注

④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40页、249—250页。

⑤ 雅克·弗兰是《巴黎的秘密》中的一个虚伪的公证人。——译注

⑥ 阿芒·阿列克西斯·蒙泰(1769—1850)，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译注

⑦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89页。

⑧ 丽果莱特是《巴黎的秘密》中的一个浪漫女子。——译注



的太太……形成了一个真正人性的对比……”<sup>①</sup>正如狄更斯在《奥列佛·退斯特》和《大卫·科波菲尔》中反映伦敦生活实况时把妓女描绘得那样斯文而妄自菲薄，欧仁·苏也可能同样没有把巴黎生活的实况如实反映出来。但是，欧仁·苏确实作出真实反映的事物，对正常的读者来说，也并非全然乏味，诸如他为之写作的那个社会集团的偏见，他本人那种也受社会制约的、“过分夸大”的想法等等。

这种信念使得马克思怀有一种比施里加更为怀疑的态度来仔细审察欧仁·苏小说中的人物的一言一行。欧仁·苏借用那个愤怒的工人莫莱尔之口感慨表达的“真理”，受到施里加热情的赞扬，那工人说：“但愿富人也知道这一点！但愿富人也知道这一点！可是不幸得很，他们不知道贫穷是什么。”马克思则对欧仁·苏和这位青年黑格尔派阐释者表示同样蔑视的态度：

“施里加先生不知道：欧仁·苏由于要对法国资产阶级礼貌一些而把时代弄错了，他把路易十四时代市民阶级常说的‘呵！但愿皇上也知道这一点！’改成‘呵！但愿富人也知道这一点！’，再借‘宪章真理’时代<sup>②</sup>的工人莫莱尔之口说了出来。这种贫富间的质朴关系至少在英国和法国已经不再存在了。富人手下的学者即经济学家们就在这里传播关于贫穷这种肉体贫困和精神贫困的非常详细的见解。他们用安慰的口吻证明说，因为要保持事物的现状，所以这种贫困似乎也应保存下来。甚至他们很细心地计算出，穷人为了富人和自己本身的福利应该按什么比例通过各种死亡事件来

92

<sup>①</sup>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97页。

<sup>②</sup> 指1830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所通过的立宪宪章，它是七月王朝的根本法。“宪章真理”是讽刺的话，隐指路易·菲力浦在1836年7月31日发表的宣言结束语：“今后宪章就是真理。”——译注



缩减自己的人数。”<sup>①</sup>

按照马克思的看法，一个人如果不大了解历史事实，不大了解有关社会关系的各种解说，则不可能达到那种有助于考虑好文学批评的见解。

马克思进行分析的第四个方面毋庸赘述。这部小说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乌托邦式的社会改革方案，由主人公鲁道夫把它们付诸实施，而由叙述者暗中详加阐明；这些方案包括建立一个模范农庄，开设一家无息贷款给暂时失业的工人的银行等等，范围十分广泛。马克思不难指出这些方案全是建立在一种十分错误的观点上的，即认为经济程序能如何起作用或如何使之起作用。正象小说中对“校长”的眼睛所动的手术不可能在活生生的人体上施行那样，那些方案所描绘的对政治实体（国家）所施行的手术也同样荒谬得在现实中根本办不到。

但是——这是讨论的第五个、也是最后的一个方面——马克思一直意识到《巴黎的秘密》最终应作为一本小说、一部文学作品，而不应作为一篇思辨哲学文章、一本蓝皮书或一本社会宣传小册子来评价。他没有运用文学批评家那种拘谨的语言，而有时谈论起来就仿佛欧仁·苏在报道真人真事似的，这一点倒亦确实，例如他揣测鲁道夫对待他的盖罗尔斯坦领地的臣民的方式时，他告诉我们欧仁·苏“保留了”“校长”在被弄瞎眼睛之前要说的一句话时，以及他把欧仁·苏呈现的一个诚实而思想开明的人称为一个“虚伪的”神甫时，都出现过这种情况。彼得·戴麦兹<sup>②</sup>为此而怪罪马克思——今后作家对此应比马克思处理得更谨慎些，而应作

<sup>①</sup>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70页。

<sup>②</sup> 彼得·戴麦兹（1922—），美籍捷克人，1962年起任美国耶鲁大学日耳曼与比较文学教授，著有《马克思、恩格斯和诗人：马克思文艺批评的来源》（1967）等书。——译注

出他所忽略作出的那种重要的区别。<sup>①</sup>但是,马克思对《巴黎的秘密》的全面分析,令人毫不怀疑他完全意识到小说人物和真人之间的区别。我们看到他对欧仁·苏的责难,其中有一点正是说小说里描写的丽果莱特那样的人物同现实生活的这类人物不尽符合,她们往往受到最肤浅的小说喜用的常规惯例的促动。<sup>②</sup>尤其糟糕的是,欧仁·苏常以说教来代替呈现,从而动机和行动背道而驰。他的人物象老式漫画中的人物那样,从嘴里吐出“一袋子语汇”,通过这些语汇向小说中其他人物和读者解释作家无法在人物行动中所表现的事物——他们不得不宣扬作家本人的意图,“这种意图决定作家使这些人物的这样行动,而不是那样行动”,充作那是他们自己思考的结果,充作他们行动的自觉动机;事后,这些人物的自己还应该表明作者这种耸人听闻的做法是合理的。<sup>③</sup>

“‘你把我关在地窖里,’”(欧仁·苏让“校长”对“猫头鹰”<sup>④</sup>说)“‘让老鼠来咬我,害我饱受饥渴之苦,这种种做法促使我完全改邪归正了。孤独洗净了我的灵魂。’‘校长’对‘猫头鹰’发出来出来的那种野兽般的嗥叫、那种肝胆欲裂的狂怒、那种极其可怕的复仇心,是对这种道德辞令的辛辣的嘲弄。”<sup>⑤</sup>

马克思论证这类矛盾在一位睿智的作家审慎而精巧的笔下是不会出现的,这毋宁说是出自一种粗糙而笨拙的文学技巧,而这种技巧又十分投合十九世纪欧洲那种惊险小说作家和他们所赢得的广大读者双方特有的浅薄的感情和荒谬的想法。所以(正如马克思所指出那样),欧仁·苏在为他的贵族主人公塑造两位教师时,必须

① 参阅彼得·戴麦兹:《马克思、恩格斯和诗人》,德文版,第107页。

②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84页。

③ 同上书,第200、233页。

④ “猫头鹰”是《巴黎的秘密》中的一个老泼妇。——译注

⑤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233页。



把聪明的波利多里描绘得邪恶而堕落，而那位愚蠢的穆尔弗反倒诚实而有德行，这种作法一点也不令人感到奇怪。

94 马克思对《巴黎的秘密》一书做出的评论，尽管略有缺点，象上面已经指出他有时没有把小说家塑造的人物同现实生活的人物区别开来，文章也显得过于冗长，另外多少还有些累赘的戏谑，但仍然不失为迄今为止对一部畅销书试图作出的最富指导性的分析。尤其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他本来打算对一些更重要的作品进行广泛的评论，却没能挤出时间来实现这些计划中的任何一项；如果他的女婿保尔·拉法格的话可信，其中还包括一项对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的研究。<sup>①</sup>

但是，马克思对《巴黎的秘密》的这篇评论的特别重要性，在于它比其他任何单篇文章都更加清楚地显现了马克思对文学性质和文学研究的看法，而且他此后一生从来没有对这些看法加以反悔。首先，他认为要完整而公正地评价一部文学作品，就必须把各方面的丰富知识和见解协调起来。马克思在揭露《巴黎的秘密》一书中经作者赞同的那些荒谬的社会改革计划时，运用了他对当代社会经济程序的理解；他在评论小说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他们那些相对貌似真实的行动时，运用了他在法国社会中的亲身体会；他在谈到警探“红手”<sup>②</sup>在小说情节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时，利用了他阅读过的回忆录（特别是弗朗斯瓦·维多克<sup>③</sup>的几部回忆录）；他在仔细审察欧仁·苏巧妙地利用塞西莉<sup>④</sup>的体态来描绘异国色情的诱惑

---

① 参阅克里姆编：《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柏林，1967年），第21页。

② 警探“红手”是《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译注

③ 弗朗斯瓦·欧仁·维多克（1775—1857），法国冒险家和警察暗探，曾任巴黎的警察头子多年，1828年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他的名字已成为狡猾的密探和骗子手的代名词。——译注

④ 塞西莉是《巴黎的秘密》中的一个混血姑娘。——译注



力时，采用了他阅读过的法国诗篇（艾瓦里斯·德·巴尔尼<sup>①</sup>的《情诗》）和旅行家的游记；他在评论欧仁·苏有意识迎合读者那种乐意寻求惊恐不安的刺激时，利用了他所阅读过的欧仁·苏的其他作品；他在揭露欧仁·苏欣然使用的文学惯例时，引证了他所熟悉的其他十九世纪的小说；他在引证《浮士德》、《堂吉诃德》、《醉心贵族的小市民》和《乔治·唐丹》中的人物来“比拟”欧仁·苏和他那位新黑格尔派评论员，而且击中要害时，显示了他对世界文学名著的渊博知识。读者同一部虚构幻想的文学作品打交道，就象施里加同《巴黎的秘密》似乎打了交道那样，如果只有一个德国外省人的经验和一个装满模糊不清的新黑格尔派观点的头脑，而很少具备其他各方面的条件，则很可能会糟糕透顶地误入歧途。马克思尖锐地把施里加读完欧仁·苏作品之后的反应同一个中学生读完席勒的《强盗》之后的反应相比<sup>②</sup>；这两部作品都有些因素可能在思想未成熟和无知的读者身上引起无批判能力和情绪过分冲动的反应。

95

马克思在他的分析中指出，普通常识、均衡感和幽默感在睿智的读者所具备的各项条件之中占重要的地位；还有一点也绝非不重要，那就是马克思在探讨《巴黎的秘密》时十分自然地转向民间文学——民间读物<sup>③</sup>、民歌和席间小调，运用它们来说明具备上述条件的好处，以揭露愚蠢，灭掉自命不凡的威风和感伤的情绪。马克思从德国民间滑稽故事《七个施瓦比亚人》中摘取诗句来嘲讽施里加和欧仁·苏的小说主人公鲁道夫：

① 艾瓦里斯·德·巴尔尼(1753—1814)，法国诗人和哀歌作者。——译注

② 见《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257页。

③ 民间读物(Volksbuch)是16世纪流行于德国的民间故事。书的内容多种多样，有过去的传说(如《齐格弗里特》)、南方民族和东方的故事、同时代的人物故事(如《滑稽大王厄仑史皮格尔》、《浮士德博士》)等。恩格斯在《德国的民间读物》一文中曾说，这种书可以使疲倦归来的农民忘却疲劳。——译注



“哈内曼，  
走向前，  
你有双大的防水靴！”<sup>①</sup>

又用德国民歌里的修女的清白来比拟那位批判家超凡的清白：

“我不思恋爱情，  
任何男人我都不需要，  
我一心想念上帝，  
他是我唯一的依靠。”<sup>②</sup>

又用一首法国席间小调来总结鲍威尔兄弟领导下进行的“批判的批判”的活动：

“犍牛能成双，  
田地耕成行。”<sup>③</sup>

- 96 另外，他还从德国民间故事书中摘取一些象征（如《福尔土纳特》那个用之不竭的钱袋<sup>④</sup>）和一些人物类型（如《梯尔·厄仑史皮格尔》那个愚鲁而智巧的主人公<sup>⑤</sup>）。因此，在《神圣家族》专门评论《巴

---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208页。

② 同上书，第205页。（引自德国民歌《修女》。——译注）

③ 同上书，第268页。

④ 同上书，第255页。（福尔土纳特是德国民间传说中的人物，他有一个神奇的用之不竭的钱袋和一顶魔帽。——译注）

⑤ 同上书，第258页。梯尔·厄仑史皮格尔早在马克思1842年评论布鲁诺·鲍威尔的一本著作的文章里就已出现过，他的形象很象桑丘·潘沙。

黎的秘密》的章节里，这些民间故事就跟《堂吉诃德》、《浮士德》、《醉心贵族的小市民》和《乔治·唐丹》等文学名著一样起着几乎相同的作用<sup>①</sup>。老百姓的民间文学和受过教育的特权阶层的文学，都可以丰富人的生活，提高人的认识，尽管有些虚构幻想的文学作品，以欧仁·苏的小说为例最为恰当，与其说使人在这方面丰富起来，毋宁说更容易把警惕性不高的读者的思想搞混乱，把他的感情引入邪路。

马克思在衡量虚构幻想的小说同“现实生活”的差距时，不是把一种“反映”同某个受反映的“外部客体”“简单地”对比一下就算完事。人们对现实生活的种种阐释构成文学素材的主要一部分；欧仁·苏的小说体现了这些阐释，而且它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极其复杂的阐释。它不仅是个人的、而且可能是具有代表性的阐释；种种设想绝大部分也是那些喜欢阅读《巴黎的秘密》的读者——十九世纪中叶法国（和欧洲的）资产阶级的设想。这种由作家和读者分享的设想，这种具有普遍反应的号召力，在使这部小说受到欢迎并获得成功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马克思对于文学作品所采取的形式和结构并不太重视，而更重视的是小说家和戏剧家怎样呈现他们的人物形象。他认为批评家在评论小说人物时，不仅应当考虑作家对于这些人物的思想状况的描绘以及作家让他们表现的行动，而且也应当考虑作家对于他们赖以生存的物质环境的烘托描绘和他们的言谈话语。马克思在探讨欧仁·苏的小说时，把这一点讲得很清楚：

---

<sup>①</sup> 马克思在讨论欧仁·苏的小说时引证《浮士德》和《堂吉诃德》（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224页），他也引证歌德的《温和的讽刺诗》（见《马恩全集》，第2卷，第224页）和莫里哀的《醉心贵族的小市民》和《乔治·唐丹》（见《马恩全集》，第2卷，第68页，第248页）。此外，我们还发现一段模拟《圣经》的滑稽作品和一段摘引的天主教圣歌《世界末日的审判》（见《马恩全集》，第2卷，第267—268页）。



“这些巢穴和言谈是罪犯日常生活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所以描写罪犯必然要描写到这些方面，正如描写 *Femme galante* (情妇) 必然要描写到 *petite maison* (幽会密室) 一样。”<sup>①</sup>

批评家首先应该自问小说中的某一个人物是否既是个别的，又是具有代表性的；例如，马克思赞同欧仁·苏对皮普勒太太的描绘，因为她既是一个令人置信的个别人物，又“代表”了她那个类型的人物、职业和阶级：她是个典型的巴黎看门女人。马克思使用的那个表示赞同的动词“*repräsentieren*”具有“描绘”和“代表”的双重意义<sup>②</sup>。同样，欧仁·苏对雅克·弗兰的描绘也体现了法国公证人主要方面的典型。

凡是一个作家没能塑造出令人置信和“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正如欧仁·苏往往没能做到那样，可能是由于两种原因所造成，或基于一种，或两种兼备。一种原因可能是由于作家力不从心，草率从事，不去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却满足于那些以作家本人的声音来表白自己的傀儡。但是，另外也可能是由于那位作家要给他为之提供娱乐从而获得报酬的社会尽力，不惜牺牲自己艺术上的完善；他遵循统治阶级为自身利益和为维护这种利益的道德观而指定的方向来歪曲现实，违反人物的逻辑性，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这样做了。至于《巴黎的秘密》对性这一方面的不忠实的描绘，以及欧仁·苏没能令人满意地呈现和发展他那众多的人物形象，马克思归咎于上述的第二种原因。

① 《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71页。

② 同上书，第94—95页。（“Bei Eugen Sue repräsentiert Anastasia Pipelet die Pariser portière”，“在欧仁·苏的小说里，阿娜斯塔西娅·皮普勒是巴黎看门女人的典型。”）

一个作家的意图，单就由作家本人明确的言词中可以收集到的、或从他的作品所提供的内在论据中推断出来的意图而言，显然是马克思试图在《神圣家族》和别处所要分析的一个论题：

“欧仁·苏自己宣布，他……是为了投合读者‘又害怕又好奇的心理’。欧仁·苏先生所有的小说都是为了投合读者又害怕又好奇的心理。只要举出《阿达尔·居尔》，《火蛇》，《普利克和普洛克》等小说，就足够说明这一点了。”<sup>①</sup>

然而，读者一向会相信故事甚于相信作者。一部著作往往会显示出远远超出作者原有意图的倾向，从而导致原有意图和所收效果之间产生种种矛盾。一部作品可能会意想不到地有助于了解作者最隐而不露的社会观点和他所设想读者所持的社会观点。这种情况发生在欧仁·苏的主人公鲁道夫身上，他（尽管有些公认的缺点）本来显然是要作为一名社会公正的施与者姿态出现的，却在读者探索的眼光下暴露出一种性虐待狂和一种暴戾成性的性格，这种性格极其明显地见之于他同如今称之为下层社会的人物打交道的时候：他不是把他们弄成残废（体现在“校长”身上），就是把他们推入一种无益而不施生产的生存境地（体现在“玛丽花”身上），或是把他们贬低为一条忠实的狗那样的身分（体现在“屠夫”身上）。另一方面，欧仁·苏在开头描述玛丽花时，还比较完整而忠实地描绘现实，似乎超出了他的世界观所容许的界限，这一点赢得了马克思的赞许。“欧仁·苏超出了他那狭隘的世界观的界限。他打击了资产阶级的偏见。”<sup>②</sup>就巴尔扎克来说，恩格斯和卢卡契后来给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71页。

② 同上书，第218页。



予高度赞扬的也正是这种“矛盾”。<sup>①</sup>

马克思对《巴黎的秘密》的探讨还进一步阐明了表面意义和内在涵义之间的相互作用。一个作家，如果自己对此不甚了了，就很可能对头脑清醒的人说的是这样一回事，而对思想糊涂的人却悄不声儿说的是另一回事。我们注意到马克思对欧仁·苏小说里有关性的隐晦之词特别敏感。他把“弄瞎眼睛”看成是象征性的“阉割”，马克思先于弗洛伊德作出了这类评论，但其中加进了那种不在弗洛伊德探讨目的之内的社会批判因素。欧仁·苏小说里关于“校长”的眼睛被弄瞎这一情节，不单纯是提供一种“可接受的”阉割的代替，马克思认为这是小说中的一个个人在公正的幌子下对另一个人进行迫害的行为。由于这些个人也具有“代表性”，显然属于社会上不同的阶级，因此最终可以把这看成是阶级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象征：统治阶级企图阉割另一阶级，耗尽它的一些精力，以便使它变得无害或卑躬屈膝，同时也企图把阶级斗争呈现为

99 一场简单的善恶之争。

马克思对欧仁·苏小说的探讨还揭示了马克思所赞扬的人类的一些基本价值。斯蒂芬·莫劳斯基在评论马克思看待欧仁·苏的玛丽花这一人物时提到了这一点，他说，“马克思认为玛丽花朝气蓬勃，精力充沛，超出她那资产阶级的本质，并冲破欧仁·苏强加在人的主体上的那种拙劣的道德教化的藩篱。”<sup>②</sup>换句话说，这

---

<sup>①</sup> 恩格斯在1888年4月给玛·哈克奈斯的信中写道：“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们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见《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46—447页。）——译注

<sup>②</sup> 见巴克森达尔和莫劳斯基合编：《马恩论文艺选》（密尔沃基，圣路易斯，1973年），第36页。

个小说人物给读者展现出一种看来大为超出欧仁·苏原有意图的力量和 joie de vivre<sup>①</sup>。这种力量当然出自欧仁·苏所选择加以描绘的那类人物的内在潜力。莫劳斯基接着以颇为公正的态度论证那些体现在玛丽花身上的价值符合马克思在文艺中找到的价值。“粗犷的声色之乐……不屈不挠的意志、欢愉的热情和激情的精神力量，凡此种种在艺术上的表达，马克思都为之赞赏不已，这些赞赏见诸于他对埃斯库罗斯和莎士比亚作品的评论。”<sup>②</sup>

《神圣家族》一书还有几点也值得本文简短地提一下。首先是书中引证了许多文学作品，从1789年的一份革命刊物（路斯达洛主编的《巴黎革命》）押韵的警句<sup>③</sup>，直到马蒙台尔的独幕喜剧《吕锡尔》中的一句台词<sup>④</sup>，范围极其广泛。在论述布鲁诺·鲍威尔那种多少有点激愤的哲学时，起先使用了歌德《浮士德》第一部里靡非斯托斐勒司的一句话<sup>⑤</sup>，后来又用上海涅诗集《北海集》里的人物的话语：

“一个傻瓜等待着回答。”<sup>⑥</sup>

在他分析当代德国人对爱情的臆想时，马克思先后摘引了莎士比亚的作品（斐朗：“可是从一个女人的眼睛里学会了恋爱，却不会禁闭在方寸的心田”——《爱的徒劳》第四幕第三场<sup>⑦</sup>）和席勒《来

① 法语：生活的欢乐。——译注

② 见巴克森达尔和莫劳斯基合编：《马恩论文艺选》，第36页。

③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104页。

④ 同上书，第183页。

⑤ 同上书，第180页。

⑥ 同上书，第200页。

⑦ 同上书，第25页。（见《莎士比亚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40页。——译注）



自异乡的少女》里的四句诗<sup>①</sup>。我们注意到马克思引用莎士比亚那段话旨在把虚无飘渺的臆想拉回到现实里来，而引用席勒那四句诗则是讽刺地用来加大与现实脱离的差距。这样，这两段引文的并列勾划出了莎士比亚方式和席勒方式的对比，而这种莎士比亚和席勒式的对比后来成为马克思评论拉萨尔的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时的一个极其突出的特色<sup>②</sup>。自此后，马克思经常在文章讽刺的段落里摘引席勒的语句，他显然领悟到席勒的作品不管它本身多么值得人们赞叹，仍然非常容易被德国的庸人市侩吞噬掉。<sup>③</sup>

此外，《神圣家族》对鲍威尔和他的信徒们在德语方面所犯下的罪行给予严厉的谴责；他们在这方面所犯的罪，其严重程度至少不下于他们在违背现实生活方面所犯的罪。“赖哈特<sup>④</sup>胡言乱语地滥用外国语汇，长篇累牍地加以引用；孚赫<sup>⑤</sup>按照英语词汇形成的原则来创造德语词汇；埃德加·鲍威尔则胡乱地处置蒲鲁东的法语，殊不知那跟德语迥然不同，而是‘富有思想观察的政治语言’；施里加混淆了他的隐喻；布罗诺·鲍威尔写出一大堆不可救药的辩解和限定的术语。”<sup>⑥</sup>由此我们再一次看到马克思这次在恩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26页。（这四句诗是“她不是降生在山谷里，谁都不知道她来自何方；她匆匆地辞别而去，连踪影也随之消失。”——译注）

② 1859年4月19日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信里谈到拉萨尔的上述这部著作时说：“这样，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而我认为，你的最大的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574页。）——译注

③ 指当时德国的庸人们醉心于他们所不甚理解的席勒的“理想主义”。——译注

④ 卡尔·赖哈特，柏林的一个订书匠，《文学总汇报》的工作人员。——译注

⑤ 莱昂·尤利乌斯·孚赫（1820—1878），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贸易自由的拥护者，50年代初宣传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观点；1850—1861年侨居英国，为《晨星报》的撰稿人，1861年回到德国，后为进步党人。——译注

⑥ 见S·E·海曼，《缠结的组合，富于想象力的作家达尔文、马克思、佛拉采尔和弗洛伊德》（纽约，1966年），第90页。



格斯的协助下，施展了文学批评的武器来反击他的对手，这种武器由于是模仿对手的文体而变得越发锐利。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里还拿埃德加·鲍威尔等人对于蒲鲁东的话的理解，同蒲鲁东的原话相对比；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提出文学作品在一个耽于积累财富的社会中具有“内在的”和“交换的”两种迥然不同的价值，这一问题后来在马克思的经济著作里变得十分突出。他们转述蒲鲁东的信念，即不应当以任何简单而机械的方式，把有才能的人看成只是社会的产物；艺术家、学者和诗人获得的最好的报酬就是社会容许他们不受干扰地专心致志于科学和艺术。<sup>①</sup>《神圣家族》的作者在这里对蒲鲁东的观点没有表示赞同与否，只不过是比“批判的批判家”更为精确地转述一下罢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贬低“批判的批判家”那种思辨的价值，说他们只知道历史上的政治、文学和神学方面的重大事件(die politischen, literarischen und theologischen Haupt-und Staatsaktionen der Geschichte)<sup>②</sup>。马克思和恩格斯表明“批判的批判家”看来不能赞赏的，是他们那个时代“下层人民阶级”所表现的高尚性：“要理解这个运动中人的高尚性，就必须知道英法两国工人对科学的向往、对知识的渴望、他们的道德力量和他们对自己发展的不倦的要求。”<sup>③</sup>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说这种人的高尚性正在产生一种“出自英法两国下层人民阶级的新的散文和诗作。”<sup>④</sup>他俩并没有提出这种“新文学”的范本，也没有暗示读者到哪里去找，但是《神圣家族》一书已经表明他们经常诉诸于民间文学（见本书上文

101

①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58—59页。

② 同上书，第191页。

③ 同上书，第107页。

④ 同上书，第171页。



第95页),人们由此可以揣测这同他们对于普通老百姓创作的富有意义而高尚的文学的探索并非毫无关联。

最后,《神圣家族》一书中还有一点也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劳永逸地同文学中那种靠神灵启示的神秘理论疏远,同时也同任何会把作品同书写它的活生生的人截然分开的那种“不具人格的”理论疏远。他们评论布鲁诺·鲍威尔时说,“布鲁诺先生以批判的天真把‘笔’跟书写的主体,并把作为‘抽象的书写者’的书写的主体跟从事过书写的活生生的历史的人分了家。这样,他就有可能被‘笔’的神奇力量弄得如醉如狂……”<sup>①</sup>关于这里提出的不具人格的文学理论和靠神灵启示的文学理论之间暗含的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进一步加以阐明,本书也不可能对此详加阐述。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跟这两种理论从来不打交道。正如《神圣家族》这个书名也纯粹是讽刺性的<sup>②</sup>,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在他们的理论系统中容纳任何宣称接近超自然真理的宗教或神秘的经验,所以他们跟那种宣扬神秘或不可思议的彼岸世界的文学理论格格不入。文学只对人谈论他自己,谈论他所生活的和他那助以形成的社会—历史世界。对马克思来说,文学所反映的人的提高和历史的演变这方面的奇迹,比宗教宣扬的奇迹更为“真实”,比吸引首次阅读欧仁·苏小说的读者那种虚妄的神秘更加惊心动魄而且意义深远;这种奇迹是由那些单个的、历史和社会条件限定下的人创造出来的。马克思一向试图听取的也正是他们的声音。

<sup>①</sup>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128页。

<sup>②</sup> 《神圣家族》一书的书名,本来是意大利著名画家安得列阿·曼泰尼雅(1431—1506)一幅名画的题目,画中的人物是圣母马利亚抱着圣婴耶稣,旁边有马利亚的丈夫圣约瑟,有圣以利沙伯、圣约翰、圣亚拿以及一些天使和神甫。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借用这个题目来讽喻以布鲁诺·鲍威尔为首的一伙的。他们把鲍威尔比作天父的独生子耶稣,把其他几个伙伴比作他的门徒。这些人妄自尊大,自以为超乎群众之上,以为他们的话就是天经地义,不容争辩,正象耶稣在人们中传道一样。——译注

### 实践和意识形态

“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的问题，变成了从语言降到生活中的问题。”<sup>①</sup>

#### (1)

1845年，马克思写下了关于费尔巴哈的那十一个论点，恩格斯将之稍加改动，以《马克思论费尔巴哈》为题，在马克思逝世后出版。这些论点从此作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而著称于世。头一个论点在很多地方就和文学研究有关系：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发展了，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gegenständliche〕活动。”<sup>②</sup>

可以认为，文学也不应该被看作是对某种外界事物，对一种“物质”

<sup>①</sup>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525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3页。



现实毫无生气的忠实反映，而应该被看作是一种客观和主观的结合，一种通过各种感觉所理解的世界同特定的思想、气质和性格的结合。这既适用于文学欣赏，也适用于文学创作。

104 这里我们必须永远记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第三个论点所试图指出的关于马克思的态度同“机械唯物论者”的态度之间的明显区别：“机械唯物论者在关于环境的改变和教育的学说中，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和文学作品的读者，并不是环境的被动的产物，他们从事能够改变他们所处的环境的活动。这样的活动，正如第六、七两个论点所告诉我们的那样，永远是**社会活动**。作家们和他们持续不断的读者都属于特定的年龄、民族和社会集团：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sup>①</sup>

关于《巴黎的秘密》一书的讨论，已经指出这一点在批判的实践中意味着什么。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在那里不断地试图在文学创作和阅读当中发现其社会成分。他试图说明欧仁·苏是怀着特定的读者的期望而为他们写作的，这一事实对于他的作品性质起了重要的影响。他试图指出，欧仁·苏所处的社会环境如何塑造了欧仁·苏的思想方式和感情。他也试图指出，有些读者不了解那种环境，而且（象施里加那样）带着同欧仁·苏为之写作的对象很

---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5页。

不相同的期望来阅读他的作品，就将会在他们心目中如何构成一种与巴黎读者所构成的迥然不同的印象。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一点并没有导致马克思走向完全的批判的相对论。他清楚地相信，他对《巴黎的秘密》一书较之施里加和《辩论日报》的一般订阅者阅读而理解得更加充分和确切，并且试图显示那种密切联系原作实际内容的优点。这种批判活动也是实践的一种方式。<sup>①</sup>马克思在说明他那种不同于别人的解释时，可以把他自己的阅读方法和那种可以证明他的方法所以正确的根据阐述得更加清楚。他通过批判，不仅帮助别人看得更加清楚，而且也发展了、在某种意义上说还改进了自己的观点。

关于费尔巴哈的第十个论点是：“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sup>②</sup>这个论点指出马克思当时已在开始采纳的乌托邦理想的远景，也即未来的一个“社会化了的人类”的预见。文学也必须根据这种远景来加以评论。文学的种种历史现象，现在可以被看成是有助于社会化了的人类的到来，或是反映文学朝这一理想的进展，或是揭露这种前进的阻力，或是通过文学超越单纯的交换价值这一概念来预见那种必将诞生的社会的价值。

关于费尔巴哈的最后一个论点：“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sup>③</sup>，马克思在这些方式中举出在那些旨在彻底改变读者的思想方法并从而改变他们的社会活动的辩论中，文学是有其帮助作用的。同样，马克思在文学欣赏方面，实践也是他的中心范畴之一，他所考虑的目的并非为了文学欣赏

<sup>①</sup> 参阅关于费尔巴哈的第八个论点：“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5页）实践很可以被看作是全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关键概念。

<sup>②</sup>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5页。

<sup>③</sup> 同上书，第5—6页。



而进行思考、了解或取得智慧,而是为了很好地生活,有所作为。①

## (2)

在包括《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那份手稿的最后两页上的一些摘记中,我们可以发现年轻的马克思对艺术的态度的一重要表示。

“自然科学和历史。

没有政治、法律、科学等等的历史

以及艺术、宗教的历史。”②

“没有艺术……史。”艺术,包括文学在内,必须在一个更加广泛的范围内加以研究,要把艺术看成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历史——全人类的奋斗和其自然基础的历史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下一部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发现这是以较长的篇幅来探讨的论题之一。

106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对费尔巴哈、布鲁诺·鲍威尔、麦克斯·施蒂纳和其他黑格尔以后的德国思想家们的批判,是在1845和1846年间写成的。但是,这部著作只有一些片段是在作者生前出版的;在遭到几家出版商的拒绝之后,这部手稿就被交给马克思形象地称之为“老鼠用牙齿去批判”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手稿就有老鼠牙齿留下的很多痕迹,使后世无法看到其中很多精采的字眼)。

这部作品,正如它的标题所提示的那样,论述的是黑格尔以后

---

① 参见里·保·伯恩施坦,《实践和活动》前言,第10页,和正文第13页起。

② 《马恩全集》,德文版,第3卷,第539页。

的唯心主义哲学虚无飘渺的幻境，在那样一个世界里唯有精神和思想是基本的现实。马克思和恩格斯抱怨说，“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sup>①</sup>

“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模糊的东西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定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失去独立性的外观。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前一种观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符合实际生活的第二种观察方法则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sup>②</sup>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断言那样，这其实是被颠倒了或仰面朝天的黑格尔主义。在这义正辞严的段落里并没有特别提到文学和艺术，但不难看出，如果不加考虑地扩大这些原则将会产生什

---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23页。

② 同上书，第30页。



107 么样危险的后果。这很容易诱使批评家忽视以下两点，即文学的各种形式，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有它们自己的历史和发展；物质生活在一些并非无足轻重的方式上是受到人的意识的影响的。观察和明智会象婴儿一般同黑格尔的洗澡水一起被泼出去，难道不会有这样的危险吗？为了消除这种危险，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后面的一节里着重指出一个关于物质生活和意识之间的关系的完整概念，其中必须包括**相互作用**这个原则：

“由此可见，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全面地描述全部过程（因而也就能够描述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了。”（着重号系本书作者所加）<sup>①</sup>

“全面”包括“相互作用”（Wechselwirkung）。相互作用这个概念有效地缓和了单方面依赖的概念。

如同在《巴黎手稿》中一样，“全面”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的一个关键概念。约希姆·伊斯瑞尔有益地区别了马克思使用“全面”这一概念的两种方式。全面可以在如下的意义上含有“理想的全面”的意思，即作为一种理想类型的人“赋有表现人类特性的一切特征，而且这一切特征随着社会和它的生产力的发展而越益显示出来”。在这个意义上，这一词汇作为“思维和感受”适用于

<sup>①</sup>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42—43页。（译文中“全面地”原译“完整地”。——译注）



“社会”。但是按照另外一种意义，“全面”可以并不适用于全人类，而适用于个人。这里“全面”一词的应用则在于提出关于机会的问题，即一定的个人或集团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下实现他们才能的机会。但是，伊斯瑞尔理所当然地得出结论：这里所区别的“全面”的两种概念是相互联系着的。“作为一种理想类型、作为这个物种本质的完整的人”是“由单个的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来达到的。”当他能够按照马克思认为在将来更美好的社会中可能实现的那种“全面”的方式来“掌握他的世界”时，全面发展的个人将会接近或符合于这一理想的类型。<sup>①</sup>

“全面”这个概念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另外一个关键概念“劳动分工”有着辩证关系。作为现代社会特征的劳动分工，据说把“抽象的”个人同生产力的“全面”对立起来，生产力则是以物化的形式向抽象的个人挑战；这就意味着对个人发展的一种阻碍。这个阻碍只有通过废除私有财产，通过把社会改造成人人都能发挥他的全部潜力并且由此产生一种新的“全面”才能克服。<sup>②</sup>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重视劳动分工的一个方面，即每天从事物质生产的人同从事精神生产的人之间的分工。我们知道，后者大都表述或表达一个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形态。但是，正如《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著作的出现所证明的那样，作家和思想家能够站在那些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方式的对立面。他们所以能够这样作，因为在国内外已经有一些力量在起作用，这些力量同社会经济制度有矛盾，并且注定要把它推翻，而一定社会的统治阶级正是由于这种社会经济制度才获得他们的优势地位和霸权的。<sup>③</sup>

① 约·伊斯瑞尔：《异化——从马克思到现代社会学》（波士顿，1971）第73—74页。

② 参阅《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77页。

③ 同上书，第36—41页。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攻击了“机械唯物主义者”，因为他们片面强调人的活动是由外界环境决定的。他认为这样的唯物主义者所忽略的，是实践所起的自我改变和解放的效果。关于费尔巴哈的第三个论点曾断言：“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sup>①</sup>《德意志意识形态》发展了这一论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说，“人们是他们的概念、观念等等的生产者，——他们是受他们的生产力和与生产力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制约的、现实活动的人”，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明确宣称：“在有利的情况下，个人能以摆脱他们的地方的褊狭胸襟”；资产阶级出身的思想家在他们的一生中不一定受本阶级思想意识的限制。《德意志意识形态》所说的“共产主义的意识”有赖于无产阶级的存在，它同无产阶级的苦难和希望是相一致的。但是这种意识，“通过认真考虑〔无产阶级〕的状况，在其他阶级中也能产生。”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就给这样一些理论找到活动的余地，这些理论也象他们自己的理论一样，是违反提出这些理论的人们所属阶级的利益的。马克思相信，一切人都是环境的产物；但是他同样坚信，一切人都有能够改变他们的环境的潜力，并且在争取改变环境的斗争中，他们获得了消极的顺民所无法得到的见识。<sup>②</sup>

当我们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试图描绘思想同“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和“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的关系的这一段著名的文字的时候，我们必须记住这样一些条件和复杂情况。单是阅读这段文字不幸使人不太明白（“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但是看一看《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这一段的上下文却可以解决一点问题：

① 参阅《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7页。

② 参阅同上书。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表现为思想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各种关系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此外，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而他们也会思维；既然他们正是作为一个阶级而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而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 and 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例如，在某一国家里，某个时期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争夺统治，因而，在那里统治是分享的，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会是关于分权的学说，人们把分权当作‘永恒的规律’来谈论。”

110

我们在上面已经说明分工是先前历史的主要力量之一，现在，分工也以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的形式出现在统治阶级中间，因为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而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谋生的主要泉源），而另一些人对于这些思想和幻想则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他们准备接受这些思想和幻想，因为实际上该阶级的这些代表才是它的积极成员，所以他们很少有时间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sup>①</sup>

<sup>①</sup>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52—53页。



后来,《德意志意识形态》试验用另外的方式来描绘这种相同的关系。在论康德的哲学的一节里,马克思和恩格斯试拟了同“反映”和“一致”有关的种种说法:

“18世纪末德国的状况完全反映 (spiegelt sich vollständig ab) 在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的这个‘善良意志’完全符合 (entspricht vollständig) 于德国市民的软弱、受压迫和贫乏的情况……”<sup>①</sup>

同一节继而称康德为德国资产阶级的“辩解发言人”<sup>②</sup> (beschönigender Wortführer), 责备他对思想如何受物质生产的性质的制约和决定 (bedingt, bestimmt) 这一点所称的无知, 并且谈到了“现实利益的唯心的表达 (Ausdruck)” (现实利益是经济上的并且是由阶级所决定的)。

111 《德意志意识形态》不仅探讨了上面说明的这种完全的反映, 而且也探讨了这种反映可能产生的曲解, 这是不足为怪的。意识形态被描写成“漫射” (Reflexe) 和“现实的生活过程”的“回响”。在意识形态方面, 人和他们的生活状况“象在照像机中一样是倒现着的”。这些曲解和颠倒可以用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来解释 (aus ihrem historischen Lebensprozess)。<sup>③</sup> 但是人们注意到, 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起很重要作用的“镜映”和“反映”的形象的说法, 在马克思自己主要动手撰写的任何作品中, 并不直接应用于文学。<sup>④</sup>

① 《马恩全集》, 中文版, 第3卷, 第211—212页。

② 《马恩全集》中文版译为“粉饰者”, 见第3卷, 第213页。——译注

③ 《马恩全集》, 中文版, 第3卷, 第29页。

④ 参阅V·卡尔布希茨基, 《反映论和结构主义。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的发生史和批判》(慕尼黑, 1973年)。

也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揭示了他们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著名模式。他们谈到“直接从生产和社会交往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die Basis)以及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Superstruktur)的基础”。他们悲叹，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每件事物都变成金钱关系，而对于工人来说，“并把无产者的一切自然形成的和传统的关系，例如家庭关系和政治关系，都和它们的整个思想上层建筑(Überbau)一起摧毁了。”<sup>①</sup>

昂利·勒弗勃夫勒在他论述马克思的社会学的著作中，十分精采地概括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意识形态”的特征。他们的出发点是现实，然而却是片断的、部分理解的现实。他们通过统治集团所选择的并为统治集团所能接受的先在的表象来折射（而不是反映）现实。他们制造统治阶级的虚假形象，而且由于这样和那样的原因，证明这对获得被统治和被剥削者的赞同是有用的。他们制定抽象的、不真实的、虚构的理论来曲解实践活动，而且绝大部分没有考虑他们自己的历史条件和先决条件，没有考虑他们正在导致的后果。但是，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见，意识形态也可以成为进步的工具：例如，德国唯心主义哲学“虽然把实践转到形而上学领域中去”，却形成辩证变化的那个概念，如果没有这一概念，马克思本人的理论和它旨在促进的革命行动就会是不可想象的。<sup>②</sup>

<sup>①</sup>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41页和第432页。

<sup>②</sup> 勒弗勃夫勒：《马克思的社会学》，第69—74页。参阅莫劳斯基的定义（李·巴克森达尔和斯·莫劳斯基合编《马克思恩格斯论文选》第25页），“意识形态在这里将被认成是社会阶级的态度、利益或思想习惯的一种类型的陈述或有代表性的表现。当意识形态作为有代表性的表现而被直接表示出来的时候，艺术家可以意识到，也可以意识不到自己是持有一种观点的。这样的类型可以由有经验的、细心的或有知识的批判家来解释。”对意识形态所作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包括这个术语的历史，对于使用这个词时不严格的方式所给予的尖锐批评以及重下定义的尝试，当属约翰·普拉麦纳兹在列·沙比罗主编的《意识形态，政治学的关键概念》（伦敦，1970年版）一书中所作的解释最为清楚。



甚至在他们歪曲真理的地方，意识形态也起着“使价值组织起来”的重要作用，从而巩固了对于一定集团或阶级的功能必不可少的价值的信念。<sup>①</sup>

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已经注意到“思想本身的要素——思想的活的表现的要素——语言”，并且坚持认为这具有一种“感性的”性质。<sup>②</sup>《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论述语言的物质基础的一段插话里，展开了这一论题：

“‘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 and 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sup>③</sup>

这便说明某些经常在马克思对文学的反应中所出现的事物，即他对文学的音响和节奏的锐敏感觉（马克思象他的妻子，后来又象他的孩子们那样喜欢朗诵和大声阅读）以及他对文学作品——语言制成品满足了人类的一种特殊需要的感觉，他对它们这样做时又造成新的需要，要由另外的文艺作品来加以满足的感觉。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探讨文艺的段落里，有些地方可能被那些不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奉为经典的人持某种怀疑的态度来看待。马克思和恩格斯激烈反对麦克斯·施蒂纳过于强调个人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他们举出莫扎特的例子，莫扎特的某些作品是由别人谱曲或完成的。他们又引用拉斐尔的例子，拉斐

① 勒·阔拉阔夫斯基：《意识形态与理论》，载T·B·鲍多莫尔编《卡尔·马克思》一书（新泽西，1973年），第119—122页。

② 《马恩全集补编》，德文版，第1卷，第544页。

③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34页。

尔将重要绘画的许多细节留给他的学生来画。这使他们对“组织”在创作不只求更多而求**更好**的文学中所能起的作用抱有怀有希望的观点，他们指出当时法国的通俗戏剧，并从历史编纂学和科学中举出可疑的类比来试图支持这一观点：

“巴黎对通俗喜剧和小说的极大喜好，促使从事这些创作的劳动组织出现了，而这种组织贡献出来的作品比德国的同这种组织竞争的‘唯一者’所写的作品无论如何要好一些。在天文学方面，阿拉戈<sup>①</sup>、赫舍尔<sup>②</sup>、恩克<sup>③</sup>和贝塞尔<sup>④</sup>都认为必须组织起来共同观测，并且也只是从组织起来之后才获得了一些较好的成绩。在历史编纂学方面，‘唯一者’是绝对不可能做出什么成绩的，而在这方面，法国人也由于有了劳动组织，早就超过了其它国家。”<sup>⑤</sup>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补充说，“但是很明显，所有这些以现代分工为基础的劳动组织所获得的成果还是极其有限的”。<sup>⑥</sup>他们指出，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作为专家和专业人员的艺术家和诗人将被全能的人完全取代，这样的人既从事其他活动，又是一位艺术家：

“由于分工，艺术天才完全集中在个别人身上，因而广大群众的艺术天才受到压抑。即使在一定的社会关系里每一个人都能成

① 多米尼克·弗朗斯瓦·阿拉戈(1786—1853)，法国著名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资产阶级活动家。——译注

② 约翰·赫舍尔(1792—1871)，著名的天文学家。——译注

③ 约翰·弗兰茨·恩克(1791—1865)，著名的德国天文学家。——译注

④ 弗里德里希·威廉·贝塞尔(1784—1846)，德国著名的天文学家。——译注

⑤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459页。

⑥ 同上。



为出色的画家，但是这决不排斥每一个人也成为独创的画家的可能性……在共产主义的社会组织中，完全由分工造成的艺术家屈从于地方局限性和民族局限性的现象无论如何会消失掉，个人局限于某一艺术领域，仅仅当一个画家、雕刻家等等，因而只用他的活动的一种称呼就足以表明他的职业发展的局限性和他对分工的依赖这一现象，也会消失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单纯的画家，只有把绘画作为自己多种活动中的一项活动的人们。”<sup>①</sup>

114 人们怀疑，对于将来的绘画是业余的而不是专业的这一信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古以来到他们当时的艺术史中能够找到多少根据。<sup>②</sup>他们在展望一个时代，若以那个时代的优势来评比，一切以往的历史则将不过是史前史罢了。马克思提出艺术爱好者的生活在将来获得解放的社会中是美好生活的典范，这种生活是：“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sup>③</sup>但是，正如查理·弗兰克尔<sup>④</sup>所说，这个想法是奇特的。<sup>⑤</sup>

但是，这部作品里阐明的两个原则却会博得比较普遍的赞同。这两个原则都不是新颖的，确实都是海德曾经提出并出色地论证过的；但是对它们加以重述依然是合时宜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法国人，北美人和英国人这些大民族无论在实践中或理论中，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460页。

② 参阅莱·韦莱克：《现代批评史》（1750—1950），第3卷（伦敦，1966年），第235页。

③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37页。

④ 查理·弗兰克尔，当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与公共事务教授，全国人文科学中心主任并曾在约翰逊总统当政时任助理国务卿。——译注

⑤ 查理·弗兰克尔：《马克思思想的理论和实践》，载于《马克思和当代的科学思想》一书（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丛书，第13卷，海牙和巴黎，1969年版），第29页。（查理·弗兰克尔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教授。——译注）

……经常彼此进行比较。”<sup>①</sup> 他们号召在国际和国内的背景上，对于艺术也应运用具有历史根据的比较方法。他们强调，在这种研究当中，交往的研究，诸如物质和精神的交往，个人、社会团体和国家之间的交互作用，以及国际间的交往，都将起重要作用：

“如果〔施蒂纳〕把拉斐尔<sup>②</sup>同列奥纳多·达·芬奇<sup>③</sup>和铁相<sup>④</sup>比较一下，他就会发现，拉斐尔的艺术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同当时在佛罗伦萨影响下形成的罗马繁荣有关，而列奥纳多的作品则受到佛罗伦萨的环境的影响很深，铁相的作品则受到全然不同的威尼斯的发展情况的影响很深。和其它任何一个艺术家一样，拉斐尔也受到他以前的艺术所达到的技术成就、社会组织、当地的分工以及与当地有交往的世界各国的分工等条件的制约。”<sup>⑤</sup>

通过比较揭示出象拉斐尔这样一位艺术家的独自性；但是这也必然指出，他的天才的发展受时间和地点的制约到什么程度。马克思和恩格斯补充说，这种发展也取决于需要，取决于艺术家的社会对他提出的要求，取决于社会对他的艺术的需要，“而这种需要又取决于分工以及由分工产生的人们所受教育的条件（Bildungsverhältnisse）。”<sup>⑥</sup>

对“历史”原则的重新强调，补充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再次申述的所谓“比较的”原则——这也就是强调，正确的文学批评正如

115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518页。

② 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画家，建筑家。——译注

③ 达·芬奇（1452—1519），意大利画家，雕塑家，建筑家。——译注

④ 铁相（1487？—1576），意大利画家，威尼斯派。《马恩全集》中译为提威安诺，现从通译。——译注

⑤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459页。

⑥ 同上。



同视觉艺术的批评一样，也必须以历史认识为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惊叹，当麦克斯·施蒂纳埋怨克罗卜史托克未能持有“独特的”基督教观点的时候，他提出的关于“独自性”的概念是多么奇怪的概念啊！

“(施蒂纳告诉我们)，看来克罗卜史托克对宗教的态度还算不得‘独自的’，虽则他对宗教的态度已是非常独特的了，已经是在对待宗教的问题上使克罗卜史托克所以成为克罗卜史托克的态度了。看来一定要他不是作为克罗卜史托克，而是作为一位现代德国哲学家来对待宗教，然后才能把他对待宗教的态度算成‘独自的’哩。”<sup>①</sup>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作者们并不隐讳他们对克罗卜史托克的个人的厌恶。他们把他叫做“侥幸被遗忘的人”(selig verschollen)<sup>②</sup>。但是，他们认为，人们必须按照他本身的条件和他自己所处的环境来理解他。他们坚信，文学批评家如果缺乏历史想象力，就说不上是文学批评家了。

《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对文学所持的特有的态度肯定是黑格尔所理解的那种历史态度，就是说，对于那些重新出现的论题(例如，家庭或国家以及它们所引起的和在他们内部发生的冲突)，每个伟大的时代各有其不同的看法。但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试图追溯现代欧洲享乐主义历史的一段中，却明显地有所不同：

“在近代，享乐哲学是随同封建主义崩溃以及封建地主贵族变

<sup>①</sup>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321—322页。

<sup>②</sup> 《马恩全集》中文版译为“久被遗忘的、永享极乐的克洛普什托克”，见第3卷第321页。——译注

成君主专制时期贪图享乐和挥金如土的宫廷贵族而产生的。在宫廷贵族那里，享乐哲学还保持着那种**反映在回忆录、诗歌、小说等等中的直接的素朴的人生观**的形式(着重号系本书作者所加)。只有在革命资产阶级的某些著作家那里，它才成为真正的哲学。这些著作家一方面按他们所受的教育和生活方式来说是同各种宫廷贵族有关系的，另一方面，他们又赞同从资产阶级的较一般的存在条件中产生出来的较一般的资产阶级思想方法。因此，这种哲学得到两个阶级的承认，尽管这种承认是从完全不同的观点出发的。在贵族那里，这些话特别适用于最高等级及其生活条件，而资产阶级却把这些话普遍化了，并且把它们不加区别地应用于每一个人，于是资产阶级使享乐理论脱离了个人的生活条件，从而把它变成一种肤浅的虚伪的道德学说。当贵族在后来的发展进程中被推翻，而资产阶级同自己的对立面——无产阶级——发生冲突的时候，贵族变成了伪善的信教者；而资产阶级却道貌岸然，在自己的理论上严格要求，或者陷入上面所提到的假仁假义中，虽然贵族在实践中根本没有放弃享乐，而资产阶级甚至使享乐采取了正式的经济形式——**穷奢极侈**的形式。”①

把洛可可式②或阿那克里翁风格③的文学描绘得比围绕这种文学而发展起来的哲学还“直接”和“天真”，黑格尔对此也许不会感到惊讶。但是，在引自《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这段文字中，特别具有马克思风格的是它强调(从此在马克思著作中就不断强调)文学和哲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489—490页。另参阅S·胡克，《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卡尔·马克思思想发展研究》(安·亚伯，1962年版)，第316页。

② 欧洲十八世纪建筑、艺术等的一种风格，其特点是纤巧、浮华、烦琐。——译注

③ 阿那克里翁是古希腊诗人，后人称专写恋爱和吃喝玩乐的作品为阿那克里翁风格作品。——译注



学的阶级根源和阶级斗争，而且文学和哲学的历史是阶级斗争史的一部分。

117 《巴黎手稿》对于德国着重于“抽象概括的历史，诸如政治、艺术、文学等等”<sup>①</sup>表示遗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对此进行攻击。他们谴责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专注于书本而不专注于生活：“德国原来没有现实的、激烈的、实际的党派斗争的这种情况，在开始时甚至把社会运动也变成了**纯粹**的文学运动。‘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这种社会文学运动的最完全的表现，这种运动是在真正的党派利益范围外产生的……”<sup>②</sup>他们还任何文化都只是纯文学的这一论点不断表示怀疑。一个小说家让·保尔·理希特<sup>③</sup>的作品被引用来说明在拿破仑占领下生活的德国人心中“微小的盘剥和伟大的幻想”的混合。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嘲笑说，这是他们的嘲笑对象麦克斯·施蒂纳将会接受的证据，因为他所知道的只有纯文学的资料。<sup>④</sup>同样的攻击一再重新出现：在一个地方，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编写了施蒂纳的历史知识的“出处”目录，从圣经直到莱辛的《爱米利亚·加洛提》和维利巴尔德·阿列克西斯<sup>⑤</sup>的小说《卡巴尼斯》<sup>⑥</sup>，并且作了一首嘲笑的挽歌，悲叹他们在协助使他们的德国同胞处于困境：

“‘施蒂纳’在这里提供了一个恰当的例子，说明共产主义使德

---

① 《马恩全集》，英文版，第1卷，第542页。

②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538页。

③ 让·保尔，原名约翰·保尔·弗里德里希·理希特（1763—1825），德国小资产阶级讽刺作家。——译注

④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214页。

⑤ 维利巴尔德·阿列克西斯（原名威廉·黑林），德国作家，写了许多历史小说，其中包括《卡巴尼斯》。——译注

⑥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387页。

国理论家们处于何等可悲的境地。现在他们也不得不研究如别针工厂之类的贱物，即他们要象真正的野蛮人，象印第安—阿吉布注人和新西兰人一样来对待的这些贱物。”<sup>①</sup>

因此，为了描述施蒂纳和黑格尔以后的德国其他理论家和哲学家，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引用或者引喻他们当时的作家，诸如维利巴尔德·阿列克西斯、弗里德里希·哈尔姆<sup>②</sup>、卡尔·冯·荷尔太<sup>③</sup>、尼古拉奥斯·贝克尔<sup>④</sup>、霍夫曼·冯·法勒斯累本<sup>⑤</sup>等人的作品。这样的一些引喻显然旨在使人了解德国哲学家生活、活动和进行思考的文化环境，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种文化环境是令人窒息的和庸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接着指出，在这样的环境里，对于象施蒂纳这样的一位思想家来说，全部历史开始呈现德国外借图书馆藏书极为贫乏的那副样子，同时“〔世界舞台〕局限于莱比锡的书市”。<sup>⑥</sup> 历史的过程成了表演王公贵族的豪华戏的情节 (hochtönende Haupt- und Staatsaktionen)，或者甚至成了一个描写骑士、盗贼和怪影的歌德式故事 (eine Ritter- Räuber- und Gespenstergeschichte)<sup>⑦</sup>。这些都是早先一代人喜爱的精神食粮。在次级的文学形象中看待生活，那是对不同意现代政治、经济和科学的人们的一种报应。他们的命运(马克思认为是一种可怕的命运!)只有象他们自己那样的文人雅士才会预见到。《德意志意识形态》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247页。

② 弗里德里希·哈尔姆(1806—1871)，奥地利浪漫派作家，作品反映了自由贵族的情绪。——译注

③ 卡尔·冯·荷尔太(1798—1880)，奥地利戏剧家、小说家与剧评家。——译注

④ 尼古拉奥斯·贝克尔(1809—1845)，德国诗人。——译注

⑤ 奥古斯特·亨利希·霍夫曼·冯·法勒斯累本(1798—1874)，德国资产阶级诗人和语文学家。——译注

⑥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46页。

⑦ 同上书，第45页。



预言，德国的“真正社会主义者”“将不得不愈来愈多地只在小资产者中间寻找自己的群众，而在那些萎靡和堕落的著作家中(Literaten)寻找这些群众的代表”。<sup>①</sup>

118 然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全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显然十分喜欢显示他们能从最好的文学作品中引用文学资料。正如在《神圣家族》一书中那样，作者处处引用圣经，有时“直接”引用，而更经常的是加以模拟：“是的，看看田野里的百合花吧！看看山羊是怎样吞食它们，‘人’怎样把它们摘下来插在自己的钮扣孔上，牧女和驴夫在淫乱时怎样践踏它们！”<sup>②</sup> 莎士比亚的泰门再一次被用来说明一个伊利莎白时代的剧作家如何比一个现代的德国哲学家更能清楚地说明金钱的主要作用：

“金钱是财产的最一般的形式，它与个人的独特性很少有共同点，它甚至还直接与个人的独特性相对立，关于这一点，莎士比亚要比我们那些满口理论的小资产者知道得更清楚：

只这一点点儿，  
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  
丑的变成美的，  
错的变成对的，  
卑贱变成尊贵，  
老人变成少年，  
懦夫变成勇士。”<sup>③</sup>

《天方夜谭》、荷马、琉善、康拉德·冯·维尔茨堡<sup>④</sup>、拉伯雷、职业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538页。

② 同上书，第557页。

③ 同上书，第254页。（《雅典的泰门》引文引自《莎士比亚全集》（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176页。——译注）

④ 康拉德·冯·维尔茨堡（死于1287年），中世纪德国诗人。——译注

喜剧<sup>①</sup>，哥德、夏米索、《魔笛》的脚本作者和《密猎者》(Der Freischütz)，因为都有恰当的引文、性格描写和对过去和当时生活与思想的深入观察而被引用<sup>②</sup>。文学模拟改作和歌剧脚本模拟改作使辩论有了生气<sup>③</sup>。先是从卡德龙的《马提勃尔小桥》一书中选出一长串赞扬词加在麦克斯·施蒂纳身上，然后再轻蔑地把他摒弃。<sup>④</sup>民歌的片段照例是以赞许的心情被引用的<sup>⑤</sup>，但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也完整地引用了一首民歌《约克尔之歌》(Jockellied)，用以说明“普通意识”(das gemeine Bewußtsein)怎样能够嘲弄马克思和恩格斯归之于施蒂纳的那种黑白不分的和反辩证法的思维公式<sup>⑥</sup>。在很多地区有同这首民歌内容相似的故事，它描写一个农夫怎样没有完成主人交给的任务，于是先后出现一只狗被派出去咬他，一支棍子又被派去打狗，火又去烧棍子，水又去灭火，牛又去喝水，屠夫又去杀牛，刽子手又去吊死屠夫。这样的民歌是不是象马克思和恩格斯声称的那样，实际上是“嘲弄”它们自己的结构，或者它们的目的是不是在于以幽默的形式揭露世道的一些真实情况，这一点得由读者自己来决定了。

119

我们把《德意志意识形态》读下去，就发现引用海涅的讽刺诗的地方越来越多，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借以刻划和打倒他们的德国对手的。但是，他们并不回避地把这些诗看成是实用抒情诗(Ge-

---

① 职业喜剧(commedia dell'arte)，一译假面喜剧，为意大利民间戏剧的一种，产生于16世纪中叶，其特点是没有剧本，演出以演员的即兴表演为基础，极富有讽刺成分。它对17—18世纪的西欧戏剧发生相当的影响。哥尔多尔和莫里哀都曾受到它的影响。——译注

②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557、428、339、204、538、209、262、49、379、380、486、511、363、575、156页。

③ 例如，同上书，第530页。

④ 同上书，第529页。

⑤ 同上书，第563页。

⑥ 同上书，第139页。



brauchslyrlik), 诗句是为了使用, 它的原来的词句也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而为了适应新的上下文是可以改动或改写的<sup>①</sup>。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 马克思的阅读范围并不局限于海涅的讽刺诗。马克思在 1846 年自布鲁塞尔写给海涅的信中, 对海涅的备受攻击的小册子《路德维希·白尔尼》表示欣赏, 并且答应在一家德文报纸上为它辩护, 以反击他所认为德国评论家们对它进行的极其愚蠢和不可理解的攻击。马克思这篇评论从未写成, 但是他和恩格斯当时显然是用海涅的眼光来看待白尔尼的。他们在 1846 年 5 月 11 日的一份通告<sup>②</sup>中提到“类似拉梅耐和白尔尼这种醉心于天主教的政治幻想家”<sup>③</sup>。这使人想起了海涅在他的小册子第一卷内对白尔尼的政治地位的分析以及指控白尔尼与拉梅耐交好并且“几乎堕落到天主教里去了”。

但是,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占主要地位的作家不是海涅, 而是塞万提斯。全书贯穿着来自《堂吉珂德》一书的引喻、引文和模拟。在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段落里, 麦克斯·施蒂纳以桑丘·潘沙的形象出现, 并且有我们的老朋友施里加, 化为堂吉珂德同他在一起, 但是, 噢, 变化多大啊!

“这一次与圣物作战是由满口金玉良言的桑丘·潘沙担负的, 而堂吉珂德扮演的是恭顺而忠实的仆人的角色。诚实的桑丘象往昔 Caballero manchego (拉·曼却的骑士) 一样勇敢地搏斗, 并且也和他一样不免多次把蒙古的绵羊群看成怪影群。肥胖的马立托奈

① 参见《马恩全集》, 中文版, 第 3 卷, 第 304、384、475、542、551、554 页。

②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草拟的反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海·克利盖的通告, 在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会议上通过。通告分发给所有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译注

③ 《马恩全集》, 中文版, 第 4 卷, 第 8 页。(拉梅耐(1782—1854), 法国神甫, 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之一。——译注)

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一系列的转变和各种各样的变形之后’，变为死于绿色贫血的纯贞的柏林女裁缝，圣桑乔为她写了一首挽诗……”<sup>①</sup>

这样一些引喻起到一种独特结构的作用，把《德意志意识形态》变成一首嘲笑的史诗；在这里，塞万提斯所创造的人物预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要嘲笑的德国人物。“桑丘以费尔巴哈的这些言论为靠山开始了战斗……就象塞万提斯在第19章中所预料到的一样，”<sup>②</sup>另别还有一段很有特征地把塞万提斯和圣经结合在一起：“为‘人’的斗争是塞万提斯小说第21章中所写的话的实现，”<sup>③</sup>——与此同时，塞万提斯还提供了一个标准，让我们确信，拉·曼却的骑士比他后来的类似人物多么更加英雄，他的仆人也比他后来的类似人物多么更加明智！最后而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在这一段新的文字里，塞万提斯提供一个颠倒角色和位置变更、置换的游戏的场合，这是马克思一向爱玩的游戏。在本段开头引的一段文字里，堂吉珂德和桑丘实际上被交换了角色，这种处理同马克思历史观一些惹人注目的方面，<sup>④</sup>同他的文体中那种极为突出的交叉转换法不无关系。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全书中，类似这样地利用圣经，也服务于同样的目的，而且从论战者的观点来说，还有另外有利之处，即这可以引起虔诚的读者大吃一惊而使之注意，并且对于这种亵渎神明的言词的惊吓尚未消散之时即作出反应。这个目的也促使马克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209页。

② 同上书，第260页。

③ 同上书，第264页。

④ 例如，马克思有这样一个黑格尔观念，即“悲剧”经过一定的时间会变成“喜剧”，又如他认为德国人所设想的世界图景是颠倒的，而他的责任就是把这一图景再颠倒过来。



思和恩格斯采用虔诚的德国作家和演说家引用圣经时所惯用的方式并以古风的词汇与句法，来引用堂吉珂德的章节和诗句。

一个小小的例子可以用来说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作者在他们的论证中插入的引语，不是单纯作为毫无联系的片段。在很多地方，他们期望有识的读者会自动补充引语的上下文，甚至起到比原文所起的作用更加广阔的作用。在概括麦克斯·施蒂纳对固定观念(idées fixes)，那种无论怎样挣扎也甩不掉的观念，在他思想中起的作用所作的解释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冷淡地插了一句：

“他背后有一条辫子。”<sup>①</sup>

- 121 当时大多数德国读者都会看出来，这句话是阿达尔别尔特·冯·夏米索写的一首诗的叠句，萨克雷以《一个悲惨的故事》为题曾将这首诗改写成英文：

从前有一位圣人，  
留着一条漂亮的辫子；  
但是，他感到十分惊奇，感到更加悲伤，  
因为它垂在他的背后。

他冥思苦想这件怪事，  
发誓要改变这条辫子的位置，  
使它垂在他的脸上，  
不要拖在他的背后。

---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363页。

他说，“我发现了诀窍，——  
我要转身”，——于是他转了身；  
但是它仍然垂在他的背后。

于是，转哪，转哪，往外又往里，  
这位晕头转向的圣人真的转了一天；  
白费劲，一点也不管事，  
辫子仍然垂在他的背后。

他右转，左转，转圆圈，  
他向上向下，里外转，  
但是这条粗辫子  
仍然坚定地垂在他的背后。

虽然他永不松劲，  
虽然他扭动，旋转，  
唉！辫子仍然忠实他的背脊，  
牢牢垂在他的背后。

但是阅读萨克雷所改写的这首诗的英国读者，大概不会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显然希望表示的另外的一种涵义。德语辫子(Zopf)这个词使人联想到陈旧过时的形式主义、小题大作、迂腐、因循守旧以及旧普鲁士军队的作风等，如果这个词译成英语的“pigtail”（“辫子”），这些联想必然会减少或者被砍掉。这个词还含有海涅运用过的联想，例如，他在《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里就说，他那时候的普鲁士士兵所留的长的髭须不过只是往昔的辫子装饰(Zopftum)的另一种形式；

122



“辫子，它过去垂在脑后，  
如今垂在鼻子下端。”<sup>①</sup>

在这样做的同时，《德意志意识形态》继续仔细考察德国作家使用语言的方式，这种考察在《神圣家族》中已经开始了。作者对比喻、语法结构、甚至散文韵律都进行考察，以力图说明对手的无能、不合逻辑或缺乏想象力。马克思和恩格斯问道：如果布鲁诺·鲍威尔从不考虑他的用词涵义，那他能象他所做的那样谈论一个“颤抖的、飘荡的、波浪式的身材”（“ein wogender, wallender, wellenförmiger Körperbau”）吗<sup>②</sup>？他们断言，麦克斯·施蒂纳使用无人称句法，通过他所采用的模糊的本质，虚幻的存在的方式，来泄露隐藏的假设，因此《德意志意识形态》对他怎样使用代词“这”（es）进行了分析<sup>③</sup>。另外又叫我们知道，鲁道夫·马特伊<sup>④</sup>通过他的散文那种催眠的、懒洋洋的、拟古的单调的节奏使人们不去注意他的论证的索然无味，因此《德意志意识形态》用常用的钩和横线标出他的扬抑抑格和扬抑格音步：

Die unendliche Mannigfaltigkeit aller Einzel-  
— U U — U U — U U — U U — U U — U  
Wesen als Einheit zusammengefasst ist der Weltorganismus.

（“宇宙的躯体就是所有的个体总合起来的无限的多样性。”）<sup>⑤</sup>

---

① 此处中译文引自冯至译《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8页。——译注

②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100页。

③ 同上书，第122页。

④ 鲁道夫·马特伊，德国政论家，“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译注

⑤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563页。——译注

马克思和恩格斯到处都发现德国思想家让语言词汇和事物两者疏远开来：

“对哲学家们说来，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是最困难的任务之一。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正象哲学家们把思维变成一种独立的力量那样，他们也一定要把语言变成某种独立的特殊的王国。这就是哲学语言的秘密，在哲学语言里，思想通过词的形式具有自己本身的内容。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的问题，变成了从语言降到生活中的问题……哲学家们只要把自己的语言还原为它从中抽象出来的普通语言，就可以认清他们的语言是被歪曲了的现实世界的语言，就可以懂得，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sup>①</sup>

123

因此，无怪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语言中看到健康思想的直接标志，他们早期合作对文字作出许多详细的分析和批判。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实践”与“意识形态”的概念首次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此后也一直保持着不变。里·贾·伯恩斯坦说得对：

实践是马克思的观点的中心概念，是了解他的早期哲学思想和他对资本主义结构的详细分析的关键。它为领会马克思关于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概念和他对生产的强调提供了正确的观察力；它也是了解马克思所说的“革命实践”的涵义的根据<sup>②</sup>。

这一点显然也影响马克思对文学的看法。从巴黎手稿起，他把一

<sup>①</sup> 《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525页。

<sup>②</sup> 里·贾·伯恩斯坦：《实践和行动》（伦敦，1971年），第13页。



切艺术都看成是“改造和创造他的世界和他自己”<sup>①</sup>的那种宇宙的创造活动的一部分。虽然《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有很多东西为非马克思主义者所不易接受，但是它的中心概念，即关于“意识形态”本身的概念，还是很有用的。卡尔·曼海姆出色地表明其涵义是指“思想上的见解、陈述、主张和体系不是从表面价值来理解，而是根据表述它们的人的生活状况来阐释”。<sup>②</sup>这就使人们更愿意观察见解、观念与阐释背后所隐藏的东西，以便发现可能同他们有关的生活状况。这就使批判家和理论家象路易·阿尔杜塞<sup>③</sup>和他的门生那样，试图发现一个作者生于其中的那种“意识形态领域”，作者在这个领域中形成了他的思想感受，而且为了迎对这个领域必须表明自己不断发展的世界观。这也使他们提出关于一定的思维和感受的体系内在统一的问题，这些体系不存在某些问题但又出现另一些问题而显示出来的特殊的疑难杂症。这导致人们探索特定的作品或特定的体系同更广阔的“意识形态领域”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探索这两者同一定的国家和时代所特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组织之间的关系。<sup>④</sup>为了发现这类有关的重要问题，我们并不需要分享马克思或阿尔杜塞的政治信念，但是我们有理由感谢马克思主义批判家，因为他们始终把这些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可惜的是他们在我们和他们的答复之间，常常设置一些左派言论不可逾越的障碍。

① 加·彼得罗维奇：《二十世纪中叶马克思的形象》（纽约，1967年），第78—79页。

② 卡·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认识论的社会学导论》（伦敦，1960年），第50页。

③ 路易·阿尔杜塞（1918—），法国哲学教授，著有《孟德斯鸠，政治与历史》、《为了马克思》、《读资本论》和《列宁和哲学》等书。——译注

④ 路易·阿尔杜塞：《为了马克思》，英译者布·布劳斯特（哈蒙斯窝斯，1969年），第62页起。

### 从《粗俗的人》到《杨·瑞日卡》

“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

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乔治·桑)<sup>①</sup>

#### ( 1 )

巴黎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谈到的对于文学的见解意味深长地得到另一篇文章的补充。这篇文章是由马克思署名的，发表在莫泽斯·赫斯主编的《社会镜报》上。这篇文章采用了书评的形式，详细考察了一个叫让·伯歇的人的回忆录，因此标题是《伯歇论自杀》(Peuchet: Vom Selbstmord)。

“从著名的作家的作品当中，从那些准备以某种程度的仪式来迎接自己死亡的绝望的人所写的诗当中，可以编出一部奇特的语录。在作出自杀决定之后出现的那阵奇异的冷酷时刻，一种富于感染力的热情在他们的灵魂中熊熊燃起，并且发泄在纸上，甚至在那些被剥夺了受教育机会的阶级的人们当中，也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在他们深刻领会即将牺牲的全部意义之前，他们整理好思路，集中全部力量，道出最后几句颇有热情和特色的话。

有一些这类被埋在公文档案里的诗确是杰作。一个集中全部精力于自己的买卖上并把他的商业当做他的上帝的、笨拙的资产

<sup>①</sup> 转引自《马恩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98页。



者,会觉得这种观点十分浪漫,并且会报以讥笑,试图驳斥这种他所不能理解的痛苦。他的轻视并不使我们感到奇怪。百分之三的人甚至一点也不知道他们正在一天一天地、一小时一小时地、零割碎刚地在慢性自杀,并且在谋杀他们自己的人性,我们对这部分人能有什么别的期望呢?但是,那些装作虔诚而且受过教育,却还重复笨拙的资产者口中那些无聊话语的好人,我们又如何来谈论他们呢?”<sup>①</sup>

126 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具有特色地重述维科<sup>②</sup>、哈曼<sup>③</sup>和海德三人的意见,即诗是人类的母语;甚至在现代世界,甚至在那些被剥夺了教育所能带给的智力发展的人们当中,在激情的压力下,在具有存在意义的处境中,诗的源泉又会涌流出来。一种致力于贪婪攫取的那种生活必然导致这种创造力的衰退,从而构成一种自杀,因为它谋杀了使人具有真正人性的东西。因此,那些支持马克思所哀叹的当时欧洲的社会制度的知识分子,便被谴责为在帮助谋杀灵魂,在帮助人类的文化自杀。

一年以后,也就是1847年10月,马克思为另外一家报纸《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他在这些文章中,再一次施展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试过的辩论技巧,其中包括大量的文学预见、对比、引喻和引语。这些重炮的目标是指向一个无名的激进记者卡尔·海因岑。海因岑曾经敢于在发表马克思反击文章的那个德国政治流亡者创办的报纸上攻击恩格斯。但是,那

---

① 《社会镜报。代表人民阶级并阐明当前社会状况的机关报》,第2卷,第7期,1846年。(《马恩全集》,德文版,第1卷,第3分册,第403页)

② 卓万尼·巴蒂斯特·维科(1668—1744),意大利资产阶级哲学家与社会学家,他企图确立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著有《新科学》(1725—1730)等著作。他的理论影响了浪漫主义学派的文学批评家。——译注

③ 约翰·格奥尔格·哈曼(1730—1788),德国哲学家与美学家,著有《罗逊克罗兹爵士的遗愿,论语言的神性与人性的根源》(1772),他认为语言基本上是无理性的,从而反对启蒙思想的理性主义。他受宗教中的虔信派的影响,是海德的老师。——译注



篇攻击海因岑的文章却值得重新提一下，因为文章一开头就显示出马克思试用的一种文学形式或次文学类型的极其详尽的特点，而这种形式就是粗俗文学 (grobianische Literatur) 或粗鲁文学 (booby-literature)。<sup>①</sup> 它是由中世纪讲餐桌仪礼的研究文章开始，经布兰特的《愚人船》(1494年)某些章节的新的促进，而在《粗俗的人》这首诗中达到了高峰。《粗俗的人》是弗里德里希·德德金<sup>②</sup>用拉丁语写的一首诗(1549年)，这首诗很快被译成了德文和欧洲其他文字。

“在宗教改革以前不久和宗教改革期间，德国人创立了一种独特的、单是一个名称就够骇人的文学：粗俗文学。目前我们正处在类似16世纪的革命时代的前夜。粗俗文学重新出现在德国人面前是并不奇怪的。对历史发展发生的兴趣不难克服这类作品所引起的美学上的反感；这类作品早在15、16世纪就在那些甚至鉴赏力不高的人们中间引起过这种反感了。

16世纪的粗俗文学是：平淡无味，废话连篇，大言不惭，象斯拉索<sup>③</sup>一样夸夸其谈，攻击别人狂妄粗暴，对别人的粗暴则歇斯底里地易动感情；费力地举起大刀，吓人地一挥，后来却刀背朝下地砍去；不断宣扬仁义道德，又不断将它们破坏；把激昂之情同庸俗之气滑稽地结合在一起；自称关心问题的本质，但又经常忽视问题的本质；以同样自高自大的态度把市侩式的书本上的一知半解同人民的智慧对立，把所谓‘人的理智’同科学对立；轻率自满，大发空言，无边

① “Boor-literature” (粗鲁文学) 可能是更确切的英文翻译，但是“粗俗的人”(Grobianus)的同义词“笨人”(booby)这个词自从罗吉尔·布尔1739年的译文(《粗俗的人或大笨蛋。讽刺诗》三卷，罗吉尔·布尔先生英译)以后，在英国已经为人所公认了。

② 弗里德里希·德德金(1525—1595)，德国讽刺作家。——译注

③ 斯拉索(Thraso)是古罗马戏剧家泰伦斯的喜剧《阉人》中的夸夸其谈的士兵。——译注



无际；给市侩的内容套上平民的外衣；反对文学的语言，给语言赋予纯粹肉体的性质（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喜欢在字里行间显示著者本人的形象：他摩拳擦掌，使人知道他的力气，他炫耀宽肩，向谁都摆出勇士的架子；宣扬健康的精神是寓于健康的肉体，其实已经受到 16 世纪极无谓的争吵和肉体的感染而不自知；为狭隘而僵化的概念所束缚，并在同样的程度上诉诸极微末的实践以对抗一切理论；既不满于反动，又反对进步；无力使敌手出丑，就滑稽地对他破口大骂；索洛蒙和马尔科夫，<sup>①</sup> 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幻想家和庸人，两者集于一身；卤莽式的忿怒，忿怒式的卤莽；庸夫俗子以自己的道德高尚而自鸣得意，这种深信无疑的意识象大气一样漂浮在这一切之上。如果我们没有记错，德国人民的智慧已用‘海涅卡——力大无穷的仆人’这首歌为它立下了一座抒情纪念碑。海因岑先生是复活这种粗俗文学的功臣之一，在这方面可以说，他是象征着各国人民的春天即将来临的一只德国燕子。

海因岑……的宣言，为我们研究这种畸形文学（上面我们已经指出这种文学代表德国的历史兴趣的一面）提供了便利的机会。我们根据海因岑宣言来描述以这篇宣言为代表的文学变种，正如文学史家根据 16 世纪流传下来的作品描述 16 世纪的作家如托马斯·穆尔纳一样。”<sup>②</sup>

128 不难看出，马克思重新提起一种已经消失的文体，不仅仅是因为好古。他提出这样的观点：社会集团的相似将导致文学现象的相似。

<sup>①</sup> 索洛蒙和马尔科夫（或莫罗尔夫）是 14、15 世纪德国滑稽剧（短篇讽刺故事）中的人物，通过索洛蒙的形象描写一个贤明而不切实际的君主，通过马尔科夫的形象描写一个机智的农民。——译注

<sup>②</sup>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322—323 页。（全集中“斯拉索”译为“伏拉松”，“托马斯·穆尔纳”译为“笨蛋传教士”。托马斯·穆尔纳（1475—1537），德国讽刺作家和神学家，他反对宗教改革，被路德教的拥护者称为“笨蛋传教士”。——译注）

所以，既然德意志似乎进入一个革命时代，在某些方面又与宗教改革以前和接踵而至的情况颇有相似之处，因此研究15和16世纪文学就同当前很可能有关联了。确实，这一点很快便弄清楚了，我们将会看到，把“粗俗文学”描绘成一种倒转过来的、可去旧书新的羊皮纸写本，我们将会通过很少德国人会试图挽救的那种时间注定其湮没无闻的作品的特点，来识别卡尔·海因岑之流所代表的一种现代现象的特点。研究古老的文学能够帮助我们了解现代世界，反对它的弊端，从而最终改变它。

“粗俗文学”(grobianische Literatur)是一种吸引人的作品，19世纪的德国人，同16世纪的德国人一样，容易受到它的吸引，同样都把粗鲁的愚蠢误认为力量和见识。马克思引用民歌《海涅卡——力大无穷的仆人》<sup>①</sup>，似乎是指出，这首歌对于中产阶级较之对于平民更容易富有引诱力。但是，还有另一种与第一种截然相反的、吸引人的作品，它在社会动乱时代对人们具有更大的引诱力；马克思选出加以说明的这种引人的作品，不是从宗教改革时期的文学中，而是从18世纪的作品中选出来的。重点仍然放在德国文学上：

“又如在轰轰烈烈的革命时代，在强烈的、激情的否定和背弃的时代，例如18世纪，出现了正直而善良的大丈夫，出现了以停滞状态的田园生活来同历史的颓废相对抗的素有教养、作风正派的盖斯纳<sup>②</sup>之类的色鬼。但是为了嘉奖这些田园诗人（他们也是一

---

① 这首题为《海涅卡——力大无穷的仆人》(Hennecke Knecht)的民歌收集在阿尔宁和布伦塔诺(改写)的民歌集《少年的奇异号角》(1805—1808年)一书中。看来马克思为了使这个名字同他所攻击的记者卡尔·海因岑的名字接近，把海涅卡(Hennecke)改为海因涅卡(Heinecke)了。

② 萨洛蒙·盖斯纳(1730—1788)，瑞士诗人和艺术家，脱离实际生活的田园诗的代表人物。——译注



些批评化的道德家和道德化的批评家),应当说,他们在评定牧人和山羊两者在道德方面谁数第一时所表现的那种犹豫不决的态度是诚恳的。”<sup>①</sup>

129 德国文学中的田园诗部分继续成为马克思诅咒的对象。例如,他对歌德的抒情史诗《海尔曼和窦绿苔》(Hermann und Dorothea)的主人公就表示出由衷的厌恶。<sup>②</sup>

马克思在论述“粗俗文学”和盖斯纳的田园诗时,试图诊断的是各种幻想,“虚假的意识”;他认为,德国的中产阶级在动荡时代特别容易接受这种意识。他们如果是激进分子,不是喜欢把自己说成是能够杀死巨人的英勇人物吗?而他们如果不是激进分子,不是喜欢把自己说成是田园诗中的牧人吗?卡尔·海因岑——这些想法的最合适的代表人物——不是曾经当真把自己比作一个期望被共产主义者阿喀琉斯打倒在地的勇士,却发现自己是在受忒耳西忒斯的攻击吗?马克思评论说,“赫克托耳只是预感到他要被阿喀琉斯一手打倒。”<sup>③</sup>他接着引用了莎士比亚的《爱的徒劳》一剧中的一幕,在这一幕中,怪诞的吹牛家唐·阿德里安诺·德·亚马多<sup>④</sup>,因为不适当地扮演了赫克托耳的角色而受到嘲笑。但是提到忒耳西忒斯时又怎样呢?马克思接着讽刺地问道,可能是海因岑的古代英雄的概念不是来自荷马,而是来自施莱格尔所译的莎士比亚的《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吧?(不可不注意,这个暗示的意思是,海因岑当然不能读莎士比亚的英文原著。)若是那样的话,海

---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329页。

② “歌德笔下的蠢家伙”,致恩格斯的信,1859年1月6日。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367页。

③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324页。

④ 《爱的徒劳》剧中的一个怪诞的西班牙人。——译注

因岑所扮演的角色便不是赫克托耳，而是埃阿斯(Ajax)了。马克思接着显然是很有兴趣地引用了《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的各幕的台词，而扮起海因岑指派给他的角色忒耳西忒斯；在这个戏里，愚蠢、笨拙的埃阿斯上了忒耳西忒斯的圈套，最后，忒耳西忒斯说出：“我宁愿做一只羊身上的虱子，也不愿做这么一个没有头脑的勇士。”<sup>①</sup>而达到高潮，马克思正是把这句话当作自己的话。接着，他模拟英雄史诗的文体讽刺地把海因岑勇猛的事迹记录下来，最后大段摘引《列那狐》的词句作为结尾，《列那狐》这部欧洲古典作品已由歌德用六步格诗体改编成一部在政治和社会方面都有教育意义的高地德语的讽刺史诗了，<sup>②</sup>马克思引用的就是歌德的这首长诗。

在海因岑想到要把马克思比作忒耳西忒斯这个角色以前，马克思实际上已经采用忒耳西忒斯的看法了，想到这一点会使人感到奇怪。1842年4月27日，马克思从波恩写给阿尔诺德·卢格的一封信中，就引用了莎士比亚的《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的几句话：“忒耳西忒斯说，‘到处只是战争和放荡行为’；即使不能责怪本地大学是在进行战争，那么至少它的放荡行为是够多的”<sup>③</sup>。但是，当时“忒耳西忒斯主义”的观点，一种平庸的、受嫉妒心支配的生活观点，在青年黑格尔派中是流行的。黑格尔本人在历史哲学讲演录中，不是曾以他自己的独特的方式分析过这种现象吗？这些演讲马克思是很熟悉的：

130

“荷马史诗中的那个指摘国王的忒耳西忒斯，是各个时代反复

---

① 《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325页。（见《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第三幕，第三场最后一句话。——译注）

② 同上书，第327页。

③ 同上书，第27卷，第427页。



出现的人物。他确实不象在荷马史诗里那样总是挨粗棍子打，但是他的嫉妒心，他的倔强的任性，一直是他肉里的一根刺，是咬他的一条不死的虫子。他总是为了发觉他的意图，哪怕是好的意图，和他吹毛求疵地找岔子，会在世界上完全没有成功的希望而感到苦恼。对忒耳西忒斯主义的命运采取幸灾乐祸的态度是可能的。”<sup>①</sup>

对马克思来说，从荷马的忒耳西忒斯观察到莎士比亚的忒耳西忒斯，并且认识到采用忒耳西忒斯的观点同采用靡非斯托斐勒司的观点一样，同样可以有助于真实的观察，这一点是很自然的。在这里，如同他经常所作的那样，他可以把黑格尔颠倒过来，他可以相信，如果忒耳西忒斯说得十分清楚，而且反来复去地说，他所指摘的“国王”的原形就可以暴露无遗。这样就有机会可以进一步让世界摆脱那些统治它的人和他們所支持的制度。结果，“忒耳西忒斯主义”就可以不象黑格尔所相信的那样注定必然失败。

马克思在《爱的徒劳》壮观的场景中，在《列那狐》中所发现的，尤其在忒耳西忒斯这个人物身上所发现的，是戳破自我欺骗、幻想、虚假的意识的肥皂泡时所感到的喜悦；当然，他在海涅的作品中也发现了这种喜悦。海涅在《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中攻击虔诚的画家柯纳里乌斯时用的一句拉丁成语，马克思现在使用它来攻击海因岑：“任意涂抹不是画图(Cacatum non est pictum)”。<sup>②</sup>

---

<sup>①</sup> 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录》（T·李特编）（斯图加特，1961年版），第78页。（参阅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71页。——译注）

<sup>②</sup>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349页。参阅海涅的《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11章。（见冯至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64页。——译注）

以《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论德意志文化的历史》为  
131  
题的攻击海因岑的文章，分期发表在1847年10月至11月的《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这以前，在1847年6月，另有一篇攻击一个更大的和更重要的人物的文章。这个人物对私有财产所作的谴责，对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曾起过重要作用。这个人物就是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马克思现在认为他的历史哲学过于唯心主义和过于受黑格尔的影响了。“这是黑格尔式的废物，这不是历史，不是世俗的历史——人类的历史，而是神圣的历史——观念的历史。在他看来，人不过是观念或永恒理性为了自身的发展而使用的工具。”<sup>①</sup>所以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Système des contradictions économiques ou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引出了马克思的一本反击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的标题再一次展示了马克思觉得非常适合他的思想方式的相互颠倒：《哲学的贫困》(《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 Réponse à la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de M. Proudhon)。

有些人认为经济规律是“永恒的”，而不是仅仅适用于历史发展的一定时期的。马克思在抨击蒲鲁东的同时，也试图揭露这些人的虚伪的抽象化和一般化；同时他还希望对所有使“一个词变出个东西来”并且把生活看成仿佛是文学的那些人进行严厉的谴责。他告诉我们，蒲鲁东

“把商品‘劳动’这个可怕的事实只看做是文法上的简略。这就是

<sup>①</sup> 致安年柯夫的信（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27卷，第479页。



说，……整个现代社会，今后仅仅是建立在**某种破格的诗文和比喻性的用语**上了。如果社会愿意‘排除’使它烦恼的‘一切麻烦’，那末只要去掉不好听的字句，改一改说法就可以了；要达到这个目的，只要请求法国科学院出版一部新词典就够了。这样一来就不难了解，为什么蒲鲁东先生认为必须在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中大事议论语源学和文法学的其他部分。”（重点系本书作者所加）<sup>①</sup>

在蒲鲁东书中“破格的诗文”当中，他使用了马克思自己所喜爱的神话英雄——普罗米修斯。

132 “再接下去，就是有关远古时代的事情了。这是富有诗意的故事，目的是要使因上述数字证明的严密性而疲惫不堪的读者得到休息。蒲鲁东先生把普罗米修斯的名字给予作为人的社会，并且用以下的话来歌颂他的功绩……蒲鲁东先生的这个普罗米修斯真是怪物！他无论在逻辑上或政治经济学上都是软弱无力的……这种说明现象的方法，部分是希腊的，部分是犹太的，既神秘又有寓意……但是蒲鲁东先生使之复活的这个普罗米修斯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这就是社会，是建立在阶级对抗上的社会关系。这不是个人和个人的关系，而是工人和资本家、农民和地主的的关系。抹杀这些社会关系，那就是消灭整个社会，而你的普罗米修斯也就变成一个没有手脚的怪影，就是说既没有工厂也没有分工，总之，没有最初你……给他的一切东西。”<sup>②</sup>

蒲鲁东用他在文学中初次遇到的一位神话英雄来使社会人格化，

<sup>①</sup>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00页。（译文略有改动，全集中“商品‘劳动’”译为“劳动商品”，“法国科学院”译为“科学院”。——译注）

<sup>②</sup> 同上书，第133—135页。

并非打算揭示真理，而毋宁说是想使真理含混不清。如果你看到整个人类社会装扮成一个人的样子，那你就是用—个幽灵来代替—个又区分又复合的现实；你就是用词汇来代替事物。神话代替了理论；—切真理都消失在一个神秘主义和讽喻的邪恶的混合体里。在错误的手笔下，古典神话产生并且加强有害的幻觉。

马克思接着断言，蒲鲁东所不理解的是：社会关系是同生产方式紧密联系着的：

“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

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

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思想的产生都是不断变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mors immortalis)才是停滞不动的。”<sup>①</sup>

人们对于马克思关于手工磨的论述能接受到什么程度，我留给研究封建制度的人去决定(我想，他的论述的意思是象征性的，而不是实际意义上的)。在上面引的这段文字中，重要的是文学在一个体制中的地位(这个体制认为观念和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样，不是永恒的”，而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文学作品是“历史的产物”，这一点可以毫不困难地被接受，但是它们“暂时”到什么

133

<sup>①</sup>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44页。



程度呢？上边引用的段落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它确实间接地、清楚地说明：对于伟大作品和它们所表现的观点是超越暂时的、具有永恒价值的说法，马克思有些什么见解。马克思别具一格地在文章的高潮处提醒我们注意一篇世界上最伟大的诗篇，马克思在那篇诗篇中经常体验到它自写成以后多年来一直使人高兴、受益并为之振奋的力量。“不死的死”（*mors immortalis*）这句成语使人想到卢克莱修的《物性论》中令人难忘的一行诗，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已经引用过这行诗：

“不死的死夺去了有死的生。”<sup>①</sup>

马克思的相对论本身被他引证的作法相对地阐明了。

引用卢克莱修的这句诗决不是《哲学的贫困》中恰当的文学联想的唯一例子。马克思还引用尤维纳利斯的讽刺诗第八卷里的一行，即“为了生活而失去生活的根基”（*Et propter vitam vivendi perdere causas*）<sup>②</sup>，来表示他对蒲鲁东的论证的荒谬性的见解。尤维纳利斯这一行诗注定成为马克思喜爱的引语之一。他在这行诗中看到的有关现代社会经济规律效果的说明，同他在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作品中看到的同样明确<sup>③</sup>。笛福的鲁宾逊在《哲学

134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605页。

② 同上书，第101页。

③ 马克思并不是对尤维纳利斯这行诗感到适当的唯一的19世纪作家。威廉·莫里斯1884年在莱斯特的世俗会所作的、第二年又在《联邦》上发表的关于“艺术和社会主义”的讲演中，就有一段提到这段话而达到高潮的意味深长的论述：“也不能为现代文明制度进行辩护，说单是这个制度的物质利益或肉体的利益就可以同这一制度使世界失去快乐这一事实相抵；正如我以前说过的，这些利益分配得很不公平，以致令人可怖地加深了贫富之间的差别，以致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尤其是在英国，这种可怕的情景展现在住在隔街或隔壁的两种人面前，他们属于同一民族，讲着同一种语言，至少在名义上是生活在同样的法律之下，但是一种人有文化，而另一种人却没有文化。我说的这一切都是践踏艺术而把商业提高到神圣的宗教地位的社会制度所造成的结果；这个制度似乎准备十分愚蠢地——愚蠢是它的主要特征——嘲弄罗马讽刺作家，因为他以相反的意思提出了他的崇高警告，现在它又要求我们大家都为了生活而摧毁生活的目的。（A·L·莫尔顿编《威廉·莫里斯的政治著作》，伦敦，1973年，第111页。）

的贫困》里第一次短暂地露了一面，以便适当地说明社会要素被降低到最小限度的一种环境。鲁宾逊剩下一个人，不受社会事物的干扰，他这个例子说明一个假设的情况：在那里，每一个人都是隐士，只为他自己生产<sup>①</sup>。后来，托洛茨基采用这同一个典型，并且把蒲鲁东（无党或无阶级的革命者）叫做“社会主义的鲁宾逊”<sup>②</sup>。

《哲学的贫困》的序言里，也清晰地回响着海涅在他那部关于德国宗教、哲学和文学的著作（《关于德国》〔De l'Allemagne〕）中对维克多·库辛<sup>③</sup>的假装恭敬的评论的声音。在马克思此书的第二章的开头，也明显地有海涅风格的痕迹。但是在这部书里，引证伏尔泰的地方比引证海涅的地方要多。马克思引用并称赞伏尔泰在《巴黎议会史》一书中谈到约翰·罗<sup>④</sup>的制度时对货币价值的分析。<sup>⑤</sup>伏尔泰的小说《有四十个埃巨的人》，证明伏尔泰已“预感”到会出现蒲鲁东和他的学说（“L'homme aux quarante écus” a senti un Proudhon à venir）：“造物主先生，您怎么说都行。每个人都是自己世界的主人，可是您绝不能使我相信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用玻璃做成的。”<sup>⑥</sup>马克思引用伏尔泰的小说中的这几句话，作为对蒲鲁东的一种预言式的讽刺，也暗示我们对他关于经济世界的描述应该采取怀疑而合乎常理的态度，因为在马克思的时代，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倾向于把这种描述看成是无可置疑的真理。马克思解释说：

---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16页。

② 参阅E·H·卡尔，《革命研究》（伦敦，1950年），第44页。

③ 维克多·库辛（1792—1867），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折衷主义者。——译注

④ 约翰·罗（1671—1729），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金融家，曾任法国财政大臣（1719—1720），以发行纸币的投机活动最后彻底破产而闻名。——译注

⑤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22页。

⑥ 同上书，第181页。



“蒲鲁东先生的著作不单是一本政治经济学的论著，也不是一本平常的书籍，而是一部圣经；其中应有尽有，如‘神秘’、‘来自神的怀抱的秘密’、‘启示’等。但是，因为今天预言家受到的裁判要比普通的作者更严格，所以读者必须甘愿和我们一起经过‘创世纪’的贫瘠而阴暗的杂学的领域，然后才和蒲鲁东先生一起升入**超社会主义**的缥缈而富饶的境地。”<sup>①</sup>

上边引用的一段讽刺文字出现在马克思的小册子的开头，这段话同结尾处引自乔治·桑的小说《扬·瑞日卡》中的一句话相呼应。乔治·桑这部小说先是在巴黎《独立评论》上连载，给该报的篇幅增添了光彩，后来于1843年又在布鲁塞尔出版。

“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在这以前，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

‘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sup>②</sup>

马克思会从当时的一部小说里寻求他当时的“社会科学的结论”，这确实应该说是了不起的。

《哲学的贫困》也包括马克思的一个最直接的考察，他所考察的是：迄今为止我们的爱好、我们的“个人”嗜好受我们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引导和限制的方式：

“消费者并不比生产者自由。他的意见是以他的资金和他的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76页。

② 同上书，第198页。

需要为基础的。这两者都由他的社会地位来决定。而社会地位却又取决于整个社会组织。当然，工人买马铃薯和受人供养的情妇买花边这两者都是根据本人的意见行事的。但是他们意见的差别就是由于他们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不同，而这种社会地位的差别却又是社会组织的产物。”<sup>①</sup>

马克思在这里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指出了加在人的“自我创造”之上的限制，这种方式预示着后来他在《大纲》（Grundrisse）中对个人利益受社会决定这一问题所作的著名分析。马克思后来在那一作品中解释说，“这是个人的利益；但是它的内容，它的形式以及实现它的手段是社会条件所提供的。”<sup>②</sup> 这一点同文学的爱好问题有关以及同这种爱好所能受到的控制有关，是不言而喻的。

136

### (3)

马克思抽出读书和写作的时间在布鲁塞尔建立了一个德国工人协会并且把它维持下去，就是因为他关心到要使工人的利益不应该仅限于购买马铃薯。这个布鲁塞尔德国工人协会不久就有了上百名会员，每星期三、星期日晚上开会。马克思坚持参加这种集会并且定出一个惯例，即每星期三晚上全都用来进行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讨论，每星期日晚上则应该有文娱活动。从《布鲁塞尔—德意志报》上登载的关于1847—1848年新年节日的一篇报道中我们了解到，在工人协会里举行的一次戏剧演出的过程中，“马克思博

---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86页。（译文略有改动，“受人供养的情妇”，全集中译为“妇女”。——译注）

②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德文版（柏林，1953年），第74页。



士夫人显示了她的朗诵天才。”<sup>①</sup>在《哲学的贫困》中可以找到搞这种文娱活动的理由；但是实际上马克思早在1844年所著的《巴黎手稿》中就已经比较充分地写下这个理由了：

“当共产主义的手艺人相互联系的时候，理论、宣传等是他们的首要的目的。但是同时，由于这种联系的结果，他们获得一种新的需要——联合的需要——并且本来是手段的东西变成了目的。在这一实践过程中，可以观察到法国的社会主义工人们无论何时集会都取得卓越的成果。不再需要诸如吸烟、喝酒、吃饭等作为接触或聚会的手段了。结交、联系和谈话（目的仍然在于联合）对他们说来已经足够了；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对于他们来说不光是一句话，而是他们生活其中的一个事实，并且从他们勤劳的身体上向我们闪烁着人的崇高品质。”<sup>②</sup>

因此，使“勤劳的”手艺人参加旨在帮助他们了解——从而也就是改变——现存社会关系的政治辩论，只是马克思协助创办工人协会时所提出的目的之一。显而易见，另一个目的则是激发工人协会会员感到有必要学习文化，而这种学习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在正常情况下不允许他们取得或满足的。

当马克思欣然分出时间来进行这样一些对社会有益的活动时，他继续埋头在“书海”之中，用卢格的难忘的话来说，这正是他的本分。他深知，他对世界历史能作出伟大贡献，首先需要进行大量批判性的阅读和研究，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因此，这时人们发现他越来越频繁地转向英国作家的作品就不足为奇了。他在

<sup>①</sup> 参阅H·甘姆劳等：《卡尔·马克思传》，第108页；与H·多涅曼：《燕妮·马克思——一位社会主义者的生活经历》（柏林，1969年），第96—97页。

<sup>②</sup> 《马恩全集补编》，德文版，第1卷，第553—554页。

布鲁塞尔摘录过的作品当中,包括约翰·斯图亚特·穆勒<sup>①</sup>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一些未解决的问题的论文》(在马克思看来,这本书最为突出地、也许是无意地表明了资产阶级理论家们迷失在矛盾重重的迷津之中的例子),笛福的《布施不是仁慈,以及雇用穷人……》,卡莱尔关于宪章主义的论文,以及威廉·科贝特<sup>②</sup>的《反对黄金的文件,或英格兰银行的历史和奥秘……》,马克思在他的批判性笔记中对上述的最后一种书曾经记下了一些赞美的评价。<sup>③</sup>在以后的年代里,他不止一次地又接触到笛福、科贝特和卡莱尔的作品。

---

<sup>①</sup>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1873),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实证主义哲学家。——译注

<sup>②</sup> 威廉·科贝特(1762—1835),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卓越代表人物;从1802年起办《科贝特氏政治纪事周报》,写过不少文章。——译注

<sup>③</sup> 《马恩全集》,德文版,第1部份,第6卷,第603—609页。



## 第七章

### 世界文学和阶级冲突

“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①

#### (1)

鲍多莫尔和鲁贝尔说过：“科学分析同道德判断的结合在社会研究的领域中绝不是鲜见的。马克思是不寻常的，而他的著作之所以特别引人注意，是因为他和任何其他的重要的社会思想家不同，他是一位公认的领袖，因而也就成了一个有组织的政治运动的先知”。②但是，那个比其他任何文件都更能使他保证得到这种称许的文件，即《共产党宣言》，于1848年2月最初在伦敦发表时，几乎没有受到人们的注意。这个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应共产主义者同盟之请共同起草的，它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可以正当地称之为“文学上的”形象化的比喻的东西：从口头和书写的文学，从出版物，从舞台演出中取得的比喻和形象。那著名的开端语宣称“一个幽灵……在欧洲徘徊。”接着生怕我们对这一形象的虚构来源产

① 《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27—28页。

② 《卡尔·马克思的社会学与社会哲学著作选读》，T·鲍多莫尔和马·鲁贝尔合编（哈蒙斯沃斯，1963年），第40页。（马·鲁贝尔现任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译注）

生误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立刻就谈到需要“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对抗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Märchen)”<sup>①</sup>。许多有关的形象接踵而来，诸如戏(Schauspiel)，挽歌(Klagelied)，谤文(Pasquill)<sup>②</sup>，“袖珍版(Duodez-Ausgabe)的新耶路撒冷”<sup>③</sup>，而比这些更加精心构思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可能从海涅那里借用来的一种“可除旧书新的羊皮纸写本”<sup>④</sup>的形象：

“大家知道，天主教僧侣曾经在古代异教经典的手抄本上面写上荒诞的天主教圣徒传。德国著作家用相反的态度对待世俗的法国文献。他们在法国的原著下面写上自己的哲学胡说。例如，他们在批判货币关系的法国原著下面写上‘人的本质的外化(Entausssrung)’……”<sup>⑤</sup>

实际上，德国的读者会不止一次地感到，《共产党宣言》本身就是一部除旧书新的羊皮纸写本，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语言下面，他们会发现德国诗人们的语言。这可能只不过是一个形象或是一个成语的问题，但是它却使人们联想到同它有关联的另一段文字：

“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

① 《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版，第23页。

② 同上书，第47页。

③ 同上书，第56页。

④ 原文“Palimpsest”，指一种羊皮纸上，能把原来的字迹刮去，在上面另写新作品，如果把这种纸照着灯光看，还可以看出原来的字迹。——译注

⑤ 《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50页。海涅在《哈尔茨山游记》和《法国画家》中用过这种“除旧书新的羊皮纸”的形象。但是这种形象并不是很不寻常的。



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sup>①</sup>（着重号系本书作者所加）

……erblickte es auf ihrem Hintern die alten feudalen Wappen  
……（……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凡是读过海涅的作品的人都会在这里听到《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的回响：

“想起中世纪这样美好，  
想起那些武士和扈从，  
他们背后有一个族徽，  
他们的心里一片忠诚。”<sup>②</sup>

140 下面一节则产生另一种较为复杂的除旧书新的效果：

“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象一个巫师那样（gleich dem Hexenmeister）不能再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鬼了。”<sup>③</sup>

① 《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 1970 年版，第 46—47 页。

② 甚至结束《共产党宣言》的那句著名的话也可以听到海涅作品的回响。海涅在论述路德维希·马尔库斯的文章（Ludwig Marcus, Denkworte）里，就曾提到“各国工人的兄弟联合（Verbrüderung der Arbeiter in allen Ländern）”，提到“无产阶级那支疯狂的大军（von dem wilden Heer des Proletariats），这支大军为了追求欧洲的一个共同目标，为了唤出一个真正的民主，而决心完全不考虑民族的问题。”参阅多尔夫·施特恩贝尔格：《亨利希·海涅和免罪》（Heinrich Heine und die Abschaffung der Sünde），汉堡与杜塞尔多夫，1972 年，第 360 页。（此处海涅诗文引自冯至译《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18 页。——译注）

③ 《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 1970 年版，第 29 页。

在歌德的诗《巫师的学徒》(Der Zauberlehrling)里面,就是那个学徒唤出了他最后不能制服的精灵们;是他的师父即 Hexenmeister (巫师)挽回了这一损失。在《共产党宣言》里,则是巫师自己失去了控制的能力:如果我们在《宣言》的文字中并通过《宣言》的文字察觉到歌德的与之对应的文字的话,就可以最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灾难的严重程度。

在《共产党宣言》里,我们常常可以遇到“Literatur”和“literarisch”这两个词。它们在《宣言》里有三种不同的用法。第一种用法只见于德文本,在常见的英译本中是看不到的:

“这样就形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西斯蒙第<sup>①</sup>就是这个学派的首领,对法国来说是这样,对英国来说也是这样。”<sup>②</sup>

(Es bildete sich so der kleinbürgerliche Sozialismus. Sismondi ist das Haupt dieser Literatur nicht nur für Frankreich sondern auch für England)

在这里,Literatur一词指的是“论述某一学科的一批专门的书籍和小册子等等和写作这些作品的作家”。

关于西斯蒙第的这句话,见于《共产党宣言》中《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一节,这一节的开头部分是这样的:

---

① 让·沙尔·利奥纳尔·西蒙德·德·西斯蒙第(1773—1842),瑞士经济学家,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批评家。——译注

② 按此句的英译文为:“Thus arose petty-bourgeois socialism. Sismondi was the head of this school, notably in France but also in England.”中译文见《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49页。——译注



“法国和英国的贵族，按照他们的历史地位所负的使命，就是写一些抨击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作品。在法国的1830年七月革命和英国的改革运动中，他们再一次被可恨的暴发户打败了。从此就再谈不上严重的政治斗争了。他们还能进行的只是文字斗争。但是，即使在文字方面也不可能重弹复辟时期的老调了。”

为了激起同情，贵族们不得不装模作样；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身的利益，似乎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声讨资产阶级。他们用来泄愤的手段是：唱唱诅咒他们的新统治者的歌(Schmählieder)并向他叽叽咕咕地说一些或多或少凶险的预言”。<sup>①</sup>

这里的“literature”一词，<sup>②</sup>看来所指的范围比开头一句提到的“抨击……的作品”要广泛。诗歌、剧本和小说，如果它们带有一点政治色彩或“信息”的话，就都有资格包括在这一词之内。我们发现有这样一本小说，就是在本节稍后提到的埃蒂耶纳·卡贝的《伊加利亚旅行记》(Voyage en Icarie. Roman philosophique et social, 巴黎, 1840和1842年)<sup>③</sup>。当然，“共产主义”这个词就是从这部书来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此书已占有显著地位，作者在那里利用此书，通过对照和比较，来揭露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是卡尔·格律恩和其他“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所作的剽窃和误解<sup>④</sup>。在马克思看来，文学并不是一个单独的、闭关自守的部门。诗歌(象海涅的诗歌和西里西亚织工之歌)、小说(象古斯塔夫·波蒙、埃蒂耶纳·卡贝和乔治·桑的作品)、剧本(象古斯塔夫·弗莱塔

① 《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46—47页。

② 此词中译本译为“文字”。——译者

③ 参阅《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56页。马克思曾在先前给卢格的一些信(发表于《德法年鉴》，《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16页)中就提到过卡贝的这部空想社会主义的小说。

④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573页起。

格①的《新闻记者》，马克思很久之后才看到这个剧本），显然是和另一些具有更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的体裁的作品有关，并且可以有益地同这些作品联系起来加以讨论。

但《共产党宣言》还在另一个意义上使用“literarisch”这个词，凡是读过马克思早期著作的人们都不会对这种用法感到奇怪。在谈到“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部分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再一次讨论了十八和十九世纪时德国介绍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作品的事情：

“德国的哲学家、半哲学家和才子们（beaux esprits），贪婪地抓住了这种文献，不过他们忘记了：在这种著作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ein rein literarisches Aussehen）……这样，第一次法国革命的要求，在十八世纪的德国哲学家看来，不过是一般‘实践理性’的要求，而革命的法国资产阶级的意志的表现，在他们心目中就是**纯粹意志、本来面目的意志、真正人的意志的规律**。”（着重号系本书作者所加）②

142

在这里，“纯粹文献的”（rein literarisches）这个词汇意指（在马克思的作品中常常有此意）一大堆轻飘飘的词，同事物、同社会现实与政治现实脱节的词。《共产党宣言》接着以使人联想到感伤的、纯文学的和修辞学的用词，来描述这种效果犹如“一件用思辨的蛛丝织成的、绣满华丽辞藻的花朵和浸透甜情蜜意的甘露的外

① 古斯塔夫·弗莱塔格（1816—1895），德国资产阶级作家。——译注

② 《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50页。



衣……”<sup>①</sup>，而且还特别指出这种文学，不管加以怎样巧妙的解释，在十九世纪的社会中都是商业交易的一种货色。这种文学的作者和译者所关心的只是如何在德国读者当中卖出他们的商品（Absatz ihrer Ware）。

从这样的一些词句可以看出，何况在这样的文字当中也是不足为怪的，《共产党宣言》让我们看到作家在现代社会中所起的作用，而且得出结论：浪漫的幻想不再能掩盖市场的现实，“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sup>②</sup>（着重号系本书作者所加）。这样一来，甚至诗歌在现代世界里都成了一种商品，并且要受到它的经济规律的制约。即使诗人也不能摆脱那种决定人的思维的作用，《宣言》以毫不含混的语气宣称：“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sup>③</sup>而如果说作者就这样成了他们的社会和他们为之写作的社会集团的一种**产物**，则那些社会集团却又受到他们间接产生和激发起来的作品的**影响**：“现今在德国流行的一切所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著作，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都属于**这一类卑鄙龌龊的、令人萎靡的文献**。”<sup>④</sup>（着重号系本书作者所加）。作家的作品使他们的读者萎靡下去，而不是用新的思想、新的希望和新的力量去鼓舞他们并使他们振作起来，这就是把作家变成赚钱的雇佣者的报应。

但如果一个民族的作品是经济和社会条件的产物，那么当条件改变时，这些作品也就要改变；《共产党宣言》的作者也清楚地看到，这一宣言本身既是要要求改变的一个号召，又是不可避免要改变的一个象征：

① 《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52页。

② 同上书，第26页。

③ 同上书，第40—41页。

④ 同上书，第52页。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

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sup>①</sup>

我们必然会推知，《共产党宣言》通过它坚决采取的和宣布的思想——作者认为这种思想将会成为无产阶级的思想——来预告即将到来的变革。无产阶级则是未来的统治阶级；在未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sup>②</sup>

我刚刚引用的有关意识和物质存在之间关系的一节，常常被非马克思主义者攻击为露骨的决定论。然而正象莱奈·韦莱克正确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的措词好象是想避开这一攻击。他断言，意识随着物质存在的条件而改变。莱奈·韦莱克说：“如果人们自由地解释‘随着’一词，那就还不会宣布任何完全的经济决定论；人的精神生活随着经济制度的转变而改变。这里教给人们的是一种平行论，一种类推法，而不是单方面的依赖。”<sup>③</sup>

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宣布了文学上的一大变革；这一变革歌德在他的老年时期就已预见到了，当时他看到货物的国际交换的发展如何给智力的和精神的交往和交换带来相应的发展。因此年老的歌德越来越频繁地谈到“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sup>④</sup>。对歌

144

① 《共产党宣言》，中文版 1970 年版，第 43 页。

② 同上书，第 46 页。

③ 韦莱克：《现代批评史(1750—1950)》，英文版，第 3 卷，第 235 页。

④ 参见 F·斯特利克：《歌德与世界文学》(伯尔尼，1946 年)，第 13—103 页。



德来说,这种“世界文学”并不意味着放弃民族的特点。恰恰相反,每个民族的文学都因为它的特殊性和差别,因为它加之于世界文学交响乐之中的特殊音色,而受到国外读者的珍视。由于意识到其他民族的特殊贡献以及懂得珍视它们,我们也就懂得珍视我们自己的贡献。确实,我们自己的文学在某种程度上也会由于这样的接触而改变它的性质,但这只会是一种丰富,而由此产生的共生现象,诸如歌德自己的《西方与东方的合集》和《中德四季晨昏杂咏》,仍然会继续带有独特的民族文化的印记和这些作品的作者的天才和个人性格的印记,通常人们是在本国文化范围之内接受外国的作品的。

这样一个概念显然是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想法的。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就描述过一代又一代的人怎样继续发展他们继承下来的物质财富、资本和生产力:

“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sup>①</sup>

《共产党宣言》对上述的说法补充了有关这样的发展将对文学所起的影响的一些想法: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

---

<sup>①</sup>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51页。

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sup>①</sup>

关于这一节，如同关于马克思的作品中其他许多地方一样，主要值得注意之处在于他对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所作的赞扬。他并不同意德国浪漫主义者或托马斯·卡莱尔的那种全盘反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他从来不曾忘记他想推翻的那一制度实际上对进步事业曾起过多么大的作用。在这一上下文中，“进步”一词意味着什么，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再一次清楚地表述出来；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了未来的一个时期，那时“各个单独的个人才能摆脱各种不同的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包括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并且可能有力量来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人们所创造的一切）”。<sup>②</sup>

《共产党宣言》进而考虑胜利的工人阶级在这既影响生活的所有其他方面也影响文学的过程中所会起的作用：

“随着资产阶级的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

① 《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 1970 年版，第 27—28 页。

②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 3 卷，第 42 页。



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了。

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sup>①</sup>

146

很可以认为,在这一节里,《共产党宣言》并没有充分估计到对它所发觉的这种倾向的反抗:民族的对立和分歧并没有象生产和商业的逻辑似乎暗示的那样迅速而普遍地消灭。实际上,马克思已开始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在他的晚年,对于那些过低估计民族感情威力的所谓追随者,始终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1866年,他就嘲笑过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的法国代表们,因为他们宣称“所有的民族甚至国家都是‘过时的偏见’”。他还说这些代表“把否定民族特性理解为由模范的法国民族来吞并各个民族了”。后来,他还称赞过俄国的经济学家弗列罗夫斯基<sup>②</sup>,因为他“很了解每个民族的性格特点”,另外他把爱尔兰人的事业作为一个“民族问题”来考虑。<sup>③</sup>

然而,《共产党宣言》的预言并没有完全落空。在我们现在的二十世纪,通过翻译、纸面书籍普及本、巡回演出、广播、电影和电视,以那些不会使马克思感到吃惊的方式改变了我们的文化视野,我们已看到“民族的与地方的”文学的混合和世界范围的传播。作为一个庞大想象丰富的博物馆,一个伟大的巴贝尔<sup>④</sup>图书馆,“世界

<sup>①</sup> 《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43页。

<sup>②</sup> 瓦西里·瓦西里也维奇·别尔维(笔名恩·弗列罗夫斯基)(1829—1918),俄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启蒙运动民主主义者,民粹派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作者。——译注

<sup>③</sup> 参见1866年6月20日和1870年2月12日致恩格斯的信(载《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229—231页;第32卷,第428页);1870年4月9日致迈耶尔和福格特的信(载《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651—658页)。

<sup>④</sup> 巴贝尔(Babel),《旧约·创世纪》第十一章,说耶和華妒忌人民造塔通天,就变乱他们的语言,使他们不能完成造塔任务。这里的意思是语言众多。——译注

文学”猛然到来了。

《共产党宣言》主要是一个行动的号召。作为这样的一个号召，大体上说来，它本身是致力于现代社会的所谓富人和穷人的观点，或者说得更恰当些，主人和奴隶的观点：两个阶级，富人和穷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但是，一位波兰学者指出：

“如果一切政治的或宗教的斗争都被解释为阶级斗争，如果我们把各种不同的文学的和艺术的倾向同作为基础的阶级关系联系起来，如果我们到道德准则中去寻求阶级利益和阶级偏见的反映，那么我们就必须利用比《共产党宣言》中的两个基本阶级更多的阶级。”<sup>①</sup>

这一点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人们可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发现阶级结构的三层的和另一种多层的模型，同时在《共产党宣言》中发现二分的阶级结构；也许还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当马克思在那部分后来成为《资本论》第三卷的著作里最后致力于给“阶级”下一个定义时，他的手稿却在正式开始论述这一定义之前令人遗憾地中断了。

147

那么，关于知识分子、艺术家和他们的阶级隶属关系又怎样呢？在这里我们必须记住《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反对派”作家和思想家这方面讲了些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著作中暗示，由于社会本身的矛盾，这样的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反对统治的思想。他们可以同他们社会中或者国外类似社会中已经发生作用

---

<sup>①</sup> S·奥索夫斯基：《社会主义意识中的阶级结构》，S·佩特森英译本，伦敦，1963年，第88页。回忆一下下述情况是适当的，即迪斯累里的《西比尔，或两个民族》是在1845年出版的，而海涅的《威廉·拉特克利夫》中的一个人物早在1822年就把人类分成两个相互斗争的民族：脑满肠肥的民族和饥饿的民族。



的力量联合起来；这种力量注定要彻底改变一个社会中原有的社会经济关系，从而最终也改变精神和艺术生活。因此我们在《共产党宣言》中读到：“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sup>①</sup>在这种能动的情况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管是作为艺术家、经济学家还是历史学家——可以通过提高他的理论觉悟使自己摆脱由于出身和所受教育而似乎会受到的阶级羁绊。《共产党宣言》显然是根据那些认为自己正是做了那种事情的人们的观点写的；他们以无产阶级战士自命，并且现在以这种身分对资产阶级说：

“你们一听到我们要消灭私有制，就惊慌起来。但是，在你们的现存社会里，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被消灭了；这种私有制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不存在。可见，你们责备我们，原来是说我们要消灭那种以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没有财产为必要条件的所有制。总而言之，你们责备我们，原来是说我们要消灭你们的那种所有制。的确，我们是要这样做的。”<sup>②</sup>

《宣言》的著名的最后一句话<sup>③</sup>是更富有戏剧性的，因为在这里，作者们第一次直接诉诸**无产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

148 《共产党宣言》是以恩格斯起草的一份《教义问答》<sup>④</sup>为基础的，但是最后的定稿工作完全是马克思做的。从偶尔保存下来的《宣言》的一页原稿可以看出，他花费了多大的辛苦来补充和润色

① 《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34页。

② 同上书，第39—40页。

③ 指“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译注

④ “Catechism”，一译《信条》。——译注

《宣言》的论述。第三部分的一个大纲表明他十分注意要把他的论述说得前后一致和有条有理。因此，正是由于他的功劳，《宣言》的总结构才显得明晰，才能做到叙述清楚，语调和远景的灵活变换，有义愤情绪有幽默，有强有力的比喻，有巧妙安排的革命口号，<sup>①</sup>并且使用大量的修词手法，不是为修词而修词，而是为了传达社会的消息。大卫·麦克莱兰列举了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经常使用的一些手法，虽然这些手法并不总是象在《宣言》中使用那样恰当、成功。这些手法是：“高潮的效果、首语重复法<sup>②</sup>、对句法、对比法和交叉法”。此外，还要加上《宣言》的德文原文具有特色的韵律和词语的音乐性。开头几句就使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它们那些悠扬的重复的词，相互联系的头韵和共鸣（有一些我加上了着重线）和它们那有效配合的越来越不相称的并列的词，先是单音节的称号（der Pápst und der Zár，教皇和沙皇），然后是多音节的名字，用四个弱音把两个主要的重音分割开来（Métternich und Guizot，梅特涅和基佐），而最后则是故意搞得不协调的最后一对并列的词的比较错综复杂的韵律（französische Radikale und deutsche Polizisten，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

“Ein Gespent geht um in Europa—das Gespent des Kommunismus. Alle Mächte des alten Europa haben sich zu einer heiligen Hetzjagd gegen dieses Gespent verbündet, der Papst und der Zar. Metternich und Guizot, französische Ra-

<sup>①</sup> “《共产党宣言》几乎是革命修辞学的一部选集，而它的一些最有效效果的口号都是借来的。维尔纳·松巴特曾经说过‘无产阶级除了他们的锁链以外，没有可以丢失的东西’，而‘工人没有祖国’则是马拉的话，‘人对人的剥削’则是巴扎尔的话，‘现金交易’关系是从托马斯·卡莱尔的作品中来的，并曾为恩格斯在《1844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所引用……”（见S.E.海曼，《缠结的组合》，1966年版，第100页）。

<sup>②</sup> 指一个单词或短语出现在连续数句或数行的开头。——译注



dikale und deutsche Polizisten.

149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sup>①</sup>

马克思并不总是写得这样地出色——但是在他写得最好的时候,他表现出他能够掌握说教的和论辩的散文写作能力,这一点就保证他的作品在思想和政治活动史上以及在德国文学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

## (2)

《共产党宣言》发表后不久,巴黎就爆发了革命,从法国土地上驱逐马克思的法令被取消了(在那急于想消除马克思潜在的危险存在的比利时警察当局的催促下),马克思返回法国的首都。马克思当初于1845年迁到布鲁塞尔去的时候,极其不愿同他别离的海涅这时已病入膏肓,因而在他们两人之间好象并没有很多的个人接触。无论怎么说,他们的观点开始发生了分歧,因为这时海涅正在摸索返回到他童年时期信仰的上帝那里去的道路,而马克思则越来越对政治经济学感到兴趣。大约五年之后,海涅本人回忆说,当人们发现他在19世纪40年代从法国的秘密国家基金中领取津贴,并因此在德国受到指责,说他由于受贿而对国家大事保持沉默的时候,马克思是他的支持者之一:

<sup>①</sup> 《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23页。参见帕美拉·汉斯弗德·约翰孙:《马克思的文学成就》(载于《现代季刊》,新辑第2卷(1946—1947年),第240页):“这一节表明了他的两个最突出的文体上的特点。第一,表现为比喻形式的简明陈述,紧接着是一个长而流畅的形容句。第二,顿降法的使用,从教皇到德国警局密探的一个急速下降的壮观的曲线。顿降法的讽刺的例子在他的全部作品中是很多的……”

“我记得当时有我的一些同胞到我这里来,其中包括他们中间最坚决和最有头脑的人物(der entschiedenste und geistreichste)马克思博士,对发表在《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上的诽谤文章表示愤慨并且劝我根本不要去理它;他们向我保证,他们自己都已在德国的报纸上刊登启事,说我之所以可能被认为接受提供的津贴,只是为了能够更加积极地支持我的政党中比较贫苦的同志。《新莱茵报》的前任编辑和他的编辑部里的朋友们都向我谈到过这一点……”<sup>①</sup>

马克思对于海涅的“回顾的说明”(Retrospektive Aufklärung)中的这一节所作的反应,表示出那种并非不动感情的不敬态度,而这看来正是马克思在他后来的年代和私下里对海涅其所采取的态度有别于对诗人海涅所采取的态度。1855年1月17日他写信给恩格斯说:“现在我家里有海涅的三卷书<sup>②</sup>。”

“顺便说一下,他详尽地叙述了一件捏造的事,说在奥格斯堡《总汇报》‘攻击’他从路易—菲力浦那里领取津贴的时候,我和其他一些人曾经来安慰过他。好心的海涅[der gute Heine]故意忘掉了这样一种情况,即我为了他而进行的干预是在1843年底,所以,无论如何不可能同1848年二月革命以后才知道的一些事实联系起来。不过我们不再提这件事了。他受着良心的责备,——要知道,这条老狗对这种丑事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就竭力讨好卖乖”。<sup>③</sup>

① 《谈话集》,第128页。

② 指海涅的《混合作品集》(Vermischte Schriften)第1—3卷,汉堡,1854年。后二卷是题为《吕太斯》的论文集和特写文集。

③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420—421页。



格奥尔格·维尔特有一段回忆，谈到马克思曾想去拜访那位一度同他关系非常亲密的患病的诗人：

“海涅曾表示希望认识我，于是马克思就带我去看他。但是我们到那里时，那可怜的人病得正利害，以致不能接见我们。因此，看来我将永远不能见到这位比任何别人都更使我感到兴趣的作家了……”<sup>①</sup>

而马克思在1849年同海涅再次见面时留给海涅的印象则可以从海涅对莫里茨·卡里耶<sup>②</sup>所讲的话的记载中探测出来，因为当时（1851年）他们正好谈到马克思，海涅说：“当一切都说了并做了的时候，如果一个人只不过是一把剃刀，那他就十分藐小了。”<sup>③</sup>但海涅在公开讲话的场合中对马克思还是表示出较大的敬意，可是马克思却不大可能对海涅在他1854年的《自白》（Geständnisse）一书法文版中的描述感到十分高兴：

151 “德国共产主义者那些或多或少显得神秘的领袖都是大逻辑学家，而其中最强大的又都是来自黑格尔学派；毫无疑问，他们是德国最有能力的思想家和最有活力的人物。这些革命的博士和他们的坚决到无情程度的门徒是德国仅有的一批有生气的人物；我担心，未来是属于他们的。”<sup>④</sup>（1855年版删去“我担心”几个字）

① 《谈话集》，第129页。

② 莫里茨·卡里耶（1817—1895），德国哲学家。

③ H·H·胡班编：《同海涅的谈话》，第898页（1948年版）。

④ 多·施特恩贝尔格：《亨利希·海涅和免罪》，第50页。

马克思更不想重复海涅在同一部《自白》里对他所作的假的忠告，这一忠告是海涅先前在1852年有一次在他加在他的再版的《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一书的序言里公开赠给马克思的。海涅在那里告诉他的读者说，“好心的卢格和我的甚至更加顽固的友人马克思博士最好去读一下《但以理书》，并且不要忘记尼布甲尼撒<sup>①</sup>在他最得意时所遇到的事情”。在这方面，回忆一下弗兰契斯卡·库格曼关于马克思后来对海涅的态度的记述是很有意思的：马克思虽然赞赏海涅的作品，却不喜欢他的为人。弗兰契斯卡·库格曼回忆说，“马克思特别指责他（海涅）对曾经帮助过他的朋友的忘恩负义”。<sup>②</sup>不过，在马克思的已发表的作品中，在提到海涅或引用他的作品时，却总是给以适当的赞扬的；在《资本论》第一卷里（1867），马克思便特别把海涅称为他的“朋友”并且赞扬了他的勇气。<sup>③</sup>

他同另一位德国诗人格奥尔格·海尔维格重新恢复的接触更加使他失望。马克思曾经热情地捍卫过《莱茵报》的这位受到尊重的撰稿人，不赞成市侩们对他那种奢侈的生活方式的攻击。但这时马克思却发现他在从事轻率的革命计划，这种计划只能损害马克思正在考虑的事业；马克思的规劝只驱使他走向敌对的道路。1848年3月16日马克思伤心地写信给恩格斯说：“伯恩施太德<sup>④</sup>和海尔维格做事象个流氓。他们在这里建立了一个黑红黄三色协

① 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公元前605—公元前562），巴比伦国王，曾经应了神的预言，“被赶出离开人世，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见《旧约》《但以理书》第四章第三十三行）。——译注

② 克里姆编：《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柏林，1967年），第1卷，第32页。弗兰契斯卡·库格曼提供的证据和卡里耶提供的那样（见前注），都需要谨慎对待，不可盲信。

③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69页。

④ 阿达尔贝特·冯·伯恩施太德（1808—1851），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普鲁士政府的密探。——译注



会反对我们。”<sup>①</sup>然而这还不是马克思的最后一次失望。他一直认为重要的是，应当使德国倾听其声音的诗人成为同情《共产党宣言》所提出的原则的人，或者使他们对这些原则抱同情态度；但是他最后总是发现他们并不可靠并且是气人的联盟者。马克思对海涅的诗估价也不高——在他生平有过个人交往的所有作家当中，海涅是唯一始终为马克思所承认在文学上有伟大成就的人。

### (3)

马克思在巴黎并没有停留很久；三月，德国革命在维也纳和柏林取得了暂时的胜利；四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到科伦去创办了一个新的《莱茵报》，即致力于革命事业的《新莱茵报》。这使马克思同两位德国诗人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两位诗人在一个时期里曾分担了他的编辑任务。他们一个是被恩格斯称之为“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和最重要诗人”<sup>②</sup>的格奥尔格·维尔特；一个是放弃了自己的非政治立场以便写些支持自由派和激进派事业的鼓动诗篇的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马克思1845年在布鲁塞尔遇到了弗莱里格拉特并且同他结下友谊；1848年10月，他邀请弗莱里格拉特出任《新莱茵报》编辑。弗莱里格拉特接受了，同时又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sup>③</sup>。

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和这份报发表的所有其他别人的文章一样，都是不署名的。这是一个原则问题，马克思后来在《法兰西的阶级斗争》一书中曾讨论过这个问题：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7卷，第137页。

② 克里姆编：《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柏林，1967年），第2卷，第296—297页。  
（见恩格斯：《格奥尔格·维尔特》，《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7页。——译注）

③ 戴麦兹：《马克思、恩格斯和诗人》，第92—96页。

“当报刊是匿名的时候，它是广泛的无名的社会舆论的工具；它是国家中的第三种权力。每篇文章都署名，就使报纸纯粹成了或多或少知名的人士的作品文集。每一篇文章都降到了报纸广告的水平。在这之前，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现在报纸却变成了令人难以相信的单户期票，它的可靠程度和流通情况不仅取决于开支票者的信用，而且还取决于背书人的信用”。<sup>①</sup>

重要的是这份报纸为之奋斗的事业——德国革命的成功，反俄的解放战争，意大利人、匈牙利人、波兰人的自决，以及无产阶级在全世界的进军<sup>②</sup>。它要成为反动当局的一根肉中刺，而不“仅仅是一部文集”。

153

但是，第一篇文章（后来人们研究确定这是马克思本人的作品）就表明，在他的论辩作品中，文学作品的引文、引喻、改写和诙谐的模仿必定要再次起多么重要的作用。在描述普鲁士的新首相卢道夫·康普豪森<sup>③</sup>时，文章一开头就论述康普豪森表面上装出一付严肃的样子，在郑重而夸大的口吻下掩盖自己“心灵的缺点”，<sup>④</sup>——这使人想起洛伦斯·斯特恩在《特利斯川·项狄的生平和见解》中所赞扬的那种对“严肃”所下的曾是十分著名的定义：

“他会说，一颗快活的心所发现的坦荡的性情当中，是不存在

---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17页。（背书人指的是在票据上作转让签字的人。——译注）

② W·布路曼堡：《从原始资料和图片文献中看到的卡尔·马克思》（莱恩倍克1962年版），第87—90页。

③ 鲁道夫·康普豪森（1803—1890），普鲁士首相，推行妥协政策。——译注

④ 参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28页。



险诈的——但是对这件事本身来说，严肃的本质既然是装给人看的，因而也就是欺骗性的，那就可说是一种诡计、是为了骗取世人的信任，好象这个人有比他实际要多的理性和知识；而且，这尽管带有一切矫饰，比之**法国**的一个机智的人物早就明确的说法‘**身体表面的神妙莫测的仪态，掩盖着心灵的缺点**’不仅不好些，往往反而更坏——对严肃所下的这一定义，约里克可以十分轻率地说，值得用黄金的字母写下来。”①

马克思接着把康普豪森称为“考察历史的朋友”，这一点使人联想到当时卡尔·冯·罗泰克写的一部通俗的历史教科书的题目②。接着他又颠倒地引用歌德在《浮士德》第一部中用来刻划瓦格纳的性格的希波克拉底③的一句格言，把它改为：“艺术即革命是短促的，生命即在革命后产生的康普豪森内阁是长久的。”④这又使作者把莎士比亚在《理查三世》中著名的一句话改编为“为了理论可以放弃王国！为了王国可以放弃理论！”这句话被说成是康普豪森的座右铭⑤。在这之后，读者又看到作者把当时已不复存在的普鲁士联合议会描写成“这个混合物令人作呕，中古的妄想和现代的骗局”⑥，这句话显然是从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里借用

① 斯特恩：《特利斯川·项狄的生平和见解》，第1册第2章。许多年之后，马克思才发现斯特恩在这里提到的法国的机智的人物是拉·罗什福考（La Rochefoucauld）。（拉·罗什福考（1613—1680）是法国作家，著有《回忆录》（1662）与《格言集》（1665）。他认为自我利益是人类行动的源泉。——译注）

② 参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29页；另参阅罗泰克：《从历史认识的萌芽时期到现在的通史；供考察历史的朋友参考》（夫赖堡，1834年）。

③ 希波克拉底，古希腊医师。——译注

④ “啊，上帝！艺术是长久的，而我们的生命则是短促的……”（《浮士德》，第1部，《夜》。）参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29页。——译注

⑤ 《理查三世》，第五幕第四场；参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0页。（莎翁的原话为“我的王位换一匹马！”——译注）

⑥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0页。

来的：

“不管怎样，中世纪在过去  
曾真实存在，我甘心容忍——  
只要你把我们解救  
脱离半阴半阳的两性人，

脱离那冒牌的骑士队伍，  
这个混合物令人作呕，  
中古的妄想与现代的骗局，  
它不是鱼，也不是肉。”<sup>①</sup>

为了进一步说明“中古的妄想”怎样在康普豪森的统治下继续存在，并且为了使他的读者有一种幽灵式的、老旧过时的、可笑的感觉，马克思现在又复苏了哥特式小说——恐怖小说的一些常用手法：

“于是负责任的首相竭力想把被遗忘的尸体挖出来，或者把亲切而忠诚的“联议会”的幽灵召唤来。这个幽灵的确出现了，但是它在空中游荡，东摇西晃，丑态百出，这是由于它脚下已经没有基础的缘故……魔术师向幽灵启示说，他把它召唤来是为了给它办理遗产手续并取得作它的合法继承人的权利……受到恭维而兴高采烈的幽灵就象中国的木偶一样，连连点头表示愿意听从魔术师的一切命令，在出门时深深一鞠躬就消逝不见了。……”<sup>②</sup>

在这一“哥特体”的插曲之后，马克思在他的文章的结尾处，又使用

---

① 《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17章。（中译文引自冯至译《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99页。——译注）

②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0—31页。



了许多古典的引喻和诙谐的模拟：

“鹅下了鹅蛋，鹅蛋也孵出了鹅。但是，人民根据拯救了卡皮托里乌姆神殿的鹅的嘎嘎叫声<sup>①</sup>很快就会知道，他们在革命时期放下的勒达的金蛋被盗走了。甚至米尔德<sup>②</sup> 议员看来也不是勒达的儿子，不是发光的卡斯托尔<sup>③</sup>。”<sup>④</sup>

“Selbst der Abgeordnete Milde scheint nicht der Ledasohn zu sein, der fernhinleuchtende Kastor”（甚至米尔德议员看来也不是勒达的儿子，不是发光的卡斯托尔），这句荷马式的六音步韵律的句子嘲笑地标出了法兰克福议会的“英雄们”和《伊利亚特》的英雄们之间的差距。

马克思在嘲笑流产的巴登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弗·卡·黑克尔<sup>⑤</sup>时，也使用了上节引文中对米尔德所用的类似嘲笑方法。1848年事件中两个出名的人物都叫黑克尔，一个在政府方面，一个在革命方面，马克思利用了这一巧合，说道：

---

① 古罗马人传说公元前390年高卢人偷袭罗马时，卡皮托里乌姆山碧由于献给优诺女神的鹅的叫声惊动了卫兵而得救。参见《古代罗马史》，1957年三联书店中文版，第156—157页。——译注

② 卡尔·奥古斯特·米尔德（1805—1861），西里西亚的大厂主，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之一；奥尔斯瓦特—汉泽曼内阁的商业大臣（1848年6月—9月），普鲁士国民议会的主席，属于右派。——译注

③ 勒达在希腊神话中是廷达瑞俄斯的妻子，卡斯托尔则是他们的儿子。勒达又和宙斯生了海伦和波吕丢刻斯，这两个神都是从蛋里孵出来的。——译注

④ 参阅《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1页。

⑤ 弗里德里希·卡尔·黑克尔（1811—1881），巴登的共和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4月巴登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后流亡美国，参加美国内战，站在北部方面。——译注

“我们不了解，这也许是国家检察官黑克尔<sup>①</sup>羡慕共和主义者黑克尔的荣誉？……我们的后代将把这两个伟人看作是现代运动的种种矛盾的戏剧性的体现。未来的歌德将在新《浮士德》中一起来描写他们。至于让哪一个黑克尔扮演浮士德，哪一个黑克尔扮演瓦格纳，这完全由作者自己来决定。”<sup>②</sup>

这是马克思对两家各打五十大板的一个具有特色的手法。他让我们理会到，歌德创造了一个真实的人物（浮士德），而两个黑克尔在这个人物面前则退居毫不足道的地位，从而“安置了”这两位黑克尔，就象以荷马的史诗来“安置”米尔德一样；另外，歌德创造了诗剧头几场中作为浮士德的有力陪衬的瓦格纳，那个智力有限、目光短浅——尽管并非毫无同情心的——腐儒，从而不偏不倚地刻划了两位黑克尔的面貌。

海涅的政治诗，特别是《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在马克思给《新莱茵报》写的文章里到处出现。从《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中摘引的句子使人想起 1848 年 5 月的种种希望：

“那时一切都装饰鲜花，  
日光也欢腾四射，  
鸟儿满怀热望地歌唱，  
人们在希望，在思索——”

156

这种引语还总结了法兰克福议会中极左派的纲领：

“我若是把事物仔细量，

① 黑克尔，普鲁士法官，1848 年是科伦检察官。——译注

②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 5 卷，第 521 页。



我们根本用不着皇帝。”

或是嘲笑德国生活中那种对于不值得羡慕的事物盲目冲动的依恋：

“这实在是我故乡的空气，  
热烘烘的面颊深深感受！  
还有这些公路上的粪便，  
也是我祖国的污垢！”<sup>①</sup>

此外还有引文引自海涅的《奥拉夫骑士》(Ritter Olaf)、《汤豪塞》(Der Tannhäuser)、《我们的海军》(Unsere Marine)、《格奥尔格·海尔维格》(Georg Herwegh)、《1829年》(Anno 1829)、《妖魔》(Der Wechselbalg)、《阿塔·特洛尔》(Atta Troll)和《卡尔道夫论贵族》(Kahldorf über den Adel)<sup>②</sup>。引自毕尔格尔<sup>③</sup>的《列诺尔》(Lenore)和斐迪南·赖蒙德<sup>④</sup>的剧本的引文也出现在《新莱茵报》上，其上下文就和海涅过去引用时的上下文相似<sup>⑤</sup>。作品中也常常提到和引用过去的文学作品，如荷马、维吉尔、《圣经》、《一千零一夜》、莎士比亚、莫里哀、博马舍、歌德和席勒；一些小作品，如阿

---

① 参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236页；第5卷，第46、326页。（海涅诗句引自冯至中译本，第51、95、50页。——译注）

② 参见同上书，第5卷，第117、206、267页；第6卷，第521、571页等等。

③ 高特夫里特·毕尔格尔(1747—1794)，德国哥亭根林麓派诗人，狂飙突进运动的主要代表者。——译注

④ 斐迪南·赖蒙德(1790—1836)，奥地利的演员和剧作家。——译注

⑤ 参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41页(《愿死者安然升入天堂》)；第5卷，第112页(《不管太阳多么亮，它总是要落的。》)——引自斐·赖蒙德的《来自小仙人世界的姑娘，或一个农民百万富翁》(第二幕，第四场)。

尔诺德·科尔图姆<sup>①</sup>的十八世纪的拟史诗《约卜西之歌》，也没有被忽略；而且我们还发现有一处提到库柏<sup>②</sup>的《最后一个摩希坎人》另一处摘了，马提阿斯·克劳狄乌斯<sup>③</sup>的《莱茵葡萄酒之歌》中的语句，此外还经常提到弗莱里格拉特译的罗伯特·彭斯<sup>④</sup>的《虽然如此》。甚至歌剧的脚本，从《费加罗的婚礼》到罗西尼<sup>⑤</sup>的《唐克莱德》，都作为引语的来源使用<sup>⑥</sup>。塞万提斯的叙述性小说再一次证实是有用的；但是这次马克思却从《惩恶扬善故事集》(novelas exemplares)取得描绘愚蠢和无赖行为的生动的例证，而只顺便地把堂·吉珂德的形象作为陈旧过时的思想方式的化身<sup>⑦</sup>。

马克思的许多文学引喻和神话引喻都是诙谐模拟式的。由此，一位普鲁士国家检查长就成了阿佛罗狄忒<sup>⑧</sup>，普鲁士民兵成了忒修斯<sup>⑨</sup>，《新莱茵报》本身成了阿利阿德涅<sup>⑩</sup>，普鲁士的威廉亲王成

① 卡尔·阿尔诺德·科尔图姆(1745—1824)，德国诗人和作家，以《约卜西之歌》一书而著名。——译注

② 菲尼莫尔·库伯(1789—1851)，美国浪漫主义作家。——译注

③ 马提阿斯·克劳狄乌斯(1740—1815)，德国诗人。——译注

④ 罗伯特·彭斯(1759—1796)，伟大的苏格兰诗人，民主主义者。——译注

⑤ 乔阿契诺·罗西尼(1792—1868)，著名的意大利作曲家。——译注

⑥ 参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64页(荷马，维吉尔)；第5卷，第66、112、311页；第6卷，第19、33、99、111、164页(莎士比亚)；第6卷，第78页(密尔顿，《失乐园》——但这篇文字还不能确定是马克思所作)；第6卷，第312页(莫里哀)；第6卷，第111、224、532页(博马舍)；第5卷，第121、521、570页；第6卷，第28、54、241、258、310、357—358、411页(歌德)；第6卷，第19、56、79、173、549页(席勒)；第6卷，第79、118页(科尔图姆)；第6卷，第70页(克劳狄乌斯)；第5卷，第438—440、493页(弗莱里格拉特)；第5卷，第433页(莫扎特)；第6卷，第81页(罗西尼，《唐克莱德》)。

⑦ 参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12、317、403、410、430、490、501页；第6卷，第54、439、592页。

⑧ 阿佛罗狄忒，希腊神话中的爱情女神是克洛诺斯将自己父亲乌拉诺斯肢体投入海中时从泡沫中所诞生，又一说，她是宙斯和狄俄涅的女儿。——译注

⑨ 忒修斯，希腊神话中的雅典王子，曾进入克里特迷宫斩妖除怪的英雄。——译注

⑩ 阿利阿德涅，希腊神话中克里特岛国王米诺斯的女儿，他给了忒修斯一个线球和一把魔刀，使他杀死了克里特迷宫里的怪物并顺着引路的线走出迷宫。——译注



了埃涅阿斯<sup>①</sup>，主管普鲁士警察部队的大臣成了“宪政自由的忠实的埃卡尔特”<sup>②</sup>等等。特别圣经的引文常常用到有意搞得不调和的上下文中去——比如，挖苦地让德国爱国者象摩西在燃烧着的树丛前面那样来面对古旧的和残暴的风俗：

“还是把你的鞋子脱下吧，德国的爱国者，因为你是站在神圣的土地上啊！所有这一切野蛮的习俗，是基督教德意志的光荣的残余，是贯串着全部历史并把你同你们祖先的伟大，甚至同赫鲁斯克人<sup>③</sup>居住过的森林联系起来的那条锁链的最后一环！”<sup>④</sup>

歌德《漂泊者的夜歌》(Wandrer's Nachtlied)中的一些语句，稍加改动，被引用来描绘一个普鲁士政治家故作姿态的退休打算；对《新普鲁士报》(Neue Preussische Zeitung)所表达的观点进行的抨击，其标题就象《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一书的第六卷那样，题为《良心的忏悔》；而对柏林《国民报》(National-Zeitung)忠诚的沉默，则用那种使歌德的迷娘闭口的命运来加以“解释”<sup>⑤</sup>。然而并非一切都是诙谐的模仿。马克思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引用诗人的作品能完美地表达他自己看到德国的状况时所感到的义忿、蔑视

① 埃涅阿斯，希腊神话中特洛亚英雄之一。——译注

② 忠实的埃卡尔特是德国中世纪传说中的人物，是忠实的人和可靠的捍卫者的典型。——译注

③ 赫鲁斯克人是古代日尔曼人的部族，纪元前一世纪生活在威悉河和易北河中游。纪元前一世纪末至公元一世纪初被罗马人征服。公元9年在领袖阿尔明尼的领导下，在多德堡森林击溃了罗马军队，从罗马统治下获得解放。——译注

④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25页。在其他许多暗示到圣经章节却又故意用得和圣经的原意有所不同的地方，有一处值得特别提一下：“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马太福音》，第13章，第12行）1848年7月26日的《新莱茵报》就说这个预言在现代世界中正在不断实现。（《马恩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11页）。

⑤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28、241、258页。

或愉快的心情。福斯塔夫对法官沙罗的反应，正可以说明马克思对普鲁士大臣们言行不一致的感觉：“老爷，老爷，我们上年纪的人多么容易犯这种说谎的罪恶！”；忒耳西忒斯对埃阿斯的反应（“我情愿做羊身上的一只虱子，也不愿做这样一个没有头脑的勇士”）显然也就是马克思对弗兰格尔伯爵<sup>①</sup>的反应；而我们多次发现博马舍的“费加罗，你万没有想到这一点！”这句话比任何其他形式的语言都更适于表达马克思对某种特别荒唐的行为的惊讶<sup>②</sup>。有时马克思夸大或者改变一个人们所熟悉的引文，这引文虽然有了改变，但他的大部分读者仍然会相当清楚地知道引文的原来的样子，例如，面对普鲁士的反革命，他就说，在“丹麦王国”里不是“有些”乌七八糟，而是一切都是乌七八糟！<sup>③</sup>另一点也是极其引人注目的，那就是马克思从他最赞许的作家——莎士比亚、歌德和海涅的作品当中引用的一句话，常常成为那些精心构思而又充满热情的长句的高潮，这种句子正是他的报章散文的一个突出特点。他需要大作家的话来证实和支持他自己的话。他1848年12月15日发表的一篇论述资产阶级和反革命的文章里，有一段很长但决不笨重的话使人毫不怀疑地想到是同《皆大欢喜》第二幕有关。马克思指控普鲁士中产阶级时说：

“……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在上层面前嘟囔，在下层面前战栗，对两者都持利己主义态度，并且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利己主义；对于保守派来说是革命的，对于革命派来说却是保守的；不相信自己的口号，用空谈代替思想，害怕世界大风暴，同时又利用这

---

<sup>①</sup> 弗里德里希·亨利希·恩斯特·弗兰格尔(1784—1877)，普鲁士将军，元帅，反动分子。——译注

<sup>②</sup> 《马恩全集》，第5卷，第500页，第6卷，第19、224页。

<sup>③</sup> 同上书，第6卷，第164页。



个大风暴来谋私利；毫无毅力，到处剽窃；因缺乏任何独特性而显得平庸，同时又因本身平庸而显得独特；自己跟自己讲价钱；没有首创精神，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没有负起世界历史使命，活象一个受诅咒的老头子，注定要糟蹋健壮人民的最初勃发的青春热情而使其服从于自己晚年的利益，**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牙齿，衰颓不堪**——这就是普鲁士资产阶级在三月革命后执掌普鲁士国家政柄时的形象”。①（着重号系本书作者所加。）

这叫人联想到扎克斯关于人的七个时期的言论，以及其中那个掌握历史命运的瘦弱、穿便鞋的傻老汉的吓人的形象，这就使这整段文字有了出色的衬托。

对于读过马克思所引用的关于人的七个时期的言论的人来说，这里使他对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指控增添了一种重要的色采；但是他的指控，甚至对于那些不能领会他的引喻的人来说，也产生强烈的印象。这是重要的一点，因为马克思现在希望那些没有受过他那种教育的人也能理解并注意他。他的《雇佣劳动与资本》起先是对布鲁塞尔工人所作的一系列演说，后来才在1849年4月份的《新莱茵报》上发表。这一著作一开头就明确提到这一点，马克思告诉他的读者说：“我们希望工人能明白我们的解说。”②但是，甚至当他不象他在别的许多报刊文章中所做的那样有意识地放出文学火花时，他仍然禁不住潜意识地引证了一些他所喜爱的文学作品。下面摘引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中的一节就提供了这样一个例子：

“可是，劳动是工人本身的生命活动，是工人本身的生命活动的表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127页。（参见莎士比亚：《皆大欢喜》第二幕第七场，莎翁的原话是“没有牙齿，没有眼睛，没有口味，没有一切。”——译注）

② 同上书，第474页。

现。工人正是把这种**生命活动**出卖给别人，以获得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可见，工人的生命活动对于他不过是使他能以生存的一种**手段**而已。他是为生活而工作的。他甚至不认为劳动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相反地，对于他来说，劳动就是牺牲自己的生活。劳动是已由他出卖给别人的一种商品。因此，他的活动的产物也就不是他的活动的目的。工人为自己生产的不是他织成的绸缎，不是他从金矿里开采出的黄金，也不是他盖起的高楼大厦。他为自己生产的是**工资**，而绸缎、黄金、高楼大厦对于他都变成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也许是变成棉布上衣，变成铜币，变成某处地窖的住所了。一个工人在一昼夜中有十二小时在织布、纺纱、钻孔、研磨、建筑、挖掘、打石子、搬运重物等等，他能不能认为这十二小时的织布、纺纱、钻孔、研磨、建筑、挖掘、打石子是他的生活的表现，是他的生活呢？恰恰相反，对于他来说，在这种活动停止以后，当他坐在饭桌旁，站在酒店柜台前，睡在床上的时候，生活才算开始。在他看来，十二小时劳动的意义并不在于织布、纺纱、钻孔等等，而在于这是**挣钱**的方法，挣钱使他能吃饭、喝酒、睡觉。假如说蚕儿吐丝作茧是为了象一个毛虫那样维持自己的生存，那末它就可算是一个真正的雇佣工人了”<sup>①</sup>。

160

蚕的形象会使受过教育的德国读者产生一种联想，从而更增加马克思的论据的力量，使人联想到歌德的《托尔夸托·塔索》中那位与书名同名的主人公对于一位真正诗人的生活方式所作的描述，那种生活方式是人不是单单为了维持生存才工作：

“在我内心日夜变化的这一冲动，

<sup>①</sup>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477—478页。（原书所引英译文末一句中的“象一个毛虫那样”几个字，全集中译本中无。——译注）



我无法抑制。

如果我不是在思考或写作，

那么生活对我来说就不再是生活。

当蚕儿把自己织向死亡的时候，

你去禁止它织吧。

它从内心深处想织出这珍贵的网，

而毫不停息，

直到它把自己缠到他的棺材里面。

哦，一位善良的上帝将来也要赐给我们

这值得羡慕的昆虫的命运：

迅速和欢乐地在新的阳光照耀的峡谷里

展开它的翅膀！”<sup>①</sup>

- 161 记得《托尔夸托·塔索》这一节的人们，会发现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描述又增加了新的一面——一个对立的形象：工作如何不再成为自我发现和自我创造的行动，伟大的诗篇在这方面既能给予例证又能给予象征。

应当顺便指出，《雇佣劳动与资本》只是一篇更长的未发表的分析文章的一部分，这篇文章分析了马克思心目中的市场经济在十九世纪所发挥的作用：

“第一，由于这一点，一切宗法制的东西都消失了，因为只有商业即买卖才是唯一的联系，只有金钱关系才是企业主和工人之间的唯一关系。第二，旧社会的一切关系一般脱去了神圣的外衣，因为它们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

<sup>①</sup> 歌德：《托尔夸托·塔索》，第五幕，第二场。

同样，一切所谓最高尚的劳动——脑力劳动、艺术劳动等都变成了交易的对象，并因此失去了从前的荣誉。全体牧师、医生、律师等，从而宗教、法学等，都只是根据他们的商业价值来估价了，这是多么巨大的进步啊！”<sup>①</sup>

艺术家和艺术同样被贬损，这一点在马克思的文章里又是一个令人高兴的原因——这样的一种贬损或残毁可以使人们确信，目前的情况是使人失去人性和不可容忍的，因此就成了变化的动因。

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大都写得很好，并且卓有成效和毫不夸张地使用了修词学的各种手法，形象，韵律的变化和文学引喻。至少有一篇文章，即1848年6月29日写的那篇文章，是和《共产党宣言》本身同样有力的一篇德国散文<sup>②</sup>。这就给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经常发表的对于文体方面的批评带来了力量和说服力。这种对于文体方面的批评包括：对于字句上的混乱和误译的批评<sup>③</sup>，对于语法上的不当的批评<sup>④</sup>，对于臃肿而笨拙的句子的批评<sup>⑤</sup>，对于浮夸的空话和陈词滥调的批评以及对于那些陶醉于自己的废话的人所讲的昏话的批评<sup>⑥</sup>；还有对于敌对的报纸编辑在写装腔作势的散文时无意中搞出来的诗体韵律的批评<sup>⑦</sup>。这也给《新莱茵报》创刊号上对法兰克福议会中的发言者所进行的指责带来了力量：“这个会议不是引导德国人民或者接受德国人民的引导，而是废话连篇，使人民感到厌倦……到现在为止，国民议

162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659—660页。

② 同上书，第5卷，第153—157页。

③ 同上书，第6卷，第272、269页。

④ 同上书，第179页。

⑤ 同上书，第134、236页。

⑥ 同上书，第311页。

⑦ 同上书，第311页。



会连革命运动的回声也够不上，更不用说是革命运动的中央机关了。”<sup>①</sup>马克思在这里对政治修辞学所表现出来的兴趣——对那种卓有成效地表达并引导人民的思想 and 感情的艺术所表示的兴趣，他此后终生都一直保持不变。

《新莱茵报》在政治论辩中经常采用文学分析的手法，同时它也把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辞汇用之于政治事件。戏剧和舞台演出的隐喻是常见的<sup>②</sup>。把康普豪森说成好象写过一篇“史诗”并且为自己作出赞美歌；《科伦报》的政治通讯员用哀歌体和高尚的抒情体写作；比利时和瑞士的社会情况，在马克思看来，则是“大历史画中的两幅悲喜剧式的、漫画式的世俗画”<sup>③</sup>。后一个例子清楚地表明，文学批评中的分类可以同美术批评的词汇相结合。

最后，《新莱茵报》抓住阿尔丰斯·德·拉马丁的政治经历所提供的机会来仔细分析一个浪漫主义作家在他祖国的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结果并不鼓舞人心。早在1847年12月，马克思就指责过拉马丁对历史的发展具有天真混乱的观点。他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写道：

“拉马丁先生提出，所有制根本就是从野蛮状况到文明状况的过渡阶段，并解释说，所有权是进行呼吸和生儿育女过程的先决条件，同样也是社会现存的私有财产的先决条件。他以为这样就证实了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万古长存。

拉马丁先生正象没有看到‘占有’空气和‘占有’社会产品之间的差别一样，没有看到从野蛮过渡到文明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之间的区别；就象两个时代都是‘过渡时代’一样，反正两者都是‘占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46页。

② 同上书，第113、496、542页；第6卷，第84、131、306、588页。

③ 同上书，第65页；第6卷，第310、474页。

有’！

毫无疑问，拉马丁先生在他那反对共产主义的‘充分的’论战中一定会发现有可能从他的‘感觉’所产生的这些一般词句里‘合乎逻辑地’引伸出一系列更为一般的词句。那时，也许我们也有可能来‘更加充分地’研究他的词句”。①

现在，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考察了拉马丁在1848年临时政府中担任了短暂的、有力的、但不光采的职务之后所发生的事情。“二月革命的最后一点正式的残余物——执行委员会——已象幻影一样在严重事变的面前消散了；拉马丁的烟火变成了卡芬雅克②的密集的炮火。”③几个月之后，在1848年10月22日，马克思再次谈到拉马丁，这时已把他看成是一个资产阶级幻想的体现，在这之后除了幻灭之外什么都不可能发生：

“拉马丁体现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对自己的幻想，体现了它所编造的关于自己的夸大的、虚幻的、热烈的想象，体现了它关于自己的伟大的幻想。有什么不可以想象的呢！象从自己的皮囊中放出风来的埃俄罗斯④一样，拉马丁也解开了自己的袋囊，放出了一阵风，轻轻地一吹就把一切空中的幽灵、一切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漂亮话——一切民族友好团结、法国会使一切民族获得解放、法国为维护一切民族的利益而自我牺牲等等轻浮的词句吹向东方和西方。

可是他做了些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做！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19页（1847年12月26日）。

② 路易·欧仁·卡芬雅克（1802—1857），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1848年5月起任法国陆军部长，镇压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曾为政府首脑（1848年6—12月），在第二共和国时期和1851年12月2日政变以后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政府。——译注

③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153—154页。

④ 埃俄罗斯，希腊神话中的风神。——译注



卡芬雅克及其对外工具巴斯蒂德<sup>①</sup>用行动补充了拉马丁的漂亮话。”<sup>②</sup>

在这个意义上，“带有虚幻的光辉的”拉马丁乃是“适应时势的真正大丈夫”(der wahre Mann der Situation)。<sup>③</sup>在《新莱茵报》上，马克思一再回顾1848年革命异常欣快的时期；而且为了向他的德国读者描述把拉马丁卷入政界的那些希望，马克思引用了席勒那首经贝多芬配乐之后传遍全欧的《欢乐颂》：

“从来还没有一次革命运动象1848年的革命运动这样以如此动人的序曲开始。罗马教皇给1848年的革命运动以宗教的祝福，拉马丁的风神之琴轻轻地奏出了优美慈爱的曲调，歌唱了所有社会成员和各族人民的《fraternité》——手足情谊。

‘拥抱吧，亿万人民！  
普天之下共亲吻’。

现在，被赶出罗马的教皇在残暴的白痴斐迪南的保护之下稳坐在加埃塔；这个意大利的 *iniziatore* [“倡议者”] 正在运用计谋，伙同他在自己的黄金时代曾以开除教籍相威胁的、意大利历来的死敌奥地利来反对意大利。不久前在法国举行的总统选举，对于叛徒拉马丁的不得人心作了统计学上的证明。没有比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更仁慈、更人道和更软弱的事变了；没有比这种软弱性

---

① 茹尔·巴斯蒂德(1800—1879)，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资产阶级共和派报纸《国民报》的编辑之一；曾任外交部长。——译注

② 《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516页。

③ 同上书，第5卷，第532页。

的人道主义的必然后果更残酷的东西了。意大利、波兰、德国和首先是在六月战败的那些人们就是证明。”<sup>①</sup>

席勒的梦、贝多芬的梦和“叛徒拉马丁”的梦在权力的现实面前都同样地幻灭了。《新莱茵报》得出结论说：“正象法国已经没有拉马丁一样，意大利再也没有 Pio nono [庇护九世]了。充满幻想的欧洲革命时期，富于遐想、良好愿望和华丽词藻的时期，在炮击、大屠杀和流放中庄严地结束了。奥地利的照会、普鲁士的照会、俄国的照会是对拉马丁的呼吁的最适当的回答。”<sup>②</sup>

因此，在革命的年代里，马克思在他当时已开始认为是阶级斗争的事业中，继续通过引喻、引文和潜意识的联想，把他所赞赏的作家当作武器。他曾专门到四十年代初期的海涅作品中去寻找材料，那是精辟简洁、机智、战斗和嘲讽的措辞用语的一个非常宝贵的源泉。他对海涅的敬佩由于他对海涅的个人品德的日益增长的怀疑而受到削弱，尽管他对海涅日益恶化的健康的怜悯使这一点没有继续发展下去。另一位诗人使他感到更严重的失望，那就是他早年的同盟者格奥尔格·海尔维格在政治活动中清楚地表现出性格上的弱点。但是新的同盟已经形成，那就是同格奥尔格·维尔特，同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的同盟。他们对日益成长的无产阶级的同情似乎可以同马克思自己的同情相比。这些人的对立面是拉马丁。在马克思的心目中，拉马丁是浪漫主义的资产阶级幻想的体现；他的人格和他的事业加在一起，对马克思来说，可以当作一部教科书那样来说明欧洲浪漫主义的政治性质。马克思认为这种浪漫主义是在一层美丽的词藻下掩盖着物质利益、利己主义和阶

165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173页。

② 同上书，第369页。



级斗争的一切平凡的或野蛮的伴随物。这些词藻的作用就是把人们诱入无所作为的境地；使这些人同意压迫和剥削，否则这些人就将会把它们清除掉。但是马克思相信，时代的逻辑对拉马丁之流的人物是不利的。在他看来，资产阶级表现得太露骨了，竟然把诗人和诗也拖到市场上去，这样就在抹杀诗人和诗的光辉方面做得太过分了。对文学的蔑视因此可以变成正如米哈依·里弗希兹所说的那样一个“有力的革命因素”；马克思在现代社会中所发现的艺术衰落，“甚至从艺术本身的观点来看”，也可以被认为是“进步的”<sup>①</sup>。

特别是，在马克思看来，同文学的命运不可避免地联系起来的经济发展，正在朝着产生世界文学的方向前进。看到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新莱茵报》上的文学引喻方面的证据，人们可以说，世界文学的时代在重要的意义上来说已经到来了。它已经存在于马克思的头脑之中，马克思的头脑正是许多世纪和许多国家的文学经验和回忆的一个宝库。

---

<sup>①</sup> 米哈依·里弗希兹：《卡尔·马克思的艺术哲学》，英文版，1933年，第100、101页。

### 俾克史涅夫、克勒维尔和 克拉普林斯基的王国

“资产阶级的‘天才人物’已经趋于没落”<sup>①</sup>

#### (1)

普鲁士当局既然已把革命置于自己控制之下，不能指望它会容许《新莱茵报》毫不受限制地开展活动。1849年5月，报纸遭到了镇压——它的最后一号（这一号的第一篇就是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执笔的一首抗议的诗）完全是用红色油墨印的——而马克思本人也被逐出了普鲁士。他先是去巴黎；但是当他得知法国当局准备只许他住在首都以外布列塔尼的一个不适于健康的地方时，他便决定迁到伦敦去。因此，在1849年8月，马克思来到英国，9月他的一家随后也到了英国。从那时起直到他去世，伦敦就成了他一家的住地。

在接踵而来的贫困交加的一年里，他首先关心的是把他被普鲁士政府打断了的事业继续下去。他想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英国成员和从德国流亡的成员取得接触，创办了一个月刊，希望通过这个月刊把《新莱茵报》的政策固定下来并继续下去。他甚至给这个月刊起了同样的名字，只是加上了政治经济评论的字样，即《新

<sup>①</sup> 《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00页。



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由于《评论》不能顺利地在德国发行,所以维持了不到一年;然而在这期间,它却发表了一些重要的文章,如恩格斯有关德国农民战争的研究,马克思从他在伦敦的有利地位对法国政局所作的第一个严厉的评述。这就是《法兰西阶级斗争》(Die Klassenkämpfe in Frankreich)。在马克思的一生当中,他从法国的政局取得了好些教训,给后来的革命者以教益和帮助。

发表在1850年1月、2月和3月<sup>①</sup>的《评论》上的这一著作中的主要形象是剧场或舞台的形象;在这样一个地方,马克思创造出无数的变化:

“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最高贵的舞台上同样公开地表演那些通常使流氓无产阶级进入妓馆、残废院和疯人院,走上被告席、苦役所和断头台的丑剧……”<sup>②</sup>

“顷刻间,官方的舞台:布景、服装、台词、演员、配角、哑角、提词员、剧本主题、冲突内容和整个局面——全都变样了”。<sup>③</sup>

有些演员,如阿尔芒·马拉斯特,<sup>④</sup>“从舞台上消失了”;另一些演员,如路易·拿破仑,则“把自己摆在顶层楼座的观众面前示众”。有一些突然扣人心弦的情节急转,例如1848年临时政府被

<sup>①</sup> 《评论》,德文版,第23—38、73—93、127—148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7—125页。

<sup>②</sup>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5页。

<sup>③</sup> 同上书,第54页。(译文略有改动。——译注)

<sup>④</sup> 阿尔芒·马拉斯特(1801—1852),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的领袖;1848年为临时政府成员和巴黎市长,制宪议会议长。——译注

剥夺了它的现金的那一次。演员们扮演了不同的角色：王位上的路易·菲利浦<sup>①</sup>扮演了罗伯尔·马凯尔<sup>②</sup>（本杰明·安蒂耶和弗烈德里克·勒美特尔在他们的剧作《罗伯尔和贝尔特朗》〔1834年〕中所创造的一个阴险的人物）；在离开王位后，他又同样成功地扮演了“一个羞答答的乞丐的角色。”路易一拿破仑本人扮演了最不光采的角色：“一个肮脏人物”、“一个傀儡”，一个小丑（Hanswurst）<sup>③</sup>；而且据说他需要一批用钱雇来的捧场喝采者，以避免被人们嘘下舞台。至于法国农民——“他们曾在一瞬间扮演了革命剧中的登场人物，此后就再也不能强迫他们充当合唱队的无所作为的消极角色了”。<sup>④</sup>角色改变得如此之快，混乱是如此之严重，甚至观众也被卷入戏剧里去了：“法国社会中所有各个阶级都突然……被迫离开包厢、正厅和楼厅而走上革命舞台去扮演各种角色！”<sup>⑤</sup>。

《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所描述的政治舞台上正在表演的那几出戏的性质，我们不久就清楚了。在偶然的情况下，例如当农民放弃了合唱队的角色时，戏就郑重一些；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它至多也只是接近“悲喜剧”，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则是“可耻的闹剧”、三流的戏法或者是妖魔鬼怪的毫无意义的闹剧。过去的伟大剧作家经常被召唤来，使人联想到这些政治和社会表演的气氛。路易·

168

① 路易一菲利浦（1773—1850），奥尔良公爵，法国国王。——译注

② 罗伯尔·马凯尔是法国名演员弗烈德里克·勒美特尔同剧作家安蒂耶和圣-阿芒合写的社会喜剧中的一个狡诈奸商的典型，他的形象是对七月王朝时期金融贵族统治的讽刺。——译注

③ 马克思写道，“那末假拿破仑则以为，士兵高喊‘拿破仑万岁，腊肠万岁！’，即‘腊肠万岁，小丑万岁！’就是向他表示感谢。”（见《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23页。）这里是文字游戏，“腊肠”的原文是“Warst”，“小丑”的原文是“Hanswurst”。——译注

④ 《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50页。

⑤ 同上书，第18页。



勃朗<sup>①</sup>的不幸的国家工场立刻使人联想到莎士比亚的《错误的喜剧》和西班牙的“仆人的喜剧”。当“秩序党”占了上风的时候，马克思就要他的读者记起由波顿和他的朋友们所表演的“皮拉摩斯和提斯柏的……可悲的喜剧”<sup>②</sup>：“1849年6月，并不是雇佣劳动同资本间表演着的流血悲剧，而是债务人与债权人所表演的一出包藏有牢狱之灾的可怜的戏剧”。<sup>③</sup>法国共和党人的行动使人们想起了莫里哀（“不得已的共和党人的这一喜剧”）而奥迪隆·巴罗<sup>④</sup>则从自己的脑袋中挤出“堪与博马舍的机智相比的机智珍珠”。

然而，当马克思考虑法国的场面时，最强烈地出现在他的头脑之中的文学形式是那种拙劣的模仿的形式。“正如带着蛊惑家姿态和借用着1793年辞句的山岳党（新议会的），是对于旧山岳党的一种拙劣的模仿一样，打着皇帝鹰旗和戴着三角帽的路易一拿破仑，也是对于老拿破仑的一种拙劣的模仿。”<sup>⑤</sup>我们记得，海涅也常常在观看舞台上的拙劣的模仿时体验过这种感觉，这最有力地表现在《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的巴尔巴罗萨（红胡子）章节里：

“赶走那帮流氓小丑，  
把那些戏园子都关闭，

---

① 路易·勃朗（1811—1882），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历史学家，1848年临时政府成员和卢森堡委员会主席；1848年8月流亡英国，在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导人之一，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反对巴黎公社。——译注

② 见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第一幕，第二场。波顿是剧中的织工，演的戏名是《最可悲的喜剧，以及皮拉摩斯和提斯柏的最残酷的死》。皮拉摩斯和提斯柏的故事见奥维德《变形记》第4章。——译注

③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73页。

④ 奥迪隆·巴罗（1791—1873），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1848年2月以前是自由主义的王朝反对派首领，1848年12月至1849年10月领导为各个保皇集团的反革命联盟所支持的内阁。——译注

⑤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52页。

他们在那里效仿远古——

你快点来吧，啊皇帝！”<sup>①</sup>

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评论》上眺望德国的时候，他们看到的不仅是拙劣的模仿，而是拙劣的模仿的拙劣的模仿：

“年迈的阿伦特<sup>②</sup>提出过‘什么是德国人的祖国？’的问题，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回答说：‘爱尔福特’。写出一部模拟《伊利亚特》的《老鼠与青蛙之战》<sup>③</sup>并不十分困难，但是迄今还没有人甚至敢打算模仿《老鼠与青蛙之战》。而现在有人却用爱尔福特计划巧妙地模仿了法兰克福议会这场老鼠与青蛙之战。”<sup>④</sup>

169

怪不得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不仅谈到了拙劣的模仿，而且经常自己也在模仿：“扫罗—卡芬雅克获得了一百万选票，而大卫—拿破仑却获得了六百万选票……”<sup>⑤</sup>。

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提出了他试图加以区分的法国知识分子同资产阶级和其它阶级及附属集团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谈到了“学者、律师、医生等等”当中的天才人物或权威，即 *Capacitäten* 并且把这些人描写为各个阶级的“思想代表者

---

① 《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17章最末一节。（中译文引自冯至译《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99页。——译注）

② 恩斯特·摩里茨·阿伦特（1769—1868），德国诗人，反抗拿破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参加者。——译注

③ 《老鼠与青蛙之战》，古希腊的喜剧诗。——译注

④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55页。

⑤ 同上书，第49页。（扫罗——据圣经传说，是第一个以色列王；大卫——据圣经传说，以色列王同非利士人作战，遇大汉歌利亚，军中无人能胜他，大卫自请出战，击杀歌利亚。后大卫继扫罗为以色列王。——译注）



和维护者”<sup>①</sup>，他们并不单单满足于自己可以对路易-菲力浦的法国施加政治影响这一方面。后来马克思很自然地回到了拉马丁这一主题和他卷入1848年事件的问题。马克思逐字逐句地重复了他在《新莱茵报》上发表过的对拉马丁的攻击<sup>②</sup>，但是这一次他试图更精确地陈述他如何看待拉马丁同十九世纪中叶法国各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

“最后，拉马丁在临时政府中本来是不代表任何现实利益，不代表任何一定阶级的；他体现了二月革命本身，体现了这次总起义及其幻想、诗意、臆想的内容和辞句。可是，这个代表二月革命的人物，按其地位和观点看来是属于资产阶级的。”<sup>③</sup>

因此，拉马丁在建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中所扮演的角色乃是一个不祥的角色。马克思认为，落在拉马丁身上的任务是散布那种不存在阶级斗争的幻想，以便哄骗那些注定会牺牲在这一战争中的人们，使他们错误地感到安全。

170 “由巴黎工人创造出来的卢森堡委员会终究有一个功劳，这就是它从欧洲讲坛上揭露了19世纪革命的秘密：**无产阶级的解放**。《通报》当不得不正式宣传一些‘荒诞呓语’时弄得面红耳赤，这些‘荒诞呓语’原先是埋藏在社会主义者的邪书里，只是间或作为一种又可怕又可笑的遥远的奇谈传进资产阶级的耳鼓。大惊失色的欧洲忽然从它那资产阶级性的假寐中觉醒过来了。于是，在把金融贵族和一般资产阶级混为一谈的那些无产者的观念里，在根本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3页。

② 同上书，第35页。

③ 同上书，第17页。

就否认有阶级存在或至多也只认为阶级不过是君主立宪制产物的那些共和主义笨伯的想象里，在先前被拒于政权之外的那些资产阶级阶层的甜言蜜语里，——资产阶级的统治已随着共和国的成立而被排除了。这时，一切保皇党人都变成了共和党人，巴黎所有百万富翁都变成了工人。与阶级关系这种想象的消灭相适应的辞句，就是fraternité——普遍的和睦与博爱。这样轻松地抹杀阶级矛盾，这样温柔地调合对立的阶级利益，这样痴心妄想地超越阶级斗争，一句话，博爱——这就是二月革命的真正口号。只是由于纯粹的误会才使社会分裂成了一些阶级，于是2月24日拉马丁就把临时政府叫做«un gouvernement qui suspende ce malentendu terrible qui existe entre les différentes classes»〔“消除各阶级间所存在的可怕误会的政府”〕。巴黎无产阶级就沉醉在这种厚道的普遍博爱气氛中了。”①

其他法国文人在1848年和1849年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根本不能指望来增加马克思对于他们的政治见解，对于他认为他们所起的思想作用产生敬意。维克多·雨果对拿破仑第三的激烈反对还是后来的事情，当时他却被斥之以allons donc! (滚开!)②，而欧仁·苏之出现于政治舞台则被视为对革命进展的一个讽刺：

“最后，温情的小市民的社会幻想家欧仁·苏被提名为候选人这件事，完全使3月10日选举失去了革命意义(其意义在于恢复六月起义的声誉)；无产阶级至多不过把这件事看成是献媚于轻佻女郎的玩笑。”③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2—23页。

② 同上书，第87页。

③ 同上书，第115页。



171 法国政府后来提出一项出版法，规定对发表在报刊上的那些通俗小说课以印花税，欧仁·苏就是由于这种小说而获得名利的，这一点在马克思看来，对于欧仁·苏之被提名和选入议会恰好是一个讽刺的回答。

马克思对于诗人和小说家在十九世纪中叶法国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冷静观察，使他并不急于让自己的读者和赞美者轻易地把他同那些在浅薄的人看来是站在他一面的德国文人混为一谈。这一点有助于解释那篇发表在《评论》4月号上题为《哥特弗利德·金克尔》<sup>①</sup>的文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篇文章里对标题里的那位感伤而雄辩的诗人采取疏远的态度；尽管对于这位在失败的德国革命中表现了不怕肉体上受苦的勇敢的诗人，恩格斯在1849年7月25日给燕妮·马克思的信中曾经给予赞扬。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时宣称：

“我们早已料到，我们在我们党的面前揭露‘被俘’的金克尔的这篇辩护词，会惹起所有温情的伪善者和民主主义清谈家的忿懣。这一点我们是毫不在乎的。我们的任务是无情的批判，而这种批判与其针对公开的敌人不如针对伪装的朋友；为了坚持我们的这种立场，我们情愿放弃在民主派当中的廉价的荣誉。”<sup>②</sup>

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样一条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这条道路在两年后引导他们在《流亡中的大人物》中对金克尔和他的一班

---

<sup>①</sup> 哥特弗利德·金克尔(1815—1882)，德国诗人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后流亡，伦敦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曾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译注

<sup>②</sup>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51页。

人发动了攻击。

未被列入革命行列的作家当然也受到了批判。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各自在《评论》上发表的文章难以明确区分)通过分析弗里德里希·道梅尔所喜爱的那种文学，所引用的那种权威著作，所写的那种散文而对这个诗人、学者和翻译家作了描述；他们通过这种办法创造了一个尼采后来称之为“Bildungsphilister”(受过教育的德国庸人)的讽刺形象<sup>①</sup>。在这里以及别处，马克思使用的词是 Spiessbürger (小市民阶级)，这个词还能使人联想到小资产者和腐朽人物。马克思告诉我们，这类人物闭目不看能迫使他们去面对现实世界的现代科学知识，却给自己创作一首农村田园诗歌。在这里，马克思发现他有理由来嘲笑巴伐利亚农村的落后(“僧侣和道梅尔<sup>②</sup>之流都同样可以滋生的土壤”) <sup>③</sup>，并蔑视地看一眼那种日益受欢迎的文学类型。这就是“Dorfgeschichte”或农村小说，而它的最渊博的(并且是最不严峻的)代表人物竟是在前面一章中遇到的莫泽斯·赫斯的朋友，即德国犹太作家贝特荷尔德·奥尔巴赫。马克思讥笑道梅尔“对于……使他不能安心研究穆罕默德·哈菲兹<sup>④</sup>和贝特荷尔德·奥尔巴赫<sup>⑤</sup>的新斗争感到恐惧。……道梅尔先生在逃避威胁他的历史悲剧，求救于所谓的自然，即笨拙的农村田园诗歌。”<sup>⑥</sup> 马克思从来不能十分容忍那种在

172

---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36页。

② 弗里德里希·道梅尔(1800—1875)，德国作家和哲学家，著有一些有关宗教史的著作。——译注

③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41页。

④ 沙姆谢丁·穆罕默德·哈菲兹(约1300—1389)，波斯大诗人，塔吉克文学的古典作家。——译注

⑤ 贝特荷尔德·奥尔巴赫(1812—1882)，德国自由派作家，后为俾斯麦的辩护士。——译注

⑥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39、240页。



文学上企图描绘一种田园诗式的乡村生活的做法。他同布鲁诺·鲍威尔在伦敦重新会见时，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里说，听到鲍威尔把德国农民浪漫化时感到惊讶；他回顾说，听到这个“批判的批判家”默认“批判的批判主义”最后归结在贝特荷尔德·奥尔巴赫身上时，他感到多么奇怪啊<sup>①</sup>。

道梅尔之流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看来就是创造这种骗人的田园诗；马克思认为这类作品的衰落没有什么可悲：

“如果说以前的阶级，例如骑士阶级的没落能够为悲剧艺术的巨著提供材料，那末小市民阶级(Spiessbürger)当然就只能表现出穷凶极恶的软弱态度和提供一些桑丘·潘沙式的格言和谚语的集录。<sup>②</sup>

于是，就在受到威胁的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同骑士阶级悲剧的没落之间形成一个可悲的对比。但是，即使人们把道梅尔同更早的一个德国小市民阶级(Spiessbürger)相比，例如同马克思决不用瓦格纳的敬佩眼光看待的鞋匠诗人汉斯·萨克斯<sup>③</sup>相比，这种比较对道梅尔也是不利的：“道梅尔先生是枯燥乏味的失去了一切幽默的汉斯·萨克斯的后继。”<sup>④</sup>

不能不注意到，在马克思力图描述道梅尔式的庸人习气时，他再一次借用了塞万提斯的名著中桑丘·潘沙的形象。

---

① 1855年12月14日，1856年1月18日和2月12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参阅《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464—466页；第29卷，第5—7、11—15页。

②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42页。

③ 汉斯·萨克斯(1494—1576)，十六世纪德国诗人，本是一个鞋匠，他站在小市民的立场上描绘了他那时代的一些现象，反映出一般的社会生活，但缺乏远大理想，有时流于庸俗。——译注

④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42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最近的一份德国出版物当作德国资产阶级文化生活的一个文献加以讨论之后，又在自己周围寻找法国和英国的类似的代表性作品。他们找到了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约姆·基佐的一个小册子，这个小册子给他们一种舒适的感觉，好象不仅国王们，而且还有资产阶级的天才人物都正在滚蛋——“*In der Tat, nicht nur les rois s'en vont, sondern auch les capacités de la bourgeoisie s'en vont*”〔其实，不但国王要滚蛋，而且资产阶级的天才人物也要滚蛋〕<sup>①</sup>。而在讨论完基佐之后，他们又写了一篇文章评述卡莱尔的《当代评论》。他们对卡莱尔抱有三重兴趣。恩格斯早年曾从他的作品中学到好多东西——当然，特别是从《过去和现在》一书，他并且鼓励马克思读卡莱尔的作品（并作笔记）。马克思最初定居在英国时，大量阅读并讨论过卡莱尔的作品，而且《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着重指出卡莱尔表现为“唯一直接接受了德国文学极大影响的英国作家”<sup>②</sup>。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读《当代评论》的头两篇文章之后，发现他们对于基佐的文章的诊断得到了充分的证实。他们重复说：“资产阶级的‘天才人物’已经趋于没落”。<sup>③</sup>现在他们就试图在卡莱尔早期和较好的作品中寻找这一衰落的线索，并且在卡莱尔的浪漫主义中、在他那种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向后看的反对态度中找到了这些痕迹<sup>④</sup>。他们嘲笑卡莱尔相信“永恒的”自然规律；在他们看来，这一点使他看不到阶级斗争的现实并且使他按照《魔笛》<sup>⑤</sup>的简单道德去看待他当时的生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53页。

② 同上书，第300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书，第300—301页。

⑤ 《魔笛》是莫扎特利用爱·施卡奈德尔的歌词谱成的歌剧。歌剧以童话的形式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谁真正理解自然界蕴藏的力量，并始终按照它的规律行事，谁就会得到好报，而恶人则会得到恶报。——译注



活<sup>①</sup>。他们嘲笑他的英雄崇拜，因为这种崇拜使他把不公正和压迫看成是天才的标记<sup>②</sup>。他们指责他无知和不诚实：“高贵的有学问的聪明人实际上怎样变为庸俗的愚昧无知的蠢人，关于这点卡莱尔本人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凌空飞翔的高贵气概一旦从格言和词藻的天国堕入现实关系的尘世时，如何立即变成了露骨的卑劣行为。”；“爱发高论的天才……在他的救世义愤之下荒唐地维护甚至加深资产者的一切丑恶”<sup>③</sup>。

174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卡莱尔的道德和逻辑中所看到的衰落——人们事后会认识到这种衰落是不可避免的——在他们看来，可以同他的文体的衰落相媲美：

“卡莱尔的风格也和他的思想一样，它和现代英国资产阶级的俾克史涅夫<sup>④</sup>式伪君子的风格是针锋相对的；后者高傲浮夸而又萎靡不振、冗长累赘、数不尽的温情劝善的忧虑；这种风格已从它的首创者有教养的伦敦人那里传到整个英国文学界了。和这种文学相反，卡莱尔开始把英语完全当成一种必须彻底加工的原料。他重新搜集古字古语，并依照德语的方式，例如照让·保尔的格式创造新的表达法。这种新风格往往夸张而乏味，但是却又往往绚烂绮丽，永远独特新颖。不过《当代评论》在这方面却表现了明显的退步。

在德国文学的所有代表人物中影响卡莱尔最深的不是黑格尔，而是文学的药剂师让·保尔，这倒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sup>⑤</sup>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07页。

② 同上书，第301页。

③ 同上书，第308、309、311页。

④ 俾克史涅夫是英国著名小说家查理·狄更斯的小说《马丁·朱述尔维特的一生》中的建筑师与狡黠的伪君子。——译注

⑤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01页。

这一节有四个特点值得注意。第一，一位伟大的小说家狄更斯的作品如何被利用来作为一种说明特征的速记法：“俾克斯涅夫式”一词就可以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无需再费笔墨去描述一种社会类型的语言和生活方式。他们似乎对他们的读者说：“读你们的鲍兹<sup>①</sup>，你们就会懂得的”。第二，如何联系一个作家所敬佩和模仿的另一个作家的性格而确定前者的性格，让·保尔·弗里德里希·里希特就有助于“确定”卡莱尔的地位。第三，〈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在这里和别的地方，力图把作家看成是代表性人物，甚至当作家断言自己反对他们的阶级和他们的时代时，也还是把他们看成是那一阶级和那一时代的代表性人物。卡莱尔在他的作品中有意识说出来的话，应该联系他无意识透露出来的东西一齐加以观察。最后，literature不光是小说、剧本和诗歌这类东西，黑格尔的作品作为 Literatur 的一部分决不次于让·保尔的作品。哲学家决不次于小说供应者。实际上，〈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早对那些认为消化了自己国家的文学之后就完成了自己的教育的人进行了嘲笑：“运用黑格尔辩证法总比引用席勒的诗要困难些。”<sup>②</sup>

但是，应当记住，马克思认为是卡莱尔的“衰落”的东西，在他看来，并没有贬低卡莱尔的见识。后来在1870年，他就曾想到卡莱尔的一句讽刺话，以此来嘲讽地看待普鲁士的“漂亮的威廉”，此人不久就成了新统一的德国的统治者威廉一世：“老卡莱尔说过，当上帝想创造某种伟大的业绩时，他总是挑选最愚蠢的人去干。”六年之后，我们发现他又在读卡莱尔的著作（这次引起他的兴趣的是

175

<sup>①</sup> 鲍兹是狄更斯的笔名。1833年以来他用这一笔名发表了〈特写选集〉（两卷本）和〈匹克威克外传〉。——译注

<sup>②</sup>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44页。



《奥里弗·克伦威尔<sup>①</sup>的书信和演说》);帕美拉·汉斯佛德·约翰逊<sup>②</sup>的看法很有道理,她认为马克思自己的文体不会完全不受恩格斯首先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让他注意的、后来又不断研究的这个作家的影响。<sup>③</sup>

在伦敦短时期继续出版的《新莱茵报》上发表的另一篇书评,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使我们能够深入了解马克思的文学艺术观点。这就是他对两个法国警察局密探阿道夫·谢努和律西安·德拉·奥德的回忆录的评论,评论一开头就引人注目地把“伦勃朗式”<sup>④</sup>和“拉斐尔式”<sup>⑤</sup>描绘人物的方式作了一个对比:

“如果用伦勃朗的强烈色彩把革命派的领导人——无论是革命前的秘密组织里的或是报刊上的,或是革命时期中的正式领导人——终于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来,那就太理想了。在现有的一切绘画中,始终没有把这些人物真实地描绘出来,而只是把他们画成一种官场人物,脚穿厚底靴,头上绕着灵光圈。在这些形象被夸张了的拉斐尔式的画像中,一切绘画的真实性都消失了。”<sup>⑥</sup>

---

① 奥里弗·克伦威尔(1599—1658),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的领袖,1649年起为爱尔兰军总司令和总督,1653年起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摄政。——译注

② 帕美拉·汉斯佛德·约翰逊(1912—),当代英国女小说家与文学评论家,著有《普洛斯特的六个设想》(1958)、《卑微的创作》(1960)与《一种错误的评断》(1962)等作品。——译注

③ 1870年8月8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载《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33页;马·鲁贝尔和M·马那尔:《没有神话成分的马克思。他的生平和著作的编年研究》(1975年,牛津版),第301页;帕·汉·约翰逊:《马克思的文学成就》,载《现代季刊》,新辑,第2卷(1946—1947),第243—244页。

④ 伦勃朗(1606—1669),荷兰画家,镂版家。——译注

⑤ 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画家,建筑家。——译注

⑥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13页。

这里提出的两种画法之间的对比（马克思赞赏的显然是伦勃朗的画法）预示了马克思后来在批判拉萨尔的剧本《弗朗茨·冯·济金根》时把莎士比亚的和席勒的描绘人物的方式作了对比（马克思明确赞同莎士比亚的方式）。同健壮的和有生命力的现实主义相对照的，则是那些理想化的做法，即赞美（verhimmeln）那种并不存在的人间真理。

在同一篇书评中，德·拉·奥德的回忆录也提供一种情况，可借以表明文学作品能怎样被利用来设计一个虚假的自我形象。这里利用了詹姆士·费尼莫尔·库伯的小说《密探》：

176

“德·拉·奥德先生在他的小册子里竭力把自己描绘成库伯小说中的密探。他说八年来他使秘密组织的活动瘫痪了，这样他就为社会立下了功劳。但是，德·拉·奥德先生距离库伯笔下的密探还远得很。”<sup>①</sup>

在书评的其余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分析了德·拉·奥德的文学上的自我形象的虚伪性，并通过把德·拉·奥德的回忆同阿道夫·谢努的回忆相比较而“确定了它的地位”。这里一部文学作品再次提供了描述特征的主要笔法：

“妓女力图用来掩饰自己身体不太诱人的地方的大量胭脂香水，在文学上找到了自己类似的东西，那就是德·拉·奥德用来点缀他的小册子的bel esprit（机智俏皮）。相反地，谢努这本书的文笔，就叙述的朴实和生动来说，在许多地方可以和吉尔·布拉斯<sup>②</sup>相比美。

---

<sup>①</sup>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14页。（《全集》中“密探”译为“间谍”。——译注）



正象吉尔·布拉斯在种种冒险活动中始终是一个仆人并从仆人的角度来观察一切问题一样，谢努从1832年的武装起义时起，直到被逐出警察局止，始终是一个演配角的秘密活动家……”<sup>③</sup>

《吉尔·布拉斯》在这里给马克思和恩格斯提供了一个他们同有教养的读者分享的、可供参考的论点。这是一个可以用来衡量谢努那部书的知名的标准，犹如谢努的书本身也是一个可以帮助我们对比德·拉·奥德的回忆录作出判断的标准。

## (2)

马克思在伦敦居住的头几年是贫困、健康日益恶化和失望的年代。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当中，意见分歧日益严重，而这些分歧又由于同在伦敦的流亡者集团的争吵更加恶化，从而使马克思的处境越来越孤立。巴黎的一次工人起义的失败使马克思在1850年深信，革命的时机尚未成熟，他应当专心从事理论研究，以便进一步开展创立有力的革命理论的工作。现在他相信，这样的研究工作必须集中于政治经济学：

177

“英国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似乎踏进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用批判的精神来透彻地研究新的材料。这些研究一部分自然要涉及到似乎完全属于本题之外的学科，在这方

---

<sup>②</sup> 吉尔·布拉斯是法国十八世纪作家阿兰·瑞内·勒萨日的小说《吉尔·布拉斯》中的一个往上爬的流浪汉。——译注

<sup>③</sup>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18—319页。

面不得不多少费些时间。”<sup>①</sup>

然而这一工作并不能毫不中断地继续下去。那场对于科伦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的审判是以部分伪造的证据为依据的，这使马克思在接触不到法庭文件而又没钱去旅行的情况下，花费了大量的劳动去揭露那些伪证并进行反驳。此外，他还必须在忠诚的恩格斯的资助之外，为他和全家取得一个比较固定的收入，这就使他接受了查理·安·德纳<sup>②</sup>的邀请，担任激进的《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正式撰稿人。不过，他的直接的政治活动在1852年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后就比较少了。

以马克思署名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第一批文章实际上是恩格斯执笔的，然而，稿费却归马克思所有，而后来这些文章以《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的书名出版单行本时也用的是马克思的名字。把马克思用德文写的文章译成英文的也是恩格斯，直到马克思觉得自己的英文程度可以有把握地写作时为止。这就使得马克思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经济学的研究。这还使他可以再次注意法国的局势，因为路易·拿破仑1851年在那里发动了一次政变，并且在1852年宣布自己为皇帝。他在题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暗示拿破仑一世的政变）的一系列文章里，分析了社会和经济关系。这些文章最初并不是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而是发表在纽约的一个出版短暂的月刊《革命》（Die Revolution）上面。虽然写得十分匆忙，而且当时他又经常为贫穷所困扰，但《雾月十八日》一直可以说是马克思的最好的著作，也是最深刻的作品；可是这部作品当时却受到了沉默的对待，他的有关科伦共产党

178

<sup>①</sup> 《马恩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84页。

<sup>②</sup> 查理·安德逊·德纳（1819—1897），美国进步记者，《纽约每日论坛报》出版人，该报在1851—1862年期间刊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论文。——译注



人案件的著作也同样没有得到反响，这都使他大失所望。

《雾月十八日》一开头就提到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的一段话，恩格斯早在1851年12月3日给他的信中就曾提醒他注意这段话：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科西迪耶尔<sup>①</sup>代替丹东<sup>②</sup>，路易·勃朗代替罗伯斯庇尔，1848—1851年的山岳党代替1793—1795年的山岳党，侄儿代替伯父。在雾月十八日事变再版的那些情况中，也可以看出一幅同样的漫画！”<sup>③</sup>

开头一句的戏剧性比喻同第二句里所说的比喻溶合在一起，并且在下面的一节里发展成为戏剧表演：

“……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die neue Weltgeschichtsszene aufzuführen)。例如，路德换上了使徒保罗的服装，1789—1814年的革命依次穿上了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服装，……”<sup>④</sup>

---

① 马尔克·科西迪耶尔(1808—1861)，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34年里昂起义的参加者；七月王朝时期秘密革命团体的组织者之一；1848年二月革命后任巴黎警察局长，制宪议会议员；1848年6月流亡英国。——译注

② 若尔日·雅克·丹东(1759—1794)，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之一，雅各宾派的右翼领袖。——译注

③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21页。马克思这里指的是黑格尔《历史哲学》第三部分。在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1844)里，他同样指出过历史悲剧后来作为喜剧重新发生的情形。

④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57页。

而这一节又导致另一种同文学有关联的比喻，一种同翻译活动有关的比喻：

“就象一个刚学会外国语的人总是要在心里把外国语言译成本国语言一样；只有当他能够不必在心里把外国语言翻成本国语言，当他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来运用新语言的时候，他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才算是运用自如。”<sup>①</sup>

正如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那些从舞台上，从普通娱乐以及从文学模拟中所摘来的譬喻，起了把这部作品内容统一起来的主导作用。“舞台上的服装”，“戏剧效果”，“台上”和“台下”，“舞台”，“布景”，“戏票”，“序幕”，“幕”，“面具”，“空洞的演说”，“在戏剧最后几幕”出现的“鬼魂”，“合唱队”，“独唱演员”，“纠葛的喜剧”，“宫廷喜剧”，以及“大戏”，这些只是马克思竭力揭露拿破仑三世和他的同伙时所用的戏剧譬喻的若干例子。他们都是不称职的演员在模仿演一出好戏。马克思告诉我们，路易一拿破仑

179

“把各国人民的历史生活和这种生活所演出的一切大戏(Haupt-und Staatsaktionen)<sup>②</sup>，都看作最鄙俗的喜剧，看作专以华丽的服装、词藻和姿势掩盖最鄙陋的污秽行为的化妆跳舞会。……在他的十二月十日会中，有一万个游手好闲分子应该装作人民，正象聂克·波顿应该扮演狮子一样。当(法国)资产阶级毫不违反法国演剧格式的迂腐规则，十分严肃地表演最纯粹的喜剧时，当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21页。

② 指阐述重大历史事件的豪华而说教的戏剧，参阅本书第50页。（《全集》中，“大戏”译为“悲剧”）——译注



它一半被骗一半信服自己表演得庄严堂皇时，一个把喜剧仅仅看作喜剧的冒险家当然是要获得胜利的。只有当他战胜了盛装的敌人，并且认真演起自己的皇帝角色，在拿破仑的假面具下装作真正的拿破仑以后，他才会成为他自己的世界观的牺牲品，成为一个再不把世界历史看作喜剧而是把自己的喜剧看作世界历史的认真的丑角。……他（波拿巴）公开地对资产者大打其关于秩序、宗教、家庭、财产的官腔，暗地里却依靠着舒夫特勒和斯皮格尔勃<sup>①</sup>一流人的团体，依靠着无秩序、卖淫和偷窃的团体，这是波拿巴的本色，而十二月十日会的历史便是他本人的历史<sup>②</sup>。”

在最后一句里被译为“历史”一词的德文 *Geschichte* 也可以有“故事”或“情节”的意思。拿破仑三世不仅是一个笑剧的演员，也是它的作者。而在他的背后，马克思唤起读者对其他“作者”的回忆，路易·拿破仑和他的一伙人可以从这些作家的作品中被推断出来。这些作家包括：创造小丑（Hanswurst）的通俗剧作家——德国的“笨拙”先生，大戏的作者和莎士比亚，后者在《仲夏夜之梦》里，从那些想扮演与自己天分或素养都不相称的角色的人所做的表演中提炼出高级的喜剧；另外还包括年轻的席勒，他曾通过他早期的剧本《强盗》中的人物舒夫特勒和斯皮格尔勃，提供了卑劣人物的典型，而在真实生活中同这种人物相似的人物则不仅限于德国或十八世纪。

在马克思对路易·拿破仑和他的时代毫不留情的描绘当中，我们看到常常反复出现的模拟形象，由于有另一种更有价值的模仿和因袭的衬托，而更显得有力。那些为中等阶级取得权力而完

① 这两个人是席勒的剧本《强盗》中穷凶极恶的强盗。——译注

②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74—175页。

成他们的世界历史任务的革命者，很懂得什么时候利用他们所读过的罗马和希伯莱古典著作：

“但是，不管资产阶级社会怎样缺少英雄气概，它的诞生却是需要英雄行为、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战斗的。在罗马共和国的高度严格的传统中，资产阶级社会的斗士们找到了为了不让自己看见自己的斗争的资产阶级狭隘内容、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需的理想、艺术形式和幻想。例如，在一百年前，在另一发展阶段上，克伦威尔和英国人民为了他们的资产阶级革命，就借用过《旧约全书》中的语言、热情和幻想。当真正的目的已经达到，当英国社会的资产阶级改造已经实现时，洛克<sup>①</sup>就排挤了哈巴谷<sup>②</sup>。

由此可见，在这些革命中，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勉强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提高想象中的某一任务的意义，而不是为了迴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起来。”<sup>③</sup>

但是现在，马克思相信，因袭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已经有了过多的讽刺画，过多的虚假意识，过多的幻想。当前的时代不应再向过去寻求它的“诗意”；它必须抛除这样一种“迷信”，即今天的战斗只有穿着去年的服装才能获胜：

“十九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事物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

① 约翰·洛克(1632—1704)，英国二元论哲学家，感觉论者。——译注

② 先知的名字，圣经中有《哈巴谷书》。——译注

③ 《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22—123页。



自身的任务的。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十九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者去埋葬他们自己的死者，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从前是辞藻胜于内容，现在是内容胜于辞藻。”<sup>①</sup>

181 有意思的是，马克思在这里引用了《新约》（《马太福音》，第8章，第22节）以支持他那要求从未来汲取诗情的号召。在马克思的作品中，从一个有待于创造的未被异化的社会的幻想中汲取你的灵感，决不意味着过去的文学传统和文化传统应当被否定或忘记。因此，《雾月十八日》的读者经常发现他们被提醒注意他们的《圣经》：“埃及的奢侈生活”、“撒母耳”、“扫罗”、“国王大卫”。

为了揭露当前的虚伪，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里求助于两位同时代的作家。海涅提供给他一个名字：他从此不断地把这个名字用于路易·拿破仑本人。这个名字就是“克拉普林斯基”，它是海涅在他一篇关于巴黎的波兰流亡者的，题为《两个骑士》的凄惨的诗歌中所创造的。<sup>②</sup>而一位同时代的法国小说家则帮助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一书的末尾处描述新的法国的道德状况：“如果我们注意到，维隆—克勒维尔<sup>③</sup>是十二月十日会的道德守护者，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sup>④</sup>是它的思想家，那末，我们对这个社会的

---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24页。

② 同上书，第131页。海涅的诗《两个骑士》(Zwei Ritter)，见《罗曼采罗》，第1卷。（克拉普林斯基是海涅的《两个骑士》一诗中的主人公，一个破落的贵族，克拉普林斯基这个姓是由法文字Crapule（贪食、饕餮、酗酒以及懒汉、败类的意思）形成的。马克思用克拉普林斯基来暗指路易·波拿巴。——译注）

③ 克勒维尔是巴尔扎克的小说《贝姨》中的人物，是暴发户、贪财者和贪淫好色之徒的典型。——译注

④ 阿道夫·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1806—1880)，法国新闻工作者，无原则的政客，1848年革命前是奥尔良党人，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立法团议员，持极右翼立场，曾为《立宪主义者报》撰稿，五十年代为《国家报》主编。——译注

上层人物就能有个清楚的概念了。”<sup>①</sup> 维隆—克勒维尔 (Véron-Crevel) 这个复合的名字把一个实有其人的原型(《立宪主义者报》的编辑路易·维隆<sup>②</sup>)和一个难忘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结合起来,从而他不知不觉地暗示给我们,就是巴尔扎克的《贝姨》里的克勒维尔。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马克思使用巴尔扎克的作品,通过可以认出来的个别人物来扼要地表现十九世纪法国的典型思想方式和感情。保尔·拉法格后来回忆说:“他认为巴尔扎克不仅是当代的社会生活的历史学家,而且是一个创造者,他预先创造了在路易·菲利浦王朝时代还不过处于萌芽状态,而且直到拿破仑第三时代,即巴尔扎克死了以后才发展成熟的典型人物。”<sup>③</sup>

《雾月十八日》一书又充满了从伟大的文学作品中信手拈来的引文和回忆片断;它还充满了马克思所特有的颠倒手法,比如,夏米索创造的人物彼得·施莱米尔<sup>④</sup>本来是有躯体而没有影子的,但现在却有一个正好相反的施莱米尔 (umgekehrte Schlemihle),他是个“没有躯体的影子”<sup>⑤</sup>。尤其是,马克思在这里,比在先前的任何作品里都更加充分地探讨了作者们同那些社会阶级的关系,它们相互间冲突的利益成为马克思注意的重点。他把“著作家”(Literaten)看成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而资产阶级在追求其他利益时,却又常常忽视这种利益:

182

---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27页。

② 路易·德吉烈·维隆 (1798—1867), 法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1848年前是奥尔良党人,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立宪主义者报》的所有人和发行人(1844—1852)。——译注

③ 见《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71页。

④ 彼得·施莱米尔是夏米索的小说《彼得·施莱米尔奇遇记》中的人物,他用自己的影子换来了一个神奇的钱袋。——译注

⑤ 参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01页。



“资产阶级对于自己的著作界的代表和自己的报纸所表现的忿怒，比它跟议会代表们的破裂更为明显。……议会外的资产阶级群众，却对总统奴颜婢膝，诋毁议会，粗野地对待自己的报刊，从而促使波拿巴压制和消灭资产阶级中讲话和写文章的分子，即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和**著作家**、资产阶级的讲坛和报纸，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使它能够不受限制的强硬的政府保护下安心地从事他们私人的事情”。<sup>①</sup>

在这一节前面的另一节里，马克思对他在这一上下文里所用的“代表”一词提出了疑问。人们不应该认为，他谈到的是这样一些文人，他们的著作在他看来散发小资产阶级臭味，也不应该认为：

“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崇拜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超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sup>②</sup>

另有一段旁白使这段文字成为论述作家在阶级结构中的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学术论文中最常被引用的一段话，马克思这段旁白是

---

<sup>①</sup> 参见《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01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152页。伊安·比尔恰普把戈德曼的“结构相应”的概念用于这一节：“这并不是一个决定论的论述。勿宁说它提出了一个社会阶级的世界观和一个作家的作品之间的‘结构相应’。这个作家（无论是出于个人的或社会的理由）不会超越这一世界观的限度”（《全面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载于瓦尔顿和霍尔编《马克思的位置》，第134页）。

“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文学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

然而，这并不是说，在马克思看来，所有资产阶级出身的文人必须用这种方式“代表”他们的阶级。他毋宁认为，他们的特殊社会地位为这样的人提供了城市无产阶级或农业工人所没有的一种选择；他们可以为资产阶级讲话，或者可以同其他社会阶级共命运。正如什洛莫·阿维涅里<sup>①</sup>所说，对知识分子来说，在马克思的设想中，“并不存在象资本家或工人那样一种先验的限定。选择正是知识分子被决定的‘社会存在’的体现”。<sup>②</sup>

《雾月十八日》接下去后面两节，应联系这一重点加以考虑。其中第一节是马克思非常出名的关于全部人类史中自由和决定论之间的协调：“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sup>③</sup>第二节则又回到“上层建筑”(Überbau)一词，这个词汇在《共产党宣言》中曾被用来描述社会阶层的形成<sup>④</sup>，但在《雾月十八日》一书中却有了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用的这个词汇更相近的意义。现在它的意思是指政治制度，连同同一个特定时期一个特定阶级所特有的信仰、思想方式、感觉和观点：

“正统王朝不过是地主世袭权力的政治表现，而七月王朝则不

① 什洛莫·阿维涅里，现任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哲学教授。——译注

② 什·阿维涅里：《马克思和知识分子》，载《思想史杂志》，第28卷(1967)，第277页。

③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21页。

④ “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第35页。)



过是资产阶级**暴发户**篡夺权力的政治表现。所以，这两个集团彼此分离决不是由于什么所谓的原则，而是由于各自生存的物质条件，由于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城市和农村之间旧有的对立，由于资本和地产间的竞争。当然，把它们同某个王朝联结起来的同时还有旧日的回忆、个人的仇怨、忧虑和希望、偏见和幻想、同情和反感、信念、信条和原则，这有谁会否认呢？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着重号是本书作者加的）。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如果奥尔良派<sup>①</sup>和正统派这两个集团中每一个集团，都硬要自己和别人相信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它们对两个不同王朝的眷恋，那末后来的事实所证明的却刚刚相反，正是它们利益的对立才使得这两个王朝不能结合为一。正如在日常生活中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评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在历史的战斗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sup>②</sup>

显然，马克思本人相信，他的视界是能够超越他当时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现在他认为自己并不是为资产阶级讲话，而是为无产阶级的力量讲话。他认为无产阶级的力量将会摧毁资本主义制度而代之以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制度。

---

① 奥尔良派是路易十四的弟弟奥尔良的拥护者。——译注

②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49—150页。

然而，在通向那更加合理的新制度的道路上，马克思看到许多障碍和敌人。这些人当中包括没有阶级觉悟的工人，他们带着依恋的情绪回顾过去，而不展望那必须通过革命才能达到的未来——马克思在他的通信和谈话中把这些人斥之为俗物 (Knoten) 和浪人 (Straubinger)；这些人当中还包括象巴黎那样的大城市里的贱民，(马克思告诉我们)，巴黎的贱民表明，他们是非常乐意支持拿破仑三世的。《雾月十八日》中对那种现在被称为 Lumpenproletariat (流氓无产阶级) 的贱民成分曾作过精彩的描述，它使我们能够再次瞥视一下那些文人：

“它名义上是个慈善团体，实际上是由巴黎流氓无产阶级组成的一些秘密团体，每一个团体都由波拿巴的走狗们领导，总领导人是一个波拿巴派的将军。在这个团体里，除了一些来历不明和生计可疑的破落放荡者之外，除了资产阶级可憎的败类中的冒险分子之外，还有一些流氓、退伍的士兵、释放的刑事犯、脱逃的劳役犯、骗子、卖艺人、游民、扒手、玩魔术的、赌棍、私娼狗腿、妓院老板、挑夫、下流作家 (Literaten)、拉琴卖唱的、拣破烂的、磨刀的、镀锡匠、叫化子，一句话，就是随着时势浮沉流荡而被法国人称作 La bohème [浪荡游民] 的那个五颜六色的不固定的人群……”<sup>①</sup>

185

在这意味深长的一节里，被夹在挑夫和拉琴卖唱的中间的 literati (下流作家) 失去了他们的一切尊严。他们既是 Lumpenproletariat (流氓无产阶级) 的一部分，又是在马克思看来没有穆尔瑞<sup>②</sup>眼中那样的魅力的 Bohème (浪荡游民) 的一部分。马克思不是浪荡

<sup>①</sup>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73—174页。

<sup>②</sup> 昂利·穆而瑞(1822—1861)，法国作家，著有《波希米亚人》(《全集》译浪荡游民)的生活景象》(Scènes de la vie de bohème)。——译注



游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在他的著作里，犹如在他的个人生活中一样，他对浪荡游民的观点和行为的看法，就和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比较保守的代表人物那样，是绝对否定的。

(3)

在移住伦敦之后的头几年，马克思写给恩格斯的信里，充满文学引语，其中大多数带有戏谑的性质：

“亲爱的恩格斯，  
Iterum Crispinus!”<sup>①</sup>

这样马克思一开头便引用了尤维纳利斯的讽刺诗第一卷里的话；或者例如：

“亲爱的恩格斯，  
我来晚了，但是我来了……”<sup>②</sup>

这句话使人联想到席勒的《皮柯乐米尼父子》的开头部分。他还提到在巴比伦河边荷马式(制止不住的)放声大笑，这样就把欧洲的希腊传统和希伯来传统诙谐地结合起来，而海涅却常常把这两种传统对立起来。再例如，通过把尤维纳利斯的 *facit indignatio ver-*

---

① 《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27卷，第204页。（“Ecce iterum Crispinus”——“又是克里斯平”〔尤维纳利斯，《讽刺诗集》第4篇的开头，这首诗（在第一部分中）痛斥罗马皇帝多米齐安的一个弄臣克里斯平。〕，转义是，“又是这个家伙”或“又是这个东西”。——译注）

② 同上书，第28卷，第76页。

sum (愤怒出诗作) 改写成 indignatio facit poetam (愤怒出诗人)<sup>①</sup>, 而比较严肃地来解释与他同时代的一个人的革命热情, 虽然, 对于这个人, 所有的人都曾认为他是好静的和爱好和平的。<sup>②</sup> 在这些书信当中, 最有意思的是马克思把文学纳入他的生活当中, 给那些引起他注意的政界人物和他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私人朋友起文学绰号。这样, 拿破仑三世就成了海涅作品中庸俗而又卑怯的冒险家克拉普林斯基; 格莱斯顿<sup>③</sup> 成了巴特勒<sup>④</sup> 的胡迪布腊斯及其扈从拉尔夫和欧仁·苏的鲁道夫·德·盖罗尔斯坦的结合物, 成了“胡迪布腊斯式的鲁道夫—格莱斯顿”<sup>⑤</sup>。阿尔诺德·卢格披上了阿塔·特洛尔的伪装, 阿塔·特洛尔就是海涅发明出来挖苦无能的德国自由派的那个跳舞的笨熊;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则成了他自己作品中的那位黑人王子(Mohrenfürst)<sup>⑥</sup>, 这一外号曾促使海涅对弗莱里格拉特开了一些最精彩的玩笑; 威廉·皮佩尔<sup>⑦</sup>照例作为图普曼<sup>⑧</sup>出现, 这显然是同《匹克威克外传》一书有关的。<sup>⑨</sup>

186

在给恩格斯的这些信里, 马克思很自然地也在思考历史学家

① “愤怒出诗作”是尤纳维利斯的第一首讽刺诗中的一句话。——译注

② 《马恩全集》, 中文版, 第27卷, 第341页。

③ 格莱斯顿(1809—1898), 英国19世纪下半叶自由党领袖之一, 曾任财政大臣和内阁首相。——译注

④ 塞缪尔·巴特勒(1612—1680), 英国讽刺诗人, 其长诗《胡迪布腊斯》(三部)嘲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的清教主义, 以及宗教的假仁假义和中世纪的经院哲学。——译注

⑤ 《马恩全集》, 中文版, 第28卷, 第257页。

⑥ 同上书, 中文版, 第27卷, 第275页。

⑦ 威廉·皮佩尔(约生于1826年), 德国语言学家和新闻工作者, 共产主义同盟盟员。——译注

⑧ 图普曼是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中的一个圆滑的胖青年, 自作多情, 见到每个漂亮姑娘都爱, 结果往往遇到麻烦。——译注

⑨ 《马恩全集》, 中文版, 第27卷中许多地方都提到。



的任务，因为他移居伦敦头几年曾正视这个问题并且发现别人在这方面正在实践。<sup>①</sup>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就不可避免地发现自己在把历史学家的活动和小说家的活动等量齐观。比如，路易·勃朗，马克思当时正在阅读他的有关七月革命的著作（《十年（1830—1840）史》〔巴黎，1841—1844年〕），据说勃朗就象大仲马写连载小说那样写他的历史作品：他总是为他的下一章搜集正好够他写的材料。马克思还说，这样做的好处是给人以某种新鲜感觉，因为他要讲的，无论对他本人还是对他的读者来说都是新鲜的。然而这样一个优点却几乎不能补偿整个作品存在的不可避免的弱点。<sup>②</sup>马克思在居住伦敦的年代里读大仲马的小说作为消遣，换换脑筋，这从保尔·拉法格的回忆文章里也可以得到证实。<sup>③</sup>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期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通信，显露他们对于在英国的德国流亡者的活动日益感到愤慨。他们特别讨厌那个哥特弗利德·金克尔，此人在德国的活动，他们在《政治经济评论》中早就非常严厉地批判过了（见前第171页）。看来马克思不能忍受金克尔的装腔作势和自我吹嘘，以致他很轻易地就听从了可疑的亚诺什·班吉迪亚<sup>④</sup>上校的劝说，用直截了当和毫不客气的语气揭露了金克尔和他周围的人物。由此而产生的小册子《流亡中的大人

① 马克思一生当中读了许多历史著作；他在移居伦敦的头几年里读过的书包括（他的笔记本可以证明的）德国人写的有关文明和文化史的一些研究著作，诸如J·G·艾希荷恩的《近代欧洲文化与文学通史》（Allgemeine Geschichte der Cultur und Litteratur des neueren Europa）（哥廷根，1769年）；W·德鲁曼的《文化史纲要》（Grundriss der Culturgeschichte）（科尼斯堡，1847年）；古斯塔夫·克莱因：《人类文化通史》（Allgemeine Cultur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莱比锡，1847—1849年），和W·瓦克斯穆特：《文化通史》（Allgemeine Culturgeschichte）（莱比锡，1850年）。参阅马·鲁贝尔：《马克思批判马克思主义论文集》（巴黎1974年），第319,327页。

②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7卷，第214页。

③ 见《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71页。

④ 亚诺什·班迪亚（1817—1868），匈牙利记者，1848—1849年匈牙利革命军的团长，后来成为警探。——译注



物》(Die grossen Männer des Exils)在马克思生前一直未能出版;由于金克尔和他的一帮人现在已经默默无闻了,这个小册子也就失去了它很大一部分兴味。但是在本文中,由于下述理由这书也的确值得注意,即它是马克思对一个德国文人的生平和作品所作的最长的,也是最严厉的一次评论。

《雾月十八日》的主要譬喻是戏剧和剧院,而《流亡中的大人物》的主要譬喻则是史诗。后一部作品一开头就是对克罗卜史托克的基督教史诗《救世主》(Der Messias)的一种故意的突降法的改作<sup>①</sup>：“歌颂吧,永垂不朽的灵魂,为有罪的人赎罪……通过哥特弗利德·金克尔”<sup>②</sup>,接着则是大量的直接引用其他史诗和对其他史诗的仿作,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沃尔夫拉姆·冯·埃森巴赫<sup>③</sup>的《巴尔其伐尔》、阿里欧斯托<sup>④</sup>的《疯狂的罗兰德》(Orlando furioso)和(最著名的)马提奥·波雅多<sup>⑤</sup>的《钟情的罗兰德》(Orlando innamorato)。偶尔还有“戏剧的”部分——例如,第六节就被分为六“场”(Auftritte)和一个“幕间演出”(intermezzo);但是总的说来,全部作品始终保持着拟作的史诗的调子,以致它简直可以称为“金克利亚特”<sup>⑥</sup>。

这部“金克利亚特”对一个受过教育的德国庸夫俗子(Bildungsphilister)的形象又作了一些新的描述,这种描述在《政治经

① 修辞学中的突降法,指说话或写作中从有重大意义的内容突然转入平淡或荒谬的内容。——译注

② 《马恩全集》,第8卷,第261页。

③ 沃尔夫拉姆·冯·埃森巴赫(约1170—1220),德国骑士史诗作家,著有《巴尔其伐尔》、《维莱哈尔姆》、《提图莱尔》三部史诗及一些抒情诗。——译注

④ 阿里欧斯托(1474—1533),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诗人,《疯狂的罗兰德》一诗的作者。——译注

⑤ 马提奥·波雅多(1434—1494),意大利诗人,著有根据宫廷骑士长篇小说传统写成的长诗《钟情的罗兰德》。——译注

⑥ 《伊利亚特》是荷马的史诗,这里的“金克利亚特”是模拟的谐音。——译注



济评论》中评论道梅尔时便已开始了。这部作品(并非全然不公平地)表明金克尔是个毫无文学才能的愚蠢而有虚荣心的作家,他如何仿效他所读过的作品的风格,但又只能对之作出拙劣的模仿。哥亭根派的诗、席勒的《阴谋与爱情》,歌德的诗和剧作,诺瓦利斯<sup>①</sup>的《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都被这样利用过,从而被贬损了。因此,马克思利用一系列文学作品,从这一端的密勒<sup>②</sup>的感伤小说《济格瓦特》到另一端的歌德和狄德罗,来描述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和他的朋友们,可说是很恰当的:

“哥特弗利德是民主主义的济格瓦特时期的英雄,这个时期在德国产生了无限的爱国主义的苦闷和泪如泉涌的悲伤。哥特弗利德就是以平庸的抒情的济格瓦特的姿态初露头角的。……”<sup>③</sup>

“……幻想将来要永垂不朽的伪善者,(金克尔)把《旧约全书》中的故事同施皮斯<sup>④</sup>、克劳伦<sup>⑤</sup>和克拉麦尔<sup>⑥</sup>式的时髦的“流动图书馆”幻想揉合在一起,并且陶醉于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浪漫的英雄人物。……”<sup>⑦</sup>

“在这里,哥特弗利德泄露了他用来掩饰自己的全部浪漫的谎

---

① 诺瓦利斯(1772—1801),德国浪漫派主要代表者,他的长篇小说《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是体现反动浪漫主义纲领的作品。——译注

② 约翰·马丁·密勒(1750—1814),德国诗人和作家,德国文学中的感伤主义的代表。——译注

③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61页。

④ 施皮斯(1755—1799),德国作家,著有一些消遣小说。——译注

⑤ 亨利希·克劳伦(1771—1854),德国作家,著有一些感伤主义小说。——译注

⑥ 克拉麦尔(1758—1817),德国作家,著有一些冒险小说。——译注

⑦ 参阅《马恩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70页。

言，他披上这种谎言的外衣；强烈愿望打扮成别人的样子，这就是他的真正的‘内在本质’。他从前把自己称为斯特拉斯堡的哥特弗利德，现在又装扮成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而他寻找的根本不是‘蓝色花朵’，而是将欣赏他扮这个角色的女人。”

“鲁道夫·施拉姆<sup>①</sup>先生是个喜欢争吵的、夸夸其谈的、极其荒唐的傀儡，他把《拉摩的侄儿》中的一段话：‘我宁愿做一个厚颜无耻的空谈家，而不愿做默默无闻的人’当作生活中的座右铭。”

“梅因<sup>②</sup>，这个因错误而生下来就没有刺的小刺猬，早就被歌德用潘辛涅的名字描绘如下……”<sup>③</sup>

通过用这样的办法把一群小文人的思想情况拿出来示众，并且引用较大作家的作品来描述他们的本质，马克思还想阐明革命后德国的金克尔的爱慕者的爱好、思想和社会环境：

“众所周知的天生有‘美丽的灵魂’的德国小市民，由于1849年的沉重打击而对他们的最甜蜜的幻想完全失望了。他们的任何一个希望都没有实现……所有的人都灰心丧气，到处都在渴求民主主义的基督、真实的或想象的殉难者，因为他会象羔羊一样温顺地以自己的受难承担起小市民世界的罪过……以莫克尔为首的‘小金虫协会’(Maikäferverein)准备来满足这一在各地都已经酝

---

① 鲁道夫·施拉姆(1813—1882)，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后来拥护俾斯麦。——译注

② 爱德华·梅因(1812—1870)，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后来是民族自由党人。——译注

③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71、301、354页。



酿成熟的要求。的确，除了被俘的坐在纺车旁的西番莲金克尔之外，除了这个泪水和激情的永不枯竭的泉源，这个传道者、美学教授、议员、政治流动商贩、火枪手、新出现的诗人和剧院老经理的结合体之外，还有谁更适于表演这出伟大的蒙难喜剧呢？金克尔是时代的英雄，而他也正是作为时代的英雄立刻被德国庸人所接受的。”<sup>①</sup>

一个没有才能的作家所起的这种代表作用——这种作用本身就使他值得注意——也有它的商业上的含意；马克思试图说明，金克尔和他那糟糕的妻子约翰娜·莫克尔<sup>②</sup>怎样利用他之突然出名而把这件事变成硬通货：

189

“饱经世故的莫克尔善于从公众的这种软心肠中攫取实利，并且立刻展开了最积极的经营活动。她着手重新出版哥特弗利德的一切已经发表过和没有发表过的突然身价百倍、风行一时的作品，并且在公众中广泛地替这些作品吹嘘。她趁机呈献出她自己从昆虫世界里得来的经验，例如‘萤火虫的历史’。为了得到一笔相当可观的钱，她允许‘小金虫’施特罗特曼<sup>③</sup>应公众的要求公布哥特弗利德日记中最隐秘的表白。她组织了各种捐款，表现出无可置疑的经营者的机灵和极大的坚忍精神，把有教养的人们的软心肠变成了硬塔勒<sup>④</sup>”。<sup>⑤</sup>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94页。

② 约翰娜·金克尔，娘家姓莫克尔（1810—1858），德国女作家和音乐家，哥·金克尔之妻。——译注

③ 阿道夫·施特罗特曼（1829—1879），德国作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革命运动的参加者，1850年逃离德国。——译注

④ 旧德国货币，等于三个马克。——译注

⑤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95页。

在这里，马克思触及许多重要的题材：文学业；善于看风使舵的人怎样利用低级趣味和低级感情；政治上的好名声或坏名声怎样被商业所利用；文学界的个人崇拜。后面的一节就用来详细地描述金克尔怎样作为自己声誉的推销员而在伦敦进行活动的，他引诱狄更斯在他的《家常话》中赞扬他，把他的照片登在《伦敦新闻画报》上，还送出大批听他演说的免费券：

“他不耻于四处奔走，刊登夸大其词的广告，进行诈骗，到处纠缠，对这些公众卑躬屈节。可是，大功到底告成了。哥特弗利德心满意足地陶醉于自己的荣耀，在水晶宫的大镜子里欣赏自己的映象，可以说，他感到非常舒适……”<sup>①</sup>

这样一来，这个劣等诗人利用自己的声誉来招摇撞骗的手法就同商业广告的新方法，同对于以水晶宫<sup>②</sup>和1851年的大博览会为代表的英国工业和发明才能的大肆吹嘘联系起来。马克思对金克尔感到厌烦，但他似乎过高估计了金克尔的成功和影响的程度，并且夸大了金克尔因自己的努力而取得的金钱上的报酬。

对马克思的论据来说，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把金克尔从他自传式的作品中暴露出来的生平和事业，拿来同有一个有文学爱好和野心的前期流亡者哈罗·哈林<sup>③</sup>相提并论。埃·约·霍布兹鲍姆<sup>④</sup>曾

---

① 《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98—299页。

② 水晶宫是为1851年举办的世界工商业展览会建的展览馆。——译注

③ 哈罗·哈林(1798—1870)，德国作家，小资产阶级激进派，从1828年起曾数度流亡国外。——译注

④ 埃里克·约翰·霍布兹鲍姆(1917—)，英伦敦大学历史系教授，专研究工人阶级史，著有《劳工转折点(1880—1900)》(1948)、《革命时代(1789—1848)》(1962)等书。——译注



190 谈到此人的活动，把它说成是“各民族的一位堪称典型的被放逐的解放者”的活动。

“哈罗·哈林（自称是）丹麦人，他曾作为玛志尼的‘青年德意志’、‘青年意大利’和比较不著名的‘青年斯堪的那维亚’的成员先后为希腊（1821年）和波兰（1830—1年）战斗过，并曾渡过大洋在纽约为计划成立的拉丁美洲合众国战斗过，后来才回来参加了1848年革命；与此同时，他还发表了如下标题的著作，如《各族人民》、《血滴》、《一个人的话》和《一个斯堪的那维亚人的诗》。”<sup>①</sup>

马克思讽刺地把哈林自己关于这一动荡生涯的记述拿来同优里乌斯·凯撒有关自己的战役的叙述相比，并继而以《流亡中的大人物》一书特有的讽刺和抨击混合的手法加以描述。他对哈林的自传体、诗体、戏剧的和政治的作品的嘲笑，目的在于把金克尔作一个透视，说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流亡者又干出了更早的流亡者的那些蠢事，而在他们自己的眼里以及在他们同时代人的眼里，那些更早一些的人物的的重要性由于政治放逐而被扩大了。在《流亡中的大人物》一书中，哈林的意义在于他是一个原始的模式，一个 Urbild<sup>②</sup>，他“成了我们的一切流亡中的大人物——所有的阿尔诺德们、古斯达夫<sup>③</sup>们和哥特弗利德们多少是有意识地并且多少是成功地竭力加以摹仿的榜样；他们也许能做到（如果不发生任何对此

<sup>①</sup> 埃·约·霍布兹鲍姆：《革命时代（1789—1848）》，门托尔出版社（纽约和多伦多，1962年），第161页。

<sup>②</sup> Urbild一词的意思是原始的形象。——译注

<sup>③</sup> 古斯达夫·司徒卢威（1805—1870），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职业是记者，1848年4月和9月巴登起义和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领导人之一；革命失败后逃离德国；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曾参加美国内战，站在北部方面，曾鼓吹素食主义。——译注

不利的话)和他平起平坐,但是未必能够高他一筹。”<sup>①</sup>

从上面引用的句子可以看出,金克尔在《流亡中的大人物》一文里,同马克思感到有账要同他们算的其他德国流亡者在一起了。这些人包括他的老搭档阿尔诺德·卢格,卢格被拿来同十八世纪的德国出版者、书商和批评家弗里德里希·尼古拉相比:

“在《哈雷年鉴》上,卢格扮演了已故的出版者尼古拉在过去的《柏林月刊》上所扮演的角色。和尼古拉一样,卢格出版他人著作,从中攫取金钱利益并为了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而剽窃他人作品,以此为主要手段来寻求名利。但是卢格善于把改写他人文章这一文学上的消化过程,提高到比原著更高的水平……”<sup>②</sup>

马克思继而对卢格这一不值得羡慕的画像作了最后的修饰,他指出:卢格的反浪漫主义精神所以表露出来,只是由于黑格尔和海涅早已在这方面作了一番有效的廓清工作,而卢格不同于黑格尔之处,在于他认为由于自己同浪漫主义的对立,他就有理由“把庸夫俗子,首先是他本人这样的庸俗人物推崇为最完美的理想人物”。<sup>③</sup>这一节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其中明确提到了马克思在其他著作中很少提到的黑格尔《美学》。马克思写道:“和尼古拉一样,他(卢格)所以也勇敢地反对浪漫主义精神,正好是因为黑格尔在《美学》中用批判的方式,而海涅在《浪漫主义学派》中用文学的方式早已给它送了终。”<sup>④</sup>

在分析金克尔向德国的庸夫俗子所作的呼吁时,马克思提出,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329页。

② 同上。(此处译文有改动。——译注)

③ 同上。

④ 同上。



金克尔在他的一生中实现了庸夫俗子的梦想，并且在他的著作里流露了庸夫俗子满足愿望的幻想。但是，这些作品却是诉诸比自觉更深一层的水平的。马克思从金克尔的回忆中引用了显然是没有毒害的一段话，并且在他认为暗中含有性的意味的那些特写的字句下面加了着重线：“‘这朵天上的花朵刚要开放便散发出如此浓郁的芳香。当……男性力量的炎夏的日光打开了内心的花瓣的时候，又将会怎样啊！’”<sup>①</sup>在这一点上，回想一下下述情况是适当的，那就是马克思本人偶尔也通过性的比喻来谈论政治问题，例如，在《雾月十八日》一书里，路易·波拿巴的政变就被描述成引诱和强奸的行为；而在他一生的不同时期，他对于性的事情可在文学中表现出来的方式表示某些兴趣。文中，金克尔的 sub rosa（秘密的）暗示，同彼埃特罗·阿雷蒂诺<sup>②</sup>著作中的一个片断形成对照，马克思曾在1852年7月3日给恩格斯的信中<sup>③</sup>，把这一片断寄给恩格斯，而恩格斯则认为把它作为解毒剂又太厉害了。

192 为了同另一个文人进行论辩，《流亡中的大人物》还求助于格林兄弟的童话，如引用了一篇题为《端饭的桌子，吐金的驴子和袋子里的小棍子》的童话，把卡尔·海因岑的风格称为“永远是童话里的‘袋子里的小棍子’！”<sup>④</sup>这位作者还被剥夺了他的教名，经常被称作“罗多芒特·海因岑”，这个名字使人想起阿里欧斯托，下面具有特色的一节就对之作了精心的描述：

“在意大利的骑士叙事诗中常常出现威武的魁伟的巨人；他们

① 转引自《马恩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66页。

② 彼埃特罗·阿雷蒂诺(1492—1556)，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讽刺作家，著有许多尖锐地揭露教皇宫廷和欧洲各国君主的抨击性小册子。——译注

③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76—80页。

④ 同上书，第8卷，第319页。（童话说袋子里的小棍子可以按照主人的命令从袋子里跳出来打击敌人。——译注）

的武器是又粗又大的木棍，但是在格斗的时候，尽管他们野蛮地乱打，大声地吼叫，但总是打不着敌人，而只能打着周围的树木。海因岑先生就是政治著作中的这样的阿里欧斯托的巨人。他生就一副粗壮结实的体格，他把这一点看做他应当成为伟大人物的标志。这副笨重的体格影响到他的全部写作活动，他的写作活动也是粗笨不堪的。他的敌人总是很矮小的，是连他的足踝也够不到的侏儒，他甚至要把身子弯到膝盖才能从上面看到他们。然而，当需要行动的时候，*«uomo membruto»*〔“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却在著作中或法庭上寻找救星。”<sup>①</sup>

当马克思用不同程度的讽刺描述自己的对手的时候，那些从法国和德国的阿瑟王史诗取得的形象就和阿里欧斯托史诗中的形象结合起来了；他叫金克尔打扮成寻求圣杯的帕威法尔<sup>②</sup>的样子乘船去美国寻求党的经费。为了嘲笑奥地利的一个民主派卡尔·陶森瑙<sup>③</sup>，马克思要我们记起西塞罗的《论预言》(De Divinatione)，在这篇文章里，“两个脏腑祭师不可能互相对视而不发笑”<sup>④</sup>；他说，陶森瑙只需照一照镜子就可以取得同样的效果。莎士比亚的

---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318页。“中世纪好闹事的英雄骑士传奇，同流亡的‘英雄’的成就，形成鲜明的对照，而后者的娇柔做作绝不下于中世纪的虚张声势。”（见R·S·李温斯通所译《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和《流亡中的大人物》的前言，伦敦，1970年，第32页。）

② 帕威法尔是许多中世纪诗歌的主人公，他出去寻找圣杯。参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379—380页。——译注

③ 卡尔·陶森瑙(1808—1873)，奥地利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左翼的卓越代表，1848年革命时期为维也纳民主联合会中央委员会首脑，1849年起流亡伦敦。——译注

④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369页。保尔·德·科克(1794—1871)，法国浪漫主义作家，著有《月亮的情人》等小说。脏腑祭师是古罗马的一种祭师，他们根据牛内脏的部位占卜。——译注



历史剧为莱昂·孚赫提供了一个绰号，他成了“自由贸易派别的旗手毕斯托”。<sup>①</sup> 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又照例出现。我们还看到，鲁道夫·施拉姆使人们想起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歌德对“文学风格”和“文学体裁”（Manier 和 Stil）所作的区分，被用来贬损古斯塔夫·司徒卢威的作品。克雷门斯·布伦塔诺的《果克尔、欣克尔和迦克莱亚的故事》提供一个不直截了当的手段把金克尔和他的妻子比作家禽（马克思总是喜欢把他的对头们比作动物或是给他们起动物的名字；他的通信里就有狗和驴子、猪和公牛、猴子、臭虫和跳蚤等精选的动物词汇）。人们特别注意到，在《流亡中的大人物》中，还有一些小作家也被用来进行各种讽刺，这些小作家包括从十七世纪的传教士阿伯拉罕·圣克拉<sup>②</sup> 直到科采布<sup>③</sup>、阿尔诺德·科尔图姆、约·提·海尔梅斯<sup>④</sup> 和保尔·德·科克。<sup>⑤</sup> 正如人们在马克思的讽刺论辩作品中一贯见到的那样，海涅的影响经常可以被感觉到。当马克思叙述一个作家的外貌和他的家庭环境，同社会生活和他的作品之间的关系时，他运用了海涅的《路德维希·白尔尼》的手法；他采用海涅创造的词汇（如“Menschenkehricht”（人类糟粕），“Konfusius”（糊涂虫））<sup>⑥</sup>；在他描述阿尔诺德·卢格时，他引用了海涅对卢格的性格的看法并引用了《阿塔·特洛尔》中的一些著名诗句。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356页。毕斯托是莎士比亚一些剧本中的角色，是一个吹牛、撒谎的二流子。——译注

② 阿伯拉罕·圣克拉（1646—1709）（乌尔利希·梅格尔勒的笔名），奥地利天主教传教士和通俗滑稽作品作家。——译注

③ 奥古斯特·科采布（1761—1819），德国反动作家和政论家。

④ 约翰·提摩泰乌斯·海尔梅斯（1738—1821），德国神学家和作家，长篇小说《索菲亚从默麦尔到萨克森旅行记》的作者。——译注

⑤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73、311、369—371页。

⑥ 同上书，第316页。（“糊涂虫”原文是Konfusius（孔夫子）与Konfusion（混乱）谐音。——译注）

把所有这些不同的材料结合到一起，则是出于马克思对这些玩弄政治的自命不凡的文人的义愤情绪。他讽刺地描述说，这些人“从地质学观点出发作了关于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宇宙演化论的经济基础的优美的演讲。”<sup>①</sup> 这些人对任何肯于听他们讲话的公众都神气活现地打情卖俏，从而既贬损了诗歌，又贬损了政治。然而，如果观察者的目光足够锐利的话，他就能够通过自我欣赏的词句的一切云雾分辨出真实情况来。《流亡中的大人物》提到金克尔时说：“当想象直接变成说谎，夸张直接变成庸俗的时候，他便没有力量使丑的一面不在实际中暴露出来。”<sup>②</sup> 小册子还告诉我们，卢格之不断求助于“人道主义”，这使人们对其他试图拥护人道主义的人产生了怀疑。马克思称“人道主义”为一个空洞的词，而“德国的一切糊涂虫，从罗伊希林<sup>③</sup> 到海德，都是用这种词句来掩盖他们的狼狈相的。”<sup>④</sup> 当卢格老头(*le père Ruge*)求助于本应有丰富内容但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的这个词时，他再一次表演了马克思认为是他的主要职能的东西：“阿尔诺德提倡德国小资产阶级庸人的理性，或者说得确切些，是提倡这种人的无理性。”<sup>⑤</sup>

#### (4)

为《流亡中的大人物》一文搜集的某些材料在另一篇反对奥古

---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347页。

② 同上书，第352页。

③ 约翰·罗伊希林(1455—1522)，德国学者，语言学家和法学家，人文主义的著名代表。——译注

④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312页。

⑤ 同上书，第316页。关于金克尔的被贬低的浪漫主义和它同庸俗的生活方式的关系，参阅上引R·S·李温斯通的著作，第31—33页。



斯特·维利希<sup>①</sup>的文章中得到发表的机会，维利希是反对马克思观点的一个流亡的共产党人。这部小作品的标题是《高尚意识的骑士》(Der Ritter vom edelmütigen Bewusstsein)，发表于1854年。在这里，我们再一次发现在《流亡中的大人物》中常见的那种模仿英雄史诗的调子和引用波雅多的《钟情的罗兰德》的地方；但是从标题可以看出，引证的中心是《堂吉诃德》。这篇文章十分恰当地把重点放在一部会使堂吉诃德从内心感到高兴的冒险小说的题目上；在这之后，立刻引用《李尔王》第二幕第二场中的话，以降低忠诚的自负：

“动听的、神奇的、夸张的、前所未闻的、真正的和充满冒险情节的关于举世闻名的高尚意识的骑士的故事就此结束。

他有一颗正直坦白的心，他必须说老实话；要是人家愿意接受他的意见，很好；不然的话，他是个老实人。

我知道这种家伙。”<sup>②</sup>

在这里，马克思再一次毫不犹豫地引用了莎士比亚的一个最令人讨厌的角色——《李尔王》中的康华尔公爵所讲的话。他明确表示同情康华尔这些句子里的想法，并且要求读者也同意这几句话。

马克思在进行了这一切攻击之后，发现在审判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期间有一封可能是奥古斯特·维利希写的信却被认为是

<sup>①</sup> 奥古斯特·维利希(1810—1878)，普鲁士军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是宗派主义—冒险集团的领袖之一，1853年流亡美国，在那里参加了北方对南方的国内战争。——译注

<sup>②</sup>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571页。(《李尔王》剧中的话引自《莎士比亚全集》(九)，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191页。——译注)

马克思写的，（这信带有金克尔的影响的明显痕迹，的确会使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人们可以想象马克思多么的气忿！他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3）中，忿怒地写道：

“即使只读过马克思写的一行字的人，都不会断言，这一封充满戏剧性的附函是马克思写的。在6月5日的仲夏夜之梦的时候，把‘红色问答书’悄悄地塞到革命庸人们的家门里去这样一种拙劣的、冒失的行动，很能表明金克尔的性格……”<sup>①</sup>

接下去对文体的细心检验把马克思青年时代在法学和文学两方面的兴趣结合起来了，马克思把他自己的文体同当时小人物的文体加以对比，并对伟大的文学作品，甚至象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那样的作品，在低水平的读者的头脑中所受到的歪曲加以嘲笑。

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马克思在适当的地方再次使用歌德的靡非斯托斐勒司的话来讲话<sup>②</sup>；他再次直接或间接地赞赏海涅。当马克思引用海涅的早期组诗《梦境》（Traumbilder）的第八首诗，恰当地形容普鲁士当局召来那些为他们的迫害作辩护的人的心理时，这赞赏是直接的<sup>③</sup>；而当马克思采用了海涅的读者会看出来是海涅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论述德国宗教、哲学和文学的文章中所提出的看法时，这赞赏是间接的：

195

“什么时候曾经有人控告过以打倒顽固守旧的罗马地方官为目的的第一批基督徒呢？普鲁士的国家哲学家们，从策布尼茨到黑格尔，都致力于推翻神，可是，如果我要推翻神，那我也同样要推翻神所恩赐的国王。难道曾经有人以反对霍亨索伦王朝的罪名迫

<sup>①</sup>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20页。（译文略有改动。——译注）

<sup>②</sup> 同上书，第534页。

<sup>③</sup> 同上书，第486页。



害过他们吗？”<sup>①</sup>

在马克思这本关于科伦审判案的小册子里，除了这样的总结和回忆之外，还填以诙谐的模拟，而首先就是对于次等文学作品的诙谐的模拟，这些作品包括从感伤的家庭小说到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从“警察和仆役的喜剧”（Widrige Polizei-und Bedientenkomödie）到情节剧和歌剧脚本<sup>②</sup>。马克思似乎是在指出，普鲁士当局通过他们的谎言和阴谋诡计歪曲了生活，乃至生活看来象是拙劣的文学作品；但这些启示将帮助读者看到事件的本来面目，并且能比科伦陪审团更加公正地估计这些事件的意义。这样，马克思在他定居于伦敦的头四年里，发现戏剧批评和文学批评的词汇极其适合用于评论政治情况；“诙谐模仿”现在是个关键概念，而“诙谐模仿”（特别是对文艺复兴时代的史诗的模仿）也为他的论辩性小册子提供了主题和结构方面的基础。有时看来生活本身就披上了拙劣文学作品的外衣。他曾想比先前任何时候都更加详细地说明，一切阵营和国家的作家——从拉马丁和卡莱尔到哥特弗利德·金克尔——怎样才可以被看成是经济和社会利益的“思想上的代表人物”，以及他们的文学作品怎样流露他们的阶级和时代所特有的幻想，他们又怎样掩盖或揭露政治现实。他对当时新流行起来的一种文学作品——奥尔巴赫的农村故事表示怀疑，认为这是骗人的田园诗的一种邪恶的形式，他并且提出他的“用未来作题材写诗”的概念同以旧诗为基础的因袭的写法相对立。但是甚至在说明这种诗的特征时，他也在过去的作品中找到了他的最适当的词句；即使在这时，当他日益埋头于经济研究的时候，他也能

① 《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68页。（译文略有改动。——译注）

② 同上书，第515页等处。

借助于桑丘·潘沙、吉尔·布拉斯或舒夫特勒和斯皮格尔勃来很好地描绘他自己的时代。而当他环顾四周那些居住在他这个世界上的人物和统治着这个世界的人物时，他发现十九世纪的小说家和诗人已经比他自己更加贴切地给他们起了名字；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们的风格是狄更斯的俾克史涅夫的风格，当代道德家的风气是巴尔扎克的克勒维尔的风气，而看来注定最有力决定欧洲最近的前途的君主则是法国翻版的海涅的克拉普林斯基。



## 第九章

## 历史的悲剧

“这样,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而我认为,  
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sup>①</sup>

## (1)

马克思在写完《流亡中的大人物》以后给恩格斯的一些信里面,流露出他对接触到的那些德国文人日益增长的不满。对金克尔和倒霉的约翰娜·莫克尔的责骂接二连三地出现,使用的词句令人想起海涅在《路德维希·白尔尼》这本小册子里对白尔尼一伙人的评论。<sup>②</sup>对于海尔维格发表在与马克思本人和有关系的一家刊物上的一首诗,马克思认为除了称之为“臭诗”<sup>③</sup>以外,别无恰当的言词。对于弗莱里格拉特,马克思尽量采取容忍的态度,因为他希望能维系住这个人,把他当作一个有用的盟友。但是即使这样,从马克思写给恩格斯的信里也可以看出,要他永远对此人保持客气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但是,从马克思同弗莱里格拉特的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574页。

② 马克思曾答应海涅对他的这部作品给予评论,但没有时间来实现这项诺言。马克思在他1861年2月14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157页)提到约翰娜·金克尔的“身上发出难闻的气味”(bitteres Fleisch)时,不过是重复了海涅在《路德维希·白尔尼》中一段类似的有关段落中使用过的词句。

③ 1859年8月1日致恩格斯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449页。德文原文为“Das Saugedicht”,直译应为“猪猡的诗”。——译注

一段关系里我们可以了解到许多东西，值得我们更详细地说一说。

在弗莱里格拉特参加编辑《新莱茵报》那段同马克思交往的期间，他的诗歌得到了新的生命。《不管这一切》和《死者致生者》等几首诗所表现出来的力量和信念，绝大部分要归功于他热情地皈依了马克思向往的事业。因此，正是弗莱里格拉特有资格被委托写了一篇挑战似的《告别词》<sup>①</sup>登在《新莱茵报》最后一期（有名的“红色版”）头版正中央。1848年革命失败后，他和马克思都定居在英国，很长一段时间弗莱里格拉特一直说他们两人都属于同一个“党”（或象他戏谑地称为“犹太人集会”）——虽然从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后，就再没有任何一种政党组织存在了。 198

马克思知道弗莱里格拉特是他的一个最有价值的同盟者——也许他不是海涅那样一个大诗人，但却很有号召力；在德国，他的声音比马克思自己的声音更容易为人接受。因此，马克思想用早些时候（根据卢格的证明）影响海涅的方法塑造弗莱里格拉特的诗

---

① 弗莱里格拉特在《新莱茵报》的告别词中写道：

“别了！只是并非永别！  
他们消灭不了我们的精神，弟兄们！  
当钟声一响，生命复临，我还要生气勃勃地  
回到你们身边！  
当最后的王座倾覆，  
当人民走上法庭  
喊出无情的声音：‘你们有罪’，  
那时候我还要重新回到你们身边。  
我这个被放逐的叛乱者，  
作为一个忠实于到处起义的人民的战友，  
将在多瑙河畔和莱茵河边，  
用言语和武器参加战斗！”

（见《弗莱里格拉特选集》，俄文版，  
第196页——译注）



才：建议他写一些讽刺诗。弗莱里格拉特欣然接受了马克思的劝告；他给约瑟夫·魏德迈<sup>①</sup>写了两封讽刺体的诗笺，由后者刊登在那份曾发表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短命”的杂志（不定期刊物《革命》）上。弗莱里格拉特不仅接受了马克思的建议要写哪一类的诗，而且把其中一首的个别章节交给马克思请他指教。哥特弗利德·金克尔曾玩弄手腕把自己的照相登在英国报纸上，这首诗讽刺的便是这件事；弗莱里格拉特就他是否把这一事实恰当地表现出来，征询马克思的意见。马克思回信说：

“你寄给我看的那一节诗写得非常好。巧妙地表达了犯罪构成，但我认为，它将损害整首诗的效果。首先，金克尔真是一个‘德国诗人’吗？我和许多其他知道底细的人敢于对此提出怀疑。其次，‘德国诗人’同‘商业的巴比伦’[等于伦敦]之间的重大对立，难道不会由于后来又谈到‘自由的’诗人同‘卑躬屈节的’诗人之间的对立而缩小吗？尤其是，在《安徒生》中你已经详尽地描述了傲慢的文学家对待与‘诗人’相对立的世界的态度。因为，在我看来，没有任何内在的必要性在这个地方引伸到金克尔，那样做只会给敌人提供理由来猛烈攻击这一节诗，说它是个人意气或敌对的表现。但是，既然这一节诗写得非常成功，不能不加以利用，那末你——如果你认为我的意见是正确的话——务必找机会将它放到你今后要写的有关别的问题的某一首诗里。的确，素描是好极了。”<sup>②</sup>

---

<sup>①</sup> 约瑟夫·魏德迈(1818—1866)，德国工人运动和美国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译注

<sup>②</sup> 《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483页。（原译文中无“等于伦敦”这几个字。——译注）本书此段引文引自M·海凯尔编《弗莱里格拉特同马克思恩格斯的通讯集》（柏林，1968年），第1卷，第37页。

弗莱里格拉特听从了马克思的通情达理、措词委婉的劝告，抽去了诗中讲到金克尔的那一节。

在他们共同流亡于伦敦的日子里，弗莱里格拉特有过不少为马克思效劳的机会，他象个绅士般地无私地、不声不响地做了不少事。但是，弗莱里格拉特也同马克思认识的其他诗人一样，需要别人的恭维和赞誉；马克思对此虽然感到十分可笑，但对弗莱里格拉特还是很感激，并且也能够尊敬他。“写一封亲切的信给弗莱里格拉特，”马克思在1852年1月16日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讲道：

“别舍不得用恭维话，因为所有的诗人甚至最优秀的诗人多多少少都是喜欢别人奉承的，要给他们说好话，使他们赋诗吟唱。我们的弗莱里格拉特在私生活上是一个最可爱最朴素的人。在他的真诚的善良心灵里隐藏着最灵敏和最善讽刺的才智；他的热情是‘真实的’，但并不使他成为‘非批判的’和‘迷信的’。他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是一个十分忠诚的人——这是我只能对少数人用的赞语。但是诗人——不管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总是需要赞扬和崇拜的。我想这是他们的天性。”<sup>①</sup>

但是这种友好的、基本上怀着敬意的态度并没有延续很久。在19世纪50年代中，弗莱里格拉特逐渐接近了另一帮侨民，其中也包括哥特弗利德·金克尔一伙人——就是弗莱里格拉特曾经请马克思指教的那一节讽刺诗的对象。及至1859年，弗莱里格拉特和金克尔参加纪念席勒诞生一百周年的筹备活动已经成了众所周知的事实，马克思和他的关系便恶化了。1859年6月7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关于弗莱里格拉特。在我们之间说，这是个无耻之徒，……让这些诗人见鬼去吧！”“这个肥胖的庸人……写了赞美

<sup>①</sup> 《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474页。



诗(采用了席勒的《酒神颂》的韵律;他念给我听过——华而不实,很不入耳)。“只要他放个屁,别人就高呼万岁……——这个家伙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sup>①</sup>在马克思和卡尔·福格特<sup>②</sup>的争执中,弗莱里格拉特拒绝明确地站在马克思一边,这就更加激怒了马克思。由于这场争执他们互给对方写了一些信,弗莱里格拉特在一封信里用雄辩的、庄严的词句表示他希望从马克思想要囚禁他的“党的笼子里”解脱出来。马克思在回信中正确指出,自从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以来,他已不再属于任何有组织的“党”了。(从1852年以来,关于你信中所说的那种意义上的“党”,我是一无所知的),也就是说,除了“在现代社会的土壤上到处自然成长起来的政党”<sup>③</sup>之外,“党”已经不复存在了。直到1866—1869年第一国际处于全盛时期中,马克思才感到《共产党宣言》所传播的思想又有了一个政治组织在进行实际的支持。但是,弗莱里格拉特在这方面并没有与马克思共同工作。从弗莱里格拉特收到《资本论》第一卷后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亲切的信中(弗莱里格拉特直到最后一刻彬彬有礼),马克思吃惊地看出这位诗人实际上已经远远落后于马克思自己的思想发展了。这本共产主义运动的经典著作是“向统治阶级头上射出一支锐箭”,而弗莱里格拉特却只把它看作是“年轻商人和工厂主”的一本有用的手册和将来学者使用的一本方便的“参考书”<sup>④</sup>。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430页(1859年6月7日);379—381页(1859年2月15日);478页(1859年11月3日);492页(1859年11月19日)。

② 卡尔·福格特(1817—1895),德国自然科学家,庸俗的唯物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后逃离德国,堕落为路易·波拿巴的密探,对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诽谤和攻击。——译注

③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481页。(1860年2月29日)

④ 见《弗莱里格拉特同马克思恩格斯的通讯集》,第182页。关于马克思和弗莱里格拉特之间的关系,参见此通讯集的导言和F·J·拉达兹著《卡尔·马克思政治传记》(汉堡,1975),第160—183页。



由于弗莱里格拉特离开了革命道路，而海尔维格后来也背离了马克思路线转向拉萨尔，马克思不得不一再鼓励一些二三流作家努力发展自己的才能以传播《共产党宣言》所宣布的伟大事业。第一个被选中的候补人是卡尔·济贝尔<sup>①</sup>。马克思在1859年8月13日给恩格斯的信里写道：“你的亲戚济贝尔（虽然我对他的诗作并不很欣赏）能不能为《人民报》写些短诗？但是不要伤感的。为了嘲弄弗莱里格拉特，我们无论如何应该找一个诗人，哪怕我们必须自己替他写诗。”<sup>②</sup>当然，济贝尔对这样的工作是力不胜任的。不久马克思只好另外再请高明人物了。他给一个叫约翰·菲力浦·贝克尔<sup>③</sup>的人写信，称赞他最近写的两首讽刺诗，并建议该如何出版；但是不久马克思就不得不承认，即使同海尔维格或弗莱里格拉特比较起来，贝克尔也是微不足道的<sup>④</sup>。因此，毫不奇怪，马克思总是怀念一位曾经支持过他的事业的伟大诗人，怀念这位他不论在什么时候总是骄傲地称之为朋友的海涅。这些年，马克思在一些不准备发表的信中直接提到海涅时，对他的为人表示了某种不太尊重的取笑，对他承认“回到”上帝那里去表示非常震惊，而对他的妻子（有关她的任何最卑鄙的诽谤马克思也轻信不疑）则流露出没有根据的轻蔑；但是在公开场合，马克思从来没有表露过自己的这些情绪。他对海涅的文学成就始终非常赞赏，对那些轻视海涅作品的人嘲弄备至。<sup>⑤</sup>马克思对海涅的尊崇间接表现在他喜欢仿

201

---

① 卡尔·济贝尔（1836—1868），德国诗人；曾协助传播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是恩格斯的远亲。——译注

②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456页。

③ 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809—1886），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国际各次代表大会的参加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译注

④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522页；第31卷，第31页。

⑤ 见《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柏林，1967年），第2卷，第235—237页。



效海涅的著作和透过海涅的眼睛来看待一些知名的人物（以及某些私交）。拿破仑三世始终是克拉普林斯基，而伦敦的一群流亡者则被加上了海涅的《两个骑士》中第二个骑士的头衔：“愚蠢的瓦西拉普斯基们自然什么也不懂。”<sup>①</sup>来自莱茵河畔的爱国者雅科布·费奈迭自从海涅首先给他起了科贝斯第一这个绰号后就一直是这样一个狂欢节中的化妆人物<sup>②</sup>。卢格被叫做糊涂虫，这本是海涅给谢林起的绰号<sup>③</sup>。甚至出现在《共产党宣言》中，现已成为马克思词汇中的一个人所共知的贬义词“流氓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如果推究其来源，似乎也多少有海涅的一份功劳。海涅在1832年4月19日发表的《法兰西状况》一文中，曾谈到在巴黎一次霍乱流行期间，捡垃圾的人（Lumpensammler）同贵族查理党人之间发生了共同的利害关系：

“后一种人同拾垃圾的人和捡破烂的老太婆结成了天然的同盟，因为他们根据同样的原则提出权利要求。他们都维护惯例权，都维护传统的、世袭的占有垃圾和形形色色的破烂货的权利。”

202 每逢马克思谈到“流氓无产阶级”时，他的矛头所向正是贵族同《共产党宣言》里说的这一“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结成的联盟。和海涅一样，他创造了“流氓无产阶级”这个词也是由

---

① 1853年12月2日致恩格斯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312页。（这里是讽刺地暗指1853年11月29日参加波兰人大会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译注）

②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415、420页。科贝斯第一是海涅同名讽刺诗中的主人公。——译注

③ 1854年12月2日致恩格斯的信及1852年1月23日致约·魏德迈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415、476页。（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冯·谢林（1775—1854）是德国哲学家，客观唯心主义者，科学的敌人，宗教的捍卫者。——译注）

于 Lumpen 这个字不仅可以解释为“破烂儿”，也兼有“流氓”的意思。

海涅早期写的非政治性的诗歌，马克思也乐于引用。从出现在马克思书信中的“一阵甜蜜的钟声，轻轻掠过我的心房”和“这是老生常谈”<sup>①</sup> 这些诗句，可以看出马克思对海涅《诗歌集》一书的喜爱，其中有些首已经深印在他的脑海里了。

在马克思点出他的某些同时代人的性格特征或者想用漫画手笔勾划这些人的脸谱时，他总是借用许多作家创造的形象。海涅只不过是他喜爱的作家中的一个罢了。譬如，和马克思同时代的一个名叫威廉·皮佩尔的流亡者在马克思的一封信中就先后以老马伏里奥<sup>②</sup>（“他脸上笑出的皱褶比加上东印度群岛的新地图上的线纹还多”）、德国浪漫主义的一位英雄人物（《儿童的奇异号角》中的漂亮的小孩——“奇异的号角”这里讽示皮佩尔的出身！）、莎士比亚的培尼狄克<sup>③</sup> 以及按照他自己的估计以莱布尼茨和拜伦两者的混合物出现。稍后一些时候，马克思在另一封信里又嘲笑这个人在爱情上的冒险，先称他为席勒叙事歌谣中的忠诚的主人公弗里多林，后来又叫他维斯瓦米特拉王；根据海涅的一首诗，这位国王为了一头母牛吃尽苦头，想必是头公牛。<sup>④</sup> 住在巴黎的一个德

---

① 1854年6月1日致拉萨尔信；1854年7月22日致恩格斯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614、376页。（“这是老生常谈”（《马恩全集》的翻译）与海涅的原诗不尽符合。原诗是：“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但是它永远奇妙新颖。”——译注）

② 马伏里奥是莎士比亚喜剧《第十二夜》中的一个管家。——译注

③ 培尼狄克是莎士比亚《无事生非》中的少年贵族。——译注

④ 1854年4月22日与1856年2月13日致恩格斯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347页；第29卷，第18页。（弗里多林是席勒的叙事诗《去炼铁厂之路》中的主人公；维斯瓦米特拉是大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虚构的国王，渴求得到满足他一切要求的神牛撒巴拉。——译注）



国侨民路德维希·西蒙,两次以伏尔泰的《老实人》中的库尼贡达的身分出现<sup>①</sup>。在这种文学游戏中,莎士比亚少不得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皮佩尔成了马伏里奥和培尼狄克;一个大胆批评过马克思文体的德国流亡者,《新英格兰报》的编辑爱德华·施累格是《爱的徒劳》中露天表演一幕中不伦不类地扮演庞培的考斯塔德<sup>②</sup>;而尤利乌斯·孚赫<sup>③</sup>据说兼有冈豪森撒谎的本领和毕斯托尔吹牛的特长。<sup>④</sup>马克思曾把狄德罗写的《拉摩的侄儿》和《宿命论者雅克》两书送给恩格斯,叫他阅读。还有一次,马克思讥嘲当时的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叫他做塞巴尔德·诺特安克,使人想到德国作家克·弗·尼古拉的小说《塞巴尔德·诺特安克先生的生平和见解》<sup>⑤</sup>。在英国作家中,除莎士比亚外,狄更斯笔下的人物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马克思的书信中,供马克思对自己的世界进行变形、扮装和漫画讽刺。理查·科布顿象尤利亚·希普一样是个“谦卑的人”<sup>⑥</sup>;而弗里德里希·察贝尔,柏林《国民报》的编辑,则

① 1860年12月19日与26日致恩格斯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131、133页。

② 1853年6月致阿道夫·克路斯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598页。(考斯塔德是《爱的徒劳》中的一个乡人。——译注)

③ 尤利乌斯·孚赫(1820—1878),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德国的自由贸易论者之一。——译注

④ 1857年4月23日致恩格斯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127页。(冈豪森是德国文学中一个惯爱撒谎吹牛的人物。毕斯托尔是莎士比亚《亨利四世》下篇、《亨利五世》等剧中的骗子手和吹牛家。——译注)

⑤ 1852年7月20日致恩格斯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88页;1856年2月13日致恩格斯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16页。

⑥ 1854年1月25日致恩格斯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322页。(理查·科布顿(1804—1865),英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论者。尤利亚·希普是狄更斯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人物,品质恶劣的、耍弄阴险诡计的穷小子,象个凶神。——译注)



成了瓦克佛尔德·史奎尔斯<sup>①</sup>。歌德也同样不断提供给马克思一些进行比拟的原型和标准。当布鲁诺·鲍威尔打算作土地投机的买卖、赚一些钱来从事研究工作的时候，马克思评论说：也许，这些美妙的幻想“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回忆起浮士德在第二部中变成土地占有者而产生的。布鲁诺只是忘记了，这种转变所需的钱浮士德是从魔鬼那儿得到的。”<sup>②</sup>当马克思套用靡非斯托斐勒司的话说：“但愿我终能找到一个什么事情做做！我的朋友，任何理论都是灰色的，唯有事业才常青”<sup>③</sup>，他用的俨然是那个魔鬼的口吻。在另一封信中，马克思又把自己看做是一个可怜虫，好象夏米索的彼德·施莱米尔。<sup>④</sup>为了同样的目的和效果，马克思也常常引用圣经和古希腊罗马作品。特别是贺雷西的作品，马克思从中找到不少有用的材料来表达自己的心境。例如在给拉萨尔的一封信中，谈到自己如何对待卡尔·福格特对他的控诉，马克思感到自己“一生中无可非议和清白无辜”。<sup>⑤</sup>他又告诉库格曼说，他不象“在这里进行煽动的流亡者喜欢从安全的远方攻击大陆上的专制君主。对我来说，这类事只有‘当着暴君的面前’做才觉得有意思。”<sup>⑥</sup>

1863年1月他写信给恩格斯，骄傲地宣称“我在科学的一些

---

① 1860年2月9日致恩格斯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34页。（斯奎尔斯是狄更斯小说《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办私立寄宿学校的生意人，惨无人道地对待学生。——译注）

② 1857年1月10日致恩格斯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89页。

③ 1862年8月20日致恩格斯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281页。靡非斯托斐勒司的原话是“我的朋友，任何理论都是灰色的，只有生命的金树是常青的。”（见《浮士德》第一部第四场。）

④ 1854年6月3日致恩格斯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363页。（彼德·施莱米尔是德国十九世纪初浪漫主义作家夏米索《彼德·施莱米尔奇遇记》中的主人公。“施莱米尔”这个词在犹太语中是“可怜虫”的意思。——译注）

⑤ 1860年3月3日致拉萨尔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493页。（语出贺雷西《颂歌》第一册。——译注）

⑥ 1869年11月29日致库格曼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625页。



极不相同的而且是极其艰难的领域里,为了扩大科学本身的范围,殚思竭虑、夜不成眠,出版了多种内容丰富的著作,也许我象贺雷西一样,有权利说:‘我奋力战斗并不是没有荣誉的。’”<sup>①</sup>

204

也就是在这同一时期,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开始用不同作家的名字代表这些人惯于使用的论战术或者出版书的方法。譬如,在一封写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谈到拉萨尔采用的是“莱辛方式”<sup>②</sup>,这样用不着多费笔墨,对方就懂得这是怎样一种论战方法,即使用劈刺战术向持有不同见解的人进攻,把对方的论点个个击破,以维护自己的观点。又譬如在几年以后写给恩格斯的另一封信里,马克思说,“雅科布·格林的方法”“一般地比较适用于那些不是辩证地分解了的整体的著作”,<sup>③</sup>他也就不必详说他指的是格林刊行作品的方法,总是在全部作品未脱稿前就分批交付出版商刊印——格林在他写的《日耳曼语言史》一书序言中曾特别提到了这种出书的方法。顺便说一下,格林的这本语言学著作马克思常常参考;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和书信中有时也谈到词源问题,总是以这本权威性的著作作为根据。

马克思不论有任何文学体验,总是立即吸收到自己的生活中,而且同其他的经验融合成一体。1852年他读了马基雅弗利的喜剧《曼陀罗华》,便马上用其中两个人物——尼恰和利古里奥的对话来嘲笑当时一个妻子与人通奸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人很感兴趣)<sup>④</sup>。1861年马克思曾在柏林短期逗留,有人带他到戏院

---

① 1863年1月28日致恩格斯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320—321页。(贺雷西原话出自《颂歌》。——译注)

② 1858年2月1日致恩格斯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263页。

③ 1865年7月31日致恩格斯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135页。

④ 1852年7月3日致恩格斯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77页。(尼古洛·马基雅弗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活动家,厂史学家和作家。他的喜剧《曼陀罗华》描写一个青年人施展阴谋诡计骗取一个愚人之妻。——译注)

去看了古斯塔夫·弗莱塔格的一出喜剧。此外马克思还在记者席上参加了普鲁士议院的一次会议，听到自由派的议员格奥尔格·芬克<sup>①</sup>的演讲。

“我在柏林看过的弗莱塔格的一出名叫《新闻界人士》的蹩脚喜剧中，描写了一个名叫**皮彭布林克**的肥胖的汉堡市侩和酒商。芬克就是这个皮彭布林克的维妙维肖的翻版。满口是令人讨厌的汉堡和威斯特伐里亚的方言，把一些词生吞活剥地咽下去，没有一句在结构上是正确的或完整的。这是我们的土产的米拉波！在这个侏儒的畜圈中唯一显得稍微象样的人物，一方面是瓦尔德克，另一方面是瓦盖纳和布兰肯堡的堂吉诃德。”<sup>②</sup>

这一段文字很可以打开我们的眼界。首先，马克思提到1852年新出的一个剧本，接着模仿了海涅的《给歌德的一个旧弟子》（1832）中的一个句子。原诗是：

205

“从远方，我高兴地听到  
人们对你的盛赞；  
说你是吕纳布格荒原上  
我们的一位米拉波！”

在这一段的收尾，又把一位保守派的政客比作堂吉诃德。我们在

---

<sup>①</sup> 格奥尔格·芬克男爵（1811—1875），普鲁士政治活动家，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左派领袖之一。——译注

<sup>②</sup> 1861年5月10日致恩格斯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169页。（古斯塔夫·弗莱塔格（1816—1895），德国资产阶级作家。奥诺莱·加比利尔·米拉波（1749—1791），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利益的代表者。瓦尔德克和瓦盖纳都是马克思时代德国政治活动家。布兰肯堡的堂吉诃德指摩里茨·冯·布兰肯堡，也是当时德国的一个政治活动家。——译注）



这里看到：马克思把政治同文学融为一体，把当代文学同过去的古典作品搀和起来，把戏剧、讽刺抒情诗同史诗揉杂到一块，又把纯属德国的人物与欧洲的名人结合起来；这段文字在马克思同恩格斯的通信中是极有特色的。

此外，马克思的书信还提供了大量材料，使我们了解到他在1852—1862这一期间如何鉴赏文学。他发现格奥尔格·维尔特后期变得过于市民化，但对他的为人却一直很尊重，对他的政治态度也很同情，对于维尔特的死马克思“深感悲痛”；虽然如此，这种尊重和同情却不能导致马克思象恩格斯那样高度评价他的文学作品。但是，如果说政治上的共鸣并不能影响马克思对一个作家的文学评价，政治上的嫌恶却会影响而且也确实影响着他对作家的态度。象沙多勃利昂这样一个贵族的保守派作家，就招致了马克思极为辛辣的抨击：

“我……也弄清了尊贵的沙多勃利昂的诡计……用最反常的方式把十八世纪贵族阶级的怀疑主义和伏尔泰主义同十九世纪贵族阶级的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在一起。自然，从文风上来看，这种结合在法国应当是件大事，虽然，这种文风上的矫揉造作有时一眼就可以看出（尽管施展了一切技巧）。至于此人的政治活动，他本人在其《维罗那会议》中把自己完全揭露出来了，问题只在于，他是得到了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的‘现金’，还是简简单单地被阿谀奉承收买了，这个虚荣的花花公子比谁都爱奉承……，‘子爵’(?)先生虽然时而靡非斯托斐勒司般地，时而基督徒般地向‘虚无中的虚无’卖弄风情，但是他的虚荣却从每个毛孔中散发出来。”<sup>①</sup>

<sup>①</sup> 1854年10月26日致恩格斯信——《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401—402页。（原译文中，“靡非斯托斐勒司般地”为“恶魔般地”。——译注）

在1844—45年，海涅在与马克思过往最密切的时候，也发表过类似的想法，马克思上述对沙多勃利昂的批评更尖锐地发挥了海涅的观点。海涅死后，在他的遗作中曾发现有《关于德国的信札》的残稿，其中也有谈到沙多勃利昂的地方。海涅认为这个人承担的任务是根据神圣同盟的要求来改造法国，想把法国人变成“基督教徒、浪漫主义者和世袭城主。”“沙多勃利昂，”海涅说，“带着一大瓶约旦河的圣水，想给变为异教徒的法国重施洗礼。”<sup>①</sup>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马克思对沙多勃利昂的抨击不只针对他的政治活动和政治观点，而且也针对他的文体。马克思认为此人结合了怀疑主义、感伤主义、浪漫主义、靡非斯托斐勒司般的狡诈和基督教的伪善；这一切所构成的虚伪和奸诈也必然反映在他的文风上——矫揉造做，不堪卒读。我们看到，马克思不只关心文风和形式，而且关心作品的思想内容，这就使他对沙多勃利昂的评论远远超过这一具体的人物和事例，而具有更深远、更普遍的意义。

从马克思恩格斯的通信里我们还可以看到，马克思非常注意文学与其他认识模式的不同。有的人把文学所表现出的对事物的观察同哲学对事物的思考等同起来，要求自己所喜爱的诗人必需有一套哲学“体系”，马克思对这种人很不以为然。“卢格这个畜生……证明说‘莎士比亚不是戏剧诗人’，因为‘他没有任何哲学体系’。而席勒，由于他是康德信徒，才是真正的‘戏剧诗人’。”<sup>②</sup>1859年快要到来了，各地都要举行纪念席勒一百周年诞辰的活动，马克思看到那些席勒崇拜者的丑恶表演越来越气愤；他所以越来越不喜欢“席勒化”无疑同这件事有关系。所谓“席勒化”，就是说

<sup>①</sup> 见海涅《作品与书信》，H·考夫曼编，第7卷，303页（关于德国的书札）。

<sup>②</sup> 1858年11月24日致恩格斯信——《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356页。



追随席勒而不追随莎士比亚。

207 前面引述的有关卢格的一段信清楚地说明了马克思同后来他的某些信徒不同：马克思从来不认为哲学的认识、哲学的完整就是优秀的文学——即使在他赞同某个作家的哲学时，也不会这样。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们也该记住：马克思永远把文学看为一个声音—形象的体系，就是说，文学不仅诉诸人们的智力、道德感，诉诸一种形式抽象的感觉，而且也要引起人们的听觉和视觉的共鸣。在很多回忆录中——特别是马克思的女儿和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回忆录——我们都可以读到描述马克思住在伦敦的家里如何不断朗诵诗歌、朗读小说和剧本的记载。马克思本人非常喜爱《浮士德》的铿锵的音调，所以在他朗读这本书的时候，总喜欢故意念得夸张一些。在他的书信里我们偶然也能看到，马克思对于印成文字的诗歌也很注意格式。1852年1月他在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一封信里写到：“要精心把诗印好，诗节之间应有适当的间隔，总之，不要吝惜版面。如果间隔小，挤在一起，诗就要受很大影响。”<sup>①</sup>

总之，马克思的信里处处表现出他对文学风格的关心和敏锐的感受。他为自己的文章风格写得不够理想而感到难过；他曾抱怨说，因为肝病的影响使他的文体出现了“低沉的呆板的笔调”<sup>②</sup>。经过比较，他发现自己很喜欢弗朗斯瓦·贝尔尼埃回忆录的那种“出色”“明确”“令人信服”的描述风格<sup>③</sup>。马克思还发现马基雅弗利的《佛罗伦萨史》是一部杰作<sup>④</sup>。他严厉批评三个法国流亡者给

---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473—474页。

② 1858年11月12日致拉萨尔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546页。

③ 1853年6月2日致恩格斯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255页。（弗朗斯瓦·贝尔尼埃（1625—1688）是法国医生、旅行家和作家。马克思这里谈的是他的《大莫卧儿、印度斯坦、克什米尔王国等国游记》（1830年）。——译注）。

④ 1857年9月25日致恩格斯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184页。

英国新闻界写的一封信“没有风格，没有思想，甚至也不是法语”<sup>①</sup>；悲叹六十年代初的德国新闻界是一群“坏透了的恶棍！这是什么样的文笔！又是什么样的胡言乱语！”<sup>②</sup>在另一封信里他又说：“维科<sup>③</sup>在自己的《新科学》中说，德国是欧洲唯一的还在用‘英雄语言’的国家。如果这个老那不勒斯人有幸领略维也纳《新闻报》或柏林《国民报》的语言，那他是会抛弃这种成见的。”<sup>④</sup>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卡尔·李卜克内西同马克思一家人度过很长一段时间，曾记叙过一个有趣的轶事——马克思会如何突然迸发出爱国热情来。有一次马克思参加了共济会会员在伦敦一家酒馆里的集会，他曾即席发表演说，谈到德国文化的伟大，德国音乐如何比英国的优越，使在场的人都非常吃惊<sup>⑤</sup>。此外，李卜克内西还有力地证实了马克思对风格问题的兴趣，以及他对风格的关心与对文学的爱好二者的联系：

“马克思极端重视语言的表达必须精纯、准确。他认为最了不起的文学大师是歌德、莱辛、莎士比亚、但丁和塞万提斯，这些人的作品他几乎每天都不释手。凡是涉及到语言的纯洁和正确的问题，他总是非常认真、一丝不苟。我记得我初来伦敦时，有一次因为在一篇文章里用了 *stattgehabte Versammlung* [举行的会议] 这个说法，挨了马克思的一顿斥责。我辩护说，人们都习惯这样用，

① 1858年3月2日致恩格斯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279页。

② 1861年1月1日致恩格斯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143页。

③ 卓万尼·巴蒂斯特·维科(1668—1744)，意大利资产阶级哲学家与社会学家，他企图确立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译注

④ 1862年4月28日致恩格斯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230页。

⑤ 《与马克思、恩格斯谈话录》，H·M·恩琴斯贝尔格尔编(法兰克福，1973年)，第250页。



马克思马上生气地说：“德国那些可恶的中等学校，没有人能在那里面学到好德文。还有那些可恶的大学……”等等。我还是尽量替自己辩护，并引证了一些经典著作的例子；但是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说过 stattgehabte〔举行的〕或 stattgefundenene〔发生的〕事件，此外也还改正了许多别的类似的说法。”<sup>①</sup>

马克思相信，如果一个人不能到外国去生活，伟大的文学作品就是掌握这些国家的语言的最有效的方法。李卜克内西回忆道：

“因为我不懂西班牙语，有一天他把我好骂了一顿！他从一堆书里抽出了《堂吉珂德》，立刻给我上了一课……虽然在其他方面他表现得很急躁，很不耐心，可是他是一位多么耐心的教师啊！只因为有一个客人来拜访，我们的课程才被打断。每天他都要考我，让我翻译一段《堂吉珂德》或别的西班牙书，直到后来断定我已经有了足够的能力为止。”<sup>②</sup>

我们刚才谈到马克思不只喜欢优秀文学作品的内容，也喜欢通过朗读欣赏作品的抑扬顿挫的音调，李卜克内西在回忆录的后部有一段记叙同马克思一家人出去远足的文章，也证实了这一点：马克思经常长篇大段地朗读《神曲》、莎士比亚的作品或者歌德的《浮士德》。

此外，在马克思自己的书札里，在李卜克内西和蒙特施图亚特·E·格兰特—达夫爵士写的回忆录中<sup>③</sup>还有不少材料说明马

---

① 见《与马克思、恩格斯谈话录》（法兰克福1973年），第213页。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柏林1967年），第1卷，第52页。

③ 见《与马克思、恩格斯谈话录》（法兰克福1973年），第245、505页。

克思一生中始终热衷于比较语言学的问题，对雅科布·格林的著作非常钦佩。但是，马克思是不喜欢方言的；李卜克内西曾回忆马克思如何专心致意地纠正他的黑森省腔调，教他学会使用受过教育的人说的标准德语。<sup>①</sup>

从马克思这几年的书信里面，我们也能看到他自己在实践他对别人的劝告。他的时间大部用于阅读、摘抄和思考政治和经济著作或政府发表的蓝皮书，有时甚至日以继夜地工作，但是他总是挤出时间来阅读一些别的书籍：

“我现在正抽空学西班牙文，从卡德龙学起。歌德在写他的《浮士德》时不仅在个别地方，而且整场整场地汲取了卡德龙的《神奇的魔术师》——天主教的浮士德。此外，说来可怕，用法文不能阅读的东西，却用西班牙文读完了，如沙多勃利昂的《阿塔拉》和《勒奈》，贝尔纳丹·德·圣比埃尔的东西。现在我拚命读《堂吉珂德》……”<sup>②</sup>

有一段日子，我们发现马克思由于精神紧张，身体不适，连报纸都放弃不看了：

“但是，晚上为了休息，我读了阿庇安关于罗马内战的希腊文原本。一部很有价值的书……他笔下的斯巴达克思是整个古代史中最辉煌的人物。一位伟大的统帅（不象加里波第），高尚的品格，

<sup>①</sup> 见《与马克思、恩格斯谈话录》（法兰克福1973年），第214页。

<sup>②</sup> 1854年5月3日致恩格斯信——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355页。  
（彼得罗·卡德龙·德·拉·巴卡（1600—1681）是杰出的西班牙剧作家。雅克·昂利·贝尔纳丹·德·圣比埃尔（1731—1814）是法国作家，感伤主义的代表人物，自然科学家和旅行家。——译注）



古代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而庞培是十足的废物……莎士比亚在写喜剧《爱的徒劳》时，看来对庞培的真正面目已经有一些概念了。”<sup>①</sup>

我们用不着阅读很多马克思的书信就会看到，他一家人都喜欢用英国文学中的人物进行比喻，简直到了入迷的程度。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里写道：“小燕妮说他〔皮佩尔〕是‘培尼狄克——结过婚的人’，但小劳拉说，培尼狄克是一个了不起的机灵鬼，而皮佩尔是个‘小丑’，而且是‘一钱不值的小丑’。孩子们经常温习莎士比亚。”<sup>②</sup> 这封信证实了马克思一家人对文学鉴赏的倾向——特别是对莎士比亚的崇拜——，凡是到马克思定居在伦敦家中作客的，很少有人不谈到这一点。马克思的家书保存下来的并不多，但是有很多地方也证实了这一点。

210

在这些家信中有一封是马克思在1856年6月21日写给他的妻子的（当时她离家到德国去作短期逗留），马克思用生动有趣的戏笔墨写的这封信倒是介绍我们了解他阅读文学的一份重要文献。在马克思对他的远离身边的妻子玩的这场诉说爱情的文字游戏中，他引用了海涅的《归乡集》中的诗句（第25首，最后一句是“我爱您，夫人！”），《奥赛罗》和《哈姆莱特》中的“请看看这幅画”（第三幕、第四场）：

“你好象真的在我的面前，我衷心珍爱你，自顶至踵地吻你，跪倒在你的跟前，叹息着说：‘我爱您，夫人！’事实上，我对你的爱情

---

① 1861年2月27日致恩格斯信——《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159—160页。（阿庇安（一世纪末至二世纪七十年代）是杰出的古罗马历史学家。——译注）

② 1856年4月10日致恩格斯信——《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40页。

胜过威尼斯的摩尔人的爱情……无数诽谤我、污蔑我的敌人中有谁曾骂过我适合在某个二流戏院扮演头等情人的角色呢？但事实如此。要是这些坏蛋稍微有点幽默的话，他们会在一边画上‘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另一边画上我拜倒在你的脚前。请看看这幅画，再看看那幅画，——他们会题上这么一句。但是这些坏蛋是笨蛋，而且将永远都是笨蛋。”

马克思在这封信中又说：“不是对费尔巴哈的‘人’的爱，不是对摩莱肖特<sup>①</sup>的‘物质的交换’的爱，不是对无产阶级的爱……”而是爱情使他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为了表达对远方的妻子的思念，马克思从奥维德那里取得了援助：

“你会微笑，我的亲爱的，你会问，为什么我突然这样滔滔不绝？不过，我如能把你那温柔而纯洁的心紧贴在自己的心上，我就会默默无言，不作一声。我不能以唇吻你，只得求助于文字，以文字来传达亲吻。事实上，我甚至能写下诗篇并把奥维德的《哀歌》重新以韵文写成德文的《哀书》。奥维德只是被迫离开了皇帝奥古斯都。我却被迫和你远离，这是奥维德所无法理解的。”<sup>②</sup>

在这封近乎游戏文章的信里面，文学被用来倾吐马克思的心声，但同时又正是借助于文学，使这些心里话不致表达得过于露骨。在马克思的其他一些家信中，这种文雅的游戏所掩盖着的热烈感情便不太容易看出来；虽然，在马克思戏谑的话语下面通常总是隐藏着

---

<sup>①</sup> 雅科布·摩莱肖特(1822—1893)，资产阶级生理学家和哲学家，庸俗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生于荷兰，曾在德国、瑞士和意大利的学校中任教。——译注

<sup>②</sup> 见《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512—516页。奥维德，一译奥维狄乌斯(公元前43—约公元17)，古罗马诗人，公元前8年因对皇帝奥古斯都的政策不满被驱逐出罗马。



某些重要的、严肃的意义。马克思给他的表妹安东尼达·菲利浦斯的一封信就是一个例子。马克思在这封信里解释为什么他决定留在英国,而不愿意回德国去;在为自己辩解时,他连续引用了《奥德塞》里的喀耳刻的典故、提修斯的神话、席勒的《威廉·退尔》的一句台词和爱尔兰的民歌“同我离别的姑娘。”<sup>①</sup>

## (2)

从文学的角度着眼,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马克思通信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无疑是写给斐迪南·拉萨尔的那些信件了。“文学”这个词在这里仍然是使用它最广的含义——就象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信中几次使用这个词那样。马克思在一封信中说,他由于生病不能动笔,“不仅就写作而言,而且就这个字的本来意义而言”;在另一封中谈到经济领域中的“‘正式’文献”和“数学群书”<sup>②</sup>。马克思后来变得越来越不喜欢拉萨尔,认为他是个公子哥儿,对德国社会主义运动起了恶劣的作用。在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里面,他常常不客气地、不留情面地提到拉萨尔的犹太性格。马克思叫他做“伊威希”<sup>③</sup>,又模仿一首德国民歌来嘲笑他:

“伊威希啊,伊威希,是什么迷了你的心窍,

① 1861年4月13日致安东尼达·菲利浦斯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589—591页。(喀耳刻(一译瑟西)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女巫,曾把尤利西斯的同伴变成猪,而把尤利西斯本人留在自己的岛上。提修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雅典王子,曾进入克里特迷宫斩妖除鬼。——译注)

② 1858年5月31日与1862年6月16日致拉萨尔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539页;第30卷,第624—625页。(“文学”一词原文“Literature”有两个意义,指文学,也可指“文献”、“群书”。——译注)

③ 伊威希(Itzig),即“艾萨克”(Isaac)希伯来语之称呼。——译注

## 你同海尔维格、赫斯结成知交？”<sup>①</sup>

马克思后来最感到伤心的一件事就是发现他的老战友格奥尔格·海尔维格给拉萨尔的组织写了一首“马赛曲”(“全德工人联合会会歌”),马克思认为这是一种背叛行为,为此,他不断尖刻嘲笑海尔维格(“这个‘劳动’的虚幻朋友和‘缪斯’的实际朋友”)<sup>②</sup>。但是在他给拉萨尔本人的信里面,却可以谈论很多东西。他和拉萨尔讨论过伊壁鸠鲁学派、斯多葛派和怀疑论;谈过他如何喜爱古代历史学家(在读过修昔的底斯的著作后,马克思写道:“这些古代人至少总还是令人感到新鲜。”);也表示过他对《物种起源》的看法(“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粗率的英国式的阐述方式当然必须容忍……”<sup>③</sup>)。此外,在这些书信里马克思还讨论过他对于资产阶级文学批评家尤利安·施米特的看法,认为这个人的文章十足地表现出只是一个有教养的资产阶级庸人:“我虽然没有读过施米特的什么著作,而只是翻阅过很少的一点,但是我总觉得这个人即使在他的文字里也表现出是一个十足令人讨厌的资产阶级趋炎附势的化身,心里对他很反感。”<sup>④</sup> 马克思曾向拉萨尔承认,自己对德国当代作

212

---

① 1863年8月15日致恩格斯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364—365页。这首民歌原来的词句是“姑娘啊,姑娘啊,是什么迷了你的心窍,你同驿车和旅客结成知交?”

② 1864年9月7日致恩格斯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423页。

③ 1857年12月21日,1861年1月16日,1861年5月29日致拉萨尔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527页;第30卷,第574、602页。

④ 1862年6月16日致拉萨尔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622页。(引文略有改动。亨利希·尤利安·奥雷尔·施米特(1818—1886),德国批评家和文学史家,1866年起为俾斯麦的拥护者。——译注)



品不够了解，拉萨尔想弥补马克思这方面的缺陷，有一次趁马克思去柏林的机会，便拖着他去看了一个戏剧，这就是马克思后来在给安东尼达·菲利浦斯信中谈到的那个“柏林喜剧，充满普鲁士的自我吹嘘。总之，这是很令人讨厌的东西。”<sup>①</sup> 马克思可以用拉丁文写“经过种种不幸”，肯定拉萨尔会知道这句话出自维吉尔的《亚尼雅士之歌》；当他想到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每逢批判地叙述完拉萨尔的言行以后，出于习惯总是从同一本书引证一句讽刺的按语“小伙子，你的英勇应受赞美”的时候，也许会不禁哑然失笑。如果马克思写了“小幅报刊的那些走狗”，他知道拉萨尔会把这句诗的上下文——海涅的《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中整个一小节诗全部背出来<sup>②</sup>。他可以用游戏笔墨随意引述很多东西，拉萨尔全都能了解：十六世纪的《梅尼培<sup>③</sup>讽刺诗》，博马舍的《费加罗的婚礼》<sup>④</sup>，席勒的《华伦斯坦》<sup>⑤</sup>，或者是海涅的《诗歌集》<sup>⑥</sup>他在书信中以沉重的心情在谈到他的一个孩子死去时，提到培根在《知识的进展》中向杰出人物提供的慰藉的话对自己并不适用<sup>⑦</sup>。在另一封信里，

---

① 1861年3月24日致安东尼达·菲利浦斯信——《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585页。

② 海涅的原诗是“爱真理的人将在斗兽场跟狮子、鬣犬、豺狼格斗，他们决不在小幅报刊上去对付那些走狗。”（引自冯至译《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64页。）——译注

③ 1861年5月8日致拉萨尔信——《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597页。（梅尼培是古希腊诗人，犬儒学派哲学家。——译注）

④ 1855年11月8日致拉萨尔信——《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632页。

⑤ 1859年10月2日致拉萨尔信——《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598页。

⑥ 1854年6月1日致拉萨尔信——《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614页。

⑦ 1855年7月28日致拉萨尔信——同上书，第626页。（原文是：“培根说，真正杰出的人物，同自然界和世界的联系是这样多，他们感到兴趣的对象是这样广，以致他们能够轻松地经受任何损失。我不属于这样的杰出人物。我的孩子的死震动了我的心灵深处，我对这个损失的感受仍象第一天那样的强烈。”——译注）

马克思把当代的一个经济学者威·罗雪尔<sup>①</sup>比作歌德的《浮士德》中的学究瓦格纳，强调指出两人的共同点和差异：

“这个〔罗雪尔〕是一个多么扬扬自得、妄自尊大、老奸巨猾的折衷主义骗子！这类按本性来说从来越不出教和学的老框框而自己也从来学不会什么东西的学究，这类瓦格纳，如果能有一丝天良和羞耻心的话，那末他对自己的学生还是有益的……”<sup>②</sup> 213

对拉萨尔，马克思可以怀着感慨的心情谈论自己作品文体上的缺陷<sup>③</sup>。最重要的是，马克思两次在文学理论上的远足，都是由拉萨尔带动的。

第一次是由于一个浮夸的悲剧引起的。这个剧本结构臃肿、语言陈腐，既无风趣机智、又缺少人物刻划，简直象一部诗律大全<sup>④</sup>，而拉萨尔却想用它来征服德国舞台。剧名是《弗兰茨·冯·济金根》，时间被安排在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期间，所有那些希望在十九世纪的德国发生一场革命的人对这一时代的兴趣都非常大，恩格斯还专门写过一本研究这一时代的经典性的著作。拉萨尔写完了这个剧本，把它寄给马克思请他过目。马克思的评论（连同恩格斯的评论）后来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发

① 威廉·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罗雪尔（1817—1894），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中的所谓历史学派的代表。——译注

② 1862年6月16日致拉萨尔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625页。

③ 见1858年11月12日致拉萨尔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545页。

④ “拉萨尔的表现方式……一大堆陈词滥调的‘火焰’——隐喻，虔诚的热情，根源于十八世纪八十年代的陈词滥调的烟火……引起人们提出卢卡契在1931年即已直率地提出的问题：在拉萨尔这种文体中，能否识别出倒退的倾向？”（见瓦尔特·兴得瑞尔：《骑士般的亚当和农民革命》，载于《日尔曼—罗曼月刊》新辑，第23卷（1973年），第179—180页。）



展成为极其重要的文献。马克思评论《济金根》的信写于1859年4月19日,对于我们理解他的文艺观很重要,英文翻译比较难得,因此尽管篇幅比较长,还是值得把全文抄录下来:

“亲爱的拉萨尔:

我没有特地写信告诉你,十四英镑十先令已经在1月14日收到了;因为来的是挂号信。但是,如果不是该死的‘荷兰兄弟’拜访我,极残酷地占去了我的剩余劳动时间,那我早就写信了。

现在他已经走了,所以我又自由地呼吸了。

214 弗里德兰德<sup>①</sup>已经写信给我。条件不如他原先告诉你的那样好,但还‘过得去’。解决了在我们之间还有的几个次要问题以后——我想,在这个星期内这就会商妥——我将给他写东西。

在英国这里,阶级斗争的进展是极其令人高兴的。遗憾的是,在这种时候连一家宪章派的报纸也不再存在了,所以,差不多两年以来,我不得不停止通过写作参与这个运动。

我现在来谈谈《弗兰茨·冯·济金根》。首先,我应当称赞结构和情节,在这方面,它比任何现代德国剧本都高明。其次,如果完全撇开对这个剧本的纯批判的态度,在我读第一遍的时候,它强烈地感动了我,所以,对于比我更容易激动的读者来说,它将在更大的程度上引起这种效果。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现在来谈谈缺点的一面:第一,——这纯粹是形式问题——既然你用韵文写,你就应该把你的韵律安排得更艺术一些。但是,不管职业诗人将会对这种疏忽感到多大的震惊,而总的说来,我却认为它是一个优点,因为我们的专事模仿的诗人们除了形式上的光泽,

---

<sup>①</sup> 麦克斯·弗里德兰德(1829—1872),德国政论家,拉萨尔的表兄弟,维也纳的《新闻报》的编辑之一。——译注



就再没有别的什么了。第二，你所构想的冲突不仅是悲剧性的，而且是使 1848—1849 年的革命政党必然灭亡的悲剧性的冲突。因此我只能完全赞成把这个冲突当作一部现代悲剧的中心点。但是我问自己：你所选择的主题是否适合于表现这种冲突？巴尔塔扎尔的确可以设想，如果济金根不是借骑士纷争的形式举行叛乱，而是打起反对皇权和公开向诸侯开战的旗帜，他就一定会胜利。但是，我们也可以有这种幻想吗？济金根（而胡登多少和他一样）的覆灭并不是由于他的狡诈。他的覆灭是因为他作为**骑士**和作为**垂死阶级的代表**起来反对现存制度，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反对现存制度的新形式。如果从济金根身上除去那些属于个人和他的特殊的教养，天生的才能等等的东西，那末剩下来的就只是一个葛兹·冯·伯利欣根了。在后面这个**可怜**的人物身上，以同样的形式表现出了骑士对皇帝和诸侯所作的悲剧性的反抗，因此，歌德选择他作主人公是正确的。在济金根——甚至胡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虽然对于他，正象对某个阶级的一切思想家一样，这种说法应当有相当的改变——同诸侯作斗争时（他反对皇帝，只是由于皇帝从骑士的皇帝变成诸侯的皇帝），他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堂吉诃德，虽然是被历史认可的堂吉诃德。他以骑士纷争的形式发动叛乱，这只是说，他是**按骑士的方式**发动叛乱的。如果他以另外的方式发动叛乱，他就必须在一开始发动的时候就直接诉诸城市和农民，就是说，正好要诉诸那些本身的发展就等于否定骑士制度的阶级。

215

因此，如果你不想把这种冲突简单地化为〈葛兹·冯·伯利欣根〉中所描写的冲突——而你也没有打算这样做，——那末，济金根和胡登就必然要覆灭，因为他们自以为是革命者（对于葛兹就不能这样说），而且他们完全象 1830 年的**有教养的波兰贵族**一样，一方面使自己变成当代革命思想的传播者，另一方面又在实际上代



表着反动阶级的利益。革命中的这些**贵族**代表——在他们的统一和自由的口号后面一直还隐藏着旧日的帝国和强权的梦想——不应当象在你的剧本中那样占去全部注意力，农民和城市革命分子的代表（特别是农民的代表）倒是应当构成十分重要的积极的背景。这样，你就能够在更高得多的程度上用最朴素的形式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出来，可是现在除**宗教**自由以外，实际上，国民的一致就是你的主要思想。这样，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而我认为，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你自己不是也有些象你的弗兰茨·冯·济金根一样，犯了把路德式的骑士反对派看得高于闵采尔<sup>①</sup>式的平民反对派这样一种外交错误吗？

其次我感到遗憾的是，在性格的描写方面看不到什么特出的东西。我是把查理五世、巴尔塔扎尔和理查·冯·特利尔除外。然而还有别的时代比十六世纪有更加突出的性格吗？照我看来，胡登过多地一味表现‘兴高采烈’，这是令人厌倦的。他不也是个聪明人，机灵鬼吗？因此你对他不是很不公平吗？

甚至你的济金根——顺便说一句，他也被描写得太抽象了——也是多么苦于不以他的一切个人打算为转移的冲突，这可以从下面一点看出来：他一方面不得不向他的骑士宣传与城市友好等等，另一方面他自己又乐于在城市中施行强权司法。

216

在细节的方面，有些地方我必须责备你让人物过多地回忆自己，这是由于你对席勒的偏爱造成的。例如，在第121页上，胡登向玛丽亚叙述他的身世时，如果让玛丽亚把从‘感觉的全部音阶’等等一直到‘它比岁月的负担更沉重’这些话说出来，那就极为自然了。

<sup>①</sup> 托马斯·闵采尔(1490左右—1525)，德国宗教改革时期和1525年农民战争时期农民和平民阵营的领袖和思想家。——译注

前面的诗句,从‘人们说’到‘年纪老迈’,可以摆在后面,但是‘一夜之间处女就变成妇人’这种回忆(虽然这指出玛丽亚不是仅仅知道纯粹抽象的恋爱),是完全多余的;无论如何玛丽亚以回忆自己‘年老’开始,是最不能容许的。在她说了她在‘一个’钟头内所体验的一切以后,她可以用关于她年老的一句话把她的情感一般地表现出来。还有,下面的几行中,‘我认为这是权利’(即幸福)这句话使我震惊。为什么把玛丽亚所说的她迄今对于世界持有的天真看法斥为说谎,因而把它变成关于权利的说教呢?也许下次我将更详细地对你说明我的意见。

我认为济金根和查理五世之间的一场是特别成功的,虽然对话有些太象是公堂对质;还有,在特利尔的几场也是成功的。胡登关于剑的格言是非常好的。

这一次已说得够多了。

你的剧本获得了一个热烈的赞赏者,那就是我的妻子。只是她对玛丽亚不满意。

祝好。

你的卡·马·

顺便说一下,恩格斯的《波河与莱茵河》里面有严重的刊误,我在这封信的最后一页上附了一个勘误表。”<sup>①</sup>

这一文献必须从四个角度去认识:(1)当拉萨尔把《弗兰茨·冯·济金根》送交马克思和恩格斯征询意见时,随着这份手稿还附有一篇阐述他对于悲剧看法的论文,因此马克思的复信是对剧本同论文的双重回答;(2)马克思并不喜欢拉萨尔,只是把他当作一个可

<sup>①</sup>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571—575页。(译文有几处略有改动。——译注)在译这封信过程中,觉得信结尾评论玛丽亚的话语时,马克思可能把 *erlebt* (体验) 误写成 *erzählt* (叙述)。



资利用的同盟者。在这种不很融洽的关系中，这封信可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事件；（3）恩格斯在1850年夏天写了一系列关于德国历史的经典性论文，投寄给《评论》杂志，后来集为一本小册子，以《德国农民战争》为名单独印行。马克思的这一封信重新阐述了这些历史观点；（4）马克思一直尝试把文学也组织到他的完整的“人文科学”的体系中去。五十年代后期马克思写的一部巨著——《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的《导言》部分以及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发表于给拉萨尔写这封信的同年）写的《序言》，这两篇著名的文章都是这种尝试的结果；而这封信则标志着这一努力的新阶段。

在简单地谈到一小笔钱财的事务后，信的一开始，马克思就很有风趣地让我们看到，他如何使用文学手法来叙述生活上的琐事。家族中的一位荷兰籍的亲戚正来作客，占用了比马克思认为能够节省出的更多的时间。他把“荷兰兄弟”几个字放在括弧里，好象是一个剧本的名称（正象他后面把《弗兰茨·冯·济金根》也括起来一样），这就很滑稽地表现出马克思对这个人的厌烦。一件日常生活中的事情这样就同充斥在德国舞台上许多戏剧划了等号（从F·L·施勒德尔的《里斯本兄弟》〔1786〕和台奥多尔·克尔纳尔的《不来梅兄弟》〔1815〕上演以后，舞台上出现了一系列这样的戏剧）<sup>①</sup>。这封信开始的一段还让我们看到一个事实：马克思因为长期定居伦敦，说话、写作经常使用英语，所以不太习惯一下子转回到德语去。开始的时候，英文词语不断闯进德文中来，但是很快地他就从容自如地写起德文来了。

<sup>①</sup> 这位客人可能是约翰·卡尔·优塔（1824—1886，德国书商。——译注），马克思的妹妹路易莎的丈夫。马克思不用“妹夫”而用“兄弟”（原文是Vetter，应为堂兄弟或表兄弟），显然是为了取笑这些文学作品。参见瓦·兴德瑞尔《济金根辩论，关于马克思文学理论的一篇论文》（达尔姆施塔德与诺伊威德，1974年），第412页。



下面的几段让我们看到，马克思在和拉萨尔打交道的时候需要使用一些外交手腕。马克思这时候失去了能在英国报刊上发表文章的小小地盘，不得不多方寻求帮助，努力在德语报章上打开一条出路。马克思希望这些报刊在发表他的文章时，在新闻检查或编辑的谨小慎微的许可范围内，尽量少歪曲他的观点；另一方面他也希望这些刊物能付给他一定的稿酬，减轻他经常陷入的经济窘境。在这些事情上，拉萨尔是个很宝贵的中间人<sup>①</sup>。从这封信可以看出，拉萨尔刚刚给马克思同麦克斯·弗里德兰德接通了关系；弗里德兰德是拉萨尔的表弟，在维也纳主编《新闻报》。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马克思为这份报纸撰写了不少稿件。“在英国这里，阶级斗争的进展是令人欣慰的”；如果马克思能促进德国的阶级斗争的发展，使它达到同样“令人欣慰的”地步，那他就必需寻找一切可能找到的同盟军。拉萨尔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建有联系，而马克思因为流亡国外却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再说，拉萨尔在附寄《弗兰茨·冯·济金根》手稿的信中又极力表示他同马克思的深挚的友谊，这样一个同盟者是不应该轻易推拒的。因此，尽管拉萨尔的这个成为死胎的剧本缺点很多——韵律呆板、形象陈旧、用词夸张、人物刻划浅薄，尽管如此，马克思也不能象今天任何一个毫无顾虑的读者那样坦白地说：“作为文学，这个剧本简直不象样；作为政治宣传，观点又站不住脚。”事实上，马克思信中所表达的也正是这样一种意见；但是他显然竭力在寻找一些他可以问心无愧地加以赞誉的东西，而在称赞的过程中，马克思却毫不含混地阐明了他的文学批评所根据的某些原则。

马克思首先对《弗兰茨·冯·济金根》的结构和选材称赞了一番

<sup>①</sup> 几个月以前(1859年2月1日)，马克思曾对魏德迈说，由于拉萨尔“特别的热情和劝说能力”使出版商弗朗茨·顿克尔接受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见《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553页。)



——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马克思如何重视一个剧本的 Gestalt [形式]，即剧本的结构和情节。但是，当马克思说拉萨尔的剧本在这方面比德国其他现代作品高明的时候，我们应该心里有数，马克思是不适宜对歌德以后的德国戏剧发表什么高见的。他在伦敦没有机会观看德国戏剧演出，虽然马克思贪婪地读了大量图书，但是却没有证据说明他读过格里耳帕尔策<sup>①</sup>，海贝尔，或者奥托·路德维希等人的任何一本作品，更不要说在 50 年代不论在德国或在英国都很难读到的格奥尔格·毕希纳的著作了<sup>②</sup>。所以马克思对拉萨尔的称赞是不落实的；而且这一点马克思只是一笔带过，接着就谈起这部作品如何强烈地感动了自己，这在马克思说来，还是很少见的。“完全撇开对这个剧本的纯粹批判的态度”——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撇开”并不是个好征兆，因为马克思最喜欢批判，他的许多重要作品都用“批判”作为标题或者副标题。虽然如此，马克思还是承认在第一次读这个剧本时受到强烈感动；而且因为从性格来说，马克思自己不是一个容易激动的人，所以对于那些与马克思秉性不同的人，剧本肯定会更有效果。马克思并没有说拉萨尔的剧本哪一方面感动了他；我们不妨猜测一下，那一定是马克思前面称赞过的剧本的情节或者主题。这个剧本的内容正是恩格斯认为（马克思也完全同意）十九世纪的革命与之有重要的共同点、并可

---

① 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中曾引证过格里耳帕尔策的剧本《女始祖》中的句子（见《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11页），但误认为这是阿道夫·默尔奈所作。所以马克思是否读过格里耳帕尔策的原书或看过这个戏剧，是很值得怀疑的。

② 弗兰茨·格里耳帕尔策（1791—1872），奥地利戏剧家。

克里斯蒂安·弗里德利希·海贝尔（1813—1863），德国剧作家和诗人。

奥托·路德维希（1813—1865），德国剧作家和小说家，著有《天地之间》（1856）和《林务员》（1850）等现实主义作品。

格奥尔格·毕希纳（1813—1837），德国革命民主主义诗人和剧作家，他作的剧本《沃伊采克》是德国第一部以无产阶级为主人公的悲剧。——译注



以从中汲取重要经验教训的那场德国“革命”<sup>①</sup>。一个公开声明同情革命的作者试图用文学形式来抓住历史早期的一场革命的实质，这无论如何是一件令人感动的事。从更广的意义上看，马克思承认对于一部文学作品在批判性的反应前，首先有一个更为直接的、感情上反应，承认这对文学作品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这不得不说是一件令人感到兴趣、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事。

接着，马克思开始评论《弗兰茨·冯·济金根》中使用的无韵诗。不管他批评的词句多么委婉，他认为拉萨尔的抑扬格诗写不成功，这是非常清楚的。马克思的这一看法现代读者大概很少有不同意的。我们还应该记住一点：马克思在其他场合下对于那些不通格律的诗人批评是很苛刻的<sup>②</sup>。但是，比起拙劣的诗歌来，马克思更厌恶的当然还是空洞无物的拙劣的模仿，徒有华丽的文字而无内容的唯美的纯文学作品。正因为这样，他对拉萨尔的抨击就减轻了不少份量，甚至还从业余写作的角度（不管怎么说，拉萨尔不是一个“职业诗人”）来看待这个问题，认为诗的艺术不够精湛可能还是个优点。拉萨尔后来承认他对马克思的说法感到很有意思，但是很清楚他也了解马克思的评论实际上是严肃的批评，事实上也的确是这样的。<sup>③</sup>

220

再下面几行，马克思开始研究拉萨尔写这个剧本的动机——这一点拉萨尔在他随同《弗兰茨·冯·济金根》手稿的一篇论述悲剧的文章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因此，马克思用不着从剧本本身来分析作者准备描写的悲剧性冲突，他有拉萨尔自己的解释可供

---

① 马克思在1856年4月16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见《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48页。

② 见《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692—693页。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柏林，1967年）第1卷，第189页。



指引。拉萨尔解释说,他对德国农民战争的兴趣是由 1848—1849 年革命的经验所激发和培养起来的;他想通过《弗兰茨·冯·济金根》描写他认为一切革命时代所共有的矛盾冲突:群众需要能明确意识到他们的目的和要求的革命领袖;但是这种明确的意识却可能损害“热情”的力量,可能妨碍坚决行动的意志。

“一点不错,在构成革命的力量与理由的理论思想与人们的有限的认识及其聪敏之间似乎确实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尽管我们的理解很难承认这一点。大多数革命之所以失败(每一个真正了解本国历史的人都会承认)都是因为这种‘聪敏’,或至少可以说所有信赖这种‘聪敏’的革命无不失败。1792 年的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在艰辛险阻的情况下能够取得胜利,只是因为它完全不顾这种‘认识’和‘聪敏’。

为什么我们在革命期间发现最激进的党派更有力量,其秘密也在这里;最后,在革命期间,群众的本能较之有教育的人的真知灼见更为可靠,其秘密也在这里。

智者看不见的东西,  
却瞒不过童稚天真的心灵。

- 221 正是缺少教育的群众拯救了革命,使其不致触到由于聪敏和深思熟虑的计划而出现的暗礁。”<sup>①</sup>

领导 1848—1849 年革命的德国知识分子没有显示出足够的革命力量,不够相信人民,因此容容易易地为反革命势力所击溃;对

---

<sup>①</sup> 见斐迪南·拉萨尔:《演讲和论文全集》,爱德华·伯恩施坦编,第 139 页。

于这一观点，马克思马上就同意了。“你所构想的冲突不仅是悲剧性的，而且是使1848—1849年的革命政党必然灭亡的悲剧性的冲突。因此我只能完全赞成把这个冲突当作一部现代悲剧的中心点。”<sup>①</sup>然而，马克思所不能同意的是，拉萨尔把**所有的革命都等同起来**。马克思认为1848和1525年的革命有很大的差异，象拉萨尔那样极其简单化地把十九世纪的问题投射到十六世纪，是违反历史主义的。济金根和胡登是属于已经过去的一个阶级。不管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追随者是怎样想的，他们代表的利益同市民的和农民的利益归根结底是无法一致的。实际上他们不是拉萨尔心目中设想的那种“革命者”；恰恰相反，他们所进行的是一场**反对进步力量的后卫战**。因此，拉萨尔用这场革命影射1848—1849年事件的构想就完全破产了。如果想寻找什么当代人物同济金根和胡登作比较的话，那末（正象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指出的那样）和他们有共同点的倒是1830年的波兰贵族，而决不是1848年的革命者。

在论证过程中，马克思提出了有关文学的三个重要问题。第一个问题常常为人们所误解。马克思**并不是说**只有斗争失败的被压迫阶级的代表人物才是适合于悲剧的题材。与此相反，马克思特别指出歌德选择葛兹·冯·伯利欣根作为悲剧的主人公是正确的。从历史上看，马克思可能认为葛兹是一个“可怜虫”（考查一下恩格斯在记叙农民战争时马克思所起的作用就可以了解他的这一看法）；但是，葛兹·冯·伯利欣根的故事却包含着马克思或者黑格尔和海贝尔一眼就看出的悲剧性冲突：旧秩序的代表人物在与新兴势力的斗争中遭到覆亡的命运。

222

<sup>①</sup> 里弗希兹在《卡尔·马克思和美学》（德累斯登1967年第2版，第152页）上说，在马克思阅读弗·泰·费舍的《美学》所作的札记中有这样的话：“革命是最适合于悲剧的题材。”



格奥尔格·卢卡契说得很对，马克思并不反对黑格尔非常重视的那种悲剧性的冲突——一个维护垂死的旧秩序的人惨遭失败的斗争。对于马克思也好，黑格尔也好，歌德的葛兹·冯·柏利欣根正是这一类主人公中的一个典型和范例。但是，在这一类型外，马克思又增加了另一类英雄人物：降世过早、时代尚未成熟的革命家。马克思认为现代德国剧作家手边就有一个这样的理想人物，即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中描叙过的托马斯·闵采尔。马克思无疑把这两种悲剧同样看作阶级斗争中的插曲，也正因为这个原故，他认为不应该选择弗兰茨·冯·济金根作为“降世过早的英雄”，他不是拉萨尔想象中的那个1848年革命的预演者。<sup>①</sup>

马克思在论证中指出的第二个大问题是，作家可以被理解为“思想家”，被理解为在作品中反映他们所属的阶级、或者他们所拥护的阶级的观点和感情的人。在研究作家的作品或者话语时，必须考虑到这一事实。在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者——从海涅到D·F·斯特劳斯的心目中，胡登都是一个文化英雄；他的言语和行动也只有在这个角度上才能充分理解。

最后一个问题马克思并没有仔细谈，他在信中只是说济金根“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堂吉诃德，虽然是被历史认可了的堂吉诃德”。象塞万提斯这样伟大的作家是有能力创造出永远为人们所承认、也永远反复出现的人物形象的，换言之，他所创造的是典型；历史条件和环境可能改变，历史可能认可或者不认可这种人应否存在，但是象堂吉诃德这一人物在十六世纪有，在十九世纪也有，在西班牙可以找到，在德国同样也可以找到。

马克思的信里，不止一次使用了拉萨尔随手稿附寄的悲剧论

---

<sup>①</sup> 瓦尔特·兴德瑞尔《济兴根辩论》一书第159—206页上重印了卢卡契这篇论文和许多其他有关资料。

文中的词句。比如，“1830年的有教养的波兰贵族”就使我们想到上文摘录过的拉萨尔的句子“正是没有教养的群众拯救了革命，使其不致触到由于聪敏和深思熟虑的计划而出现的暗礁”。离这句话不远的地方，拉萨尔还提出了另外一个论点，并让读者参阅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的文章，以证明他的论点是不容置疑的。拉萨尔说：“只有采用本身就完全包含着某一目标的特性的手段，才能达到这一目标。所以，一个目标必须用与其性质相合的手段来达到；所以，**革命目标不能用外交手段达到。**”看了这一段话，读者不禁会问：拉萨尔写这个悲剧，自己难道不正是在用外交手段来追求革命目标吗？拉萨尔在他这篇悲剧论文的结尾，又一次明确指出，他希望用《弗兰茨·冯·济金根》一剧为当代历史打开新的局面：

“一方面〔拉萨尔解释道〕当代世界的思想意识把某种调和的因素**加进这个悲剧里**，因为战斗现在重新开始意味着剧本的主人公及其目的的最大的胜利。另一方面，在当代艰苦斗争的现实中，这种思想意识又可以从**这个悲剧里为自己取得安慰和信心**。因为在三百年以后又继续的这场战斗以及继续战斗所显示的它的目的的永恒性，有力地证明了**胜利是绝对必要的。**”<sup>①</sup>

马克思驳斥说，如果这真是拉萨尔的悲剧的目的，他用的外交手段是错误的：因为他引起读者们同情的是贵族的代表，是反对进步的骑士，而绝对不是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集中分析的“闵策尔式的平民反对派”。不管《弗兰茨·冯·济金根》宣传的是什么，反正它不是传播十九世纪革命的优秀的宣传品。

<sup>①</sup> 见斐迪南·拉萨尔：《演讲和论文全集》，第1卷，第148页。



不仅如此,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也不把它当作可以与歌德的《葛兹·冯·伯利欣根》相比拟的一部优秀的文艺作品。歌德的这个剧本采用的是同一时代的题材,不管读者的想象力多么丰富,也不能把它当作宣传革命的文学。这里我们发现马克思惯用的一种文艺批评手法:以一部作品为标准来衡量另一部,也就是说,他用的是真正的比较批评的方法。这种比较批评法并不是简单地把不同的作品互相比较一下,它涉及对文学传统的不同流派、不同种类的评价。同样在十九世纪的德国,格奥尔格·毕希纳和奥托·路德维希通过对当代的生活的观察,通过阅读其他文学,也通过亲身尝试创作有意义的作品,也达到了与马克思的极为相似的结论。马克思虽然没有读过这两个人的著作,却分辨出席勒式的和莎士比亚式的不同的传统;他盛赞后者,而否定了前者。我们也须注意,马克思并不想贬低席勒本人的作品。他反对的是信中指摘的“那些一味因袭席勒的诗人”;他看不起的是没有席勒的真实才华而只模仿其皮毛。(马克思用的 *das Schillern* 一词是个俏皮的双关语,既作“席勒式地写作”,又作“闪亮”解)。根据马克思的看法,在十九世纪中叶,模仿席勒比模仿莎士比亚更为有害;马克思指出的《弗兰茨·冯·济金根》一剧的最大缺点——“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无疑是拉萨尔一意追随席勒的结果。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马克思的文学观的核心了。我们在这里看到的马克思是以十八世纪古典美学和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美学的伟大的调解人的身分出现的。他站在这一立场研究了拉萨尔剧本,向拉萨尔提出三点指摘:(1)拉萨尔并没有创造出任何具有特殊性格并通过自己的个性代表着比他们自身更为伟大的事物的人物。拉萨尔的人物是浅薄的,是作者心目中的“时代精神”的传声筒。至于我们怎么看待这种时代精神,是剧本发生的时代十六



世纪的精神还是作者写作时代十九世纪的精神，那是另外一个问题。（2）拉萨尔不仅把他的人物写成了时代精神的传声筒，而且写成了某些抽象品质的代表者。以胡登为例，就不是一个真实人物，而只是“热情”的化身。他在剧中的一言一行无不受这一功能所支配。这种缺少“性格方面的特殊的東西”之所以更不可原谅，是因为马克思认为路德和闵策尔的时代同十九世纪不同，在那个时代一个人还是可以充分发挥和显示自己独特的性格特点的。“还有别的时代比十六世纪有更加突出的性格吗？”马克思问道。拉萨尔在《弗兰茨·冯·济金根》中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挂着胡登的名字、一味感情激动的令人厌倦的热心家，这对历史上的真正的胡登是非常不公平的。真实的胡登远比剧本中的角色更有趣、更聪明、也更富于机智和幽默。（3）拉萨尔通过剧中人物之口发表他自己对这些人物的性格的见解因而破坏了人物的统一性。这种附加的台词偶一为之也未可厚非，但是拉萨尔作得有些太过分了，因之马克思责备他“让人物过多地回忆自己”。马克思在分析欧仁·苏处理自己创造的人物时也提出过这种批评，但是现在马克思把它，归诸于席勒的有害的影响。然而，马克思所指责的仍不是席勒本人的创作方法。该指摘的是那些席勒的拙劣的模仿者，而拉萨尔就是其中之一。马克思举的例子是拉萨尔剧中的济金根的女儿玛丽亚；作者让我们相信玛丽亚的幼稚天真，而这种幼稚天真却不断同她自觉说教和论述权利所表现的老练世故相抵触。

马克思最后称赞了剧本中的个别场景，借以缓和他对全剧的批评。但是在这之前，马克思还提出了《弗兰茨·冯·济金根》的另一个缺点：“甚至你的济金根——顺便说一句，他也被描写得太抽象了——也是多么苦于不以他的一切个人打算为转移的冲突，这可以从下面一点看出来：他一方面不得不向他的骑士宣传与城市友好等等，另一方面他自己又乐于在城市中施行强权司法。”上



文已经分析过拉萨尔的写作方法，他毫不隐讳地借助剧中角色宣讲自己的观点和同情，但是他所描写的事件却违背了这些观点和同情，作者笔下的济金根远不是他企图叫我们看到的那样一个令人敬佩的英雄。历史的逻辑性没有谁反对得了，不管是有意的歪曲或者无知的涂改，它仍然要表现出来。对马克思建议他写托马斯·闵策尔以代替弗兰茨·冯·济金根一事，拉萨尔后来曾写过一封信表示不同意见。他在信中申辩说：马克思提出的批评意见系就历史人物济金根而言，并不是指他在十九世纪写的这一剧本中的同名人物。但是拉萨尔的申辩是徒劳的。马克思在信里讲到的“抽象化”（缺少个性）和内在矛盾，批评的矛头正是指向拉萨尔创造的济金根。与此相反，歌德的《葛兹·冯·伯利欣根》虽然从性质上讲远远不是一个《托马斯·闵策尔》式的戏剧，马克思却盛赞它的悲剧精神和它的与内容完全统一的形式。

信的结尾部分虽然对这个剧本的个别场景也有所赞誉，但是我们也会注意到，在称赞的同时马克思总是提出一些条件。只有一处——“胡登关于剑的格言”，受到马克思的毫无保留的赞赏，除非我们认为“格言”在戏剧中根本是无关轻重的东西。下面就是马克思认为“非常好”的一段剧词：

剑，你万不能小看这剑！

如果为了自由的事业把它挥舞，

剑就是你宣讲的真理的现实，

它就是诞生于现实世界的上帝。

基督教曾经依靠利剑来传播，

查利挥舞着它，使德国受了洗礼，

人们至今对他心怀崇敬，称他“大帝”。

异教邪端——靠利剑征服，

耶稣的圣墓也是靠它解放。  
剑把塔尔昆<sup>①</sup>逐出帝都罗马，  
把塞克西斯<sup>②</sup>王赶出了希腊，  
为我们赢得了艺术和科学。  
大卫·萨姆逊和吉底昂<sup>③</sup>都向它低头！  
历史上一切丰功伟绩，  
从古至今，无不是宝剑的功劳；  
而未来，任何伟大的事业，  
仍然要宝剑来完成使命。

也许这段文章就是马克思信中开始所说的强烈地感动了他的章节之一吧！这段文字显然以感人的笔调宣讲了马克思坚信的一条真理：在德国，只靠改良和进化是不能带来人们所需要的变革的，只有靠暴力才能有效地完成这种变化。也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和拉萨尔后来发生了争执。确实如此，马克思后来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拥护拉萨尔的一派彻底决裂就是因为这种意见分歧，就是因为马克思坚决认为同现状妥协——社会民主党认为俾斯麦执政下的普鲁士是在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只能起一种给屠宰场装饰天竺葵的作用，而决不会有其他任何好处。在批评《弗兰茨·冯·济金根》之后大约又过了六年，马克思在给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一封信里谈到上文所说的这种意见分歧，并引证拉萨尔崇拜的、但模仿得非常拙劣的席勒的剧中人物来进行比喻：“拉萨尔事实上背叛了党。他同俾斯麦订立了一个正式的契约……拉萨尔想在乌凯马

---

① 塔尔昆(公元前约534—510?)，传说中伊特拉斯坎族的罗马皇帝。——译注

② 塞克西斯(公元前约519?—465)，古代波斯国王，曾入侵希腊。——译注

③ 大卫，萨姆逊和吉底昂都是《圣经》中人物。——译注



尔克的菲力浦二世的面前扮演无产阶级的波扎侯爵……”<sup>①</sup>席勒的《唐·卡洛斯》中的菲力浦二世用来影射普鲁士的国王威廉第一，而拉萨尔则被看作是波扎侯爵——这样，拉萨尔在文学上推行的席勒模仿就成为马克思用来讥嘲拉萨尔本人的一种手段了。马克思在引用乌凯马尔克这个地名时——乌凯马尔克是布兰登堡省北部的名称——不只想到席勒，肯定还想到了海涅。他想到的是海涅的一首诗《格奥尔格·海尔维格》。在这首诗里，海涅让诗中的主人公把自己比作席勒剧中的波扎侯爵，而普鲁士的国君弗里德里克·威廉第四则是席勒笔下的菲力浦二世：

“阿兰乌埃河啊，往昔美好的时日  
如何在你的流沙中迅速消失！  
在那些日子里，我在菲力浦国王  
和他的乌凯马尔克大公们面前侍立。”

马克思同海涅一样，也承认席勒在《唐·卡洛斯》这个剧本里创造出的典型人物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后代的人。这种理解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席勒的剧本直接提供给我们的；因为席勒描写的是波扎的志愿同行动的冲突、波扎的良好意图同实现这些意图所采取的迂回的手段的冲突，我们在后来的某些热心改革者身上也可以发现类似的情况。理解的另一方面是指人们对自己的认识——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扮演某一角色，常常荒唐无稽地自拟为波扎侯

<sup>①</sup>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455—456页。（波扎侯爵和菲力浦二世是席勒的《唐·卡洛斯》一剧中的人物。“乌凯马尔克的菲力浦二世”暗指威廉一世。——译注）另外马克思在1864年11月4日和1864年10月10日致恩格斯的信中也有这样的比喻；在后一封信中马克思再一次称拉萨尔为“这个乌凯马尔克的菲力浦二世的波扎侯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10、40页。）

爵。我们所以能用《唐·卡洛斯》进行比拟或对比，是因为席勒的这个剧本堪与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和歌德的《葛兹·冯·伯利欣根》媲美；席勒创造出的人物形象既有独特的性格又有典型意义，既是某一特定时期的产物又能启发我们认识后代的人物。拉萨尔自己的生活与写作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也证明了（尽管拉萨尔不是有意识这样做的）席勒写作方法的力量，这是《弗兰茨·冯·济金根》望尘莫及的。

马克思在1859年4月19日这封信的附言里提到不久前寄给拉萨尔的恩格斯的一篇文章。这是全信第一次直接提到恩格斯的字，但是恩格斯实际上从始至终一直出现在这封信里面。拉萨尔写《弗兰茨·冯·济金根》所依据的一个主要材料是D·F·斯特劳斯的《乌尔利希·冯·胡登传》；拉萨尔不论在剧本里或是在随剧本附寄的论文中都没有提到他是否读过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与此相反，马克思的这封信同恩格斯的这部著作对十六世纪德国历史所表示的明确的观点却完全一致。如果拉萨尔也读过这部著作并给予重视的话，我们可以推论，即使他不可能成为马克思心目中的那样一个优秀作家，至少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和更有能力的宣传家。

229

恩格斯也写了一封信给拉萨尔，劝他不要因为热衷于席勒而忘记了莎士比亚。马克思的和恩格斯的信引起拉萨尔写了一封很长的复信。但是不管他怎样申辩，也挽救不了这个剧本的命运。这个死胎不论上演或是欣赏阅读都注定要遭受失败。但是在他的复信中，有两点答辩还是值得提一下。

拉萨尔的第一点反驳是：尽管马克思非常重视独特的和个人的因素，但是因为受黑格尔的历史观的影响过深，所以倾向于忽视个人在创造历史中的作用：



“这种批判——哲学的历史观认为铁的必然性一环紧扣着一环，完全忽视并否认个人的决定和行动所起的作用，无论对实际的革命行动或假想的戏剧情节的创作来说，都不是适当的根据。

作为这两者的必然的根据，倒应该是相信个人的决定和行动能够引起种种变革。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就既不能写出感人的、有意思的戏剧，也不能作出豪迈的行动来。”<sup>①</sup>

这个问题导致了前文已经谈到的马克思的另一个与此有关的批评。拉萨尔认为马克思在他剧中的主人公同他刻划这一人物的蓝本——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之间并没有划出清晰的界限：

“你的反对意见大部分是就历史上的济金根而言，与我刻划的那个济金根不相干。我的济金根不能因为‘反动的目的’而消失，因为我根本未赋予他这种目的。我给他的只是某些反动的局限性，这种性格——这是由他的阶级地位决定的——未能形成革命的突破。”<sup>②</sup>

230 但特别让拉萨尔恼怒的是，马克思认为作者把这种路德式的骑士反对派放在闵策尔式的平民反对派之上因而怀疑作者自己就犯了他笔下的弗兰茨·冯·济金根犯的一种“外交错误”。拉萨尔认为马克思攻击他犯了“外交错误”，是指他因为热切使这个剧本能在德国上演向剧场经理和政治审查官员所作的“外交上”的让步。拉萨尔显然没有理解马克思这句话的意思。马克思对拉萨尔的批评，不是指他运用的外交太多，而是太不够了。如果拉萨尔强调的

<sup>①</sup> 见《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柏林1967年）第1卷，第202页。彼得·戴麦兹在他的《马克思、恩格斯和诗人》一书第115页上着重地表示赞同拉萨尔这一反驳。

<sup>②</sup> 同上书。

是平民反对派，那他在“外交”上就是成功而不是失败了；因为“平民反对派”是马克思的兴趣所在，也是当代革命者能从中找到鼓舞力量、进行拉萨尔（同马克思一样）要求他们从事的行动的范例。总而言之，马克思不是指责拉萨尔向统治思想作了让步，而是向他建议一种更富于策略的文学宣传方式。

但是，当拉萨尔的回信写来的时候，马克思已有更为重要的事要作、要思考，无暇再顾到一个流产的历史剧和它的恼怒的作者了。在1859年7月10日给恩格斯的信里，马克思说拉萨尔的答辩“写得密密麻麻的纸一大叠”，实在“荒唐可笑”，并评论说：“在这样的季节，在这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面前，一个人不仅自己有功夫来写这种东西，而且还想叫我们花费时间来看它，实在不可理解。”<sup>①</sup>但是不管怎么说，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只能占据马克思的一小部分精力，虽然马克思一旦着手做起这件事来，他总是全神贯注、一丝不苟的。

1861年与拉萨尔的通信还使马克思对文学上另一重要问题发表了深邃的见解。这次是由于讨论罗马继承法以及这种继承法同后代的、特别是德国的法的关系而引起的；因为马克思早期曾研究过法学，自然对这一问题极感兴趣。马克思同意拉萨尔的看法，认为德国法学家曲解了有关遗嘱自由的罗马法，因此德国对于罗马法的发展可以说是建立在被曲解的基础上。马克思又进一步说：

“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现代形式的（德国）遗嘱……是被曲解了的罗马遗嘱。否则，就可以说，每个前一时期的任何成就，被后一时期所接受，都是被曲解了的旧东西。例如，毫无疑问，

231

<sup>①</sup>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432页。



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剧作家从理论上构想的那种三一律，是建立在对希腊戏剧（及其解释者亚里士多德）的曲解上的。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毫无疑问，他们正是依照他们自己艺术的需要来理解希腊人的，因而在达西埃<sup>①</sup>和其他人向他们正确解释了亚里士多德以后，他们还是长时期地坚持这种所谓的‘古典’戏剧。大家也知道，所有现代的宪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建立在被曲解了的英国宪法上的，而且当作本质的东西接受过来的，恰恰是那些表明英国宪法在衰落、只是现在在形式上勉强还在英国存在着的東西，例如所谓的责任内阁。被曲解了的形式正好是普遍的形式，并且在社会的一定发展阶段上是适于普遍应用的形式。”<sup>②</sup>

这种把“责任内阁”看作是宪法没落的迹象的见解会使我们感到震撼，但是我们的注意力很快就会被这段文章隐含的两个论点吸引过去。第一，马克思企图把文学同法律和政府放在一起进行考察；如果一方面的情况如此，另一方面也必然如此。一方面的发展也可以解释另一方面的发展。对马克思这样一个总是在追寻最根本的、普遍适用的法则的人来说，这一原则性的论点是有典型意义的。第二，在马克思看来，一种文学理论或是一部文学作品不是静止的，不是一经产生就永远一成不变的。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都有自己的发展历史，而这种历史是受特定时期的艺术的需要所影响的。海涅曾说过：“每一个时代，在其获得新的思想时，也获得了新的眼光，这时它就在旧的文学艺术中看到了许多新精神。”<sup>③</sup>马克思也同意这种看法，并且补充说，绝不应该把这种新的解释看作

---

① 安得列·达西埃(1651—1722)，法国语文学家，古希腊诗人和哲学家的许多著作的译者和著释者，其中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译注

②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608页。

③ 见海涅：《北海集》第三部《旅游的画面》。

“歪曲”，看作对一种理论创建时或一部作品产生时建立的不变准则的背离。如果一个高乃依<sup>①</sup>或是莱辛“曲解”了亚里士多德或者索福克勒斯，他们这样做完全是有意，是为了使自己的创作和同时代人的创作结出丰硕果实的深思熟虑的结果。如果只是一个古董家，不论学问多么渊博、知识多么丰富，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

<sup>①</sup> 高乃依(1606—1684)，法国剧作家。——译注



## 第十章

### 演说家和文化英雄

“……那些他扬言要加以维护、而且在一群没有批判力的人的想象中已经加以维护的观点，实际上都不在我的批判之列。我只准备分析一下他的确维护过的那些观点。”<sup>①</sup>

#### (1)

1848年夏，查理·安德森·德纳同阿尔伯特·布里斯班到科伦访问，和马克思会了面，马克思的性格和他对新闻事业的敏锐目光给这两个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德纳当时是激进观点的《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编辑，布里斯班是该报的国外记者。大约过了三年，这次访问结得了果实，马克思被聘请为这家报纸的常驻欧洲记者。马克思当时的经济情况极为窘迫，便接受了这一聘请。虽然他常常请求恩格斯替他撰写稿件，也偶尔发怨言说，把该用于研究经济学的时间浪费在这样的“吸墨纸”上，但在1852到1862年间还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和其它几份报刊撰写了大量稿件。这些稿件不象过去发表在《莱茵报》上的那样，专门讨论德国事务。也不象给《评论》撰写的文章，只限于评论法国的形势。它们的题材极为广泛：英国的政治，俄罗斯和土耳其，英国在爱尔兰、印度和中

---

<sup>①</sup>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03页。

国执行的殖民政策,世界各地发生的危机和战争,几乎无所不包。马克思给《纽约每日论坛报》、《人民报》和《自由新闻》写的稿件,开始用德文撰写再由恩格斯译成英语发表;但是不久以后,马克思就勿须恩格斯的帮助,直接用英语书写,除了偶有不够流畅的地方外,英语可以完全运用自如了。马克思的 these 文章写得生动、有力,虽然并没有专门对文学的评论,却不断引用他喜爱的文学作品来突出自己的政治观点,并赋予一层感情色彩。

马克思这时期写的不少文章可以说是英国著名的国会议员的画像,对他们的政策提出了批评。因此,他的笔下不断出现人们熟悉的一些剧本中或舞台上的人物形象。第一篇评论帕麦斯顿勋爵<sup>①</sup>的文章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鲁杰罗<sup>②</sup>一次又一次地被阿耳契娜<sup>②</sup>的假风姿迷住,其实他也知道在这种假风姿掩盖之下是一个老巫婆——

‘没有眼睛,没有牙齿,没有味觉,没有一切。’<sup>③</sup>

这位游侠骑士虽然明明知道这个老巫婆把追求过她的人都变成了驴子和其他动物,却还是不由自主地爱上了她。英国公众是第二个鲁杰罗,帕麦斯顿是第二个阿耳契娜。帕麦斯顿虽已年近七十,并且自1807年以来,差不多一直活动于政治舞台,但他却总是有办法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新人物,使人们一次又一次对他寄予希望,象一般人对未涉世事、前途无量的青年人寄予希望那样。尽管他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坟墓,可是人们却总以为他的真正的政治

① 亨利·约翰·坦普尔·帕麦斯顿勋爵(1784—1865),英国国家活动家,初为托利党人,1830年起为辉格党领袖之一,依靠该党的右翼分子,曾任外交大臣,内务大臣和首相。——译注

② 鲁杰罗与阿耳契娜都是意大利中世纪诗人阿里欧斯托长诗《疯狂的罗兰德》中的人物。阿耳契娜是一个女巫。——译注

③ 引自莎士比亚,《皆大欢喜》第二幕,第七场。



生涯尚待开始。如果他明天死了的话，全英国都会大吃一惊：原来他已经做了半个世纪的大臣了。

虽然他不是样样精通的国家活动家，但他至少是一个任何角色都能扮演的演员。喜剧人物和英雄人物、高歌和私语、悲剧和闹剧，他都同样演得很成功；但是更适合他性格的恐怕还是闹剧。他不是第一流的演说家，然而却是一个干练的辩论家。他有惊人的记忆力、丰富的经验和无比的精细，他永远保持着 *présence d'esprit*〔镇静和机警〕，具有上流人物所应有的那种圆活，熟谙议会里的一切阴谋诡计、党派和人物；所以在遇到复杂的情况时，他能应付裕如，从容不迫，迎合听众的偏见，利用他们的感情。厚颜无耻使他对任何突如其来的攻击都能处之泰然；利己的心肠和圆滑的手腕使他不致有任何真情的流露；极端的轻佻，十分的冷淡，以及贵族的傲慢态度，使他永远不致激动……他用艺术家的手法来处理国际冲突，先把事情弄到一定的限度，等事态严重化就打退堂鼓，不过无论如何总要获得他所需要的戏剧性的紧张。在他看来，历史进程本身不过是专为帕麦斯顿封地的帕麦斯顿子爵阁下的个人享受而发明的消遣品而已。”<sup>①</sup>

- 234 从这一段引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写的这类文章所引用的文学典故和比喻的范围和性质。开头第一个句子，马克思就把阿里欧斯托描写鲁杰罗受女妖阿耳契娜迷恋的长诗《疯狂的罗兰德》同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人生七个时期中的最后一个）编织到一起。底下的一段文章清楚地说明，马克思如何给一个古老的比喻——用戏剧或舞台比拟人生——增添了新的内容：这位由于

---

<sup>①</sup> 见《纽约每日论坛报》（1853年10月19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389—391页。

自己优越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无庸尝受生活忧患的贵族政治家,把世界当作舞台,要在上面随心所欲地做一个戏剧家或舞台监督在真正舞台上所做的事。再下边,帕麦斯顿又以傀儡戏子的身份出现,在幕后牵线,导演一出社会生活中的戏剧<sup>①</sup>。马克思在文章中自始至终把他描写为一个企图效尤艺术家的政客,想要象作家巧妙运用词句那样操纵国际事务。但是巧妙运用词句还有另一层意义,因为言语是可以用来遮掩事实真象的:

“他屈服于外国势力,但在言词上却反对外国势力……他能使民主的词句和寡头政治的观点调和起来;他会用旧时英国贵族的傲慢语言来掩盖资产阶级投和平之机的政策……他也有一边溜走一边说大话的本事……他的这种外交手腕虽然没有使他和外国的谈判获得怎样辉煌的结果,可是在另一方面的成就却非常辉煌:他有办法使英国人民相信他对谈判结果所做的一套解释,使他们把空话当作实际,把幻想当作现实,只听到冠冕堂皇的借口而看不出卑鄙齷齪的动机。”<sup>②</sup>

在这段描述中,无论从句子的结构和内容或是从铿锵的音调,都可以看出来,马克思对一种把文学和政治结合起来的艺术,对政治演说术表现出很大的兴趣。马克思从开始为《莱茵报》撰写文章起,就对这种艺术非常迷恋,不论在这篇文章或其他文章中都有所表现。

因此,马克思的许多用英语书写的、文笔辛辣的报刊文章都是

---

<sup>①</sup> 见《纽约每日论坛报》(1858年8月4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563页。

<sup>②</sup> 见《纽约每日论坛报》(1853年10月19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391—392页。



评论在议院中的各种演说词的。例如，在他评述约翰·罗素勋爵<sup>①</sup>的一文中，就象前文引述评论帕麦斯顿的文章一样，再一次把贵族政治家比拟作文学家，然后又进一步描写约翰·罗素的文学上的和国会中的表演：

“他对骗人的幌子的力量的信念如此真诚，以致认为在骗人的幌子下不仅可以成为英国的国家活动家，而且还可以成为诗人、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只有这一点才能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些胡诌出来的东西，如他的悲剧《唐·卡洛斯，或迫害》、《自亨利七世到现在英国政府及宪法的历史经验》以及他的《乌得勒支和约以来欧洲事务札记》。由于头脑里充满了狭隘的自私观念，罗素把每一件事物都只看做是一块供他写上自己名字的 *tabula rasa* [白板]。他的见解从不以实际事实为依据，相反地，在他心目中事实本身是由他对事实的说法来决定的。作为一个演说家，他没有给人留下任何值得一提的独到见解，没有一句至理名言，没有一点真知灼见，没有一点鲜明的记述，没有一点美妙的思想，没有一个生动的隐喻，没有一点幽默的描写，没有一点真实的情感。‘一个最可怜的庸才’（正如罗巴克<sup>②</sup>在他的改革内阁的历史一书中所认定的），这就是他甚至在进行他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件最大的壮举——向下院提出他的所谓改革法案的时候使他的听众感到惊异的地方。他具有一种独特的手法：把他那种象拍卖时估价人的喊叫一样的枯燥无味、呆板单调的话，同一些幼稚的历史例证和以‘宪法的美妙’、‘国

① 约翰·罗素(1792—1878)，英国政治活动家，辉格党领袖。曾任首相、外交大臣、枢密院院长。——译注

② 约翰·阿瑟·罗巴克(1801—1879)，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资产阶级激进派，议会议员，1855年为克里木英军状况调查委员会主席。——译注

家的普遍自由’、‘文明’、‘进步’等为题的冠冕堂皇的令人莫名其妙的词句结合起来。只有当他本人受到触犯的时候，或者当他被自己的敌手逼得放下他那付假装的高傲自负的姿态而露出心绪不宁的种种迹象的时候，他才会表现出真正热情来。”<sup>①</sup>

马克思同一时期撰写的、刊登在《新奥得报》上的另一篇文章，一一列举了罗素勋爵的演说未能达到的一些技巧，从而制定了一整套演说术。从马克思的评述，我们可以推知，他理想中的演讲者会用不平凡的概念、深邃的格言、可靠的观察、有力的描写、高超的思想、生动的引喻、幽默的描述，以及（这是自然的）真实的感情打动听众。<sup>②</sup> 迪斯累里<sup>③</sup> 似乎偶然能接近这一理想，但是更多的时候却达不到这一标准，比如他在下院“解释”印度起义<sup>④</sup> 问题就是一个例子：

236

“迪斯累里先生昨天晚间在‘死寂的下院’所发表的三小时的演说，如果不是去听它，而是去读它，只会显得好些，而不会显得坏些。一个时期以来，迪斯累里先生喜欢作绝顶庄严肃穆的演说，他故意慢条斯理地吐字，一五一十地平铺直叙而毫不动声色。不管

---

① 写于1855年7月25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432—433页。

② “作为一个演说家，他没有给人留下任何值得一提的独到见解，没有一句至理名言，没有一句真知灼见，没有一点鲜明的记述，没有一点美妙的思想，没有一个生动的隐喻，没有一点幽默的描写，没有一点真实的情感。”（《新奥得报》1855年7月25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432—433页。）

③ 本杰明·迪斯累里·贝肯斯菲尔德伯爵（1804—1881），英国国家活动家和作家，托利党领袖之一，十九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曾任财政大臣，内阁首相。——译注

④ 这里讲的是印度人民在1857—1859年为争取民族独立、反对英国统治而举行的一次最大的起义。——译注



这种品质如何符合他关于一个即将做大臣的人所应有的尊严的特殊概念，但对他的不幸的听众来说却是一种真正的折磨。过去他甚至能把陈词滥调变得象讽刺诗那样的锋利。而今他竟能把讽刺诗埋葬在枯燥无聊的尊严的俗套下面。象迪斯累里先生这样一个操匕首比操长剑更熟练得多的演说家，不应该忘记伏尔泰的一个警告：«Tous les genres sont bons excepté le genre ennuyeux»。〔除了乏味的体裁之外，其余的一切体裁都是好的。——见伏尔泰喜剧《流浪子》的序言。《全集》编者注〕

迪斯累里先生除了他目前的词令所具有的这种形式上的特点以外，从帕麦斯顿当政以来，在自己的议会演说里小心地避免任何哪怕稍微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他不是为了使他的提案获得通过而发表演说，而是为了让听众听他的演说而提出这些提案。他的提案可以叫做自相辩驳的提案，因为就它们的内容来说，如果它们被通过了，对提案的反对者并无损失，如果它们被否决了，对提案的起草人也无害处。实际上，提案所要的不是被通过或被否决，而只不过要人对它们置之不理。它们既不是酸，也不是碱；它们是天生的中性物。不是发表演说来促进行动，而是行动的假象为发表演说提供借口。实在，也许这就是议会演说的典范的和完美的形式；但是即使这种议会演说的完美形式也无论如何摆脱不了议会制的一切完美形式的命运，也就是：列入令人讨厌的东西之类。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动作是支配戏剧的法律<sup>①</sup>。政治演说也是这样。迪斯累里先生关于印度起义的演说可以作为有用知识普及协会的小册子出版，或者可以在工人学校发表，或者可以作为悬奖征文送到柏林科学院去。他的演说对地点、时间和发表演说的理由所持的无所谓态度，证明他的演说既不适合地点、时间，也不符合理由。关

① 见亚里士多德《诗学》第6章。——译注

于罗马帝国衰落的一章在孟德斯鸠或吉本的书<sup>①</sup>是可以令人读得津津有味的,但是如果把它放在一个罗马元老的口上,那它就成了非常荒谬的东西,因为罗马元老的专门职责刚好是要防止罗马帝国的衰落。”<sup>②</sup>

读了马克思的这段文章,我们的感觉是:枯燥乏味的言词——对于风趣机智的迪斯累里说来,是故意使用枯燥乏味的言词——只能使人打瞌睡,只能掩盖暗中或幕后进行的**实际活动**或是隐藏起从不想让公众知道的行动和动机。

但是如果英国政治家不敢说出事实真象,英国的小说家却是直言无讳的。我们能不能到十九世纪的小说中去寻找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混淆颠倒的真象呢? 1854年8月1日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一篇评论“英国资产阶级”<sup>③</sup>的文章认为我们能够这样做,也应该这样做:

“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他们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他们对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从‘最高尚的’食利者和认为从事任何工作都是庸俗不堪的资本家到小商贩和律师事务所的小职员,都进行了剖析。狄更斯、萨克雷、勃朗蒂女士和盖斯凯尔夫人<sup>④</sup>把他们描绘成怎样的人呢?”

① 爱德华·吉本(1737—1794),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著有卷帙浩繁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这里指的是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和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两书。——译注

②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263—264页。

③ 原文是“the English middle class”,《马恩全集》译作“资产阶级”。——译注

④ 威廉·麦克皮斯·萨克雷(1811—1863),杰出的英国现实主义作家。夏绿特·勃朗蒂(1816—1855),英国女作家,现实主义流派的代表。伊丽莎白·盖斯凯尔(1810—1865),英国女作家,现实主义流派的代表。——译注



把他们描绘成一些骄傲自负、口是心非、横行霸道和粗鲁无知的人；而文明世界用一针见血的讽刺诗印证了这一判决。这首诗就是：‘上司跟前，奴性活现；对待下属，暴君一般。’”<sup>①</sup>

必须指出，这样评价文中引述的几位小说家是不尽恰当的；这些小说家对资产阶级人物的刻画远比这里的估计更精巧，更复杂多样。当然也有一些人物，特别是在狄更斯的作品里，适合于上面的评述；但是更多的人物并不是这种情况。就连狄更斯的小说也充满了富有同情心的食利者、资本家、商贩和小职员，从匹克威克先生和布朗娄先生直到特莱朵斯和狄克·斯威魏莱尔。<sup>②</sup>至于盖斯凯尔夫人，就更不能这样说了。无论她在《克兰弗德》一书中描写受新修建的铁路侵袭的农村天地也好，或是在《北方和南方》中描写索尔顿先生的工厂主世界也好，她创造的都不是这样的人物。颇有人怀疑，这段文章是否就是马克思原来的文笔。《马恩全集》的编辑提出了不少理由，认为《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在发表这篇文章作为社论之前，曾对原文的一些部分作过重大的篡改。<sup>③</sup>

238

马克思在1852至1862年期间为报刊撰写的文章里——用英语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和《人民报》写的和用德语为《新奥得报》、《人民报》写的文章——引用了大量文学典故、人物和比喻，笔墨极为生动。但是这些典故、人物和比喻的来源远远不止1854年8月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的这篇文章所赞许的十九世纪小说（前文已经说过，这种赞扬并不符合事实）。我们知道，马克思曾给他的孩子们朗读过阿拉伯神话故事《一千零一夜》。从这本书里，马克

①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686页。

② 布朗娄先生是狄更斯小说《奥列佛·退斯特》中人物，特莱朵斯是《大卫·科波菲尔》中人物，狄克·斯威魏莱尔是《老古玩店》中人物。——译注

③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749页注释第347条。

思就借用了东方暴君的形象来斥责当代印度的王公首领。再譬如描写愕然震惊的场面：在一次马车夫罢工中，伦敦居民突然发现街头变得一片空荡，一辆马车也看不见了。马克思把伦敦人的惊愕比作《一千零一夜》中“神灯”故事中的苏丹王，一觉醒来发现昨夜的豪华宫殿突然不翼而飞。<sup>①</sup>此外还有无法摆脱的噩梦的比喻。《新奥得报》的读者被告知说，帕麦斯顿“好象是一个能施妖法的老人，有一次航海家辛伯达让这个老人爬到自己的肩膀上以后，就无论如何也不能摆脱他了。”<sup>②</sup>当然了，从儿童喜爱的欧洲童话故事中摘拾来的形象比喻就更多了。鹅妈妈的故事，幸福国土的故事和七里靴的故事，马克思都曾引用过。关于七里靴，马克思是把它当作象征看待的。马克思认为德国人民一旦下定决心，就会象穿上七里靴一样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sup>③</sup>

用不着说，希腊罗马古典文学再一次提供给马克思无数丰富的素材。荷马同荷马史诗的模拟者是使用得最多的标本。马克思把拿破仑第三继承拿破仑大帝的统治比作《老鼠与青蛙之战》妄图续貂《伊利亚特》。<sup>④</sup>除了用《伊利亚特》和它的模拟作品的关系来嘲讽当代政治外，希腊悲剧也同样被引用来讥刺当代政客的闹剧式的效颦：

“1854年罗素作为联合内阁的一个阁员又提出一个选举法改革草案来取悦下院。这个草案事先已经确定要成为新的伊菲革涅

---

① 见1853年7月25日和1853年8月1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227—254页。

② 见1855年7月14日《新奥得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400页。（辛伯达也是神话故事《一千零一夜》中的人物。——译注）

③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08页；第10卷，第552页；第12卷，第727页。

④ 见1856年4月5日《人民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668页。



亚,由罗素这位新的阿伽门农献出来,作为取得新的特洛伊远征胜利的祭品。他主持祭礼仪式时用的是真正的闹剧的风格,眼泪汪汪……”<sup>①</sup>

1855年8月初在《新奥得报》上发表的同篇文章的德文版,解释所谓“闹剧的风格”就是“梅塔斯塔西奥的音乐话剧的风格”<sup>②</sup>。古希腊罗马神话故事在马克思的文章里俯拾皆是,证明它们具有永恒的生命力,任何时候都可以引用。《泰晤士报》在马克思的舞台上被比作长眠不醒的埃披门尼底斯<sup>③</sup>;英国整个议会中都没有出现一个能解决印度管理问题之谜的俄狄浦斯<sup>④</sup>;英国士兵并没有犯坦塔罗斯的罪,可是却要在克里米亚忍受他所受的折磨,眼望着救命的物资就是拿不到手<sup>⑤</sup>;佩利西埃元帅没有阿喀琉斯的本领能够治好自己亲手所造成的创伤<sup>⑥</sup>。品得<sup>⑦</sup>被认为是一位典型的狂想诗人(马克思称帕麦斯顿为“歌颂‘光荣宪制’的品得”<sup>⑧</sup>),一些伟大的拉丁诗人的深刻言词也经常被引用,以表示马克思和这

① 见1855年8月2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441—442页。(原书此处英文引文最后一句与中文版略有不同,见下文。阿伽门农是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阿耳戈斯国王,《伊利亚特》中的人物之一。传说为了使希腊舰队得以顺利地开往特洛伊,他用自己的女儿伊菲革涅亚作为牺牲,祭祀女神阿耳忒弥斯。——译注)

② 彼得罗·梅塔斯塔西奥(1689—1792);意大利诗人,歌剧作家。——译注

③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181页。(埃披门尼底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祭司,传说他在克里特岛上酣睡了半个多世纪。——译注)

④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202页。(据希腊神话,俄狄浦斯猜中了斯芬克斯的谜语,因而使特维城逃脱了吸血怪物的毒手。——译注)

⑤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183、187页。(坦塔罗斯是古希腊神话中吕底亚的国王,因侮辱诸神被罚沉沦地狱,永世受苦。每当他想掬取身周的水解渴或采摘悬在头上的果子解饿的时候,水和果子就消失不见。——译注)

⑥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447—448页。(让·雅克·佩利西埃(1794—1864),法国元帅,30年代初参加征服阿尔及利亚,以残酷出名。阿喀琉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只有他一个人能治好他使梅格立斯的儿子泰列夫遭受到的创伤。——译注)

⑦ 品得(公元前约522—约442),古希腊抒情诗人。——译注

⑧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393页。

些诗人有相同的陶冶和经历，如维吉尔的Arcades ambo〔一丘之貉〕和quantum mutatus ab illo〔他变得与过去多么不同了！〕和尤维纳利斯<sup>①</sup>的 et propter vitam vivendi perdere causas〔为了生命和丧失整个生命的根基〕和hoc volo, sic iubeo〔这样我写了，这样我命令〕，等等<sup>②</sup>。但丁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显身说法，申诉流亡的痛苦和愤怒痛斥《泰晤士报》的一篇居心险恶的社论：

“但丁在‘火星天’上遇见了他的祖先卡西亚基达·迪·亚利基利，后者用下面的话预告他将被逐出佛罗伦萨：

‘你将懂得

别人家的面包是多么含着苦味，

别人家的楼梯是多么升降艰难。’

幸运的但丁！他也是属于被称为‘政治流亡者’的一类可怜的人，但是他没有受到敌人的象《泰晤士报》的无谓社论这样的攻击！《泰晤士报》则更幸运了！它逃脱了但丁在‘地狱’里给它‘预备下的席位’。”<sup>③</sup>

（我们应该记得，海涅也不止一次引用但丁的这一段诗；在《德国，一个冬天的故事》的结尾，海涅还用了但丁地狱里的一个地方去威吓自己的趾高气扬的敌人。）在英国下院一次无精打采的会议期间，马克思又想到了地狱；他把议员们感到的沉闷无聊比作但丁在

① 尤维纳利斯（一世纪六十年代—127年后），罗马讽刺诗人。——译注

② 这一类普通套语的例子，可以在《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318页，第13卷，第188页，第15卷，第455页等到处找到。

③ 见1853年4月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28—629页。但丁的诗出自《神曲》天堂篇。——译注）



《地狱》第三篇中让冷漠无情的人终身居住于其中的混杂物。<sup>①</sup> 评论加里波第<sup>②</sup>的时候，马克思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从但丁和马基雅弗利著作中读到的典型的意大利人的那种深邃的智慧，这是他非常赞赏的。<sup>③</sup>

象在马克思的其他著作中一样，堂吉诃德的形象在这一部分文章里也随时随地出现。每逢马克思看到人们在豪侠地捍卫一种陈旧过时的事业时，塞万提斯笔下的这位英雄就涌现在他的心头：

“这样一来，埃格林顿勋爵<sup>④</sup>，这位渴望在唯利是图的英国复活骑士精神的堂吉诃德，便应该在都柏林堡就任爱尔兰总督的崇高职位，而以狂热拥护爱尔兰地主制度臭名昭著的纳斯勋爵<sup>⑤</sup>，则应该成为他的内阁总理。不言而喻，这可尊敬的一对，arcades ambo〔一丘之貉〕，在离开伦敦时，曾得到他们的上司的坚决劝告，要他们放弃自己的怪癖……”<sup>⑥</sup>

用在比埃格林顿勋爵更老奸巨猾的政客身上，“堂吉诃德”这个绰号的讽刺意味也就更强烈了，因此“托利党内阁的重要成员”帕麦斯顿被称为“热心保护‘自由体制’的堂吉诃德”。马克思还故意使

① 见1855年7月21日《新奥得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412页。

② 朱泽培·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革命家，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译注

③ 见1860年10月1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199页。马克思说，“……何况是加里波第这样的人，既具有一颗火热的心，又兼有某些只有在但丁和马基雅弗利身上才能发现的灵敏的意大利天才。”

④ 阿契波德·威·蒙·埃格林顿勋爵(1812—1861)，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曾任爱尔兰总督(1852, 1858—1859)。——译注

⑤ 理查·萨·伯·纳斯，美奥勋爵(1822—1872)，英国国家活动家，保守党人，曾任爱尔兰事务大臣和印度总督。——译注

⑥ 见1858年1月1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711—712页。(原译文中“闻名的纳斯勋爵”，英文引文为“臭名昭著的纳斯勋爵”，似更恰当，故作此改动。——译注)

用这一形象比喻另外一些与塞万提斯原著中的英雄迥然不同的人物。例如，在谈到伊比利亚半岛战争中游击队**打败了拿破仑的军队**时，马克思把游击队比作手持长矛的堂吉诃德同学会用火药作战的人作战<sup>①</sup>；把西班牙的唐·卡洛斯称作神圣宗教裁判所的堂吉诃德<sup>②</sup>等等。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这一形象比喻与原著是相符的。例如，我们被告知说，埃斯帕特罗同堂吉诃德一样，也有他的固定观念——宪法，和他的托波索之达辛尼亚——伊萨贝拉女王<sup>③</sup>。塞万提斯的《**惩恶扬善的故事**》提供给马克思一个讥嘲愚蠢方案的绝妙比喻：理查·普莱斯博士<sup>④</sup>的“关于继承支付的评论”使马克思想到塞万提斯这篇小说中的一个**人物**。这个人建议全国人民一个月少吃一顿饭就可以解决西班牙的财政困难<sup>⑤</sup>。马克思也引证过其他一些西班牙的作品，但不如对塞万提斯的著作这样同情和尊重。西班牙革命洪达发表的告人民书使马克思很不愉快地想到西班牙文学作品的装腔作势和吹嘘夸大；他同意西斯蒙第的意见，认为这种文学是“东方的”<sup>⑥</sup>。卡德龙笔下的英雄，马克思同样认为

① 见1853年10月1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485页。

②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672页。（唐·卡洛斯（1788—1855），斐迪南七世的弟弟，西班牙王位的追求者，曾领导反动的封建教权派发动西班牙内战（1833—1840）。——译注）

③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406页。（巴尔多梅罗·埃斯帕特罗（1793—1879），是西班牙的一位将军和政治活动家，进步派的领袖，主张君主立宪。托波索之达辛尼亚是堂吉诃德给他意中人起的名字。伊萨贝拉女王指西班牙女王伊萨贝拉二世（1830—1904）。——译注）

④ 理查·普莱斯（1723—1791），英国激进派政论家，经济学家和道德论哲学家。——译注

⑤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479—480页。（根据《马恩全集》，这个愚人的方案是“两个星期不吃不喝”，而不是每月一次。——译注）

⑥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470页。（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德·西斯蒙第（1773—1832），瑞士经济学家，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批评家，著有《南欧文学》等书。——译注）



夸夸其谈。<sup>①</sup>

在这些报刊文章中，引证莎士比亚作品的地方比比皆是。莎士比亚惯于把崇高同卑贱，把恐怖同滑稽混合起来；伏尔泰对此感到震惊，但是马克思却认为这是符合生活真实的。在近代事务中，本来是悲剧性的或者豪迈的事往往因为滑稽戏的突然闯入而受到损害，但是莎士比亚的圆熟、老练的文学才能却能使他的作品的悲剧的、豪迈的效果不受损害：

“英国悲剧的特点之一就是崇高和卑贱、恐怖和滑稽、豪迈和诙谐离奇古怪地混合在一起，它使法国人的感情受到莫大的伤害，以致伏尔泰竟把莎士比亚称为喝醉了的野人。但是莎士比亚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让丑角在英雄剧中担当念开场白的任务。这个发明的荣誉属于联合内阁。阿伯丁<sup>②</sup> 阁下扮演的角色就算不是英国的小丑，那也是意大利的潘塔隆。眼光短浅的人总以为，好象一切伟大的历史运动究竟都会变成滑稽戏，或者至少变得平庸无奇。但是这样来开场，这正是一出名为对俄战争的悲剧所独具的特色，这出悲剧的序幕已经于星期五晚上在议会两院同时揭开了……”<sup>③</sup> 保尔·拉法格证实，马克思在1848年以后想使自己的英语更趋精纯时，“他把莎士比亚特殊风格的词句都搜寻出来”<sup>④</sup>，对科贝特<sup>⑤</sup> 也

①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476页。（德·拉·巴卡，彼得罗·卡德龙（1600—1681），杰出的西班牙剧作家。——译注）

② 乔治·戈登·阿伯丁伯爵（1784—1860），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1850年起为皮尔派领袖，曾任外交大臣和联合内阁首相。——译注

③ 见1854年4月1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88页。（关于伏尔泰评论莎士比亚的话，见其为悲剧《塞米拉米达》（1748）所写的序言“论古代悲剧和现代悲剧”。潘塔隆是古代意大利喜剧中常见的角色傻老头。——译注）

④ 见保尔·拉法格：《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1页。——译注

⑤ 威廉·科贝特（1762—1835），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卓越代表人物；从1802年起办《科贝特氏政治纪事周报》，写过不少文章。——译注

下了同样的功夫。所以，毫不奇怪，马克思在撰写政治报道时，莎士比亚的词句不断涌现在他的笔头，从陈腐的“仁慈的乳汁”到《亨利八世》中很少为人所知的一句话：“象偶像那样镀了金”<sup>①</sup>，后一句帮助他来形容空洞浮夸的闪耀。

马克思好象不断地问读者说：有谁能象莎士比亚那样更适合于给我们提供投向敌人的风雅的或机智的辱骂呢？“发育不全的三寸丁！”这是他仿照《仲夏夜之梦》中拉山德，给约翰·罗素勋爵起的诨号<sup>②</sup>；对于蒙克顿·米尔恩斯<sup>③</sup>，他用的是玛克·安东尼的一句话轻蔑地打发开：

“他只是一件工具罢了。”<sup>④</sup>

马克思嘲讽《泰晤士报》发表的一篇社论，用的是狄米特律斯鼓励斯纳格的话：“狮子，你吼叫得好！”<sup>⑤</sup>。一次伦敦的一些虔诚的教士建议星期日停止出售酒类，群众对这一严峻措施大为不满，使用了讥诮的语言发泄自己的气愤。马克思这时同情地说，莎士比亚塑造的典型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仍然在灿烂开放。<sup>⑥</sup>

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莎士比亚的独创性的词句是用以向读者表达自己对当代事物观感的最理想的手段。在评论帕麦斯顿时，马克思就引用莎士比亚的语言说：“勋爵阁下如此轻易地更改土耳其政府向他求援的日期，就好象福斯塔夫把从

① 见1856年4月5日《人民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665页。

② 见1856年4月26日《人民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6页。（这句话出自《仲夏夜之梦》第3幕，第2场。——译注）

③ 理查·蒙克顿·米尔恩斯(1809—1885)，英国作家和政治活动家，初为托利党人，19世纪下半叶为自由党人，议会议员。——译注

④ 见1852年9月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307页。（原话出自莎士比亚《裘力斯·凯撒》第四幕，第一场。——译注）

⑤ 见1855年1月6日《新奥得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627页。

⑥ 见1855年1月22日《新奥得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659页。



他背后袭击他的忽而穿着漆布衣裳忽而穿着肯德尔草绿衣裳的家伙们的人数改来改去一样。”<sup>①</sup>这句话出自马克思连续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批评帕麦斯顿内阁的八篇文章中的第四篇。在第五篇中马克思回溯前文，再一次引用《亨利四世前篇》中的话嘲笑帕麦斯顿说：“现在你还能想出什么诡计，什么花招，什么藏身的窟窿，可以来掩盖你这场公开的众目所见的耻辱吗？杰克，你现在还能想出什么诡计？”<sup>②</sup>第六篇一开始就开始探讨“荣誉”的虚幻，这仍是引证福斯塔夫的继续。<sup>③</sup>阿伯丁伯爵内阁，我们被告知说，同福斯塔夫一样，认为谨慎是构成勇敢的主要部分。格莱斯顿在议会中的策略使马克思想到福斯塔夫如何计算穿肯德尔草绿衣服的人<sup>④</sup>。但是虽然象帕麦斯顿、格莱斯顿和阿伯丁等这些有一定权势的体面人物，福斯塔夫是最合适的比喻形象，对约翰·布莱特的肥胖的对手约翰·波特尔爵士，马克思却没有直截了当地给加上“曼彻斯特的约翰·福斯塔夫爵士”这一绰号。马克思告诉我们，这一称号不适合于波特尔，不仅由于他的巨大的钱包，而且由于他的渺小的智慧<sup>⑤</sup>。至于等而小之的一些对手们，是可以通过福斯塔夫本人的眼睛来给予评价的。例如，马克思在1855年8月16

①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422页。（语出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二幕，第四场。福斯塔夫是莎士比亚好几篇剧作中的人物，是一个爱吹牛的懦夫、诸诸者和酒徒。——译注）

②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435页。（引语见《亨利四世前篇》第二幕，第四场，这是对福斯塔夫讲的话。——译注）

③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436页。

④ 见1855年2月13日《新奥得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66页。（原文是“格莱斯顿象福斯塔夫一样，能把6000个‘穿麻衣的人’变成3万人”。本文误为“穿肯德尔草绿衣服”。——译注）

⑤ 见1857年4月1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183页。（约翰·布莱特（1811—1889），英国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从60年代初为自由党左翼领袖，曾多次提任自由党内阁的大臣。约翰·波特尔，英国自由党人，议会议员，曾三度任曼彻斯特市长。——译注）



日《新奥得报》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没有必要更详细地说明泰特先生的特点了。因为莎士比亚已经作到了这一点，他创造了不朽的夏禄的形象；福斯塔夫把夏禄比作是一个人们在饭后吃甜食时用干酪皮刻成的人型。”<sup>①</sup>

但是马克思不只引用莎士比亚的作品来分析说明当代政治问题，还把莎翁剧中的人物投射到过去的历史中，后来成为英皇乔治四世的皇家亲王就曾被马克思称为“皇家的凯列班”。<sup>②</sup>

在马克思探讨英国政治场景时，也常常联想到莎士比亚历史剧中的其他一些人物和场面。当英国的政客企图愚弄伦敦市民时，马克思马上想到白金汉给理查三世出的主意：“站在两个教士中间”。但是马克思又补充说，帕麦斯顿所选择的是站在一个教士同一个鸦片走私商之间。至于鸦片走私商提供的是什么货色，也可以用莎翁历史剧中的词句说明（援引的是《约翰王》第一幕中庶子的原话）：

“‘站在两个教士中间，好大人，

---

<sup>①</sup> 见1855年8月16日《新奥得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549页。（莎士比亚的话见《亨利四世下篇》第三幕第二场。威廉·泰特（1789—1873）是英国建筑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译注）这一方面相当重要，因为这显示马克思对文学的反应是多么的敏感，大大地超越了那些自封为他的弟子的人对文学的反应，那些人告诉我们说马克思把福斯塔夫纯粹看成一个否定的人物，“原始积累时代的鲜明典型”。M.奈契基娜写道，“对马克思来说，福斯塔夫是资本主义初兴时代的一种‘人格化的资本’，这个时代诞生了原始积累时代的资产阶级……莎士比亚一边遗憾地看到封建世界的没落，一边在福斯塔夫这个喜剧人物身上表现出对新兴的资产阶级世界的抵制。”（见《卡尔·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莎士比亚》，载于《国际文学》（1935年），第3期，第75页）有一点是确实的，那就是马克思从来没有在任何一处着重福斯塔夫的哀愁，他在马克思的著作里主要是作为一个撒谎者、懦夫和讲究饮食的人三者结合的形象出现的。对马克思来说，这些联合起来的品质使他成为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一文中嘲讽的肥肥胖胖的政治家和学究的原型（Urtyp）。

<sup>②</sup> 见1856年4月26日《人民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16页。（凯列班是莎士比亚的戏剧《暴风雨》中半人半怪、野性而丑怪的奴隶。——译注）



好让我借此高唱赞美圣曲。’

244 帕麦斯顿并没有完全按照白金汉给理查三世出的主意行事。他站在教士与鸦片走私商中间。这个老练的骗子让他的亲戚舍夫茨别利伯爵<sup>①</sup>推荐的那些低教会派主教,证明他‘正直无邪’,而贩卖‘麻醉世人的甜蜜毒药’的鸦片走私商,则证明他忠心耿耿地为‘利益,这颠倒乾坤的势力’服务……如果说品得曾以‘万物莫好过于水’的名句开始他那篇赞美奥林匹克竞技会优胜者的颂歌;现代利物浦的品得在他赞美唐宁街空谈家的颂歌里就很可能用上一个更巧妙的首句:‘万物莫好过于鸦片’。

跟圣洁的主教和邪恶的鸦片走私商走在一起的,还有大茶商……”<sup>②</sup>

当谈到政治野心时,马克思自然会想到《亨利四世》中的“戴王冠的头是不能安于他的枕席的”<sup>③</sup>,以及《麦克白》中的话:“我已经两足深陷于血泊之中,要是不再涉血前进,那么回头的路也是同样使人厌倦的。”<sup>④</sup>但是,马克思引用莎士比亚作品给我们的启示还远不止这一点。他认为莎士比亚的悲剧和历史剧中的人物,不论是英

① 安东尼·艾释黎·库伯·舍夫茨别利伯爵(1801—1885),英国政治活动家,40年代时在议会中领导托利党慈善家集团;1847年起为辉格党人。——译注

② 见1857年3月3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161—162页。(“站在两个教士中间……”出自莎士比亚《理查三世》第3幕第7场。“麻醉世人的甜蜜毒药”出自莎士比亚《约翰王》第1幕第1场;“利益,……”出自同剧第2幕第1场。品得(约公元前522—442)是古希腊抒情诗人。“万物莫好过于水”句引自品得“第一首奥林匹克颂歌”。——译注)

③ 见1859年3月2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303页。(原话见莎士比亚《亨利四世》下篇,第3幕,第1场。——译注)

④ 见1859年3月3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319页。(“我已经……”句见莎士比亚《麦克白》第3幕,第4场。马克思在文章中并未使用莎士比亚的原话。——译注)

雄也好，恶棍也好，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政客来说，气度都太大了一些。对于这些人，更合适的形象应该从莎士比亚的喜剧中去找：扮演狮子的细木工斯纳格<sup>①</sup>，《爱的徒劳》中的扮演庞贝的考斯塔德，命运使他当了贵族老爷的穷补锅匠克里斯朵夫·斯赖<sup>②</sup>，或者《无事生非》第四幕中由教堂司事协助审案的警吏道格培里<sup>③</sup>等等。谈到林德赫斯特勋爵<sup>④</sup>、得比勋爵<sup>⑤</sup>和格雷勋爵<sup>⑥</sup>三人演出的一场政治闹剧时，马克思觉得最恰当的评价，莫过于《一报还一报》中依莎贝拉向安哲鲁说的一段话：

“骄傲的世人

掌握到暂时的权力，

却会忘记了自己琉璃易碎的本来面目，

象一头盛怒的猴子一样，

装扮出种种丑恶的怪相，

使天上的神明们因为怜悯他们的痴愚而流泪。”<sup>⑦</sup>

---

① 见1859年8月20日《人民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522页。（斯纳格是《仲夏夜之梦》中的人物，细木工。——译注）

② 见1855年8月7日《新奥得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442页。（考斯塔德是《爱的徒劳》中的乡人。克里斯朵夫·斯赖是《驯悍记》中的补锅匠。——译注）

③ 见1859年10月1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584页。（道格培里是《无事生非》中的一个自大而愚蠢的警吏。——译注）

④ 约翰·辛·柯·林德赫斯特男爵（1772—1863），英国国家活动家，法学家，托利党人，曾任大法官。——译注

⑤ 得比伯爵（1799—1869），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领袖，19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之一，曾任首相。——译注

⑥ 查理·格雷伯爵（1764—1845），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领袖之一，曾任首相（1830—1834）。——译注

⑦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152页。（上述莎士比亚的一段话实际上是在马克思引林德赫斯特勋爵的一段发言中出现的。——译注）



在一场马克思认为是夏禄、斯纳格、考斯塔德和斯赖之流演出的政治戏中，马克思不止一次表示同情莎士比亚笔下的忒耳西忒斯<sup>①</sup>的观点。在描述了俄罗斯和土耳其两国如何在外交上勾心斗角地角逐之后，马克思引用了《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第五幕第四场的一段话。看来，马克思是很同意这种说法的：

“那些狡猾的信口发誓的坏东西，——那块耗子咬过的霉腐的陈年干酪，涅斯托，和那头狗狐俄底修斯，——定下的计策，简直不值一颗乌莓子！他们的计策是要叫那条杂种恶狗埃阿斯去对抗那条同样坏的恶狗阿喀琉斯；现在埃阿斯那恶狗已经变得比阿喀琉斯那恶狗更骄傲了，今天他不肯出战；所以那些希腊人都象野蛮人一样胡作非为起来，计策权谋把军誉一起搞坏了。”<sup>②</sup>

但是，正象马克思引用福斯塔夫时，心里总记着莎士比亚创造的这个人物富于机智，尽管堕落而不失体面，性格也比较宽宏一样，在引用忒耳西忒斯时，虽然这个人阅历丰富，说的话非常正确，马克思也从来没有忘记他的卑鄙可憎的面目。当约翰·阿瑟·罗巴克在下院行使阻挠议会的策略时，马克思给他下的评语是：“这个渺小的、刻薄的、与忒耳西忒斯很相象的、而且又是老练的、完全掌握了议会策略的道道地地的律师”<sup>③</sup>。利用罗巴克的辉格党人被比作俄底修斯，只有一点重要的区别：“俄底修斯从来没有利用过忒耳

<sup>①</sup> 忒耳西忒斯是莎士比亚《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的人物，一个残废而好谩骂的希腊人。

<sup>②</sup>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361页。（涅斯托和俄底修斯均系《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的希腊将领。引文见《莎士比亚全集》（7），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237页。——译注）

<sup>③</sup> 见1854年8月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362页。

西忒斯；但是同俄底修斯一样机灵的辉格党人却在利用罗巴克。”<sup>①</sup>

最后，莎士比亚还为破坏欧洲现存秩序的革命者提供了一个复合的形象。1856年4月14日，马克思在宪章派报纸《人民报》（马克思偶而也给这家报纸投过稿）创刊四周年纪念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说，阐述了这个社会的内在的矛盾。马克思描绘了一副极为生动的图画，使听众大为震动。按照马克思的话，在这个社会里，“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马克思说：

“这里有一件可以作为我们十九世纪特征的伟大事实，一件任何政党都不敢否认的事实。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象，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

246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

<sup>①</sup> 见1855年1月27日《新奥得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6页。（“辉格党”（whig）本书误作“组织秘书”（whip），现根据《马恩全集》译文。——译注）马克思在攻击克拉伦登勋爵对土耳其的态度的进程中，玩弄了一下具有特征的变换忒耳西忒斯这一题材，即把忒耳西忒斯当做责备丹纳士诸女的腐儒。



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有些党派可能为此痛哭流涕；另一些党派可能为了要摆脱现代冲突而希望抛开现代技术；还有一些党派可能以为工业上如此巨大的进步要以政治上同样巨大的倒退来补充。”

但是，马克思接着说，他和他的听众是不会“认错那个经常在这一切矛盾中出现的狡狴的精灵”的。

“我们知道，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工人也同机器本身一样，是现代的产物。在那些使资产阶级、贵族和可怜的倒退预言家惊慌失措的现象当中，我们认出了我们的好朋友、好人儿罗宾，这个会迅速刨土的老田鼠、光荣的工兵——革命。”<sup>①</sup>

显而易见，马克思在这里借用了《仲夏夜之梦》第二幕第一场同《哈姆莱特》第一幕第四场的两个形象。在露台上出现的哈姆莱特的父王的鬼魂和狡诈的精灵迫克被揉和为一，用来表达未来的革命的一副既幽默又可怖的形象。<sup>②</sup>

247 在马克思的报刊政论文章中借用莫里哀作品里的唯一人物是达尔杜弗。马克思称辉格党为“营私舞弊的老手，……宗教中的伪善者和政治上的伪君子”<sup>③</sup>；又把鼓吹对印度起义者应该施加报复

<sup>①</sup>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3—4页。（“好人儿罗宾”是英国民间故事中的侠义英雄，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中的淘气的精灵迫克也叫此名。——译注）

<sup>②</sup>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描绘欧洲的革命力量时已用过“老田鼠”这个形象（见《马恩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691页）；黑格尔先于马克思在描绘历史中的精神作用时也用过这一形象（见格洛克纳编《黑格尔全集》中《哲学史讲义》（斯图加特，1927年）第19卷，第691页）。

<sup>③</sup> 见1852年8月2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386页。（“伪君子”或译为“达尔杜弗”是莫里哀同名剧作的主人公。——译注）

的《泰晤士报》叫作“复仇的达尔杜弗”<sup>①</sup>。如果要讥嘲的是荒谬的逻辑而不是伪善，马克思立刻会想到英国诗人赛缪尔·巴特勒的主人公胡迪布腊斯<sup>②</sup>。歌德的创造自然也经常为马克思引用——但在用英语发表的文章中比在德语作品中要少一些。马克思在《浮士德》第二部中找到一个极为妥贴的比喻来说明根本无法实行的、势必在政治环境的坚硬岩石上撞得粉碎的政治上的发明。“的确，多亏了他（指帕麦斯顿勋爵）的发明创造，世界上才有了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这三个‘立宪’王国——三个只能同《浮士德》中瓦格纳博士的何蒙古鲁士相比的政治幻影。”<sup>③</sup>在奥法战争中有人想让普鲁士扮演诚实的掮客的角色，作一个调停国，这就使马克思想到另一个“调停人”——歌德的小说《亲和力》中的一位专好管人闲事的和事佬。这个人专门调解别人纠纷，但是总是在帮倒忙。<sup>④</sup>歌德最后还从《西方与东方的合集》中提供给马克思的一段话，帮助马克思说明世界历史发展的原因是很复杂的。马克思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一个痛苦的过程，由于贪婪这一进程才得以继续发展，并引起许多人遭受痛苦；但是只要社会能因此而有所发展，只要最后人们的幸福的总和增加了，这种痛苦的代价是必需付出的。马克

① 见1857年9月1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311页。

② 见1853年2月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69页。赛缪尔·巴特勒（1612—1680）是英国讽刺诗人，其长诗《胡迪布腊斯》（《马恩全集》根据俄文译为《古迪布腊斯》）嘲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的清教主义，以及宗教的假仁假义和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主人公胡迪布腊斯喜用荒谬的逻辑作无意义的争辩。——译注）

③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418页。（何蒙古鲁士是歌德的《浮士德》中浮士德的弟子瓦格纳用中世纪炼金术制造出来的“人造矮人”，但只是一个在曲颈玻璃瓶中能发光的胎儿形，无法蜕化、发育。——译注）

④ 见1859年8月6日《人民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510页。（指歌德长篇小说《亲和力》中的米特勒（意译为调停人）。他是一个僧侣，经常调解自己教区里的纠纷。——译注）



思具体谈论的是不列颠对印度的统治问题：

“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末，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这么说来，无论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是怎样难受，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

248

‘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  
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  
难道不是有无数的生灵，  
曾遭到帖木儿的蹂躏？’<sup>①</sup>

我们还应该想到马克思在另一篇文章里也曾举了一个经典性的例子，说明“原因的复杂性”这一论点的另一个方面。这段话出自马克思写的博士论文：

“普卢塔克在他的马里修传记里曾经遗留下一个令人震惊的历史证件，表明这种道德态度如何会消灭一切理论的和实践的无私。在他描写了西姆贝尔人的可怕的毁灭之后，他又讲述了死尸的数目是那么多，以至于那些麻沙利奥特人能用来作他们的葡萄园的肥料。随后下了雨，于是这一年就成了葡萄和水果收成最好的一年。对于那个民族的悲惨的毁灭，这位高贵的历史家有些什

<sup>①</sup> 见1853年6月2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149—150页。（歌德的诗出自《西方与东方的合集》中《致祖莱卡》。——译注）

么感想呢？普卢塔克认为，上帝让整个伟大的、高贵的民族死亡和衰朽，以便那些马赛里亚的俗人可以获得果子的丰收——这在上帝说来是道德的。因此即使把整个民族变成粪堆也可以给人以沉迷于道德狂想的良好机会！”<sup>①</sup>

问题在于：引证别人的话是为了说明什么问题，是由谁来引证的。为了让读者看到同一论证可以使用于不同的目的，马克思设想一位曼彻斯特经济学派代言人也可能引用歌德的诗句，即马克思在论不列颠对印度统治的文章引用过的同一首诗（马克思自己引用这几行诗时显然是抱着赞成的态度的）。马克思在发表于1855年1月20日《新奥得报》上的一篇文章中告诉读者说：如果英国工厂主的行动不予制止、不加控制的话，不久之后“整整一代工人的体力、智力和生命力就将失去一半。”可是悲叹英国在克里木战争中使士兵惨遭牺牲的曼彻斯特学派“可能拿这样的话来回答：

如果痛苦是欢乐的源泉，  
谁还会为痛苦而忧伤？”<sup>②</sup>

马克思引用原著时，在很多情况下，非常大胆地对原文加以改 249  
动。为了使《新奥得报》的读者认清英国政治家们对英国士兵的真正看法，马克思在报道英国军务大臣在议会的讲演时引用了两句德国诗：

“他们打起架来是好汉，

---

① 见马克思，《博士论文》，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2—63页。

② 见《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643页。



但在动脑筋上是笨蛋。”<sup>①</sup>

这两句诗出自歌德《诗集》中的“谚语诗”一部分。歌德的原句是：

“我对什么会感到高兴？  
群众斗争起来真个奋勇，  
他们人人不愧是好汉，  
但在动脑筋上却是笨蛋。”

从上面的例子里我们再一次看到，马克思并不认为一个伟大作家的语言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同黑格尔一样，为了阐明一个观点，可以重新塑造大作家的语言，没有什么顾忌。

出现于马克思的这一部分报刊文章中的，还有其他几个十八世纪的作家。有几处引证了伏尔泰的著作。奥利弗·哥尔斯密创造的人物汤尼·朗普金被用来讽刺英国政客罗伯特·皮尔：“如果把汤尼·朗普金和美男子布腊默尔合而为一，那末我们就会想象得出皮尔的面貌、服装和风度的那种奇形怪状。”<sup>②</sup> 在另外一个地方，马克思试图模仿约翰逊博士的文笔<sup>③</sup>，但是不很成功。同奥·威·施莱格尔<sup>④</sup>和海涅一样，马克思对赛米尔·约翰逊的洞察力、批判力，对他的人道精神和机智风趣并不很理解，但是对于乔纳

---

① 见1855年2月1日《新奥得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21页。

② 见1855年8月16日《新奥得报》——同上书，第549页。（汤尼·朗普金是英国作家哥尔斯密的喜剧《欲擒故纵》中的人物，一个妄自尊大的贵公子。布腊默尔是英国十九世纪初的贵族，以讲究穿戴出名。外号“美男子”。——译注）

③ 见1859年2月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726页。（赛米尔·约翰逊（1709—84）是英国作家，字典编纂者。——译注）

④ 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1767—1845），德国诗人，批评家和翻译家。——译注

桑·斯威夫特,马克思却很有同感。在他投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一篇讨论爱尔兰现状的文章中,马克思就提到了这位作家。马克思首先引证了十九世纪爱尔兰到处设了疯人院的统计数字,接着就挖苦道:“这就是有名的斯威夫特在爱尔兰办第一所疯人院时还怀疑过能否找到90个疯人的那个国家!”<sup>①</sup>虽然马克思几次提到格列佛在小人国里,马克思对这位作家的著作的理解似乎没有什么深度和广度;直到在1870年买了一部斯威夫特的十四卷的集子,马克思对这个作家才有了广泛、深入的了解<sup>②</sup>。马克思对斯威夫特感到兴趣,主要是因为他是一个爱尔兰事务的作家,正象罗伯特·骚塞是以《比利牛斯半岛战争史》的作者,而不是跻于湖畔诗人之列的一个诗人进入马克思的世界一样<sup>③</sup>,也正象马克思只了解梅恩·里德船长是“一个美国海盗”,而不是冒险小说的作者一样。<sup>④</sup>

至于席勒,马克思始终认为他是一个悲剧作家和抒情诗人,而不是研究尼德兰起义和三十年战争的历史学家。他一再引用席勒创造的崇高人物形象和壮丽的诗句来反衬出十九世纪悲惨的现实。“富尔德扮演着波扎侯爵!”马克思把一位法国银行家兼政客和席勒的《唐·卡洛斯》中的人物相提并论,故作不可置信的口吻

① 见1853年8月1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257页。(乔纳桑·斯威夫特(1667—1745),著名的英国讽刺作家,爱尔兰人,著有《格列佛游记》等。遗嘱以自己全部财产在都柏林建立一所疯人院。——译注)

② 参见布鲁诺·凯撒和I·维尔汉著《马克思和恩格斯藏书。一个书库的收藏经过和全部目录》(柏林,1967年);另参阅《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490页。

③ 见1854年9月2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467页。(罗伯特·骚塞(1774—1843),英国诗人和作家。马克思在《革命的西班牙》一文中,曾引用了骚塞《比利牛斯半岛战争史》中的一句话:“爱国主义火焰因加上迷信的圣油而燃烧得更旺了。”——译注)

④ 马克思1853年2月23日致恩格斯的信提到梅恩里德——《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216页。(托马斯·梅恩·里德(1818—1883),爱尔兰作家,惊险小说作者。——译注)



喊道。“朋友们，鼓掌吧！”<sup>①</sup> 席勒的另一剧作《强盗》中的英雄人物同样提供给马克思对比的形象，其嘲讽意味也不减于前者：“如果象席勒所说的那样，英雄的死犹如太阳落山，那末东印度公司的下场更象是破产者与其债权人签定的协议。”<sup>②</sup> 马克思首先借助席勒的诗句来概括德国同时代人的风尚趣味。关于德国的一些小政客，马克思是这样写的：

“这种人浸透了这样一种思想：柏林是世界第一城市；除柏林以外，什么地方也找不到‘Geist’〔‘精神’〕（这是个无法翻译的概念，尽管从语源学上讲来，英文的ghost〔鬼魂〕同它是一个字；法文的esprit〔机智〕则完全是另外的东西）；Weissbier〔白啤酒〕——外地来的蛮子都不爱喝的一种饮料——就是《伊利亚特》中所说的甘露，《艾达》中所说的蜜酒。除了具有这些无伤大体的偏见之外，我们的普通的柏林明星是不可救药的空谈家，喜欢信口开河、说短道长、醉心于一种在德国被称做 Berliner Witz〔柏林式风趣〕的低级幽默，这种风趣与其说是玩弄思想，不如说是玩弄字眼，它是一种古怪的混合物，里面有一点讽刺，有一点怀疑论，还有大量的粗俗不堪的东西。总之，这种人是人类的不太杰出的、同时也不太有趣的标本，但毕竟是一种相当有特色的类型。就这样，我的那位柏林朋友用纯粹柏林式的幽默，引用席勒《大钟歌》中的这样一节来回答了我的问题。我还应该 en passant〔顺便〕指出一点：我们普通的柏林人通常颂扬的只是歌德，而引用的只是席勒。

‘啊，柔情的苦恼、甜蜜的希望，

① 见1861年11月19日《新闻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396页。

② 见1858年7月2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559页。（“英雄的死犹如太阳落山”句见席勒的《强盗》第3幕，第2场。——译注）

初恋的黄金时代！

眼前是万里无云的晴空，

心头是无边无际的快乐。

啊，愿初恋的黄金时代的花朵，

永不凋谢！”<sup>①</sup>

除了上述一些作家外，马克思还引用了维兰特的作品。他的小说《阿布德拉人》描写两派斗争的故事被马克思借用来预言伦敦的“鼓掌喝采派”同给下院“喝倒采”的一派人相互斗争的下场。<sup>②</sup>在较迟一代的作家中，马克思引证过的有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他给历史学家下的定义“目光注视着过去的预言家”，马克思曾用来评论英国外交家大卫·乌尔卡尔特<sup>③</sup>）；海尔维格（他的诗句“自由灵魂展翅飞翔”被用来嘲讽帕麦斯顿<sup>④</sup>），当然，少不得还有海涅。“海涅是多么正确，”这几乎成了马克思的一句口头禅，“他说，真正的愚蠢也和真正的贤明一样罕见。”<sup>⑤</sup>从贝朗热引用的一句名言是“平庸的米尔米东人”<sup>⑥</sup>。此外，马克思还用罗伯尔·马凯尔

---

①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673—674页。（《伊利亚特》是著名的古希腊史诗，传说为荷马所写；《艾达》是一部收有七至十三世纪时期冰岛神话和英雄诗歌的集子，也是著名的史诗。席勒的一节诗出自《大钟歌》。——译注）

② 见1855年5月10日《新奥得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228页。（维兰特（1733—1813）是德国的诗人和小说家。他的讽刺小说《阿布德拉人》描写该城市的居民因小事分为两派，相互斗争，几乎导致整个城市毁灭。——译注）

③ 见1855年6月8日《新奥得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302页。（大卫·乌尔卡尔特（1805—1877）是英国外交家，反动的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译注）

④ 见1855年6月12日《新奥得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317页。

⑤ 同上书，第13卷，第464页。

⑥ 见1853年4月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6页。（米尔米东人是传说中的特萨利亚的一个部落，曾参加特洛伊战争。米尔米东也有矮人、侏儒之意，借用指猥琐、无能的人。——译注）



252 来嘲笑当时政客们的言行。马克思说，只有法国人的听觉才能鉴别拿破仑第三给帕麦斯顿的书信中使用的粗俗不堪的文句：“Entendons nous loyalement comme d’honnêtes gens, que nous sommes, et non comme des larrons, qui veulent se duper mutuellement.”（“我们都是老实人，让我们象老实人那样，而不要象尔虞我诈的骗子手那样达成真诚的协议吧。”）马克思这段话的意思是，政治也在模仿艺术；拿破仑第三的文体在勒美特尔同安蒂耶合写的社会喜剧中早已预先让听众品尝到了。<sup>①</sup>

但是在这一部分为报刊撰写的文章里，马克思引用最多的还是十九世纪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当然了，他们大都是英国作家。在发表于《人民报》的一篇文章上，马克思把詹姆斯·辛普森<sup>②</sup>比作哥列姆。马克思认为辛普森是帕麦斯顿一手创造的人物，正象哥列姆（马克思告诉读者说，德国诗人阿契姆·冯·阿尔宁最近曾把这个传说中的形象引进德国文坛）原来是些大土块，由于奇妙的魔术才化作人形并有了生命一样<sup>③</sup>。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的一篇文章里，马克思对读者说，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使他想到威廉·豪弗的一篇故事《年轻的英国人》。豪弗在这篇故事里写一个外地小城镇误把一只化妆打扮的猴子当作一位时髦的、尽管有些怪癖的英国贵族，受尽了愚弄<sup>④</sup>。爱尔兰法庭审理的一个遗产案使马克思

---

① 见1860年8月2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130页。

② 詹姆斯·辛普森(1792—1868)，英国将军，1855年(2—6月)为陆军参谋长，后任克里木英军总司令。——译注

③ 见1856年4月26日《人民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708页。(路德维希·阿契姆·冯·阿尔宁(1781—1831)，德国浪漫派诗人。哥列姆出现于阿尔宁的幻想故事《埃及的伊萨伯拉》中。——译注)

④ 见1858年10月2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631页。(威廉·豪弗(1802—1827)是德国作家，写有《豪弗童话集》。——译注)



联想到巴尔扎克的情节耸人的小说：谋杀、通奸、诈骗、用非法手段争夺遗产等等情节<sup>①</sup>。拿破仑第三则使马克思自然联想到这位皇帝的宿敌维克多·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因此，拿破仑第三可以叫做“法国革命的加西莫多”<sup>②</sup>，虽然马克思在其他地方表示了谨慎，指出拿破仑第三只是想做一个狰狞吓人的加西莫多，而不想扮演雨果创造的那个令人悲悯同情的畸形人。狄更斯提供给马克思的人物形象有瓦克弗德·史奎尔斯<sup>③</sup>（马克思把他看做对毫无抵抗能力的人横施暴戾的典型）和诡计多端的道济尔（这是一个最无心肝的代表人物，最终导致自己的毁灭）。马克思在1853年发表的“帕麦斯顿勋爵——第五篇”中写道：“但是这种诡计不管多么巧妙，却仍然没有成功。”<sup>④</sup>在马克思的文章中评论政客们如何玩弄词藻时，自然屡次谈到“匹克威克式的意义”<sup>⑤</sup>。从英国小说家萨克雷那里，马克思借用了“黄裤奴”<sup>⑥</sup>这个人物，一个用奴仆眼光观察事物的伦敦西区的男仆。1862年2月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文章《英国的舆论》，谈到“《泰晤士报》、《邮报》和伦敦整个黄裤奴报界”。马克思又从《笨拙》<sup>⑦</sup>上找了一个庸俗不堪、阿谀奉承的贵族人物——詹金斯来比喻这些奴才报纸。詹金斯惯会说些低级

① 见1855年2月24日《新奥得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85页。

② 见1860年6月30日和1859年3月3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75页和第13卷，第309页。（加西莫多是雨果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中的人物，这个名字已成为丑陋的化身。——译注）

③ 见1854年8月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366页。（史奎尔斯是狄更斯小说《尼古拉斯·尼克尔贝的生平和奇遇》中的教员，是残忍、贪婪无知和虚伪典型。——译注）

④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431页。（道济尔是英语dodge的谐音字，意思是“搪塞、支吾”。道济尔是《奥列佛·退斯特》中的狡猾的年轻扒手。——译注）

⑤ 见卡尔·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和《帕麦斯顿勋爵》，L.哈恰逊编（伦敦，1969年），第204、182页。

⑥ 黄裤奴是英国小说家萨克雷（1811—1863）用黄裤奴笔名发表的讽刺随笔《黄裤奴札记》中的主人公，一个卑躬屈节的典型。詹金斯也是一个卑躬屈节、惯会阿谀奉承的人物。——译注

⑦ 《笨拙》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幽默刊物。——译注



笑话，吹嘘阔佬的衣着和宴会：

“《晨邮报》一部分是帕麦斯顿的私产。这个奇特的报纸的另一部分卖给了法国大使馆。剩下的部分则属于‘上流社会’，给宫廷的阿谀之徒和贵妇人的裁缝提供最细致的消息。由此，《晨邮报》在英国人民的心目中是报界的詹金斯（一个通常用来指奴才的典型）。”<sup>①</sup>

马克思认为只用一个詹金斯还不足以表达他对《晨邮报》的完整的看法。为了使读者了解自己对这份报纸的性质的看法——既傲慢自大又奴隶性十足，马克思又从阿里欧斯托的《疯狂的罗兰德》中借用了一个角色，称《晨邮报》为“詹金斯同罗多芒特”的奇怪的混合物<sup>②</sup>。此外，马克思还引证过“著名的幽默家”道格拉斯·杰罗尔德的一封信<sup>③</sup>。菲尼莫尔·库伯的长篇小说《密探》也曾出现在马克思的文章中，说明一些警察的密探总是认为人们歪曲了他们的真实面目，而进行自我辩护。<sup>④</sup>

马克思从来没有提过迪斯累里的著作《西比尔》（了解一下迪斯累里对《西比尔》的“两个民族”的看法倒也不错）；但是当马克思发现可以为迪斯累里演说词的某些特点——透彻、简练和轻松的语言说几句赞扬的话时，他却提到迪斯累里的另一部小说《年轻的公爵》，认为他的演说很可以同这部小说比美，甚至读起来更要愉

---

①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464—467、455页。

② 见1861年12月2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441页。

③ 见1855年1月22日《新奥得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659页。（道格拉斯·杰罗尔德（1803—1857），英国资产阶级讽刺作家和剧作家。——译注）

④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44页。（菲尼莫尔·库伯（1789—1851），美国小说家，《密探》是库伯的一部长篇小说。——译注）

快一些<sup>①</sup>。在较晚的一些时候写给恩格斯的信中(1866年7月27日),马克思认为迪斯累里本人就是他的第一部小说《维维安·格雷》中的主人公。但是在发起脾气来的时候,马克思也曾把爱德华·布尔韦尔-利顿在议会中的表演同他写的文学作品联系起来。在1855年6月9日发表在《新奥得报》上的一篇文章里,马克思就谈到利顿的演说:“布尔韦尔一方面有他的‘国王制造者’的英雄气概,另一方面又有他的《尤金·阿拉姆》的消极情绪。在以前者的精神面貌出现时,他向俄国挑战,在以后者的精神面貌出现时,他就在梅特涅的头上编织桃金娘花冠。”<sup>②</sup>这样,马克思既嘲笑了作为政治活动家的利顿、又嘲笑了作为作家的利顿。另一次评论利顿时,马克思并没有提到他的作品,而集中品评他为人的缺点,比较详细地叙述了他如何牵连到一件家庭丑闻中的事。但是在许多文章里,马克思都曾表示这样一种见解:正如一个政治家的演讲辞如果印成文字就容易使人看清楚他的词藻的迷雾所掩蔽的事实真象,一个政治活动家的文学、语言著作也能提供重要的线索,使人了解决定这一政治活动的个人品质。也正因为这个原故,马克思才不惜化费大量笔墨嘲笑约翰·罗素勋爵的悲剧《唐·卡洛斯》,他的英国宪法历史和政治回忆录。马克思告诉读者说,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只能表现罗素的自私,他“把每一件事物都只看做是一块供他写上自己名字的tabula rasa〔白板〕”。<sup>③</sup>

① 见1858年5月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476页。(本杰明·迪斯累里,贝肯斯菲尔德伯爵(1804—1881),英国国家活动家和作家,托利党领袖之一。——译注)

② 见1855年6月9日《新奥得报》——《马恩全集》,第11卷,第305页。(爱德华·布尔韦尔-利顿(1803—1873),英国资产阶级作家和政治活动家,他的小说《露谷之子遗》中的主人公沃里克伯爵,绰号“国王制造者”。——译注)

③ 见1855年7月28日《新奥得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432页。



在马克思的这些报刊文章中，真正的英雄是威廉·科贝特。从马克思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他对科贝特政治哲学中的“倒退的”因素看得很清楚，而且不止一次指出，科贝特不可能深入探索英国经济灾难的根源，但是这并未影响马克思对他的感情和尊敬。在1853年7月《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里，马克思告诉读者说，科贝特是一头真正的约翰牛，但是他是现代宪章运动者的先驱；科贝特既是古老的英国最纯真的化身，又是年青的英国最勇敢的预告者；他是大不列颠的最保守又最激进的人物——但是作为一个作家，他是无与伦比的<sup>①</sup>。自1853年起，马克思的作品和书信里提到“老科贝特”的地方和引用科贝特的作品《政治纪录》的地方屡见不鲜。马克思在引用科贝特文章时总是流露出称许和赞美，这是只有马克思在引述海涅的讽刺文章时才使用的笔调。虽然没有使用直接赞许的言词，马克思对科贝特实在表现了最大的敬意；因为马克思的这些报刊文章，无论从其笔法、格调或者语气上看，都清楚地显示出，科贝特的著作也同海涅的政治论战文章一样（特别是《路德维希·白尔尼》），有不少可供马克思借鉴的地方，对马克思的文体影响很大。

255 在一系列评论议会演说和“高级政治”的文章里，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在其他著作中经常借用的与悲剧、喜剧、闹剧、各种表演（包括古罗马人兽格斗）和舞台机械装置有关的各种形象比喻，这是毫不足奇的。马克思不止一次以文学鉴赏者和戏剧评论家的身分，对摆在面前的政治场景大肆讥嘲：

“对于‘高级政治’喜剧的鉴赏家来说，11月17日的法国《通

---

<sup>①</sup> 见《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214—215页。

报》是一个真正享受的源泉。正如在旧古典戏剧里一样，一个捉摸不到的万能的命运纠缠着主人公，而这一次命运的形象是数达十亿法郎的赤字。正如在旧戏剧里一样，对话只在两个人物之间进行：俄狄浦斯—波拿巴和铁列西阿斯—富尔德。但是悲剧变成了喜剧，因为铁列西阿斯所说的话都是俄狄浦斯预先悄悄告诉过他的。

一次又一次地使旧的、已经演完了戏的 *personae dramatis*〔剧中人〕作为崭新的主角重新粉墨登场，这套本领是波拿巴喜剧最典型的特技……富尔德又以杜尔哥的角色登台了，富尔德扮演着波扎侯爵！*Applaudite, amici!*〔朋友们，鼓掌吧！〕”<sup>①</sup>

在马克思从法国的时事转回来观察英国事务时，他发现自己常常联想到歌舞杂耍表演和滑稽歌剧。他的一个怪诞的想法与此也不无关系，这就是，英国政治家对外国人的看法和对付外国人的方法常常得自观看歌舞杂耍表演或者是浏览象保尔·德·科克这样作家写的小说（马克思自己在闲暇时间就常常阅读科克的小说消遣）。马克思告诉我们，约翰·西摩尔爵士开始把苏丹当作小歌剧中的 *Grand Turc*〔苏丹〕看待，最后则按保尔·德·科克的方式，称他为 *ce monsieur*〔这位先生〕<sup>②</sup>。约翰·罗素勋爵的蹩脚法国话

<sup>①</sup> 1861年11月19日《新闻报》——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394、396页。（俄狄浦斯是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同名悲剧中的主要角色，因命运的安排而犯下了罪。铁列西阿斯也是同一剧中的人物，预言家。杜尔哥是十八世纪末法国的一个经济学家。阿希尔·富尔德（1800—1867）是法国银行家和国家活动家，奥尔良人，后为波拿巴主义者，曾任财政大臣，国务大臣和皇廷事务大臣。——译注）

<sup>②</sup> 见1854年4月1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68页。参阅拉法格的《忆马克思》一文：“有时他躺在沙发上读小说，而且间或两三本小说同时开始，轮流阅读……现代小说家中，马克思最感到兴趣的是保尔·德·科克，查理·利维尔，大仲马和瓦尔特·司各特。”（《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1页。）



使马克思不由自主地想到《弗拉·迪亚沃洛》中“大人”使用的语言<sup>①</sup>；而他对卷入美国内战的北美诸州的忠告，马克思则借用歌剧《堂璜》的歌词，一语道破它的本质：“让他去吧，他不值得你恼怒！”<sup>②</sup> 针对伦敦《泰晤士报》对印度起义的社论，马克思的评论却用了一连串引证和典故——以科贝特开始，以圣经结束，文章的主要部分则环绕着莫扎特的歌剧《后宫诱逃》中的一个人物——奥斯明。马克思觉得不如此不足以表达自己对这篇社论的反感和自己的感情：

“‘嗜血的老《泰晤士报》’（科贝特通常这样称呼它）猖狂地咆哮；它扮演莫扎特歌剧中这样一个残暴人物，他在一段旋律极其优美的独唱中幻想着如何先把敌人绞死，然后把他放在火上烤，然后把他砍成四块，然后再把他穿在铁叉上，最后生剥他的皮；他竭力想掀起复仇的情绪，使之达到疯狂的地步，——要是在悲剧的激情后面没有明显地露出喜剧的把戏，所有这一切可能显得只是很愚蠢罢了。伦敦《泰晤士报》不仅仅是由于恐慌而把角色演得过火。它给喜剧提供了甚至连莫里哀都错过了的新题材，那就是复仇的达尔杜弗。而在实际上，它所需要的只不过是颂扬国家公债和庇护政府。既然德里的城墙没有象耶利哥<sup>③</sup>的城墙那样仅仅由于空气的震荡而倒塌，那就必须用复仇的号叫来震聋约翰牛的耳朵，使他

① 见1855年4月2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203页。（《弗拉·迪亚沃洛》（《魔鬼大哥》）是法国作曲家奥伯作的喜歌剧。——译注）

② 见1861年11月7日《新闻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357页。（《唐·璜》是奥地利音乐大师莫扎特的歌剧。这句话是唐·璜的仆人列保莱罗劝告唐·璜弃妇的话。——译注）

③ 耶利哥是西亚死海以北的古城。——译注

忘掉他的政府应该对所发生的灾难以及使这次灾难达到如此巨大的规模负责。”<sup>①</sup>

如果我们还记得马克思对自己在第一国际成立后的政治活动的评价,就更能了解马克思不断使用舞台比喻的特殊意义:

“伦敦工人的示威游行(同在1849年以后我们在英国所见到的比起来实在太了不起了)完全是‘国际’的作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重要区别:一是不抛头露面而在幕后活动,一是象那些民主派似的,在公众面前装模做样,而实际上一点事也不做。”<sup>②</sup>

马克思在1866年7月7日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也清晰地对比了远离舞台脚灯的有效果的活动同在公共舞台上昂首阔步的骗局。

虽然马克思写的报刊文章很少有直接谈论文艺问题的,但是通过前文探讨的散见各篇文章中的这些引述,我们对马克思的文艺观还是可以了解到不少东西。马克思不喜欢铺张夸大的文体,这一点我们已知道得很清楚;但另一方面,马克思也同样清楚地表示,他不喜欢急就成章的东西,不喜欢专靠“灵感”而不是通过艰辛努力而写作出来的作品。“有谁听说过,伟大的即兴作者同时也是伟大的诗人呢?在政治方面,道理也同诗歌方面一样。任何时候革命都不能按照命令制造出来。在有了1848年和1849年的可怕的经历之后,要唤起民族的革命,只是身在远方的领袖的纸上的号

257

---

<sup>①</sup> 见1857年9月1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311—312页。

<sup>②</sup> 见《马恩全集》,第3部分,第3卷,第343页。



召已经不够了。”<sup>①</sup>通过这些文章，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非常注意语言词汇的精密区别。他在发表1855年2月28日《新奥得报》上的一篇文章里，就向德国读者解释“clever”这个英文字的不同含义。<sup>②</sup>在同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再一次展开论战中，马克思还有一次借机专门讨论了六韵步的诗歌。金克尔大概在自己办的杂志《海尔曼》上草率发表了一篇歌颂索尔费里诺会战<sup>③</sup>的史诗，马克思评论说：

“歌颂会战的那首诗的韵律是英雄史诗的韵律，是六脚韵。大家知道，克莱斯特在六脚韵前面增加了一个短音节。我们这位歌颂英雄的诗人〔指金克尔——作者〕超过了克莱斯特：他非常慷慨，韵脚多少对他说来是无所谓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六脚韵刚从沙场上回来，缺少一个脚，或者膝盖脱了骹，那也不能责怪六脚韵。”<sup>④</sup>

马克思在讽刺挖苦了一通后，又从这首史诗中摘出几个例子，说明金克尔的诗如何不合规格。

从这部分为报章撰写的文章可以看到，马克思最感到兴趣的还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一个政治家的文学著作对于理解他的政

---

① 见1853年3月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01页。

② 见1855年3月3日《新奥得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105页。（原文是“但‘clever’是一个不好翻译的词，它有各种意思、各种含义。它包含着一个善于表现自己的优点以及善于巧妙地损人利己的人的一切品质。”——译注）

③ 索尔费里诺会战指1859年奥法战争中，奥军由于奥皇弗兰茨-约瑟夫一世指挥错误，在索尔费里诺会战中溃败。——译注

④ 见1859年7月16日《人民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692页。（艾瓦德·克莱斯特（1715—1759）是德国诗人。——译注）

策的实质会有什么帮助呢？约翰·罗素勋爵、迪斯累里、布尔韦尔—利顿，以及后来编订荷马史诗的格莱斯顿的事例都可以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而如果一个文人参加了政治活动，成为政府的要员，情形又如何呢？沙多勃利昂同拉马丁的例子实在令人厌恶，理应引为借鉴。曼努埃尔·霍赛·金塔纳<sup>①</sup>的情况略好一些，但也使人沮丧。马克思告诉读者说，西班牙洪达具有文学鉴赏力，委托金塔纳起草了洪达的宣言书，结果这份宣言尽管磅礴有力，可是洪达的行动却远远落在后面。<sup>②</sup>除此以外，马克思还研究了该如何认识表现于一个民族的文学和政治中的统一的“民族风格”的问题。我们不止一次读到，马克思在评论革命的西班牙的政治宣言时，把它的夸张、甚至夸夸其谈的词藻同卡德龙的文体联系起来；在解释加里波第的政治表现时，又借助于但丁和马基雅弗里的著作。但是，民族风格不是一成不变的；马克思认为马志尼就已经同较旧的意大利风格彻底决裂，因此可以说已经创立了意大利文学的一个新派别。<sup>③</sup>

马克思确认这种“民族风格”的存在，也表现在他对读者的尊重上；马克思认为作家必须考虑到读者的口味。在1854年6月14日发表于《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文章中，马克思曾引证了一篇匿名的俄国梯尔泰的寓言。马克思仔细地指出，这篇寓言的语言和结构简单浅显，是因为诗人想让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读者能够接受。<sup>④</sup>

① 曼努埃尔·霍赛·金塔纳(1772—1857)，西班牙诗人和政治活动家，曾任西班牙中央洪达的秘书。

②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476、484页。

③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450页。

④ 见1854年6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79页。



正象马克思其他著作一样,这些报刊文章一再向我们指出,马克思从来不脱离生活与历史的背景来谈论一部文学作品,他总是见地很高地把作品同时代联系起来。在1856年发表在《自由新闻》上的《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第三篇中,马克思说过这样的话:“要了解某一历史时期,我们必须迈出这一时期的局限,把它同其他历史时期进行比较。”<sup>①</sup>这一原则马克思不只用于观察社会和政治,也用于对文学史的研究。在现代社会中,某些文学形式可能为人滥用,受到损害——如前文谈过的金克尔的诗、或者利物浦商人据说是为了“丰富”英国诗歌而制作的赞扬奴隶买卖的颂歌<sup>②</sup>——,但是对于文学的真正价值,马克思从来没有怀疑过。当马克思谈到柏拉图把诗人摒除于他的“共和国”之外的时候,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他对这一举动感到不以为然,认为是很荒谬的:

“我既不同意李嘉图的见解,也不同意西斯蒙第的意见。李嘉图把‘纯收入’看做摩洛赫,认为大批大批的居民应该心甘情愿地做它的牺牲品;西斯蒙第则从他那悲天悯人的慈善心肠出发,企图用强力来保持已经过时的农业经营方法,并把科学从工业中驱逐出去,就象柏拉图把诗人从他的共和国中驱逐出去一样。”<sup>③</sup>

259 这段文章以希伯来的古风俗开始,以古希腊的著作结束,在表示对社会正义和正确的经济措施的关切时带出对诗人的关怀,在马克

---

① 见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与帕麦斯顿的生平》,L·赫契逊编(伦敦,1969年),第85页。

② 见1862年2月4日《新闻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484页。

③ 见1853年3月2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19页。(摩洛赫是腓尼基人所奉的火神,以人特别以儿童作祭品。柏拉图的对话集《理想国》中,描写一个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理想国家,主张把诗人驱逐出去,因为他们没有一点用处。——译注)

思从 1852 到 1862 年写的大量报刊文章中，这种论述方法是很有代表性的。

(2)

马克思为查·安·德纳和《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文章，间接地促使他集中思考了一些美学问题。1857 年德纳约请马克思为他编纂中的一部百科全书写一篇解释美学的文章；尽管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里嘲笑了这个建议（美学怎么能用一页的篇幅说清楚呢？），他还是受到触动，阅读并摘录了弗·费舍<sup>①</sup>作的《美学》和一部著名的德文百科全书的美学部分。格奥尔格·卢卡契在一篇颇有启发性的文章中研究、分析了马克思的这部分美学笔记。<sup>②</sup>卢卡契指出马克思的这部分笔记有三个重要特点。第一个是，马克思对费舍的关于美学的四卷著作的结构和材料安排所表现的兴趣：他不仅对这部作品所涉及的美学的各种问题感到兴趣，而且（马克思在 1858 年 2 月 22 日给拉萨尔的一封信里讲得很清楚）认为费舍把一部卷帙浩繁的作品分册出版是一个可资仿效的办法，自己的经济学著作不妨也按顺序分册呈现给读者。卢卡契提出的第二点，哈依·里弗希兹以前也已指出过。根据卢卡契和里弗希兹两人的意见，马克思着重研究的是费舍美学体系中艺术与生活关系最密切的一些部分，是一些处于生活和艺术的边界线上的问题，如主观与客观的相互关系，“美的瞬间”，滑稽与丑陋等等。这些问题引导马克思思考了事物的本质与其美学上的意义的

---

<sup>①</sup> 弗里德里希·泰奥多尔·费舍(1807—1888)，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分子，写有多卷美学著作。——译注

<sup>②</sup> 参阅卢卡契，《卡尔·马克思与弗·泰·费舍》一文，载于《美学史论丛》（柏林，1954），第217—285页。



关系。马克思从费舍的著作里摘录了一些康德对这些问题的论述,这样他就以费舍的《美学》为门径,进入了对康德的《判断能力的批判》的研究。卢卡契提出的第三点最为重要。据他说,马克思的这部分笔记摘录最多的是费舍美学中讨论神话的部分。费舍是黑格尔的追随者,也把神话看作是一个已经消失的、特殊的历史时期的表现,并把“现代的自由世俗的幻想”同历史早期的“受宗教制约的幻想”进行了对比。当马克思在1857年为他的经济学巨著《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撰写《导言》时(见本书第11章),脑子里肯定还萦回着这些概念。

费舍的著作概括了欧洲十八、十九世纪美学理论,马克思阅读这部作品所作的笔记是一部非常令人感觉兴趣、也非常重要的文献。前文所谈,远不能概括其重要意义。里弗希兹就曾经指出,费舍的作品不仅使马克思了解了康德的思想,而且也使他更深入地研究了席勒的美学。费舍的作品中有一处引证席勒的地方,马克思也抄录下来,而且显然表示赞同。“美既是客观事物,又是主观境界。它既是形式——当我们判断它的时候,又是生活——当我们感觉它的时候。它既是我们存在的状态,又是我们的创造。”这段引文使马克思想到他早年接受的黑格尔的美学,也激起他研究“崇高”,研究与“崇高”有辩证关系的“量”与“度”的概念的兴趣<sup>①</sup>。里弗希兹告诉我们,“有限”与“无限”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中正象在他的美学思想中一样,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因此,马克思在1857—1858年对美学的研究不仅在我们分析过的对拉萨尔的《弗兰茨·冯·济金根》的评论中结出果实,而且同《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等经济学著作也有密切的关系。

<sup>①</sup> 见米·里弗希兹:《卡尔·马克思的艺术哲学》,英文版,第95—97页。

1859年,马克思感到针对当时说德语的国家对他的攻讦非要写一篇详细的批驳不可。几年来他为美国、英国和德国报刊杂志撰写文章所练习的技巧对他写这篇反击文章帮助很大。当时攻击、诬蔑马克思特别激烈的是一个叫卡尔·福格特的人。这人本是一个学院派的科学家,曾是法兰克福议院一名有名的左翼议员,后来却成为,也许是受人利诱而成为把拿破仑三世当作欧洲的白天使<sup>①</sup>的帮派的代言人。因为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妨碍了这些人观点的传播,所以福格特诬蔑马克思是一个颠覆性的秘密组织的头目,并造谣说该组织靠敲诈勒索和把自己组织中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出卖给警察局而获得经费,妄图以此诋毁马克思。福格特的这些诬蔑诽谤也为一些德国报纸所接受转载。当马克思在普鲁士法院对这种诽谤提起上诉时,竟未被受理。为了洗清自己的名誉,也为了继续为自己献身的事业继续发挥作用,马克思就写了这篇《福格特先生》,于1860年出版。由于文章的性质,这部作品有很多篇幅谈论的是早已为人遗忘了的一些不出名的人物,和大多数读者已不再关心的时事问题。也就是说,《福格特先生》不象《雾月十八日》和《法兰西内战》两本书那样至今还引起人们的兴趣。但是这篇著作的确也包含有个别富于重大历史意义的篇章(如马克思为驳斥福格特无耻造谣而叙述“共产主义者同盟”历史的一段),同时,作为马克思把文学引喻与文学警句运用于政论文章的各种方式的汇编,这篇著作在本书中是值得探讨一

261

<sup>①</sup>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32页:“福格特……把两个人——沙皇和凯撒(亚历山大二世和拿破仑三世)都变成‘白天使’。这两个人都命定是欧洲的解放者。”



下的。

事实上，马克思的全部著作没有哪一篇能象《福格特先生》这样充分地、清楚地显示出马克思如何倾心于世界文学。西塞罗的引文，维吉尔和柏西阿斯<sup>①</sup>的警句，和希腊讽刺短诗作家的一小段引文（希腊原文）代表着古希腊罗马文学；《圣经》中的人物和一些家喻户晓的词句代表着马丁·路德翻译的《圣经》。此外，马克思还常常以不见经传的引证显示了他对古德国文学的渊博的知识——哈尔特曼<sup>②</sup>，高特夫里特<sup>③</sup>，沃尔夫拉姆<sup>④</sup>，瓦尔特<sup>⑤</sup>，《尼伯龙根之歌》<sup>⑥</sup>，《酒鬼》<sup>⑦</sup>，菲沙尔特<sup>⑧</sup>仿效拉伯雷的作品等等。对于较晚一些的作家则有歌德、席勒、路德维希·乌兰德<sup>⑨</sup>，以及不太知名的作家如弗·威·哈克兰德尔<sup>⑩</sup>等。当然，少不得还有海涅。象在马克思的任何著作中一样，莎士比亚总是占据着一个突出的地位。加入到英国作家行列的有赛缪尔·巴特勒<sup>⑪</sup>（《胡迪布腊斯》

① 柏西阿斯（奥鲁斯·柏西阿斯·弗拉克）（34—62），罗马讽刺诗人。——译注

② 哈尔特曼·冯·奥埃（约1170—1210），德国骑士史诗作家，著有《埃雷克》、《伊万》和《可怜的亨利希》等。——译注

③ 高特夫里特·冯·史特拉斯堡（12世纪末—13世纪初），德国骑士史诗作家，著有未完成的作品《特里斯坦》。——译注

④ 沃尔夫拉姆·冯·埃森巴赫（约1170—1220），德国骑士史诗作家，著有《巴尔其伐尔》、《维莱哈尔姆》、《提图莱尔》三部史诗及一些抒情诗。——译注

⑤ 瓦尔特·冯·得尔·弗格尔外德（约1160—1227），德国中世纪宫廷抒情诗人，写出德国文学史里第一首赞颂德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的诗歌。——译注

⑥ 《尼伯龙根之歌》是德国中世纪叙事诗，作者不详，约写于13世纪初。——译注

⑦ 《酒鬼》是13世纪德国的一首打油诗。——译注

⑧ 约翰·菲沙尔特（1545左右—1590），德国讽刺作家，曾仿效法国拉伯雷的《巨人传》作了长篇小说《关于格朗果施·高冈都亚和庞大固埃诸英豪和老爷的业绩与名言的惊险长篇历史故事》。——译注

⑨ 路德维希·乌兰德（1787—1862），德国南部史瓦奔地区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具有民族风格。——译注

⑩ 弗里德里希·威廉·哈克兰德尔（1816—1877），德国作家。——译注

⑪ 赛缪尔·巴特勒（1612—1680），英国讽刺诗人。——译注

的作者)、蒲伯<sup>①</sup>（特别是他的叙事诗《愚人记》）、彼得·品达尔<sup>②</sup>、《特利斯川·项狄先生的生平和见解》的作者洛·斯特恩<sup>③</sup>、拜伦（给卡斯尔里子爵写的有伤大雅的《墓志铭》<sup>④</sup>）和狄更斯（主要是《奥列佛·退斯特》和《马丁·朱述尔维特》两本小说）。在意想不到的行文中，我们会突然遇到但丁，卡德龙，塞万提斯，拉伯雷，伏尔泰，维克多·雨果，巴尔扎克和许多别的作家。马克思在1860年2月柏林发行的《人民报》上曾登了一则预告，称《福格特先生》为对德国诽谤者们的一篇“文学性”的回答，用以区别普鲁士法院拒绝马克思给予诽谤者的“法律”的回答。从马克思在这部作品中大量引用全世界伟大作家来看，也许“文学性”这个词还有出于马克思本意之外的另一特殊意义。

262

在《福格特先生》中，马克思再一次运用了他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创造的一种技巧——文学主导主题。因为卡尔·福格特是个胖子，扯的都是露骨的谎话，所以福斯塔夫的比喻从始至终贯穿着马克思的这本小册子。“从谎言中铺陈出谎言，一眼就望穿的露骨的谎言。”除了从《亨利四世》中选中福斯塔夫外，马克思自然还引用许多别的人物进行比喻，对不久前逝世的《新莱茵报》的一位编辑的赞颂就是一个例子：

“施拉姆不但生性热情、大胆，有如一团烈火，从不为日常生活忧虑，而且有辨别力，独创的见解，机灵的诙谐和天真的善良。他

---

① 亚历山大·蒲伯(1688—1744)，英国诗人，启蒙运动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中多次引证他的《愚人记》（一译《邓斯之歌》）中的诗句。——译注

② 约翰·沃尔考特(笔名彼得·品达尔)(1738—1819)，英国诗人与医生，著有讽刺诗《致皇家院士抒情诗集》(1782)与《致中国皇帝书翰诗集》(1817)。——译注

③ 洛伦斯·斯特恩(1713—1768)，英国感伤主义作家。——译注

④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656页。



是我们党的潘西·霍茨波。”<sup>①</sup>

在这部作品中，马克思常常把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当作代表一些特性或缺点的速写记号使用：拿破仑三世在文章的一个地方被叫作“皇族俾克史涅夫”<sup>②</sup>，在另一处又被叫作“加西莫多”<sup>③</sup>。象过去一样，马克思有的时候把文学作品中的不同人物溶合到一起，用以更精确地描划一个性格复杂的同时代人。如果只用福斯塔夫一个形象，可能还使我们对福格特产生某种敬意，因此就必需在福斯塔夫身上再加上拉伯雷和菲沙尔特的高冈都亚，加上舞台上的一些小丑，吹牛大王闵豪森，和席勒的剧本《威廉·退尔》里的暴虐的州官。用席勒剧本中的人物显然是因为州官这个德文字[Landvogt]有一半同福格特(Vogt)这个姓谐音。《福格特先生》与马克思其他作品有一个不同处，就是经常地、大量地使用语音或语义双关的文字游戏。例如，文中多次引用德国中世纪作品《路易之歌》<sup>④</sup>(Ludwigslied)，是因为福格特正在高唱一首“路易之歌”，赞颂法国皇帝路易·拿破仑。冠于第一章之首的卡德龙的一句引文也是因为里面有一个语义双关的词“硫磺膏”<sup>⑤</sup>；福格特正是诽谤马克思是一

---

①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71—472页。（康拉德·施拉姆（1822左右—1858），德国工人运动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曾参加《新莱茵报》编辑工作。潘西·霍茨波是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亨利四世》和《理查二世》中的人物，一个充满热情的勇敢高贵骑士的典型。霍茨波的英文原义为“急性人”。——译注）

②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76页。（俾克史涅夫是狄更斯的小说《马丁·朱述尔维特》中的人物，是个伪君子，假好人。——译注）

③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618、663页。

④ 《路易之歌》是德国中世纪一位无名诗人的诗作，用法兰克方言写于九世纪末。路易指路易·拿破仑即拿破仑三世。——译注

⑤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04页。（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第1章“硫磺膏”正文前，引用了西班牙作家卡德龙的剧作《神奇的魔术师》中的一句话，“他胡说八道；……他给自己擦上了硫磺膏。”用以反击福格特的无耻诽谤。——译注）

个名为“硫磺帮”的秘密社团的头目。《福格特先生》中引用了不少伟大作家的名字，或者是为了同一些较小的作家进行对比（马克思认为对这些不很知名的作家也必须给予应有的尊重），例如福格特就被叫作“前室的塔西佗”<sup>①</sup>；或者是为了嘲笑某些人对这些大作家的盲目崇拜，如马克思多次谈到席勒的剧本《唐·卡洛斯》，有时直接引用，有时用在很不恰当的“庸俗的”背景中，故意加以歪曲；另外一些时候，是为了在读者的心目中唤起一幅整个世界的腐败、堕落的画面，例如在一篇文章里马克思暂时打断对现代新闻界的评论，而向读者提起“巴尔扎克的著名小说”<sup>②</sup>（指巴尔扎克的小说《幻灭》）；或者是——用但丁的《神曲》地狱篇的话说——让读者了解马克思越来越感到自己正在费力跋涉一片粪污的泥塘：

“把食物变成粪便的臭皮囊；”<sup>③</sup>

或者：

“我看到一个脏鬼满头都是污粪，  
以致看不出他是僧侣还是俗人，  
他向我咆哮：‘你为什么老爱瞧着我，  
难道我比别人更污秽！？’”<sup>④</sup>

马克思引证文学作品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从中取得一套比较典

①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54页。（塔西佗（约55—120）是著名的罗马历史学家。——译注）

② 同上书，第682页。

③ 同上书，第460页。（语出但丁《神曲》地狱篇第28首歌。——译注）

④ 同上书，第488页。（语出但丁《神曲》地狱篇第18首歌。——译注）



雅的辱骂敌人的话语。《神曲》地狱篇就提供给马克思刻划魔鬼的方法和一些囚居在地狱里的人物的形象。前者(“他是骗子和一切谎言之父”<sup>①</sup>)马克思用来形容福格特,后者马克思用来描写福格特的狐群狗党:

“在第二圈里集居着  
 伪善者,谄媚者,妖术感人者,  
 盗窃者,买卖圣职者,诡计多端者,  
 欺诈者,诱淫者等等卑鄙齷齪的人。”<sup>②</sup>

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蒲伯的《愚人记》<sup>③</sup>,海涅的《科贝斯第一》,《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和《路德维希·白尔尼》<sup>④</sup>供给了马克思特别丰富的讽刺挖苦的表现法。

在《福格特先生》一书中,马克思似乎每看到一个政治或社会现象都联想起文学作品中某一场景。例如关于法兰克福的议会,马克思就写了这样一段话:

“在西班牙戏剧中,每一个主人公都得搭配两名丑角。在卡德龙的剧作中,甚至给圣基普里安诺这个西班牙的浮士德也配备了莫斯康和克拉林。同样地,反动将军拉多维茨在法兰克福议会中也有两名滑稽副官:他的喜剧小丑利希诺夫斯基和他的马戏团小丑

①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30页。(语出但丁《神曲》地狱篇第23首歌。——译注)

② 同上书,第616页。(语出但丁《神曲》地狱篇第11首歌。——译注)

③ 同上书,第649、659页(引自蒲伯《愚人记》中的词句)。马克思在嘲笑弗·察贝尔等人时,大量运用了英语词汇“dunce”(愚人)。

④ 同上书,第454、499、699页。

芬克。”<sup>①</sup>

利用文学引证使马克思对拉多维茨、利希诺夫斯基和芬克等人的讽刺挖苦更加深刻。他们不仅是奇异怪诞的人物，而且那些熟知人类缺陷和愚蠢的伟大作家很久以前就预见到这种怪物。通过这段比喻，法兰克福议会的面目就一清二楚了。说穿了，它只不过是外国文学和外国政治的一文不值的拙劣模仿品而已。

前文已经讨论过的福斯塔夫的引喻，集中于莎士比亚的一个剧本，而且只集中于这个剧本的一场，即《亨利四世》前篇第二幕第四场。在这一场中，福斯塔夫受威尔士亲王的挑逗，恣意吹嘘，信口开河，矛盾百出。每一次叙述同恶棍械斗的故事，他就把对手的人数增加一些；而且一会儿说这些人穿的是这种颜色这种质地的衣服，一会儿又说是另一种颜色和另一种质地。马克思反复引证这个故事，是为了想让读者了解福格特在他的诽谤性著作中所用的欺骗手法，想揭穿福格特的荒谬逻辑：把一个流亡者的无害的团体“硫磺帮”任意歪曲夸大，说成是威胁欧洲和平的极其危险的秘密社团。在这个意义上，福斯塔夫是卡尔·福格特的“老祖宗”。马克思想让读者看到，这位肥胖的兽学家是莎士比亚的角色的“兽国再生物”。<sup>②</sup> 马克思用福斯塔夫讲述穿麻布衣服的人的故事来比拟福格特信口夸大“硫磺帮”，把它说成颠覆性的危险组织，这也是对莎士比亚的一种礼赞。因为马克思认为莎士比亚有洞察力，

265

---

①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665—666页。（基普里安诺、莫斯康和克拉林都是卡德龙的歌剧《神奇的魔术师》中的人物。基普里安诺的性格与浮士德相仿。拉多维茨（1797—1853）是普鲁士的一个将军，宫廷权奸的代表人物。利希诺夫斯基和芬克都是当时普鲁士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译注）

② 福格特曾用庸俗唯物主义观点写了一本名叫《兽国研究》的书，马克思用这本书名来讽刺福格特。——译注



看得到人类行为的发条和齿轮，并有能力创造出显示这些发条和齿轮如何工作的模型。这样，马克思就又使我们了解到他尊崇莎士比亚、费佩莎翁创造的“不朽”人物（“不朽的约翰·福斯塔夫爵士”<sup>①</sup>）的一个——而且还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福格特先生》一书从始至终充满了伟大文学作品的引证，在文章风格方面也树立了典范。这些伟大的作家对于马克思的政敌们的那些不堪卒读的蹩脚文章不啻一副消毒剂，起了积极的矫正的作用。这些人的文章不仅形象比喻荒谬，语言笨拙，语法不通，而且思维逻辑也是一片混乱。马克思对这些人的文章虽进行了细致的剖析与评注。由于马克思的这本著作引证了大量伟大文学作品，这对马克思本人也是一个鞭策，使他特别认真考虑自己文章的效果，不仅是当时当地的效果，而且是对所有阅读到这部作品的人所产生的效果。马克思对《福格特先生》的读者说，他感到必须非常认真地撰写这篇文章，必须使文章发挥实效，“因为我必须把‘我的令人喜欢的题目’搞得相当巧妙。”<sup>②</sup>

马克思试图把他的令人喜欢的题目搞得巧妙，也包括绞尽脑汁给这部作品想出一个恰当的题目。他从报上读到，在阿尔及利亚流传的波拿巴派的宣传小册子是由一个笔名“达一达”<sup>③</sup>的人翻译成阿拉伯文的，因此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想把自己的这部作品叫作《达一达·福格特》。马克思家里的人和一些朋友们都反对，认为这个名字太费解了，最后马克思放弃了他的意见。虽然如此，他还是有些不甘心，因为（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达一达会引

---

①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05页。

② 见同上书，第421页。

③ 达一达，阿拉伯政论家，19世纪50年代受阿尔及利亚当局的委托把一些波拿巴派的抨击性小册子译成阿拉伯文。——译注

起庸人的好奇心并且有滑稽感。”又说：“达一达会引起庸人的好奇心这种情况很合我的心意，而且我觉得这也适合于轻蔑嘲笑的做法。”<sup>①</sup>五十多年以后，在苏黎世流亡的一群艺术家在一本法文字典里发现了“达达”这个字，他们和马克思产生了同样的想法，“达达”终于成了一个艺术流派的名字<sup>②</sup>。

马克思把达一达同福格特的活动连系在一起，是因为想让人们知道这两个人都是代表拿破仑第三在讲话，而不是在讲自己的话。这就使马克思在用来比拟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创立者的一串舞台小丑的名单中又增加了一个新名字。他在一段典型的文章中写道：“……福格特不过是土伊勒宫里能操腹语的小丑手中的无数外语传声筒之一。”<sup>③</sup>（着重号系本书作者所加）

必须承认，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一书中引证文学作品、使用文学比喻，未免过分一些。马克思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引进各式各样的作品，有时给人以堆砌之感，不够自然；其结果反而削弱了作者预期的效果，使读者感到烦冗。马克思的早期作品也曾出现这种倾向（在阅读《德意志意识形态》时，很少读者在第二十次遇到“圣·麦克斯”<sup>④</sup>和桑丘·潘沙能象第一次遇到这两名字时感觉那么新鲜），但是并不明显。马克思自己后来也逐渐感到在吸收别人作品的方法上不够恰当。在1868年4月11日用英语写给他的女儿劳拉的信里，马克思曾表示了自己的不安：

“亲爱的孩子，你一定会认为我是嗜书如命的，因为在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时候我还是拿书籍的事来麻烦你。但是你这样想就

①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96、101页。

② 指20世纪初现代资产阶级的颓废文艺流派——达达主义。——译注

③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58页。

④ 指麦克斯·施蒂纳（卡斯巴尔·施米特（1806—1856）的笔名）。他是德国哲学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家之一。——译注



错了。我只是一架机器，注定要把书籍吞掉，再改换一种形式把它们抛掷出来，投向历史的垃圾堆上。”<sup>①</sup>

一个能够这样清楚地看到自己的缺点、能够这样机智、风趣地描绘自己的缺点的人，肯定早已在作了不少努力，弥补自己的缺点，甚至能够把缺点转化为力量。如果深入地研究一下马克思的著作，大多数读者都会同意巴枯宁的一句话（巴枯宁对马克思显然不会有什么好感，因此他的这句评论应该说是公正的）：“很少有人读书能象马克思读得那么多，而且我们还可以加添一句，也很少有人读书能有马克思那样有见地。”<sup>②</sup>

#### (4)

267 马克思给报章写的最后一批文章是1861年年底和1862年全年投寄给维也纳的《新闻报》的一组稿件。在这些文章里，马克思继续从古希腊罗马著作中汲取大量的形象比喻和妙语警句。关于伦敦修筑泰晤士河堤岸的报道就是一篇饶有趣味的例子。泰晤士河堤岸的修建计划目的是为了了解决交通阻塞问题，这使马克思想到一篇讽刺诗：尤维纳利斯说他自己要先立下遗嘱才敢到罗马市街上去，因为很可能他一出门就被车轧死<sup>③</sup>。马克思告诉这篇文章的读者说，总的说来，伦敦的贵族老爷们是欢迎修建这条新堤岸

---

① 见W·施威尔勃洛克编：《卡尔·马克思不为人所知的私函》（慕尼黑，1962年），第121页。

② 引自伊赛亚·柏林：《卡尔·马克思。他的生平和环境》（牛津，1963年），第3版，第110页。

③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549页。（根据《马恩全集》，尤维纳利斯写的是一个罗马人的事，不是写他自己。——译注）

的,因为他们可以慷公家之慨,大大改善一下泰晤士河边的私人宅邸的环境。但是这些老爷们也有一个严重的顾虑:

“他们要求,在新建街道预定要紧靠着他们的地产走过从而使他们同‘misera contribuens plebs’〔‘纳税的可怜虫’〕相接触的地方,原定的建筑工程必须中断一下。这些‘fruges consumere nati’〔‘为享受果实而生的人们’〕的超凡绝俗的奥林帕斯仙境,决不能被忙于俗务的小民的目光、喧声以及呼出来的浊气所污染。在这些养尊处优的贵人们当中,为首的乃是一位最有钱、最有势、因而在提出‘小小的’要求时比谁都厉害的巴克鲁公爵。”<sup>①</sup>

在这段文章里,马克思使用贺雷西和尤维纳利斯的话,清楚地刻划出与古罗马贵族持有一样偏见的英国贵族老爷对待平民的轻蔑态度,同时也表现了在马克思的时代英国贵族所享有的一种特权——他们受到的古典文学的教育。

在为说德语的读者写文章时,马克思再一次到海涅那里去寻找生动的形象比喻。马克思挖苦帕麦斯顿当权时期的新闻界,把它比作海涅的《新春集》序章中的骑士;这位骑士颇想驰骋沙场,无奈堕入了爱神布下的罗网,不仅失去手中的利剑,而且为花环牢牢拴系住。马克思告诉读者说,英国的报刊不能投入战斗,不仅由于受了象别的专制国家中一样的专横独断的束缚,而且也是由于一些“迷人的、令人心喜的障碍”,由诡计多端的帕麦斯顿阴险地设置下的障碍<sup>②</sup>。在叙述美国内战时期一件偶然事件时,马克思借用了《浮

268

<sup>①</sup>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550页。(巴克鲁公爵,瓦尔特·弗兰西斯·蒙台居一道格拉斯—司各脱(1806—1884),英国贵族,托利党人。——译注)

<sup>②</sup> 同上书,第431页。



士德》第一部舞台指导说明中让靡非斯托斐勒司做的“不雅观的姿势”一词使自己的文笔更为生动。<sup>①</sup> 达·朋得为莫扎特的歌剧《唐·璜》写的歌词中的一句话被用来讥刺约翰·罗素爵士向内战中美国北方进的忠告<sup>②</sup>。马考莱对艾塞克斯伯爵的评论被引用来刻划1862年美国大选的总统的候选人麦克累伦将军<sup>③</sup>。在一篇用严肃的笔墨讲述英国工人贫困的文章中，马克思认为只有但丁《神曲》地狱篇的一个例子才能勉强比拟现代英国工人的深重灾难。马克思谈的是发生在英国约克郡西区一件工人活生生被饿死的悲剧。马克思说：“乌哥利诺和他儿子们的悲剧在帕德蒙登的小屋里又重演了，只不过是吃人的场面罢了。”<sup>④</sup> 象海涅在《莎士比亚剧中妇女形象》一文中所做的那样，马克思也从莎士比亚的剧本中去寻找除了在文学作品中已不复存在的古老英国的影象。马克思利用这一影象来批评当前的英国以及只存在于那些不了解当前实况的人的头脑中的“幻影”英国。

“大陆上人们习惯地认为，岛民约翰牛是有‘独特性’或‘个人特性’的。一般说来，这种看法是把早先的英国人和现代的英国人混为一谈了。其实相反，明显的阶级差别、过分细致的分工以及报界的婆罗门制造的所谓‘舆论’，已经把人们的性格弄成了千篇一律，连莎士比亚恐怕都认不出自己的同胞。有差别的已不是单个

---

①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539页。

② 见同上书，第357页。前文曾举过这个例子。

③ 见同上书，第506页。（托马斯·巴宾顿·马考莱（1800—1859），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艾塞克斯伯爵（1591—1646），英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麦克累伦（1826—1885），美国将军和大实业家，内战时期曾任北军总司令。——译注）

④ 见同上书，第580页。（乌哥利诺是但丁《神曲》中的人物（“地狱篇”第33首歌），他同儿子、孙子一起被皮萨主教鲁吉里囚禁于“饥饿之塔”中，乌哥利诺吃掉了孩子们的尸体，结果仍然饿死。——译注）

人,而是他们的‘职业’和阶级。如果不看职业而看日常生活,那末一位‘体面的’英国人同另一位就十分相象,连莱布尼茨也未必能找出他们之间的差别,或者 *differentia specifica* [特种差别]。”<sup>①</sup>

但是,马克思又缓和了一下自己的严峻的判断,加添说,英国人的“个人特性”还可以在个人生活中,因此也偶然在法庭上看得出来,因为法庭是个人的怪癖,互相冲突的公开场所。马克思举了一件有趣的诉讼案——一个伦敦裁缝控诉画家爱得文·兰西尔爵士<sup>②</sup>的案件——来说明这一论点。

马克思在为《新闻报》撰写的稿件中引用的其他文学著作包括从朱尼厄斯<sup>③</sup>的信札到当代的美国小说家库伯的《开路人》。但是在所有这些旁征博引的文章中,最令人感到兴趣的首推马克思对阿伯拉罕·林肯性格的一段描述。原文载于1862年10月12日的《新闻报》。马克思认为林肯

269

“从不首倡什么,从不表现激情,从不装出姿态,从不使用历史帷幔。最重大的行动,他也总是使之具有最平凡的形式……他犹豫不决地、违背本意地、勉勉强强地演唱着他这个角色的雄壮歌词,好象是在请人原谅他是为情势所迫,不得不‘充当英雄人物’

---

①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490页。(哥特弗利德·威廉·莱布尼茨(1646—1716),伟大的德国数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译注)

② 爱得文·兰西尔爵士(1802—1873),英国著名喜画动物的画家,曾绘过作家瓦尔特·司各脱居于他的一群狗之中的一幅画而享名。——译注

③ 朱尼厄斯(Junius),1769年1月至1772年1月《伦敦公告》上刊载的70封信的作者。这位作者在这期间一直用“朱尼厄斯”这一笔名,后来几经考查都无法查出他的真名实姓,有人认为是伯克(1717—1797),有人认为是瓦尔波尔(1717—1797),也有人认为是庇特(1708—1778)或弗朗西斯·菲力浦(1740—1818)。他的文体遒劲有力,雄浑瑰丽,极尽讥讽之能事。——译注



似的……

要想从林肯的所作所为中找出美学上的不雅、逻辑上的缺陷、形式上的滑稽和政治上的矛盾，象英国的那些奴隶制度的品得——《泰晤士报》、《星期六评论》之流所做的那样，是再容易不过了。尽管如此，在美国历史和人类历史上，林肯必将与华盛顿齐名！在今天，当大西洋这一边所发生的一切无足轻重的事情都故意带上了了不起的神气的时候，那在新大陆上以如此平凡的形式所进行的一切重大事件，难道没有任何意义吗？

林肯不是人民革命的产儿。是那种没有意识到本身应当解决何等伟大任务的普选制的寻常把戏把他——一个从石匠上升到伊利诺斯州参议员的平民，一个缺乏智慧的光辉、缺乏特殊的性格力量、地位并不十分重要的人，一个善良的常人——送上最高位置的。新大陆还从来没有取得过比这一次更大的胜利，这证明，由于新大陆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善良的常人也能担负旧大陆需要英雄豪杰才能担负的任务！

黑格尔曾经说过，实际上，喜剧高于悲剧，理性的幽默高于理性的激情。如果说，林肯不具有历史行动的激情，那末，作为一个来自人民的常人，他却具有这种行动的幽默……”<sup>①</sup>

---

①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586—587页。（原译文未能突出马克思的一些引证。现把这些部分直译出来，俾读者在阅读本书下这评述时，更清楚地了解马克思借用文艺术语和引证文艺著作的技巧：

(1) “从不装出姿态”——“从不穿演希腊悲剧用的高底靴”。

(2) “演唱着他这个角色的雄壮歌词”——“演唱他扮演的角色叫他唱的雄壮的咏叹调”。

(3) “不得不‘充当英雄人物’似的”——“不得不‘装扮成一头雄狮’”。

(4) “林肯的所作所为”——“林肯在这场庄严隆重的戏剧表演中”。

(5) “当大西洋这一边所发生的一切无足轻重的事情都故意带上了了不起的神气的时候”——“当大西洋这一边微不足道的人物昂首阔步地在舞台上装模做样地大演滑稽戏的时候。”——译注)

同《雾月十八日》一书一样，各种各类的舞台——表演的比喻和术语——穿高底靴的希腊悲剧演员啦，十七世纪德国的庄严隆重的连本大戏啦，歌剧中的雄壮的咏叹调啦——在这篇文章中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这些比喻和形象似乎只是作为反证而出现，也就是说，用以说明林肯并不是某种人物，他并不做某些事情。通过这些形象比喻，我们很清楚地看到，林肯是一个与拿破仑第三截然相反的人物。在马克思的眼睛里，拿破仑第三只不过是一个趾高气扬、以英雄自居的滑稽小丑而已。提到小丑强扮为英雄，马克思自然又想到一个戏剧中的形象：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中的细木工斯纳格。斯纳格向观众道歉说，他扮演狮子是迫于业余剧团的要求，勉为其难。由于有林肯的对比，斯纳格这个人物就更赢得我们的同情；由于有斯纳格的对比，林肯的行事与作风就更为我们所理解。品得<sup>①</sup>这个著作颂歌的人，只是作为《泰晤士报》、《星期六评论》的讽刺性的比拟一笔带过，文章最后一段谈的完全是如何运用黑格尔的一个美学观点观察世界历史的事。黑格尔对喜剧的这一奇特的评价初见于他著作的《精神现象学》，后来在《美学讲演录》中他又把这个观点加以发挥<sup>②</sup>。林肯与欧洲政治活动家两种表现的对比，既说明又验证了应用于世界历史范围中的黑格尔的这一论点。

## (5)

马克思在 19 世纪 60 年代初本计划再写一部作品，细致研究

① 品得(约公元前522—442)，古希腊抒情诗人。——译注

②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5卷，卷741页，注释第345条。参阅黑格尔，《精神现象学》(CC, vii, B, c)和《美学讲演录》第3卷，第1部分。



一下当代的演说家同文化上的英雄。作品的内容是1863年一月波兰起义引起的波兰问题；但是这部著作并未完成，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只是马克思从不同书籍和小册子上抄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摘录，连同他做的一些零碎的评注。这些评注，集中论述的是普鲁士和法国的政治，而不是波兰本国的问题。马克思在这部分手稿中再一次把政治活动家比作“喜剧演员”和“潘奇内洛”<sup>①</sup>。弗里德里希大帝<sup>②</sup>同俄罗斯搞联盟被讥刺为“整个事件中的一首可怜的短诗”<sup>③</sup>。马克思继续从海涅作品中引用各种讽刺挖苦的词句（如借用海涅的《掉包的怪孩子》中一句骂人的话，几次称弗里德里希大帝为“老兽奸者暴徒”）<sup>④</sup>。对于曾写过《维罗纳议会》并主持过一个时期法国外交事务的沙多勃利昂，马克思直言不讳地称之为“沙皇亚历山大的工具”和“俄罗斯的奸细”<sup>⑤</sup>。在按年代叙述法国对俄罗斯的政策时，马克思插入了一段自己对大作家的代表作用的想法：

“从上面论述的事实可以看出，那个政府的言行，或者如果你愿意，说意图与行动也可以，是多么不一致。但是除了这些事实外，我们还不应该忘记，路易十五的政府，不论是公开的或是秘密的，

① 潘奇内洛——意大利假面喜剧中的人物，好说俏皮话和爱插科打诨。——译注

② 弗里德里希大帝（即弗里德里希二世）（1712—1786），1740—1786年任普鲁士国王。曾以背信弃义的手段推行侵略其他民族领土的政策，从而扩张了普鲁士的领土，并建立了强大的普鲁士军队。——译注

③ 见W·孔齐和D·赫兹—爱森罗德编《波兰问题手稿（1863—1864）》（海牙，1961年），第97、98、99、101、119页。着重体系本书作者所加。

④ 同上书，第119、140页；另参阅马克思致恩格斯信（1863年3月24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311页。

⑤ 见W·孔齐和D·赫兹—爱森罗德编《波兰问题手稿（1863—1864）》（海牙，1961年），第188、189页。

都不代表法兰西。伏尔泰和狄德罗远比德·布罗格利公爵或是维尔任纳伯爵更能代表法国。伏尔泰为弗里德里希二世吹号角，正象狄德罗为叶卡捷琳娜二世吹嘘一样。法国十八世纪百科全书派竭尽全力替叶卡捷琳娜二世捧场，同这些人的浪漫主义反对派沙多勃利昂为沙皇亚历山大服务毫无差别。”<sup>①</sup>

要想了解十八世纪法国真正起作用的政治力量，我们必须象注意国王和大臣的政治一样注意伏尔泰同狄德罗的言论，也许还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这些人身上。但是最易使人误入歧途的，莫过于以看待十九世纪自由主义派的目光探讨这些十八世纪的作家。马克思叫我们认识到，伏尔泰和狄德罗对本国以外的专制君主仍是非常虔敬的，也正象某些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作家对神圣同盟和这一同盟的主要缔造者心怀崇敬一样；尽管马克思并不因此而对《老实人》和《拉摩的侄儿》减少一丝尊敬，也不因此而对沙多勃利昂的作品增加一分好感。归根结底，文化界的英雄只有在他们的时代背景中才能被充分了解。

---

<sup>①</sup> 见《波兰问题手稿(1863—1864)》(海牙,1961年),第176页。这段文章系马克思在1864年12月用英文写的。(德·布罗格利公爵系指维克多·弗朗索阿·德·布罗格利(1715—1804);查理·格拉维耶·维尔任纳伯爵(1719—1787),曾任法国驻外国大使及外交部长。——译注)



## 第十一章

## 模式和隐喻

“思想脱离语言就不存在。”<sup>①</sup>

“所以我打算把法律、道德、政治等等的批判分为几个小册子单独出版；最后我还打算单出一部书，把互相关联的整体写出来，让读者了解不同部分的关系，并提供对这一材料的理论研究的批判。”<sup>②</sup> 这是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订的计划，这时他开始对政治经济学，对政治经济学与国家、法律和道德的关系并对人们的思想、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了兴趣。在1850和1851两年，他很有可能写成专门批判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本这种“小册子”，但是每天在大英博物馆从早晨九点工作到晚上七点，摘录一本又一本的笔记，夜里还要分析思考这些摘录的意义，他逐渐发现他研究的这一题目内容过于庞杂，牵涉范围过广。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位著名出版商，弗·阿·布罗克豪斯拒绝考虑出版一本专门批判英国当代政治经济学论文的建议），使马克思不得不把具体写书的事推迟。1857年发生了马克思预见到也预言过的一次经济危机，这使他重又下定决心发表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从他给恩格斯的一封信可以知道马克思如何“发狂似地”

① 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柏林,1953年),德文版,第80页。

② 见《1844年巴黎手稿》序言提纲——《马恩全集补编》(德文版)第1卷,第467页;另参阅T·B·鲍多莫尔编,《卡尔·马克思早期著作》(伦敦,1963年),导言,第63页。

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sup>①</sup>。1857年8月马克思草拟了一篇论述经济研究的总导言(Einleitung),在以后的六个月里他的手稿、摘记填满了七个笔记本。这些笔记说明,马克思试图通过阅读亚当·斯密和李嘉图,马尔萨斯和凯里,<sup>②</sup>巴斯提安<sup>③</sup>和其他许多作家弄清楚他最初在1844年在巴黎写的笔记提出的一些问题。这部手稿是马克思较后来的重要著作的丰富资料,直至1939年才公开问世,现在人们一般称为“大纲”(Grundriss),这是最初的编辑给这一著作所定的名称的简称。原书全名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sup>④</sup>

1857年的总导言开始的一段考察了“物质生产”,断言所有这种生产都是**社会性的**。

“被斯密和李嘉图当做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猎人和渔夫,应归入十八世纪鲁滨逊故事的毫无想象力的虚构,鲁滨逊故事决不象文化史家设想的那样,仅仅是对极度文明的反动和想要回到被误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同样,卢梭的通过契约来建立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联系的社会契约论,也不是奠定在这种自然主义的基础上的。这是错觉,只是美学上大大小小的鲁滨逊故事的错觉。这倒是对于十六世纪以来就进行准备、而在十八世纪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219页。

② 亨利·查理·凯里(1793—1879),美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宣扬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利益一致的反动理论的始者。——译注

③ 阿道夫·巴斯提安(1826—1905),德国资产阶级民族志学家,著有《人在历史中,基于一种对于世界的心理概念》(3卷,莱比锡,1860年)。马克思在评论此书时说,“我发现这本书不好,条理不清,装腔作势。他对心理学的‘自然科学的’论证并没有超出虔诚的愿望。另一方面,对历史作‘心理学的’论证表明,这个人既不知道心理学是什么,也不知道历史是什么。”(见马克思1861年1月28日致拉萨尔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574页。)——译注

④ 关于这部著作的详细内容和写作过程,请参阅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M·尼古劳斯译)(马克思丛书[鹈鹕版])(哈蒙斯窝斯,1973年),第7—80页和D·麦克莱兰:《马克思的大纲》(伦敦,1973年),第13—25页。



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表现为摆脱了自然联系等等，后者在过去历史时代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这种十八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十六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而在十八世纪的预言家看来（斯密和李嘉图还完全以这些预言家为依据），这种个人是一种理想，它的存在是过去的事；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sup>①</sup>

274 模仿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的各式各样鲁滨逊故事，写的都是人们同人类社会和文明隔绝一段时期的生活<sup>②</sup>。马克思认为这些故事靠着它们“美学上的错觉”<sup>③</sup>是很容易叫人上当的。席勒在其艺术理论中曾想方设法论证“美学上的错觉”并不是骗人的假象<sup>④</sup>。马克思指出这种“美学上的错觉”与真实相互对立是非常危险的，对那些表现了这种对立而把读者引入歧途的作品他称之为“毫无想象力的虚构”。但是，我们应该记住，马克思对“大大小小的鲁滨逊故事”的这一抨击并没有涉及这些故事的蓝本，《鲁滨逊·克卢梭的奇异冒险史》。笛福的这本长篇小说（约·亨·康培<sup>⑤</sup>为德国读

---

① 见《马恩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86—87页。鲁滨逊·克卢梭和卢梭的结合绝非偶然；卢梭的《爱弥儿》第3卷已提供那种景象，许多18和19世纪的读者通过这种景象看待笛福的小说。

② 参见H·乌尔里希著《鲁滨逊和鲁滨逊故事。传记，故事，批判》第一部（魏玛，1898年）；H·乌尔里希著《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一个流传全世界的故事》（莱比锡，1924年）；H·布伦纳尔著《诗的岛屿。德国文学中的荒岛和荒岛的想象》（斯图加特，1967年）。

③ “美学上的错觉”系上引《马恩选集》上的译法。原文aesthetischer Schein也许译为“美学上（或艺术上）的假象”比较恰当一些，英文是aesthetic semblance。——译注

④ 参见席勒的《美育通讯》（E·M·威金逊和L·A·威劳贝编辑），第327—329页。

⑤ 约阿希姆·亨利希·康培（1746—1818），德国资产阶级作家，教育家和语言学家，著有儿童和少年读物。——译注

者编译的只是一个缩写本,内容有一些更异)决没有表现,也不想表现物质生产始于与世隔绝的个人,或者一位创业的英雄开始是生存在纯“自然状态”中。鲁滨逊自己在荒岛上生活的某一阶段也许产生过这种幻想(在《鲁滨逊漂流记》的第三章,当他开始种植谷物时,由于没有合适的农具,便想到自己又“回复到自然状态里”去了);但是笛福一直没有忘记,也没有让他的主人公忘记,鲁滨逊多亏抢救来一些十八世纪英国高度发达的社会的工具、物质和技术,才能生存下去。因此,马克思在这段文章里攻击的并不是《鲁滨逊漂流记》这本书本身,而是某些读者由于拙劣模仿,由于食而不化,或是由于想入非非而产生的种种幻想。一句话,马克思攻击的是鲁滨逊·克卢梭的神话,而不是这本小说。<sup>①</sup>

事实上,马克思在前引总导言稍后几行就陈述了类似于此的看法:

“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偶然落到荒野中的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或许能做到——就象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在这方面无需多说。十八世纪的人们有这种荒诞无稽的看法本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是巴师夏<sup>②</sup>、凯里和蒲鲁东等人又把这种看法郑重其事地引进最新的经济学中来,这一点本来可以完全不提。蒲鲁东等人自然乐于用编

275

---

<sup>①</sup> 参阅伊昂·瓦特:《作为神话的鲁滨逊·克卢梭》一文,载于《文艺评论》(伦敦,1951年),第95—119页。

<sup>②</sup> 弗雷德里克·巴师夏(1801—1850),法国庸俗经济学家,资产阶级社会利益调和论的鼓吹者。——译注



造神话的办法，来对一种他不知道历史来源的经济关系的起源作历史哲学的说明，说什么这种观念对亚当或普罗米修斯已经是现成的，后来它就被付诸实行等等。再没有比这类想入非非的陈词滥调更加枯燥乏味的了。”<sup>①</sup>

由此可以得知，是在马克思把大多数十九世纪经济学者都划在内的“平庸的心灵”这一类人中，流落荒野的故事，或者说亚当和普罗米修斯的故事才引起了浅薄的、哄骗人的奇思异想。马克思说这段话时特别想到了亨·查·凯里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这本书描写了使鲁滨逊在荒岛上“获得了他认为有价值的财富”的各种活动，但对于他从文明世界抢救来的工具和技术却只字未提。另外马克思还想到约翰·格雷<sup>②</sup>的《社会制度。一篇关于交换原则的论文》，这本书对寻求交换的“社会中的人”与寻求生产的鲁滨逊进行了极为简单化的对比。<sup>③</sup> 台瑞尔·卡维尔说得很对，对马克思来说，笛福的这位主人公的态度和行为，必须从“特定的社会经济变化，亦即从‘封建社会形式解体’和‘十六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这一角度来观察。<sup>④</sup> 确实如此，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以及后来在《资本论》里都让我们看到鲁滨逊·克卢梭这个模型在讲述经济学的文章中可以大加利用。在《大纲》这篇论文中他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前景。这些鲁滨逊故事不应当看作是某一原始社

---

① 见《马恩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87页（《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想入非非的陈词滥调”根据英文是“平庸的心灵的奇思异想。”——译注）

② 约翰·格雷，18世纪末英国资产阶级作家。——译注

③ 凯里一书（费城，1837年），第1卷，第7页；格雷一书（爱丁堡，1831年），第21页。台瑞尔·卡维尔在《卡尔·马克思方法论选读》（牛津，1975年）一书中引述了凯里的原话，并认为弗雷德里克·巴师夏关于《鲁滨逊漂流记》的看法与马克思的很接近，而马克思自己对这个问题只是一带而过，反而不容易让我们弄清楚。

④ 见卡维尔同书，第91页。

会组织的图景，而应看作对十九世纪英国社会所孕育着的某些发展趋势的描绘，而且描绘得那么清楚，简直可以说是对未来社会的某些迹象的预言。如果仔细观察一下，我们就可以发现，鲁滨逊的孤独实在就是十九世纪“文明社会”的人与人关系异化疏远的一个征兆。可见文学有时候是有“预言性”的，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预言只有在事情发生过后才被认识到。

总《导言》的那种辨识什么是“不合理的抽象”并加以摒弃的方法对于文学批评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点近几年来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人赏识。马克思写道：“一切生产阶段所共同的、被思维当做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sup>①</sup>因此马克思警告我们，不要因为只见到事物的连续性与共同性就忘记它们的本质的差别，后者才是唯一能使我们理解事物发展的东西。“如果说最发达语言的有些规律和规定也是最不发达语言所有的，但是构成语言发展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sup>②</sup>

《导言》的后一部分对所谓的社会主义作家大肆讥嘲（这种嘲弄的方法我们已经很熟悉了）。这些作家的作品与其说是经济学和社会学著作，倒更象是文艺作品。在这段抨击后，马克思开始分析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这里他发挥了1844年巴黎手稿中已经提出的关于艺术与人类需要的关系的一些看法：

“生产不仅为需要提供材料，而且它也为材料提供需要……消

① 见《马恩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91页。

② 同上书，第88页。另参阅H·加拉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纽威德和柏林，1971年），第173页。



费对于对象所感到的需要，是对于对象的知觉所创造的。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sup>①</sup>

277 这是我们所能看到的关于艺术在很重要的程度上创造了欣赏它的鉴赏力这一真理的最扼要的论述。但是，我们不该忘记的一点是：马克思在这里不仅强调了需要考察创造与欣赏艺术品的社会的物质生产手段，也要研究这一社会的阶级结构。马克思说：

“如果我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因此，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末这就是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经过更切近的规定之后，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sup>②</sup>

这里泛论人口问题的道理，自然也适用于创造艺术作品和“接受”艺术作品的具体的人。

与此同时，马克思在总《导言》里还承认了伊安·比尔恰正确

---

① 见《马恩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95页。

② 同上书，第102—103页。

地(如果说不太文雅地)称之为“艺术反映现实的特殊性”。马克思在阐述他这时制订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的一段文章里说:“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被思维的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特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重点系本书作者所加)<sup>①</sup>。因此,思辨的哲学家或者政治经济学家“掌握世界”(eignet sich die Welt an)是与艺术家的方法不一样的。但是,马克思接着又说,不要因为承认了这一点而把这样掌握的现实与真实的现实混为一谈。马克思的原话是:

“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一定要经常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sup>②</sup>

马克思并不怀疑——正象海德<sup>③</sup>、歌德和黑格尔并不怀疑一样——文学与社会发展是相互联系着的。但是,如何相互联系呢?有没有一种发展上的特殊的“不平衡”使文学上的“思想”产品与经济生活的“物质”产品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复杂呢?正是这些问题使马克思写下《导言》结尾部分的那些不连续的札记。这一部分札记说明马克思并不赞同连续的、一致的进步这种粗浅的观点。他首先不赞同的是认为社会组织的进步必直接影响艺术进步这种实证主义的观点。

278

---

① 见《马恩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104页。另参见伊安·比尔恰,《全面的马克思和马克思文艺理论》一文,载于《马克思的位置》(瓦尔顿和霍尔),第135页。

② 见《马恩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104页。

③ 约翰·高特弗里德·封·海德(1744—1804),德国诗人和哲学家。——译注



“(6)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理解。现代艺术等等。这种不平衡在理解上还不是象在实际社会关系本身内部那样如此重要和如此困难。例如教育。美国同欧洲的关系。可是，这里要说明的真正困难之点是：生产关系作为法的关系怎样进入了不平衡的发展。例如罗马私法(在刑法和公法中这种情形较少)同现代生产的关系。

(7)这种见解表现为必然的发展。但承认偶然。怎样。(对自由等也是如此。)(交通工具的影响。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

(8)出发点当然是自然规定性；主观地和客观地，部落、种族等。

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例如，拿希腊人或莎士比亚同现代人相比。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因此，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如果说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部的不同艺术种类的关系中有这种情形，那么，在整个艺术领域同社会一般发展的关系上有这种情形，就不足为奇了。困难只在于对这些矛盾作一般的表述。一旦它们的特殊性被确定了，它们也就被解释明白了。

我们先拿希腊艺术同现代的关系作例子，然后再说莎士比亚同现代的关系。大家知道，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成为希腊人的幻想的基础、从而成为希腊〔神话〕的基础的那种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能够同自动纺机、

铁道、机车和电报并存吗？在罗伯茨公司面前，武尔坎<sup>①</sup>又在哪儿？在避雷针面前，丘必特又在哪儿？在动产信用公司面前，赫尔墨斯<sup>②</sup>又在哪儿？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在印刷所广场<sup>③</sup>旁边，法玛<sup>④</sup>还成什么？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也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这是希腊艺术的素材。不是随便一种神话，就是说，不是对自然（这里指一切对象，包括社会在内）的随便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加工。埃及神话决不能成为希腊艺术的土壤和母胎。但是无论如何总得是一种神话。因此，决不是这样一种社会发展，这种发展排斥一切神话地对待自然的态度和一切把自然神话化的态度；并因而要求艺术家具备一种与神话无关的幻想。

从另一方面看：阿喀琉斯能够同火药和弹丸并存吗？或者，《伊利亚特》能够同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并存吗？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而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失吗？

但是，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

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

---

① 武尔坎是罗马神话中的火神与匠神，相当于古希腊神话中的赫非斯托斯。——译注

② 赫耳墨斯是古希腊神话中宙斯和众神的神使，又是司畜牧、商业、交通、旅行和体育与运动的神。——译注

③ 印刷所广场是指伦敦的一个广场，《泰晤士报》总社就设在这里。——译注

④ 法玛是罗马人对希腊神话中的传闻女神俄萨的称呼。传说她吹着号角传播消息。——译注



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它的固有的性格不是在儿童的天性中纯真地复活着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他们的艺术对我们所产生的魅力，同它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它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它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sup>①</sup>

当马克思开始思考今天人人都在谈论的“文艺滞后论”，亦即艺术与物质生产的“不平衡的发展”时，他发现这远不是他需要解决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使他更伤脑筋的是社会和法律分析的一些更为棘手的问题，给进步下界说的困难，必然、自由和偶然中间的关系，以及在交通更有效、更迅速的发展已使所有的历史成为**世界的历史**的时代，历史研究的复杂性。如果想研究艺术史（马克思这时想要做的正是这件事），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考虑在内。同研究任何事物一样，研究艺术也必须（正象海德很久以前就坚持的看法一样）从自然决定一切开始——马克思特别提到部落和种族。当他转而谈艺术史本身时，他的语汇就使用了大自然世界的一些词。马克思也同浪漫主义作家一样，把艺术的发展比作植物的不同季节。他用了开花季节，繁盛时期（Blütezeiten）这样一个词。但是正象我们从《导言》前一部分很多地方看到的那样，马克思并不满足于观察艺术的内部发展；艺术必须放在社会的一般发展中进行研究。但是用“基础”（Grundlage）这一词作为隐喻是否又令人联

---

<sup>①</sup> 见《马恩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112—114页。



想到建筑,太不灵活了呢?马克思好象也已感到这一点,所以马上又换了另外一个词:经济条件,生产组织被视为国家的“骨骼结构”(Knochenbau)。“骨骼结构”与“基础”一词不同,它可以根据内在规律生长、变化,虽然比起身体的其他部分来,它的变化缓慢,更为持久。

虽然如此,这一切还是太抽象了;所以马克思立刻就转入文学史中的两个实例。他选择的这两个例子也是德国浪漫主义作家以及浪漫主义以前的席勒很喜爱的——希腊人或莎士比亚同现代有什么关系?说得更具体一点(马克思现在接触到黑格尔从写作《现象学》以后迫切想解决的一个美学思想问题),某些文艺体裁——例如史诗——与历史某一特定时期究竟有什么关系?自从荷马以后,还出现了许多史诗,但是马克思同歌德、黑格尔的看法一样,认为没有哪一部能达到荷马的那种典范的古典的形式和划时代的力量。马克思这一段文章的词汇很值得我们仔细推敲——因为我们发现,他把主要用于经济学的术语也用在文学和其他艺术的历史上,如生产(Produzieren, Produktion)等。他把诗人也叫做“生产者”,把艺术品叫做“产品”,虽然是一种独特的、有别于其他种类的“产品”。马克思通过使用这样的术语叫我们不要忘记把艺术放在其他社会关系的框子里来观察,特别是应该放在物质生产关系和生产手段的框子里。只有明确了这一点之后,他才能独立地、抽象地研究艺术,才有余暇观察一下艺术领域自身。

但是,尽管**艺术领域**这样被分割出来,马克思开始思考这一问题时的种种棘手问题仍然存在。为什么艺术的某些重要的、有意义的形态——最引人注意的是史诗——只是在人类发展的初期(这一时期艺术的潜在力还没有获得发展机会)才可能发展?如果这是把艺术领域独立出来以后其中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毫不奇怪,它仍然是在较大的社会—历史范围内的问题。这里有一些矛盾



(Widersprüche,这是马克思,也是黑格尔的一个关键词)需要辩证地解决。马克思认为,只要我们从一般化的公式转到具体的事例去,这些矛盾是不难解释的,而马克思自己也确实准备这样做。

282 马克思把莎士比亚撂在一边,先集中分析希腊人的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区别。与过去相同,注意力仍然以史诗为中心。史诗的基础是神话——希腊神话,正象马克思在黑格尔的作品以及弗·泰·费舍的《美学》中谈到的那样,不仅是希腊诗人提取必要装备的武器库,也是整个希腊艺术的土地和土壤。马克思这里用的一个暗喻Boden,是阐述这一问题的一个特别有用的词。当“土地”讲,它和马克思用过的“基础”这个暗喻是一致的,而当“土壤”讲,它又和繁茂时期这一描写植物界的暗喻非常吻合。Boden既是可以上面进行建筑的地基,又是可以进行种植的土壤。但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这块土壤被浸蚀了,地基被割走了。希腊神话一定要当作一种特殊的幻想(Phantasie)的产品来看待;而这种幻想是依靠一种对大自然的观点、依靠某些社会关系才产生的。这些社会关系已经一去不复返,在技术时代不可能再从人类的经验中产生了。马克思对于希腊诸神的看法也和他那一时代许多人的看法一样,认为它们是在一个人们很不理解并非常畏惧的世界中的自然威力的人格化。但是,马克思问道,在我们看到了现代工业机器的奇迹的时候,又怎能对武尔坎的功绩感觉畏惧呢?在避雷针可以使霹雷不再伤害人的时候,丘必特的雷电又有什么可怕呢?在现代银行家的运算远远超过去赫尔墨斯的速度和技巧的时候,谁又为赫尔墨斯的速度和把戏倾倒呢?如果神话真的如马克思所想的那样,是对自然力的一种屈服、而在幻想中赋予它们以形体并控制它们,那么当这些力量已被理解、被驯服、并在实际中受人驾驭的时候,神话就非得消失不可了。

希腊艺术是以一种特殊的神话为先决条件的。这种神话本身



就很具有艺术性,因为这是希腊人民在幻想中(人民的幻想Volksphantasie,这又是一个浪漫主义的概念,特别为格林兄弟所喜爱)使自然和社会关系转变形态的方法。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神话不能简单地接受过来,从一个社会、一种文明移交给另一个社会和文明(象另外一种原料一样)。这正同海德的看法一样,他很早以前就认定一个诗人只有在他的人民的生活传统中才能令人信服地工作。在论述这一问题时,马克思举了埃及神话不可能使希腊人的艺术繁茂起来的例子。这时他又介绍了一个人体器官的暗喻。他从Boden[地基或土壤]转到Mutterschoß[母体],暗示一个有机体在另一个有机体中缓慢生长以及出生后虽然脱离母体但却仍与母体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283

马克思在把论点摆清楚以后,即开始总结。史诗诗人需要一种神话,如果一个社会排斥了能够产生神话的对待自然的态度(“自然”这里指整个客观世界,因此也包括社会关系),史诗就无法在其中繁荣滋长。一旦发明了火药和炮弹,阿喀琉斯就不能再被介绍到现代世界里来了;在手工印刷术,特别是印刷机发明以后,伊里亚特代表的那种口诵文学的形式也就岌岌可危了;法玛的号角同《太晤士报》这种大报纸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一种含义深广的神话可以繁荣发展的条件已经不存在了,因此象荷马的那种史诗可以产生的条件也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刚才观察了马克思在这段理应传诵人口的文章里如何用各种方法(或者相互补充,或者交替更迭)解说物质与社会条件同艺术作品的关系。他用了“关系”和“比例”,等词,也用了“必要的发展”和“偶然性”等概念。他一口气地谈了“物质基础”,“组织”和社会的“骨骼结构”。他既用了现代武器库,也用了来自自然界的一些比喻(Boden可以解释作土地、土壤或基础)。文章中还出现了“开放”,“展开”,“成熟”和“生长”等形象词,但也有更多的如“出现”这



类形象不太鲜明的词。在一些段落里，幻想被说成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对自然的和社会的形式进行“加工”。在另外一些段落里，又说艺术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牢系在一起”<sup>①</sup>。马克思抛出这一切，都是解决几个棘手问题的初步尝试，都是想探索一条途径把一些令人头痛的复杂问题说清楚。

284 文章写到这里，马克思已经尽量从各种不同的关系，从几个不同角度对文学和艺术进行了观察。他提到了不同的人物（阿喀琉斯）、作品（《伊里亚特》）和文学体裁（希腊史诗），也探讨了文学领域连同其内在规律和各种关系。但是与此同时，马克思一直通过上文谈到的种种暗喻（从生物学到建筑、从有机体到经济学）使读者注意到文学的更广泛的联系。马克思已经从诗人的角度观察了文学，他手边还掌握有其他什么材料呢？这些材料的形式在多大程度上已预先受到社会或一个社会群的决定呢？哪些材料马克思可以使用？哪些材料不可以使用？由于历史、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在马克思已经掌握的题目、主题和形式中，有哪些将不得不舍弃呢？

但是，马克思呈现给读者的，是另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我们姑且承认某些文学体裁在历史较晚的时期不可能再达到原来那么高的艺术成就，但是为什么早期用这种体裁写出的杰作对于现代人仍然是艺术享受的永不枯竭的源泉呢（在马克思看来显然是这样的）？为什么人们始终把这些作品（至少在某些方面）看作是艺术典范，是无法逾越的完美的范本呢？

马克思现在显然已从诗人看待作品的角度转到读者的角度上来了。他提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现代读者对待荷马作品的态度在某些重要方面有别于荷马同时代人对待这些作品的态度；第二，伟大的文学给予人们一种特殊的艺术享受；第三，有批判

<sup>①</sup> 见《马恩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114页。（原译文为“同……结合在一起。”——译注）



眼光的读者不得不承认有所谓规范和范本，不得不使用马修·阿尔诺德<sup>①</sup>后来称之为“试金石”的艺术准绳。马克思的文章暗含着这样的意思：如果用古希腊的艺术准绳来衡量，现代人写的史诗没有一本能够合格。文章写到这里，马克思又用了人们长期乐于使用的“有机体”的比喻：把世界的不同时期比作人生的不同阶段。如果我们现在还写神话式的史诗，马克思论述说，就不啻成年人再返回到童年时期的行为举止。但是，成年人想这样返老还童固然不对，对儿童的天真烂漫完全失去兴趣也同样不对，因为在儿童的稚气里含有为适应成年的特点免不掉要丧失的一点儿真实。这一点儿真实我们必须在“一层更高的阶梯上”重新捕抓住，再现出来。在任何一个历史时代，儿童们都非常自然地、毫不做作地把这一时代的特性表现出来。席勒在一篇有名的论文——论“天真的”诗和“感伤的”诗中曾提出过这种论点，马克思在这里又把这一论点复活了。但是另一方面，马克思提出这种看法也是出于他个人的体验；许多目光敏锐的观察家都证实，马克思非常喜爱儿童，对儿童很耐心，而且很了解他们的习性。

285

马克思总结说：如果在个人生活中是这样，在作为总体的人类历史又何尝不如此呢？童年时代是一个有其独特价值的阶段；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一个开放得最完美（“开放得最完美”，又是一个花朵的暗喻）的阶段，不该显示出一种永恒的魅力呢？马克思在阐述自己的观点的关键时刻，又一次进行比较和“定位”。如果儿童的脾气和性格彼此不同——有的儿童顽皮任性，有的早熟——古代的不同民族又何尝不是这样呢？马克思认为古代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他们对我们的吸引力的最大的秘密也就在这里。因此，在这种魅力同产生这种魅力的来源之间，并没有什么矛盾。马克思在总结这篇文章时，又使用了“生长”“成熟”等比喻。结

<sup>①</sup> 马修·阿尔诺德(1832—1904)，英国文学批评家、诗人。——译注







这一点，但同时也指出我们同样也认为马克思的答案中的一个极有价值的、非常令人信服的部分（如果没有这一部分，马克思的上述答案就显得不够完整了）：“重要的是，马克思把一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的受时代限制的艺术看为人类的一个要素（a moment of humanity），并认识到正因为这样，这种艺术才能超出历史的瞬间而继续起作用，才能显示出永恒的魅力，即使受时代限制的艺术还是反映出人类的一些永恒不变的特征。”<sup>①</sup> 斐舍尔的著作是用德文写的，“moment”这个名词用的是中性，意思是“事件发展或继续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阶段或转折点”；但是译成英语，除了上述意义外又有了为“瞬间”的意义（这样理解也很有用；而在德文，区别这两种意义则有der Moment与das Moment之分）。

马克思关于希腊艺术的这些论述证实了昂利·勒弗勃夫勒对马克思的评论。勒弗勃夫勒认为马克思习惯于把神话同“虚假意识”区分开；“在马克思看来，”他写道，“希腊神话哺育了希腊艺术的土壤，表现了人们的真实生活，是使这种艺术‘永恒地’显示魅力的永不涸竭的源泉。希腊的一些神话和大神都是人或者也可以说人的威力的象征。它们用扩大的图象显示出人类如何发展自己的个性——人们生活中的各种活动（战争，冶金）、运动、爱情和享乐等等。开天辟地的传说、神话和神话集只有成为宗教的组成部分以后，特别是成为要求解释宇宙万物的伟大宗教的组成部分以后，才形成一种意识形态。这时候这些比喻和传说就从哺育着它们的土壤上被切割开，而它们呈示到人们心目前的魅力也就消失了。”<sup>②</sup> 马克思尽管非常喜爱神话中包含的诗境和真实，但是却并不因此而丝毫减低对宗教的厌恶。他始终认为宗教是无意识的幻景同有

287

<sup>①</sup> 见厄·斐舍尔，《艺术的必要性，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探讨》，安娜·波斯托克译（哈蒙斯窝斯，1963年），第12—13页。

<sup>②</sup> 见勒弗勃夫勒，《马克思的社会学》，第79页。



意的谎言的令人嫌恶的(或至少是彼此无关的)混合物。

但是与此同时,马克思自己却在创建一个体系。这一体系之所以宏伟有力、悲壮动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使人联想到构成欧洲和亚洲的伟大宗教的基础的那种世界末日论的模式(越来越多的宗教哲学家已经承认了这一点)。这一点没有哪个人比米尔其亚·埃里亚德<sup>①</sup>解释得更加清楚了:

“马克思接受并发展了小亚、地中海一带的一个伟大的末世论的神话——正义(或者叫“选民”,“救世主”,“无辜者”,“先驱者”;今天则是无产阶级)终将战胜邪恶,正义的忍受折磨注定将改变世界的最终状态。事实上,马克思宣传的无阶级社会同人类历史上的紧张矛盾的最后消灭都可以在‘黄金时代’的神话中找到先例。许多传统的说法都认为这一时代存在于历史的开端和结尾。”<sup>②</sup>

在马克思晚期著作中不难看到一些回到希伯来先知传统宣教的地方,诸如对正义的要求,对现存社会的严厉批判,善与恶的战斗的幻景,希望我们现在知道的历史过程将绝对终结,等等。

在《大纲》一书的后部,有一段文章企图更确切地说明,究竟是什么使生活在马克思的时代的人们醉心于希腊文学永远捕捉住的那一“人类的要素”:

“所以在古代,尽管处在那样狭隘的民族、宗教、政治境界里,毕竟还是把人看作生产的目的;这种看法就显出比现代世界高明

---

<sup>①</sup> 米尔其亚·埃里亚德,当代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与宗教史教授。——译注

<sup>②</sup> 见米·埃里亚德:《神圣和凡俗。宗教的性质》(纽约,1959年),W·R·特拉斯克译,第206—207页。

得多,因为现代世界总是把生产看成人的目的,又把财富看成生产的目的。其实,所谓财富,倘使剥去资产阶级鄙陋的形式,除去那在普遍的交流里创造出来的普遍个人欲望、才能、娱乐、生产能力等等,还有什么呢?财富不就是充分发展人类支配自然的能力,既要支配普通所说的自然,又要支配人类自身的那种自然么?不就是无限地发掘人类创造的天才,全面地发挥、也就是说发挥人类一切方面的能力,发展到不能拿任何一种旧有尺度去衡量的那种地步么?不就是不在某个特殊方面再生产人,而要生产完整的人么?不就是除去先行的历史发展以外不要任何其它前提,除去以此种发展本身为目的的外不服务于其他任何目的么?不就是不停留在某种既成的现状里面要永久处于变动不息的运动之中么?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以及与其相当的生产时代里,把这种彻底发掘人类内在本质弄成了彻底空虚,把普遍物化弄成了极端麻木不仁,把打破一切固定的片面目的弄到为一种纯粹外在目的而牺牲人类本身的目的。因此,那幼稚的古代世界看起来便象是一种格外崇高的世界。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古代世界也确是人们寻求一切完善形象、形态和圆满境界的所在。那是在狭隘观点以内的一种满足。而现代则叫人永不知足,否则要是谁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觉得称人如意,那必定是个庸夫俗子了。”<sup>①</sup>

由此看来,古代文学能给我们的是结构和形式的完美感,整体感,以及在马克思称之为社会发展的“幼稚”阶段人的力量所能达到的充分发展的感觉。马克思感到在现代社会中,由于技术和经济领域中的发展,人的更大的活动能量已经得到解放;但是它们却主要表现在一些不熟习的形式上,对于通过自己的活动使世界

<sup>①</sup> 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分册,第104—105页。



和他们自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人们说来,这些形式是很陌生的。因此,古代世界能够给人们一副完整和充分发展的图案;对于那些渴求在自己生活中找到这种完整和充分发展的人,对于那些努力创造一个未来的境界、使这种完整能够在更高的水平上体现出来的人,这一图景当然是很有魅力的。

289 《大纲》引证的这一对比再一次显示了马克思的美学观是同歌德时期、同魏玛的古典主义以及德国浪漫主义诗人的美学观点是一脉相传的。马克思把古代文学所特有的那种完美、紧凑的形式同现代社会对更高的完整的令人失望的追逐加以对比,使我们想到席勒把诗歌分为“天真的”与“感伤的”两类<sup>①</sup>,也使我们想到奥·威·施莱格尔认为古典诗歌是“实有的”,而现代文学则彷徨于“回忆”与“预感”之间,两者形成一种对照<sup>②</sup>。但是马克思尽管把古代与现代进行对比,对于那些只赞颂“更充实”的过去而非薄“较为空虚的”现代的人,却极为蔑视。

“在初期的发展阶段上,单个的个人似乎美满些,那正是因为个人尚未造就内容丰富的个人关系,而且因为那种个人关系尚未成为脱离个人而独立的社会力量并与个人自身对立的社会关系。留恋那种原始的圆满,固然可笑;相信必须停留在这样彻底的虚空中,也同样可笑。资产阶级的观点绝不可能超越反对浪漫主义观点的那个对立面,所以浪漫主义观点将作为合理合法的对立面一直陪伴资产阶级升入天堂。”<sup>③</sup>

① 参阅席勒论文《论“天真的”和“感伤的”诗》。

② 参阅施莱格尔,《戏剧艺术与文学演讲录》第一篇。

③ 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人民出版社,第1分册,第100页。

马克思既不同意那种认为进步是一帆风顺、整齐划一、普及于各个方面的幼稚的看法，也反对颂古非今的观点。他在《大纲》中预见到这样一个未来，这种未来能把生产借助于现代生产方式而达到的丰满充实与历史早期的简单纯朴的世界的和谐融睦结合为一。

马克思这里仍然没有离开从圣经开始、经过席勒而传递下来的“一千年至福”说的老传统。马克思问道，人不是“一直努力想在更高的水平上重新创造自己的真实存在么”<sup>①</sup>？艺术并不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就停止前进了。在《大纲》一书中预见的未来社会中，将出现一种能体现新的真实的新艺术。在这个社会里是，人剥削人（特别是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的现象不复存在了，机器也将把繁重的劳动减低到最小程度。马克思宣称，这种减低劳动数量的必然结果将是：“由于社会所有成员都有可资利用的闲暇与手段，所以都能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深造。”<sup>②</sup>劳动时间的节省，马克思接着说，并不意味着享乐的减少，而意味着力量、生产力，因而也意味着享受乐趣的能力与手段的增长。<sup>③</sup>

290

读了上面的这一段话，我们该已经注意到，马克思这时又回到了本章早一些时候已经探讨过的《导言》中一个突出的论题：艺术品不只被动地供人享受，而且也在发展（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创造）人们用以鉴赏艺术的能力。

“钢琴演奏家生产了音乐、满足了我们的听觉的感受，在某种意义上说不也是在发展着我们的这种感受能力吗？”

钢琴演奏家刺激了生产，一方面是由于能使我们成为更其精神旺盛、生气勃勃的人，一方面也是由于（人们一般总是这样认为）

① 见米·里弗希兹：《卡尔·马克思的艺术哲学》，第110—111页。

②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德文版，第593页。

③ 同上书，第599页。



唤醒了人们的一种新的欲望,为了满足这种欲望,需要在物质生产上投入更大的努力。”<sup>①</sup>

这样,物质生产一方面能提高生活的质,另一方面又能增加供消费用的物品的量。与此同时,艺术家也可以让他的同胞知道,该如何创造性地利用他们的空闲时间,这在未来的生产自动化的社会里是很需要学习的一课。马克思论证说,即使在很不能令人满意的十九世纪中,只把工作看作为一种苦工,这种看法也是偏狭的。工作如果是由沉重难忍的经济力量、由不公正地窃取了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资本拥有者强加在不情愿的劳动者身上,那它确是一种负担。但是自由选择的工作却是人们改变世界同时也是培养、创造自身的一个途径,是最可靠的自我体现的手段。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同傅立叶的看法不一样,后者认为自由选中的工作是轻松愉快的享受,而马克思则愤慨地宣称,想象中的那种非异化的劳动“丝毫也不意味着只是一种游戏,只是象傅立叶从女店员的眼睛里天真地见到的那种寻欢取乐。真正自由的工作,即以作曲为例,既是非常严肃的,也需要极大的努力。”<sup>②</sup>因此艺术家是可以给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全人类讲清楚一个重要的道理的。

《大纲》关于艺术的一些论述同这本书的主要内容——现代社会的劳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第三本笔记里有一段关键性的文章对这个问题说得极为明确:

291

“这种经济关系,即资本家与劳动者作为生产关系上的两极所具有的特征,随着劳动越来越失去它的一切的艺术性质,它就发展得越纯粹,越完善;劳动的特殊技巧日益成为一种抽象的、无足轻

<sup>①</sup>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德文版,第212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505页。

重的东西,劳动日益成为纯粹抽象的活动,即纯粹机械的、因而是漠不关心的、对它的特殊形态满不在乎的活动;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活动,或者也不妨说是一种有形的活动,形式如何是无所谓的。”<sup>①</sup>(重点系本书作者所加)

用重点标出的一句话明确表示出:马克思认为现代雇佣劳动的特征就是艺术属性的丧失,并认为艺术性的创造是其他一切劳动都热烈向望的一种劳动;只有在这种劳动中个人才能体现和发展他的一切潜力。

但是,从这一立论出发需要讨论的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该使用什么语言才能让外行们理解呢?如果是“舞文弄墨”的人,倒也不难,因为他们一贯“信口雌黄”;这些人专门从事文字游戏而不尊重事实,“把各种科学满满涂上一层乌七八糟的蜜糖”<sup>②</sup>而自鸣得意。特别象亚当·弥勒<sup>③</sup>这样浪漫主义的理论家,把“滞呆资金”(dead capital)这类隐喻的说法附会出极为神秘的含义,使本来已经复杂的东西更趋混乱。但是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在讨论文化问题时,自己也不得不经常借用隐喻和比拟的表现法,必须通过注释和解说才读得懂。因此,难怪马克思在《大纲》中特别化费一部分精力探讨比拟的运用与界限:

“把货币比拟为血液,——虽然流通一词为此提供了机缘——其不伦不类,和迈奈尼乌斯·阿古利巴把贵族比作胃,不相上下。

---

<sup>①</sup>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人民出版社,第2分册,第70—71页。另参阅A·桑谢一瓦谢:《艺术和社会。马克思美学评论》(伦敦,1974),第205页。

<sup>②</sup>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德文版,第201页。

<sup>③</sup> 亚当·亨利希·弥勒(1779—1829),德国政论家和经济学家,德国经济学中反映封建贵族利益的所谓浪漫派的代表人物,亚·斯密的经济学说的反对者。——译注



把货币比作语言,也是同样错误的。概念并未因为转化为语言,就丧失概念的特性;概念的社会性质和概念本身并存于语言之中,正象价格与商品并存一样。概念不能脱离语言而存在。倒是为着流通、为着交换而从其本国语言开始翻译为外国语言的概念,显示较多类似之处;但这类似之处,不是来自语言本身,而是来自语言的异国性。”<sup>①</sup>

这段文章提到了莎士比亚在《科里奥兰纳斯》中使用的一个脍炙人口的比拟——把罗马行政长官比作胃,但这并不是奚落迈奈尼乌斯·阿古利巴的看法。<sup>②</sup>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即使对莎士比亚这样一个大作家,马克思认为必要时也可以表示不同的意见。当然,这只是行文中间接提到的例子,并不是对莎士比亚直接提出的批评。威廉·科贝特的情况也相同;马克思认为他对货币的性质比拟得不伦不类,尽管他提出的问题是正确的,但没有给予正确的回答。

在撰写《大纲》时,马克思有时无法从别的来源找到经济学上的一些史实和有关的意见,便求助于一些大诗人的作品。这种方法马克思在过去写别篇文章时倒也偶然用过。我们在这里看到,他从荷马、亥西欧德、和卢克莱修等人的作品里寻找到古代社会中有关商业和经济的信仰、活动、条件的种种实例<sup>③</sup>。但在更多的情况下马克思引证文学著作是为了证实自己首先形成的独立见解。

①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人民出版社,第1分册,第100页。(迈奈尼乌斯·阿古利巴是罗马贵族,公元前503年任罗马执政官,死于公元前493年。——译注)

② 见莎士比亚:《科里奥兰纳斯》第1幕第1场。A·O·勒夫乔埃在《一连串的存在》以及E·M·W·蒂尔耶德在《伊利莎白时代的图景》中都曾以较长的篇幅描述人体和政体之间的比拟。

③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德文版,第98和679页。

至少在读到货币的性质和威力时，马克思的某些论点便从品得、阿里斯托芬、《启示录》的作者以及莎士比亚的《雅典的泰门》中得到佐证。<sup>①</sup>象马克思的所有文章一样，《大纲》一书的语言也充满了一些大作家的语汇——从歌德在《艾格蒙特》中用过的“生存的舒适习惯”直到从卡莱尔那里搬用来的“现金交易关系”<sup>②</sup>。马克思还利用了过去伟大作家创造的一些人物形象，一方面为的是生动地阐明自己的论点，另一方面也借此暗示自己对争论的问题所持的态度。（马克思既然警告过别人不该使用不恰当的比拟，这倒好象是在做示范——如果比拟得体，不需多费笔墨就可以把论点阐明。）例如在谈到抗阻历史的力量是徒劳无益的尝试时，马克思就用了堂吉诃德的形象。<sup>③</sup>但是堂吉诃德另一次出现却是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段文章里：

“当经济学者们讨论资本与雇佣劳动、利润与工资的现存的关系时；当他们向工人证明，他无权要求享有一部分侥幸获取的利润时；当他们试图说服工人应该安于资本家手下的从属地位时——，他们都强调说，工人与资本家不同，工资有一定的稳定性，可以多少免受资本的大风险。堂吉诃德就是这样劝慰桑丘—潘沙的：挨别人的棍棒是桑丘的份儿，他没有必要显示勇敢。”<sup>④</sup>

293

这里，文学比拟被用来嘲讽荒谬的论点，揭露了或是由于认识谬误、或是有意欺骗而使用的诡辩术。

---

①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德文版，第817，895页。

② 同上书，第38，874页。

③ 同上书，第77页。

④ 同上书，第851页。



(2)

1858年8月,马克思着手准备出版他搜集起来并在《大纲》中剖析过的部分材料。论述货币与商品的几章是在1859年1月整理好,交付到出版商弗朗茨·顿克尔手里的。顿克尔于同年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书名出版。但马克思给《大纲》写的《导言》并没有印在这本书里,也没有包括在马克思生时出版的任何一本书中。“我把已经起草好的一篇总的导言压下了,”他解释道,“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sup>①</sup>马克思用一篇序言代替了导言。在这篇序言中他简单地叙述了自己研究的过程,提到法学、哲学、历史、经济等方面,但是并未谈到对文学和美学的研究。马克思有意回避这一问题,也许是一种策略,因为有不少经济学者不是从经济理论和统计资料中、而是从纯文学作品中援引了大量的例证,而马克思是不愿意读者把他同这样的经济学家混为一谈的。他接着在文章里谈到对黑格尔的法哲学的批判,他清楚地看到这一批判是他思想发展的一条分界线:

294 “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他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

<sup>①</sup>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7页。

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他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sup>①</sup>

这一段著名的文章详细阐述了他和恩格斯早一些时候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观点:“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sup>②</sup>但是在《序言》里,马克思特

295

<sup>①</sup>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8—9页。

<sup>②</sup> 见《马恩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270页。



别提到**艺术**，与法律、政治、宗教和哲学并列，此外他还用了一个有重要意义的暗喻：“上层建筑”竖立其上的物质“基础”。我们很可能感到，这个比喻并不完全恰当，因为它给我们一个静止的概念，而它要表现的却是不断变化、不断发展的现象。马克思又使用另一个比喻部分地修正了前一个；这次他用的是“变革”（umwälzen），德文原义带有“翻转”“滚动”的意思。同时，马克思还试图表示经济—社会“变革”并不一定立即引起在《导言》中细致分析过的文学艺术的变化：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sup>①</sup>（着重号系本书作者所加）

雷蒙德·威廉斯<sup>②</sup>在《文化和社会（1780—1950）》一书中特别指出这句话中“或慢或快”几个字非常重要，这是很有道理的：

“即使我们接受结构和上层建筑这一公式，我们还要想到马克思所说的，后者的变化需要用不同的比较地不精确的考察方式。马克思的文章里使用的一个状语强调了这一点……上层建筑是属于人类意识的问题，因此必然极为复杂，这不只因为它纷繁多样，而且还因为它总是历史性的。无论在什么时代，上层建筑都牵涉到与过去的连续性和对当前的反动……如果……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只是理性化，那么从整体来看，其复杂性就更加大了。”<sup>③</sup>

① 见《马恩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83页。

② 雷蒙德·威廉斯（1921—），英国剑桥大学文学系教授，著有《从易卜生到布莱希特的戏剧》（1954）、《文化和社会（1780—1950）》（1958）和《现代悲剧》（1966）等书。  
——译注

③ 见《文化和社会》第2版（哈蒙斯窝斯，1961年），第259页。雷蒙德·威廉斯对这一问题更详尽的阐述，见《马克思文化理论中的“基础与上层建筑”》一文（《新左翼评论》，第82期，1973年11—12月号，第3—16页）。

马克思在搁置下未发表的《导言》里试用过的各种各样的有机体的比喻人们早已非常熟悉了，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直到歌德的许多研究欧洲文化理论的著述中都有先例可寻。但是我们发现这些比喻后来在二十世纪的德国有时也滥用成灾。马克思想用别的词汇代替“基础”和“上层建筑”时，可能也已考虑到这一点。但是我很怀疑换用的新比喻在文学批评中是否已证明象旧有的那样有助于说明问题。如果我们研究一下从马克思逝世以后这些比喻的使用历史，也许会看出实在弊多利少。从其他一些方面看，正象约翰·普拉麦纳兹已透彻地剖析过的那样<sup>①</sup>，马克思在1859年序言中的说法不尽完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这种比喻不能表示出两者的“相互作用”。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述得很清楚，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又一再强调过。厄恩斯特·斐舍尔曾从恩格斯晚年给约瑟夫·布洛赫<sup>②</sup>同汉斯·施塔尔根堡<sup>③</sup>的信件里摘引了有关的章节：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

① 见约·普拉麦纳兹《人和社会。对从马基雅弗利到马克思的一些重要社会和政治理论的批判研究》（伦敦，1963），第2卷，自第325页起。

② 约瑟夫·布洛赫（1871—1936），柏林大学学生，后为新闻记者，出版者，《社会主义月刊》编辑。

③ 恩格斯这封信的受信人，现在确证是瓦·博尔吉乌斯，不是汉斯·施塔尔根堡。瓦·博尔吉乌斯是一个德国大学生。——译注



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律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

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sup>①</sup>

297 第二段引文中的几个混合的暗喻：“发展”对“基础”“起反作用”，可以证实《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最初用的比喻不尽完善。在序言里我们没有看到恩格斯这里所作的一些修改。相反地，在德文原著里我们看到的是马克思的那种引人入胜的雄辩，他对这个问题滔滔不绝地进行议论，直到他自己和读者都相信经济确实决定一切为止。马克思首先用的词是“适合”（或“适应”）：

“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sup>②</sup>

“……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sup>③</sup>

① 见斐舍尔著《艺术的必要性》第128页引文。（这里所引的恩格斯的话，第一段是1890年9月21日恩格斯致约·布洛赫的信，载《马恩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477页，第二段则为1894年1月25日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见同上书第506页。——译注）

② 见《马恩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82页。（着重体系本书作者所加）

③ 同上。

接着用的是“制约”：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sup>①</sup>

最后在一个最有名的句子里(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句话完全相同。)使用了“决定”一词：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sup>②</sup>

在《序言》中，最后这句毫无调和余地的论断并没有任何补充说明，象恩格斯给施塔尔根堡或弗兰茨·梅林的信中谈到的那种还可能存在着相互作用的解释。恩格斯在给梅林的信里面着手澄清“由于把原因和结果刻板地、非辩证地看做永恒对立的两极”<sup>③</sup>而产生的种种误解。他在这封信里提出的看法是：马克思所以一点也没有提基础与上层建筑间还可能存在着“相互作用”，是出于一种策略：

“我们最初是把重点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律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而**当时是应当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sup>④</sup>

298

① 见《马恩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82页。（着重体系本书作者所加）

② 同上。

③ 《马恩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502页。

④ 同上书，第500页。



以黑格尔为发展最高峰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传统总是把“精神”和“思维”看作基础，看作是最后的现实。在这一传统面前，马克思很可能感到必须多多强调一下生产方式的“制约”力量和人们的社会存在的“决定”力量。<sup>①</sup>

马克思从来也没有抛弃他的“基础—上层建筑”模式。相反地，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还为其进行辩护，驳斥了别人对这一模式的批评。但是在他以后谈到文学和艺术时却从来没有再用过“上层建筑”这个词。<sup>②</sup> 虽然如此，这个术语对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从报刊杂志的一般撰稿人到这些人中头脑最机敏的瓦尔特·本杰明<sup>③</sup>，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本杰明很喜欢，也善于把五花八门的事物强行归纳分类；在这方面他经常和研究犹太教法典

---

① “马克思自己对阶级，特别是革命阶级在政治上的作用的论述，就说明人们经常引用的‘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句名言是不够全面的。思想意识对社会存在，对最重要的社会关系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如果不是这样，马克思所坚信的阶级斗争和阶级革命就没有意义了。如果阶级意识真的只反映了阶级利益而不是同时也强有力地影响着它，马克思在世界历史上就远远不会是象现在这样一位重要的人物了。”（见前引普拉麦纳兹同书第2卷，第350页）。

②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99页。在马克思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文章中，“上层建筑”一词主要与国家形式、与政治机构等结合起来（同上书，第12卷，第450页和628页）。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曾抨击一种观点说：“物质生产领域中的对立，使得由各个意识形态阶层构成的上层建筑成为必要，这些阶层的活动不管是好是坏，因为是必要的，所以总是好的”（见同上书，中文版，第26卷第1分册，第298页）。在1862年7月《新闻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马克思写道：“我们经常看到社会基础不动而夺取到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不断更迭的情形。”（见同上书，中文版，第15卷，第545页）。在马克思后来的文章同札记中，“上层建筑”一词用于法律体系、社会和政治观点以及“凌驾于已建立的、起主导作用的生产方式之上的新的经济的、商业的、工业的和经济的方法。”（见同上书，中文版，第16卷，第414页，第17卷，第355、650、597页，第34卷，第347—348页）。另参见艾尔肯布莱希特著《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语言学理论》（克隆贝尔格，1973），第66—69页。

③ 瓦尔特·本杰明（1892—1940），德籍犹太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参加进步文艺运动，1933年逃至巴黎，法国沦陷后被纳粹逮捕，自杀而死。著有《启蒙》、《了解布莱希特》与《波特莱尔：资本主义全盛时期的抒情诗人》等著作。——译注



的学者竞赛,这些学者(据本杰明说)可以在他们的圣典的每一段落中寻出四十九重意义来。对本杰明说来,马克思发明“上层建筑”这个词实在是对自己的机敏和喜好的挑战。

鉴于这个概念经常引起误解,这里还需要弄清楚一个问题。马克思从来没有想到,在他努力探索人们的经济生活同艺术成就的关系时,会使人感到自己在贬低艺术成就。恰恰相反,马克思坚信他自己的“人”的概念比他同时代的时髦的资产阶级历史学者心目中的“人”更为高贵。他认为自己的作品所表现的关于人的努力、成就和潜力等观点远比列奥波特·冯·兰克<sup>①</sup>之流所表现的更符合人的尊严。在1864年9月7日给恩格斯的一封信里,马克思愤怒地谴责“手舞足蹈的矮子兰克认为收集趣闻轶事和把一切重大事件归为琐碎小事是属于‘精神’的事情”。<sup>②</sup>

在本书293—294页所引证《序言》的一段文章中,只有一次提到艺术。马克思把它和具有“精确性”的自然科学区别开,同法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统称为“意识形态”的形式,认为正是在这一形式中人们“意识到”受经济制约的社会冲突并力图“克服”这种冲突。这句话似乎包括三个涵义:(1)借助艺术表达的见解与从科学中推究出来的性质不同,而且或许(如果我们还记得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把“思想意识”与“不真实的意识”<sup>③</sup>连系起来的例子)更

① 列奥波特·兰克(1795—1886),德国的反动的历史学家,普鲁士容克地主的思想家。——译注

②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423页。(“‘精神’的事情”根据上下文译为“历史的精神”似更恰当。——译注)

③ 普拉麦纳兹(同书,第2卷,第323—324页)辨别“思想意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有三个意思,这对我们也许很有用。(1)人们用以描写世界以及表现自己的感情和目的整个思维体系;(2)所有不属于科学范围的理论 and 学说以及所有规范性的观念;(3)为某一阶级或人群的利益服务的规范性的观念。——如果再把“文学结构”加在“思维”和“规范性的观念”之后,这些解释在阅读这篇文章时不无补益。



容易被歪曲；(2)艺术并不是一个自治的领域——更确切地说，它是人们借以意识或表现社会—经济的世界中的各种冲突和变化过程的许多手段之一；(3)艺术是进行战斗和决斗的一个战场，这或许意味着艺术反映、维护和证实阶级利益与阶级地位。我们可以再一次肯定地说，尽管马克思好象认为艺术就是思想意识，但决没有轻视或贬低艺术的想法。只不过同这篇序言中许多引起争议的问题一样，这一个公式也很容易被误解和滥用罢了。

也许我们已经注意到，《序言》中几乎没有谈到适用于艺术的研究方法。马克思要谈的事很多，根本没有顾到这一问题。但是，300 《序言》却提出应该区别“生产的经济条件”中的变化（马克思认为这是可以用自然科学所特有的准确性进行研究的）与思想意识的形式（我们已经看到，艺术也包括在内）。马克思告诉我们说，在评论艺术时，我们必须慎重，不应轻信艺术家本人和他的同时代人对于艺术作品的企图和成就所作的解释。首先应该考虑的是经济的和社会的因素，这些因素作者和他们的最早的读者不一定明确意识到，但是却渗入到他们创造的和吸收的文艺作品中去。

此外，还需要提出一个条件：

“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形态而告终。”<sup>①</sup> 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摘引的这段话再一次告诉

---

<sup>①</sup> 见《马恩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83页。

我们，马克思早年阅读黑格尔作品如何有力地继续影响着他对历史发展阶段的见解。与本文有关的重要的一点是，这种历史观对于其文化从属的“基础—上层建筑”模式究竟有什么关系？是否这样一个模式只在社会主义黄金时代到来以前的史前时期才适用呢？是否在马克思所企盼的社会里这类模式也同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一样将要陈腐过时呢？对于这一问题，也正如对序言提出许多别的问题一样，无论序言或序言后边的正文都没有给予清晰的解答。

序言虽然把艺术归到思想意识的上层建筑里，却没有特别提到文学；但是，马克思最后引用了但丁《神曲》的诗句作为结束，倒是一件意味深长的事：

301

“我以上简短地叙述了自己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经过，这只是证明，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论，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却是多年诚实探讨的结果。但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象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sup>①</sup>

但丁虽然同马克思一样，也饱尝过流放的滋味，但是这两人的社会经历和世界观却相差十万八千里；马克思在**这样一位中世纪诗人的作品中**寻找到表达自己的不妥协态度的最适宜的词句，这不能

---

<sup>①</sup>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1页。在这段诗文中如把“ogni sospetto”译为“一切不信任”则不很恰当，因为“不信任”是马克思面对其他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著作的惯常态度，所以我采用约翰·希亚尔迪在《地狱篇。为现代读者翻译的诗文》（纽约，1954年）第42页上的建议，把它译为“一切犹豫”（“all division of spirit”）。



不说是马克思的独特风格。

(3)

《政治经济学批判》继《大纲》之后继续在文学作品中寻找能说明经济条件、社会态度和人类信仰的各种例证。《大纲》引证的是荷马、亥西欧德、索福克勒斯、阿里斯托芬和卢克莱修等人的作品，而在《批判》中则出现了欧里庇得斯、维吉尔和贺雷西等人的名句。在一个富有特色的脚注中，一开始就引证了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sup>①</sup>的一段文章。与之并列的是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一段话，结尾是对希腊悲剧诗人，特别是欧里庇得斯使用的两个词——公正和贪欲的评论<sup>②</sup>。引证贺雷西的一段文章对我们特别有启发：

“贺雷西的下面这几句诗表明他完全不懂货币贮藏的哲学（讽刺诗第二卷第三首）：

‘买来弦琴置一旁，不爱音乐不弹唱，  
不作鞋匠买刀剪，不去航海买帆桨；  
世间若有这等人，谁不说他是疯狂。  
今有人焉攫黄金，黄金到手即埋藏，  
平生不敢动铢两，试问此人狂不狂？’

---

① 色诺芬(约公元前430—354)，古希腊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自然经济的维护者。——译注

②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27页。

西尼尔先生却比较了解……”<sup>①</sup>

读者也应该知道，贺雷西不可能有纳骚·西尼尔<sup>②</sup>或安·卡·施托尔希<sup>③</sup>那种社会经验（马克思还继续引证了施托尔希的一些有关经济积累的分析），但是对一些荒唐可笑的经济行为他比后来的这些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却看得更加透彻。通过马克思嘲讽的文笔，贺雷西的一段诗不只使我们了解到古代人的某些行为态度，而且也使我们知道该如何矫正当代人的荒唐乖僻的行径。

普雷斯科特<sup>④</sup>在《墨西哥征服史》中引过昂吉埃腊（殉道者彼得）<sup>⑤</sup>的著作《新大陆》（1530）中的一句话；这句话也被马克思用来说明同一问题。<sup>⑥</sup>

马克思在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继续探索如何运用文学比附手段。比如说，马克思深感把亚当·斯密庸俗化了的一些经济学者的著作枯燥乏味；此外，这些所谓的学者虽然名噪一时，但是若以他们的思想深度论，却实在徒有虚名。该如何把这两种感觉同时传达给有文化修养的读者呢？能不能借用文学史上的例子，既简洁又深刻地完成这一任务呢？马克思是这样说的：

---

①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23页。

② 纳骚·威廉·西尼尔（1790—1864），英国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人，他反对缩短工作日。——译注

③ 安得列依·卡尔洛维奇（亨利希）·施托尔希（1766—1853），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和历史学家，彼得堡科学院院士，古典经济学派的模仿者。——译注

④ 威廉·希克林·普莱斯科特（1796—1859），美国历史学家。——译注

⑤ 昂吉埃腊，殉道者彼得（1457—1526），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生于意大利，长期在西班牙宫廷服务。——译注

⑥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44页。（马克思转引自《墨西哥征服史》的昂吉埃腊的话是“哦，有福的货币，既供给人类以甜美滋养的饮料，又不会使它的无事的所有者染上可怕的贪婪病，因为它既不能埋藏，也难于长期保存。”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44页及第706页注释32。——译注）



“亚当·斯密学说的庸俗化者、乏味的让·巴·萨伊<sup>①</sup>——法国人称他为 prince de la science〔科学王子〕,正如约翰·克里斯托夫·哥特谢德把他的雪恩奈希<sup>②</sup>奉为荷马和彼埃特罗·阿雷蒂诺<sup>③</sup>把自己称作〈terror principum〉〔“王公的恐怖”〕和〈lux mundi〉〔“世界之光”〕一样,……”<sup>④</sup>

到了十九世纪,雪恩奈希早已被人忘在脑后,阿雷蒂诺的名望也已一落千丈,尽管前者在当代人中曾经享有盛名,后者则自负非凡。通过马克思这一比较,让·巴·萨伊的著作的命运如何,读者不难猜到,而萨伊本人在时间和批评的夹击下,必将声名扫地,自然也是意料中的事了。

过去大作家创造的人物,马克思用三种不同的方法引进《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来。第一种是直接了当地介绍进来。例如,在谈到某些不懂得亚当·斯密的理论的人对经济问题的看法时,马克思举了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中主人公的父亲作为代表人物:

“普希金在他的一首叙事诗中,说他的作品的主人公的父亲怎样也不懂得商品就是货币。但是,俄罗斯人早就懂得货币就是商品……”<sup>⑤</sup>

---

① 让·巴蒂斯特·萨伊(1767—1832),法国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译注

② 克利斯托夫·奥托·雪恩奈希(1725—1807),德国诗人,叙事诗《海尔曼》的作者。——译注

③ 彼埃特罗·阿雷蒂诺(1492—1556),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讽刺作家,著有许多尖锐地揭露教皇宫廷和欧洲各国君主的抨击性小册子。——译注

④ 见《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58页。

⑤ 同上书,第167—168页。

## 第二种方法比较曲折：

“卖者和买者变成了债权人和债务人。如果先前作为货币贮藏者的商品所有者曾经扮演了可笑的角色，那么现在他却变成了可怕的人物，因为现在他不是把自己而是把他的邻人看成一定货币额的存在，他不是把自己而是把他的邻人变成为交换价值的殉道者。他从信徒变成了债主，他从宗教走进了法律。

«I stay here on my bond!»

〔‘我照契约行事’〕<sup>①</sup>

通过《威尼斯商人》中的这句话，马克思把夏洛克召唤来，不只作为失去人性的经济行为的象征，而且还作为例证来说明，一旦利欲熏心，一个人不只变得可笑，而且还变得多么可怕。马克思的这一引证也部分地（虽然只能说是很小的部分）帮助我们认识莎士比亚的艺术成就和他的可能的创作意图。至于我们所熟悉的马克思特有的另一种笔法——“反意”比拟，在这部著作里则有夏米索的著名中篇小说《彼得·施莱米尔》的例子：

“因此，表面上看来，价值符号直接代表商品的价值，它不表现为金的符号，而表现为在价格上只表示出来、在商品中才实际存在的交换价值的符号。但是，这个表面现象是错误的。价值符号直接地只是价格的符号，因而是金的符号，它间接地才是商品价值的符号。金不是象彼得·施莱米尔那样出卖自己的影子，而是用自己的影子购买。”<sup>②</sup>

<sup>①</sup>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30—131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105—106页。



在夏米索的故事里，彼得·施莱米尔为了金钱出卖自己的影子，但是不肯出卖他的不朽的灵魂。马克思在这里故意颠倒过来，让我们看到金子是某种没有灵魂的东西，它用自己的“影子”（作为价值符号的货币）去购买人们制造的或收获的东西。看了这段文章，我们不禁会问，夏米索写的浪漫主义的故事和马克思用于说明经济学问题的变体，究竟哪一个更阴森可怖，更富于魔鬼气息呢？就这样，马克思找到了一个极为有效的方法来表达他感到异化、颠倒、背离人性的现象。我们不妨称这个方法为“转换文学”（meta-literature），就是说，把过去的作家创造的人物和情节加以变换、颠倒，用来表现原来的作家从未想到可能表现的事物。

当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没有直接谈论美学价值的地方；它阐述的是商品与货币，书中偶有对文艺的评论，马克思总是有意使他的文笔既有趣又别致：

“因此，一卷《普罗佩尔蒂乌斯歌集》和八盎司鼻烟可以是同一交换价值，虽然烟草和哀歌的使用价值大不相同。……一座宫殿的交换价值可以用一定数量的鞋油表示。反过来，伦敦的鞋油厂主们曾用几座宫殿来表示他们的大批鞋油的交换价值。”<sup>①</sup>

读了这段文章，任何一个读者都不禁要思忖一下自己对普罗佩尔蒂乌斯同鼻烟这两种迥然不同的事物的不同态度，因而也会感到，纯粹以数量衡量事物是何等荒谬、何等不近人情的办法。文学艺术的世界就含蓄地批判了我们这个只有交换价值（特别是货币价

<sup>①</sup>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6—17页。（塞克斯都·普罗佩尔蒂乌斯（公元前约49—约15年），罗马抒情诗人。——译注）

值)才算价值的世界。

在这里，我们不该忘记米哈依·里弗希兹的精辟的见解。他用很多事例表明，马克思在经济学著作使用的术语和范畴实际上都带有美学性质。泰瑞·伊格尔顿说得很对：“艺术问题决非个人兴趣和生活装饰的问题……在马克思对社会生产、劳动分工和作为商品的产物的理解中，艺术尽管是附属的，但却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因素；在拜物教、审美和概括思维等观念的发展中，都可以追溯到艺术的影响。”<sup>①</sup>因此，我们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发现马克思对美感和艺术品“使用价值”的起源有一段罕见的论述，也就不必奇怪了。马克思阐述了在1844年《巴黎手稿》中已经思考过的一个问题，即不同的人对于宝石的不同态度，有的人把它当做商品而买卖，有的人则把它当做满足美感的装饰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本书里，马克思重又提到这个问题：

305

“一般金属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重大意义是同它们当作生产工具的作用联系在一起。撇开金银很稀少不谈，仅就它们比铁甚至比铜(指古人所用的硬铜)软而论，这已经使它们不适于这种用途，因此，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它们丧失了一般金属的使用价值所依以存在的那种属性。它们不仅在直接生产过程中没有什么用处，而且作为生活资料，作为消费对象，它们同样不是必需的。因此，不论把多少金银投入社会流通过程，也不致对直接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发生不利的影晌。它们本身的使用价值并不与它们的经济

---

<sup>①</sup> 见米·里弗希兹著《卡尔·马克思的艺术哲学》(伦敦，1973年版)，第8页，泰瑞·伊格尔顿序。



职能发生冲突。另一方面，金银不只是消极意义上的剩余的、即没有也可以过得去的东西，而且它们的美学属性使它们成为满足奢侈、装饰、华丽、炫耀等需要的天然材料，总之，成为剩余和财富的积极形式。它们可以说表现为从地下世界发掘出来的天然的光芒，银反射出一切光线的自然的混合，金则专门反射出最强的色彩——红色。而色彩的感觉是一般美感中最大众化的形式。雅科布·格林曾经指出过印度日耳曼语系的各种语言中的贵金属名称与色彩的相互关系的词源联系（见他的《德意志语言史》）<sup>①</sup>。

306 如果我们还记得马克思多次对施蒂纳、蒲鲁东等人在作品中玩弄词源的花招表示反对，特别是反对这些人只根据真实的或假想的词源关系便把不同的事物等同看待<sup>②</sup>，现在马克思自己也谈到印度日耳曼语系的几种语言中各种贵金属名称的词源，就更使他的这段文章特别增加了分量。通过这段文章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后期的经济著作，也正如同早期的显明带有“人文”色彩的作品中一样。马克思不断地显示出他的深邃和广博，包括他对美学、文学和语言学的极大兴趣。从艺术的错综复杂性、从马克思自己的精湛的见解看，他使用的范例和隐喻并不一定永远都很恰当，但是他这样做显然基于一个愿望——希望在把世界推向一个人人都有权享受丰富的艺术生活的新社会的同时，能叫整个人类互相接近。

---

①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44—145页。

② 参阅艾尔肯布莱希特著《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语言学理论》，自第50页起。

## 第十二章

307

### 《资本论》

“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sup>①</sup>

马克思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的经常工作在1862年以后告一结束。虽然他从来没有完全摆脱过经济困难，虽然他在个人经济问题上所碰到的危机仍象欧洲经济问题所碰到的危机一样多，但是在1860年，由于得到了几笔数目不大的遗产，而且恩格斯又慷慨地增加了对他的支援，他的经济情况便有了好转，使他感到可以完全专心致志地从事经济学的研究，一直到他再一次被吸引到实际政治中去为止。国际工人协会于1864年成立；马克思担任了它的中央委员会委员，起草了它的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指导了它的工作，一直到1872年，为了防止进一步发生内部冲突，他采取了一个策略步骤，把它的总部迁到了纽约。他经常参加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对于国际工人运动所受到的、他认为是有害的影响，不断地进行了斗争，这耗费了他很大一部分精力和时间，虽然他重新参加实际政治的经验促使他作出更大的努力，来完成他的关于经济理

<sup>①</sup>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926页。（此处原书所引英译文译成中文为：“自由王国只有在生活的必需和世俗的因素所规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真正开始；因此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实际物质生产范围之外。”——译注）



论的基本著作。大卫·麦克莱兰对于这项工作的进展情况，作了一个很好的简单介绍：

308 “在写作《大纲》的时候，马克思原来想把他的《经济学》分为六卷，第一卷题为《资本论》。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该卷的第一分册，还缺关于‘资本一般’的一节没有完成。马克思写作这一节的工作，在1860年由于同卡尔·福格特的争吵而中断，当马克思在1861—1863年开始继续写作这一节时，他象往常一样发现，他所写出来的手稿太长（约三千印张），无法出版。这部手稿的大部分是历史材料，探讨过去的价值理论；它最后由考茨基在1905年以《剩余价值理论》为题出版，作为《资本论》的第四卷。从1863年起，马克思就直接写作最后终于出版了的那三卷《资本论》。第三卷主要是在1863年到1865年之间写作的，因此是在第一卷的最后定稿之前。至于第二卷的手稿，马克思是在第一卷最后定稿前后写作的。因此，虽然第一卷已经完成，原定还要相继出第二卷和第三卷，这两卷不论从形式或内容来说仍旧是不完整的；而且在这三卷出齐以后还要陆续出其他几卷。

马克思生前能够完成的这一巨著的唯一部分是《资本论》的第一卷。”<sup>①</sup>

因此，很清楚，后来由恩格斯和考茨基编成《资本论》第二、三卷和《剩余价值理论》的那些材料，有很多写在马克思的1867年作

---

<sup>①</sup> 大卫·麦克莱兰：《卡尔·马克思的思想》，第84—85页；另参阅同一作者的《卡尔·马克思。他的生平和思想》（伦敦，1973年），第422页：“因此，《资本论》第3卷手稿实际上仍处于1864—1865年以来所处的状态。马克思在1870年几乎改写了第2卷的一半，但以后只作了一些次要的增补和修正——因为，正如他临死前不久对爱琳娜所说的，他认识到究竟怎么‘利用它’要看恩格斯了。”

为《资本论》第一卷亲自付印出版的材料之前，虽然他在临死之前还一直在继续写作这些还没有出版的材料。因此，本章先要简略地谈一谈《资本论》第二、三卷和《剩余价值理论》，然后再来考察马克思生前出版了两次德文版和一次法文版、后来成了世界历史上影响最为重大的著作之一的《资本论》第一卷中，文学所起的作用。

### (1)

《资本论》第三卷重新提出了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已经提出过的一个比较委婉的警告：“我们且不谈完全属于艺术领域的作品，因为按事物的性质来说，这不属于我们讨论的范围。”<sup>①</sup>因此，从表面上来看，马克思的这些著作只是在文学和艺术直接接触及经济问题，或者作为商品进入经济领域的时候，才讨论到文学和艺术。原定的《资本论》第一卷第六章，马克思最后没有收在他生前出版的那一卷书中，这一章谈到了文学和其他艺术是一种“非物质生产”，不过还是生产商品，因此构成一种“过渡形式”：

309

“生产的结果是商品，这种商品脱离生产者而存在，因而可以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一段时间内作为商品来流通，如书籍、绘画以及一切有别于艺术家本身活动的艺术作品。这种人凡是没有工匠作为助手(如雕塑家等)的，或独立工作的，他们一般都是为一个企业家的资本劳动——比如说为那些从事出版业的企业家劳动。

---

<sup>①</sup>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856页。(原译文为“撇开真正的艺术作品不说(按问题的性质来说，这种艺术作品的考察不属于我们讨论的问题之内)”，作为引文似不成句，故改译如上。——译注)



即使在一种仅仅形式上是资本主义式的生产方式方面，这种关系也构成了一种过渡形式。在这些过渡形式中，恰恰对劳动的剥削最厉害，但这一点并不改变事情的本质。”<sup>①</sup>

因此，出版商、印刷商、书籍出口商、剧场经理、演员、戏剧演出人、艺术家代理人的活动，在不同的时候，都归入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分析。

当然，作家的活动也是如此。这里，马克思同意亚当·斯密的不带感情的论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以称作家是“生产”劳动者，“并不是因为他生产出观念，而是因为他使出版他的著作的书商发财，也就是说，只有在他作为某一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的时候，他才是生产的。”<sup>②</sup> 马克思认为，对科学的产物、学术研究的产物、或任何哪种脑力劳动的产物的“估价，总是比它的价值低得多，因为再生产科学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同最初生产科学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是无法相比的，例如学生在一小时内就能学会二项式定理。”<sup>③</sup> 这一点怎么应用到文学上去，马克思有一段把歌德的《托尔夸托·塔索》（见本书上文第160页）中的“春蚕”形象来比喻约翰·密尔顿生活中一件事的文章，对此作了解释：

“同一种劳动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

例如，密尔顿创作《失乐园》得到5镑，他是非生产劳动者。相反，为书商提供工厂式劳动的作家，则是生产劳动者。密尔顿出于

---

<sup>①</sup> 马克思著《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即《资本论》第1卷，资本的生产过程。第六章〕，社会主义文献丛书，新批判出版社（法兰克福，1969年，第2版，1970年），第74页。（引文参考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15页。——译注）

<sup>②</sup>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册，第149页。

<sup>③</sup> 同上书，第377页。

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失乐园》。那是他的天性的能动表现。后来，他把作品卖了5镑。但是，在书商的指示下编写书籍（例如政治经济学大纲）的莱比锡的一位无产者作家却是生产劳动者，因为他的产品从一开始就从属于资本，只是为了增加资本的价值才完成的。一个自行卖唱的歌女是非生产劳动者。但是，同一个歌女，被剧院老板雇用，老板为了赚钱而让她去唱歌，她就是生产劳动者，因为她生产资本。”<sup>①</sup>

这是亚当·斯密关于“生产”和“非生产”的定义的逻辑，马克思把它同黑格尔的“推理的狡猾”联系起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黑格尔自始至终无处不在！），并且甚至风趣地用在**犯罪**上：

“哲学家生产观念，诗人生产诗，牧师生产说教，教授生产讲授提纲，等等。罪犯生产罪行。……罪犯还生产……艺术、文艺——小说，甚至悲剧；不仅缪尔奈的《罪》和席勒的《强盗》，而且《俄狄浦斯王》和《理查三世》都证明了这一点。……”<sup>②</sup>

马克思为亚当·斯密的这种区分进行辩护，因为后来的理论家不愿认为伟大的作家、艺术家、思想家不如卖文为生的文丐有“生产性”。马克思认为，这仅仅表明，这些后来的经济学家完全接受了资产阶级对“生产性”的过高估价；他们奴性十足地愿意“把一切职能都说成是为资产者生产财富服务的职能，”同意“资产阶级世界是最美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一切都是有用的，而资产者本人又是如此有教养，以致能理解这一点”。再往前几页，还有：“这些人如

---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册，第432页。

② 同上书，第415页。



此拘守于自己的资产阶级固定观念,以致认为,如果把亚里士多德或尤利乌斯·凯撒称为‘非生产劳动者’,那就是侮辱他们,其实,单是‘劳动者’这个名称,就会使亚里士多德和凯撒感到侮辱了。”<sup>①</sup>

因此马克思认为,实际情况是,现代资产阶级世界,不是艺术的沃土,我们在《剩余价值理论》中读到:“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因此他同莱辛站在一起,维护欧洲启蒙运动的传统,但是却嘲笑它的一些比较简单的设想:主要是艺术方面不断进步的想法。他告诉我们,如果认为我们这一代人在技术知识方面超过了古人,一定也能够产生更好的诗歌,那就没有比这种假设更加荒谬的了。结果,我们便会拿伏尔泰的《亨利亚特》来同《伊利亚特》相对立。

“例如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不考虑这些,就会坠入莱辛巧妙地嘲笑过的十八世纪法国人的幻想。既然我们在力学等等方面已经远远超过了古代人,为什么我们不能也创作出自己的史诗来呢?于是出现了《亨利亚特》来代替《伊利亚特》!”<sup>②</sup>

这就在不同的情况下又重提了马克思在1857年的《导言》末尾化

<sup>①</sup>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册,第302,299页。参阅米·里弗希兹,《卡尔·马克思的艺术哲学》,第98页:“马克思严厉地批判了所有‘关于智力生产和物质生产的笼统肤浅的类比’。他嘲笑一切企图把艺术家、文学家、经济学家说成是‘斯密所谓的生产劳动者’的人,因为据说他们生产的‘不仅是特殊种类的产品,而是物质劳动的产品,所以他们直接生产财富’。所有这些企图表明‘连最高的精神生产,也只是由于被描绘为、被错误地解释为物质财富的间接生产者,才得到承认,在资产者眼中才成为可以原谅的。’”

<sup>②</sup>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册,第296页。

了不少笔墨的论点：技术对神话是具有破坏作用的；没有活的神话，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史诗。

必须承认，马克思在文学方面幽默地运用“生产”和“非生产”的标签，是显然有点奇怪的。如果“生产劳动”的明显标志是为了增加资本和为资产所有者带来利润，<sup>①</sup>那末，密尔顿的《失乐园》只得到5镑，只不过证明他本人并不是资本家。出版商和书商从密尔顿的作品中赚的钱大大超过了5镑！事实上，从长远来说，写了《失乐园》的密尔顿已经证明比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拿来同他对比的莱比锡文丐“生产”更多的资本。但是马克思要说明的总的论点仍然是够清楚的。一个真正诗人的劳动能够保持——至少在密尔顿时代——不异化，只要他不计较市场价值。这样一个诗人出于他的心灵深处的要求，只写他非写不可的东西，而让别人去把他写的诗变成生产利润的商品。因此，他预示了一个“自由王国”，《资本论》第三卷中最有说服力的、因此当之无愧是最有名的一段话就是由此得到启发的：

312

“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sup>②</sup>象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延

---

<sup>①</sup> “资本主义生产的目标并不是生产商品本身，而是利润。在这个社会里，劳动只有在为资本和资本家创造利润的时候才是生产的。因此，在这个资产阶级所支配的社会里，艺术家、作家、以及作为艺术家的建筑师所进行的劳动（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相反）没有被认为是社会劳动。决定艺术作品的价值的，是一种心理上的偶然因素，也就是正好感到有消遣、娱乐、逃避的特殊需要的人手头有多少钱。尽管如此，剧院，举例来说，仍是一种企业，既然投了资本进去，就得生产利润；观众所得到的那种‘货物’是他们从全面生产和剩余价值中所得的收入来支付和消费的。”（亨利·勒弗勃夫勒，《马克思的社会学》，第107—108页。）

<sup>②</sup> 此句译文请参见本章开始的第一个注释。——译注



续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他们都必须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这样做。这个物质上的必需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他的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指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自然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人力，在最有利于和最无愧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仍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sup>①</sup>

马克思在 1844 年的巴黎手稿中就看到了对异化的征服，从他的这种远见到现在这个激动人心的号召之间，有一条明显的线索；这个号召是要求把人类还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的能力发挥出来；是要求建立一种新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人类固然仍旧必须进行劳动，才能从自然那里觅求生存，满足自己不断变化的需要，但是人类也终于能够从“商品拜物教”那里，从经济的不平等那里，从残害人类的贪婪那里得到解放。

马克思认为，现代社会已经创造了巨大财富和全面发展人类能力的一种巨大潜力；但是现代社会却竭力阻挠这种发展，而不是促进这种发展。现代社会把一切东西都尽量变为商品，**货物**，因而限制了人类对自然和艺术的感应。然而在马克思看来，艺术的一

<sup>①</sup>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 25 卷，第 926—7 页。（此处译文略有改动。——译注）另参阅伊·麦斯扎罗斯，《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一书，第 216 页和米·里弗希兹，《马克思的艺术哲学》一书，第 115—116 页。

个伟大效能，恰恰是它通过自己的存在方式对这种“拜物教”进行了抵抗；例如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即使在现代条件下，也仍旧抗拒把自己变成社会支配集团的雇佣劳动者。即使处在不利的时候，真正的艺术生产也极有意义地不同于《资本论》中所说的那种剥夺了劳动者“把劳动当作自己的智力和体力的发挥来享受”的机会的工厂劳动。即使在机器时代，它仍旧保持了与《大纲》中所说“它仍是半艺术性的；它本身就是它的目的”<sup>①</sup>的那种中世纪手工艺的相同的共性。这一点有助于说明美学的范畴为什么在《资本论》中仍旧和在马克思其他后期著作中一样那么重要。文学和艺术是人类能够进行自由创作和享受的能力的一种象征，由于这种能力，使我们可以对人类的前途寄以很高的希望。

常常被引用来支持这种看法的，是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批判经济学家施托尔希的一段话：

“因为施托尔希没有能够了解物质生产的**历史的性质**，他把物质生产当作一般的物质财富的生产来考察，而不是当作在历史的发展中某一具体时候的一定生产形式来考察，所以他就失去了理解的基础，而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才能够既理解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也理解这一一定社会形态下自由的精神生产。他没有能够超出泛泛的毫无内容的空谈。”<sup>②</sup>

有人说，马克思这样区分阶级的意识形态（die ideologischen Bestandteile der herrschenden Klassen）和自由的精神生产（die freie geistige Produktion jeder gegebenen Gesellschaftsformation），似乎是再一次表示，即使受到一种意气不合的社会秩序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圣·路易斯，1973年），第16页。

②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册，第296页。（此处译文略有改动。——译注）



限制，艺术可能仍是一个比较自由的领域。这种论点是站得住脚的，即使我们必须承认，对这一段话的理解是有分歧的。马克思本人没有看到它的付印，而他的手迹又是这样模糊，后来的编辑者读做“自由的精神生产”(freie geistige Produktion)的一句话也可以读做“精细的精神生产”(feine geistige Produktion)。①但是，不论读做什么，原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隐含地把文学与意识形态等同起来，而现在却把“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同不管是“自由的”还是“精细的”方式作出区分，这是一个可喜的纠正。

马克思在他这些后期经济著作中，也表示出他要想打消这种关于物质“基础”或“根据”的简单化想法，而他在这篇序言中是极其明显地强调了物质“基础”对艺术的重要性的。在《剩余价值理论》中，他极其直截了当地指出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相互作用(Wechselwirkung)：

“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②

315 《资本论》第三卷甚至比上引这一段话更加明确地强调历史真理是具体的这一名言。马克思写道：“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

---

① 《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圣·路易斯，1973年)，第64页。

②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册，第296页。

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sup>①</sup> 如果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有时图自己方便而把事情过于简单化，他们在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是找不到过于简单化的根据的。

凡是在困难前面不敢正视而是象溜冰那样姿态优雅地溜过去的行为，马克思都是深恶痛绝的。对于经济学和社会学方面这种“舞文弄墨”，马克思现在更加猛烈地一再提出熟见的谴责，这同他的这种深恶痛绝的态度是一致的。“美文学式的废话，”马克思痛斥道；“美文学式的胡言乱语”，“舞文弄墨的业余爱好者。”<sup>②</sup> 他并且表现出比以前更加敌视德国浪漫主义了。在这些章节里，凡是有理论家亚当·弥勒出现，难得不把他叫做“浪漫主义者”；因此，马克思对于在弥勒著作中见到的暧昧的神秘主义和糊涂思想所作的全面谴责，也是对整个浪漫主义运动的谴责：

“最后，还有‘浪漫主义的’弥勒的如下胡说……在少数几行内再也不能拼凑比这更多的令人恶心的胡言乱语了……它的内容是由日常的偏见构成的，是从事物最表面的假象取来的。然后，这种错误的平庸的内容被用神秘的表达方法‘提高’和诗化了。”<sup>③</sup>

马克思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可能把“事物最表面的假象”

---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892页。

② 同上书，第26卷，第1册，第299，311，167页。

③ 同上书，第25卷，第447—448页。另参阅马克思在《大纲》和《政治经济学批判》里对亚当·弥勒更详尽的批判。《大纲》（柏林，1953年版），第413和694—695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62—63页）。



看作是真实情况了。他年纪越老，就越来越同意黑格尔和德国唯心主义者：真理是埋在直接的感性认识的下面，需要由那些有理论概括和哲学思维天赋的见多识广的人来挖掘，或者由伟大的艺术家用直觉来抓住。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和德国浪漫主义者却有了一致的看法，这是颇有讽刺意味的。

马克思逝世后出版的经济著作使我们看到，马克思再一次从拉丁经典著作中寻找辞句，总结经济上实际情况和观点，令人经久难忘：除了熟见的“*fruges consumere nati*”以外，马克思现在用维吉尔的“*vos, non vobis*”和奥维德的“*materiam superabat opus*”来非常恰当地表达他自己要想说的话。<sup>①</sup>路德的关于高利贷的小册子提供了许多可以用来进行论战的形象生动的模特儿（“这是对一般资本家的绝妙写照”，马克思有一次在长段引述了路德的一本小册子以后惊叹道：“这一切描写得绘声绘色，同时也确切地抓住了旧式高利贷和一般资本的性质”）；<sup>②</sup>而且在马克思自己的文章中也一再应用了路德的《圣经》译本中的遣辞、造句、韵律、人物。马克思现在从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中找到了一种过去时代的形象，能够使十九世纪的读者痛感当前有哪些事情需要加以改变。他在1865年第一国际中央委员会上说，农业工人的低工资，同英国济贫法配合在一起，成了“把雇佣工人变成奴隶，把莎士比亚的骄傲的自耕农变成贫民的一种高明手法。”<sup>③</sup>席勒的《华伦斯坦的阵营》提供了两个令人难忘的形象来表现当代的人。其中一个又是那个卡

---

① 《马恩全集》，德文版，第26卷，第1册，第146、197页；第2卷，第117页。（中文版未保留拉丁文。“*fruges consumere nati*”意“为享受果实而生的人们”（贺雷西语），“*vos, non vobis*”意“你，不是为你”，“*materiam superabat opus*”，意“工艺胜过原材料”。——译注）

②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3册，第596—597页。

③ 《工资、价格和利润》，《马恩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200页。

普勤教士<sup>①</sup>，他对华伦斯坦的士兵大谈其地狱的烈火和万劫不复，所用的话是席勒基本上从十七世纪一个自称为阿伯拉罕·圣克拉的神甫的布道中借用的。这个卡普勤教士和他的十七世纪模特儿为马克思所利用，来表达他对马尔萨斯的态度：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这部著作第一版没有包含一个新的科学词汇；这本书只应看作卡普勤教士喋喋不休的说教，只应看作是用阿伯拉罕·圣克拉文体对唐森<sup>②</sup>、斯图亚特<sup>③</sup>、华莱士<sup>④</sup>、埃尔伯<sup>⑤</sup>等人的论断的改写。因为这本书实际上只是指望以它的大众化的形式来引人注目，所以它理所当然地要引起大众的憎恨”。<sup>⑥</sup>

马克思从《华伦斯坦的阵营》借来的另外一个角色是个竭力模仿他的伟大将领的司务长，但只做到了一些表面相像——他咳嗽吐痰酷肖华伦斯坦，但一点也没有华伦斯坦的精神和天赋。马克思用这个角色作为象征，反映李嘉图的信徒同李嘉图本人的关系。<sup>⑦</sup>歌德提供了不少俗套和引语，而海涅的《宗教辩论》则提供了一则典型的犹太笑话。<sup>⑧</sup>此外，马克思机智地把宗教信仰和商业信用(Glauben和Kredit)并列很可能是受到海涅在《观念——勒格朗特文集》第

317

① 卡普勤教士(Kapuzin)，意即天主教方济各会托钵僧。——译注

② 约瑟夫·唐森(1736—1816)，英国教士，地质学家和社会学家，鼓吹反科学的人口论，后为马尔萨斯所利用。——译注

③ 詹姆斯·斯图亚特(1712—178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商主义的后期代表人物之一。——译注

④ 罗伯特·华莱士(1697—1771)，英国教士和统计学家，鼓吹反科学的人口论，后为马尔萨斯所利用。——译注

⑤ 克劳德·雅克·埃尔伯(1700—1758)，法国经济学家，重农学派，马尔萨斯的反科学的人口论的前辈之一。——译注

⑥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2册，第128页。

⑦ 同上书，第26卷，第3册，第186页。

⑧ 同上书，第25卷，第612页。



七章中类似的并列的启发。<sup>①</sup>

这样引用的不仅是些伟大作家。马克思大概没有读过纳撒内尔·李<sup>②</sup>的《两后相争》这个剧本就用了当初出于这个剧本的一句成语：“两雄相遇，必有激战”；<sup>③</sup>他从汤姆·泰勒<sup>④</sup>的《我们的美国亲戚》中借用头脑空虚的贵族邓德里厄里勋爵这个人物来比喻马尔萨斯<sup>⑤</sup>；而弗利兹·罗伊特的低地德语小说提供了督察长布雷济希的角色<sup>⑥</sup>，使马克思能够有效地丑化头脑愚蠢的经济学家的兜圈子的思维方法和“示范表演”：“这样，我们现在就知道了资本家发财致富的一个源泉。它不外就是督察长布雷济希的秘密——大贫穷的原因就是 *la grande pauvreté* [大贫穷]。”<sup>⑦</sup>在这里，弗利兹·罗伊特帮助了马克思有力地提出了他对闯进经济领域的“美文学家”和“文人学士”经常提出的指责：他们用纯粹语言修辞上的手法来“解决”问题；他们善于舞文弄墨，可是不善于逻辑思维。<sup>⑧</sup>

上文已经谈到，威廉·科贝特在这些经济著作中所受到的对待比在马克思关于政治问题的报纸文章中所受到的对待不可避免

---

① 《马恩全集》，德文版，第26卷，第3册，第442页。

② 纳撒内尔·李(1653—1692)，英国剧作家，他的悲剧在当时深受欢迎，《两后相争，或亚历山大大帝之死》写于1677年。他也同屈莱顿合作写剧本。——译注

③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147页。(原译文为“希腊人遇到希腊人就发生激战”，现意译如上，始似成语。又原译注释中把《两后相争》误译为《王后的情敌》。——译注)

④ 汤姆·泰勒(1817—1880)，英国剧作家和记者。——译注

⑤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3册，第31页。

⑥ 弗利兹·罗伊特(1810—1874)，低地德语作家，文学评论家，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德国狭隘的地方文学代表人物。督察长布雷济希大叔是他的短篇幽默小说中的人物。——译注

⑦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541—542页。(中译本把督察长(*Inspektor*)误译为检察官。——译注)

⑧ 散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3册，第90—160各页。

地要差一些；因为科贝特的向后看的经济学，特别是他完全反对纸币，只能使马克思感到好笑。但是马克思继续用赞许的口气引述科贝特，既赞扬他的政治见识，又赞扬他的直截了当的表达方法。他喜欢他是一个真正来自人民的人，在他一贯喜欢用的括号中，把他同莱比锡大学罗雪尔那样的态度冷漠、不切实际的教书先生作对比：

“因此，英国工人阶级憎恨马尔萨斯——科贝特粗鲁地称他为‘江湖牧师’（科贝特虽然是当代英国最大的政论家；但他缺少莱比锡大学教授的教养，并且公开反对‘学者的语言’），——对马尔萨斯的这种憎恨是完全正当的……”<sup>①</sup>

从马克思所引用的权威，可以越来越明显地看出，他相信伟大作家是能够具有凌驾于他们自觉信念和态度之上的见识的。最清楚不过的例子是保皇派巴尔扎克这个保守分子，马克思极其钦佩他对社会现实的深刻理解：

“以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而著名的巴尔扎克，在他最后的一部小说《农民》里，恰当地描写了一个小农为了保持住一个高利贷者对他的厚待，如何情愿白白地替高利贷者干各种活，并且认为，他这样做，并没有向高利贷者献出什么东西，因为他自己的劳动不需要花费他自己的现金。这样一来，高利贷者却可以一箭双雕。他既节省了工资的现金支出，同时又使那个由于不在自有的土地上劳动而日趋没落的农民，越来越深地陷入高利贷的蜘蛛网中。”<sup>②</sup>

<sup>①</sup>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2册，第127页。对科贝特的比较冷静的看法，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823页。

<sup>②</sup>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47—48页。



马克思显然很高兴看到自己的结论得到了一个伟大小说家的观察所证实，而这个伟大小说家自觉的人生哲学在根本方面来说是不同于他自己的人生哲学的。他认为，巴尔扎克的了解要比保尔·德·科克那样的流行作家深刻得多！

“保尔·德·科克的一个专家会告诉我，正如我不买面包就无法生活一样，我不买裤子也无法生活，因此，我不买裤子就发不了财，因此买裤子就象我的血液循环和呼吸过程一样是我发财的一个间接手段，或者说至少是一个条件。但是不论我的血液循环还是我的呼吸本身都不能使我发财……”<sup>①</sup>

319 我们知道，马克思本人在空闲的时候是爱读保尔·德·科克的小说的<sup>②</sup>；显然，除了可供消遣以外，他还觉得这些小说是有用的，因为这些小说迎合嗜之入迷的读者的口味，反映了这些读者的思想混乱。

在这些经济学批判中，过去的伟大作家还在另外一种典型的情况中出现：只要提一下他们的名字就可以“识别”，从而贬低后来的小作家。托马斯·霍吉斯金<sup>③</sup>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强调“表现在商品上的过去劳动作为目前正在进行的活动的劳动的重要性”，他们被取笑地称为“资本的品得们”；罗雪尔教授由于轻率

---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册，第433—434页。（此处译文有改动，——译注）

② 《同时代人心目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第26页（保尔·拉法格）。

③ 托马斯·霍吉斯金（1787—1869），英国经济学家和政论家；他从空想社会主义的立场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批判资本主义，他利用李嘉图的理论来论证社会主义。——译注

地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基础》(奥格斯堡,1858年第三版)序言中提到修昔的底斯,结果在《剩余价值理论》中经常以“威廉·修昔的底斯·罗雪尔”的名字出现。<sup>①</sup>

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研究中,除了同意黑格尔以外,也同意孟德维尔<sup>②</sup>,认为恶也是艺术的一个母亲。我们在上文(本书第310页)已经看到这个论点的开端,也就是马克思对犯罪的“生产”性质的风趣的探讨;这里,这个论点达到了最高峰,而且是以提到《圣经》开始的,这是他的特点:

“撇开私人犯罪的领域来说,如果没有国家的犯罪,能不能产生世界市场?如果没有国家的犯罪,能不能产生民族本身?难道从亚当的时候起,罪恶树不同时就是知善恶树吗?”

“孟德维尔在他的《蜜蜂的寓言》(1708年版)中,已经证明英国所有的职业都具有生产性并且早就提出了我们的论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称之为恶的东西,不论道德上的恶,还是身体上的恶,都是使我们成为社会生物的伟大原则,是毫无例外的一切行业和工作之牢固基础、生命力和支柱;我们应当在这里寻找一切艺术和科学的真正源泉;一旦不再有恶,社会即使不完全瓦解,也一定要受到破坏。’

“孟德维尔就是有比资产阶级社会心胸狭隘的辩护士勇敢得多,诚实得多的优点。”<sup>③</sup>

在这里,孟德维尔帮助了马克思极其充分地描述了黑格尔的“推理” 320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3册,第303、558页。

② 贝尔纳德·孟德维尔(1670—1733),英国作家和经济学家。——译注

③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册,第416—417页。(此处译文略有改动。——译注)



的狡猾”在文化领域中可能起的作用。

从《剩余价值理论》中摘引的最后一句金玉良言，在这里是值得引的。“但是，一个人如果要想使科学不去适应从科学本身（不管这种科学如何错误）得出的标准，而是使科学去适应从外部得出的标准、去适应从与科学无关的外在利益所支配的一种观点得出的标准，我就说这种人‘庸俗〔gemein〕’。”<sup>①</sup>这个指责是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向马尔萨斯提出来的；但是显然也适用于马克思的文学理论和批评。他把马尔萨斯的所谓“对科学犯罪”同他认为李嘉图所特有的“无私”，“科学诚实”，“科学公正”作了对比，这与他把欧仁·苏迎合资产阶级读者偏见同他认为巴尔扎克所特有的现实主义公正态度作的含蓄对比，是极其相象的。

## (2)

马克思一边在写作《资本论》，一边越来越开始认识到，一部著作还没有全部写好就把已经写好的部分先送去排印，这种做法对他不合适。这是雅科布·格林在他的《德国语言史》中所说的做法，为了出版他的卷帙浩繁的辞典，这样做是必要的。而马克思则要让他的著作作为一个艺术的整体出现在读者面前。因此，他在1865年7月31日告诉恩格斯说：“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在它们没有完整地摆在我面前时，不拿去付印。用雅科布·格林的方法不可能达到这一点，他的方法一般地比较适用于那些没有辩证结构的著作。”<sup>②</sup>但是，他没有机会这样完整地

<sup>①</sup>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2册，第126页。（此处译文略有改动。——译注）

<sup>②</sup> 同上书，第31卷，第135页。（原译文把最后一句“……没有辩证结构的著作”译为“……不是辩证地分解了的整体的著作。”——译注）

把全部《资本论》出版。只有第一卷是在他生前出版，由他亲自定稿的。

在由马克思亲自付印出版的这一卷《资本论》中，文学始终使他心迷神醉，这可以在一页又一页的字里行间中看出。这里是典型的一段话：

321

“但是，原罪到处发生作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积累和财富的发展，资本家不再仅仅是资本的化身。他对自己的亚当具有‘人的同情感’，而且他所受的教养，使他把禁欲主义的热望嘲笑为老派守财奴的偏见。古典的资本家谴责个人消费是违背自己职能的罪恶，是‘节制’积累，而现代化的资本家却能把积累看作是‘放弃’自己的享受欲。‘啊，他的胸中有两个灵魂，一个要想同另一个分离！’”<sup>①</sup>

这一段话象马克思经济著作中的许多其他段落一样是以一句神学上的话开始的。这起了三个主要作用：(1)指出了“宗教和资本主义兴起”的关系，这是后来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特别是威伯<sup>②</sup>、特鲁尔契<sup>③</sup>、陶纳<sup>④</sup>都要详尽地加以分析的；(2)表示了马克思认为在现代的世界中金钱已经取得了上帝的地位，这也是海涅所共有的看法，除了以间接的方式以外，马克思也常常用直接的方式表达

<sup>①</sup>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51页。（最后一句出自歌德的《浮士德》，郭沫若译本为：“有两种精神居住在我们心胸，一个要想同另一个分离！”（《浮士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54—55页。）——译注）

<sup>②</sup> 麦克斯·威伯（1864—1920），德国社会学家，著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译注

<sup>③</sup> 厄恩斯特·特鲁尔契（1865—1923），德国学者，研究宗教、社会史、宗教哲学与历史哲学，著有《基督教教堂的社会教义》等著作。——译注

<sup>④</sup> 里查·亨利·陶纳（1880—1962），英国历史学家。他的《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1926）是研究16和17世纪新教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关系的经典著作。——译注



出来；(3)使人有一种不协调的感觉，提醒人们，有一些价值标准，他们只是口头上赞成，但是在实践中却置之脑后。他喜欢提醒他的读者，基督曾经把银钱兑换商赶出了神殿；他津津有味地引用了《启示录》第十三章第十七节：“凡没有这种印记即没有这个兽名或兽名的数字者，都不能买或卖”；而且常常模仿《圣经》的教诫说：“积累啊，积累啊！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sup>①</sup>但是上述那段话并不满足于引用《圣经》和根据《圣经》所建立起来的神学体系。它也引用了席勒的叙事诗《保证》和歌德的《浮士德》。席勒的叙事诗说的故事是生死之交达门和帕蒂亚斯的故事；马克思所提到的那一句诗发生在故事的高潮，暴君狄俄尼修斯由于这两个朋友的忠贞而受到感动，赦免了对达门的惩罚，并且要求允许他同他们两人也结为朋友。这里提到这个暴君的“人的同情感”的话，在马克思的这一段文章中又是具有三重效果的：它表明资本主义是暴君；它把古代暴君忽然同情别人来同现代暴君只同情自己的老亚当来作对比；它表明有钱的公民由于受过教育而有装饰门面的文化，他们现在能够不比任何人差，流畅地引用席勒的诗句，依此美化自己的自私自利。这最后一个作用是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引述席勒的其他一些话来完成的：

“资本主义生产最奇妙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仅不断地再生产出雇佣工人本身，而且总是与资本积累相适应地生产出雇佣工人的相对过剩人口。这样，劳动力的供求规律就保持在正常的轨道上，劳动力的变动就限制在资本主义剥削所容许的范围内，最后，工人对资本家必不可少的社会从属性即绝对的从属关系得到了保证。

<sup>①</sup> 例如见《马恩全集》，第23卷，第105,652页。《〈启示录〉引文据通行《圣经》官话译本为：“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的，都不得作买卖。”——译注）

政治经济学家在本国，即宗主国，可以花言巧语地把这种绝对的从属关系描绘成买者和卖者之间的自由契约关系，描绘成同样独立的商品所有者即资本商品所有者和劳动商品所有者之间的自由契约关系。但是在殖民地，这个美丽的幻想撕破了。”<sup>①</sup>

Aber in den Kolonien reißt der schöne Wahn entzwei——这里引用的是席勒所有叙事诗中在十九世纪最流行的一部叙事诗《钟之歌》。席勒的诗句指的是新婚之夜的情欲取代爱情：

“同束胸和面纱一起  
这个美丽的幻想撕破了。”

引用这句诗的好玩地方是，承认把在殖民地的所作所为同新婚之夜的兴奋刺激并列有其意外的相似之处，有其令人吃惊的含意。但是也有严肃的地方；因为揭去或撕破一层面纱，在马克思的成熟作品中是一个中心的形象。《资本论》第一卷中别的地方也曾出现过：

“这层面纱在人们面前掩盖起他们自己的社会生产过程……。大工业撕碎了这层面纱”；<sup>②</sup>

它也出现在马克思的《数学手稿》中：

323

<sup>①</sup>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838页。（此处译文第二句“劳动力的供求规律”与“劳动力的变动”，原译文为“劳动的供求规律”与“工资的变动”。又原译文最后一句为“但是在殖民地，这个美丽的幻想破灭了”为求与下文数处引文一致，改译为“但是在殖民地，这个美丽的幻想撕破了。”——译注）

<sup>②</sup>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533页。（原译文“面纱”译为“帷幕”，为求与其他引文译文一致，改译为“面纱”。——译注）



“把科学的这层神秘的面纱撕去，在这里同其他地方一样是很重要的；”<sup>①</sup>

而且它也经常出现在其他著作中，其含意总是，遮起来不让外行看到的東西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马克思常常通过借用流行古典作品的话达到了这种复杂的效果。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描绘占有的过程是另外一个例子：

“商品是物，所以不能反抗人。如果它不乐意，人可以使用强力[wenn sie nicht willig, kann er Gewalt brauchen]，换句话说，把它拿走。”<sup>②</sup>

马克思在这里又一次借用了德国读者不会认不出来的诗句：歌德的怪诞可怕的叙事诗《魔王》中的诗句，诗中那个可怕的矮小精灵恐吓一个发烧的孩子：

“我爱你，你的美好的体态吸引着我，  
如果你不乐意，我就要用强力！”

我们读到马克思引语的原文出处，眼前就闪过了这样的形象：人类在狂热地进行占有和积累中变成了象那个魔王那样可怕的精灵。但是，当然，这里的不同之处和相同之处是同样重要的：商品是由人制造的，是为人制造的，因此人有拿走它的权利……问题是由谁

---

① 马克思，《数学手稿》（莫斯科，1968年德文版），第192页。

②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02页。

来拿走, 拿走什么, 如何拿走, 在什么时候拿走……

我们在上文开始时引述的那一段话(见本书上文第 321 页)以歌德的《浮士德》中两行诗句告终。马克思在这里又可以断定, 这两句诗的原文出处是大多数德国读者所熟悉的; 因此, 把原文出处同引用场合作一对比, 是颇有意思的。浮士德所说的两个灵魂中, 有一个灵魂代表精神上和智力上对高尚事物的追求, 而另一方面, 马克思所无情地剖析的新式资本家的世界中, 可以与之相比的, 却是对享受的追求, 这就形成了显明的对照。以前的从歌德著作中引用的诗句, 已为这个效果作了准备。例如, 《西方与东方的合集》中有几行诗, 马克思一度曾加引用, 表示出他对黑格尔的“推理的狡猾”(见本书第 248 页)的体会, 这几行诗句,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又用来表示放任其发展的资本主义是多么冷酷无情:

324

“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 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人们为体力和智力的衰退、夭折、过度劳动的折磨而愤愤不平, 资本却回答说: ‘既然这种痛苦会增加我们的快乐, 我们又何必为此苦恼呢?’”<sup>①</sup>

为了强调对比, 马克思又说, “这里的快乐可以读作利润”。我们也可以引证《资本论》第一卷中接近开头部分的那一段, 马克思讽刺地把商品所有者同浮士德吃力地想翻译《约翰福音》的开头部分相比: “我们的商品所有者在他们的困难处境中是象浮士德那样想的: ‘泰初有为’。因此他们还没有想就有所为而做起交易来了。他

---

<sup>①</sup> 《马恩全集》, 中文版, 第 23 卷, 第 299 页。另参阅歌德的《西方与东方的合集》中的《致祖莱卡》〔《帖木儿篇》〕。



们根据本能遵从商品本性的规律。”<sup>①</sup>在这里，对比也是重要的。但是浮士德把《约翰福音》中的“泰初有道”改为“泰初有为”本来就有疑问，如今经马克思一引用就显得更有疑问了。

《浮士德》中有一句话，马克思在《大纲》中曾经引用，后来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又引用一次，在《资本论》第三卷的注释中再一次引用，这句话是特别使人感到兴趣的：

“原来是活的工人的活动变成了机器的活动。因此，资本对工人的劳动的占有以一种他的感官明显地感到的残酷方式，使工人面对这样的情况：资本把劳动吸收到自己的体内，‘好象它有春情在体内发作一样’[als hätt’ es Lieb’ im Leibe]。”

325 “在生息资本的场所，资本的运动被简化了；中介过程被省略了。因此，一个1000的资本已确定为这样一种物，这种物本身=1000<sup>2</sup>，经过一定时期变成1100，好象窖内的葡萄酒，经过一定时期会改善它的使用价值一样。资本现在是物，而作为物它是资本。货币现在有春情在体内发作[Das Geld hat jetzt Lieb’ im Leibe]。”

当资本家把货币变成商品，使商品充当新产品的物质形成要素或劳动过程的因素时，当他把活的劳动力同这些商品的死的物质合并在一起时，他就把价值，把过去的、物化的、死的劳动变为资

---

<sup>①</sup>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04页。（原译文为“我们的商品所有者在他们的困难处境中是象浮士德那样想的：‘起初是行动’。因此他们没有想就已经做起来了。商品本性的规律通过商品所有者的天然本能表现出来。”其中“起初是行动”根据郭沫若译本和《圣经》官话译文改为“泰初有为”。（《浮士德》，郭沫若译，（人民文学出版社，第61页。）后两句译文也略有改动。——译注）

本,变为自行增殖的价值,变为一个有灵性的怪物,它用‘好象有春情在体内发作’[als hätt’ es Lieb’ im Leibe]的劲头开始去‘劳动’。”<sup>①</sup>

在这三段引文中,主要的涵义是很明白的:关于物化,关于货币能把活的工人吸收到自己体内,变成机器,关于货币滋生货币,好象体内有春情在“发作”一样——不管是作为性交,还是作为这种活动的结晶——都是有某种淫秽的东西。如果我们记得《浮士德》中“Als hätte sie Lieb’ im Leibe”这句诗的背景,那么这种憎恶的感觉就加剧了,隐含的威胁也就表达了出来:因为在《浮士德》里这一句诗指的是服了毒以后在屋子里东奔西跑的老鼠,由于毒药在它体内发作而上下乱窜,最后暴死在厨房里。在《浮士德》的第一部中,这首关于垂死老鼠的歌是自称“鼠王”的靡非斯托斐勒司上场的信号,接着他就支配了整个场面,唱了他自己的“胜利的跳蚤之歌”,盖过了白朗德的“失败的老鼠之歌”。

《资本论》第一卷由于引用了《浮士德》而显得生动活泼,事实上其中的大部分是靡非斯托斐勒司嘴中的话,或者与这个恶魔角色有些直接关系的。蒲鲁东及其门徒的著作使马克思想起了靡非斯托斐勒司对一个学生的讽劝:

“……缺乏概念的地方  
字眼就及时出现。”

几页之后,一张桌子,一个可以用感官认识的普通的物,作为商品,

---

<sup>①</sup> 《大纲》,第592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443页;第23卷,第221页。(三处引文中译文都把所引《浮士德》中诗句根据郭沫若译本译为“害了相思病”,但按下文来看,似以译为“有春情在体内发作”为宜。——译注)



变成了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了。Ein sinnlich übersinnliches Ding；其中的联系又是靡非斯托斐勒司，他责备浮士德没有在甘泪卿情绪对头的时候抓住机会：

“你超凡而不入圣的乘鸾吉士，  
被一位小姑娘用鼻尖儿指使！”

其他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的资本家早就预见到了这种情况，这正是他发笑的原因”——这句话令人想起了浮士德说到靡非斯托斐勒司第一次在他书斋中出现的话，当时后者由一只狮子狗变成了一个旅装书生：

“狮子狗里藏着的原来是这个！  
一个旅装书生！这正是使我发笑的原因！”

或者，在《资本论》第一卷快到末尾的地方，再回到靡非斯托斐勒司自己的话上来：

“事实上，爱尔兰的贫困又成了英格兰当前的话题了。1866年底和1867年初，有一个叫达费林侯爵的爱尔兰大地主，曾经在《泰晤士报》上着手讨论解决这个问题。‘这位伟大的至尊多么仁慈啊！’”<sup>①</sup>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84, 87, 220, 777—778页。（“……缺乏概念的地方，字眼就及时出现”郭译为“因为在恰好的地方，有时用得着没有意义的言语”（见郭译《浮士德》，第94页）；“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郭译为“超凡而不入圣”（见郭译《浮士德》，第188页）；“……这正是使我发笑的原因”两行诗句在郭译本《浮士德》中漏译；“至尊”袭用郭译，原义为“主”，指上帝，也可用作贵族称谓，通译“勋爵”，“爵爷”，故也可指“侯爵”。——译注）

“Wie menschlich von solch grossem Herrn”（“这位伟大的至尊多么仁慈啊”）——马克思用了引号，这一次又引自《浮士德》：引自靡非斯托斐勒司关于一位比达费林侯爵<sup>①</sup>还要大的“至尊”的话：

“我喜欢时常来看望这位老人，  
我提防着，怕和他断绝了关系。  
他真不愧是一位伟大的至尊，  
便和我恶魔交谈也这般和气。”<sup>②</sup>

因此，靡非斯托斐勒司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我们在这里应当记住，黑格尔有两部著作对马克思的思想的形成具有根本的意义，其中也引用了靡非斯托斐勒司的话，而且称他是个“很了不起的权威”。<sup>③</sup>尤其是，我们不禁想起李卜克内西回忆他在伦敦同马克思一家在一起的日子时有一段话：

327

“当他真正情绪好的时候，他就会为我们表演赛德尔曼怎样演靡非斯托斐勒司。他在柏林求学的时候曾经看过赛德尔曼的演出，对之极为倾倒，而且《浮士德》是德国全部文学作品中他最喜爱的一部作品。我不能说马克思朗诵得很好——他演得过火了——但是每一句话，他都抓住了中心，他总是正确地表达了意思；总之，

---

① 达费林侯爵，弗雷德里克·坦普尔·汉密尔顿·坦普尔·布莱克伍德（1826—1902），英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自由党人，爱尔兰大地主，加拿大总督（1872—1878），印度总督（1884—1888）。——译注

② 《浮士德》，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8页。见《浮士德》第一部《天上序幕》，此处所引的是菲力浦·魏恩所译的英译文。

③ 见黑格尔的《法哲学》序言（见《法哲学原理》1961年商务印书馆，第6页）和《精神现象学》。黑格尔很少有引用文学作品而不随意删节的；引用歌德作品也不例外。



他的表演很有效果，一等到我们明显地看出，他深入了角色的灵魂，充分抓住了并且彻底了解角色的灵魂，那时，他在开始时念词过火所造成的滑稽印象就马上消失了。”<sup>①</sup>

歌德的靡非斯托斐勒司性格复杂，他也是一个好揭露别人装模作样，刺探生活隐秘，指出腐朽事物必然没落，嘲笑冠冕堂皇的姿态和华丽动听的辞藻的精灵。这就难怪马克思经常用靡非斯托斐勒司的口吻说话，他象歌德的《浮士德》天上序幕中的天帝一样，总是意识到反面人物推动人们采取正面行动的力量。

夏洛克又是《资本论》中经常出现的另一个文学人物。他所代表的意义，有一部分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已露端倪（见本书第303页）：受到法律保护的金钱交易是残酷无情的；在一个金钱取代了上帝地位的世界中所特有的现象是荒谬绝伦的事情同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发生在一起。因此，毫不奇怪，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资本本身具有了夏洛克的外貌，用夏洛克的口吻说话。马克思告诉我们，在出现工厂童工问题的时候，发现当时并没有条例规定禁止儿童从下午二点起毫不间断地干活到晚上八点半：

“工人和工厂视察员从卫生和道德的角度提出抗议。但资本回答说：

‘我的行为没有越轨，我要求我的权利！  
那就是我的契约上规定的罚金和抵押品！’”

328 接着就让资本要求，儿童不仅要下午二点起拚命干活到晚上八点半，而且不能分身去吃饭；它又用夏洛克的口吻说：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柏林，1967年），第27—28页。

“对了，他的胸部，  
契约上是这么说的！”

只有在这样没有指明出处引用了《威尼斯商人》中审判场面以后，马克思才明确地谈到英国资本家“象夏洛克那样死抓住 1844 年的法令条文不放”。<sup>①</sup>不仅在工厂主中间可以找到夏洛克，而且，我们发现，在乡村中也有“贵族夏洛克”，他们“在谈到建筑投机家、小地主和开放村庄时也会伪善地耸耸肩膀。”<sup>②</sup>马克思指责高教会派贵族，卫理公会派或教友会派工厂主都有莎士比亚笔下那个犹太人的邪恶品质，他显然是骂得自己也感到很痛快。

我们知道马克思在他的早期论文《论犹太人问题》中就已经表明了这一点。在那篇论文中，他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极其流行的观点，把犹太人性格同贪财求利、经商致富的倾向等同起来，不管有这种倾向的人属于什么宗教信仰和种族。在那篇论文中，马克思也表明，他已决定不顾犹太教的更深刻、更真正的精神，而且也不顾他自己的观点和论点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并且传达了犹太先知们及其法典注释家们的传统。因此，毫不奇怪，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用夏洛克的口吻说话的是剥削者。不过，有一个颇有意义的例外。马克思解释说，现代工业的技术条件同它的资本主义形式的社会性之间有着一种矛盾的关系，“破坏着工人生活的一切安宁、稳定和保障；使工人面临这样的威胁：在劳动资料被夺走的同时，生活资料也不断被夺走”；他并且在脚注中又加了一句：

---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 23 卷，第 318—319 页。

② 同上书，第 750 页，脚注(165)。



“你们夺去了我活命的资料，  
就是要了我的命。”<sup>①</sup>

329 这里，终于有这么一次，马克思让被压迫者用夏洛克的口吻说话；对于这个性格复杂的人物，不论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马克思提出了一种更加深刻、更加忠实的看法，这是我们所意想不到的，因为我们以前总是把夏洛克与死扣法律条文的残酷无情的剥削者等同起来。

马克思也又一次引用了莎士比亚戏剧《雅典的泰门》第四幕第三场，用泰门说金钱是“人尽可夫的娼妇”的话，来说明他认为金钱是个激进的平均主义者的论点：“正如商品的一切质的差别在货币上消失了一样，货币作为激进的平均主义者把一切差别都消灭了。”<sup>②</sup> 巴黎手稿中也引用了这一段话，马克思都同样不顾这一段话在莎士比亚剧本中是在什么具体场合中说的，也不顾说这段话的人是否可靠；而且，泰门所发表的见解到底是不是莎士比亚时代的口头禅，这一点也无关他要达到的目的。

但是应该注意到，在巴黎手稿中引用《雅典的泰门》的话所采取的形式，同《资本论》第一卷中所采取的形式之间，有两个意味深长的不同之点。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让泰门去祈求天神：

“吓！你们这些天神啊！为什么要给我这东西呢？……”

而在《资本论》中则没有这种使人想到“人民的鸦片”而致思想混乱的话。在巴黎手稿——我们必须记住，这是供马克思自己参考而

---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534页，脚注（307）。

② 同上书，第152页。

写的,而不是为出版而写的——中,那个年老色衰的寡妇还有追求者,他们脸上显然有着花柳病的症候:

“它可以使鸡皮黄脸的寡妇重做新娘;  
即使她的尊容会使身染恶疮的人见了呕吐,  
有了这东西也会恢复三春的娇艳。”

但是在《资本论》中,身染恶疮的人以下几句,象在鲍德勒版家庭用《莎士比亚全集》中一样,给删得无影无踪了。马克思是个维多利亚时代的老派人,他认为即使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也有一些东西是不宜在公开场合提到的,尽管他对阿雷蒂诺和雷尼埃<sup>①</sup>这样的作家提出性方面的问题却不无兴趣,这在本书其他地方已有述及。此外,他致恩格斯的一些信常常以毫无顾忌的坦率口气谈到性行为和性病。 330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紧接着《雅典的泰门》的一段引语后面是另一段引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的诗句:

“人间没有象金钱这样坏的东西到处流通,  
这东西可以使城邦毁灭,使人们被赶出家乡,  
把善良的人教坏,使他们走上邪路,作些可耻的事,  
甚至叫人为非作歹,干出种种罪行……”<sup>②</sup>

这里再一次没有说明,用这样极其讽刺口吻说的这些话是在什么

---

① 马屠朗·雷尼埃(1573—1613),法国讽刺诗人。——译注

②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52页。



情况下说的,也没有指出说话的人是克里昂,这个角色在其他方面的看法很少可能会引起马克思的注意。但是,这一次马克思在引用时加了他自己的一段话,清楚地表明他摘引莎士比亚和索福克勒斯的剧本要达到什么目的:

“但货币本身是商品,是可以成为任何人的私产的外界物。这样,社会权力就成为私人的私有权力。因此,古代社会咒骂货币对经济秩序和道德秩序具有破坏性。〔这里作为脚注插入了上述从《安提戈涅》引用的一段话。〕还在幼年时期就抓着普路托<sup>①</sup>的头发把他从地心里拖出来的现代社会,则颂扬金子是圣杯,是自己最根本的生活原则的光辉体现。”<sup>②</sup>

331 马克思在莎士比亚的剧本中所寻找的,象在索福克勒斯的剧本中所寻找的一样,是一种有力的表达方法,或者一种有力的暗示方法,来说明一种同他认为属于现代资本家的世界观截然相反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究竟是由于(象泰门那样)绝望厌世,还是由于(象克里昂那样)完全误解了某个行动的真正动机,那无关紧要:重要的只是莎士比亚和索福克勒斯都使他们剧本中的主人公明确宣布,或者是暗示,一种可以假定他们所生活的社会中的许多成员都是可以接受的想法,而且这种看法对十九世纪资本主义是有效的纠正。全部《资本论》,马克思的全部著作,都清楚地表明,他同那种对资本主义世界观采取一概否定态度的简单化和非历史的观点,距离是多么的远,他是多么清楚地看到,金钱不仅是人类的祸

① 普路托,罗马神话中的地府之神。——译注

②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52—153页。(此处译文略有改动——译注)  
此处引用的索福克勒斯英译文是E·F·瓦特林所译。

害和人尽可夫的娼妇，而且也是进步的一个重要工具。

在刚才引用的这段文章中，马克思接着支持克里昂对贪婪的抨击，所用的一段话是从时代晚得多的一个作家那里引用的：那就是语法学家阿泰纳奥斯<sup>①</sup>的《学者们的宴会》，这是在纪元第二世纪末编纂的。马克思在脚注中引述道：“贪婪想把普路托从地心里拖出来。”这样，他就说明了，甚至在印刷机、自动棉锭、机车、电报、罗伯茨公司，避雷针和动产信用公司的时代，希腊神话也仍旧是适用的。

《资本论》第一卷以各种方式应用了神话人物和事件。第一种方式可以称之为“直用法”：普路托（或称普路同）象征财富；墨杜萨<sup>②</sup>所象征的东西太可怕了，没有幻想安慰自己是看也不敢看一眼的：

“德国和西欧大陆其他国家的社会统计，与英国相比是很贫乏的。然而它还是把帷幕稍稍揭开，使我们刚刚能够窥见幕内墨杜萨的头。如果我国各邦政府和议会象英国那样，定期指派委员会去调查经济状况……那末我们的情况就会使我们大吃一惊。”

“独眼巨人似的”用来生动地形容大机器；普罗米修斯总是一种高尚有益的原则的代表，被强大的暴政禁锢了一个时期：

“最后，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淮斯托斯的楔子把

---

① 阿泰纳奥斯（2世纪末至3世纪初），古希腊雄辩家和语法学家。——译注

② 墨杜萨，一译美杜莎，是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怪，被其目光触及者即化为石头。——译注



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sup>①</sup>

332

《资本论》第一卷中应用古典神话的第二种方式可以称为“倒用法”。我们经常看到，这似乎是马克思的“批判的”头脑的一种特有的产物。

“珀尔修斯<sup>②</sup>需要一顶隐身帽来追捕妖怪。我们却用隐身帽紧紧遮住眼睛和耳朵，以便有可能否认妖怪的存在。”<sup>③</sup>

在这里，珀尔修斯的神话被当作针对现代的不可取的态度的一個反形象，推动“事情向正确道路发展”的一种鼓励。这同最后一种应用神话的方式——讽刺法或滑稽模仿法——显然是有相关联的，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同在海涅和奥芬巴赫<sup>④</sup>的作品中一样常见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52—153，11，708页。另参阅海曼关于《资本论》第1卷中“隐喻神话”和“隐喻仪式”的评论：“如果工人是西绪福斯和普罗米修斯，资本就不仅是蛇发女怪和复仇女神，而且是一整套的超自然恐怖。它是一个‘只靠吸活的劳动为生的吸血鬼一般的’怪物；‘对劳动的活血象吸血鬼一样嗜血’……它‘对剩余劳动象狼人一样有食欲’。《资本论》中的机器是吃人魔王：‘一个庞大的机械怪物，它的躯体里充满了整座整座厂房，它的魔力先是由它的庞大肢体庄重而有节奏的运动掩盖着，然后在它的无数真正工作器官的疯狂的旋转中迸发出来’。关于机器的两页屡次谈到‘独眼巨人似的’，‘独眼巨人似的’，‘独眼巨人似的’，‘巨型的’，‘怪物’，‘重得连托尔也举不起来’，资本家是恶魔……什么都物化了，凝固了，石化了；商品是‘物化工时的确定总体’；‘货币是交换过程中必要物化形式’；……‘货币石化为贮藏’，等等。但是这种死的东西在马克思的童话世界中会觉醒过来，资本‘有了能够自己增殖的神秘性质。它带来活的子息，或者至少说，能生金蛋。’象《睡美人》中的王子一样，‘活的劳动必须抓住这些东西，使它们从沉睡中醒过来。’”（《缠结的组合》一书，第134—135页。）（引文中“独眼巨人似的”在原译文中作“庞大的”，作为一般形容词这样译本无不可，但在此处因涉及隐喻神话，故改为直译。——译注）

② 珀尔修斯，宙斯和达那厄的儿子，希腊神话中的大英雄之一。——译注

③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1页。

④ 雅克·奥芬巴赫（1819—1880），著名的法国作曲家，古典小歌剧的创始人之一。——译注

这种方式。例如，分工据说产生了（只需看一眼俄耳甫斯<sup>①</sup>的命运）“诗人的分散的肢体”（*disiecta membra poetae*），而在1866年口蹄疫大流行时英国土地所有者的叫嚷据说证明了“即使不是印度教徒也可以礼拜撒巴拉神牛，即使不是丘必特也可以变成牛。”<sup>②</sup>

马克思常常把他引用的古代世界诗歌中所描写和体现的那种态度拿来同十九世纪对比，倒不是作为仿效的模范，而是提醒我们十九世纪有它自己的相对的不人道之处。我们并不希望恢复到一个人的充分发展依靠对另一个人的奴役这种社会秩序中去，但是马克思问他同时代的人，在我们“自由的”人所组成的“基督徒”社会中，我们难道没有造成一种比古代的奴役更坏的奴役吗？

“西塞罗时代的希腊诗人安谛巴特洛斯<sup>③</sup>，曾歌颂碾谷的水磨这种一切生产机器的最初形式的发明，把它看作是女奴隶的解放者和黄金时代的复兴者！‘异教徒！噢，这些异教徒！’他们对政治经济学和基督教一窍不通，就象有学问的巴师夏和在他以前的更聪明的麦克库洛赫<sup>④</sup>在这方面所发现一样。例如，他们就不了解机器是延长工作日的最可靠的手段。他们也许会辩护说，一个人受奴役是使另一个人获得充分发展的手段。但是，要鼓吹群众受奴役，以便使少数粗野的或者没有多少教养的暴发户成为‘卓越的

333

① 俄耳甫斯，希腊神话中的著名歌手；他能以歌声使山林岩石移动，使野兽驯服。他的妻子被毒蛇咬死，心里悲痛，不再续娶。传说由于他不敬重酒神，后被酒神的迈那德妇女们杀害，把他尸身撕得粉碎。头随着海水漂至到斯波斯岛，这里后来成为古希腊抒情诗歌的故乡；四肢被埋在奥林帕斯山麓，后来那里的夜莺比任何地方都唱得动听。——译注

②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33页脚注（16）。

③ 安谛巴特洛斯（公元一世纪），古希腊诗人。——译注

④ 约翰·拉姆赛·麦克库洛赫（1789—1864），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嘉图经济学说的庸俗化者，资本主义制度的狂热辩护士。——译注



‘纺纱业主’、‘了不起的香肠制造业主’和‘有势力的鞋油商人’，那他们还缺少特殊的基督教才能”。<sup>①</sup>

马克思是从十八世纪一个德国贵族克利斯提安·冯·施托尔贝格<sup>②</sup>伯爵的译本中引用安蒂巴特洛斯的有关诗句的，这个译本是弗莱里格拉特给他找出来的。

这里不妨提一下，马克思引用安蒂巴特洛斯的诗句后来对威廉·莫里斯<sup>③</sup>鼓吹在英国实现社会主义起了一种关键性的作用。莫里斯不畏艰难地读了《资本论》：

“在参加了社会主义的组织以后……我自觉地要想了解了解社会主义的经济方面，甚至读了马克思的著作，不过我必须承认，我虽然很赞赏《资本论》的历史部分，但是在读这部巨著的纯经济学部分时，却感到头脑混乱。不过，我还是尽力读了它，并且希望，我读了以后有些知识能牢记不忘……”<sup>④</sup>

使威廉·莫里斯无疑地“牢记不忘”的一个知识就是安蒂巴特洛斯的那句诗，在他的那篇《财阀统治下的艺术》的论文中表明了这一点：

“那末，艺术一定有了问题，要不就是文明的屋子里的幸福生活出了毛病。是什么原因引起了这种毛病？你说是机器劳动？不

---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447—448页。（译文略有改动。——译注）

② 克利斯提安·冯·施托尔贝格（1748—1821），德国诗人和翻译家。——译注

③ 威廉·莫里斯（1834—1896），英国诗人，画家和社会活动家，80年代参加英国工人运动。——译注

④ 《威廉·莫里斯的政治著作》，A·L·莫顿编，第242页。

过,我读到过引用古代一位西西里诗人的诗句,对水力推磨的发明表示欢呼,对人力由此而从手推磨的苦役中解放出来表示高兴;所谓节省人力的机器的发明肯定是人类的一种自然的希望;没有问题,是自然的希望,因为虽然我说过,劳动包括艺术,应该同时带来享乐,但是没有人能否认,还有某种必要的劳动本身并不令人感到愉快,还有许多不必要的劳动简直是痛苦的。如果能用机器尽量减少这种劳动,即使用尽才智也一点不算浪费,但是事情就是这样吗?看看世界各地……”<sup>①</sup>

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令人欢迎的例子,说明《资本论》中引用文学作品能使那些不能自然地或容易地领会经济学公式或统计数字的人也能领会马克思的论点。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文学以两种相互有关的方式起了文献纪录的作用。与柏拉图、修昔的底斯、色诺芬、塞克斯都一恩披里柯<sup>②</sup>的引语一起,《奥德赛》被引用来说明古代世界分工情况的证据;安谛巴特洛斯被引用来说明当时特有的态度和希望。比较近代的作家的作品也可以起这种文献纪录的作用。小作家可能清楚地不自觉地暴露了那个崇拜(因而购买)他们作品的阶级的偏见、成见、世界观:例如,光是提一下马丁·塔波尔<sup>③</sup>牧师的名字就可以为马克思起一种代表维多利亚时代的假装虔诚的简明象征作用。<sup>④</sup>马克思好象直接继续《德意志意识形态》和《神圣家族》似的评论道,“现代资产阶级的平庸,从它的‘大思想家’的水平上就可

① 《威廉·莫里斯的政治著作》, A·L·莫顿编,第73页。

② 塞克斯都一恩披里柯(2世纪),古希腊怀疑论哲学家。——译注

③ 马丁·塔波尔(1810—1889),英国作家,马克思认为他是贪图微小成就的庸俗化身。——译注

④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69页。



以测量出来”。<sup>①</sup>中等的作家，或者文学上抱负不大的作家，有时可能直接反映了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们的困境，令人感动：马克思完全赞同地引用了彼埃尔·杜邦<sup>②</sup>的诗《工人》（1796）中的几行，这首诗详细反映了城市贫民的困苦。但是，伟大作家却不止如此：他们能够创造特殊的人物和事件，使我们看到或认出支配性格和社会行动的一般规律。“例如巴尔扎克曾对各色各样的贪婪作了透彻的研究。那个开始用积累商品的办法来贮藏货币的老高利贷者高布赛克<sup>③</sup>，在他笔下已经是一个老糊涂虫了。”<sup>④</sup>

335 有些作家有这样的才能，能够在他们的作品里表现简单化的社会关系模特儿，以此来说明我们在比较复杂的社会中所看不到事实。在这里，最主要的例子便是《鲁滨逊漂流记》，这部作品在《资本论》中受到的对待比在《大纲》的导言中似乎要好一些：

“既然政治经济学家喜欢鲁滨逊的故事，那末就先来看看孤岛上的鲁滨逊吧。不管他生来怎样简朴，他终究有一些需要要满足，因而要从事各种有用劳动，如做工具，制家具，养山羊，捕鱼，打猎等等。关于祈祷一类事情我们在这里就不谈了，因为我们的鲁滨逊从中得到快乐，他把这类活动当作休息。尽管他的生产职能有各种各样，但是他知道，这只是同一个鲁滨逊的不同的活动方式，因而只是人类劳动的不同方式。需要本身迫使他精确地分配自己执行各种职能的时间。在他全部活动中，这种或那种职能所占比重的大小，取决于他为取得预期效果所要克服的困难的大小。经验告诉他这些，而我们这位从破船上抢救出表、账簿、墨水和笔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566页。

② 彼埃尔·杜邦（1821—1870），法国诗人，作品在工人中广为流行。——译注

③ 高布赛克是巴尔扎克的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译注

④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46页，脚注（28a）。

的鲁滨逊，马上就作为一个道地的英国人开始记起账来。他的账本记载着他所有的各种使用物品，生产这些物品所必需的各种活动，最后还记载着他制造这种种一定量的产品耗费的劳动时间。鲁滨逊和构成他自己创造的财富的物之间的全部关系在这里是如此简单明了，甚至连麦·维尔特<sup>①</sup>先生用不着费什么脑筋也能了解。但是，决定价值的一切必要因素都包含在这里了。”<sup>②</sup>

因此，鲁滨逊漂流孤岛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代表“经济计划人员”，特别是十八世纪“道地的英国人”的性格典型。在一件东西的价值同所化劳动量成正比例而不受市场因素的影响的环境中，经济活动是怎样进行的，这个故事也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模特儿。<sup>③</sup>

怎样把这样一个模特儿用来构想一个与笛福所想象的完全不同的世界，用来设计一个社会乌托邦？马克思在几页以后又回到鲁滨逊怎样分配他们劳动和时间时，对此作了说明：

“最后，让我们换一个方面，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在那里，鲁滨逊的劳动的一切特点又重复一遍，不过不是在个人身上，而是在社会范围内重复。鲁滨逊的一切产品只是他个人劳动的结果，因而是他个人使用的物品。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物。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

---

① 麦克斯·维尔特(1822—1900)，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和政论家。

② 《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93—94页。(译文略有改动。——译注)

③ 参阅伊昂·瓦特利用马克思的见地来比马克思更加透彻地分析《鲁滨逊漂流记》的那篇卓越的论文：《鲁滨逊神话论》，载于《文艺评论》第1卷(1951年)，第95—119页。



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这个有关合体的生产组织本身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仅仅为了同商品生产进行对比，我们假定，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样，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劳动时间按一定的社会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这个联合体的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在那里，各个劳动者同他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sup>①</sup>

当然，这远远超过了笛福的范围；但是这个分析是笛福所引起的，而且由于他所提供的模特儿而更加清楚，更加容易理解了。

337 《资本论》第一卷中所以这样经常表明伟大作家能“预示”发生在他们之后的时代的现象，同他们有能力象上面所说的那样创造典型和模特儿。有关马克思在指出这种预示时常常用德文 schon（已经）这一词；例如马克思在谈到现代经济学家没有能力丢掉他们的过时概念和范畴时说：“而从另一方面说，堂吉诃德误认为游侠生活可以同任何社会经济形式并存，结果已经遭到了惩罚。”<sup>②</sup>同样，莎士比亚的道格培里<sup>③</sup>也预示了十九世纪政治经济学教授，当然不是很具体，但是用论辩的形式：“在这里，我们不禁想起我们的好朋友道格培里，他教导巡丁西可尔说：‘一个人长得漂亮是偶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95—96页。（译文略有改动。——译注）

② 同上书，第99页。（原译文没有“已经”两字，是本书译者后加的。——译注）

③ 道格培里是莎士比亚的《无事生非》中的人物，自大而愚蠢的官吏的化身。

——译注

然的运气，会写字念书才是天生的本领。”<sup>①</sup>因此马克思能够把他本人的时代的乡绅称为“英国的道格培里们”，因为他们用某种歪理来为他们苛待雇工进行辩解。《泰晤士报》刊载的艾德蒙·波特尔<sup>②</sup>的一封信使马克思想起了席勒的《阴谋与爱情》中宫廷侍卫长卡尔勃的几句话，而在屈莱顿<sup>③</sup>重写的《修女的牧师的故事》中，他发现了“预示”教友会派童工雇主的先身：

“狐狸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面孔，  
它不敢发誓，一味妖言惑众，  
它一双贼眼四处探索，佯作忏悔者的神情，  
它想破戒，不先祈祷一番，不成！”<sup>④</sup>

这同马克思赞许英国经济学家亨利·罗伊引用布瓦洛<sup>⑤</sup>《讽刺诗集》中一首诗来指出格莱斯顿 1863 年和 1864 年预算演说中的矛盾是一致的；同保尔·拉法格所说的马克思对巴尔札克的估价也是一致的。据保尔·拉法格说，他的岳父认为，巴尔扎克不仅是他自己所处时代的“历史家”，而且是那些在路易—菲力浦时代尚在胚胎状态而到巴尔扎克死后才充分发展起来的性格典型的先知创造者。<sup>⑥</sup>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 23 卷，第 100—101 页。（译文略有改动。——译注）

② 艾德蒙·波特尔，19 世纪英国工厂主和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论者。

③ 约翰·屈莱顿（1631—1700），王政复辟时期英国古典主义杰出的代表，英国文学批评的创始人。——译注

④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 23 卷，第 660、631、270（脚注 55）页。

⑤ 尼古拉斯·布瓦洛·戴斯帕莱奥（1636—1711），法国诗人与批评家，他模仿贺雷西和尤维纳利斯的笔法写成《讽刺诗集》（1666），抨击了当时社会和文学的缺点及癖好。——译注

⑥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 23 卷，第 716 页；《同时代人心目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第 20 页。



因此，大作家产生了典型、模特儿，预示了未来。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来说，他们的作品也是**类比**的宝库：

338 “因此，商品要实际上起交换价值的作用，就必须抛弃自己的自然形体，从只是想象的金变为实在的金，诚然，商品实现这种变体，同黑格尔的‘概念’实现由必然到自由的过渡相比，同龙虾脱壳相比，同教士圣热罗莫解脱原罪相比，是‘更为困难的’。商品除了有例如铁这种实在的形态以外，在我们想象中还可以有金的形态，但它不能同时既是实在的铁，又是实在的金。要规定商品的价格，只需要使想象的金同商品相等。但商品必须为金所代替，它才能对它的所有者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例如，铁的所有者遇见某种享乐商品的所有者，他向后者说铁的价格已经是货币形式了，后者就会象圣彼得在天堂听了但丁讲述信仰要义之后那样回答说：

“‘我们现在已经明白，  
这个铸币的重量成色，  
但是请告诉我，你的钱袋里有吗？’”

“价格形式包含着商品为取得货币而让渡的可能性和这种让渡的必要性。”<sup>①</sup>

对于但丁放在天堂守护神嘴里说的关于金钱的隐喻，马克思显然感到很好玩，通过他自己的类比，又应用到但丁当初所根据的世俗事情中去。但是但丁也提供了比较严肃的类比。在《炼狱》第五节

---

<sup>①</sup>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21—122页。（译文略有改动，又原译文诗句为：“这个铸币经过检验，重量成色完全合格，但告诉我，你钱袋里有吗？”——译注）

中,维吉尔告诉但丁继续向前,不要放慢步伐;维吉尔在诗中问道:“他们在这里窃窃私议,这对你有什么相干?跟着我走,让人们去说罢”:

“Vien retro a me, e lascia dir le genti.”

马克思没有维吉尔可以跟随,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的末尾,把这句话用在自己身上,不过作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改动:

“Segui il tuo corso, e lascia dir le genti”

(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sup>①</sup>

当然,最后,但丁《地狱篇》里的种种地狱恐怖是可以同现代世界的种种恐怖作类比的,只是后者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已。例如,维多利亚时代的火柴工厂,由于在没有任何防护设备的情况下处理磷而可能带来可怕疾病,是大大超过那位中世纪作家为自己和为读者所想象的任何情景的。“如果但丁还在,他一定会发现,他所想象的最残酷的地狱也赶不上这种制造业的情景。”<sup>②</sup>

339

古代作家所想象的地狱可以用来作为维多利亚时代现实情况的类比和说明。马克思在——列举政府《蓝皮书》中所泄露的情况时,插进了一句话,提到奥德赛游地狱,十分击中要害:

“一大群不同职业、年龄、性别的各色各样的工人,争先恐后地向我们拥来,简直比被杀者的鬼魂向奥德赛拥去还要厉害。即使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3页。

② 同上书,第275—276页。



不参考一下他们腋下夹着的蓝皮书，我们也可以一眼看出他们从事过度劳动的情况。现在让我们从这一大群人当中再挑出两种人来，一种是女时装工，一种是铁匠。这两种人的鲜明对照表明了在本钱面前人人平等。”<sup>①</sup>

在这一段文章中插入了一句讽刺地模仿基督教信仰的话（“在本钱面前人人平等”），使得马克思把维多利亚时代劳动条件同诗人想象的地狱所作的类比有了更进一步的意义。诗人所能给我们的，是刺激我们作出感情上的反应，同时向我们提出了一种标准，以此来衡量马克思想要在我们心中引起的恐怖情景。维多利亚时代的世界中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比被杀者的鬼魂“更加迫切地”挤进了马克思的想象之中；维多利亚时代的劳动条件“超过了”但丁所想象的地狱，也如马克思后来所说，这些条件“超过了我们的小说家的最可怕的幻想。”<sup>②</sup> 这里不妨提醒一下：马克思所列举的劳动条件恶劣超过小说家最可怕的幻想的行业，有伦敦的印刷厂。文学作为商品，文学作为书籍，能够象十九世纪社会的其他商品那样容易地奴役人和侮辱人。

“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很早就告诉读者说，“类比只能到此为止。”<sup>③</sup> 马克思对于类比的限度的这种体会，可能有助于说明，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和在其他地方为什么经常改动  
340 伟大作家所创造的人物，为了自己的目的而进行加工。例如，狄更斯要是还活着就会发现，在《资本论》第一卷和《福格特先生》<sup>④</sup> 中那个口若悬河的杀人犯，以他笔下的人物比耳·赛克斯<sup>⑤</sup> 名字出

① 《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83页。（译文略有改动。——译注）

② 同上书，第509页。

③ 同上书，第72页。

④ 同上书，第484页，和第14卷，第455页。

⑤ 比耳·赛克斯是狄更斯小说《奥列佛·特惠斯特》中的强盗。——译注

现，但是他却认不出来了。在海涅的作品上，马克思甚至走得更远：在改写了海涅的《新春》和《亨利希》中的诗句后，马克思开始用海涅的论战风格写下去，虽然讽刺地否认他是这样做的：“如果我有我的朋友亨·海涅那样的勇气，我就要把耶利米·边沁称为资产阶级愚蠢方面的一个天才。”<sup>①</sup>

但是，马克思这么处理边沁是为了要表明文学类比的用途而不是仅仅它的限度。他写道，“边沁在哲学家中的地位，就象马丁·塔波尔在诗人中的地位一样。他们两人只有在英国才能制造出来。”<sup>②</sup>这样就一举“识别了”边沁、塔波尔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制造业精神。自称为亨·克劳伦（即卡尔·海因，1771—1854）的德国哀情（骨子里是色情的）小说家也被引用来用于同一目的：

1836年的一个早晨，以经济学识和文体优美著称的纳骚·威·西尼耳，这位英国经济学家中相当于克劳伦的人，从牛津被召往曼彻斯特。他在牛津教授经济学，现在被召到那里去学习经济学（着重号系本书作者所用）。<sup>③</sup>

类比可以用于人，也可以用于时代：象“经济上的狂飙时期”或“生产过程的狂飙”这样的比喻，可能很容易地暗示，十八世纪文学界的动乱同十九世纪经济界的动乱有一定限度的相似。但是象往常那样，马克思应用类比，除了因为两者相似以外也同样为了两者的对照：

---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69页脚注（63）。（原译文下半句为“……我就要把耶利米·边沁先生称为资产阶级蠢才中的一个天才”。——译注）

② 同上书，第669页。

③ 同上书，第251页。（原译文最后一句为“……现在被召到这里来学习经济学”，其中“这里来”似应译为“那里去。”——译注）



“威廉·修昔的底斯·罗雪尔以真正的哥特谢德式的天才发现,如果说剩余价值,或者剩余产品的形成,在今天来说,是由于资本家的节俭的话,那么在较低的文明阶段,这是强者迫使弱者实行节约。”<sup>①</sup>

341 这里用了修昔的底斯的名字显然是为了用对照的方法帮助我们“识别”罗雪尔,而常常被马克思当作取笑对象的十八世纪文学理论家约翰·哥特谢德则是用来以类比的方法帮助我们识别罗雪尔的。

从情节剧、滑稽剧、大戏、以及其他戏剧娱乐节目中引用的熟见隐喻,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层出不穷,不过具体环境不同了,而且常常有了新的涵义。在《商品的流通》一章中,商品和货币在脱离了制造它们的人而异化后,演出了自己的一场戏,通过从《罗密欧和朱丽叶》中引用的一句话,甚至有了莎士比亚的味道:

“我们看到,商品爱货币,但是‘真正的爱情,所走的道路永远是崎岖多阻’……一个商品的总形态变化,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上,包含四个极和四个登场人物。最先,一个商品遇到了货币。……商品在第一阶段,即在出卖时,一身扮演两个角色。……现在每一个新资本最初仍然是作为货币出现在舞台上,也就是出现在市场上……。”<sup>②</sup>

<sup>①</sup>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44页脚注(30)。(原译文略有不同,“威廉·修昔的底斯·罗雪尔先生以真正的哥特谢德的天才发现,在今天,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形成,以及与此相联的积累,是由于资本家的‘节俭’,为此,资本家‘比如说,要求得到利息’,相反,‘在极低的文化阶段……是强者迫使弱者节俭’。”——译注)

<sup>②</sup>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26页(作者此处误记,“真正的爱情,所走的道路永远是崎岖多阻”这句话出处见《仲夏夜之梦》第一幕第一场。——译注);第130页(原译文为“……一个商品的总形态变化,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上,包括四个极和三个登场人物。最先,与商品对立着的是作为它的价值形态的货币。……商品在它的第一个转化中,即在出卖时,一身兼有这两种作用……”。——译注);第131、168页。



在全部三卷《资本论》中，我们都发现马克思把资本和地产人格化了，把它们变成了“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中的公民）。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sup>①</sup>因此有人不无理由地说，马克思把他的经济论文写成了一部悲剧，由资本老爷和集体工人演出，他在这里让世人读到了“现代最戏剧化的一部书。”<sup>②</sup>

我们不需要进一步说明，这种戏剧化的手法也能够以最最直接有力的方式，令人信服地证明马克思关于“物化”的论点，关于人的手脑的产物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存在于他面前的论点。

鉴于马克思所看到的十九世纪欧洲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演出的悲剧，任何田园诗式的想法不仅是不合实际的，而且是极其错误的。“大家知道，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但是在温和的政治经济学中，从来就是田园诗占统治地位。”或者，又是用更加讽刺的口吻说：

① 《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938页。

② 见R·C·塔克著《卡尔·马克思的哲学和神话》，第2版（剑桥，1972年），第204、215、221、226页。另参阅斯达得勒著《卡尔·马克思。思想和政治》，第2版（哥本根，1971年），第129页。马克思著作的戏剧性质，特别是《资本论》的戏剧性质，时常有人谈到。有些评论家说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情节剧（海曼在《缠结的组合》第146页上甚至提出了一个剧名：《取消劳动力抵押权》）；别的评论家则比较尊重，说是喜剧或悲剧：“马克思作为论辩家最拿手是……他揭露虔诚的抽象道理这种面具的时候，是他揭开这种面具，让人们看到面具下面的简单的不光彩的真相的时候。……他的方法是一种典型的喜剧方法。除了这种方法，还有他对思想统率人类事务的奇怪能力的认识。因此，他的历史分析有一种累积的、无情的逻辑和一种悲剧的性质。象俄狄浦斯一样，马克思所叙述的人类历史中的演员是受到无情的必然性支配的，不论他们做什么都无法阻挡这种必然性的发展。然而把他们同这个命运相连接的东西就是他们自己的悲剧式的盲目性，他们自己的*idées fixes*〔固定观念〕，使他们不能及时看到事实真相。在马克思对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中，我们看到了希腊戏剧的典型问题——愚昧无知同自我欺骗的关系，自我认识同自由的关系。”（弗兰克尔：《马克思思想的理论和实践》，载于《马克思和当代科学思想》，第31页。）



“掠夺教会地产，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用剥夺方法、用残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和克兰财产变为现代私有财产——这就是原始积累的各种田园诗式的方法。这些方法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合并，为城市工业造成了不受法律保护而无产阶级的必要供给。”<sup>①</sup>

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必要的背景，帮助我们了解马克思为什么常常表示不喜欢象盖斯纳<sup>②</sup>的田园诗和奥尔巴赫的乡村小说这种文学现象。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除了上述那些附带提到文学作品、类比、隐喻的情况之外，还有直接引用《圣经》、维吉尔、尤维纳利斯、<sup>③</sup>贺雷西的作品的話；直接引用莎士比亚《亨利四世》上篇的话（把快嘴桂嫂的怪话颠倒过来使用；这是马克思惯用的手法）；<sup>④</sup>直接引用莫尔<sup>⑤</sup>的《乌托邦》，巴特勒<sup>⑥</sup>的《胡迪布腊斯》和伏尔泰的《老实人》的话——而且通过暗喻，引用了恐怖故事（狼人和吸血鬼的形象！），德国的民间文学（特别是《福尔土纳特》）、流行歌谣、歌曲小调、传说、童话、神话、谚语。《资本论》第一卷中引用的最生动的散文大部分则是那些不是一般“文学”作家的作品。例如，马克思喜欢向他的读者介绍经济学家威廉·配第爵士<sup>⑦</sup>（1623—1687）的贴切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782、801页。

② 所罗门·盖斯纳（1730—1788），瑞士诗人和风景画家。——译注

③ 德齐姆斯·尤尼乌斯·尤维纳利斯（1世纪—127年以后），著名的罗马讽刺诗人。——译注

④ “商品的价值对象性不同于快嘴桂嫂，你不知对它怎么办。”（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1页。）参阅《亨利四世》，上篇，第三幕，第三场。

⑤ 托马斯·莫尔（1478—1535），英国人文主义作家，空想共产主义的早期代表之一。——译注

⑥ 塞缪尔·巴特勒（1612—1680），英国讽刺诗人。——译注

⑦ 威廉·配第（1623—1687），英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英国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译注

的隐喻和幽默的类比，《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篇以配第的开玩笑地用脑肥肠满形容货币的话来结束。<sup>①</sup>

但是，同时，马克思再一次表明，对于内容乏味、思想懒惰的“漂亮文章”他极其不信任。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他有时甚至还讽刺地模仿这种文章。<sup>②</sup> 他再一次抨击蒲鲁东模糊了比喻和现实的界线（马克思说，蒲鲁东把“劳动”商品看作是“语法上的省略”）<sup>③</sup>，而且一再经常表示，他不信任那些卖弄**文学**学识的经济学家：

“他们企图以卖弄文史学识或用无关材料的大杂烩来掩饰他们在科学上的无能为力的感觉，来掩饰他们不得不把自己也完全外行的一门学科教授别人时感到的心虚胆怯。”<sup>④</sup>

由于这个缘故，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于他认为“文学上有欠缺”的作品，在风格和阐述上有欠缺的作品，态度也许反而更宽厚一些；而对马考莱和后来的卡莱尔<sup>⑤</sup>这种博学的讲究文体的作家，评论起来则十分苛刻。<sup>⑥</sup>

---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66页。

② 例如同上书，第256页。

③ 同上书，第588页。

④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5页。（1873年第二版跋）。（此处译文有改动。——译注）

⑤ 托马斯·马考莱（1800—1859），英史家和作家。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英作家，著有《法兰西革命》。——译注

⑥ 同上书，第18—19页，303页脚注（120），285页脚注（90）。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考莱是个“苏格兰马屁精和爱说漂亮话的人”；在后来的一封信中，他同迪斯累里和瓦尔特·萨维奇·兰多尔一起，都是“天真的英国人”，打算宣传自己不打算实行的主张（1881年4月11日致恩格斯的信）。可以想象，伯克和兰克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也难免受到辱骂。（艾德蒙·伯克（1729—1797），爱尔兰出生的英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初期同情殖民地美国和爱尔兰天主教徒，后竭力反对法国大革命。——译注）



《资本论》第一卷使读者毫无怀疑地认为，凡是超过简单生理需要的一切需要都是由历史或社会条件决定的：

“由于一个国家的气候和其他自然特点不同，食物、衣服、取暖、居住等等自然需要也就不同。另一方面，所谓必不可少的需要〔notwendige Bedürfnisse〕的数量和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一样，本身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因此多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明阶段〔Kulturstufe〕，其中主要取决于自由工人阶级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从而它有哪些习惯和生活要求。”<sup>①</sup>

344 在“工作日”这重要的一章中，他又说：“工人必须有时间满足精神的和社会的需要，这种需要的范围和数量由文明发展总阶段所决定。”<sup>②</sup> 因此，在《资本论》第一卷的通篇著作中，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对世界名作家的作品的涉猎，放在他现在已经充分形成的、关于专属于人的劳动的见解上来加以观察：

“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于人的劳动。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想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他工作的材料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界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

---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94页。（译文略有改动。——译注）

② 同上书，第260页。（译文略有改动。——译注）

服从这个目的。但是这种服从不是孤立的行为。除了从事劳动的那些器官要用力之外，在整个劳动时间内还需要劳动者的意志始终与其目的一致——这表现为集中注意力。而且劳动的内容及其方式和方法越是不能吸引劳动者，劳动者越是不能把劳动当作他自己体力和智力的活动来享受，他的注意力就越是要紧张地集中。”<sup>①</sup>

伟大文学的创作和吸收，使得那些有足够的幸运条件能够从事文学的人尽情发挥他们的智力，这是大大超过动物力所能及的。而十九世纪工厂工人却被剥夺了这种享受和其他许多享受。

所有这一切同上文(见本书上文第 312 页)所已经阐明的“自由王国”概念是有明显关系的；这说明关于文学在社会中的作用、关于读者的要求与作家的反应之间的复杂关系，存在着许多问题，而马克思却一直没有时间来加以充分阐明，进行论辩或解答。但是，他使他的读者毫无疑问，他认为这种问题是重要的。在《资本论》中，他的最大的蔑视是留给英国的功利主义者的，因为后者认为，艺术批评是“有害的”，因为它妨碍正派人享受马丁·塔波尔的作品。<sup>②</sup>

345

《资本论》第一卷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读者表明，在现代社会中，有钱人的生活，从一种精神意义上来说，象穷苦人的生活一样容易退化堕落。“商品拜物教”把实行它的人一起拉了下去。在十九世纪的文明社会里，商品似乎具有了自己的生命和帝国，颁布了一个拉平价值的总法令：

---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 23 卷，第 202 页。(译文略有改动。——译注)

② 同上书，第 669 页，脚注(63)。



“商品所有者与商品不同的地方，主要在于：对商品来说，每个别的商品只是它本身的价值表现形式。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和昔尼克派，它随时准备不仅用自己的灵魂而且用自己的肉体去同任何别的商品交换，哪怕这个商品生得比马立托奈斯还丑。”<sup>①</sup>

毕竟，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马克思是怎样运用文学的，因此我们就不会觉得奇怪，马克思笔下的商品准备对具有理性、感情和人性需要的人实行控制，这个画像最后使人联想到《堂吉诃德》。

过去时代的伟大作家对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人类从他所看到的片面发展的跛子发展为一种新型的“全面的人”——远景，有他们要起的作用。他象席勒和荷尔德林<sup>②</sup>一样热切地希望这种“全面的人”的出现：

“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sup>③</sup>

但是，马克思认为，把这种想象化为现实，需要比席勒的“对人的美学教育”更加激烈的东西。文学可以帮助揭露旧秩序的缺陷，预示一个更美好、更完善的生活的到来；它可以用细致的方式改造人，使他们对社会变化有所准备；但是它并不是能使资本主义的耶利哥城墙闻声就倒塌的号角。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03页。（马立托奈斯是塞万提斯的小说《堂吉诃德》中的一个丑女人。——译注）

② 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1770—1843），德国诗人。——译注

③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535页；另参阅 I·费彻尔著《青年时代和老年时代的马克思》，载于《马克思和西方世界》，洛勃科维奇编（诺特尔—戴姆和伦敦，1967年），第38页。

尽管如此,我们已经作了充分说明,指出即使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心目中也是从来没有脱离美学考虑的。我们已经多次指出,在他谈到社会生产、分工、商品生产、“拜物教”、或者未来的“自由王国”时,这些美学上的考虑是始终存在的。<sup>①</sup>因此,《资本论》第一卷对于那些甘冒初读困难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有极大的魅力。他们在那里曾经找到过,而且仍能找到许多有趣的东西,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清楚地说明的**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不同;研究方法要求从事研究的人“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而叙述方法则是按逻辑和时间的次序来说明事情的发展,“材料的生命”是“观念地反映出来”的。<sup>②</sup>

关于马克思的经济著作在近年来所引起的方法学上的兴趣,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已在他的《马克思主义和形式》一书中作了令人极其难忘的叙述。詹姆逊认为马克思的经济研究是“内容通过本身内在的逻辑产生范畴,然后用这些范畴把自己组织成一个正式结构的方法的典范”,他这话指的显然是《资本论》第一卷的开头一章。因此,它作了“一个典型的示范表演,说明辩证思维是不断地产生和消亡思想范畴的过程。”正如马克思在这里表明的,可以认为辩证思维有“双重的历史性:不仅它所研究的现象是历史性的,而且它必须把用以了解这些现象的那些概念解冻,把后者的不变性解释为本身就是历史现象。”詹姆逊为了要说明阿多诺<sup>③</sup>、布洛

---

① 参阅泰瑞·伊格尔顿为米·里弗希兹编《卡尔·马克思的艺术哲学》所作的序言,第8页。

②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3页。另参阅台瑞尔·卡维尔著《卡尔·马克思方法论选读》第4—5页;和马丁·尼古拉斯给《大纲》所作的序言:“《大纲》和《资本论》第一卷在形式上的长处截然不同。后者是叙述方法的模范,前者是工作方法的记录”(第61页)。

③ 泰奥多尔·W·阿多诺(1903—1969),德国社会学家。——译注



赫<sup>①</sup>、本杰明和萨特<sup>②</sup>以不同方式从马克思的实践中所取得的教训,又说:“这说明为什么真正的辩证方法的批评总是必须包含对它自己的思想工具的评论,作为它自己工作方法的一部分。”<sup>③</sup>可以万无一失地假定,马克思要是看到有人在他的著作中寻找一种工作的方法,“一种在时间中运动的形式”,而不是“一种客观的、有系统的观念整体”<sup>④</sup>,他一定不会感到高兴的。但是,对于那些认为他的著作极有意义但是又不能完全同意他的社会和政治信念的人——这种人很多——来说,对于那些终于觉得马克思的重要性已达到不能让马克思主义者独家垄断的程度的人们来说,这是一种一定会引起他们兴趣的可能性。

---

① 厄恩斯特·布洛赫(1885—),出生在德国,1937年移居美国的哲学家,曾在哈佛、莱比锡,图林根等大学任教,著有《乌托邦精神》(1918)、《自然权利与人类尊严》(1902)、《论卡尔·马克思》(1968)等书。——译注

② 让-保尔·萨特(1905—),当代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译注

③ 见弗·詹姆逊:《马克思主义和形式。二十世纪文学的辩证理论》(普林斯顿,1971年),第335—336页。

④ 同上书,第362页。

## 第十三章

348

### 啃 书 本

“您厌恶的人……马丁·塔波尔

您喜爱的事……啃书本

您喜爱的诗人……莎士比亚、埃斯库罗斯、歌德

您喜爱的散文家……狄德罗”<sup>①</sup>

#### (1)

在《资本论》第一卷初版发行以后，马克思虽然努力要继续完成他为自己规定的那项庞大的理论著作任务，但是由于患病，这项工作经常中辍。不过，他固然很少出版什么东西，却继续读书，并且根据他所读的书做了笔记，<sup>②</sup>同全世界的朋友们和学者们通信，学习其他外语（主要是俄语），对历史性事件（俾斯麦的战争、巴黎公社）发表评论，对新兴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政党提供意见，为加强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团结和澄清他们的思想混乱而努力。他发现有许多政治斗争要进行——例如，反对拉萨尔的国家社会主义，反对巴枯宁及其追随者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他的声誉日隆；他虽然因为自己的著作得到重视而感到高兴，然而却十分怀

<sup>①</sup>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588页。

<sup>②</sup> “他的读书摘录填满了五十本左右的笔记本——几乎有三万页，都是密密麻麻地写的小字。他所阅读和收集的成吨材料，使恩格斯感到惊诧……”（鲁贝尔和马那尔，《没有神话成分的马克思。他的生平和著作的编年研究》，第287页）。



疑那些“嗜读”他的著作却不让这些著作影响他们生活的读者。他认为，他在许多钦佩《资本论》第一卷的俄国有文化教养的人中察觉到了这种品尝式的态度。他在1868年10月12日写给库格曼的信中说，“这是不折不扣的美食癖，和十八世纪一部分法国贵族的爱好一样。‘这不是为裁缝和鞋匠写的’——那时伏尔泰谈到自己的启蒙思想时这样说。这并不妨碍这些俄国人一旦做官就成为混蛋。”但是到1883年3月他死的时候，对于他的思想会对改造世界发生多大的影响，他一定也有所预感——虽然，我们希望，日后人们用他的思想来进行辩解的那些事情，他不是都有预感的。

1869年需要出版《雾月十八日》第二版的时候，马克思为此写了一篇新的序言，他在序言中把维克多·雨果的《小拿破仑》同他自己的路易·拿破仑的“画像”作了对比：

“维克多·雨果只是对政变的责任编辑作了一些尖刻的和俏皮的攻击。事变本身在他笔下却被描绘成了晴天的霹雳。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作用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而是写成伟人了。……相反，我则是说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sup>①</sup>

这里，无处不在的舞台形象又多了一个新的形象：拿破仑三世不是被看成是政变的作者，而是编辑。对于马克思在这里要想阐明的历史关系，很难想得出有一个更好的文学类比了。但是同时，马克

---

<sup>①</sup> 《马恩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599页。（原译文第一句把“编辑”译为“发动人”，本无不可，但下文有“作者”、“编辑”等文学类比，故仍改为直译。——译注）

思又再一次急于要强调类比有它的用途但也有它的限度：

“最后，我希望，我这部著作对于清除那种流行的——特别是现今在德国流行的——关于凯撒主义的陈词滥调，将会有所帮助。在作这种肤浅的历史类比时，人们忘记了最主要的一点，即在古代的罗马，阶级斗争只是在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内部进行，只是在自由富人与自由穷人之间进行，而从事生产的广大民众，即奴隶，则不过为这些斗士充当消极的柱脚。人们忘记了西斯蒙第<sup>①</sup>所说的一句中肯的评语：罗马的无产阶级依靠社会过活；现代社会则依靠无产阶级过活。由于古代阶级斗争同现代阶级斗争在物质经济条件方面有这样的根本区别，在由这种斗争所产生的政治人物之间，也就不能比坎特伯雷大主教与祭司长撒母耳<sup>②</sup>之间有更多的共同点了。”<sup>③</sup>

即使在西斯蒙第的帮助下这样来说明毫无限制地运用类比的危险，马克思也表明了类比的用途：为了说明古代罗马世界和现代法国之间的不同，举出了《圣经》中的一个人物和较近代的一个英国显贵之间的平行对比。这样，马克思稍为一顾那部既是伟大文学作品又是不可或缺的史料来源的《圣经》，就很恰当地结束了那篇序言，在那篇序言中他一再强调可以把“文学”一词应用于单纯美文学之外更加广泛的领域，这也是他自从《共产党宣言》以来所经常强调的： 350

---

① 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德·西斯蒙第(1773—1842)，瑞士经济学家，历史学家。——译注

② 撒母耳，圣经中的古犹太先知。——译注

③ 《马恩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599—600页。（译文略有改动。——译注）



“沙尔腊斯上校在他论 1815 年战役的著作<sup>①</sup>中，开始了对崇拜拿破仑偶像的攻击。从那时起，特别是在最近几年中，法国的出版物借助历史研究、批评、讽刺和诙谐等等武器彻底打破了关于拿破仑的奇谈。在法国境外，这个一反传统的民众信仰的激烈转变，这个巨大的精神革命，很少使人注意，更不大为人所理解。”（着重号系本书作者所用）。<sup>②</sup>

历史学家、各种各样的批评家、讽刺作家——他们现在都在马克思心目中的“法国文学”的巨厦宏邸中找到了一席之地。他在 1870 年致第一国际俄国支部的信中也作了同样的说明：他在信中赞扬俄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恩·弗列罗夫斯基<sup>③</sup>（即瓦·瓦·别尔维）的著作是“一个严肃的观察家、一个无畏的工作者、一个冷静的批评家、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尤其是一个对于任何奴役感到愤慨的人”的著作（着重号系本书作者所用）。<sup>④</sup>同样，马克思对威廉·配第爵士的《货币略论》表示高兴，他在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所写的一章中，称之为“按内容和形式说来，这是一部篇幅不大的杰作”<sup>⑤</sup>。

马克思在后期作品中从《圣经》《旧约》中借用了许多形象，其中有一个形象特别突出和重要。这里是一个早期的例子，出自他在

---

① 让·巴蒂斯特·阿道夫·沙尔腊斯(1810—1865)，法国军事和政治活动家，曾参加镇压 1848 年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后反对路易·波拿巴，1851 年 12 月 2 日政变后被驱逐出法国。此处指的是他于 1857 年写的《1815 年滑铁卢战役史》。——译注

② 《马恩选集》，中文版，第 1 卷，第 599 页。（法国的出版物原文为“French literature”，广义可指书籍、出版物，狭义指文学，下文似属后者。又见本书下文第 422 页阿尔诺德的话。——译注）

③ 瓦西里·瓦西里也维奇·别尔维（笔名恩·弗列罗夫斯基）(1829—1918)，俄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启蒙运动民主主义者，民粹派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作者。——译注

④ 《马恩论文艺》，里弗希兹编（柏林，1948 年），第 239 页。

⑤ 《马恩选集》，中文版，第 3 卷，第 273 页。

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的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宣布成立第一国际时发表的演说：

“资产阶级通过自己最著名的学者如尤尔博士<sup>①</sup>、西尼耳教授及其他同类聪明人的口预言，并且满意地证明：对于工时的任何立法限制都必然要为不列颠工业敲起丧钟；不列颠工业象吸血鬼一样，只有靠吮吸人血——并且也吮吸儿童的血——才能生存。古时杀害儿童是崇拜摩洛赫神的宗教的神秘仪式，但它只是在一些极隆重的场合下实行，大概一年不过一次；同时摩洛赫神并没有表示专爱吃穷人的儿童。”<sup>②</sup>

351

这里有两点值得一谈。第一点是，马克思怎样把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的形象和概念——吸血鬼和摩洛赫神的形象——溶合成怪诞的恐怖的一体；第二点是，他把《圣经》中的形象用在他自己的世界中的时候，总是小心地不但指出相似之处，也指出不同之处。凡是看到《圣经》中所记述的摩洛赫神崇拜而认为这是达到恐怖和残酷的顶峰的读者，听到马克思说，在开明的十九世纪，牛津大学的可敬的教授很可能愿意鼓励比摩洛赫的祭司和礼拜者所能想得出来的更加惨无人道的事情，并且为之辩护，更是要大为震惊的。

《旧约》中的许多其他形象，在马克思的晚年出现在他的脑际——以扫为了一碗红汤出卖了他长子的名分，这件事使人想到还没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正如遍体长着癞疮的约伯使人想到本人生疮长期不愈的马克思一样不可避免。他在1868年说自己“象约伯那样生着病，却没有约伯那样敬畏上帝。”引用了这句话的路·

<sup>①</sup> 安德鲁·尤尔(1778—1857)，英国化学家，庸俗经济学家，自由贸易派，写有许多工业经济学方面的著作。——译注

<sup>②</sup> 《马克思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132页。(译文略有改动。——译注)



赛·费厄尔<sup>①</sup>也谈到了马克思在晚年时对他的犹太祖先态度开始温和起来：他指出了马克思同犹太民族的伟大历史学家亨利希·格拉茨的诚挚关系，格拉茨是他在1877年在卡尔斯巴德碰到的，后来一直保持通信关系；他也提到马克思发现他的妻子和女儿爱琳娜打算去参加查理·布莱德洛<sup>②</sup>的全国世俗协会主持的“世俗”礼拜时感到不高兴。据说他对她们说，如果她们要满足精神上的需要，她们尽可以阅读犹太教的先知。<sup>③</sup>即使马克思的这些话是确实的，也不应该认为他是有“回到”犹太教去的任何意思。他从来没有收回过他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对“犹太人精神”所作的解释，也很少感到同犹太民族有什么血缘关系，虽然别人总是很快就在他身上发现有这种血缘关系。海因德曼<sup>④</sup>对马克思的印象，在这方面极有代表性：

“当然，马克思是个犹太人，在我看来，他似乎在他个人和气质中，以他的突出的前额和浓眉，他的锐利的炯炯目光，宽厚敏感的鼻子，活泼的嘴巴，周围一从未加修剪的头发和胡须，把他本民族的伟大先知的义愤同斯宾诺莎<sup>⑤</sup>和犹太博士的冷静分析能力结合起来。”<sup>⑥</sup>

① 路易斯·赛缪尔·费厄尔(1912—)，当代美国大学哲学教授，著有《斯宾诺莎与自由主义的兴起》(1958)、《科学知识分子》(1963)和《马克思和知识分子》(1969)，并编过一本《马克思恩格斯政治与哲学基本著作》。——译注

② 查理·布莱德洛(1833—1891)，英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派，《国民改革者》周刊的编辑，曾恶毒攻击马克思和国际工人协会。——译注

③ 路·赛·费厄尔：《马克思和知识分子。后期意识形态论文集》(纽约，1969年)，第49页，费厄尔引用麦克斯·皮尔和费里德里希·列斯纳为上述马克思关于犹太先知的话的根据；最初来源出自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

④ 亨利·迈尔斯·海因德曼(1842—1921)，英国律师和政论家，80年代为社会主义民主党人联盟创始人和卓越活动家之一，后为社会沙文主义者。——译注

⑤ 巴鲁赫·斯宾诺莎(1632—1677)，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译注

⑥ 海因德曼：《多事的一生的纪录》(伦敦，1911年)，第270—271页。

以赛亚·柏林<sup>①</sup>说得不错,马克思本人继续认为,犹太人问题是一个非现实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捏造出来掩盖更为迫切的问题的,就他本人而论,在他的早期论文中,他不仅压下了这个问题,而且捏死了这个问题。<sup>②</sup>

## (2)

根据以后的历史来看,马克思晚年最重要的作品无疑是他为第一国际写的以《法兰西内战》为题在1871年出版的三篇文章。这本书描述了普法战争的结局及其后果——“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个月之久的巴黎公社。”<sup>③</sup>马克思从公社中得出的教训,(这使他和恩格斯认为《共产党宣言》中所包含的某些办法“过时了”<sup>④</sup>)被列宁在准备和指导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时有意识地学来应用了。

《法兰西内战》从多方面来看都是《雾月十八日》的顶峰和继续;因此,毫不奇怪,我们在马克思初期著作中见到的占支配地位的文学形象后来又重新出现了。拿破仑三世的帝国的“残酷笑剧”,其“结局也会象它的开端一样,不过是一场可怜的模仿剧”;拿

353

---

① 以赛亚·柏林(1909—),英国哲学教授,曾在英牛津大学与美哈佛、芝加哥等大学任教,1974年起任英国科学院院长,著有《卡尔·马克思》(1939)、《历史的不可避免性》(1954)、《对自由的两种概念》(1959)、《四篇关于自由的论文》(1969)与《父与子》(1972)等作品。——译注

② 以·柏林:《卡尔·马克思。他的生平和环境》,第100页。马克思在致莱昂·菲利浦斯的两封信中提到了自己是犹太人:一封是1864年6月25日,他在说到《旧约》时讽刺地说到 unser Ahnenstolz〔我们的祖先〕;另一封是1864年11月29日,他称迪斯累里是 unser stammesgenosse〔我们的同种族人〕。

③ 《共产党宣言》1872年版序言(《马恩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229页)。

④ 同上书,第229页。



破仑本人作为一个“老朽不堪的小丑”出现，梯也尔作为笨拙先生或小丑出现；“其貌不扬的侏儒”梯也尔采用“冒牌英雄的口吻”；公社的比较宽大的措施对梯也尔是一出“讽刺剧”；正统派和奥尔良派，“一切旧制度的食尸鬼”“拙劣地模仿1789年，在Jeu de Paume<sup>①</sup>召开了幽灵会议”。<sup>②</sup>通过马克思给予乡绅们的统称属名“法国的所有布索那克”<sup>③</sup>使我们看到莫里哀；莎士比亚则通过“毕斯托尔军曹”（给加利费侯爵<sup>④</sup>的绰号），并且再一次通过夏洛克：

“使灾难达到顶点的，是普鲁士的夏洛克手持票据勒索供养他在法国土地上的五十万军队的粮饷，要求支付他的五十亿赔款以及过期补缴的5%的利息。”<sup>⑤</sup>

事实上，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初稿里还有夏洛克的出场——不过总是披着普鲁士人的外衣，总是要求还债，或者赔他一磅肉。<sup>⑥</sup>

马克思最瞧不起梯也尔——也就是海涅在谈到路易-菲力浦治下的法国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时曾经不无无情和尊敬地批评过的那个学者出身的政治家，但是《新莱茵报》却早在1848年就加以攻击了。现在，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通过一系列的文学上、戏剧上、修辞上和民间传说上的引喻，发泄了对梯也尔的仇恨：

① 网球厅，国民议会于1789年在这里通过了著名的决议。（恩格斯在1871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② 《马恩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339, 385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547页；《马恩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358, 385页。

③ 布索那克是莫里哀的喜剧《布索那克先生》中的主角，愚昧无知的土贵族典型。——译注

④ 加利费侯爵，加斯顿·亚历山大·奥克斯特（1830—1909），法国将军，普法战争时期任骑兵团团长，在色当被俘，后被放回参加反对公社的战争，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之一，曾任凡尔赛军队的骑兵旅旅长。——译注

⑤ 《马恩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362, 402, 362页。

⑥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599, 650页。

“他如同一个被允许扮演塔梅尔兰<sup>①</sup>角色的议会中的大拇指般的小人物一样，带着妄自尊大的虚荣，拒不承认那些反对他这个小人的尊严的叛乱者享有交战一方的权利，甚至不愿对伤兵救护守中立。再没有比伏尔泰就已预见过的这种可以暂时恣意发挥其老虎本能的猴子更可恶的了。”

接着又说：

“梯也尔鉴于4月30日的市镇选举在即，便于4月27日演出了一幕议和剧。他在国民议会讲坛上滔滔不绝地说了许多故作多情的漂亮话……”<sup>②</sup>

354

在马克思看来，梯也尔的生涯提供了一个可憎的例子，说明让一个资产阶级文人取得政权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梯也尔先生一向只不过是一个‘能干的’报人，一个巧鼓舌簧的‘辩客’……他好虚荣、喜猜疑、贪图享乐，从来没有写过和谈过正经事。在他看来，事物本身只是供他动笔杆耍嘴皮的因由……罗马历史学家们在描述尼禄的性格时，最后都以这个魔君自诩有吟歪诗、演喜剧的天才这一点作结语。但是若把一个象梯也尔那样的区区职业报人、议会小丑扶上台去，他一定会使尼禄相

<sup>①</sup> 塔梅尔兰，即帖木儿(1336—1405)，中亚细亚的统帅和征服者，统治毛厄兰纳赫尔、花刺子模和霍拉桑的帖木儿王朝(1370—1507)的创建者。“大拇指般的小人物”，原文为“大拇指托姆”，是一体高二英尺十一英寸的侏儒在马戏团的艺名。——译注

<sup>②</sup> 《马恩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370，389—390页。前一段引文是指伏尔泰的《老实人》，第22章，最后一段中法国被称为“ce pays où des singes agacent des tigres”〔一个猴子戏弄老虎的国家〕。



形见绌。”<sup>①</sup>

这一段文章取自马克思为巴黎公社报告所写的提纲初稿；二稿中他又说：“所谓文化成就只不过表现在精心讲究荒淫生活和……自私自利上。”<sup>②</sup>从这里开始，到《法兰西内战》定稿本中马克思对可以称之为“唯美”态度的令人难忘的谴责，就只有一步之差：这种“唯美”态度就是无聊的戏剧和小说所培养出来的、把别人的受苦看成是供观赏消遣的倾向。

“梯也尔先生的巴黎并不是‘贱民’的真正巴黎，而是幽灵的巴黎，francs-fileurs<sup>③</sup>的巴黎，闲逛男女的巴黎，富人的、资本家的、花花公子的、游手好闲者的巴黎。这个巴黎带着它的奴仆、骗子、文丐、荡妇目前正麇集在凡尔赛、圣丹尼、吕埃伊和圣热尔门；这个巴黎认为内战不过是惬意消遣，它从望远镜中欣赏战斗的进行，计算放炮的次数，用自己的以及自己娼妇的名誉赌咒发誓说，这里演的戏要比圣马丁门剧场中的好得多。被打死者真的被打死了，伤者的呼声也不是假装的，而且在他们面前演着的这场戏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sup>④</sup>

355 马克思把这里引人刺激的戏剧场面同十九世纪的历史主义结合起

---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巴黎公社》（莫斯科，1971年）第118—123页。（亦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552—558页。（克劳狄乌斯·尼罗（公元前42—纪元37）是罗马皇帝。）——译注）

②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627页。

③ francs-fileurs——直译是“自由逃亡者”，是给在巴黎被围时从城里逃出去的资产者起的嘲讽性绰号。francs-fileurs的读音与francs-tireurs（自由射手，即积极参加反普鲁士斗争的法国游击队员）相近，这就使这一绰号具有幽默性质。——译注

④ 《马恩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386页。

来，造成了——至少是加强了——一种丧失人性的可怕印象。唯美主义和野蛮主义手携着手。

读者想必已经注意到，马克思在这里描绘的“梯也尔先生的巴黎”这幅不客气的画面中，也包括“落拓不羁的文人逸士”。在马克思的心目中，不受资产阶级习俗的约束同革命政治完全是两码事；这些“文人逸士”同他在《法兰西内战》中称为中等阶级的“捉刀人”和“雇佣文丐”<sup>①</sup>这种公开的辩护士一样，必然维护当权势力的利益。他当时的许多通信中都充满了对这种“耍笔杆子的”的谴责，特别是那些为报纸写文章的。但是，《法兰西内战》指出的重要一点是，英法报纸偶然有正直的记者，毫无畏惧地，或者毫无偏袒地揭露了镇压公社的人或者有钱的巴黎人的麻木不仁，他们继续若无其事地寻欢作乐：

“要想找到与梯也尔和他那些嗜血豺狼的行为多少相象的东西，就必须回到苏拉和前后罗马三执政的时代去。<sup>②</sup>同样是冷酷无情地大批杀人；同样是不分男女老幼地屠杀；同样是拷打俘虏；同样是残酷迫害，不过这一次是迫害整个阶级；同样是野蛮地追究隐藏起来的领袖，使他们无一幸免；同样是纷纷告发政治仇敌和私敌；同样是任意摧残根本和斗争无关的人们。不同处只在于罗马人没有多管炮来整批整批地击毙俘虏，他们没有‘手持法律’，没有口喊‘文明’罢了。

---

① 《马恩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380页。

② 指公元前一世纪在古罗马的社会政治斗争尖锐化时期，在罗马奴隶主共和国发生危机的不同阶段上出现的血腥迫害和恐怖局面。苏拉（鲁齐乌斯·拜尔奈利乌斯·苏拉，公元前138—78）是罗马统帅和国务活动家，曾为执行官（公元前88）和独裁者（公元前82—79）。前后罗马三执政（公元前60—53年，公元前43—36年）是由三个最有威望的罗马军队统帅分掌政权的专政。前三执政是庞培、凯撒和革拉苏，后三执政是屋大维、安东尼和列庇都斯。——译注



“看了这一切惨象之后，现在再来看一看这个资产阶级文明由它自己的报刊所描写的另一面，更加丑恶的一面吧！”<sup>①</sup>

接着引述的“一家伦敦托利党报纸驻巴黎记者”的报道和“被公社查封的一家凡尔赛报纸《巴黎报》”的爱德华·爱尔威<sup>②</sup>的报道，使人对这两位记者的目光清晰和态度诚恳感到毫无疑义，虽然据马克思看来，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所揭露的残酷无情是属于他们所服务的阶级的，而不是属于全体人民的。对保守派报纸的正派记者这样附带一提的赞扬，可以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对英国工厂视察员和政府《蓝皮书》编写者所作的表扬相比，马克思对维多利亚时代资本主义的挞伐所根据的事实，大部分就来自这些《蓝皮书》。<sup>③</sup>

但是，总的来说，马克思对当时的新闻界的评价仍旧不高。他为了要说明同时代的政治家的智力水平，常常喜欢提到他们撰稿的、或有某种其他联系的报纸，他这么做绝没有恭维的意思。在《法兰西内战》中，俾斯麦就受到了这样的待迂。马克思在该书第三节中写道：

“只有俾斯麦那种除了策划铁血阴谋之外，经常喜欢从事最适合于他智力的旧业，即给《喧声》杂志（柏林的《笨拙》杂志）撰稿的人，才会异想天开，以为巴黎公社要仿效那种作为对1791年法国旧城市制度的拙劣模仿品的普鲁士城市制度，要仿效那种把城市管理机关贬为普鲁士国家警察机构附属轮子的城市制度。”<sup>④</sup>

① 《马恩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393页。

② 爱德华·爱尔威（1835—1899），法国政治家，《巴黎报》创办人之一和主编，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第二帝国崩溃后为奥尔良党人。——译注

③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2页。

④ 《马恩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377页。

当然,马克思本人曾经做了多年能干的记者,他从来没有忘记过在那方面取得的经验。上文已有述及,这些经验之中有一个就是,文学批评的手法可以用在从狭义上来说一点也不属于“文学的”文章上,而有切中要害的效果。他对新成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即《哥达纲领》的批判说明,他在1870年代仍在应用这个经验;他的批判中有不少关于“空话”、“陈旧的废话”、“信笔写来的空洞的废话”、“整个行文和内容都不妥当”(stilistisch und inhaltlich verfehlt)的谴责。<sup>①</sup>他叫拉萨尔的徒众去读一读歌德的《人类的局限性》中的一句诗,指出拉萨尔的话是抄袭来的,这就使拉萨尔丢丑:“大家知道,在‘铁的工资规律’中,除了歌德的‘永恒的、铁的、伟大的规律’中抄来的‘铁的’这个词以外,没有一样东西是拉萨尔的。”<sup>②</sup>马克思在分析《哥达纲领》的缺点时,也讽刺地使用一般只用来讨论希腊悲剧结构时才用的专业术语:“前一句[first strophe]是从国际章程的导言中抄来的,但是经过了‘修订’……作为一种补偿,后一句[antistrophe]却纯粹引用了拉萨尔的话。”这里,“舞文弄墨”、剽窃抄袭、力不胜任这种种意思都加在一起,说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实在不怎么样。但是,不能认为马克思的批判是纯消极性的或破坏性的,因为他时常以《哥达纲领》中的提法作为他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对策的出发点。在探讨劳动、社会、文化的关系的一节,尤其是如此,因此,这一节对于文学在马克思时代的社会中起什么作用,是有它的意义的:

① 《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7—29页。

② 同上书,第27页。在1882年4月6日给燕妮·龙格的信中,马克思又追溯歌德的诗句出诸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歌德和拉萨尔都用了形容词“ebern”,它的字面意思是“铜制的”,“铜一样的”。)



“‘劳动只有作为社会的劳动’，或者换个说法，‘只有在社会里或通过社会’，‘才能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

“这个论点无可争辩地是正确的，因为孤立的劳动（假定它的物质条件是具备的）虽能创造使用价值，但它既不能创造财富，也不能创造文化。

“但是另一论点也是同样无可争辩的：

“‘随着劳动的社会性的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劳动之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劳动者方面的贫穷和愚昧、非劳动者方面的财富和文化也发展起来。’

“这是到现时为止的全部历史的规律。因此，不应当泛泛地谈论‘劳动’和‘社会’，而应当在这里清楚地证明，在现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最终创造了物质的和其他的条件，使工人能够并且不得不铲除这个历史祸害。”<sup>①</sup>

这里的含义显然是，必须改变社会组织，使文学和文化生活中的其他表现形式都成为人人能够享受的东西，而不仅仅是有闲阶级所能享受的东西<sup>②</sup>。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在重申了这一信条以后，又一次提到《旧约》中的先知，以此来结束全文，可谓恰到好处。他用拉丁文引《以西结书》第三章第十九节：Dixi et salvavi animam meam——“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这句

358

<sup>①</sup>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7页。

<sup>②</sup> 在《哥达纲领批判》最著名的一段文章中，马克思怀着寄托于来世的心情，展望一个未来的共产主义国家，人人都能得到全面的发展，劳动，不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不仅成了谋生的手段，而且成了头等的需要：“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恩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12页。）

格言可以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末尾改写但丁的话放在一起：Segui il tuo corso, e lascia dir le genti——“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吧！”

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中还有一句金玉良言，可以说是总结了马克思从早年开始一直到临终在语言方面批评他的对手的主要精神。Meinte man das, so mußte es gesagt werden——“如果就是这个意思，那就应当明说。”<sup>①</sup>这句格言仍然有效，即使马克思自己并不是总能遵守的。

### (3)

马克思在晚年的其他论战著作中继续满意地从世界伟大作家的军火库中借用弹药。在对《人民国家报》（1872年8月7日）读者介绍格莱斯顿的演讲时，他称之为“繁文缛礼局文体”，并且向不熟悉狄更斯的《小杜丽》的读者解释“繁文缛礼局”的意思是 Um-die-Sache-herumschreibungsbüro。<sup>②</sup>德国工厂主联盟的先生们曾经非难他的材料的可靠性和精确性，因此被他指责为闯进天使们也不敢践踏的地方；用的不是蒲伯的话（因为他们不可能知道），而是用席勒的话（他的诗，他们在上学的时候一定读到过了）：

“智者看不见的东西，  
却瞒不过童稚天真的心灵。”

---

① 《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4页。（原译文为“如果指的就是这点，那就应当加以说明”。——译注）

② 同上书，第18卷，第126页。（德语，意即“办事拖拉的官僚机构”。——译注）



359 马克思用一个文字游戏来结束他的反击。这个文字游戏对那些（在一家以席勒的《钟之歌》中的钟的名字《协和》为名的杂志中）向他挑战的工厂主是一个最后的侮辱：“那个向至少同《协和》一样可敬的对手说了‘Asinus manebis in secula seculorum’（‘你永远永远是一头驴子’）这句有份量的话的人，卖的是什么货色，叫的是什么名字？”因此他这就是重申，这些德国工厂主自以为抓住了他引证的错误，“但是要鉴别文字货色，他们却一窍不通，就象驴子弹琴一样。”<sup>①</sup>

马克思后来在与巴枯宁发生的一次比较严重的论争中，又一次借助于莎士比亚，用了福斯塔夫说的慎重是勇敢的最大要素的话，勾划了巴枯宁。他并且把商福<sup>②</sup>的一句名言颠倒过来（“给宫廷和平，对茅屋宣战”），揭露巴枯宁的徒众的逻辑；对涅恰也夫<sup>③</sup>的《革命问答》嗤之以鼻，称它的作者是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席勒的《强盗》、夏尔·安特尔和弗烈德里克·勒美特尔的一个剧本中的各色人物的集成：

“批评这种杰作就是掩饰它的滑稽性质。这样也就是过分地看重这个异想天开地要把鲁道夫、基度山、卡尔·穆尔<sup>④</sup>和罗伯

① 《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101，127页。马克思在《莱茵报》为了同样目的已经引用过席勒的诗《信仰的话》（见本书上文第37页）。（原译文为“什么人在什么文章中向对手——按其地位说来至少和《协和》相当——说过下面这句有份量的话：‘Asinus manebis in secula seculorum’。——译注）

② 赛巴斯蒂昂·商福（1740—1794），法国作家，著有《年轻的印第安人》（1764）、《莫里哀颂》（1766）、《格言和思想，人物和轶事》（1830）等作品。——译注

③ 谢尔盖·涅恰也夫（1847—1882），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拥护者，1869年在莫斯科成立密谋组织“人民惩治会”，1872年被瑞士当局引渡给俄国政府，死于彼得—保罗要塞。——译注

④ 鲁道夫是《巴黎的秘密》中的主人公。卡尔·穆尔是席勒的戏剧《强盗》中的主人公。——译注

尔·马凯尔的形象集于一身的无定形的破坏一切的人……”<sup>①</sup>

因此，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法国和德国的作家们帮助马克思表达了他对一个俄国恐怖分子的基本特点的认识，就是这个恐怖分子的恶行劣迹为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恶魔》提供了一些素材。在这些年代中对马克思论战起了帮助作用的其他作家有笛福（他的《一个骑兵的回忆录》提示了法国和德国的民族心理思想）；<sup>②</sup> 海涅（他的一针见血的新造词儿“孔夫子”被马克思用来描绘经济学家麦克劳德）；<sup>③</sup> 还有萨尔蒂科夫—谢德林，他称资本家和富农是“社会新栋梁”——马克思在他收藏的谢德林的著作中划出了这个词儿，用在致尼·弗·丹尼尔逊和维·查苏利奇等俄国人的信中。<sup>④</sup> 他在用这一词儿的时候，心中想的可能是易卜生；读者想必记得，他的女儿爱琳娜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最早提倡易卜生的人之一。

360

刚才提到的同巴枯宁的论战之所以引人注目，是由于仅此一次，马克思似乎对席勒的一部作品提出了直接的批评：他谈到了《强盗》中的主人公卡尔·穆尔的性格“离奇”。<sup>⑤</sup> 当然，马克思曾经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529, 452, 471, 476页。

② 1869年8月10日致恩格斯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341页。

③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279页。（“孔夫子”在德文中是“混乱”的谐音。亨利·麦克劳德（1821—1902），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发展了所谓信贷创造资本的理论。——译注）

④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431, 474页。另参见高尔曼等著《卡尔·马克思传》，第751页。（萨尔蒂科夫—谢德林（1826—1889）是著名的俄国讽刺作家，革命民主主义者。尼·弗·丹尼尔逊（1844—1918）是俄国经济学著作家，80至90年代民粹派思想家之一，曾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2、3卷译成俄文。维拉·查苏利奇（1851—1919）是俄国民粹运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积极活动家，后来转到孟什维克立场。——译注）

⑤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447页。“Ein Komplott gegen die Internationale Arbeiter-Assoziation”（一场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阴谋）。



多次表示，他不喜欢席勒受到欢迎的那种情况——学童们对《强盗》百读不厌；金克尔按席勒的模子过着那样的生活；卢格喜欢席勒而不喜欢莎士比亚，因为席勒的哲学体系容易看出来；拉萨尔把戏剧人物放进传声筒里来鼓吹他自己的观点，或者鼓吹他自己对Zeitgeist(时代精神)的看法；弗莱里格拉特用席勒的《酒神颂》的韵律写了一首拙劣的诗来纪念席勒；自由派文人把席勒百年纪念当作自吹自捧的机会；商人们一边引用席勒的高尚诗句，一边继续大声叫卖。<sup>①</sup>他喜欢取笑那些崇拜席勒的小市民，用讽刺的口气引用席勒关于“孩子气精神”的诗句，那种精神主张实行理性的眼睛连看也看不到的东西。有一次他还引用了《欢乐颂》中诗人要拥抱整个世界的诗句。在其他地方，他也喜欢从《欢乐颂》中引用辞句，有意来造成一种反高潮；例如他把下面常常引用的诗句

“不论谁为了达到  
找到一个朋友的最高目标……”

361 作为引喻放在一个句子中，取笑费里克斯·皮阿<sup>②</sup>找微不足道、无藉之名的德国盟友来支持他的政治见解和野心：“皮阿终于达到了他的最高目标[Pyat ist der grosse Wurf gelungen]。他找到了他的德国人——从巴拉丁纳特来的维贝尔先生。”但是，从1842年他

---

<sup>①</sup>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356，478，581—586，477页；第18卷，第101页。

<sup>②</sup> 费里克斯·皮阿(1810—1889)，法国政论家、剧作家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1849年起侨居瑞士，比利时和英国；反对独立的工人运动；有许多年利用在伦敦的法国人支部诽谤马克思和国际；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1880年大赦后回到法国，1880年9—11月出版《公社报》。——译注

用赞同的口吻引用《论纯朴的和感伤的诗》中的一段文章开始，到1870年他根据《还愿匾》里的一首诗赞扬席勒是小市民作风的一个“权威裁判”<sup>①</sup>为止，马克思使他的读者深信不疑，他尊重席勒这个伟大的作家，即使他个人的爱好偏向于歌德和（特别是）莎士比亚，即使他认为，模仿席勒的风气——das Schillern——把十九世纪德国剧作家引导到了邪路上去了。

马克思晚年继续进行大量阅读，其中大部分并不是狭义的“文学”作品；但是必须注意到，他用尽各种方法使他的文学兴趣和科学历史兴趣结合起来。在他读了摩尔根<sup>②</sup>的《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伦敦，1877年版）所作的笔记中，他用荷马和埃斯库罗斯作为史料来源，考核或者证实摩尔根的研究结果；《人种学笔记》中有进一步研究原始社会结构的纪录，我们可以一次又一次地看到马克思读书是采取了一种批判的态度的，文学帮助他“识别”他所研究的那些作家。例如，读了亨利·梅恩爵士<sup>③</sup>的《早期制度史讲座》，他作了下面的笔记（除了一处指示代名词以外，全部是用英文写的）：

“那末，如果，（一个很好的‘如果’，如果仅仅依靠梅恩自己的‘大胆的说法’）那末，（这个‘那末’是俾克史涅夫<sup>④</sup>式的），在任何

---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7页；第33卷，第6页（1870年7月20日致恩格斯的信）。

②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1818—1881），杰出的美国学者，民族志学家，考古学家和原始社会史学家，自发的唯物主义者。——译注

③ 亨利·梅恩（1822—1888），英国法学家和法学史家，积极参加制定英国的地方立法和实行对印度的殖民奴役。——译注

④ 俾克史涅夫是狄更斯《马丁·朱述尔维特》中的建筑师与狡黠的伪君子，已成为英国特殊类型的资产阶级伪善与假仁假义的化身。——译注



早期的时候〔梅恩把他的‘家长制’罗马家庭搬到了开元混沌〕已婚妇女除了印度人以外还有**完全脱离丈夫控制的财产**〔那就是说‘脱离’梅恩的‘大胆的说法’〕，这就不容易举出理由来说明为什么**家庭专制的义务**〔这是头脑死板的约翰牛读到原来的‘专制’一词时喜欢用的一个主要学说〕在这个具体义务方面是松弛的。”<sup>①</sup>

362 狄更斯的俾克史涅夫闯入这些笔记中，这不是第一次——边沁的“最大数目的最大幸福”就引起了“哦，你这个俾克史涅夫（O du Pecksniff!）的惊叹，这对边沁和梅恩都适用。从约翰·拉伯克<sup>②</sup>爵士那里抄录的一段关于澳大利亚土著的伦理的记述：

**“惩罚量受到严格限制，如果对一个人进行矛刺，不论是由于疏忽或任何其他原因，超过公认的限度——例如，伤及大腿动脉——本人就要受到惩罚。”**

这句话使人想起了莎士比亚：“夏洛克事件”。拉伯克关于婆罗门的习俗（把神像用锁链栓起来，目的是为了要使香客捐钱来解救）的记述，使马克思在笔记中写道：“试比较《堂吉珂德》第二卷第二十三章，堂吉珂德在蒙德西诺斯地洞里一节。”这些笔记也表明了马克思对许多伟大文学人物的一种我们可以称为侧面观察的看法。正如斯威夫特（他的作品马克思是仔细阅读和研究的，这从他一直保有的斯威夫特全集中他所划的线和写的边注可以证明）主要是因为爱尔兰问题上的立场而进入他的视界一样，爱德蒙·斯宾

---

① 方括号、圆括号、着重体都是马克思原来用的。——译注

② 约翰·拉伯克（1834—1913），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主义者，以动物学方面的著作而闻名，民族志学家和考古学家，金融和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译注

塞<sup>①</sup>和约翰·戴维斯爵士对他来说并不是脍炙人口的诗歌的作者,而是压迫政策的可鄙工具:

“那个可恶的约翰·戴维斯爵士是国王詹姆斯的爱尔兰检察长,当然,为了这个职位,选了一个再也合适不过的恶棍——象伊丽莎白的拍马屁诗人斯宾塞(《爱尔兰国》)一样的一个‘没有偏见’和没有私心的家伙。他治疗爱尔兰弊病的药方是使用大批军队去‘践踏所有站在他们前面的人,把那个国家的所有倔强的人都踩倒在地。’不仅要在夏季,而且也要在冬季作战;他继续说:‘收场会很快’,他确凿地描写了他在‘最近闵斯特战争中’所亲眼看到的情况,如此等等。欲知这个诗人的其他野蛮言论,请看哈佛蒂〔即哈佛蒂著《爱尔兰古代和现代史》(都柏林,1860年版)〕。”<sup>②</sup>

最后,这些人种学和政治学的研究经常引用古代神话和古代文学,下面对《伊利亚特》中一段讲话的评语,是最详尽的例子,但是绝不是唯一的例子: 363

“奥德赛在这里并不是讲述统治的形式,而是要求服从战争中的最高统帅。对于在特洛伊城下仅仅作为军队出现的希腊人来说,人民大会是进行得十分民主的。阿喀琉斯在说到赠品,即说到分配战利品时,他总是认为应该由‘亚该亚人的儿子们’即人民来分配,而不是由阿伽门农或其他某个巴赛勒斯来分配。‘宙斯所生

<sup>①</sup> 爱德蒙·斯宾塞(1552—1599),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诗人,倾心于哲学上的唯心主义流派——新柏拉图主义。著有《牧人日历》、《仙后》、《爱情小诗》等。——译注

<sup>②</sup> 《卡尔·马克思的人种学笔记》, L·克拉德尔编(亚森,1972年版),第324,351,305页。马克思在斯威夫特、笛福、科贝特等人的著作上划线和边注一事,见布·凯撒和艾·维尔汉著:《马克思恩格斯藏书。一个书库的收藏经过和全部目录》(柏林,1967年)。



的’，‘宙斯所养的’这一类称号，不能证明任何东西，因为每个氏族都起源于一个神，而部落首长的氏族则起源于一个‘更显赫’的神，在这里就是起源于宙斯。甚至非自由民，如牧猪人欧迈俄斯以及其他的人，都是‘神的’（dioi和theioi），这是在《奥德赛》中所描述的情形，即在比《伊利亚特》晚得多的时期中发生的情形；在这本《奥德赛》中，‘英雄’的称号还给予传令官穆利俄斯和盲人歌手得摩多科斯。简言之，希腊著作家用来表示荷马所说的王权的 basileia〔巴赛勒斯〕一词（因为这一权力的主要特征是军事的统率），在同时存在议事会和人民大会的情况下，其意不过是军事民主制而已。”<sup>①</sup>

在这一方面值得记住的是，老年时代的马克思仍旧发现古典神话对他讨论现代世界是有用的，有意义的。他把“大闹天官”的法国巴黎公社社员同德国的“天国奴隶们”作对比，这使人想起了他在早年把普罗米修斯同埃斯库罗斯诗中的赫耳墨斯作的对比：他在1871年4月12日给库格曼的信中说，“就让人们把这些冲天的巴黎人同……举行陈腐化妆舞会的那些德意志普鲁士神圣罗马帝国的天国奴隶们比较一下吧。”<sup>②</sup>

但是，当马克思放下他的人种学研究，来调查一下别人在十九世纪最后四分之一年代里怎样利用神话的时候，他自认大吃一惊。恩格斯引用了马克思在1882年春季写的一封信，马克思在这封信中指出瓦格纳的《尼贝龙的指环》任意滥用日耳曼神话：

“‘谁曾听说哥哥抱着妹妹做新娘？’瓦格纳的这些‘色情之

<sup>①</sup> 引文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恩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102—103页。

<sup>②</sup>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207页。

神’，完全以现代方式，用一些血亲婚配的事情使自己的风流勾当更加耸人听闻；马克思对此回答道：‘在原始时代，姊妹曾经是妻子，而这是合乎道德的。’”<sup>①</sup>

因此，马克思发现老的神话被滥用了，但是他也发现他自己的时代并没有产生新的“神话”。在对瓦格纳提出抗议以前十一年，即1871年7月27日，他写信给库格曼说：

“直到现在人们都认为，罗马帝国时代之所以可能创造基督教神话，仅仅是由于还没有发明印刷术。恰恰相反。顷刻之间就可以把自己的发明传遍全世界的报刊和电讯，在一天当中所制造的神话（而资产阶级蠢驴还相信和传播它），比以前一个世纪之内所能制造的还要多。”<sup>②</sup>

不用说，在马克思看来，象这样的说谎的神话，比他在荷马和埃斯库罗斯的著作中所找到的神话短命；不可能由此爆发新的史诗和戏剧的光辉。

马克思除了《人种学笔记》外，在晚年也作了一些其他笔记，说明他继续努力要把他的文学体会同他的历史方面和政治方面的

---

<sup>①</sup>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48页脚注①。马克思提到瓦格纳的时候总是不友好的。他在威廉·皮佩尔向他介绍了“未来的音乐”以后写信给恩格斯说：“这是一种可怕的东西，能够造成对未来及其诗歌和音乐的恐惧。”（1856年2月12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11页）。他在晚年了解到了瓦格纳、毕洛夫、李斯特、科济玛的关系后，既感到吃惊又觉得好玩：“真是想不出比这个小家庭及其相互之间的宗法关系更合适的奥芬巴赫歌剧脚本了。这个小家庭的趣事也可以用类似尼贝龙根的四部曲来表现。”（1876年8、9月间致燕妮·龙格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4卷，第181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33卷，第258页。



研究结合起来。例如,在关于J·R·格林<sup>①</sup>的《英国民族史》的笔记中,马克思企图澄清十四世纪英国的阶级感情,他把朗兰德的《农夫皮尔斯的申诉》<sup>②</sup>同他觉得比较“有宫廷气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作对比;在他读施洛塞尔<sup>③</sup>的《世界史》后所作的摘录中,他再一次想处理政治史和文化史的无连贯性和不均衡性:“在这个野蛮的、不平静的时代,意大利文化〔开放了〕最优美的花朵(即但丁、哲学家基多·卡瓦尔康提,等等)。”<sup>④</sup>在别的地方,文学为他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类比材料。例如,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前的一封信中,马克思要想表达他对蒲鲁东关于财产的著作的性质和重要性的看法,他就不仅从文学史并且从德国哲学中找对比:

“他〔蒲鲁东〕的第一部著作《什么是财产》无疑是他最好的著作。这一著作如果不是由于内容新颖,至少是由于论述旧东西的那种新的和大胆的风格而起了划时代的作用……蒲鲁东在他那部著作中对圣西门和傅立叶的关系,大致就象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关系一样……在政治经济学的严格的科学历史中,这本书几乎是不值得一提的。但是这种耸人听闻的著作在科学中也象在小说文学中一样起着自己的作用……”<sup>⑤</sup>

在《法兰西内战》的初稿中,马克思把一心为公、不计报酬的巴黎公

① 约翰·理查·格林(1837—1883),英国历史学家,在著作中着重社会变化——译注

② 《农夫皮尔斯的申诉》是英国威廉·朗兰德(1332—1377)写的反封建的讽寓诗——译注

③ 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施洛塞尔(1776—1861),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自由党人,德国历史编纂学中海得尔堡学派领袖。——译注

④ 《马恩论文艺》,(柏林,1967年),第380,355页。基多·卡瓦尔康提(1250—1300),意大利哲学家与诗人,但丁的亲密朋友,著有《爱情诗歌集》。——译注

⑤ 1865年1月24日致约·巴·施韦泽的信——《马恩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140—141页。(约翰·巴普提斯特·施韦泽(1833—1875)是德国拉萨尔派著名代表人物之一,支持俾斯麦所奉行的在普鲁士霸权下“自上”统一德国的政策,本是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1867—1871),1872年被开除出联合会。——译注)

社的工作人员比喻为把《失乐园》只卖了五英镑的密尔顿。<sup>①</sup>这种类比反过来也有。翻译错误的历史用地质学错误的历史来说明(见本书下文第387页)。古生物学用来说明思想史。<sup>②</sup>从生理学家那里学来的一个术语——退化变态——用来说明他对从狄德罗到黑格尔到茹尔·让南<sup>③</sup>的欧洲思想史的看法。<sup>④</sup>结晶学上的一个名词假晶,用来代表那些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模仿非本阶级的思想作风和方式的作家。<sup>⑤</sup>

马克思谈到《什么是财产》时说,“在蒲鲁东的这一著作中,风格方面还算强健的肌肉组织占优势——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而且我认为这种风格是这一著作的主要优点。”<sup>⑥</sup>不用说,这并不是纯粹的恭维;但是马克思在这封给约·巴·施韦泽的信中继续用几乎逐字逐句都可以用在自己身上的话来说明他钦佩蒲鲁东的地方:

366

“向经济学中‘最神圣的东西’进攻的挑战性的勇气,用来嘲笑庸俗的资产阶级理性的机智的怪论,致命的批判,刻薄的讽刺,对现存制度的丑恶不时流露出来的深刻而真实的激愤,革命的真诚……”<sup>⑦</sup>

除此之外,马克思又加上了他认为在蒲鲁东的“诉诸感情的”著作

---

① 《马恩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415页。

② 1868年3月25日致恩格斯的信——《马恩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366页。

③ 茹尔·让南(1804—1874),法国作家,批评家和新闻工作者。——译注

④ 1869年4月15日致恩格斯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284页。

⑤ 《世俗纪事》,1878年——《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68页。

⑥⑦ 1865年1月24日致约·巴·施韦泽的信——《马恩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140—141页。



中缺少的东西：以认真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对社会和政治经济学进行一番考察。他希望通过不断的专心的研究，能够作出“在纯科学性的政治经济学史”中值得一提的贡献（而不是象蒲鲁东的贡献那样！）。他说了这话以后，心中又马上出现了一个文学类比。

“但是，这种耸人听闻的著作〔即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在科学中也象在小说文学中一样起着自己的作用。以马尔萨斯的著作《人口论》为例。初出版时，它不过是一种‘耸人听闻的小册子’，此外，从头至尾都是剽窃。然而，这本诋毁人类的诽谤书曾留下了多么强烈的印象呵！”<sup>①</sup>（着重体系本书作者所用）

在实践中就象在理论上一样，马克思从来没有把历史分割开来过——小说的发展和经济思想的发展提供了互相补充说明的类比。

如果说，在蒲鲁东的初期作品中，马克思认为有不少令人钦佩的地方，那么蒲鲁东的后期著作，不论在文笔或内容上，他认为都是拙劣得无法补救的：

“文笔往往如法国人所说的那样，是夸张的。凡是失去了高卢人的敏锐智慧的地方，冒充德国哲学风格的那种傲慢的思辨的胡言乱语就表现出来了。自矜自夸的、自吹自擂的、大言不惭的语调，特别是极其无聊地胡扯‘科学’和错误地以‘科学’自夸，这类东西真是刺耳极了。充满了他的第一部著作的真实的热情，在这里，在某些地方都已经系统地被虚浮的狂热所代替了。此外，这是自

---

<sup>①</sup> 1865年1月24日致约·巴·施韦泽的信——《马恩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140—141页。（原译文最后两句疑有误，按本书英文引文应译为“初出版时，它不过是一本‘轰动一时的小册子’，并且从头至尾遭到剽窃。然而这部‘讽刺人类的著作’证明是多么有刺激作用呵！”——译注）

学者炫耀自己学问的极为笨拙而令人生厌的伎俩。这个自学者对自己的独创思想的那种天生自豪感已经被挫伤，他作为科学的暴发户，觉得必须以自己所没有的身份和东西来炫耀一番。”

在马克思的心目中，后期的蒲鲁东由于他的喜欢空话、市侩式的想象、可笑的狂言乱语、虚荣心、卖“科学的”假药、政治上的妥协，已经成了他的国家和时代的一个典型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象历史学家劳麦一样，这个小资产者是由‘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构成的。他在自己的经济利益上是如此，因而在自己的宗教观点、科学观点和艺术观点上也是如此。他在自己的道德上是如此，在一切事情上都是如此。”

马克思在这次再度抨击《贫困的哲学》的文章中最后说，“也许后人在评论法国历史中最近这一阶段时会说，路易·拿破仑是这一阶段的拿破仑，而蒲鲁东是这一阶段的卢梭兼伏尔泰。”<sup>①</sup>

马克思关于蒲鲁东的评语说明，后期的马克思在分析经济文章中应用了他的文学方面和风格方面的知识，而他关于他所敬仰的小说家的评语则说明，他们在他们著作中寻找能够说明人在经济方面的行为和动机的材料。他在1868年12月14日的一封信中，抄了巴尔扎克的《乡村教士》中的一段话，要求恩格斯根据他自身在实际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来证实或者加深巴尔扎克在这部小说中所表明的那些支配他同时代人的行为动机的东西。<sup>②</sup> 保尔·拉法格告诉我们，巴尔扎克的《不为人知的杰作》使马克思印

① 《马恩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148页。

② 戴麦兹，《马克思，恩格斯和诗人》，第168—169页。



象很深，因为这部作品有一部分描写了他自己的感情。这证明马克思也用文学来说明自己的内心生活的。<sup>①</sup>

368 关于蒲鲁东的这封信已经说明，马克思在晚年一直是意识到风格的重要性的——尤其是清晰的、有力的、精确的表达的重要性。他读德国报纸时常常对他读到的东西感到大吃一惊。<sup>②</sup>他同自己的非德文著作的翻译者打交道的经验，也使他不能恢复他对同时代德国人用本国语言优美地、准确地写作的信心。他在许多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英文著作中碰到的一些“假哲学和假科学的行话”，他同样强烈地感到憎恶：“它妙就妙在使读者莫测高深，使读者绞尽脑汁，最后才得出一个使人放心的结论：这些吓人的话所包藏的不过是一些口头禅而已。”<sup>③</sup>这句话引自他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他在1860年代重读了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感到一种接近于愁伤的发现：

“重读了你的这一著作，我惋惜地感到，我们渐渐老了。这本书写得多么清新、热情和富于大胆的预料，丝毫没有学术上和科学上的疑虑！连认为明天或后天就会亲眼看到历史结果的那种幻想，也给了整个作品以热情和乐观的色彩，与此相比，后来的‘灰色而又灰色’就显得令人极不愉快。”<sup>④</sup>

---

① 《卡尔·马克思：他的生平和著作。保尔·拉法格和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回忆录》（纽约，1943年版），第16页。

② 见1862年4月28日致恩格斯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230页。

③ 1868年5月23日致恩格斯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90页。

④ 1863年4月9日致恩格斯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339页。  
“灰色而又灰色”（Gray in Gray）是引自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导言中的一句名言：“如果哲学描绘的是灰色而又灰色的画面，那么生活中的人物只能变得苍老，这种灰色而又灰色不能使他变得年轻，只能使他识知。敏内瓦尔的鸟只是在蒙眬暮色开始时才开始飞翔。”（参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1961年商务印书馆，第14页。——译注）

因此，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第一卷的时候，强调他自己著作的文学和艺术一面，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不论他的著作有什么缺点，他在1865年7月31日写信给恩格斯时说，“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sup>①</sup> 文章的风格、整个结构内各个部分的比例，都是经过缜密考虑和再三加工的，时刻以“艺术考虑”为念。虽然，这种考虑始终是要配合真理的追求的。他有时感到，在他的难于处理的题材所许可的范围内，要尽力追求优美和通俗的形式，这种努力用在德国读者身上是白白浪费了，因为他们对一本书的评价往往是根据它的容量，而不是根据内容的重量和结构的动人。他意识到，他由于患病而不能如愿地给《资本论》第一卷应有的润饰，但是他在1866年2月20日又是给恩格斯的信中说：

369

“亲爱的朋友，你明白，在象我这样的著作中，细节上的缺点是难免的。但是结构、整个的内部联系，是德国科学和学术的辉煌成就，这是单个的德国人完全可以承认的，因为这决不是他的功绩，而是全民族的功绩。”<sup>②</sup>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1873年1月24日）中，马克思承认他的著作有“修辞上的缺点”，但是自豪地指出英国和俄国的书评赞许他生动的文笔以及他在处理最困难和最深奥的问题时的从容自如，引人入胜。<sup>③</sup> 他也不厌其烦地向他的读者解释，他的叙述方法怎么样和为什么一定不同于他的研究方法：

---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135页。

② 同上书，第135，185页。

③ 《马恩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210页。



“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sup>①</sup>

在这篇跋的一段著名文章中，马克思也解释了他为什么仍旧认为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应该使用黑格尔的用语：

“将近三十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但是，正当我写《资本论》第一卷时，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模仿者们，却已高兴地象莱辛时代大胆的莫泽斯·门德尔森<sup>②</sup>对待斯宾诺莎那样对待黑格尔，即把他当作一条‘死狗’了。因此，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sup>③</sup>

这一段文章显示了马克思很重视叙述的方法和适当的表达，他使用形象方法作为表达思想和进行论辩的手段（“内核”和“外壳”、“倒立着的”东西要“把它倒过来”）；他有意“卖弄”黑格尔的用语；

---

① 《马恩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217页。

② 莫泽斯·门德尔森（1729—1786），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译注

③ 《马恩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217—218页。

最后还必须加上，他对过去时代的某些作家和思想家成见极深。莱辛的确在1780年7月7日对弗·亨·雅科比<sup>①</sup>说过，他们的同时代的人说起斯宾诺莎来往往把他“当作一条死狗”；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证明，他把门德尔森也包括在这一范畴之内。事实上，莱辛很明白，虽然门德尔森认为斯宾诺莎的哲学在许多方面都是错误的，他却尽力说明，斯宾诺莎的哲学对他所钦佩的莱布尼茨的哲学是有影响的，而且莱辛也知道，门德尔森对斯宾诺莎的为人是始终赞扬的<sup>②</sup>。但是莫泽斯·门德尔森是马克思心目中的“俗物”之一；因此，他对门德尔森的意见有先入的成见，而且对他的贬低只能说是不公平的。

#### (4)

由于这么多的朋友虽有见识却丝毫没有正确有力的表达能力，马克思格外觉得有必要提高所谓“文学”修养。例如，卡尔·济贝尔<sup>③</sup>为了在德国推广马克思的著作做了不少工作，但是轮到他自己下笔时却仿佛神志昏迷了一般。马克思在1865年8月5日致恩格斯的信中问道，“你对于济贝尔的爱国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诗歌创作有什么看法？所有这些废话似乎都是在大醉之后晕头转向的情况下写出来的。这纯粹是无稽之谈，它使我们这个朋友从

371

① 弗里德里希·亨利希·雅科比(1743—1819)，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译注  
②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和1870年6月27日致库格曼的信中(《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672页)已对门德尔森提出同样的指责。另参阅A·阿特曼，《莫泽斯·门德尔森论莱布尼茨和斯宾诺莎》，载于《理性主义，犹太教和宇宙神教。里昂·鲁斯纪念文集》，R·卢威编(伦敦，1966年)，第13—45页。  
③ 卡尔·济贝尔(1836—1868)，德国诗人，恩格斯的远亲。——译注  
④ 《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138页。  
⑤ 西吉兹蒙德·路德维希·波克罕(1825—1885)，德国政论家，民主主义者，曾参加1848—1849年革命，后来流亡瑞士和英国。——译注



马克思推崇他是一个有才华的人，谈风甚健，思想活泼，但是认为他的写作却条理不清、完全没有情趣和技巧：“他象野人一样，以为用种种惹人注目的色彩把自己的脸刺上花纹就美化了自己的脸。”<sup>①</sup>同时，马克思对美文学仍象以前一样不信任。《反杜林论》中他写的一章对经济学著作中的“美文学的蠢话”（belletristische Mätzchen）表示厌恶，他称亚历山大·赫尔岑是个“俄国美文学家”，上下文的语气使人毫无怀疑，他认为赫尔岑是不屑一提的。<sup>②</sup>他用同样的口吻认为勒南<sup>③</sup>的《耶稣传》“不过是一部小说，充满了泛神论的神秘主义的幻想”，并且用 Poesie〔诗〕这个字作为谎话的委婉的同义语。<sup>④</sup>他在1867年7月20日写信给弗莱里格拉特时说，“我是不读德国的美文学垃圾的”；他在同时期给恩格斯的信中也使人很少怀疑，在他的心目中，弗莱里格拉特自己的诗也属于同一垃圾堆。

“我宁愿做一只小猫，向人发出喵喵的叫声；  
我可不愿做这种吟风弄月的卖唱者！”<sup>⑤</sup>

他在1870年8月22日给恩格斯的一封信愤慨地责备弗莱里格拉特的

---

① 1867年10月11日致路·库格曼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561页。

② 见《反杜林论》——《马恩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270页，1877年致《祖国纪事》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26页。

③ 厄内斯特·约瑟夫·勒南（1823—1892），法国宗教史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以早期基督教史方面的著作闻名。——译注

④ 1864年1月20日和1869年5月14日致恩格斯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381页，第32卷，第299页。（后一信原译文查不到“诗”字，疑译为“愚蠢文章”。——译注）

⑤ 见《莎士比亚全集》（5），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62页。

信中引用了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上篇》中的这两句诗。<sup>①</sup> 还有其他许多文人,本来是至少赞同他的一部分意见和主张的,可是在他晚年也引起了他的怀疑和忿怒,例如:那个“凯特贝尼<sup>②</sup>,他是一个妄自尊大、头脑不清、令人讨厌的文学界浪人”,或者著名的社会民主党人爱德华·拉斯克尔<sup>③</sup>,他写了一本小说,马克思甚至连读也没有一读就说是一部“懦弱心灵的奥德赛。”<sup>④</sup> 对于波特莱尔所描绘的和自封为马克思的弟子的瓦尔特·本杰明后来所称颂的那种浪人型的文人,马克思的不信任和憎恨,不下于他厌恶“波希米式”的文人,对于后者,他现在找到了一个有力的但是无法翻译的名称 Lumpenliteratenpack〔流氓文人〕。<sup>⑤</sup>

马克思在1864年12月10日写信给恩格斯说,“但是在同英国工人打交道时,合理的东西很容易被接受,而只要是文人、资产者或半文人[Literaten, Bürger oder Halbliteraten]一参加到运动中来,就必须特别小心。”<sup>⑥</sup> 一个月以后,他自己承认对拉萨尔派的报纸《社会民主党人报》专辟供工人诗人投稿的栏中刊载的东西感到吃惊;他称之为 beliebiger Knotenblödsinn,没有无产阶级觉悟或革命热情的人写的老一套无聊的东西。<sup>⑦</sup> 因此,工人阶级出身并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555页,第33卷,第50页。

② 卡尔·马利阿·凯特贝尼(1824—1882)(真姓邦凯特),匈牙利文学家,资产阶级自由派,曾与1848—1849年革命的活动家保持联系。——译注

③ 爱德华·拉斯克尔(1829—1884),德国政治活动家,支持俾斯麦政策的民族自由党创建人和领袖之一,1867年起为国会议员。——译注

④ 1868年10月26日致路·库格曼的信和1876年8月19日致恩格斯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561页,第34卷,第26页。

⑤ 1867年4月13日致恩格斯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290页。

⑥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41页。

⑦ 1865年1月30日致恩格斯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50页。马克思怀疑刊载这些吹捧拉萨尔的诗是与索菲娅·哈茨费尔特直接或间接有关的。(索菲娅·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1805—1881)是拉萨尔的朋友和拥护者。)



不能使文人不堕落，特别是如果他们以写作为职业。马克思在1870年代末期写信给弗·阿·左尔格<sup>①</sup>说，“工人本身如果象莫斯特<sup>②</sup>先生那帮人一样放弃劳动而成为职业文人，他们就会不断制造‘理论上的’灾难，并且随时准备加入所谓‘有学问的’阶层中的糊涂虫行列。”<sup>③</sup>

373 马克思在同海尔维格和弗莱里格拉特打交道的经验中才惨痛地认识到，诗人出身的党员是靠不住的。的确，弗莱里格拉特在1860年2月28日的一封尊严的信中，对他说明了这一点。弗莱里格拉特说，“党是个囚笼；甚至为了党歌唱，在笼外歌唱也比在笼里歌唱好。”<sup>④</sup>但是，如果由此认为，后期的马克思要使文学成为公开的宣传工具，那就错了。他对弗莱里格拉特感到生气，是因为后者在1859年席勒百年纪念活动中同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及其一伙搞在一起，是因为弗莱里格拉特拒绝在他同卡尔·福格特的争吵中公开支持他。但是他对弗莱里格拉特后来的诗歌所提出的批评是批评后者诗中空洞的吹嘘（Pomp und Schall），“席勒化”，透不过气来的家庭气氛，1870年以后的爱国叫嚷（特别是《乌拉，日耳曼尼亚》一首诗）以及缺乏幽默感。他们在他们俩人关系恶化以后写信给弗莱里格拉特说，“要是你把你这个非洲陛下在私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幽默放到你的艺术中去，那末我相信，你对幽默体裁也会

---

① 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左尔格（1828—1906），德国共产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美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译注

② 约翰·莫斯特（1846—1906），德国无政府主义者，19世纪60年代参加工人运动，1878年颁布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以后流亡英国；1880年作为无政府主义者被开除出社会民主党，1882年侨居美国，继续进行无政府主义的宣传。——译注

③ 引自大卫·麦克莱兰的《卡尔·马克思。他的生平和思想》，第435页。（《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34卷，第281页。——译注）

④ 参阅戴麦兹著《马克思，恩格斯和诗人》第92—101页。

做出贡献的。”<sup>①</sup>对于那种明显讨好读者的文学作品，马克思始终和恩格斯一样不信任。

马克思也没有要求文学成为社会历史情况的直接的立即的反映。他在1860年代后期寄给恩格斯一本霍夫曼的幻想故事《小察赫斯》和一些工厂报告；<sup>②</sup>他还送了一本给库格曼一家；<sup>③</sup>他在晚年爱读的其他作品有巴尔扎克的《不为人知的杰作》和《改邪归正的梅莫特》。他在1867年2月25日写信给恩格斯说，“我建议你读一读……《不为人知的杰作》和《改邪归正的梅莫特》。这两本小杰作充满了值得玩味的讽刺。”<sup>④</sup>他对这种作品深有体会，是由于个人原因（他本人不是象《不为人知的杰作》中的主人公那样受到驱使要再三推敲他那部名垂史册的主要作品吗？），<sup>⑤</sup>也因为他感到这种作品有力地体现了当时的重要问题。霍夫曼的《小察赫斯》是世界文学中所能找到的最适当的异化象征，它讲的是一个畸形的侏儒，由于某种有力的符咒，凡是别人所做的一切好事，所说的一切好话，都归诸于他了。而巴尔扎克的《梅莫特》则不无理由地被称为是“对‘甚至圣灵在股票交易所也有行情’的一个完全世

---

① 1859年11月3日和1870年9月2日致恩格斯的信；1871年1月21日致齐格弗里特·迈耶尔的信；1850年1月10日（应为1851年12月27日——译注）致弗莱里格拉特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477页；第33卷，第52,177页；第27卷，第620页。（最后一段引语原译文为“无论什么时候，如果你想要把你这个非洲陛下在私生活中所特有的幽默变成艺术形式，那末我相信，你采用这种体裁也会获得成功的。”疑不确，改译如上。——译注）

② 1866年2月20日致恩格斯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183页。

③ 《摩尔和将军。回忆马克思和恩格斯》，第316页。

④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280页。

⑤ 参阅《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谈话》，第307、559页；戴麦兹上引书，第169—170页。



俗化的社会的现状，作了一个极妙的讽刺。”<sup>①</sup>但是正如上面引述的致恩格斯的信所表明，马克思不仅喜爱这种故事的表面和内在的主题，并且也喜爱这种故事的调子——特别喜爱作家叙述故事时所用的讽刺口吻。

马克思继续强调，一个作家的意图和他的成就是两码事。他在1879年4月告诉马克西姆·柯瓦列夫斯基<sup>②</sup>说：“对一个著作家来说，把某个作者实际上提供的东西和只是他自认为提供的东西区分开来，是十分必要的。这甚至对哲学体系也是适用的。”<sup>③</sup>

自从早年写的关于普斯特库亨朗诵歌德作品的诗起，尤其是在1859年席勒百年纪念期间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及其一伙闹出丑剧后，马克思一直把对伟大文学的了解作为判断一个人的思想和精神水平的试金石。他在1864年4月19日的一封信中告诉恩格斯说，他在伦敦《艺文》杂志上看到“卡尔·布林德<sup>④</sup>先生参加了莎士比亚委员会”不觉大吃一惊；因为他很了解这个自由主义的

① 伊·麦斯札罗斯著《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第33页。另参阅J·斯莫尔克斯蒂斯的《卡尔·马克思》，第93—94页：“可以想象，他〔在《改邪归正的梅莫特》中〕看到了资产阶级不顾人类基本价值标准疯狂地积累财富而必遭覆灭命运的预言。巴尔扎克在提到法国资产阶级社会是‘1815年以来一直受到挣钱发财精神而不是荣誉原则推动的一种文明’时，似乎是暗示了这一点。也可能马克思对这位作家成功地把当代社会精神同浮士德主题思想的变异形式结合起来，深有印象，而浮士德的主题思想是他从学生时代起就一直很感入迷的。最后，马克思不会不注意到，这个故事是用种种现象的辩证的对比手法表现出来的；例如力量和虚弱、理想和愤世、感情和理智——这种写作方法显然是合他心意的。”斯莫尔克斯蒂斯认为《改邪归正的梅莫特》作为浮士德传奇的一种变异形式符合马克思的心意，这个论点已为人们所广泛接受。

② 马克西姆·柯瓦列夫斯基(1851—1916)，俄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法学家。——译注

③ 1879年4月致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柯瓦列夫斯基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4卷，第343页。

④ 卡尔·布林德(1826—1907)，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50年代是在伦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首领之一，后来是民族自由党人。——译注

流亡者,他认为可以说“这个家伙对莎士比亚一窍不通。”<sup>①</sup>这话也同样适用于罗德里希·贝奈狄克斯<sup>②</sup>那个多产的喜剧作家:“假如他和他这类人懂得莎士比亚的话,他们怎么能够鼓起勇气把自己的‘作品’公之于众呢?”<sup>③</sup>个人的情况是这样,整个时代的情况也是这样。1869年4月间,马克思寄给恩格斯一本他最喜爱的作品,狄德罗的“无与伦比的杰作”《拉摩的侄儿》。他在附信中抄了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关于这部关于“正直的灵魂”和“分裂的意识”发生冲突的经典作品所说的话,然后添上了几句对茹尔·让南关于同一作品的解释的评论。

“让南对狄德罗的《拉摩》里缺少道德的结论感到不满,因此他就按照自己的发现来修改这本著作,他发现这个侄子的一切颠倒都是他因自己不是‘世袭贵族’而产生的苦恼引起的。他在这种基础上堆砌起来的科采布<sup>④</sup>式的劣作,现在正在象上演传奇剧似地出现于伦敦。从狄德罗到茹尔·让南的道路正是生理学者称作退化的变态的道路。这就是法国革命前和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的法兰西精神!”<sup>⑤</sup>

375

在这一段话中,特别有启发性的一点是,马克思否定在伟大的文学作品中寻找直接表示的“寓意”,“教训‘意义’”;他用生理学上的一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384页。

② 罗德里希·贝奈狄克斯(1811—1873),德国作家和剧作家,1845年是爱北斐特剧院的院长。——译注

③ 1873年12月11日致恩格斯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109页。

④ 奥古斯特·科采布(1761—1819),德国反动作家和政论家。——译注

⑤ 1869年4月15日致恩格斯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284页。(原译把“这个侄子”误译为“拉摩”;又“道德的结论”似以译为“寓意”或“教训”为宜。——译注)



个名词来说明文学史上的一种现象；他在晚年继续尊重黑格尔（尽管他偶而对黑格尔的文风和思想方法开开玩笑）；还有他企图把作家看作是他们的民族和时代的精神——Geist——的代表。<sup>①</sup>这最后一种努力使马克思有了一种新的观点来看他的一贯讨厌的俗物沙多勃利昂。1873年11月30日致恩格斯的一封信表明，他正在读圣贝夫<sup>②</sup>关于沙多勃利昂的一本书（《沙多勃利昂及其帝国时期文学团体》〔巴黎，1860年版〕）。他说起沙多勃利昂是“这个作家我一向是讨厌的，”又继续说：

“如果这个人在法国这样有名，那只是因为他在各方面都是法国式虚荣的最典型的化身，这种虚荣不是穿着十八世纪轻佻的服装，而是换上了浪漫的外衣，用新创的辞藻来加以炫耀；虚伪的深奥，拜占庭式的夸张，感情的卖弄，色彩的变幻，文字的雕琢，矫揉造作，妄自尊大，总之，无论在形式上或在内容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谎言的大杂烩。”<sup>③</sup>

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之间，甚至虚荣的质量看来也退步了。马克思在晚年不论往什么地方看，都发现很少有东西可以使他轻易相信趣味有什么提高；他显然认为，资本主义秩序导致了欧洲文化生活的“退化的变态”。我们读到他最后几封给恩格斯的信中有一封信谈到，“那个满口空话的博登施泰特<sup>④</sup>和浓装艳抹的美学家弗里德里希·费舍是威廉一世的贺雷西和维吉尔。”<sup>⑤</sup>

① 马克思在他的一篇《纽约每日论坛报》文章中求助于但丁和马基雅弗利来了解加里波第的“意大利天才”。（《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199页。）

② 沙尔·奥古斯坦·圣贝夫（1804—1869），法国批评家和作家。——译注

③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102页。

④ 弗·博登施泰特（1819—1892），德国诗人，政治家和翻译家。——译注

⑤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5卷，第52页；该信日期是1882年3月8日，实际上是该年4月8日写的。（原译文为“跳康康舞的英雄博登施泰特和臭不可闻的美学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费舍……”——译注）

马克思的信继续充满了这些几乎不招自来就出现在他脑海的文学掌故。有一次因为没有如愿地及时回信而感到内疚，就使他想起了路德的《席间演说》中的一则寓言。查理·布莱德洛“歪曲”了他的看法，使他想起但丁《神曲》《天堂篇》第十七歌中卡西亚基达的悲叹：人们在流亡中不得不与“坏人”为伍；而穿着橡皮保护衣的人在恩吉安浴场吸硫磺治疗，似乎是在演出“但丁《地狱》中的无罪的场面”。他喜欢称对手是个 *vir obscurus*（这个蠢汉），这样就把对手含蓄地比做十六世纪一部著名人文主义讽刺作品《*Epistolae obscurorum virorum*》（蠢汉信笺）中所嘲笑的蒙昧主义的僧侣。一场不好意思说出口的疾病使他想起了马屠朗·雷尼埃的几首诗；威廉·李卜克内西的活动，他用改写伏尔泰的《老实人》中一句名言来掩饰掉；随便浏览一下拉·罗什福考的《格言》使他想起了斯特恩的《特利斯川·项狄》，后者他在好多年以前早在《新莱茵报》和《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都已提到过了；一提到莉希·白恩士<sup>①</sup>就使他想起了与她同姓的“大诗人”。<sup>②</sup>在文学作品的另一个极端，马克思发现，弗莱里格拉特家庭的情况使他想起了那个把自己的姓名卡尔·海因倒拼成克劳伦的哀情小说；其他荒唐的事使他想起科采布和贝特荷尔德·奥尔巴赫。<sup>③</sup>在这些年代里，马克思

① 莉希·白恩士(死于1878年)，爱尔兰女工，恩格斯的第二个妻子。——译注

②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4卷，第228页（路德）；第17卷，第524页和第35卷，第73页（但丁）；第19卷，第410页（这个蠢汉）；第31卷，第373—374页（雷尼埃）；第32卷，第520页（伏尔泰）；第32卷，第308页（斯特恩）；第31卷，第74页（白恩士）。（“大诗人”指苏格兰诗人彭斯。——译注）

③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10页（克劳伦）；第35卷，第10页（科采布）；第34卷，第26页（奥尔巴赫）。奥尔巴赫刚刚为爱德华·拉斯克尔匿名出版的《一个男子心灵上的感受》写了一篇序，因此引起了马克思的旧恨宿怨。



所提到的文学典故有些并不出于名家名作，在文坛上过眼即逝，因此只有极其熟悉他的思想的读者才能跟得上。例如，1868年4月11日他给他女儿劳拉写了一封动人的家信，说到他的新婿保尔·拉法格（他的祖先不是欧洲人）：“至于上述这位丈夫，他在这种关键时刻给我寄来了书籍，这比任何语言都雄辩地证明，这个‘年青人’生性善良。这个简单事实已经证明，他属于一个比欧洲人种更好的人种。”<sup>①</sup>这最后一句是巧妙地暗指佐伊默<sup>②</sup>的一度很有名的诗《蒙昧人》，其中的主人公，一个被欧洲的虚伪礼貌吓退到丛林中去的土著，边退边说：

“我们蒙昧人毕竟是更加优秀的人。”

马克思文学典故的广泛多样，可由另一封在1869年6月10日写给他的女儿燕妮的英文信中看出，这封信写到他到地质学家达金斯在约克郡的一个农庄去的情况。在这封信里，连续好几句话都极其自然地，一点也不做作地提到了夏洛特·勃朗蒂的小说、歌德的《浮士德》和乔治·爱略特<sup>③</sup>的《费里克斯·霍尔特》：

“星期日，我们在达金斯住的农场那里吃了午饭，吃饭的那间屋子正好在小礼拜堂的上面。这间筑有主墙（我是说四面的墙很厚）的屋子显然是以前修士聚会的地方；从这里眺望，可以看到葱茏茂盛的树木，似带环绕的群山，嶙峋轩邈的峰峦，又有淡蓝色云雾紫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532页。

② 约翰·哥特弗利德·佐伊默（1763—1810），德国作家和诗人。——译注

③ 乔治·爱略特（真名是玛丽·安·伊文思，1819—1880），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家，她的《费里克斯·霍尔特》（1866）描写的是19世纪30年代后英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而发生的社会变化，主人公费里克斯·霍尔特是个青年工人，反对社会不平等和剥削制度。另著有《亚当·比德》《织工马南传》等小说。——译注

绕其间，这种云雾曾使柯勒·贝尔为之倾倒。乡村风味的午饭虽然简单，但大家吃得非常愉快，非常满意，在吃午饭时从小礼拜堂传来了青年们的歌声，因为隔着厚厚的墙壁，听起来好象歌声来自远方，这歌声有点象《浮士德》中的教堂赞美歌。

“看来，我们的朋友达金斯有点象费里克斯·霍尔特，不过不象后者那样装腔作势，而是有学识的。”<sup>①</sup>

由此可见，马克思没有白读夏洛特·勃朗蒂的《雪丽》——第七章里象上述那样的风景描写深深地留在他的记忆之中：

“……远远的群山参差斑驳，天际象珍珠母壳，色彩重重；蓝、紫、绿、红融成一片片白云，纯洁得象莹雪一样，使你仿佛看到了遥远的天国。吹到眉睫上的空气清新芳香，使你精神一振。

378

“‘我们的英格兰是个美丽的岛屿’，雪丽说，‘而约克郡又是它最美丽的一个角落’。”

或者象第三十二章中：

“群山蓝得象紫丁香；落日的夕辉红中有紫；天空一片蔚蓝，象冰雪一样晶莹……”

我们读了玛里安·康明所写的在马克思晚年到马克思家作客的回忆文章<sup>②</sup>，知道马克思一家都表示爱读夏洛特·勃朗蒂和艾米

<sup>①</sup> 承蒙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鲁尔夫·德卢贝克教授慨借此信影印件和同意引述，不胜感谢。（译文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601页。——译注）

<sup>②</sup> 《十九世纪》，第91期（1922年），第151—169页。最近出版了一本德译注释本，玛里安·康明著《我对卡尔·马克思的回忆》，佛兰克·T·瓦尔克翻译和注释，并附汉斯·贝尔格尔的序言（特里尔，1970年）。



丽·勃朗蒂的作品,对她们的评价在爱略特的作品之上。

但是,如果说马克思的脑海里英国文学的联想越来越多的话,他的德国文学的联想也从来没有被挤掉过。我们一再碰到他在青年时代学会的德国歌曲的歌词和曲调脱口而出,信笔写来。他的女儿燕妮在写给库格曼一家的一封信中描写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场面,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按着学生的饮酒歌 Krambambuli 的调子一起唱麦克斯·施奈肯伯格的《守卫在莱茵河上》;他一提起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耳中就会马上听到切姆尼兹和贝尔曼为这一地区编的一首有名的歌曲——《海水环绕的》。这样的回忆,一直到最后,都包括马克思在柏林的学生时代流行的戏剧的片断。例如,在1876年10月7日的一封信中出现的

“啊,埃林杜尔,告诉我  
这种两重性格是怎么回事!”

379 这句话是根据阿道夫·缪尔奈的命运悲剧《罪》中一句台词的不甚确切的记忆写的。除了德国的童谣,英国的童谣也越来越多了,不过记得不是总是正确的:“我不能同迪河岸上的磨坊主合唱:‘我不关心人家,人家也不关心我’。”<sup>①</sup> 他的著作中和信中一再出现他

---

<sup>①</sup> 《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谈话》,第373页。1863年12月4日致恩格斯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373页);1876年10月7日致李卜克内西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4卷,第194页[该诗也出现在第32卷第583页上,但译文为“但是,埃林杜尔,请你替我猜破这个自然之谜吧!”——译注]);1866年3月24日致恩格斯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195页[原译文作“我可以同迪河岸上……”——译注]);1866年3月20日致女儿劳拉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508页。缪尔奈的原文是“啊,埃林杜尔,给我解释,这种两重性格是怎么回事”。《罪》,第1幕,第5场)。

喜欢从歌德的著作中引用的一些话（摩非斯托斐勒司对学生说的关于灰色理论和黄金色生命之树的话和《西方和东方的合集》中关于“痛苦”带来“更大的快乐”的诗句），<sup>①</sup> 还有一些其他不这么出名的诗句。甚至在他晚年患的痛苦不堪的背痛也使他想起了歌德——有一个痈长在臀部，使他无法坐下来，他就告诉恩格斯，歌德的诗《完整无缺》中的最后两行：

“要是骑士没有屁股，  
那他又怎样骑马呢？”

马克思劝告一个通信对象要谨慎郑重时也免不了想起《威廉·麦斯特的修业时代》中迷娘的诗句：“让我沉默吧，别叫我讲。”<sup>②</sup>

引用次数频繁仅次于歌德的总是海涅。马克思往往采用或改写海涅的容易引起争论的复合动词，再一次从《新春》的第四十四首中引用了 Menschenkehricht（人类糟粕），或者把“Plateniden”中的 Vorschusslorbeerkrone（“提前的桂冠”）改为 Zukunftslorbeerkrone（“未来的桂冠”）。<sup>③</sup> 在批判《哥达纲领》的时候，他想起了海涅的悲叹：“我播种的是龙，收获的却是跳蚤。”<sup>④</sup> 1866年3月20日他在从马尔吉特用英文写给他女儿劳拉的信中，谈到关于口蹄疫的法令时就首先想起海涅的《归乡集》中的一首诗，他把它译成了英文歪诗，然后又引了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第四幕第二场

380

① 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281, 651页。

② 1867年12月17日致恩格斯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418页（也出现在第30卷，第380页上。——译注）；1871年4月13日致李卜克内西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208页。

③ 1879年8月14日致恩格斯的信和1865年8月5日致恩格斯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4卷，第88页和第31卷，第141页。

④ 海曼在《缠结的组合》中引用，见该书第161页。



中的一首歌，那是劳拉——“周到的芭伊—芭伊”<sup>①</sup>——爱唱的：

“只要稍许离开海边到附近的农业区去走走，就可以到处碰到上面有‘牛瘟’字样的大木板牌，这些大木板牌会使你不愉快地联想到‘文明’。木板牌上都贴有一张政府的法令，这项法令是上下两院头上长角的畜牧业绅士、上下院议员们在议会开会时向政府猛冲的结果。

“哦，维斯瓦米特拉王，  
你真是头愚蠢的公牛，  
为了一头母牛，  
你竟费了这么大的劲儿争吵，吃了这么多苦！”

“但是，如果正直的国王维斯瓦米特拉象一个真正的印度教徒那样，为了拯救母牛撒巴拉<sup>②</sup>而苦苦地折磨自己，那么完全具有现代殉教者风度的英国绅士，却为了因自己的母牛生病而榨人民的血。牛角真该冲向他们！牛角，牛角，正象周到的芭伊—芭伊起劲地唱的那样。”<sup>③</sup>

到了这里，文学引喻还没有完，这封信继续提到了萨克雷的一句双关语和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

海涅的诗文似乎继续不断地在马克思的脑海中涌现。在写给

---

① “周到的芭伊—芭伊”是劳拉·马克思的绰号。（《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509页注为燕妮·马克思的绰号，疑有误。——译注）

② 撒巴拉（瓦西施塔）是印度教中具有母牛形象的神，被奉为财富和土地之神。——译注

③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509页。（原译文与本书英译引文相差甚多，参考后重译。又莎翁原剧中为鹿角。——译注）

保尔·拉法格的一封信中,他用他特有的英法文夹杂的文体,提到《吕太斯》中的一段话:“巴枯宁……几乎同维克多·雨果一样是一个吹牛专家,用海涅的话来说,雨果不仅仅是利己主义者,而且是雨果主义者。”<sup>①</sup>甚至在写到巴黎公社的失败和光荣时,马克思也发现海涅的话比任何其他人的话更能表达他的感情:“不管怎样,即使巴黎的这次起义会被旧社会的豺狼、瘟猪和下贱的走狗们镇压下去,它还是我们党从巴黎六月起义以来最光荣的业绩。”<sup>②</sup>Wenn auch unterliegend vor den Wölfen, Schweinen und gemeinen Hunden der alten Gesellschaft<sup>③</sup>——这句话在巴黎公社的失败之上又加上了另外一系列起义,即1848年起义的失败,海涅曾在一首有力的诗《在1849年10月》中纪念了那次起义,

381

“……这是历来已久的习惯,  
英雄总是败于野兽的残暴力量。

这一次是〔奥地利〕公牛甚至同  
俄国熊结了盟——  
匈牙利人,你们倒了下来,  
但是可以告慰的是我们的命运比你们更丢脸。

毕竟你们是在一场不太不公正的战斗中  
败于正派的野兽之手;  
而我们却落到了  
豺狼、瘟猪和下贱的野狗的轭下。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667页。

② 同上书,第33卷,第207页。

③ 德语:即使……被旧社会的豺狼、瘟猪和下贱的走狗们镇压下去。——译注



这样的狂吠乱叫——我实在  
忍受不了胜利者的气味……”

弗兰契斯卡·库格曼回忆 1867 年谈到海涅时马克思引了海涅一首关于多情的年轻姑娘欣赏晚霞的诗（《新诗集》中《逝去》第 10 首），一首关于一个嘻嘻哈哈的不忠贞的妇女的诗（《新诗集》中《罗曼采罗》第 1 首），他当时表示赞许，但是对海涅的个人品德却很不留情。<sup>①</sup>海因德曼在 1880 年和 1881 年马克思临死前两年去见过马克思，他回忆起马克思认为海涅是最伟大的语言大师之一，对把海涅的诗译成英文的工作很是关心：

382 “他告诉我许多关于海涅的事情，他同海涅有长期通信的关系，这些通信还从来没有出版过。……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在谈到弗莱里格拉特、海涅、海尔维格和现代的其他伟大德国文学家时，他坚持要我朗诵……汤普逊翻译的海涅几首短诗，他说这是任何一种语言中迄今为止的最好作品。”<sup>②</sup>

与海涅相比，其他十九世纪诗人都相形失色。这话不仅适用于那些兴趣和观点与他不同的诗人，如约翰·彼得·黑贝尔<sup>③</sup>，他的一首方言诗，马克思并不予以热情对待。这话甚至也适用于格奥尔格·维尔特，在《新莱茵报》时代，马克思曾与他亲密地合作过，他的政治和社会观点是马克思从来不怀疑的，他的逝世曾使马克思伤心不已，在 1864 年 2 月 13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到是个

① 《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谈话》，第 316—317 页。

② 海因德曼：《多事一生的纪录》，第 279—280 页。

③ 约翰·彼得·黑贝尔（1760—1826），德国诗人，所谓人民文学首创人之一，把农民生活习惯中的宗法关系理想化。——译注

“老同志”的逝世。但是在维尔特的许多著作中，马克思只记起过一首诗的两行：

“从来没有这样快活过  
刺痛敌人乐呵呵。”<sup>①</sup>

凡是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和通讯，或者他的谈话记录的人，都不会有任何疑问地知道，为什么这种好斗的诗句深深地留在他的记忆中。因此，维尔特就象许多现在已为人遗忘的人物一样，只是由于两句没有被忘掉的诗而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留下了痕迹——例如，那两句开玩笑的童谣，马克思一生之中始终喜欢用来揭露装模作样的写作和行为的：

“如果这给臭虫还不够好  
那我就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

或者威廉·冯·梅克尔斯 1848 年写的一首诗，马克思在 1861 年 11 月 18 日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提了一下：

383

“只有士兵有助于  
反对民主派。”

马克思在晚年写的信经常表现出他很自如地从一个学术领域

---

<sup>①</sup> 1868 年 1 月 11 日致库格曼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 32 卷，第 519 页），另参阅《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谈话》，第 421 页。马克思引用维尔特的诗并不十分正确。黑贝尔，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 31 卷，第 153 页（1865 年 8 月 22 日致恩格斯的信）。



转到另一个学术领域。有一个批评《资本论》第一卷的人连这本书也没有读懂，这使马克思想起了十八世纪一个哲学家莫泽斯·门德尔森的作品，他一直认为（这是有点不公平的）门德尔森是浅薄理性主义的典型；这又使他想起了古·泰·费希纳（1801—1887年）<sup>①</sup>的心理学和美学，后者企图在刺激和反应之间找到一个相互关系，用“刺激对数”的数学名词表现出来；对于所有这些他认为是浅薄思想的不同例子，他最后总结了她的看法，请读信人读一读席勒的《还愿匾》中一首很少有人知道的诗：

“……在哲学上是一片不亚于莫泽斯·门德尔森的空谈，是一片自作聪明、抑郁不满和自命不凡的抱怨之声。而现在，连政治经济学也蜕化为关于法权概念的无稽之谈！这甚至比‘刺激对数’还要高明。正如这方面的权威裁判席勒早就指出的，小市民在解决一切问题时，总是把它归于‘良心方面’。”<sup>②</sup>

马克思应用文学引喻范围之广，这不过是信手捡来的一个例子。

马克思引用文学著作或引喻在语言和文化方面的范围也是很广泛的。我们知道他曾在阿姆斯特丹寻觅荷兰文和弗里斯兰文的书籍；在临死前还想研究朗兰德的中世纪英语；<sup>③</sup>念希腊文的阿庇安作为消遣，念意大利文的但丁，西班牙文的塞万提斯和卡德龙。

384 他在青年时代曾在1837年11月10日那封著名的信中告诉他父亲，他想通过语法学习英语和意大利语而告失败；但是在后来，他

① 古·泰·费希纳（1801—87年），德国物理学家、哲学家。——译注

② 1870年7月20日致恩格斯的信——《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6页。席勒的诗原题为《道德的谈话》。

③ 1882年11月10日给爱琳娜·马克思的一封信，要她弄一本《农夫皮尔斯的申诉》（《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35卷，第397页）。

把自己的文学兴趣用来为学习外语服务，进步神速惊人。他通过莎士比亚和科贝特学习英语，通过但丁和马基雅弗利学习意大利语，通过塞万提斯和卡德龙学习西班牙语——到了临终前几年，他很想了解俄国的经济和社会情况，在这个新产生的欲望驱使下，开始学习俄语，办法是通过阅读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和赫尔岑的一卷回忆录，后者已为恩格斯用来达到过同一目的。<sup>①</sup> 他的俄语没有能够达到非常流畅的水平；但是足以读懂俄语写的经济和统计著作，他收罗的俄语书籍到1880年代已达120到200种。其中有萨尔蒂柯夫—谢德林的讽刺作品，有好几个地方他都划了线表示感到兴趣和了解。他在1873年读了萨尔蒂柯夫的《圣彼得堡一个外省人的日记》和《塔什干来的先生们》，后来还有同一作家的其他作品，包括《巴黎之行》和《蒙勒帕斯》。他并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没有地址的信》至少两遍，一遍在1870年，第二遍在1880年；他是不是也读过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则不清楚，虽然燕妮·马克思在1877年5月给《法兰克福日报》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极为推崇这部作品。《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马克思称崇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俄国的伟大学者和批评家”。弗兰契斯卡·库格曼认为——那已是三十年以后的事了——她记得马克思称颂过屠格涅夫和莱蒙托夫：

“他发现屠格涅夫特别忠实地刻画了俄罗斯民族灵魂〔volks-Seele〕的特点和斯拉夫性格中隐藏的容易激动的一面；他也认为莱蒙托夫对自然的描写是无人能超过，也无人能与之相比的。”

---

<sup>①</sup> 这并没有使他对赫尔岑的憎恶有所稍减。在1870年2月10日给恩格斯的信中，他谈到“公民赫尔岑虚构的谎言”。（《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421页）



而保尔·拉法格则记得马克思谈到过，他除了在普希金和萨尔蒂柯夫的作品中得到乐趣之外，在果戈理的作品中也得到了乐趣。最近苏联出版的一本马克思传记充分介绍了马克思所读过的俄国作品，这本传记说，他在阅读这些作品时所寻找的显然并不仅仅是美学上的满足。他企图通过这些作品了解产生这些作品的社会条件和了解他从来没有到过的一个国家的社会情况和生活态度。<sup>①</sup>

正是这种想要多了解一些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文化的愿望，促使马克思去读弗·古·艾希霍夫<sup>②</sup>的《斯拉夫各族语言和文学史》，书中俄国的《伊戈尔之歌》引起了他的兴趣，因为他在它的“基督教—英雄的”表面下察觉到了“异教的因素”；这也促使他去读各种斯拉夫民歌（或者仿拟的民歌）集的德语译本。他的俄语藏书中有德拉戈马诺夫的《俄国政府对乌克兰文学的迫害》，从他在这部作品中划的线中可以看出，他对乌克兰诗人塔拉斯·舍夫琴柯很有兴趣。但是，彼得·戴麦兹在研究了这一点以后，正确地得出结论说，马克思的斯拉夫研究并没有怎么深入。<sup>③</sup>马克思在拉丁古典著作方面（他后来的一些信中不断地大量出现和提到贺雷西、维吉尔、尤维纳利斯和西塞罗）和西欧后期著作方面继续感到更加自在得多。我们在他最后几年的信中看到中世纪高地德语的片断以及一段十六世纪的法语——这是从马屠朗·雷尼埃的著作中摘引的一段有关性的大胆段落，他寄给恩格斯去看，并附了他的典型的一句评语：“虽然在这方面我曾看过许多书，但是我记不得有谁这

①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柏林，1967年），第33、596—600页和戴麦兹上引书，第123—125页。马克思唯一引用《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地方，见本书上文第303页和《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67页脚注（2）。关于马克思阅读过的俄语著作的详尽调查，见高尔曼等著《卡尔·马克思传》，特别是第488、701、751、752—755页。

② 弗雷德里克·古斯塔夫·艾希霍夫（1799—1875），法国语文学家。——译注

③ 参阅戴麦兹：《马克思、恩格斯和诗人》，第124页。

样用诗体来描写 *chaude pisse*。”<sup>①</sup> 我们也读到他提到从卡德龙的《天才魔术师》起的欧洲戏剧，也提到从《拉摩的侄儿》到《费里克斯·霍尔特》，《哈里·洛雷克尔》<sup>②</sup> 和《彼得·西姆普耳》<sup>③</sup> 这样水平和吸引力各不相同的欧洲小说。<sup>④</sup>

《彼得·西姆普耳》的作者在马克思的孩子们的教育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同一些非常著名的作家一起在她们中间享有地位。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回忆她的父亲给她朗读名著的情况时说：

“象以前对我的两个姊姊朗读一样，他对我诵读全部荷马的作品，全部《尼贝龙根之歌》，《古德龙》<sup>⑤</sup>，《堂吉诃德》，《一千零一夜》等等。至于莎士比亚，他是我们家的《圣经》，书不离手，脱口而出。到我六岁的时候，我已经整出整出的记得莎士比亚的戏剧了。

“我六岁生日的那天，摩尔〔即马克思〕送给了我第一部小说——不朽的《彼得·西姆普耳》。以后接着是整套的马利亚特<sup>⑥</sup> 和库伯。而且在我读每本小说时，我父亲也是真的每本都读一遍的，并且同他的小女儿认真地讨论……〔接着〕开始了司各特热，小女儿吃惊地发现，她自己与可恨的坎勃尔族是远亲，从而颇为愤懑……我应该补充一句，司各特是马克思反复阅读的作家，他

① 1869年9月25日致劳拉·马克思的信和1867年10月19日致恩格斯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620页；第31卷，第373页。

② 《哈里·洛雷克尔》是爱尔兰小说家查理·詹姆斯·利维尔（1806—1872）所作。——译注

③ 《彼得·西姆普耳》是英国作家弗雷里克·马利亚特（1792—1848）所作。

④ 1869年6月10日致燕妮·马克思的信和1870年5月7日致恩格斯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601—602、484页。

⑤ 《古德龙》是13世纪中古德国长诗。——译注

⑥ 弗雷德里克·马利亚特（1792—1848），英国作家，船长，著有一些海洋探险小说，在19世纪受到广大青少年的喜爱。——译注



象崇敬和了解巴尔扎克和菲尔丁<sup>①</sup>一样崇敬和了解他。他在谈到这些书籍和其他许多书籍时，往往——虽然她当时是一点也没有意识到的——向他的小女儿指引在这些作品中到哪里去找最优秀和最精彩的东西，教她——虽然她当时一点也不知道他在教她，否则她会不愿意的——学会怎样自己去思索，自己去了解。”<sup>②</sup>

马克思对文学的热爱和尊崇，没有比他孩子们的回忆更有说服力的证明了。

马克思对许多国家的著作和语言的兴趣，使他对翻译艺术始终感到兴趣，这是一点也没有不自然的地方的。他对《资本论》第一卷译成法语的工作的进展，一直保持着关心，这可以从1869年10月18日用英文写给保尔和劳拉·拉法格的一封信中看出来：

“告诉凯累尔先生，让他继续译。总的说来我对他的译文感到满意，虽然文字不漂亮，译得又太马虎。……第二章里我修改的地方不是非改不可的，不过它们表明我希望按这个方向去修改。……在德语中，我们使用‘Prozess’ (procès) [过程] 一词是针对经济发展而言，就象你们说‘化学过程’一样，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他把这个词译成‘现象’，就没有意义了。如果他找不到另外的词，就让他统统译成‘运动’或别的什么同义词。”<sup>③</sup>

---

① 亨利·菲尔丁(1707—1754)，英国现实主义作家，启蒙运动者，著有《汤姆·琼斯》、《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约瑟·安特路传》等。——译注

② 见巴克森达尔和莫劳斯基编：《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圣·路易斯，1973年)，第147—148页。

③ 《马克思不为人知的私人书信》(慕尼黑，1962年)，第124—125页；另参阅《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谈话》，第454页。

路易·阿尔杜塞<sup>①</sup>等人早已详尽说明,事实上,马克思对《资本论》第一卷的这一法译本十分关心;因为马克思在一些关键的地方同意法译本对德文本原意的修改(或者说澄清)。马克思在1875年4月28日写法文版跋时自己就指出了这一点:“不管这个法文版本有怎样的文字上的缺点,它仍然在原本之外有独立的科学价值,甚至对懂德文的读者也有参考价值。”<sup>②</sup>

1877年4月,马克思对库尔茨把他极其欣赏的一本法语著作利沙加勒<sup>③</sup>的《1871年公社史》译成德文的工作极为不满。除了详细提出了批评以外,他还加上了一句他特有的概括评语:“总的说来,即使没有根本译错的地方,译文也往往是笨拙的,平庸的和枯燥的。不过,这也许在一定程度上适合德国人的口味。”<sup>④</sup>一个翻译者的社会偏见怎样影响他在翻译时的遣词造句,他对此特别感到兴趣。例如,雅科布·格林的语言学著作是马克思极其推崇的,<sup>⑤</sup>但是马克思却责备他在翻译塔西陀的《日耳曼尼亚》第二十

---

① 路易·阿尔杜塞(1918—),当代法国大学哲学教授,著有《孟德斯鸠,政治与历史》(1959)、《为了马克思》(1965)、《谈资本论》(1965)和《列宁和哲学》(1969)等书。——译注

②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9页。另参阅《为了马克思》,B·布劳斯特译(哈蒙斯窝斯,1969年),第89页。

③ 普罗斯比尔·奥利维耶·利沙加勒(1839—1901),法国记者,巴黎公社参加者和巴黎公社史家。——译注

④ 1877年5月26日致白拉克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4卷,第254页。

⑤ 特别见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回忆,载《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柏林,1967年),第24页。李卜克内西在这里证明马克思对雅科布·格林的著作的了解和尊崇,可以从马克思著作中好几个地方提到格林的语源学著作看出来。参阅科尔布的《卡尔·马克思和雅科布·格林》,载于《新语言学研究文献》(1969—1970年)第96页以后和甘斯的《雅科布·格林心目中的德国研究》(牛津,1973年),第7页:“卡尔·马克思把他放在他的浪漫主义的中世纪化的同时代人之上,认为他是一个虽然不自觉地,却是向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人。”另参阅1868年3月25日致恩格斯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51页。



六章中的一段话时，有损他的令誉，因为马克思认为这一段有争议的译文没有表示出古代日耳曼人没有私有财产和社会特权。

388 “地质学家，甚至象居维叶<sup>①</sup>那样一些最优秀的地质学家也把某些事实完全解释错了，同样象格林那样一些有才能的语言学家也把最简单的拉丁文句子译错了，因为他们完全处于麦捷尔（我记得，他所叹赏的是：德国人中从来没有“自由”，但是“空气造成占有”）等人的影响之下，例如，塔西陀的一句人所共知的话：“arva per annos mutant, et superest ager”，意思是：他们更换（通过抽签，后来所有野蛮人法典中的 *sortes*〔抽签〕一词就是由此而来的）田地（*arva*），而仍保留公有地（*ager* 同 *arva* 相反，是 *ager publicus*〔公有地〕），格林等人却译成：他们每年耕种生地，但仍有（荒）地存在！”<sup>②</sup>

但是，并不能认为马克思偶而批评一下格林的社会态度和社会偏见，就是非难格林的治学态度和诚意。他在 1868 年 3 月 25 日写信给恩格斯说：“法国革命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启蒙运动的第一个反作用，自然是把一切都看作中世纪的、浪漫主义的；甚至象格林那样的人也不能摆脱这种看法。第二个反作用是越过中世纪去看每个民族的原始时代，而这种反作用是和社会主义趋向相适应的，

---

① 若尔日·居维叶(1769—1832)，法国自然科学家，动物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提出了反科学的唯心主义灾变论。——译注

② 1868 年 3 月 25 日致恩格斯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 32 卷，第 52 页。大多数现代英国翻译家同意格林的译法而不同意马克思。但是我们却发现，在马克思的时代，并不拥护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英国学者推测，古代日耳曼人是抽签分地的，认为塔西陀著作第 26 章中的 *ager* 是 *ager publicus* 的简化形式。见丘奇和勃罗德里布著：《塔西陀的农业和德国与演讲术对话》，修订版（伦敦，1877 年），第 130 页。

虽然那些学者并没有想到他们和这种趋向有什么联系。于是他们在最旧的东西中惊奇地发现了最新的东西，甚至发现了一**定程度的平等派……**”<sup>①</sup>由于他对格林通过德国语言史和通过古代历史学家所遗留的纪录来探索德国古代风习感到关心，马克思便重新估价德国浪漫主义和有关的研究。马克思现在认为，浪漫主义派学者由于越过中世纪往回追溯，就不自觉地为社会进步力量提供了动力。在我们自己的这个时代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有传统观念的文学批评家就发现这种观点是合乎心意的，因此在它的帮助下能够对德国浪漫主义运动采取一种比原来可能的态度更加积极的态度。

马克思对普通卖文为生的人的怀疑和憎恶也适用于出身高贵的文人。他在用英文写给他的表妹南尼特·菲利浦斯的信中关于柳德米拉·阿辛格<sup>②</sup>的描写是出诸他笔下最刻薄的：

“这位对我热情洋溢的小姐，是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最丑陋的人物：一副令人讨厌的犹太人面孔，非常突出的细尖鼻子，永远微笑着，咧着嘴，说话常是散文诗，总要挖空心思说出几句不寻常的话来，装得非常热情，在忘乎所以时对你口沫飞溅。今天我勉为其难地去拜访这个小怪物，我对她非常审慎和冷淡，并且通过我的朋友拉萨尔向他示意：吸引力对我总是向离心方向起作用，当我非常赞赏一个人的时候，我往往是竭力躲开他。”

后来一封给同一个人的信也是用英文写的。他在信中抱怨说，那

<sup>①</sup>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51—25页。（“一定程度的”原文是英文。原译文没有这几个字。——译注）

<sup>②</sup> 柳德米拉·阿辛格(1821—1880)，德国自由派女作家，著名的德国作家万哈根·冯·恩赛《日记》的出版者，同拉萨尔很友好。——译注



次他到德国去,使他有认识了柳德米拉·阿辛格,当时有“数不清的迂腐的美女和讨厌的女学究想方设法要把我变成一头驴子。”他又说,“你知道,古代的喀耳刻把尤利西斯的同伴们变成了猪。而这些现代喀耳刻们实在文明,竟想把人变成驴子。”<sup>①</sup>但是,当马克思在1879年的《科伦日报》文艺栏读到一个叫贝尔塔·奥古斯蒂<sup>②</sup>的人的一部小说时,他从一个共同的相识的人那里知道她交友不广,境况拮据,就极为感动,写了一封热情的信给这位女作家,祝贺她的“非凡才能”,鼓励她继续写作。为了增加他的赞扬的力量,马克思又说,在德国小说方面,他自己是“一个很大的异教徒”。他写道,“我并不很喜欢它们。读了最优秀的法国、英国和俄国小说家,完全把我给宠坏了。”<sup>③</sup>

要全面地谈一谈马克思与文学的关系,还必须提一下他同家人通信中极其突出的游戏成分——比如有一次他向他的女儿爱琳娜报告一种新的化妆品,向她提起歌德的一首不太有人知道的诗:  
390 “歌德在赞美‘脱去’老蛇皮的人的时候,大概没有把脱去人造‘假皮’算做返老还童的过程。”<sup>④</sup>他一家人总是在玩文学的游戏,马克思常常把这种游戏告诉给恩格斯。例如1869年5月,他向

---

① 1861年3月24日和4月13日致南尼特·菲力浦斯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586页和第589—590页。另参阅W·布路曼堡:《马克思生平不为人所知的一个章节》,载于《国际社会史评论》第1卷(1956),第84,85页。(喀耳刻——译瑟西,希腊神话中的赫利俄斯和珀耳塞的女儿,是一女巫,能将人变为牲畜。尤利西斯——译乌利斯,即希腊神话中的英雄、特洛伊战争中献木马计使希腊军获胜的俄底修斯。——译注)

② 贝尔塔·奥古斯蒂(1827—1886),女作家,丽娜·舍勒尔的姊妹。——译注

③ 1879年10月25日致贝尔塔·奥古斯蒂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4卷,第392页。(原译文略有出入:“对德国来讲,我是一个很大的异教徒,我认为它无足轻重,我十分偏爱优秀的法国、英国和俄国的小说家……。”——译注)

④ 1882年5月28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5卷,第321页。见歌德的《温和的讽刺诗》。

恩格斯寄去了他的女儿燕妮编的一个谜语：“为什么阿尔卑斯俱乐部的‘埃克赛西奥’<sup>①</sup>先生不同‘克拉拉·韦尔·德·韦尔夫人’<sup>②</sup>结婚？”<sup>③</sup>恩格斯只有熟读朗费罗<sup>④</sup>和丁尼生<sup>⑤</sup>的诗以后才能回答这个谜语。五年以后，马克思又与燕妮一起开了丁尼生的一个玩笑，并且叫她转给“小杜西”（即爱琳娜·马克思）。<sup>⑥</sup>由于这种家庭游戏，我们今天才保持了马克思的女儿们在1865年向他（还有向恩格斯等其他客人）提出的一份问题的答复：

### 自 白

您喜爱的优点……纯朴。  
您喜爱的男人的优点……刚强。  
您喜爱的女人的优点……柔弱。  
您的特点……目标始终如一。  
您对幸福的理解……斗争。  
您对不幸的理解……屈服。  
您能原谅的缺点……轻信。  
您厌恶的缺点……逢迎。  
您厌恶的人……马丁·塔波尔。  
您喜爱的事……啃书本。  
您喜爱的诗人……莎士比亚、埃斯库罗斯、歌德。  
您喜爱的散文家……狄德罗。

① 埃克赛西奥是朗费罗的长诗《埃克赛西奥》中的男主角。——译注

② 克拉拉·韦尔·德·韦尔夫人是丁尼生的同名长诗中的女主角。——译注

③ 1869年5月8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295页。

④ 亨利·伍慈沃思·朗费罗（1807—1882），美国诗人，翻译家和文艺学家。——

译注

⑤ 阿尔弗雷德·丁尼生（1809—1892），英国浪漫主义诗人。——译注

⑥ 1874年4月19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627页。



您喜爱的英雄……斯巴达克斯、刻卜勒<sup>①</sup>。  
 您喜爱的女英雄……甘泪卿。  
 您喜爱的花……瑞香。  
 您喜爱的颜色……红。  
 您喜爱的名字……劳拉、燕妮。  
 您喜爱的菜……鱼。  
 您喜爱的格言……Nihil humani a me alienum puto  
 [人所具有的都具有]。  
 您喜爱的箴言……De omnibus dubitandum [怀疑一切]。

卡尔·马克思<sup>②</sup>

391 尽管这些“自白”有其开玩笑的成分(例如对“女人的优点”的答复,或者对“喜爱的名字”的答复<sup>③</sup>),却对本书上文所出现的马克思文学欣赏方面的形象,提供了宝贵的佐证。即使在游戏方面,马克思也是独具一格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写道:“物的名称对于物的本性来说完全是外在的。即使我知道一个人的名字叫雅各,我对他还是一点不了解。”<sup>④</sup>这就难怪马克思在他的通讯中继续出现的最突出

① 约翰·刻卜勒(1571—1630),德国天文学家,根据哥白尼的学说发现行星运转的规律。——译注

② 《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588页(原译文与此处次序略有不同。——译注)。甘泪卿是歌德《浮士德》中的人物;劳拉和燕妮是马克思两个女儿的名字;燕妮也是他夫人的名字。

③ 不过这个玩笑有其严肃的背景:马克思举甘泪卿为他喜爱的女主人公和“柔弱”为他喜爱的女人的优点,最终的根源是他与许多比较保守的维多利亚同时代的人都有分享的男性父权观念。

④ 《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19页。

的开玩笑形式之一是给他的家人或熟人起外号。这些新的名字往往是他从读书中得来的，因此这些文学人物就出现在他日常生活之中。愚蠢的激进派卡尔·海因岑象以前一样以“力大无穷的仆人海涅卡”<sup>①</sup>出现。商人兼未来的革命家波克罕摇身一变而成了巴尔扎克的“大名鼎鼎的戈迪萨尔”。激进派地质学家达金斯，上文已经说到，被形容为“有点象费里克斯·霍尔特，不过不象后者那样装腔作势，而是有学识的”；而且马克思从此之后就套用了乔治·爱略特的小说的全名，亲昵地称呼达金斯为“激进派费里克斯·霍尔特”。他的女婿保尔·拉法格的非欧洲血统一直受到他的注意，因此成了“那个奇怪的卡列班孩子”。他仿斯威夫特称自己的女儿为“小人国小姐”，用一本后来已为人遗忘的小说中一个裁缝的名字叫她们“卡卡杜师傅”。因为负债累累，他就自称是巴尔扎克喜剧《生意人》中的梅尔卡岱。他写信给他的孩子们时署名为“老尼克”<sup>②</sup>，在他晚年的时候尤其经常这样，这不是再一次扮演他喜爱的摩非斯托斐勒司的角色吗？<sup>③</sup> 受到世界文学名著人物“侵入”的圈子也不仅仅限于马克思接近的一些人。拿破仑三世成了“当上了皇帝的托尔梅斯河的拉萨里耳奥”<sup>④</sup>；在普鲁士国王威廉面前的拉萨尔使马克思想起了海涅所描写的在弗里德里希·威

392

① 海涅卡是一首民间模拟 16 世纪所谓粗俗文学的同名德国歌曲中的人物，力大无穷的仆人。——译注

② 老尼克意为家神或魔鬼，是马克思在家里的谑称。——译注

③ 《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 30 卷，第 580 页和第 32 卷，第 502 页（“海涅卡”）；第 32 卷，第 130, 150 页（戈迪萨尔）；第 32 卷，第 601 页（费里克斯·霍尔特）；第 31 卷，第 408 页（小人国）；第 31 卷，第 280 页（梅尔卡岱）。至于“老尼克”散见 1881 年 7 月 22 日，8 月 9 日，8 月 18 日及 12 月 17 日致燕妮·朗格的许多信中（《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 35 卷，第 198, 200, 210, 243 页。（8 月 9 日的信是给劳拉·拉法格的。——译注））“卡卡杜师傅”见《同时代人心目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莫斯科，1972 年），第 183 页。

④ 拉萨里耳奥是 16 世纪中叶问世的一部匿名西班牙中篇小说《来自托尔梅斯河的拉萨里耳奥及种种不幸》中的人物。——译注



廉四世面前的海尔维格，席勒所描写的在西班牙国王菲力浦面前的波札侯爵<sup>①</sup>。第一国际的法国支部使他想起了席勒的《强盗》中的恶棍斯比格尔伯格。柏林《国民报》的编辑察贝尔成了斯库伊尔斯<sup>②</sup>的化身。路易·勃朗<sup>③</sup>和兰克<sup>④</sup>成了小矮人和童话民间传说中的畸形侏儒。<sup>⑤</sup>在马克思写的信的其他地方，俄底修斯、卡吕普索、弗兰肯施坦<sup>⑥</sup>的怪物、格列佛和他的小人国人都栩栩如生地重新出现了。当1871年9月保尔·罗班<sup>⑦</sup>为了要跟随巴枯宁而决定同马克思决裂时，马克思在一封用英法两种文字写给保尔和劳拉·拉法格的信中谈到了这件事，并且加上了他具有特色的评语：

---

① 波札侯爵是席勒悲剧《唐·卡洛斯》中的一个企图影响暴君的高尚的、有自由思想的内侍官。——译注

② 斯库伊尔斯是狄更斯小说《尼古拉斯·尼克尔贝的生平和奇遇》中的主人公，是残忍、贪婪无知和虚伪的典型。——译注

③ 路易·勃朗(1811—1882)，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和历史学家，1848年革命的活动家，临时政府和卢森堡委员会委员，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场，后流亡国外。——译注

④ 列奥波特·兰克(1795—1886)，德国历史学家，反动分子。——译注

⑤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365页(拉萨里耳奥)；第31卷，第10页(波札侯爵)；第32卷，第123—124页(斯皮格尔伯格[原译文中没有出现此一人名。——译注])；第30卷，第34页(斯库伊尔斯)；第31卷[应为第30卷]，第423页(小矮人、侏儒)。兰克写历史的方式是马克思所不喜欢的，因为都是一些“轶事”，而且“把所有重大事件都归于琐细的原因”(1876年9月7日致恩格斯的信)。十一年后，他同样强调地表示不赞成亨利希·冯·特莱契克作品中所发现的普鲁士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627页)(亨利希·冯·特莱契克(1834—1896)，德国反动的历史学家和政论家，1886年起为普鲁士国家历史编纂家。——译注)

⑥ 卡吕普索，希腊神话中的女神，曾在她的俄古癸亚岛上留俄底修斯住了几年。弗兰肯施坦是英作家玛丽·雪莱1818年所著小说中的生理学研究(他创造了一个怪物而自己被他毁灭)。——译注

⑦ 保尔·罗班(生于1837)，第一国际法国支部委员，巴枯宁主义者，1869年居住比利时，是比利时联合委员会委员，无政府主义报纸《平等报》的编辑之一。——译注

“我认为不必回答罗—罗—罗—罗班这头羊(拉伯雷已经知道它叫这个名字并特意从巴汝奇的羊群中选中了它)。现在,我们来谈谈我们其他的羊吧。”<sup>①</sup>

这里可以看得特别清楚,马克思的笔下是怎样给人起文学绰号的。他记得罗班是法语中一般叫羊的名字之一;这就引起他想起拉伯雷的《巨人传》第四卷第六章中有名的一段,由此又使他想起《彼埃·巴塔兰师傅》中“Revenons à ces moutons〔咱们再来谈羊吧〕”这句话。从此之后,“叛徒”罗班在马克思的笔下就永远成了罗班这头羊,他追随巴枯宁一事总使马克思想起拉伯雷所描写的那些愚蠢得要死的绵羊。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塞万提斯所创造的人物比起拉伯雷笔下的人物更是马克思天地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马克思一辈子都把他的政敌看成是堂吉诃德的化身,特别是如果他认为他们基本上是不符合他心目中的他们时代精神的。如今他在晚年也开始感觉到,这个伟大的堂吉诃德在某些方面也象他本人,这是令人感到非常奇怪的。“我失眠,食欲不振,咳嗽得厉害,有点惘然若失,有时犯重重忧郁症,象伟大的堂吉诃德一样。”<sup>②</sup> 1882年3月写的一封信中有这一段自我刻划,这说明马克思随着自己的变化而看到了他原来喜爱的文学人物另外一些方面。

393

马克思的一些熟人的性格固然使他想起文学人物,他在生活中所遇到的事情和看到的情景也同样使他想到了文学人物。例如他在1878年9月17日写信给他的妻子:

<sup>①</sup>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346页。

<sup>②</sup> 1882年3月1日致恩格斯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5卷,第41页。



“我还是忍不住要谈一件事情，这件事的奇特令人同时想起巴尔扎克和保尔·德·科克。当杜西、伦肖<sup>①</sup>夫人和彭普斯<sup>②</sup>（她现在高升了，从此恩格斯称她为彭普西娅）整理死者的东西时，伦肖夫人从中发现一小束信（大约八封，其中六封是马克思家里人写来的，两封是威廉斯从兰兹格特写来的），她本打算交给当时在场的契提先生。他却说：‘不，把它们烧掉吧！我不想看她的信。我知道，她不会欺骗我。’难道费加罗（我指的是博马舍的真正的费加罗）能够‘猜到这一着’吗？”<sup>③</sup>

马克思所看到的这件奇怪的事是恩格斯在他的同居女人莉希·白恩士死后的反应，这件事马上引起了三个文学联想：巴尔扎克、德·科克、博马舍。他提起这三位作家，就帮助了他的妻子想象他亲身的经历，把这件事同他们富有文学修养的家庭中的其他共同经历联想起来。

我们从许多家属中知道，马克思自始至终是个善于讲故事的人。他的女儿爱琳娜特别记得她父亲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一个月又一个月地讲的一个霍夫曼式幻想故事：

“这个故事讲了好几个月；这是许多故事串联起来的。这些故事这么富于诗意，风趣、幽默，没有人当场把它记下来真是太可惜了！汉斯·吕克尔是个霍夫曼式的魔术师，他开着一家玩具铺，他

---

① 伦肖是恩格斯在伦敦的熟人。——译注

② 彭普斯即玛丽·艾伦·白恩士，恩格斯妻子的侄女。——译注

③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4卷，第320页。参见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文中引用的“上吊吧，费加罗！你再不要想到这一点了！”（语出博马舍：《费加罗的婚礼》。）（“猜到这一着”暗指博马舍的《费加罗的婚礼》第五幕第八场费加罗的话“费加罗，你真该死！你竟没猜到这一着！”——译注）

的日子总是很‘拮据’。他的铺子里都是些很好玩的东西——男女木偶、巨人侏儒、国王王后、工人老板、飞禽走兽，数量之多象诺亚上了方舟的时候一样，还有桌椅板凳、各式各样各种大小的马车和箱子。汉斯虽然是个魔术师，可是总付不清欠魔鬼或屠夫的账，因此总得违背心意地把木偶玩具卖给魔鬼。于是这些木偶就历尽种种险阻，最后还是回到汉斯·吕克尔的铺子里。这种经历，有些同霍夫曼的一样可怕惊险，有的很滑稽，但都是讲得有声有色，风趣幽默。”<sup>①</sup>

路·赛·费厄尔颇有独创的见解，他把这个故事同马克思本人作为一个潦倒的流亡者和历史创造者的经历联系起来。我们从上文爱琳娜的回忆中可以知道，吕克尔的玩具铺里尽是男女木偶、巨人侏儒、国王王后、工人老板。费厄尔说，这同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历史唯物观如出一辙。凡是知道马克思一家流落伦敦的开始几年中的遭遇的人，无不知道吕克尔总是还不清魔鬼或屠夫的债这一点有一定的自传成分。另一方面，木偶们历尽了种种险阻最后终于回到玩具铺中来，这一点所象征的东西，就很可能不仅仅是从当铺赎东西回来。因此费厄尔不是没有理由地评论道：“历史的考验有其胜利的结局。”<sup>②</sup>

有时我们在马克思的通讯中也看到了这种讲故事特点的一鳞半爪——例如，他在1863年12月对恩格斯说，他打算把他患的背痛写成短篇小说的主人公。“从前面看，这人享用波尔图酒、波尔多酒、黑啤酒和大块大块的肉，把这些东西装进自己的‘体内’……

① 《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圣·路易斯，1973年），第147页。爱琳娜·马克思是用英文写这些回忆的。

② 路·赛·费厄尔：《马克思和知识分子》（纽约，1969年），第141—142页。



从后面看呢，在背上——在‘体外’，长着一个可恶的痈。”在他把这个体外人或第二个弗兰肯斯坦的故事告诉爱琳娜后，她叫道：“这不也是你自己的肉吗！”<sup>①</sup>

395

马克思继续对所谓“作为表演艺术的文学”表示兴趣。他不仅喜欢大声朗读小说和朗诵诗歌，而且也批评别人的朗诵：在这一点上，斐迪南·拉萨尔特别受到他的讽刺挖苦。<sup>②</sup>我们知道，他不喜欢日常生活中的戏剧性表现；<sup>③</sup>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同他的家人一起到伦敦的剧院里去看戏，欣赏菲尔浦斯、欧文和萨尔维尼的演技。爱琳娜·马克思把她母亲写的亨利·厄尔文<sup>④</sup>的悼词寄给卡尔·希尔施<sup>⑤</sup>时甚至叹道：

“要是爸爸有时间，他就会自己写一篇厄尔文先生的评论，因为我们都对他很有兴趣，尽管我们同他并不相识；首先，他是个才能出众的人，其次因为他由于一件可悲的事件而遭到英国报界的攻击，受尽了恶毒的诽谤。”<sup>⑥</sup>

许多观察家都注意到了马克思家中极其崇拜莎士比亚，结果有一个叫做“道格培里俱乐部”的莎士比亚朗诵协会经常在马克思家中举行集会，马克思不仅参加，而且还很喜欢，另外还同弗尼瓦尔和

---

① 1863年12月4日和27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373、382页。

② 《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谈话》，第335、521页。

③ 《同时代人心目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第61—62页。

④ 亨利·厄尔文(1835—1905)，英国著名演员，尤以扮演汉姆雷特最为成功，是英国第一位被授爵士称号的演员，死后葬于威斯敏斯特教堂。——译注

⑤ 卡尔·希尔施(1841—1900)，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记者，一些社会民主党报纸的编辑。——译注

⑥ 布鲁诺·凯撒：《戏剧批评家燕妮·马克思——一个重要的发现》，载于《横断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笔会中心文集(莱比锡，1970年)，第125—126页。

英国莎士比亚协会发生了联系。<sup>①</sup>这就难怪上了年纪的马克思给了他的俄国客人马克西姆·柯瓦列夫斯基“一个学识极其渊博的盎格鲁—日耳曼绅士”的印象。<sup>②</sup>

在马克思晚年,求见他的许多其他客人都证实了这种印象。1871年9月马克思在家中接见了第一国际的一个西班牙党员,这位西班牙客人对其主人的关于卡德龙、洛贝·台·维迦、蒂索·德·莫里那<sup>③</sup>和塞万提斯作品的渊博知识,能够以流利的、语法正确(即使发音不总是正确)的西班牙语表示自己的见识,感到惊服。<sup>④</sup>七年以后访问马克思的一个《芝加哥论坛报》记者注意到书架上尽是各种语言的书籍,包括莎士比亚、狄更斯、萨克雷、莫里哀、拉辛、伏尔泰和歌德的著作。同时期的玛丽安·康明看到他书桌上的几本诗集和散文,注意到其中有布尔威—李顿<sup>⑤</sup>的小说。<sup>⑥</sup>

396

## (6)

在马克思死后出版的许多回忆他的文章,总的来说,只不过证实了我们考察了他的著作和通讯以后所得到的了解。只有在两个方面,这些回忆文章能够补充我们对马克思与世界文学的关系的

---

① 如《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谈话》,第275,482—483,566,568,575页。(弗雷德里克·詹姆斯·弗尼瓦尔(1825—1910)是英国语言学家,曾建立了许多协会,如新莎士比亚协会、乔叟协会、雪莱协会等。——译注)

② 同上书,第486页。

③ 蒂索·德·莫里那(1571—1648),西班牙剧作家,著有《塞维尔的引诱者》,是最早把关于堂璜的传说编成戏剧的作家之一。——译注

④ 《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谈话》,第386页。

⑤ 布尔威—李顿(1803—1873),英国历史传奇小说家,著有五部历史传奇:《德维尔》、《邦贝末日记》、《利恩齐》、《爵爷之子遗》和《哈罗德》。——译注

⑥ 《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谈话》,第575页。



了解。一个方面是，这些回忆文章使我们知道马克思曾有计划要写作文学作品，但苦于没有时间，例如，他想写一部以格拉古兄弟<sup>①</sup>为题材的剧本，或者一部研究巴尔扎克的批判性著作。<sup>②</sup>另一方面是，马克思还读了许多作家的作品，可是在他的著作中却没有留下痕迹，这些回忆文章却提出了证明。据说他非常欣赏菲尔丁的《汤姆·琼斯》和司各特的《清教徒》，是个司各特的热情读者，<sup>③</sup>但是，如果说他的著作中有引用过或提到过菲尔丁或司各特的地方，那么笔者就没有发现过。夏米索的社会诗和——更重要的是——艾米丽·勃朗蒂的著作也是如此。<sup>④</sup>但是，如果我们要引用这些材料，必须极其谨慎；突出的例子是爱德华·艾威林与爱琳娜·马克思合写的于1888年出版的小册子《雪莱的社会主义》，艾威林在书中提到马克思把雪莱和拜伦作了对比：

“拜伦和雪莱的实际不同是：了解和爱护他们的人都觉得拜伦在三十六岁早年夭折是件幸事，因为如果他的寿命再长一些的话，他就会成为一个资产阶级反动派；但是他们感到遗憾，雪莱在二十九岁就去世了，因为他是个彻头彻尾的革命派，总是会站在社会主义前列的。”<sup>⑤</sup>

397 尽管马克思敌视浪漫主义（但是请注意，这种敌视在他晚年似乎并不包括对霍夫曼的作品），我不能相信上面这段话的可靠性。

---

① 提比利乌斯·格拉古和凯尤斯·格拉古为古罗马护民官，为农民争取实现土地法的斗士。——译注

② 保尔·拉法格：《同时代人心目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第26，156页。

③ 同上书，第26，156页。

④ 《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谈话》，第575页（玛丽安·康明）。

⑤ 《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柏林，1967年），第536—537页。

马克思公开出版的著作中没有任何材料证明这一说法。他的著作中从来没有提到过雪莱，拜伦也极偶而提到，但是提到拜伦时，显然是用赞许口吻的。他把他早期收集的民歌向燕妮推荐时，提到了《查尔德·哈洛德游记》；他在1854年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取笑了一个共同的熟人，因为他居然自以为是拜伦和莱布尼茨之间的人物；他在《新奥得报》（1855年）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用赞许口吻提到《英国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sup>①</sup>中的一行诗：

“该说句双关话，可以称之为雅而不俗的俏皮话；”

在《福格特先生》（1860年）中，他高兴地引用了拜伦给卡斯尔里<sup>②</sup>写的《墓志铭》：

“后代的人永远不会踏勘，  
一个比这更高贵的坟墓；  
这里埋着卡斯尔里的骸骨，  
行人停下来小便吧。”<sup>③</sup>

---

① 《英国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是拜伦于1809年写的一首讽刺长诗，是他针对当时文学上反动的浪漫主义倾向而写的富有战斗性的言论，同时他也对中世纪幻想和神秘主义的极端迷恋加以讥笑。——译注

② 罗伯特·斯图亚特·卡斯尔里（1769—1822），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陆军和殖民大臣（1805—1806，1807—1809），外交大臣（1812—1822）。——译注

③ 《马恩全集》（国际版），第1卷，第2分册，第96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347页（1854年4月22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30页（1855年2月2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656页。把列保莱罗的话，“让他离去吧，他不值得你恼怒！”说成是出自拜伦的《堂璜》一诗，这一点是弄错了（《流亡评述》，马克思丛书〔鹤鹑版〕，哈尔蒙斯沃斯，1973年，第344页）；马克思引用的这句话是出自达·朋得为莫扎特的歌剧《堂璜》写的歌剧台词。



根据我们对马克思的文学感受力和政治理解力的了解，没有理由认为他会迟钝到把《堂璜》的作者看作是一个潜在的“资产阶级反动派”的程度。相反，我们对爱德华·艾威林的“伪造事实的癖好”〔伊冯·卡普语〕却颇有了解。艾威林在爱琳娜·马克思的一生中所起的有害作用已有令人心痛的充分证明；①《雪莱的社会主义》这本小册子是在什么情况下为了论战的目的写出来的，都筑也有记述，因此并不能加强我们对这本小册子中所提供情况的可靠性的信任。②

398

至于其他一些例子，提供情况的人要回忆许多年以前同马克思的交往，记忆不免有错。马克思真了解果戈理的作品吗？他真的——象弗兰契斯卡·库格曼在三十年后告诉我们的那样——谈起屠格涅夫和莱蒙托夫来头头是道吗？③他真的有引用“夏米索的动人的诗《叫化子和他的狗》的习惯吗？”④在未有进一步文献出现之前，这些情况必须作为“尚未证实”来看待。但是已有足够的材料使我们相信，马克思“啃书本”的劲头比从他已出版的著作和通讯中所能见到的要深入和广泛得多。

---

① 艾威林后与爱琳娜·马克思离婚，与另一个女子结婚，爱琳娜深受刺激，自杀而死。——译注

② 参阅伊冯·卡普：《爱琳娜·马克思》，第1卷；《家庭生活（1855—1883）》（伦敦，1972年），第248页；都筑著《爱琳娜·马克思的生平（1855—1898）。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悲剧》（牛津，1967年），第177页。（都筑（1926—）是日本大学教授，另著有《H·M·海恩德曼与英国社会主义》（牛津，1961）。——译注）

③ 《同时代人心目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第26页（拉法格）；第185页（弗兰契斯卡·库格曼）。

④ 《同时代人心目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第184页（弗兰契斯卡·库格曼）。

## 结 论

399

“书籍是他的思想工具，不是奢侈品。他常常说，  
‘它们是我的奴隶，必须按我的意志为我服务。’”<sup>①</sup>

马克思从来没有写过一篇完整的美学论文，也从来没有发表过一篇扎实的正式文学批评——他对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的分析是他揭露施里加和布鲁诺·鲍威尔的青年黑格尔分子的附带产物；他对《弗兰茨·冯·济金根》的评论是在一封私人信件中信笔挥就的。但是从一开始起，他就对文学表示了强烈的兴趣，这种兴趣后来从来没有减退过，导致了大量的附带批评、暗喻和引述。文学点缀着他的个人生活和私人事务；他的博士论文中提到文学作品的地方比比皆是；在他早年当记者的时候，文学成了他有力的战斗武器；随着他自己的 Weltanschauung〔世界观〕逐渐从早期的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混合物中演变出来，他就开始借助文学来证实和提出他的新观点；他认为，在文学或其他艺术中不取得一个牢固的杰出的地位，他在成熟时期要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是不可能的；晚年的马克思则经常从文学作品中寻找精神上的支持、游戏的材料、论战的弹药。他精通古典文学，从中世纪到歌德时代的德国文学，但丁、波雅多、塔索、塞万提斯、莎士比亚的作品，十八和十九世纪的法国和英国的散文小说；任何当代诗歌，凡是能够有助于破坏

---

<sup>①</sup> 见保尔·拉法格：《同时代人心目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莫斯科，1972年），第24页。



传统权威和引起对未来社会正义的希望，例如海涅的诗歌那样，他无不感到兴趣。但是总的来说，他的目光所向，主要是在过去而不是当前，主要是在埃斯库罗斯、但丁、莎士比亚，而不是同时代人的作品。他后来的阐释者卢卡契在这一点上和在许多其他方面一样都师法他的榜样。

本书的目的是要按年代的顺序探讨马克思与文学的关系，这样做就必然会发现其间有某些变化。早年赞成费希特式浪漫主义<sup>①</sup>的态度很快就消失了，让位于一种新的看法，认为浪漫主义文学的唯美成分不过是遮掩严酷无情、令人窒息的现实的一层面纱，要改变现实，就得撕破这层面纱，除去这层面纱。早期仰慕席勒的感情很快就减退了，因为他越来越感觉到，席勒的剧本和诗歌，不象莎士比亚的剧本和诗歌，是可以被滥用的——它们把什么都过于理想化了，为那些在现实社会的真正性质和自己的动机上自欺欺人的人们，提供了太多的现成材料，而且席勒对天分较差的戏剧家的影响可能是极其有害的。在《神圣家族》中，他还只是轻描淡写地把席勒方式同莎士比亚方式作一对比，可是在1859年关于《济金根》的信中却用一句斩钉截铁的话表达出来。在1845年以后，在估计阶级冲突最后得到解决对文学和艺术会产生什么影响方面，马克思比较谨慎起来；他的后期著作并没有一味作乌托邦式的设想，以为在未来的社会中人人（除了其他身分以外）还都是个艺术家。但是马克思还是继续认为，要让人人有机会发挥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遭到压制和扼杀的艺术和鉴赏能力，必须根本改变交换和生产方式。后期的马克思已开始考虑要改变他的一些比较引起争论的提法；1859年的那句名言

---

<sup>①</sup> 参阅里弗希兹：《马克思和美学》，德文版，第43—44页。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全部过程。”(着重体系本书作者所用)

在他亲自过问下翻译的法文本中成了

“Le mode de production de la vie matérielle *domine en* 401  
*général* le développement de la vie sociale, politique et intel-  
lectuelle.”

马克西米林·鲁贝尔指出这点不同之处,并说德文“bedingt”(决定)确切地译成法文应该是“détermine”或“conditionne”,而马克思同意用“domine”<sup>①</sup>一词就是强调人的 Praxis〔实践〕在意识的形态的起源中的作用,而没有提出这种 Praxis 和精神倾向之间有机机械的因果关系。<sup>②</sup>我们也注意到其他的辞汇变化——1857年以后,马克思不再把 Blütezeit〔开花期〕和 Mutterschoß〔娘胎〕这样的浪漫主义生理隐喻用在文学批评上,而表现出比较倾向于把经济学上的术语用在作家和作品上(一个作家 liefert〔供应〕或 produziert〔生产]);在晚年,他结合了他的文学兴趣和科学兴趣,把物理学上和生物学上的术语——例如“退化变态”——用在文学史上。马克思的文坛泰斗名单也不断增加:荷马、埃斯库罗斯、奥维德、卢克莱修、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歌德、海涅之外,相继又添上了但丁、狄德罗、科贝特、巴尔扎克、狄更斯等许多人。他的

---

① 法语:支配、控制之意。

② 马克西米林·鲁贝尔:《卡尔·马克思。思想评传》,修订版(1971年巴黎),第297—298页。(马·鲁贝尔(1905—)是当代法国社会学教授,曾编辑《卡尔·马克思社会学与社会哲学选读》(1956)、《马克思著作目录》(1956)与《马克思经济学著作》(1963)等。——译注)



文坛“俗物”名单也同样不断增加：哥特谢德、盖斯纳、拉马丁、沙多勃利昂之外又添上了金克尔、道梅尔<sup>①</sup>、后期的弗莱里格拉特、古斯达夫·弗莱塔格、马丁·塔波尔这样的次要人物。

但是，我们按年代顺序对马克思引用文学作品进行这番考察的最显著的结果，却是使我们认识到，他的发展是经常不断、始终一贯的，他在设计未来社会的革命性蓝图的时候很少需要修改他早期的文学观点。因此，莱奈·韦莱克<sup>②</sup>说得不错，马克思关于文学的散见各处的评论即使谈不上是完整的文学理论，但是却不乏连贯性；这些评论是由一种总的历史哲学（它本身也是逐渐形成的）连结在一起的，可以看出发展的过程。但是韦莱克认为，马克思的这种发展“通过严格的经济决定论的阶段而演变到了后期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范围内一种比较温和容忍的态度”，<sup>③</sup>对此我则不敢苟同。这种客观存在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很明显）经济决定论，同马克思在关于拉萨尔的《弗兰茨·冯·济金根》的信中极其充分说明的“现实主义”理论，是同时并存的，因为这封信是在写了序言以后没有几个月就写的。没有材料表明，马克思是赞成文学上的自然主义的；而且总的来说，马克思的文学倾向和观点并没有因为年老而变得比较“温和容忍”了。<sup>④</sup>

老年时代的马克思比青年时代的马克思用得比较节制谨慎的一个概念，便是“异化”概念——虽然这个概念在1857—1858年的

---

① 格奥尔格·弗·道梅尔（1800—1875），德国作家和哲学家，著有一些宗教史。  
——译注

② 莱奈·韦莱克（1903—），美国文艺批评家，主要作品有《康德在英国》、《文学理论》、《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现代批评史》、《批评的概念》。——译注

③ 韦莱克：《现代批评史 1750—1950年》，第3卷，第239页。

④ 海因德曼在《多事一生的纪录》中说起，他有一次去马克思伦敦寓所作客：“我记得有一次向他说，我年纪一老就觉得变得比较容忍了。‘真的吗？’他反问我，‘真的吗？’完全可以肯定，他不是这样。”（第271页）



《大纲》和《资本论》中仍起了很重要的作用。<sup>①</sup>但是马克思从来不需要推翻他早年对文学在异化和物化方面的作用的分析。他在1844年的巴黎手稿中曾经想说明,在哪些方面,文学可能被用来为统治阶级服务,在哪些方面,一个热衷于商业和赢利的时代之不利于对伟大的文学的鉴赏可能同不利于创作一样。因此他想说明文学可能成为阶级统治的工具,或者受到现代的异化的影响——可能成为这种情况的牺牲品,那就是人脱离自然、脱离自己和自己的活动、脱离人的本质或“物种”、脱离他的同胞。<sup>②</sup>但是青年时代的马克思认为,文学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异化和物化是怎样起作用的(他引用了歌德和莎士比亚的著作的段落来证明这种观点);它可以提供形象,使我们能够更加意识到我们丧失人性的情况,或者如果条件比较有利我们可能处在什么状态(早期的马克思引证埃斯库罗斯的《被缚住的普罗米修斯》,后期的马克思引用但丁的《神曲》);它可以用来作为阶级斗争的武器(马克思极其欣赏的西里西亚织工之歌就是明证);而且象其他艺术一样,它将在人类的文化生活中起它的作用(马克思以音乐为例,说明艺术能够养成如何欣赏艺术的鉴赏力)。

403

由于马克思越来越埋头于经济分析,由于他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越来越肯定和复杂,他修改了他的不少其他观点,但是即使如此,巴黎手稿中提出的文学观点,是他从来不需要否认的。这种文学观点在他后期的著作中得到了补充,因为他提到了文学的进一步的作用和用途,因为实际需要(例如有人请他就一部具体作品发表意见)迫使他提出美学上的论点。从本书所介绍的情况可以看出,这些因素极其紧密结合在一起,因此,要对马克思的文学信念

---

① 有关段落已由麦斯扎罗斯汇集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一书中。

② 参阅麦斯扎罗斯上引书,第14页。



和观点作一总结,似乎并不一定是一件完全办不到的事情。

他的早期诗歌中有一定的浪漫主义的宗教成分,但在这个时期以后,马克思便认为文学是完全属于这个现实世界的。它不是由超自然的灵感所产生,它所涉及的也不是什么超凡的领域,什么神秘的、不可思议的彼岸。文学所涉及的是在一定社会历史环境中的人类,是由受社会制约的个别的人所生产的,也是他们所接受的。

因此,文学的创造者可以看得出,是单个的人——马克思与“非个人的”理论是绝不相干的。但是同时,这些创造者又以不同的方式作为他们的国家、它的发展中的不断变化的民族精神、他们的时代、他们所属的阶级或者他们所标榜的阶级的代表。马克思努力要区别作者同他们的社会所由组成的阶级的关系之中的许多不同的方式。他们很可能属于一个机会主义思想的流氓无产阶级。他们也可能是一个占支配地位的阶级或集团的“雇佣文人”。他们也可能是这样的一个集团的自觉的或不自觉的代言人,反映和代表它的利益、理想、世界观、政治地位、自我形象、幻想、仇恨、恐惧。他们也可能决定采取一个阶级或集团的观点,按出身或教养来说,他们自己并非属于这个阶级或集团。他们也可能一方面自觉地站在某一个阶级或集团一边,而另一方面反映现实又很忠实,很有见地,结果他们的作品会违反那个集团和超越作者本人自觉的信仰和信条而暴露出来。

404 因此,马克思认为,虽然许多作家是一个占支配地位的阶级的代言人,但是伟大的文学是能够超越某一流行的意识形态之上的。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末它可能成为一个相对非异化的劳动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一个作家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作为一个全面的人表现自己。在这方面,诗人就比工厂工人有利,虽然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两者的产品都要受市场规律的支配,这种规



律常常迫使作家为生活而写作而不是为写作而生活。但是,要把一部文学作品变成一种纯粹功利的东西,一种可以取得和占有的东西,有一定的限制。它只有在“消费”中才能充分存在,但是在“消费”后,它还是在那里,还是一件由一个受历史条件制约的人所创造而受到另外一个人享用的东西。马克思在《大纲》中谈到中世纪手工艺时说:“这种劳动仍是半艺术性的,它本身〔Selbstzweck〕就是它的目的。”他说这话,实际上是以康德会加以赞许的方式把艺术性和本身具有的目的性等同起来了。

马克思世界观中这种文学和艺术观点的最终意义,由阿道弗·桑谢一瓦谢在《艺术与社会》一文中作了很公正的总结:

“劳动的艺术性质越确立,它就越接近艺术,那就是说,它越接近人类有意识地把自己的人性本质加以实现和具体化的一种活动。劳动越失去艺术性,它就越脱离艺术,最后成了一种与艺术截然相反的纯形式的和纯机械的活动。劳动领域丧失了精神上的丰富性,这时艺术就成了这种丰富性的适当领域。”<sup>①</sup>

对马克思来说,文学不仅仅是一种表达的手段——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也是一种自我构成的手段。人类和禽兽之间一个重要不同是,人类不仅为了满足自己身体上的需要和冲动才从事劳动,而且也“按照美的规律”形成形态。因此,文学满足人的一种需要,它象其他艺术一样,创造和形成欣赏文学的感受能力。因此,这才有可能谈到“生产性的消费”。艺术作品的生产和欣赏有助于我们成为更完美的人。马克思在1874年年底到1875年年初写的关于

405

<sup>①</sup> 阿道弗·桑谢一瓦谢,《艺术与社会。马克思主义美学论文集》,英文版(伦敦,1974年),第206页。此书原为西班牙文版,于1965年在墨西哥出版,题为《马克思的美学思想;马克思美学散论》。英译本是马罗·里奥弗朗哥斯译的。



巴枯宁的一些笔记中，把文学列于“已经获得的生产力(物质方面的和精神方面的)、语言、文学、技术能力等等”<sup>①</sup>之中。他认为文学和其他艺术就是后来加约·彼得罗维奇所说的“一种创造世界和创造自己的活动，由此人类也改造和创造自己的世界和人类自身。”<sup>②</sup>这样，文学同人类朝着一个比较公正的社会的迈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但是，马克思充分认识到，仅仅有代表性，有表现能力，有大家可以接受的社会和历史观点，还不足以保证艺术性的优点。他在这个问题上所发表的一切意见，从他在《莱茵报》上发表的关于“特权的”和“无特权的”(或“够资格的”和“不够资格的”<sup>③</sup>)作者的论文起，到他评论拉萨尔的《弗兰茨·冯·济金根》的一封信为止，都表明他懂得需要具有思想和精神见识的艺术才能。

文学作品是产品，作家是生产者，文学不能不受到它所处的社会、它为之生产的社会中流行的生产和消费方式的影响。在《资本论》和其他著作中，马克思都用了不少篇幅来说明，文学具有了一本书或一个剧本的形式，作为一种商品由一个投资者订货、付款、印刷、宣传，在公开市场上出售以后，会发生什么情况。他谈到了通过报纸和其他宣传工具左右作者声誉的情况。不论从作者或读者的观点，都不能把文学看成是一个独立自主的领域。它的内容和形式都不能独立于一定社会的经济组织或生产方式之外；但是这种从属的程度和从属的性质，在不同的著作中有不同的估计。所以有这种不同，常常是由于马克思当时心目中的具体目标：例如《政治

①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682页。

② 加约·彼得罗维奇，《二十世纪中叶的马克思形象》，第78—79页。

③ 此处“特权的”和“无特权的”(或“够资格的”和“不够资格的”)系按《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89页中的译法。本书英译引文为“authorized”和“unauthorized”(或“competent”和“incompetent”)似应译“授权的”和“未授权的”(或“胜任的”和“不胜任的”)。——译注



《经济学批判》的序言比后来放弃的《大纲》导言更加直截了当地、更加有意识地富有论战性，马克思想要比较充分地说明这种关系的复杂性质。他提出许多论点的目的是要具有后来瓦尔特·本杰明所说的 Kampfwert——战斗价值。可以认为，对于经济因素的过分强调——包括人类要掌握和利用自然的所有努力、生产和分配的关系、财产关系——是一种对付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解毒剂，也是对付有些人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使大家不去注意十九世纪欧洲财产是怎么分配的、货物和劳务是怎么交换的一种武器。

除了这种重点的出入和差异以外，本书所收的材料颇能证实斯蒂芬·莫劳斯基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共有的“历史主义”艺术观点的分析：

“美学现象应该看成是人类在社会历史过程的母体内充分实现自己能力的缓慢进展中的一种文化活动。各种艺术都各不相同地依赖其他文化表现形式，不论是社会的、政治的、道德的、宗教的或科学的表现形式，这些艺术的这种非孤立现象反过来也影响这些其他活动领域。此外，这种相互依存和复杂的相互关系的体系在每个情况下都是有双重性的。它既是一定时期的，也就是在一定时间里在整个社会结构中都发生的；也是一段时间的，也就是作为历史进程的受过去影响的一个阶段而发生的，并且对未来文化性质会发生可能的影响。美学和艺术这样不断发生巨大的流动和变化，主要是由于一贯复杂的意识形态观的兴起和衰落，而后者归根到底又是受阶级社会的总矛盾和发展的制约的。但这种动力之所以产生也是由于已经成型的意识形态观和新兴的观点之间的矛盾。”<sup>①</sup>

<sup>①</sup> 莫劳斯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美学观点》，载于《美学和艺术批评杂志》，第28期（1970年），第303页。



但是,上文已有述及,后期的马克思比较好谈论社会的经济组织怎样影响艺术,而不好谈论艺术怎样影响其他的存在领域和活动领域;正如他比较愿意指出莫劳斯基所说的艺术的“异体起源”方面(即各种不同的艺术怎样依赖非艺术因素),而不是它的“本体起源”方面(即艺术怎样可以说有它自己的历史,一部作品怎样影响另一部作品)。为了要说明“异体起源”因素的重要性,马克思在一个地方甚至否认艺术有什么自己的历史,他的意思无疑是指那没有把产生艺术的国家和社会经济史考虑进去的纯艺术史。

虽然马克思充分认识到每个历史时期的独特性,也认识到,根据现实经验,一定的经济“基础”是能够有无限的变异形态的,但是他还是认为,存在着历史的相似现象,可以造成文学和艺术的类似发展。他谈到德国的“粗俗文学”(见本书原文第126—127页),目的是要说明,在某些方面同以前的一个历史星座相似的历史星座可能造成对那个早一时期的文学重新发生兴趣,他并且表示,这也可能引起产生类似的文学作品。不需要直接的“影响”;类似的历史条件可能产生类似的艺术作品。因此,必须把艺术的欣赏和生产都看成是社会的、能动的过程,不仅有变化,而且也有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复发。但是在最后,不同之处至少与相似之处同样重要;马克思经常使用比较的方法,这说明他对两者都是意识到的。

马克思象黑格尔一样知道,不能希望所有的文学体裁都从人类经济社会政治关系的发展中得到益处。《大纲》的序言中极其生动地谈到了自从荷马时代以来史诗的衰落,使上述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也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总的来说是敌视文学的。但是在《大纲》中,老年时代的马克思重复了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关于艺术在一个新兴的比较公正的社会中的地位的预言。没有材料说明,他曾经有过乔治·李赫特海姆所说的“黑格尔



对艺术在一个被哲学和科学造成透明的世界中的命运的悲观看法。”<sup>①</sup>相反，他继续认为，创造和欣赏文学作品的才能之普遍，大大超过了十九世纪欧洲社会组织使人想象得到的程度。因此，他努力争取的社会改造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解放这种才能。这种社会改造就是要使人人都有机会表达他们内心要表达的东西，培养被日常生存斗争所挫伤的鉴赏力。在这方面，他的关于无阶级社会的设想，显然与老年时代的海涅不同，后者不止一次地表示担心，共产主义会对诗歌不利。由于马克思满怀希望地设想最终要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再不会有任何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市民社会内部阶级对立的正式表现”<sup>②</sup>——到现在还没有在这个不完美的地球上出现，所以这个问题还有待于充分的经验上的检验。

但是，即使在马丁·塔波尔的时代，也就是在马克思看来千千万万具有创作和欣赏文学的才能的人由于不公正的社会制度而不能发挥这种才能的时代中，文学的萧条不振的状态，对文学和人类的文化前途来说，也不是一种十十足的灾祸。恰恰相反。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由于发展了技术，最终有希望减轻劳动和增加闲暇的时间，由于发展了交通和交换的方式，超越了国境和克服了民族狭隘性，因此为未来的文学准备了基础，它的伟大性很可能同古代希腊文学相媲美，而且在某些方面（不过决不会在所有方面）可能甚至超过古代希腊文学。有些人感到十九世纪的社会秩序使自己不能充分发挥人性，这些人所遭受到的挫折有一种积极的作用，那就是使人们希望加速那个比较正义的社会的到来，在那个社会

<sup>①</sup> 乔治·李赫特海姆，《卢卡契》，丰塔那现代大师丛书（伦敦，1970年），第118页。

<sup>②</sup> 《哲学的贫困》载于《马恩全集》，第1部分，第6卷，第227页。马克思在晚年（《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保持了这一对将来无国家社会的设想，但是他也声明，他相信，这种社会只有通过改变政权制度才能实现，这包括他所说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中,马克思认为文学和艺术将沿着新的、可喜的方向发展。

409 马克思并不经常推测,在他所希望出现的比较美好的未来,文学和艺术发展会采取什么具体形式。因为他始终意识到一定的历史环境有许多无法估计的具体条件,这就不可能作确切的预言。他只满足于指出,必须解放被埋没的才能,因此必然要增加文学和艺术的活动量。他着重指出了人的合作劳动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会起的作用:这种劳动会再次带来愉快而不是仅仅带来挫折失望,进行这种劳动的人不再被迫剥夺充分发挥自己的多方面能力的机会。这一对人的劳动的强调是至关重要的,也是明确的。里弗希兹说得不错,“费尔巴哈谈到艺术问题时总是以沉思开始,而马克思则始终强调生产因素的重要性,后者决定审美的需要,并且通过实践把这种需要从其初期的粗糙阶段发展出来。”<sup>①</sup>

但是,马克思尽管相信人类在文化上的自我发展,他从来没有忘记过,要生产伟大文学,不一定非要生活在一个社会主义的乌托邦里不可。他在《大纲》绪论中所勾划出来的关于经济上和文化上、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领域的“不平衡”发展的理论,使他不致于抱有单线发展的、因而必然是同时发展的粗糙想法。而他对奴隶制希腊、对欧洲中世纪封建制基督教世界、对他竭力要破坏其社会组织的十九世纪所产生的文学的爱好,也同样肯定地使他不致于把艺术性的优点同社会平等混淆起来。他相信文学的阶级基础,但这从来没有妨碍他在从荷马到但丁,到莎士比亚,到歌德的这些超疆界和超时代的伟大作家的想象作品中,发现仍旧适用的真理、不断重复出现的人间情景的真正典范。同时他认为,尽管他憎恶道德说教不下于一切其他的故作多情和装模作样的形式,归根到底,伟大的文学总是表现出关心真理和人们心目中的道德价值。

---

① 里弗希兹:《马克思的艺术哲学》,第83页。



马克思在谈到文学时从来没有用过“反映”或“反射”的形象，尽管他有时在谈到语言和哲学时确曾偶而用到过<sup>①</sup>，这在上文已有述及。尽管如此，他经常纲领式的把注意的焦点集中在他所说的以“实际的”财产关系为基础的“实际的”社会环境中的“实际的”人上，这必然导致他对文学进行仔细的研究，从中寻找文献性的材料。他显然认为，文学能够告诉我们关于产生文学的那个社会的情况，它的组织、制度、生产方式、思想和感情方式。他从世界伟大作家，从荷马和埃斯库罗斯到普希金和巴尔扎克，也从较小的作家，从安谛巴特洛斯到保尔·德·科克那里，寻找他们所处的国家和他们为之写作的读者的情况，寻找他们多少自觉地信奉其价值标准的那些阶级的情况。但是他显然从来没有把作家笔下的世界错误地当作那个作家所了解的生活的简单的镜面形象。作家是有所选择，有所强调的，因此可以使他的读者能够清楚地生动地看到实际生活中纯粹由于无关重要的细节太多反而看不到的过程。在文学中出现的东西必须是有意义的，有代表性的，但是这并不是说要抽象化，给拉萨尔的关于《弗兰茨·冯·济金根》的信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他所推崇的剧本和小说往往是在下列意义上“忠实于生活的”：它们的人物表现了个性，甚至古怪，但仍是他们那一类型的人和他们的处境的典型。他们绝不能成为作者宣告自己信念的传声筒；他们必须表现出内在的逻辑性和一致性，以实际社会中类似人物的思想活动和社会行动为根据，“个性和特性是典型性的组成方面。”<sup>②</sup>这样，巴尔扎克或狄更斯的一部小说可能成为一个“具体的世界”——它可能比大多数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

<sup>①</sup> “罪犯的巢穴和他们的言谈反映罪犯的性格。”（《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71页）“18世纪末德国的状况完全反映在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中”（《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211页）。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圣·路易斯，1973年）第31页。



家的著作更多地揭示法国或英国十九世纪生活的动因，更多地揭示人性在其总的方面和在时间上以及社会学上特殊的方面的作用。

因此，应该没有疑问，尽管马克思从来没有在文学批评的角度使用过“现实主义”一词，或者它的无论哪个派生词，在他 1844 年以后的著作中出现的关于小说和戏剧的美学观点可以毫不歪曲地称之为“现实主义的”美学。不过，不是一种“自然主义的”美学——他从来没有显示他对于那种把生活的原始材料当作文学的作法有什么喜爱。这种美学也不排除幻想：他在《一千零一夜》、夏米索的《彼得·施莱米尔》、霍夫曼的《小察赫斯》和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这样的“幻想”作品中发现了人生经验的适当象征。

除了文献作用和象征作用之外，在马克思的文化天地中，文学还可以起一种“批判”作用。一个象欧仁·苏那样的作家，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反映或讨好了他的读者对象的偏见；但是即使是他，也偶而可以达到伟大作家的成就，用小说形式，反映了同他自己自觉采取的政治和社会立场背道而驰的社会实际。狄德罗和歌德，分别通过拉摩的侄儿和靡非斯托斐勒司，阐明了对社会倾向和制度的愤世嫉俗观点，有益地揭露了欧洲“文明社会”的不光采一面。劳动阶级虽然基本上被剥夺了享受文学的机会，不能自由地发挥他们从事文学创作的才能，但是有时偶而也可以找到一种有力的批判的声音；例如，西里西亚织工之歌就是明证，马克思非常推崇它的洞察力和成熟性。

马克思的著作在文学上发表的美学见解，在很大程度上要追源于海德、歌德、席勒、奥古斯特·施勒格尔、黑格尔的美学。<sup>①</sup> 他

---

<sup>①</sup> 帕祖拉在《马克思和德国古典美学》中说明了马克思的美学和 K·P·莫里兹、康德的美学之间的连续性。关于马克思美学“来源”，《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圣·路易斯，1973 年）第 40—45 页中有很好的总结。



认为有必要把个别与一般、特殊与代表、具体与象征结合起来的见解，直接导源于魏玛古典主义。尽管他明白反对浪漫主义，他的“全面的人”的理想——在他设想中的未来世界中，人们“随自己所想，可以早上打猎、下午捕鱼、晚上养羊、饭后从事批评，而不必非做一个猎人、渔夫、牧羊人或批评家”——同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所设想的“自由的有文化教养的人”的形象有许多共同之处。<sup>①</sup> 他的批评辞汇也受到上述德国作家的很大影响——他象他们一样，把各种各样的生物学上和生理上的隐喻作了许多试验，不过他还加上了“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个有名的隐喻，并且用了象 Schein(美学上的错觉)这样的一个关键概念，其方式肯定不会使席勒感到满意。但是，本书应该已经毫无疑问地证明，马克思在与文学的实际接触中，从来没有机械地、一成不变地搬用“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个模式，而且事实上，在他的对当时文学作品的评论中，这个模式也从来没有占过突出的地位。

马克思在其一篇早期论文中曾经说过，人的头脑不是一个收状子的法官；文学上的认识对象在不同的读者的头脑中有不同的反映，每个文学对象都需要特殊的、具体的对待。他对德国实验美学心理学的开创者费希纳不屑一顾，这说明对于那种把注意力从艺术的文学作品及其创作者那里转移到读者的心理上面去的美

---

<sup>①</sup> 参阅库克斯的论文：《马克思——革命者的自白》(苏黎世，1966年)，第74页；F·J·拉达兹：《马克思政治传记》，第362—363页。M·H·阿勃拉姆斯讨论到马克思与英国浪漫主义运动时得出结论，认为“马克思的理想人类包括浪漫人文主义的基本价值标准”，但是他又说：“不同之处在于，席勒、谢林、黑格尔、柯列律治、华滋华斯、布莱克以不同方式赋予艺术家的想象作品的调和和一致作用，马克思把它加以扩大，包括了凡经人工之手的一切作品——那就是说，只要该项作品是在自由的共同的企业的环境中完成的。”(《自然超自然主义》，载于《浪漫主义文学的传统和革命》(纽约，1973年版)第314,316页。)



学主张,他是一点也不赞成的。但是,在关于欧仁·苏和金克尔的评论中,他的确也显出,他是能够窥探一部文学作品在写作和阅读时所发生的心理过程的。他在晚年显示,他特别注意到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在早晚时代不同的读者面前所呈现的方面是不同的。新的社会经验、新的需要可能使人看到一部艺术作品的头一批热情的读者所没有看到的广度和意义。这是文学作品所造成的永恒吸引力的一个方面;同第一个方面有辩证关系的另一个方面是,过去时代的伟大作品所代表的,是人类的一个独一无二的“**瞬刻**”,它在生活中已一去不复返了,可是却保存下来供后代享受它在艺术上的表现。马克思在他早期的著作中也谈到艺术家所遵循的“**美的法则**”。就是由于遵循这种“**法则**”,使人类有别于禽兽,因为后者是没有审美感的;正如最拙劣的人类建筑师由于在实际建筑房子以前已经在想象中建筑起来而有别于最高明的蜜蜂或蜘蛛一样。

马克思不常谈到形式问题。他在文学上的美学观点,象黑格尔的一样,承认 *Gehalt*[内容]第一,主题和思想第一;他在早年有句箴言:“形式如果不是表达其内容的形式就没有任何价值”,这在他评论具体文学作品时仍在他的思想深处经常起作用。这句箴言的含意是,一部作品要表达什么思想和它的表达方式必须协调一致。但这也意味着马克思对于那些知道怎样使用缰绳但是却没有马匹的艺术家,对于一切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对于用华丽的辞藻掩盖陈腐的思想、感情、甚至纯粹无知的“**美文学**”感到厌烦。这使他甚至称赞拉萨尔没有写正确的无韵诗,这倒不完全是讽刺。但是他在其他时候使人看到,他完全意识到作家不仅需要思想和感情,也需要掌握他的专业。他在他的几篇最犀利风趣的文章中痛贬了不忍卒读的诗句和拙劣的遣词造句。在马克思看来,诗人在思想和感情上的缺陷正是通过他的语言水平、通过他的诗和散文



的韵律暴露出来的。上文已有述及，他象十八世纪的古典派一样推崇他在《大纲》中所说的希腊艺术的完整的结构，“严密的形态和形式及其一定的限度”。<sup>①</sup>

马克思在1859年写信给拉萨尔说，他本人对文学的感受主要是思想上的；不过他也努力注意到富有想象力的文学作品所具有的和应该具有的感情上和内心上的吸引力，这在这封关于《弗兰茨·冯·济金根》的信中也有所说明。对于某些主题、结构、形象、声音、韵律，人们产生一种直接刺激，一种似曾相识的感受，批评便是要在事后说明这种感受。人们是以整个存在来感受的，用他们的眼睛、耳朵、感情，还用他们的思想。象从鲍姆加登<sup>②</sup>起的德国美学家一样，马克思把艺术看做是意识的一种感官上的形式，不同于抽象的思维——最使他感到好笑的，莫过于听到象卢格那样的批评家推崇他们所喜爱的作家时说，因为他们的作品产生了一种充分成形的、明白的哲学体系。

在马克思看来，一切取决于产生感受的是谁，对什么产生感受。从人们的文学趣味可以看出他们是何等样的人。因此，马克思对普斯特库亨、道梅尔、金克尔这样虽属次要但有代表性的人物的刻划，在不小程度上，是通过这种人所推崇或不喜欢的文学作品的，是通过他们从这种作品中挑出来赞扬或责备的一些方面的，是通过他们怎么样想按照作品中的主人公或理想来安排自己的生活 and 作品的。马克思对卡莱尔的评价也是如此：他认为

414

---

<sup>①</sup> “严密的形态和形式及其一定的限度”(见《大纲》(柏林,1953年),第388页);另参阅莫劳斯基上引书,第305页。

<sup>②</sup> 亚历山大·哥特里伯·鲍姆加登(1714—1762),德国哲学家与美学家,著有《哲学伦理学》(1746)、《美学》(2卷,1750—1758)等著作。康德在讲学中曾引用过鲍姆加登的《形而上学》(1739)。——译注



卡莱尔推崇让·保尔的离奇古怪的小说，暴露了他的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

马克思比较相信故事，胜过相信作者。从他评论文学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认为一个作者的作品可能与他的原意相冲突，他的内心思想与他的公开表白相冲突。这种看法在恩格斯于1888年4月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的信中得到了最有名的阐明。<sup>①</sup>马克思有时说起话来好象一个作家所创作的人物在实际生活中确实存在、而且其历史超出了那本小说或剧本的范围一样。但是，这种“麦克白夫人有多少儿女”的心理并不如有些人所说的那样突出。即使出现，也马上被马克思纠正过来，所用的文字正说明，作者歪曲了他自己创造的人物的逻辑，没有让他们充分发展，或者过于明显地借他们的口说话了。“据马克思看来，拉萨尔应当让他的悲剧的主人公们有可能忠实于他们自己，尽量考验他们的能力，探索自己个性中的内在、有机的辩证法。”<sup>②</sup>同时必须承认，马克思用词并不总是十分小心的，因此免不了另外一个罪名：他没有充分有力地区分一个剧中人物（例如，莎士比亚的《雅典的泰门》）的看法和作者本人的看法。但是，仔细考察一下实际引用的话和这些话在马克思的论据中出现的场合，就常常可以看出，马克思是意识到这种不同的，也估计到读者也意识到这种不同的。<sup>③</sup>

上文已经述及，马克思不赞成这样的主张，即文学作品的价值

---

① 参阅韦莱克：《现代批评史，1750—1950年》，第3卷，第238页。

② 参阅亨利·阿尔冯：《马克思主义美学》，译者海伦·兰恩（伊泰卡和伦敦，1973年），第37页。

③ 也有例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引用《雅典的泰门》的一句话确实似乎把泰门的看法与莎士比亚本人的看法等同起来。马克思把从第四幕引用的一段话作了很大的剪裁，使人看不到泰门对他所记述的情况感到深恶痛绝。（见《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255页。）

与它所包含的抽象思想或成套说教成正比例。但是这并不是说他把美学经验看成是“非实际的”。恰恰相反：在他看来，文学有多种“用途”，其中有些用途，本书已有介绍。他认为文学享受，象文学创作一样，是 Praxis〔实践〕的一种形式，使人类凌驾于禽兽之上，提高了人类潜力的发挥，<sup>①</sup>使人看到了过去和现在的现实和将来的可能性。但是，在马克思看来，文学所以能做到这些，所依靠的手段完全不同于哲学的手段，它用任何哲学体系都不能与之匹敌的一种方式吸引“全面的”人。把文学与哲学或抽象思维混淆起来，对作者同对读者一样都是个致命伤。因为这有可能使作者直接表白他们自己的观点，象马克思时代的许多政治上的Tendenzdichter〔倾向诗人〕那样，或者象拉萨尔在《弗兰茨·冯·济金根》中那样，而不是用他们的艺术的丰富多采，表现出一个具体的、复杂的、有形的现实境界。

马克思在其私生活中经常给人看到，文学怎么样可以点缀、活跃和提高生活。为了要对人表示难以措词的问候，他起先自己写诗，后来借用或改写别人的诗。他同他的孩子一起朗读故事和诗歌，根据民间传说或者德国浪漫主义文学自己编故事，但是用自己的特性、自己的问题、自己的社会经验予以充实。他高声朗读好几种语言的诗歌和戏剧，既欣赏它们的内容又欣赏它们的声音和韵律。他用莎士比亚、狄更斯、乔治·爱略特的作品中的人物的名字来刻划他的熟人。他阅读希腊文、拉丁文、西班牙文、俄文、法文、英文、德文的富有想象力的作品，既作为消遣，又吸收教益。作为一个社会人士，既是作家又是演说家，马克思经常引用他所仰慕钦佩的过去和当代的作家。为了论战的目的，他采用埃斯库罗斯的

<sup>①</sup> 参阅亨利·阿尔冯上引书，第26页。



416 普罗米修斯的口吻，莎士比亚的忒耳西忒斯的口吻，歌德的靡菲特托斐勒司的口吻。他引用世界上伟大作家——或者尽他记忆所及做到精确无误，或者有意改写——以最集中、最令人难忘的方式提出他的论点。有的时候，记得这种引用的话的原来出处，对要达到的目的是不利的，例如马克思从莎士比亚笔下最令人讨厌的一个人物、《李尔王》中的康华尔公爵的嘴中引用了一句他显然同意的话。有的时候，原来的出处无关重要：例如，马克思“直用”了或者说讽刺地用了歌德的《西方和东方的合集》中他喜爱的诗句，读者完全可能既对此有充分的感受，而又不会记得这些诗句是摘自讲述帖木耳的一本书的，而且是一首情诗的一部分，其中的情人描写了为了要为他的对象制造几滴香水得用掉大量的玫瑰花。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情况是大多数——记得原来的出处的确能加强马克思要我们得出的对比效果。然而有的时候，所引用的是特别有名的文学作品，我们如果认不出原来的出处就会大大减弱要想达到的效果。我们不要忘了，马克思引用的某些话原来出诸莎士比亚的夏洛克之口，而且，没有能够控制他所召来的幽灵原来是巫师的学徒的失败，而不是（象在《共产党宣言》中那样）是巫师本人的失败。

马克思喜欢让读者把文学创作中的人物（如堂吉诃德、福斯塔夫或者俾克史涅夫）当作一种典型，来代表他的对手，或者说他的对手在基本方面就是由这种典型衍化出来的。他利用具体文学作品中的事件，象个模特儿一般，来说明实际社会世界中所发生的事件的实际的或颠倒的逻辑（例如，黑格尔左派把精力集中在反对宗教时使他想起了堂吉诃德向出殡的行列进行袭击）。<sup>①</sup>在实际生活中“不透明”的经济过程在文学中可能弄得“透明”，因此，《鲁滨逊

<sup>①</sup>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260页。



《飘流记》就成了《资本论》第一卷中的头号展品。马克思发现，人们的论争和行动的结构，在文学的结构中都有清楚的表现：或者在《约克尔之歌》那样的个别作品的结构中，或者在具体的剧本的具体的场景的结构中，例如福斯塔夫把穿麻布和穿草绿衣服的人数越来越扩大，或者在某一个文学体裁的典型结构中，不管是悲剧、喜剧、笑剧还是讽刺模仿剧。他总是替换地把实际世界中的行动和事件的逻辑同文学中的行动和事件逻辑来作对比而加以突出，例如他谈到“颠倒的彼得·施莱米尔”用黄金买影子。他一鼓作气地提到一部具体文学作品，用这种暗喻办法作为把他自己的论文和小册子串联起来的主导主题，例如波雅多的《钟情的罗兰德》，或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或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他为了要更加有力地说明他的论点，甚至有意模仿文学结构：《资本论》第一卷中常见的戏剧化的写作方法是个极其说明问题的例子，但绝不是个孤立的例子。他经常使用文学和文学批评中的隐喻来刻画人物和事件。最后同样重要的是，他发现文学批评中有些技巧——韵律分析、形象研究、句子结构研究——是把对手的观点连同他们的文风一起批臭的有力手段。在这一类的批评中，他就批评他的对手在音韵、含义上各种各样的错误：实际说的话和作者自以为说的话之间有很大出入，空洞的辞藻堆砌，废话连篇，不具体的抽象概念，说话转弯抹角，要想超然于不可解决的矛盾之上，语言上的暧昧反映出思想上的暧昧，对遣词造句的历史背景缺乏考虑，语义和词义上玩弄花样，混杂的隐喻，诗句粗糙，文法错误，不善运用韵律等等。这样的分析帮助马克思一方面提出自己的论点而同时又对他的敌手报之以恩格斯于1881年2月2日给爱德华·伯恩施坦信中所说的“鄙视和嘲笑”：

417

“既然您那里有《新莱茵报》，您可以不时翻阅一下。正由于我



们对自己的敌人持鄙视和嘲笑的态度，在戒严前的六个月里我们获得了差不多六千个订户。虽然在11月我们不得不一切从头开始，1849年5月我们又拥有原来的订户数目，而且甚至更多。”

418 上文已经说明，马克思的许多引文都改动了原来的用字。这种改动往往是有意的：他利用别的作家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为了要适应自己的需要，必要时不惜改动他们的词句。有的时候，他的用词和原文的用词的不同本身就是他要达到的效果的一部分。但是也有有的时候，只是由于马克思记性不好，例如他在1866年10月13日致库格曼的一封信中诚恳地坦率地承认：“我有时引证光凭记忆，没有核对原著。”但是即使如此，他造成的错误从来没有象我们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发现的那么严重。马克思对语言上的声色变化听觉敏锐，记忆力强，不可能象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最后一句话中那样随便删节席勒的话。

象他的时代的其他有教养的人一样，马克思发现他的头脑里越来越多地储存了 Bildungsgut [文化财富]，那就是世界上伟大作家的辞句，可以用来装饰自己的文章，而在思想上或感情上不用完全同意。他偶而这样利用文学上的引语和引喻，这固然毫无疑问。但是更经常的情况是，这种引语和引喻有一种权威的力量。马克思引用他所能够尊重的、而且他的读者可能觉得自己有些最精采的文化生活得归功于他们的那些作家的话，使得他自己的论点增加了力量，而且有的时候可以使他免得再去寻找有力证据。但是，除此之外，这种材料也帮助马克思把人类的经济活动和他自己的文化活动之间的复杂联想连串起来。他的思想的活跃、他的多样而又统一的兴趣的范围的广泛，没有其他地方比这样把极其多样的引语结合在一起，表现得更为明显了，尽管他有时做得有点过分，尽管（例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部分章节中或者《福格特先



生》中)引喻过多或重复使人厌倦,而失去原定的效果。

在《巴黎手稿》题为《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的一节中,马克思痛斥私有财产制度“使我们这么愚蠢小气,以为一件东西在为我们所有的时候——作为资本而为我们存在,或者在为我们直接占有、吃、喝、穿、住的时候,总而言之,在为我们所用的时候——仅仅属于我们的。”上文已经述及,伟大的文学对马克思有价值,决不仅仅是因为它反对单纯的“功利”和“消费”思想。同时,他的文学引语和引喻经常起着敲警钟的作用,要我们防止把他降低为经济学家,卡尔·科希<sup>①</sup>等人在马克思后来的门徒中就发现出现了这种情况;要我们不要以为只有经济斗争和社会斗争才是重要的,不要以为关心文学就是在上层建筑跳舞,只能使世界上的工人脱离革命任务。路德维希·白尔尼在以前的政治斗争中就曾经批评海涅犯了这种分散注意力的错误。读者想必记得,在那次争论中,马克思是坚定地站在海涅一边的。

419

马克思从《莱茵报》时代的早期活动开始,就一直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诗歌和小说的作家能够对一个事业作出极大的贡献:提倡这个事业,出版一些针贬不公正现象的作品,呼吁必须进行改革,取笑嘲弄敌人。因此,当那些曾经和他合作过的作家一个个开始疏远他的时候,或者表现出不能全心全意地支持他的社会和政治见解的时候,他深感伤心。但是从上文可以看出,这并不是说,他完全是,或者甚至主要是根据一个作家的作品的“寓意”符合他自己的信念和希望的程度,或者根据这部作品在当前斗争中作为武器的用途,来评价这部作品的。他从来没有贬低过海涅的后期作品,也没有贬低过海涅在他的观点同马克思的观点完全一致以前所写

<sup>①</sup> 卡尔·科希(1886—1961),德国哲学家,著有《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等书,30年代曾写过《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原则》、《资本论导言》与《我为什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等论文。——译注



的早期作品，尽管他显然不赞成海涅公开恢复一神教的信仰。反过来，他也没有赞扬过格奥尔格·维尔特的作品，尽管维尔特是《新莱茵报》最重视的撰稿人之一，而且在马克思的眼中从来没有（象弗莱里格拉特那样）成为一个变节者。他热爱但丁和歌德，不下于莎士比亚，尽管他很了解前两位作家的世界观，知道这种世界观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同他自己的世界观是有矛盾的。在这里需要发挥历史的想象力：对于他同时代的有些人由于克罗卜史托克的诗歌中对人生的态度不同于新黑格尔派的态度就抨击他的诗歌，马克思只有嗤之以鼻。

420 但是，也有一些情况，马克思对某一作家的政治立场和活动极为反感，他似乎甚至矫枉过正，连那个作家所遗下的富有想象力作品也不屑一读，或者有什么感受。他对艾德蒙·斯宾塞和约翰·戴维斯爵士的评价就是以他们在爱尔兰问题上的关系为依据的，并没有因《仙后》和《乐队》而丝毫减弱。他对沙多勃利昂的评价是以这位作家的政治活动和历史著作作为根据的，而且就我们所知，并不因为《勒奈》<sup>①</sup>出版后得到重视而受到什么影响。他对各种各样的田园诗式的文学也都不耐烦，他不喜欢盖斯纳、不喜欢歌德的《海尔曼和桃乐赛亚》中的主人公、不喜欢奥尔巴赫的乡村小说，都说明了这一点。当然，我们可能感到遗憾，这有时是不公平的，例如，不象白尔尼和海涅，马克思对让·保尔的作品从来不能予以充分的估价。但是我们没有权利要梨树结出苹果来。他是作为一个全面的人来看待文学的；而马克思如果能够赞赏资产阶级的田园诗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了。

他的爱好不可避免地是有偏向的，他的阅读范围极其有所选

---

<sup>①</sup> 《勒奈》是沙多勃利昂 1805 年出版的一部小说。主人公勒奈具有热烈的心情和忧郁的性格。他的姐姐觉得勒奈对她太热烈而害怕，遁入空门修行，勒奈离开故乡，飘流到美洲。书出版后风行一时，其忧伤的情调形成 19 世纪的“时代病”。——译注



择；他不可能好几天好几个星期对一些文笔纤细的文学作品留恋忘返，精心欣赏，品评别人的评价，以便纠正或指导自己的评价。他也不可能有足够的的时间和金钱“跟上”他那一时代的文学生产。他多年来积累了一些现成的喜爱的引语和引喻，可以在不同的场合起不同的作用。但是尽管上述的种种一切，他触及的范围之广，而且，由于他的观点有力，他关于文学的评论中明显的判断错误的地方相对之少，仍是很突出的。

但是，“判断错误”不应与“个人专用”相混淆。马克思的著作是一个有强烈个性、意见和爱好的人按照自己的特殊需要专用伟大作家的作品的完美典范。但丁的例子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说明。显然，成熟时期的马克思认为《神曲》，特别是《炼狱》，可以适用于他本人的生活和问题，尽管这部作品有超自然的成分；在这方面，《神曲》同歌德的《浮士德》，巴尔扎克的《改邪归正的梅莫特》，当然还包括路德的《圣经》译本这种具有超自然成分的其他作品一样，在马克思的想象和风格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从本书前几章中所举出的马克思始终在世俗的意义上引用《神曲》的例子可以看到，但丁突然出现在他脑际可分六种不同的情况。一个异乎寻常的景象或者新鲜事儿，例如他第一次看到硫磺浴，便在他的脑海中引起了文学上的联想，他看到的景象成了“但丁的《神曲》中的无罪的场面”。其次是，他想寻找某种方法来说明他本人所走过的、也希望他的信徒要走的不屈不挠的道路，于是想起了维吉尔对但丁的教诲“跟着我走，让人们去说吧”。但是由于他没有维吉尔可以跟随，他就把它改为“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吧。”但是他也发现，在某些情况下，但丁的诗句完全符合他本人的感情，不需要作文字上的改动。但丁让卡西亚基达说出关于“爬上流亡的艰难阶梯”和关于流亡者不得不与坏人为伍的话语，马克思似乎觉得非常适合，可以用来说明他本人的经历，就象海涅总是觉得《天堂》中

421



这几段落非常适合、可以用来说明他自己的经历一样；马克思对经济学这门“沉闷的科学”的钻研，似乎也需要但丁的地狱要求那些想进入地狱大门的人拿出来同样的勇气和决心。在其他的时候，他在《神曲》中发现有表达经济学论点的幽默方法，例如，他把但丁的圣彼得用过的关于金钱的隐喻放在一个商品所有者的口中，要对方不要多说废话，直截了当：“我们现在已经相当明白这个铸币的重量成色；但是请告诉我，你的钱袋里有吗？”在《炼狱》中，马克思又象海涅一样发现，除了向敌人进行辱骂以外，还有一套现成的量罪用刑的惩罚方法，《福格特先生》中有好几个这方面可以说明问题的例子。最后，马克思在读了但丁的作品以后发现最重要的是，《炼狱》可以提供许多对比来刻划、提供许多标准来衡量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为城乡贫民所造成的人间地狱。

422 上文已有述及，马克思使用 *Literatur* 和 *literarisch* 并不单指富于想象力的文学作品；他也深意地用这种名称泛指凡是书写的或印刷的材料，不论是否有艺术性，也用来指某一特定的调查范围的著作。这不过是他的信念的一个外表表现。他的信念是，富于想象力的文学和其他种类的著作并不是完全截然可分的，而这一点本身又是他最深刻的一个信念的必然结果，那就是：人们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他们所创造的一切制度，他们所形成的一切社会关系，都是有紧密联系的；因此对这一切的研究应该形成一个整体，一种“人类的科学”。当然，我们可能不同意马克思怎样看待和提出这种相互关系的方式，可能不同意他认为为了要克服社会上的不公正和不平等现象而必须采取的手段。我们可能对于他对文学结构和文学作品的“文学性”没有给予足够的明显重视而感到遗憾。但是，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始终坚持，需要把一个人和他的作品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这一点，甚至那些在其他方面极不同意他的人，也许也会觉得是不无教益的。



我们必须把马克思的喜爱文学和阅读文学作品，看成是他要了解世界上已有的思想和言论的精华的努力的一部分；马克思经常作这样的努力，马修·阿尔诺德也是如此。在马克思逝世的那一年，阿尔诺德由于同托马斯·赫胥黎<sup>①</sup>发生争论，在刺激之下写了下面的信仰自供：

“我谈到了解世界已有的思想和言论的精华；赫胥黎教授说，这就是了解文学。文学是个大字眼；它可以指用文字写出来的或印成书本的一切东西。欧几里德的《原理》和牛顿的《原理》因此都是文学。一切通过书本传到我们手中的知识都是文学。但是赫胥黎教授说的文学是指纯文学。他的意思是要我说，了解现代各国已有的思想和言论的精华就是了解它们的纯文学而已。他争辩说，要批判现代生活，以此为武器是不够的。但是由于我并不是说，了解古代的罗马，就仅仅是多少了解一些拉丁纯文学，而不考虑到罗马在世界上的军事、政治、法律和行政工作；而且由于我认为，了解古代的希腊，就是了解它是希腊艺术的创造者，它是自由地正确地运用理性的指导者和科学方法的指导者，它是我们的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和生物学的奠基者，我认为了解它所有这一切，而不仅仅是了解一些希腊的诗歌、历史、条约和演说，因此对于现代各国的了解也是如此。所谓了解现代各国，我的意思不仅是指了解它们的纯文学，而且也了解象哥白尼、伽利略、牛顿、达尔文那样的人做了一些什么贡献……要了解意大利的纯文学并不就是要了解意大利，要了解英国的纯文学并不就是要了解英国。要了解意大利和英国，还有许多的事情要了解，伽利略和牛顿就是其中

423

<sup>①</sup> 托马斯·亨利·赫胥黎(1825—1895)，英国生物学家，信仰达尔文的进化论，著有《人类在自然界的地位》(1863)、《生命的物质基础》(1868)、《伦理和进化》(1893)等书。——译注



之一部分。说你是个浅薄的人文主义者，只懂纯文学的一些皮毛，这种责备用在某些其他学科上可能很合适；但是用在我所建议的了解世界上已有的思想和言论的精华这门具体学科上，这种责备并不适用。我所说的精华当然包括现代大自然的伟大观察家和研究者的思想和言论。”<sup>①</sup>

后期的马克思会更加有力地坚持“行”和“知”一样重要；尽管他喜爱荷马和埃斯库罗斯，尽管他推崇伊壁鸠鲁，他大概不可能象阿尔诺德在这一段文章内那样毫不含糊地认为，古代的希腊“是自由地正确地运用理性的指导者和科学方法的指导者”的。但是这段文章中没有别的东西是他不会全心全意地赞成的。

因此，当马克思考虑到文学时，他是在一种广泛的经济、社会、历史的条件下考虑到文学的。当他考虑到一个具体的作者，或者一部具体的文学作品时，他是在同多种语言的其他作家、其他作品联系起来考虑的。他在《共产党宣言》中的提法——“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在他本人身上确是如此。我们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所考察到的他引用许多国家的文学的频繁情况说明，他已经使他的预言在他本人的生活中以及在他本人的著作中在多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现实。当然，他始终仍旧意识到地点上和时间上的不同，而且不止一次地想证明，一个具体的作家（比如说卢克莱修或者但丁）为什么可以说是他的民族、他的时代、他的社会环境的“代表”。他象歌德在他的关于 Weltliteratur〔世界文学〕的言论中一样，并没有把“世界文学”看成是标准划一而没有差别的。

---

<sup>①</sup> 马修·阿尔诺德：《文学和科学》——阿尔诺德于1883年在美国巡回讲学时的一篇演讲。这是针对赫胥黎于1880年在伯明翰的一篇演讲《科学和文化》的。



马克思在他的生平和他的著作中都表明，一个人是能够同时精通好几个国家的文学的，欣赏它们的特点和多样性，让自己对其中一国文学的了解来加深和丰富对其他一国文学的了解。他象海德一样坚决主张对文学采取一种比较的和历史的态度。但是，尽管他对印度和中国的政治社会组织发生兴趣，尽管他偶然提到费尼莫尔·库伯和比彻—斯托夫人那样的北美作家<sup>①</sup>，对马克思来说，“世界文学”基本上是指西欧文学。他的著作中很少有地方可以同歌德接受波斯、中国、印度的文学的情况相比——如果我们把下列情况除外：《一千零一夜》的故事，象对他的孩子一样，对他也具有极大的魅力，他在晚年对阿拉伯寓言也产生了兴趣<sup>②</sup>，他还偶而涉猎吕凯特从波斯文翻译过来的故事，或者印度的关于神猴哈奴曼和神牛撒巴拉的故事。

本书研究的范围有意只限于马克思本人同文学的关系，没有涉及后来辩证法思想作文学上的应用，也就是乔纳森·库勒所说的那种“把思想作二次乘方的应用，也就是思想在自身升华的运动中反映到自身，并且在折回去的时候发现在某一水平上被认为是一种局限性或缺陷的事物，而在更高一个水平上却变成一种力量或有利条件。”<sup>③</sup> 本书没有想越过马克思本人进而研究后期的恩

① 比彻—斯托夫人是在马克思 1861 年 9 月 18 日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文章中提到的（《马恩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321, 323 页）；象他的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他用“汤姆大叔”一词来泛指美国南部诸州受苦的奴隶（例如，1853 年 4 月 30 日的《人民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93 页）。马克思也不止一次地提到本杰明·富兰克林（他对富兰克林的价值理论极为推崇），在致丹尼尔逊的一封信中也提到一些没有具体指名的作家：“美国的优秀作家们公开地宣布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尽管反对奴隶制的战争打碎了束缚黑人的锁链，然而在另一方面，却使白人生产者遭到奴役。”（《马恩全集》，中文版，第 34 卷，第 333 页。）

② 见他在 1882 年 4 月 13—14 日致劳拉·拉法格的信——《马恩全集》，中文版，第 35 卷，第 303 页。

③ 乔纳森·库勒对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和形式》一书的评论，载于《现代语言评论》第 69 号（1974 年），第 599 页。



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梅林、考德威尔<sup>①</sup>、卢卡契、布莱希特、本杰明、艾德曼、费希尔、葛兰西、台拉·伏尔普、马契雷和许许多多其他发展了今日所谓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人。这种发展所根据的出发点往往是马克思在那些根本没有公开谈论文学的著述中可能给予的暗示。他对意识形态和神话、对“商品拜物教”、对“生产性消费”、对矛盾和全面、对 Praxis〔实践〕和权威的看法，象辩证法本身一样，都是可以加以改述、发挥、并入一些与马克思本人思想迥然不同的体系中去，而这些体系的思想相互之间也同样极其不同。但是，这是另外一回事，可以另写许多专著。

---

<sup>①</sup> 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1907—1937)，英国文学批评家，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论集《幻觉与现实》(1937)在30年代左派当中颇有影响，西班牙内战时参加国际纵队作战牺牲。——译注

## 年 表

- 1835年 中学毕业作文。
- 1835—7年 诗歌和其他文学作品。
- 1841年 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区别》。
- 1842—3年 为《莱茵报》撰稿。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 1844年 在卢格编的《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文集》上发表文章。  
在《德法年鉴》上发表文章。  
在《前进报》上发表文章。  
《经济学—哲学手稿》
- 1845年 《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同恩格斯合著）。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 1846年 《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同恩格斯合著）。
- 1847年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  
在《北极星报》上发表《保护关税派、自由贸易和工人阶级》。
- 1847—8年 为《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撰稿。
- 1848年 《共产党宣言》（同恩格斯合著）。
- 1848—9年 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文章。
- 1850年 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发表文章。
- 1852—62年 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和《人民报》上发表文章。
- 1852年 在《革命》杂志上发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 1853年 《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高尚意识的骑士》。  
《帕麦斯顿和俄国》（政治小册子第一集）。
- 1854年 《帕麦斯顿勋爵》（政治小册子第二集）。



- 1854—5年 在《新奥得报》上发表文章。
- 1856—8年 在《自由新闻》和《外交评论》上发表文章。
- 1857—8年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
- 1858—9年 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稿。
- 1859年 《政治经济学批判》。  
在《人民报》上发表文章。
- 1860年 《福格特先生》。
- 1861—2年 为《新闻报》撰稿。
- 1864年 起草国际工人协会临时章程,并发表演说。
- 1865年 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上发言,后以《价值、工资和利润》为题发表。
- 1867年 《资本论》第一卷(其他各卷的初稿和摘记在逝世后以《资本论》第二、三卷和《剩余价值理论》为题出版)。
- 1867—73年 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起草宣言、纲领和声明。
- 1870—1年 《法兰西内战》。
- 1875年 《哥达纲领批判》。
- 1877—8年 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第二编第十章写稿。
- 1880年 在《社会主义评论》上发表《工人调查表》。

## 参考文献选目

### 1.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与同时代人回忆录等

-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 ed. D. B. Ryazanov and V. Adoratski (Frankfurt-Berlin—Moscow, 1927—35) (MEGA). A new MEGA is being prepared for the Dietz Verlag, Berlin.
-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Werke*. Herausgegeben vom Institut für Marxismus-Leninismus beim ZK der SED (Berlin, 1956—68) (MEW).
-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Werke, Ergänzungsbände*. (Supplementary Volumes of MEW).
-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Collected Works* (Moscow, New York, and London, 1975 ff.) (MECW).
-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Selected Works in Three Volumes* (Moscow, 1969) (SW).
-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1846—1895*, transl. and annotated by Dona Torr (London, 1936).
- Aus dem literarischen Nachlaß von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und Ferdinand Lassalle, I: *Gesammelte Schriften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von März 1841 bis März 1844*, ed. F. Mehring (Stuttgart, 1902).
-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Über Kunst und Literatur*, ed. M. Kliem (Berlin, 1967) (ÜKL)
-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Über Kunst und Literatur. Eine Sammlung aus ihren Schriften*, ed. M. Lifshits (Berlin, 1948).
-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On Literature and Art, A Selection of Writings*, eds. L. Baxandall and S. Morawski (St. Louis, Milwaukee, 1973).
- Marx, Karl, and Frederick Engels, *Articles on Britain* (Progress Publishers, Moscow, 1971).
- Marx, Karl, and Frederick Engels, *The German Ideology*, ed. C. J. Arthur (London, 1970).
- Marx, Karl: *Early Texts*, trans. and ed. D. McLellan (Oxford, 1972).
- Marx, Karl,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trans. M. Milligan, ed. D. J. Struik (London, 1973).
- Marx, Karl, *The Ethnological Notebooks of Karl Marx*, ed. L. Krader (Assen,



1972)

- Marx, Karl, *Grundrisse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Rohentwurf)* (Berlin, 1953).
- Marx, Karl, *Manuskripte über die polnische Frage (1863—1864)*, ed. W. conze and D. Hertz-Eichenrode (The Hague, 1961).
- Marx, Karl, *On Colonialism and Modernization. His Despatches and Other Writings on China, India, Mexico,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ed. S. Avineri (Anchor Books, New York, 1969).
- Marx, Karl, *Politische Schriften*, ed. H. J. Lieber (Stuttgart, 1960).
- Marx, Karl, *Karl Marx privat. Unbekannte Briefe*, ed. W. Schwerbrock (Munich, 1962).
- Marx, Karl, *Secret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nd the Story of the Life of Lord Palmerston*, ed. L. Hutchinson (London, 1969).
- Marx, Karl, *Selected Writings in Sociology and Social Philosophy*, ed. T. Bottomore and M. Rubel (Harmondsworth, 1963).
- The Pelican Marx Library. General Editor: Q. Hoare:
- Early Writings*. Translated by R. Livingstone and G. Benton, introduced by L. Colletti (Harmondsworth, 1975).
-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Rough Draft)*. Translated with a Foreword by Martin Nicolaus (Harmondsworth, 1973).
- The Revolutions of 1848 (Political Writings I)*.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David Fernbach (Harmondsworth, 1973).
- Surveys from Exile (Political Writings II)*.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David Fernbach (Harmondsworth, 1973).
-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and After (Political Writings III)*.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David Fernbach (Harmondsworth, 1974).
- 'Lettres et documents de Karl Marx, 1856—1883', *Annali* (Feltrinelli, Milan), i (1958)
- Freiligraths Briefwechsel mit Marx und Engels, ed. M. Haeckel (Berlin, 1968).
- Gespräche mit Marx und Engels, ed. H. M. Enzensberger (Frankfurt, 1973).
- Marx and Engels through the Eyes of their Contemporaries (Progress Publishers, Moscow, 1972).
- Mohr und General, *Erinnerungen an Marx und Engels* (Berlin, 1970).
-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 redigiert von Karl Marx, ed. K. Bittel (Berlin, 1955).
- Ruge, Arnold, and Karl Marx,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1844)*, ed. J. Höppner (Leipzig, 1975).

## 2. 评论与阐释著作

- Adams, H. P., *Karl Marx in his Earlier Writings* (London, 1940).
- Adorno, T. W., *Ästhetische Theorie* (Frankfurt, 1970).
- Althusser, L., *For Marx*, trans. B. Brewster (Harmondsworth, 1969).
- Althusser, L. (and others), *Lire le Capital* (Paris, 1965).
- Aptheker, H. (ed.), *Marxism and Alienation. A Symposium* (New York, 1965).
- Arvon, H., *Marxist Esthetics*, trans. H. R. Lane, Introduction by F. Jameson (Ithaca, 1973).
- Avineri, S., 'Marx and the Intellectual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xxviii (1967).
- Avineri, S.,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Karl Marx* (Cambridge, 1968).
- Barth, H., *Wahrheit und Ideologie* (new edition Frankfurt, 1974).
- Baxandall, L., *Marxism and Aesthetics. A Selective Annotated Bibliography* (New York, 1968).
- Bell, D. R., 'Marx, Sartre and Marxism', *Memoir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Manchester Literary and Philosophical Society*, civ (1961—2).
- Benjamin, W., *Schriften*, ed. T. W. and G. Adorno (Frankfurt, 1955).
- Berlin, I., *Karl Marx. His Life and Environment*, 3rd edn. (Oxford, 1963).
- Bernstein, R. J.: *Praxis and Action* (London, 1971).
- Blackburn, R. (ed.), *Ideology in Social Science. Readings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 (London, 1972).
- Bloch, E., *Das Prinzip Hoffnung* (Frankfurt, 1959).
- Bloch, E., *Über Karl Marx* (Frankfurt, 1968).
- Blumenberg, W., *Karl Marx in Selbstzeugnissen und Bilddokumenten* (Reinbek, 1962).
- Bober, M. M., *Karl Marx's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Cambridge, Mass., 1927) (new edn. New York, 1965).
- Böhme, S., *Grundlage und Methodik der Literaturbetrachtung bei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Diss. (Berlin, 1954).
- Bottomore, T. B., *Introduction to Karl Marx: Early Writings* (London, 1963).
- Bottomore, T. B. (ed.), *Karl Marx, Makers of Modern Social Science* (New Jersey, 1973).
- Breuer, K. H., *Der junge Marx; Sein Weg zum Kommunismus* (Cologne, 1954).
- Burns, E. and T. (eds.), *Sociology of Literature and Drama. Selected Readings* (Harmondsworth, 1973).
- Calvez, J. —Y., *La Pensée de Karl Marx* (Paris, 1956).



- Carr, E. H., *Studies in Revolution* (London, 1950).
- Carver, T., *Karl Marx: Texts on Method* (Oxford, 1975).
- Clecak, P., *Marxism and American Literary Criticism* (Ann Arbor, 1964).
- Cornu, A., *Karl Marx et la pensée moderne* (Paris, 1948).
- Cornu, A., *Karl Marx et Friedrich Engels, leur vie et leur oeuvre* (Paris, 1955 ff.).
- Cwojdrak, G., 'Karl Marx, die Phantasie und die Kinderliteratur', *Der Bibliothekar*, xxii (Leipzig) (1968).
- Delfgaauw, B., *The Young Marx*, trans. F. Schütz and M. Redfern (London and Melbourne, 1967).
- Demetz, P., *Marx, Engels and the Poets. Origins of Marxist Literary Criticism*, 2nd edn. revised and enlarged by the author and translated by J. L. Sammons (Chicago, 1967).
- Demetz, P., *Marx, Engels und die Dichter. Ein Kapitel deutscher Literaturgeschichte* (Frankfurt-Berlin, 1969).
- Dymschitz, A., 'Zur Sickingen-Debatte', *Weimarer Beiträge*, vi (1960).
- Dymschitz, A., 'Marx und Literatur-Antwort an Hans Mayer', *Sinn und Form*, xxi (1969).
- Elvin, H. L., 'Marx and the Marxists as Literary Critics', *Journal of Adult Education*, x (1938).
- Erckenbrecht, U., *Marx' materialistische Sprachtheorie. Mit einem selektiven Sachregister zu den Marx-Engels-Werken* (Kronberg, 1973).
- Feuer, L., *Marx and the Intellectuals. A Set of Post-Ideological Essays* (New York, 1969).
- Fischer, E., *The Necessity of Art. A Marxist Approach*, trans. Anna Bostock (Harmondsworth, 1963).
- Fischhof, H. (ed.),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Über Kunst und Literatur* (Vienna, 1948).
- Freville, J., *Introduction to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sur la littérature et l'art. Textes choisis* (Paris, 1954).
- Fridlender, G. M., *Karl Marks i Fridrikh Engels i voprosy literatury* (Moscow, 1962).
- Fügen, N., *Die Hauptrichtungen der Literatursoziologie, Ein Beitrag zur literatursoziologischen Theorie* (Bonn, 1964).
- Gallas, H., *Marxistische Literaturtheorie. Kontroversen im Bund proletarisch-revolutionärer Schriftsteller* (Neuwied and Berlin 1971).
- Garaudy, R., *Karl Marx* (Paris, 1964).
- Gemlow, H. (and others), *Karl Marx. Eine Biographie* (Berlin, 1968).

- Glaser, H. A. (and others), *Literaturwissenschaft und Sozialwissenschaften. Grundlagen und Modellanalysen* (Stuttgart, 1971).
- Glicksberg, C. I., 'Literature and the Marxist Aesthetic', *University of Toronto Quarterly*, xviii (1949).
- Goffenshefer, V. Ts., *Iz istorii marksistskoi kritiki: Pol Lafarg i borba za realizm* (Moscow, 1967).
- Goldmann, L., *Le Dieu caché* (Paris, 1955).
- Goldmann, L., *Pour une sociologie du roman* (Paris, 1964).
- Goldmann, L., *Marxisme et sciences humaines* (Paris, 1970).
- Golman, L. I. (and others), *Karl Marx. Biographie. Institut für Marxismus Leninismus beim ZK der KPdSU* (Berlin, 1973).
- Goux, J. -J., 'Marx et l'inscription du travail', *Tel quel. Théorie d'ensemble* (Paris, 1968).
- Gramsci, A., *Prison Notebooks* (London, 1970).
- Harstick, H. P., 'Zum Schicksal der marxschen Privatbibliothek',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xviii (1973).
- Hauser, A., *Philosophie der Kunstgeschichte* (Munich, 1964).
- Hillmann, G., *Marx und Hegel. Von der Spekulation zur Dialektik* (Frankfurt, 1966).
- Hinderer, W., 'Der ritterliche Adam und die Bauernrevolte. Die Debatte über die historische Tragödie "Franz von Sickingen" von Ferdinand Lassalle', *Germanisch-romanische Monatsschrift*, NF xxiii, 1973.
- Hinderer, W., *Sickingen-Debatte. Ein Beitrag zur materialistischen Literaturtheorie* (Darmstadt and Neuwied, 1974).
- Hirth, F. E., 'Heine und Marx' in *Heinrich Heine. Bausteine zu einer Biographie* (Mainz, 1950).
- Hook, S., *From Hegel to Marx. Studies in the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of Karl Marx* (New York, 1938) (new edn. Ann Arbor, 1962).
- Hyman, S. E., *The Tangled Bank. Darwin, Marx, Frazer and Freud as Imaginative Writers* (New York, 1966).
- Israel, J., *Alienation. From Marx to Modern Sociology* (Boston, 1971). (Swedish edn., Stockholm, 1968).
- Jackson, T. A., 'Marx and Shakespeare',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vi (1936).
- Jameson, F., *Marxism and Form. Twentieth-century Dialectical Theories of Literature* (Princeton, 1971).
- Jay, M., *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A Hist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1823—1950* (London, 1973).
- Johnson, Pamela Hansford, 'The Literary Achievement of Marx', *The Modern*



- Quarterly, New Series, ii (1946—7).
- Johnston, W. M., 'Marx's Verse of 1836—7 as a Foreshadowing of his Early Philosoph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xxviii (1967).
- Karbusicky, V., *Widerspiegelungstheorie und Strukturalismus. Zur Entstehungsgeschichte und Kritik der marxistisch-leninistischen Ästhetik* (Munich, 1973).
- Koch, H., *Marxismus und Ästhetik. Zur ästhetischen Theorie von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und W. I. Lenin*, 3rd edn. (Berlin, 1962).
- Kolakowski, L., *Marxism and Beyond*, trans. J. Z. Peel (London, 1969).
- Kolakowski, L., 'Marx' anti-utopische Utopie', *Merkur*, xxviii (1974).
- Kolb, H., 'Karl Marx und Jacob Grimm', *Archiv für das Studium der neueren Sprachen und Literaturen*, ccvi (1969-70).
- Korsch, K., *Marxismus und Philosophie* (Leipzig, 1930).
- Kosik, K., *Dialektik des Konkreten. Eine Studie zur Problematik des Menschen und der Welt* (Frankfurt, 1971).
- Kux, E. E. W., *Karl Marx-Die revolutionäre Konfession*, Diss. (Zürich, 1966).
- Lang, B., and F. Williams (eds.), *Marxism and Art. Writings in Aesthetics and Criticism* (New York, 1972).
- Lapin, N. J., *Der junge Marx im Spiegel der Literatur* (Berlin, 1965).
- Laurenson, D., and A. Swingewood, *The Sociology of Literature* (London, 1972).
- Lefebvre, H., *Contribution à l'esthétique* (Paris, 1956).
- Lefebvre, H., *Pour connaître la pensée de Karl Marx* (Paris, 1956).
- Lefebvre, H., *The Sociology of Marx*, trans. N. Guterman (Harmondsworth, 1972).
- LeRoy, G. C., and U. Beitz (eds.), *Preserve and Create. Essays in Marxist Literary Criticism* (New York, 1973).
- Lichtheim, G., *Marxism. An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Study*, 2nd edn. (London, 1961).
- Lifshits, M., *The Philosophy of Art of Karl Marx*, trans. R. B. Winn (New York, 1938, reprinted London, 1973).
- Lifshits, M., *Karl Marx und die Ästhetik*, 2nd edn. (Dresden, 1967).
- Lifshits, M., *Karl Marks. Iskusstvo i obschestvennyi ideal* (Moscow, 1972).
- Livergood, N. D., *Activity in Marx's Philosophy* (The Hague, 1967).
- Lobkowitz, N. (ed.), *Marx and the Western World* (Notre Dame and London, 1967).
- Löwith, K., *Von Hegel zu Nietzsche* (Zürich-New York, 1941).
- Lukacs, G.,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Berlin, 1923).
- Lukacs, G.,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als Literaturhistoriker* (Berlin, 1948).

- Lukacs, G., 'Marx und Engels über dramaturgische Fragen', *Aufbau*, ix (1953).
- Lukács, G.,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Ästhetik* (Berlin, 1954).
- Lukács, G., *Probleme des Realismus* (Berlin, 1955).
- Lukács, G., *Wider den mißverständeren Realismus* (Hamburg, 1958).
- Lukács, G., *Probleme der Ästhetik* (Neuwied, 1969).
- Macherey, P., *Pour une théorie de production littéraire* (Paris, 1971).
- MacIntyre, A. C., *Marxism. An Interpretation* (London, 1953).
- MacIntyre, A. C., *Marxism and Christianity* (New York, 1968).
- McLellan, D., *The Young Hegelians and Karl Marx* (London, 1960).
- McLellan, D., *The Thought of Karl Marx* (London-New York, 1971).
- McLellan, D., *Marx's Grundrisse* (London, 1971).
- McLellan, D., *Karl Marx: Early Texts* (Oxford, 1971).
- McLellan, D., *Marx before Marxism*, rev. edn. (Harmondsworth, 1972).
- McLellan, D., *Karl Marx. His Life and Thought* (London, 1973).
- Maguire, J., *Marx's Paris Writings* (Dublin, 1972).
- Marcuse, H., *Negations. Essays in Critical Theory* (Boston, 1969).
- Marcuse, H., *The Philosophy of Aesthetics* (New York, 1972).
- Marcuse, L., 'Marx und das Tragische', *Der Monat*, iv (1952).
- Marx and Contemporary Scientific Thought*, Publica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Council, xiii (The Hague and Paris, 1969).
- Mayer, H., 'Karl Marx und die Literatur', *Merkur*, xxii (1968).
- Mehring, F., *Aus dem literarischen Nachlaß von K. Marx, F. Engels und F. Lassalle* (Stuttgart, 1902).
- Mehring, F., 'Karl Marx und das Gleichnis', *Ges. Schriften*, vol. xii (Berlin, 1963).
- Mehring, F., *Karl Marx. Geschichte seines Lebens*, 2nd revised edn.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iii (Berlin, 1964).
- Mende, G., *Karl Marx' Entwicklung vom revolutionären Demokraten zum Kommunisten*, 3rd edn. (Berlin, 1960).
- Mészáros, I., *Marx's Theory of Alienation* (London, 1970).
- Miller, S., and B. Sawadzki, *Karl Marx in Berlin* (Berlin, 1956).
- Mills, C. W., *The Marxists* (New York, 1962).
- Miranda, J. P., *Marx and the Bible. A Critique of the Philosophy of Oppression*, trans. J. Eagleson (New York, 1974).
- Mönke, W., *Die heilige Familie. Zur ersten Gemeinschaftsarbeit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Glashütten im Taunus, 1972).
- Morawski, S., 'The Aesthetic Views of Marx and Engels',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xxviii (1970).



- Nechkina, M., 'Shakespeare in Karl Marx's "Capital"',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No.3 (1935).
- Ollivier, R., *Marx et Engels, poètes* (Paris, 1935).
- Pascal, R., *Karl Marx. His Apprenticeship to Politics* (London, 1942).
- Pascal, R., *Karl Marx. Political Foundations* (London, 1943).
- Payne, R., *The Unknown Karl Marx* (New York, 1971).
- Pazura, S., *Marks a klasyczna estetyka niemiecka* (Warsaw, 1967).
- Petrović, G., *Marx in the Mid-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1967).
- Plamenatz, J., *Man and Society.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some Important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ies from Machiavelli to Marx* (London, 1963).
- Plamenatz, J., *Karl Marx's Philosophy of Man and its Legacy of Ideas*, Oxford, 1975.
- Popitz, H., *Der entfremdete Mensch. Zeitkritik und Geschichtsphilosophie des jungen Marx* (Basle, 1953).
- Popper, K. 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vol. ii: *The High Tide of Prophecy: Hegel, Marx and the Aftermath* (London, 1945).
- Prévost, C., *Littérature, politique, idéologie* (Paris, 1973).
- Raddatz, F. J. (ed.), *Marxismus und Literatur. Eine Dokumentation* (Reinbek, 1969).
- Raddatz, F. J., *Karl Marx. Eine politische Biographie* (Hamburg, 1975).
- Rader, M., 'Marx's Interpretation of Art and Aesthetic Value', *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 vii (1967).
- Raphael, M., *Proudhon, Marx, Picasso* (Paris, 1933).
- Reeves, N., 'Heine and the Young Marx', *Oxford German Studies*, vii (1973).
- Rubel, M., *Bibliographie des oeuvres de Karl Marx* (Paris, 1956). (Supplement volume Paris, 1960).
- Rubel, M., *Karl Marx. Essai de biographie intellectuelle*, revised edn. (Paris, 1971).
- Rubel, M., 'Les cahiers de lecture de Karl Marx',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ii (1957) and v (1960).
- Rubel, M., *Marx-Chronik. Daten zu Leben und Werk* (Munich, 1968).
- Rubel, M., *Marx critique du Marxisme. Essais* (Paris, 1974).
- Rubel, M., and M. Manale, *Marx without Myth. A Chronological Study of his Work* (Oxford, 1975).
- Sánchez Váchez, A., *Art and Society. Essays in Marxist Aesthetics* (London, 1974).
- Sander, H. -D., *Marxistische Ideologie und allgemeine Kunsttheorie* (Basle and Tübingen, 1970).

- Sanwald, R., *Karl Marx und die Antike* (Zürich, 1957).
- Schiel, H., *Die Umwelt des jungen Marx* (Trier, 1954).
- Schiller, F., 'Marx and Engels on Balzac',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iii (1933).
- Schmidt, A., *Geschichte und Struktur. Frage einer marxistischen Historik* (Munich, 1971).
- Schmidt, A., *The Concept of Nature in Marx*, trans. B. Fowkes (London, 1971).
- Schuffenhauer, W., *Feuerbach und der junge Marx* (Berlin, 1965).
- Sebag, L., *Marxisme et structuralisme* (Paris, 1964).
- Smulkstys, J., *Karl Marx*, Twayne's World Author Series, 296 (New York, 1974).
- Solomon, M., *Marxism and Art. Essays 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New York, 1973).
- Sommer, C. (ed.),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Über Literatur* (Stuttgart, 1971).
- Stadler, P., *Karl Marx. Ideologie und Politik*, 2nd edn. (Göttingen, 1971).
- Stein, E., 'Karl Marx-ein Meister der Sprache', *Der Deutschunterricht* (Berlin) vi (1953).
- Steiner, G., 'Marxism and the Literary Critic', *Language and Silence, Essays 1958—1966* (London, 1967).
- Strelka, J. (ed.), *Literary Criticism and Sociology. Yearbook of Comparative Criticism*, v (1973).
- Strey, J. and G. Winkler, *Marx und Engels 1848—49. Die Politik und Taktik der 'Neuen Rheinischen Zeitung' während der bürgerlich-demokratischen Revolution in Deutschland* (Berlin, 1972).
- Teller, J.,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zu Fragen des künstlerischen Volksschaffens*, Diss (Berlin, 1967).
- Thier, E., *Das Menschenbild des jungen Marx* (Göttingen, 1957).
- Thomson, G., *Marxism and Poetry* (London, 1946).
- Trilling, L., *Sincerity and Authenticity* (London, 1972).
- Trofimov, P. S., *Ocherki istorii marksistskoi estetiki* (Moscow, 1963).
- Tucker, R. C., *Philosophy and Myth in Karl Marx*, 2nd edn (Cambridge, 1972).
- Victor, W., *Marx und Heine. Tatsache und Spekulation in der Darstellung ihrer Beziehungen* (Berlin, 1951).
- della Volpe, G., 'Methodologische Fragen in Karl Marx' Schriften von 1843 bis 1859', *Deutsche Zeitung für Philosophie*, vi (Berlin, 1958).
- Walton, P., and S. Hall (eds.), *Situating Marx. Evaluations and Departures* (London, 1972).
- Weber, P., 'Die Einheit von politischer und ästhetischer Kritik in Marx' und Engels' Stellungnahme zu Lassalles Drama "Franz von Sickingen"', *Weima-*



rer Beiträge, xii (1966).

Wellek, R., *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1750—1950*, vol. iii: *The Age of Transition* (New Haven, 1965, London, 1966).

Williams, R.,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2nd edn (Harmondsworth, 1961).

Williams, R., "Base and Superstructure" in *Marxist Cultural Theory*, *New Left Review*, 82 (Nov. -Dec. 1973).

Wilson, E., 'Marxism and Literature' in *The Triple Thinkers* (New York, 1938).

Wintermeier, J., *Um das Wesen der Kunst. Studien zur marxistischen Ästhetik*, Diss (Münster, 1971).

Wolff, A. V. Schmidt, 'Heine und Marx', *Archiv für Kulturgeschichte*, liv (1972).

Yezuitov, A. N., *Voprosy realizma v estetike Marksa i Engelsa* (Moscow—Leningrad, 1963).

Žmegač, V. (ed.), *Marxistische Literaturkritik* (Bad Homburg, 1970).

## 附 录

### 马克思读过的书<sup>①</sup>

“一位学识极其渊博的盎格鲁—日耳曼绅士”——这是马克思晚年留给一位俄国来访者马克西姆·柯瓦列夫斯基<sup>②</sup>的印象。马克思对文学造诣之深简直达到惊人的程度。他通晓德、法、英、意、西、希腊和拉丁诸语文，还懂得一点俄文，一生博览了这些文种的大量书籍。他在许多理论著作和无数报刊文章中，广泛利用了自己丰富的文学知识，因此柏拉威尔以此为主题，写成一部有价值的、趣味盎然的学术性著作。作者本人精通马克思著作，包括他那卷帙浩繁的书信，而且对马克思引用的大量文学作品也十分熟悉，所以可以说露·柏拉威尔·贾伯瓦拉<sup>③</sup>之兄——希·萨·柏拉威尔写得相当出色，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

当今明智之士都不会否认马克思在历史上的突出重要性，以及他对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研究方面所作的伟大贡献。现有的

---

① 这篇关于希·萨·柏拉威尔，《卡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书的评论载于《泰晤士报文学增刊》1977年2月4日一期。作者是牛津大学希腊文教授休·劳埃德—琼斯。译文略有删节。（本文的注释均为译者所加）

② 马克西姆·柯瓦列夫斯基（1851—1916），俄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法学家。

③ 露丝·柏拉威尔·贾伯瓦拉（1927—），英国女作家，波兰血统，1951年嫁于印度人，著有小说《热情的本性》（1956）、《埃斯蒙德在印度》（1958）、《热与尘土》（1975）等。



大量文献,包括一部分很有价值的,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不仅在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门学科中,而且在美学和文学批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都是每个有学识的读者必须与之打交道的一种学说。对它一窍不通,就不可能看懂卢卡契、瓦尔特·本杰明或卢西安·戈德曼这些重要文学批评家的作品。

柏拉威尔教授的这本书不是一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但对这方面,尤其对马克思的美学作了详尽的阐述,因此对今后撰写马克思传记的作家很有参考价值。

马克思生长在特利尔城,受到当时欧洲所能给予的最好的教育。在学校里,他扎实地掌握了希腊文和拉丁文,此后一生孜孜不倦地精读希腊和拉丁文学。肖伯纳总是带着伏尔泰主义讥诮的口吻嘲笑荷马,而马克思却对荷马十分崇敬;在他家里,荷马史诗经常被高声朗诵。他在中学还读过索福克勒斯、修昔的底斯、柏拉图、西塞罗、维吉尔和塔西佗的原作。

马克思翻译过奥维德的作品,听起来似乎令人感到惊奇,其实他的这种兴趣一直延续到晚年;他喜爱流放者的诗歌。1865年马克思在一份征询表上填写的他最喜爱的三位诗人的名字,除莎士比亚和歌德之外,就是埃斯库罗斯。他每年都要读一读他的希腊文原著;就象对歌德和雪莱一样,《普罗米修斯》一书对他也同样产生了特别强烈的印象。

但是,在马克思青年时代,古典文学研究在德国并非一种特殊的学科,而是时代要求人们所必备的文学和历史知识的一个组成部分。年轻的马克思象歌德时代的人们那样阅读古代文学,深信日后会由此而增长一种历史感。

他从少年时代起也广泛阅读中世纪和近代文学。他父亲帮助他认识到启蒙运动时期的作家,而一位有学识的邻居,即后来成为他岳父的冯·威斯特华伦男爵,则使他认识到莎士比亚和瓦尔特·



司各特爵士。威斯特华伦爱好浪漫主义，而马克思一开始也可说是一位浪漫主义者。他写过许多不太出众的浪漫派诗歌，晚年他跟他的妻子重读这些诗篇时不禁哑然失笑。思想成熟后的马克思激烈反对浪漫主义，但是我们依然看到他早期的一些观点继续影响着他对古代世界的态度。

马克思十八岁时，进入波恩大学，进修著名的古希腊文化研究者弗·哥·韦尔凯尔和奥·威·冯·施莱格尔讲授的课程。一年后他到柏林钻研哲学，从而信仰黑格尔主义。1841年，他那篇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使他获得博士学位。尽管这篇论文直到1927年才出版，一些研究这个主题的非马克思主义专家仍然从中发现不少精辟的见解。

马克思当时的学术能力已经绰绰有余，运用自如，但是促使他写这篇论文的动力无疑是他皈依了黑格尔哲学所提供的。他认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希腊哲学情况同黑格尔之后的德国哲学情况极其相似。黑格尔完成了思辨形而上学的任务，现在应由他的后继者把哲学拉回到现实世界中来，使那种理想付诸实施。这篇论文显示马克思十分赞同伊壁鸠鲁和他最善辩的信徒卢克莱修。他赋予哲学以人格化，让它说出普罗米修斯的话：“说老实话，我痛恨所有的神灵。”论文表明马克思当时是属于黑格尔学派的，但也证实他对文克尔曼和歌德时代的美学造诣很深。马克思的美学是由此发展起来的，不提这一点就无法得到充分的理解。

1843年起，马克思在巴黎居住期间，他的哲学思想逐渐成熟而形成体系。他掌握了英国政治经济学和十九世纪早期法国政治理论家的学说，因此恩格斯后来说马克思主义综合了英国政治经济学、法国政治理论和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因素。马克思后来虽然没有再系统地研究古代哲学，但他早期对这个领域的研究并没



有在他的著作里就此显得不重要。任何一位读者，在读他的著作，尤其是《资本论》时，都会为他经常热情地提到亚里士多德而深受感动。《资本论》的作者觉得他同《政治学》的作者有很多相同的观点，他称亚里士多德为社会学创始人。

他不常提到柏拉图，而且也不很赞同，无疑是因为柏拉图那种精神哲学的有神论和唯心论引起他的反感。但是，对他的哲学理论来说，他通过黑格尔从柏拉图那里比从亚里士多德那里汲取来的任何东西都更为主要。柏拉图关于理念的哲学诚然是静止的，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之所以适合马克思的意图则是由于它的能动性，是由于精神所导生的辩证发展。归根结蒂，一种思想体系往往是由另一种思想体系演变而来的；柏拉图解剖他当时的社会，希望实现一个尽可能最公正的理想共和国时所采用的大胆而无情的方式，要比亚里士多德审慎而保守的态度更加接近马克思的精神。

如果说五世纪的诡辩家普罗塔哥拉不是社会学创始人，那末创始人就应是柏拉图了。卡尔·波珀爵士<sup>①</sup>在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动猛烈抨击之前，首先就攻击柏拉图，而且心里很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干。黑格尔学派认为，历史研究能使哲学家预言历史发展的进程，这种见解就是以柏拉图的唯心主义为依据的，马克思的理论所称的科学性也正依据这一点。一旦取消思想和物质之间的差别，给单个的实体取个什么名称就不是什么首要问题了。马克思在称呼他的第一性物质时，可以利用18世纪40年代处于鼎盛时期的自然科学的威望，他本人的理论体系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但是，他的理论超越一切思辨和形而上学的理论；伊赛亚·柏

---

<sup>①</sup> 卡尔·波珀爵士(1902—)，当代伦敦大学哲学与逻辑学教授，著有《研究的逻辑》(1934)、《开放社会与其敌人》(1945)、《科学发现的逻辑》(1959)、《云与钟》(1966)等。



林爵士四十年前在这方面所作的研究，至今在众多研究马克思的文献幽暗之林中仍然犹如独闪金光的一株，他认为就严格的字面意义上来说，马克思根本不同于一般的唯物主义者，马克思总是在注意不使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同单纯的经验主义者所发展的“庸俗唯物论”混为一谈。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写于1857年，但被他扣压下来未发表，直至1939年才正式发表；他在这部著作的导言中竭力要对物质生产的发展同文学艺术的发展之间所出现的不平衡的关系这个问题作出阐释，这对一位黑格尔学派哲学家来说多少有点棘手。马克思坚持认为生产和分配状况对文艺也象对生活的其他领域一样产生影响，这一点是对的，谁也不能加以否认；同样他本人也没有象他的一些现代门徒那样生硬地过分强调经济对文化的影响。但是，对马克思来说，他最为珍视的希腊文艺是出现在社会总状况尚处于相对原始的阶段，这就构成一个需要认真加以解释的问题，莎士比亚的情况亦是如此。他很清楚，某些伟大艺术的形式甚至不可能在一个社会相对高度发展的时代里出现，马克思最喜爱的史诗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他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可能使他的一些现代信徒感到诧异。他写道：

“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它的固有的性格不是在儿童的天性中纯真地复活着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他们的艺术对我们所



产生的魅力，同它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它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它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sup>①</sup>

在马克思的整个学说中，美学占一席十分重要的地位。对马克思来说，艺术家就是视工作本身为乐事那一类型的人，而现代工业资本主义却令人可怖地使大多数人的生活远离了这一理想。马克思正是要尽可能地纠正这种状况。一旦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只剩下了一个阶级，国家消亡了，人类的生活看来将在很大程度上恢复历史的童年时代那种美丽的单纯。马克思象他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从青年所受的教育中得来的那种对古希腊的美好看法，也助长了他对将来的预言怀有那种惊人的乐观主义态度。

柏拉威尔教授在阐述马克思对每个作家的态度时，不象恩斯特·克鲁马赫那部有价值的著作《歌德和古代风格》那样在每个作家的标题下分别叙述，而是顺着马克思一生事业的发展来论述他如何在每部著作中使用自己的文学知识。作者颇有技巧地避免把书写得沉闷，常常生动活泼地加上自己对各个主题的一些见解。如果要是有所批评的话，那就是他的语调有点过分赞美了。我们如果仔细观察作者列举的材料，就会发现马克思是一位知识渊博、精力充沛并富于机智讽刺的读者，而不是一个兴趣高雅、审美感纤细的读者。概括地评述一下就能明瞭这一点。

有趣的是马克思读过《论神之都》<sup>②</sup>，可惜他对这部同他的著作有某些共同特征的作品没有记录下自己的观感。他很熟悉但丁的作品，经常加以引用，例如从《地狱篇》里搜出辱骂的语句来谴责

<sup>①</sup> 见《马恩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114页。

<sup>②</sup> 波希主教奥古斯丁（354—430）的作品，对教会应负罗马帝国衰亡之责的谴责进行辩解。



那位可怜的福格特先生<sup>①</sup>；一些贫穷受难者的遭遇使他想起乌哥利诺<sup>②</sup>的命运，他还感人肺腑地摘引描述流亡者觉得面包味咸而且不得不在别人的楼梯上走上走下受煎熬的情景那段文字<sup>③</sup>。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结尾，他引用但丁的诗句<sup>④</sup>来宣告他不妥协的态度。

马克思也很熟悉阿里欧斯托、塔索和波雅多的作品，有一次他忽然提到阿雷蒂诺<sup>⑤</sup>，使恩格斯大吃一惊。他看过马基雅弗利的作品，包括《佛罗伦萨史》和《曼陀罗华》。他责怪威廉·李卜克内西不懂西班牙文。《堂·吉珂德》是他喜爱的作品之一：他用那段描写宫廷医师怕桑丘·潘沙肠胃不适不能执行任务，因此什么东西都不让他吃的情节，来比喻普鲁士报刊在弗里德里希·威廉第四强行的检查制度下变得萎靡不振。除塞万提斯之外，卡德龙、洛贝·台·维迦和蒂索·德·莫里耶的作品也在他的阅读范围之内。

马克思有时摘引拉伯雷的话。他也经常引用莫里哀的作品，拿众所周知的人物达尔杜弗、德·布索那克先生和乔治·唐丹来比喻他的对手。至于高乃依，他只引用他的批评文章，拉辛的作品他读过，但好象没有引用过。他似乎也没有提到过拉封丹和德·

---

① 卡尔·福格特(1817—1895)，德国自然科学家，庸俗唯物主义者，1849年逃离德国，50—60年代时是路易·波拿巴雇用的密探，对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诬蔑性攻击。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1860)中揭露了他。

② 见但丁的《地狱篇》，意大利的格那得斯卡伯爵乌哥利诺1288年为其政敌所败，被俘后囚于哥兰塔中饿死。

③ 见但丁《天堂篇》第17篇第58至60行。作为皇帝党员（皇帝政权的捍卫者）领袖之一，但丁于1302年从佛罗伦萨被驱逐出外，一直到死，过着流亡的生活。

④ 序文结尾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象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⑤ 彼得罗·阿雷蒂诺(1492—1556)，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讽刺作家。



塞维奈夫人<sup>①</sup>。伏尔泰和卢梭在他的一生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他最喜爱的散文作家是狄德罗，特别是由于他那部《拉摩的侄儿》。另外他欣赏博马舍。

他谴责法国和其他国家的浪漫主义作家，尤其憎恶夏朵勃里昂。在他看来，夏朵勃里昂“以一种最惹人生厌的方式把十八世纪显著的怀疑主义和伏尔泰主义同十九世纪显著的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起来了。”他摘引雨果的作品，但显然并不热情；他十分正确地注意到雨果那篇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慷慨激昂的演说并没有击中要害。尽管巴尔扎克与马克思的政治态度迥然不同，马克思还是非常喜爱他，常常引用他的作品，而且还认真地打算写一本关于巴尔扎克的<sup>②</sup>书。事实上，他发表的唯一关于文学主题的著作是评论欧仁·苏那部耸人听闻的畅销书《巴黎的秘密》，书中荒谬之处马克思不难加以揭露。我们不晓得他是否读过司汤达或福楼拜的作品，但是我们确实知道他时常拿一本保尔·德·科克<sup>③</sup>或大仲马的小说来看作为消遣。

在他来到英国之前，马克思跟他同时代的许多德国人一样，早对莎士比亚的作品着了迷。就象对待巴尔扎克的态度一样，不同政见并没有使他感到困扰。他在自己的著作里大量引用莎士比亚，而且许多地方并非机械地引用或者落入俗套。夏洛克和泰门被详细地引证来阐明金钱的力量，前者还被用来证实他那种众所周知的、对犹太教的憎恶是正确的。当他举出忒耳西忒斯<sup>④</sup>的时候，并非不表同情。波顿<sup>④</sup>那场戏提供了一些扮演与自己性格不

① 德·塞维奈夫人(1629—1696)，法国沙龙女作家，著有《书翰集》。

② 保尔·德·科克(1794—1871)，法国浪漫主义作家，著有《月亮的情人》等小说。

③ 忒耳西忒斯是莎士比亚的《特洛伊罗斯与古瑞西达》中的残废而好谩骂的希腊人。

④ 波顿是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中的织工。



相称的角色的实例。马克思不只一次引用康华尔公爵谴责虚伪的肯特伯爵是个表面言辞率直而内心却包藏着极大的奸谋的人那段发言<sup>①</sup>，而且，柏拉威尔教授指出，马克思好象并不理会那位发言人是莎士比亚创作中最可憎的人物之一。另外他还以辛辣的语调举出福斯塔夫和道格培里<sup>②</sup>的荒谬，来跟他那些形形色色的敌手的荒谬言行相对比。

马克思晚年着手攻读中世纪英国文学，如《农夫皮尔斯的申诉》<sup>③</sup>，他好象也读过乔叟的一些作品。密尔顿他很少提及，通常认为是由于密尔顿把《失乐园》手稿卖掉，只换了微薄的五镑钱<sup>④</sup>，也许是因为密尔顿那股浓厚的基督教气息妨碍他，使他没有发现他会多么地欣赏密尔顿笔下的撒旦。马克思谴责斯宾塞参加伊丽莎白分裂爱尔兰的活动；他肯定不会在斯宾塞描绘的天地里感到自在。他提到屈莱顿，但是仿佛更关心《胡迪布腊斯》的作者<sup>⑤</sup>。马克思喜欢那些空前辛辣地讽刺英国清教主义的作品。他欣赏蒲伯，当然对他那部《愚人记》尤为赞赏。1870年他得到一套斯威夫特全集之后，也对这位作家抱有好感。笛福供给他一些实例，他喜欢菲尔丁，而且象许多德国人一样赞赏斯特恩。但他一点也不能

---

① 见莎士比亚的《李尔王》第二幕第二场。

② 福斯塔夫是莎士比亚的《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和《亨利四世》中的人物，爱吹牛的懦夫，谐谑者，酒徒。道格培里是莎士比亚的《无事生非》中的人物，自大而愚蠢的官吏的化身。

③ 《农夫皮尔斯的申诉》是英国威廉·朗兰德（1332—1377）写的反封建的讽寓诗。

④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一文中说：“同一种劳动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例如，密尔顿创作《失乐园》得到5镑，他是非生产劳动者。相反，为书商提供工厂式劳动的作家，则是生产劳动者。密尔顿出于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失乐园》。那是他的天性的能动表现。后来，他把作品卖了5镑。”

⑤ 指英国讽刺诗人塞缪尔·勃特勒（1612—1680），其长诗《胡迪布腊斯》（三部，1663—1678）嘲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的清教主义，以及宗教的假仁假义和中世纪的经院哲学。



欣赏约翰逊<sup>①</sup>。

马克思很少引用华尔特·司各特的作品，但是肯定对他十分钦佩，《清教徒》就是他喜爱的一部小说。在他提到过的少数几位美国作家之中，同比契—斯陀夫人并列的就是司各特的模仿者詹姆士·费尼莫尔·库伯。因为拜伦和雪莱政见一致，他喜欢拜伦，但不包括其他英国浪漫主义作家。

他十分赞赏科贝特<sup>②</sup>，尽管对他的经济学摇头。卡莱尔是当时少数几个熟悉德国文学的英国作家之一，马克思本来对他表示尊敬，但是后来由于他赞赏让—保尔<sup>③</sup>，并且表现出不大体面的英雄崇拜而使马克思感到厌恶。马克思不能分享卡莱尔对弗里德里希大帝<sup>④</sup>的敬仰，而常把那位帝王称作“老兽奸者暴徒”。

马克思喜爱的狄更斯，不是那位创作出小耐儿和齐里布尔兄弟<sup>⑤</sup>的感伤的作家，而是那位粗犷地描绘资产阶级社会的作家，那位创作出俾克史涅夫、史奎尔斯、比尔·希克斯和阿特佛·道吉尔<sup>⑥</sup>的狄更斯。他为了要向德国读者描述格莱斯顿的演说，想到了《小杜丽》里办事拖拉的官僚机构。他读萨克雷的作品。至于勃朗蒂三姐妹和乔治·爱略特，他更喜欢前三位。他读迪斯累里和

---

① 塞缪尔·约翰逊(1709—1784)，英国作家。

② 威廉·科贝特(1762—1835)，英国激进政论家，在一些小册子里揭露了官方英国的代表们。马克思称他为“人民的作家”。

③ 让—保尔(1763—1825)，德国作家。

④ 弗里德里希大帝(即弗里德里希二世)(1712—1786)，1740—1786年任普鲁士国王。他曾以背信弃义的手段推行侵略其他民族领土的政策，从而扩张了普鲁士的领土，并建立了强大的普鲁士军队。

⑤ 小耐儿是狄更斯《老古玩店》中的孝女，齐里布尔兄弟是狄更斯《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中的人物。

⑥ 俾克史涅夫是狄更斯《马丁·朱述尔维特》中的建筑师与狡黠的伪君子。史奎尔斯是狄更斯《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中的教员。比尔·希克斯特是狄更斯《奥列维·退斯特》中的强盗杀人犯。阿特佛·道吉尔是《奥列维·退斯特》中的狡猾的年轻扒手。

布尔威—李顿的小说。他厌恶边沁<sup>①</sup>，也讨厌马丁·塔波尔那部诗体的《格言哲学》，他写道，“边沁和马丁·塔波尔两人都只能在英国制造出来。”<sup>②</sup>

马克思还摘引德国中世纪的许多民间和骑士史诗，如《尼伯龙根之歌》、哈尔特曼·冯·奥埃<sup>③</sup>和沃尔夫拉姆·冯·埃森巴赫<sup>④</sup>等人的作品。他为了痛斥那个倒霉的新闻记者卡尔·海因岑<sup>⑤</sup>，援引了宗教改革时期的“粗俗文学”，他写道：“粗俗文学重新出现在德国人面前是并不奇怪的。”他一点也不喜欢虔诚的诗人克罗卜史托克<sup>⑥</sup>或公认的批评家高特舍特<sup>⑦</sup>。他对无论是作为批评家还是作为辩论家的莱辛都推崇备至。

马克思象大多数有教养的德国人一样精读歌德的作品。他常引用《浮士德》，喜欢摘引瓦格纳<sup>⑧</sup>荒谬的行为或者摩非斯托斐勒司辛辣的嘲讽。《列那狐》<sup>⑨</sup>及其出名的智慧和对政客的挖苦都对他很有吸引力。《塔索》提供给他一种蚕的形象来比拟那位非写作不

---

① 耶利米·边沁(1748—1832)，英国政治活动家，功利主义的创立者，马克思说他是“资产阶级蠢才中的一个天才”。

② 见《资本论》第1卷。

③ 哈尔特曼·冯·奥埃(约1170—1215)，德国骑士史诗作家，著有《埃雷克》、《伊万》和《可怜的亨利希》等。

④ 沃尔夫拉姆·冯·埃森巴赫(约1170—1220)，德国骑士史诗作家，著有《巴尔其伐尔》、《维莱哈尔姆》、《提图莱尔》三部史诗及一些抒情诗。

⑤ 卡尔·海因岑(1809—1880)，德国政论家，曾参加过1848年的革命。他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后侨居美国。

⑥ 克罗卜史托克，德国十七世纪诗人，在密尔顿的影响下，曾写出史诗《救世主》。

⑦ 约·克·高特舍特(1700—1766)，德国作家，著有《给德国人写的批判诗学试论》与剧作《濒死的卡托》等。

⑧ 瓦格纳是歌德的《浮士德》中的人物，浮士德的学生，崇尚高论，是脱离生活的烦琐学者的典型。

⑨ 《列那狐》是歌德把高特舍特根据中世纪列那狐故事写的散文改编为六步格诗体的长诗，通过动物的言谈动作对当时封建社会的腐败现象进行了讽刺。



可的诗人<sup>①</sup>。《葛兹·冯·伯利欣根》提供给他一根拐棍来敲打他痛恨的拉萨尔所写的那个失败的悲剧。在《共产党宣言》里，他鲜明地利用了《巫师的学徒》<sup>②</sup>。在这首诗里，巫师后来恢复了秩序，但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欧洲，“魔王”自己也控制不了自己。“商品是物，不能与人对抗，”马克思在《资本论》写道，“如果它们不愿意，他就可以使用强力。”柏拉威尔教授指出这一引喻出自歌德的名诗《魔王》（瓦尔特·司各特曾卓越地将此诗译成英文）；魔王在病孩子的耳边悄声说道：“我爱你，你的美好的体态吸引着我。如果你不乐意，我就要用强力！”

对马克思来说，席勒的美学比起他的诗歌，更显得重要。席勒晚年出现的那种唯心主义的矫揉造作使马克思产生了反感。他喜欢劝告拉萨尔在试图写悲剧时，与其愚蠢地模仿席勒，还不如仿效莎士比亚。他曾两次引用过席勒那句格言式的警句：“智者看不见的东西，却瞒不过童稚天真的心灵。”<sup>③</sup>另外他从《华伦斯坦》三部曲中摘引过那段故事，即军士长想模仿华伦斯坦，却只活龙活现地再现了华伦斯坦所鄙视的一面。

马克思也摘引乌兰德<sup>④</sup>、布尔格<sup>⑤</sup>和吕凯特<sup>⑥</sup>的诗，以及缪尔奈<sup>⑦</sup>沉闷的《命运的悲剧》和恩斯特·霍夫曼梦幻的故事。在他同

---

① 指密尔顿。

② 见《共产党宣言》第一节“资产者和无产者”。原文是“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象一个巫师那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

③ 引自席勒的《信仰的话》。见马克思、恩格斯《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一文。

④ 乌兰德（1787—1862），德国南部史瓦奔地区的浪漫派诗人，他的诗具有民歌风格。

⑤ 布尔格（1747—1794），德国狂飙时代诗人，著有《莱诺尔》等民歌风格的诗。

⑥ 弗·吕凯特（1788—1886），德国诗人，东方文学热心的翻译者。

⑦ 阿道夫·缪尔奈（1774—1829），德国剧作家与杂志编辑。

时代的作家当中，他嘲笑金克尔夫妇，他跟海尔维格<sup>①</sup>发生争执而决裂，他最终转而反对他的旧伙伴弗莱里格拉特<sup>②</sup>。更重要的是他和海涅的关系。在学校时，他模仿过海涅的诗，在巴黎期间，两人成为莫逆之交，后来马克思离开法国时，真想把海涅装进自己的行囊里带走，可见他们友谊之深厚。此后，他俩没有再见面，马克思一再抱怨玛蒂尔德<sup>③</sup>；海涅后来转而信仰上帝也使马克思感到厌恶，但他还是不愿听别人对海涅的批评。他熟悉《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这首诗提供给他许多例证，他经常加以引用。更重要的是海涅那种讽刺而辩证的散文文体对马克思的写作也有一些影响。

马克思也十分注意文章的风格，在他写得最好的作品中，例如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不但能强有力地唤起读者的理智，也能激动他们的感情；毋庸置疑，他机智，甚至幽默。

在柏拉威尔教授这部书中作为读者出现的马克思形象，与出自其他来源的印象是十分相符的。的确，首先受他欢迎的是那些最伟大的作家，但是他们提供的材料大部分被用来表达讽刺和愤慨。此外也有些作品显然马克思没有加以注意，诸如伟大的法国诗篇，几乎全部非德语的抒情诗，以及他同时代文笔较纤细的小说家的作品。这本研究著作显示马克思具有许多伟大的品质，但也表明他有一种惊人的选择性。

(梅绍武译)

---

① 格奥尔格·海尔维格(1817—1875)，德国诗人，马克思本来很器重他，后因他与巴枯宁结交，受无政府主义影响，1848年马克思与他决裂。

②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1810—1876)，德国诗人，1848年至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五十年代脱离革命斗争。

③ 玛蒂尔德(即克蕾仙·尤琴尼·米拉)，巴黎一女店员，1841年与海涅结婚，尽管海涅有不少收入，但由于她性喜奢侈，挥金如土，致使海涅经常处于拮据状况。



## 索引

(按原文的字母次序排列。条目后系原书页码,检索时请查印在本书正文页边的数码。)

### A

- Aberdeen, Lord George Hamilton Gordon, 4th Earl of, 阿伯丁伯爵, 乔治·汉密尔顿·戈登 241-
- Abraham a Santa Clara, 阿伯拉罕·圣·克拉 193, 316
- Abrams, M. H., 阿勃拉姆斯, 麦耶 411注
- Adorno, T. W., 阿多诺, 泰奥多尔 346
- Aeschylus, 埃斯库罗斯 23-, 31, 64-, 76, 80, 99, 286, 348, 361, 363-, 390, 400-, 410, 415, 423
- Aesop, 伊索 30, 43
- Alexander I, Tsar, 亚历山大一世(沙皇) 205, 270-
- Alexis, Willibald, 阿列克西斯, 维利巴尔德 117
- Althusser, Louis, 阿尔杜塞, 路易 123-, 387
- Altmann, A., 阿特曼 370注
- Ammon, C. F. von, 阿蒙, 克里斯托夫·弗里德里希 52
- Anchor, R., 安考尔, 罗勃特 82注
- Andersen, Hans Christian, 安徒生 198
- Anghiera, Peter Martyr 昂吉埃腊(殉道者彼得) 302
- Annenkov, Paul, 安年柯夫, 巴维尔 131
- Antel, Charles, 安特尔, 查理 359
- Antier, B., 安蒂耶, 本杰明 167, 251-
- Antipatros, 安蒂帕特洛斯 332-, 410
- Appian, 阿庇安 209, 383
- Arabian Nights, The, 一千零一夜(天方夜谭) 118, 156, 238, 386, 411, 424
- Arago, D. F. J. 阿拉戈, 多米尼克·弗朗斯瓦 113
- Aretino, Pietro, 阿雷蒂诺, 彼埃特罗 191, 302, 329
- Ariosto, Lodovico, 阿里欧斯托, 洛多维科 187, 192, 233-, 253
- Aristophanes, 阿里斯托芬 292, 301
-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 25, 33, 223, 231, 236, 296, 301, 310-
- Arndt, E. M., 阿伦特, 恩·摩 169
- Arnim, Bettina von, 阿尔宁, 蓓蒂娜·冯 9
- Arnim, L. Achim von, 阿尔宁, 路德维希·阿契姆·冯 9, 20, 128注, 252
- Arnold, Matthew, 阿尔诺德, 马修 81, 284, 422-
- Arthurian epic, 阿瑟王史诗 192, 330
- Arvon, H., 阿尔冯, 亨利 414注, 415注
- Assing, Ludmilla, 阿辛格, 柳德米拉 389
- Athenaeus, 阿泰纳奥斯 331
- Atkins, Stuart, 阿特金斯, 斯图亚特 78注
- Auerbach, B., 奥尔巴赫, 贝特荷尔德 25注, 172, 196, 342, 376, 420
- Augusti, B., 奥古斯蒂, 贝尔塔 389
- Augustine, St., 奥古斯丁, 圣 49, 52
- Augustus Caesar, 奥古斯都·凯撒 15,

- Aveling, Edward, 艾威林, 爱德华 241注, 396-  
 Aveling, Eleanor Marx, 见 Marx, Eleanor 艾威林, 爱琳娜·马克思(见马克思, 爱琳娜)  
 Avineri, S., 阿维涅里, 什洛莫 183

## B

- Babeuf, Cracchus (F. N.), 巴贝夫, 格拉古(真名弗朗斯瓦·诺埃尔) 71  
 Bacon, Francis, 培根, 弗兰西斯 212  
 Bakunin, M., 巴枯宁, 米哈伊尔 60, 68, 266, 348, 359-, 380, 392, 405  
 Balzac, Honoré de, 巴尔扎克, 奥诺莱·德 94, 98, 181, 196, 252, 261, 263, 318, 320, 334, 337, 367, 373, 386, 391, 393, 396, 401, 410, 420  
 Bangya, J., 班迪亚, 亚诺什 186  
 Barrot, Odilon, 巴罗, 奥迪隆 168  
 Bastian, A., 巴斯提安, 阿道夫 273  
 Bastiat, F., 巴师夏, 弗雷德里克 275, 333  
 Bastide, J., 巴斯蒂德, 若尔 163  
 Batrachomyomachia, The, 《老鼠与青蛙之战》 169, 238  
 Baudelaire, Charles, 波特莱尔, 查尔斯 371  
 Bauer, Bruno, 鲍威尔, 布鲁诺 3, 42, 60, 87-, 95, 96注, 99-, 105, 122, 172, 203, 399  
 Bauer, Edgar, 鲍威尔, 埃德加 95, 100  
 Baumgarten, A. G. 鲍姆加登, 亚·哥 413  
 Bazard, Saint-Amand, 巴扎尔, 圣-阿芒 148注  
 Beaumarchais, P. A. C. de, 博马舍, 彼尔·奥古斯丁·卡龙 156, 157注, 158, 168, 212, 393  
 Beaumont de la Bonninière, G. A. de, 波蒙·德·拉·蓬尼尼埃尔, 古斯塔夫 62, 141  
 Becker, J. P., 贝克尔, 约翰·菲力浦 200-  
 Becker, Nicolaus, 贝克尔, 尼古拉奥斯 117  
 Beecher-Stowe, H., 比彻-斯托, 哈里埃特·伊丽莎白 424  
 Beer, Max, 皮尔, 麦克斯 351注  
 Beethoven, Ludwig van, 贝多芬, 路德维希·万 164  
 Bellmann, K. G. 贝尔曼, 378  
 Benedix, R., 贝奈狄克斯, 罗德里希 374  
 Benjamin, Walter, 本杰明, 瓦尔特 298, 346, 371, 405, 424  
 Bentham, Jeremy, 边沁, 耶利米 90, 340, 362  
 Béranger, P. J. de, 贝朗热, 比埃尔·热 46, 251  
 Berlin, Sir Isaiah, 柏林, 伊赛亚 266注, 352  
 Bernard de Clairvaux, 贝尔纳·德·克莱沃 47  
 Bernays, F. C., 贝尔奈斯, 斐迪南·卡尔·路德维希 60  
 Bernier, F., 贝尔尼埃, 弗朗斯瓦 207  
 Bernstein, E., 伯恩施坦, 爱德华 221注, 417  
 Bernstein, R. J., 伯恩施坦, 里·杰 76, 105注, 123  
 Bessel, F. W., 贝塞尔, 弗·威 113  
 Bible, 圣经 3, 15, 48, 52, 63-, 96注, 117-, 120, 134-, 151, 156-, 180-, 185, 187, 203, 256, 261, 289, 292, 316, 319, 321, 324, 342, 346, 350-, 357-, 386, 393, 420



Birchall, I., 比尔恰, 伊安 17-, 182注, 277  
 Bismarck, O. E. L. von, 俾斯麦, 奥托 227, 348, 356  
 Blake, William, 布莱克, 威廉 411注  
 Blanc, Louis, 勃朗, 路易 168, 178, 186, 392  
 Blanckenburg, K. H. M. von 布兰肯堡, 莫里茨·冯 204  
 Blind, Karl, 布林德, 卡尔 374  
 Bloch, Ernst, 布洛赫, 厄恩斯特 346  
 Bloch, Joseph, 布洛赫, 约瑟夫 296  
 Blumenberg, W., 布路曼堡, 威尔纳 153 注, 389注  
 Bodenstedt, F. M. von 博登施泰特, 弗里德里希 375  
 Boiardo, M., 波雅多, 马提奥 187, 194, 399, 417  
 Boileau-Despréaux, N., 布瓦洛-戴斯帕莱奥, 尼古拉斯 337  
 Borkheim, S. L., 波克罕, 西吉兹蒙德·路德维希 371, 391  
 Börne, L., 白尔尼, 路德维希 41, 119, 197, 419-  
 Bornstedt, A. von, 伯恩施太德, 阿达尔贝特·冯 151  
 Börnstein, Heinrich, 波恩施坦, 亨利希 68  
 Bostock, A., 波斯托克, 安娜 286 注  
 Böttiger, K. A., 勃蒂格, 卡尔 32  
 Bottomore, T. B., 鲍多莫尔, 汤姆 112注, 138, 272注  
 Bowdler, T., 鲍德勒 329  
 Bracke, W., 白拉克, 威廉 387注  
 Bradlaugh, Charles, 布莱德洛, 查理 351, 376  
 Brant, Sebastian, 布兰特, 赛巴斯蒂昂 59, 126

Brecht, B. 布莱希特, 贝 424  
 Brentano, Bettina, 见 Arnim, Bettina von 布伦塔诺, 蓓蒂娜(见阿尔宁, 蓓蒂娜·冯)  
 Brentano, Clemens, 布伦塔诺, 克雷门斯 8-, 20, 128注, 192  
 Brewster, B., 布劳斯特, 布 124注, 387 注  
 Bright, John, 布莱特, 约翰 243  
 Brisbane, A., 布里斯班, 阿尔伯特 232  
 Brockhaus, F. A., 布罗克豪斯, 弗·阿 272  
 Brodribb, W. J., 勃罗德里布 388注  
 Broglie, Victor-Francois, duc de, 布罗格利公爵, 维克多-弗朗索阿·德 271  
 Brontë, Charlotte, 勃朗蒂, 夏洛特 237, 377-  
 Brontë, Emily, 勃朗蒂, 艾米丽 378, 396  
 Brummell, G. B. (Beau), 布腊默尔(美男子) 249  
 Brunner, H., 布伦纳尔 274 注  
 Buccleuch and Queensberry, 5th Duke of, 巴克鲁公爵 267  
 Büchner, Georg, 毕希纳, 格奥尔格 54, 218-, 224  
 Buffon, G. L. L. de, 毕丰, 乔治·路易 36  
 Bull, Roger, 布尔, 罗吉尔 126注  
 Bülow, D. H. von, 毕洛夫, 汉斯·冯 364注  
 Bulwer-Lytton, E. G. L., 1st Baron Lytton, 布尔韦尔-利顿, 爱德华·乔治·利顿 395  
 Bunsen, C. C. J., Baron von, 布恩逊男爵, 克里斯蒂安·卡尔·约西阿斯 71  
 Bürger, Gottfried, 毕尔格尔, 高特夫里特 156  
 Burke, Edmund, 伯克, 艾德蒙 343注  
 Burns, Lizzy, 白恩士, 莉希 376, 393

Burns, Robert, 彭斯, 罗伯特 157, 376  
Butler, Samuel, 巴特勒, 赛缪尔 185, 247,  
261, 342  
Byron, George Gordon, 6th Baron, 拜  
伦, 乔治·戈登 20, 202, 261, 396-

## C

Cabet, Etienne, 卡贝, 埃蒂耶纳 61, 141  
Cacciaguada de Elisei, 卡西亚基达·  
迪·亚利基利 239, 421  
Caesar, Julius, 凯撒, 尤利乌斯 15, 190,  
310-, 355  
Calderón de la Barca, Pedro, 卡德龙·  
德·拉·巴卡, 彼得罗 118, 209, 241,  
258, 261-, 264, 383-, 395  
Campe, J. H., 康培, 约阿希姆·亨利希  
274  
Camphausen, L., 康普豪森, 卢道夫 153-  
Carey, H. C., 凯里, 亨利·查理 273, 275  
Carlos, Don, 卡洛斯, 唐 240  
Carlyle, Thomas, 卡莱尔, 托马斯 60, 72,  
137, 145, 148注, 173-, 195, 292, 343,  
414  
Carr, E. H., 卡尔, 爱德华 134注  
Carrière, M., 卡里耶, 莫里茨 150  
Carver, Terrell, 卡维尔, 台瑞尔 275,  
346注  
Castlereagh, Robert Stewart, 2nd Mar-  
quis of Londonderry, 卡斯尔里子爵,  
罗伯特·斯图亚特 261, 397  
Catherine II, Czarina of Russia, 叶卡  
特琳娜二世, 俄国女皇 271  
Caudwell, Christopher, 考德威尔, 克里  
斯托弗 424  
Caussidière, Marc, 科西迪耶尔, 马尔克  
178  
Cavaignac, L. -E., 卡芬雅克, 路易·欧

仁 163, 169  
Cavalcanti, Guido, 卡瓦尔康提, 基多 365  
Cervantes, Miguel de, 塞万提斯, 米格  
尔·德 39, 73-, 94, 96, 119-, 157,  
172, 192, 194, 196, 204-, 208-, 215,  
222, 228, 240-, 261, 266, 292-, 337,  
345, 362, 383-, 386, 392, 395 399,  
401, 416-  
Chamfort, S. R. N., 商福, 赛·罗·尼  
359  
Chamisso, Adalbert von, 夏米索, 阿达  
尔别尔特·冯 20, 118, 121, 181, 203,  
303-, 396-, 411  
Charras, J. -B, -A., 沙尔腊斯, 让·巴  
蒂斯特·阿道夫 350  
Chateaubriand, F. R., -de, 沙多勃利昂,  
弗朗斯瓦·勒奈·德 56, 205-, 209,  
257, 270-, 375, 401, 420  
Chaucer, Geoffrey, 乔叟 79, 364, 380  
Chemnitz, M. F., 切姆尼兹 378  
Chenu, Adolphe, 谢努, 阿道夫 175-  
Chernyshevsky, N. G. 车尔尼雪夫斯基,  
尼古拉·加甫利洛维奇 384  
Church, A. J., 丘奇 388注  
Ciardi, J., 希亚尔迪, 约翰 301注  
Cicero, 西塞罗 1, 27, 49, 60注, 192, 261,  
332, 385  
Clarendon, 4th Earl of, 克拉伦登伯爵  
245注  
Claudius, Matthias, 克劳狄乌斯, 马提阿  
斯 157  
Clauren, H. (Carl Heun), 克劳伦, 亨  
(卡尔·海因) 187, 340, 376  
Cluss, A., 克路斯, 阿道夫 202注  
Cobbett, William, 科贝特, 威廉 137,  
241, 254, 256, 292, 317-, 362注,  
384, 401  
Cobden, Richard, 科布顿, 理查 203



Coleridge, S. T., 柯列律治 411注  
 Commedia dell' arte, 职业喜剧 118  
 Comyn, M., 康明, 玛里安 378, 395, 396注  
 Condillac, É. B. de, 孔狄亚克, 埃·朋·德 53注  
 Cooper, James Fenimore, 库伯, 詹姆士·费尼莫尔 156, 157注, 176, 253, 269, 386, 424  
 Copernicus, Nicolaus, 哥白尼, 尼古拉 47, 422  
 Corneille, Pierre, 高乃依, 彼尔 231  
 Cornforth, M., 康恩弗斯, 莫里斯 27注  
 Cornu, A., 考尔努, 阿 16, 71注  
 Cousin, Victor, 库辛, 维克多 134  
 Cramer, C. G., 克拉麦尔, 卡·哥 187  
 Cromwell, Oliver, 克伦威尔, 奥利弗 175, 180  
 Culler, J., 库勒, 乔纳森 424  
 Cuvier, G. L. C. D. B. Baron, 居维叶, 若尔日 387

## D

Dacier, A., 达西埃, 安得列 231  
 'Da-Da', "达—达" 265-  
 Dakyns, J. R., 达金斯, 让 377, 391  
 Dana, C. A., 德纳, 查理·安德森 177, 232, 259  
 Danielson, N. F., 丹尼尔逊, 尼·弗 360, 424注  
 Dante Alighieri, 但丁, 阿利格埃里 208, 239-, 258, 261, 263, 268, 301, 338-, 358, 365, 375注, 376, 383-, 399-, 409, 419-  
 Danton, G. J., 丹东, 若尔日·雅克 178  
 Darwin, Charles, 达尔文, 查理 211-, 422  
 Daumer, F., 道梅尔, 弗里德里希 172-, 187, 401, 414

Davies, Sir John, 戴维斯, 约翰 362, 419  
 Debrosses, C., 戴布罗赛斯, 查尔斯 32  
 Dedekind, Friedrich, 德德金, 弗里德里希 126  
 Defoe, Daniel, 笛福, 丹尼尔 133-, 137, 273-, 335-, 362注, 416  
 Demetz, P., 戴麦兹, 彼得 2注, 15注, 57注, 67注, 93, 152注, 229注, 367注, 372注, 373注, 385  
 Democritus, 德谟克里特 23, 26  
 Derby, 14th Earl of, 得比勋爵 244  
 Dickens, Charles, 狄更斯, 查理斯 91, 174, 186, 189, 196, 203, 237, 252, 261-, 340, 358, 361-, 392, 395, 401, 410, 415-  
 Diderot, D., 狄德罗, 德尼 33, 187-, 192, 202, 271, 348, 365, 374-, 385, 390, 401, 411  
 Dies irae, «世界末日的审判» 96注  
 Diogenes, 第欧根尼 32, 44, 55  
 Dionysius, tyrant of Syracuse, 狄俄尼修斯, 叙拉古暴君 321-  
 Disraeli, Benjamin, 1st Earl of Beaconsfield, 迪斯累里, 本杰明, 贝肯斯菲尔德伯爵 146注, 235-, 257, 343注, 352注  
 Dlubek, R., 德卢贝克, 鲁尔夫 377注  
 Dornemann, H., 多涅曼, 136注  
 Dostoevsky, F. M. 陀斯妥耶夫斯基 359  
 Dragomanov, M. P. 德拉戈马诺夫 385  
 Drumann, W., 德鲁曼 186注  
 Dryden, John, 屈莱顿, 约翰 337  
 Dufferin and Ava, 1st Marquis of, 达费林侯爵 326  
 Dumas, Alexandre (elder), 大仲马, 亚历山大 186, 255注, 359  
 Duncker, F., 顿克尔, 弗朗茨 218注, 293  
 Dupont, Pierre, 杜邦, 彼埃尔 334

## E

- Eagleton, T., 伊格尔顿, 泰瑞 304, 346注  
 Edda, <艾达> 251  
 Eglinton, Lord Archibald William, 13-th Earl of 埃格林顿伯爵, 阿契波德·威廉 240  
 Eichendorff, J. von 爱沁多尔夫, 约瑟夫·冯 8  
 Eichhoff, F. G., 艾希霍夫, 弗雷德里希·古斯塔夫 385  
 Eichhorn, J. G., 艾希荷恩 186注  
 Eliade, M., 埃里亚德, 米尔其尔 287  
 Eliot, George, 爱略特, 乔治 377注, 385, 391, 415  
 Encke, J. F., 恩克, 约·弗 113  
 Engels, F.,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 vii, 53注, 54, 60, 61注, 68, 71-, 86-, 98, 100-, 103, 105-, 138-, 141, 144-, 146注, 147-, 150, 152, 168, 171-, 175-, 185-, 191, 197, 199-, 201-, 211-, 213, 216, 219, 221-, 227注, 228-, 232, 240注, 244注, 250注, 253, 256, 259, 262, 265, 270注, 272, 294, 296-, 299, 308, 320, 329, 343注, 350, 354注, 359注, 361注, 363, 364注, 365注, 367-, 370-, 377, 379, 382-, 384注, 385注, 387注, 388, 390, 392注, 393-, 397, 414, 424  
 Epicurus, 伊壁鸠鲁 23, 25-, 30, 211, 423  
 Erckenbrecht, U., 艾尔肯布莱希特 298注, 305注  
 Erlach, L., 埃尔拉赫 20  
 Euclid, 欧几里德 422  
 Euripides, 欧里庇得斯 301

## F

- Faucher, Julius, 孚赫, 尤利乌斯 202  
 Faucher, Léon (L.J.), 孚赫, 莱昂(尤利乌斯) 100, 192  
 Fechner, G. Th., 费希纳, 古·泰 383, 412  
 Fetscher, I., 费彻尔, 厄尔温 345注  
 Feuer, L. S., 费厄尔, 路易斯·赛缪尔 351, 394  
 Feuerbach, L. A., 费尔巴哈, 路德维希 27, 33注, 56-, 60, 64, 68, 75, 103, 104注, 105, 108, 120, 123, 210, 365, 399, 409  
 Fichte, J. G., 费希特, 约翰·哥特利勃 33, 47, 400  
 Fielding, Henry, 菲尔丁, 亨利 386, 396  
 Fischart, J., 菲沙尔特, 约翰 261  
 Fischer, Ernst, 费歇尔, 厄恩斯特 286, 296, 424  
 Fischer, K. P., 费歇尔, 克·柏 23  
 'Flerovsky, N.' (V. V. Bervy), "费列罗夫斯基, 恩" (瓦·瓦·别尔维) 146, 350  
 Forster, G., 福斯特, 格奥尔格 33  
 Fould, A., 富尔德, 阿契莱 250, 255  
 Fourier, Charles, 傅立叶, 沙尔 59注, 90, 290, 365  
 Frankel, Charles, 弗兰克尔, 查理 114, 342注  
 Franklin, Benjamin, 弗兰克林, 本杰明 424  
 Frederick II ('the Great'), King of Prussia, 弗里德里希二世(大帝) 270  
 Frederick William IV, King of Prussia, 弗里德里希四世 34, 59, 61, 69-, 169, 228, 252, 270, 391



Freiligrath, F., 弗莱里格拉特, 斐迪南  
41, 152, 157, 165-, 186, 197-, 333,  
360, 371-, 376, 401, 419  
Freud, Sigmund, 弗洛伊德, 西格蒙德  
61-, 90, 98  
Freytag, Gustav, 弗莱塔格, 古斯塔夫  
141, 204, 401  
Friedländer, Max, 弗里德兰德, 麦克斯  
213, 218  
Furnivall, F. J., 弗尼瓦尔, 弗雷德里克·  
詹姆斯 395

## G

Galileo, Galilei, 伽利略, 伽利莱 422-  
Gallas, H., 加拉斯 276 注  
Gallifet, G. A. A., Marquis de, 加利  
弗侯爵 353  
Ganz, P. F., 甘斯 387 注  
Garibaldi, Giuseppe, 加里波第, 朱泽培  
209, 240, 258, 375 注  
Gaskell, E. C., 盖斯凯尔, 伊丽莎白 237  
Gassendi, Pierre, 伽桑弟, 比埃尔 30  
Geibel, E., 盖贝尔, 埃马努尔 4  
Gemlow, H., 甘姆劳, 亨利希 41 注, 136 注  
George IV, King of England, 乔治四  
世 243  
Gessner, Salomon, 盖斯纳, 萨洛蒙 128-,  
342, 401, 420  
Gibbon, Edward, 吉本, 爱德华 236  
Gladstone, W. E., 格莱斯顿, 威廉·尤  
尔特 185, 242-, 257, 337, 358  
Glockner, H., 格洛克纳 246 注  
Gluck, C. W. von, 格鲁克, 克里斯朵夫  
· 威里巴德 14  
Goethe, J. W. von, 歌德, 约翰·沃尔  
夫冈·冯 2, 9, 13, 15-, 24, 29,  
31, 33, 36-, 48, 51, 55, 61, 67, 76-,

82-, 85, 94, 96 注, 99, 118, 129-,  
140, 144, 153, 155-, 160, 187-,  
192, 195, 203, 205, 208-, 212, 214,  
218, 221-, 226, 228, 247-, 251, 261,  
267, 278, 281, 288, 292, 296, 310,  
317, 321, 323-, 348, 356, 357 注,  
361, 374, 377, 379, 390-, 395, 399,  
401-, 409, 411, 415-, 419-, 423-  
Goeze, M., 哥采, 约翰·密尔希奥尔 48  
Gogol, N. V., 果戈理, 尼古拉·瓦西里  
也维奇 384, 397  
Goldmann, L., 戈德曼, 卢西安 45 注,  
182 注, 424  
Goldsmith, Oliver, 哥尔斯密, 奥利弗 15,  
249  
Golman, L. I., 高尔曼 360 注, 385 注, 395 注  
Gottfried von Strassburg, 高特夫里特·  
冯·史特拉斯堡 261  
Gottsched, J. C., 哥特谢德, 约翰·克里  
斯特夫 47, 302, 340-, 401  
Gracchus, Gaius, 格拉古, 凯尤斯 396  
Gracchus, Tiberius, 格拉古, 提比利乌斯  
396  
Graetz, H., 格拉茨, 亨利希 351  
Gramsci, A., 葛兰西, 昂托尼奥 424  
Grandjanc, J., 格朗容, 夏克 69 注  
Granier de Cassagnac, B.-A., 格朗尼  
埃·德·卡桑尼亚克, 阿道夫 181  
Grant-Duff, Sir M. E., 格兰特-达夫爵  
士, 蒙特施图亚特 208  
Gray, John, 格雷, 约翰 275  
Green, J. R., 格林, 杰 364  
Grey, 2nd Earl, 格雷勋爵 244  
Grillparzer, Franz, 格里耳帕尔策, 弗兰  
茨 218  
Grimm, Jacob, 格林, 雅科布 191, 204,  
209, 282, 305, 320, 387-  
Grimm, Wilhelm, 格林, 威廉 191, 282

Grün, Karl, 格律恩, 卡尔 4, 141  
Grund, J. J., 格隆德, 约翰·雅科布 32  
Gruppe, O. F., 格鲁培, 奥托·弗里德里希 42  
Guizot, F. P. G., 基佐, 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约姆 148-, 173, 294  
Guterman, N., 古特曼, 诺贝特 53注

## H

Häckel, M., 海凯尔 198注  
Hackländer, F. W., 哈克兰德尔, 弗·威 261  
Hafiz, 哈菲兹 172  
Hall, S., 霍尔 182注, 277注  
Halm, Friedrich, 哈尔姆, 弗里德里希 117  
Hamann, J. G., 哈曼, 约·格 126  
Hamilton, Thomas, 汉密尔顿, 托马斯 62  
Hariri, Abu Mohammed Kasim ibn Ali, 哈利利, 阿卜·穆罕默德 48  
Harkness, M., 哈克奈斯, 玛格丽特 414  
Harring, H., 哈林, 哈罗 189-  
Hartmann, von Aue, 哈尔特曼·冯·奥埃 261  
Hatzfeld, Sophie von, 哈茨费尔特, 索菲娅·冯 372注  
Hauff, W., 豪弗, 威廉 252  
Haverty, M., 哈佛蒂 362  
Hebbel, C. F., 海贝尔, 克里斯蒂安·弗里德利希 218, 222  
Hebel, J. P., 黑贝尔, 约翰·彼得 382  
Hecker, F. F. K., 黑克尔, 弗·卡 155  
Hegel, G. W. F., 黑格尔,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 13, 15-, 20-, 24-, 28-, 30注, 33, 44, 56-, 63-, 67, 72, 74, 83, 87, 115, 130, 150, 174, 178, 191, 195, 222-, 229, 246, 249, 259-, 269-,

278, 281, 285, 293-, 298, 300, 310, 315, 319-, 324, 326-, 338, 365, 368注, 369, 374-, 399, 407, 411, 413, 418  
Heine, Heinrich, 海涅, 亨利希 7-, 14-, 20-, 25, 30-, 44, 54, 59-, 63, 65-, 86, 99-, 119, 121-, 130, 134, 139, 141, 146注, 149-, 154-, 158, 164, 168, 181, 185-, 191, 193, 195-, 201-, 205-, 210, 212, 222, 227, 231, 240, 249, 251, 254, 261, 264, 267-, 270, 285, 317, 321, 332, 340, 353, 379-, 391, 399, 401, 408, 419-  
Heine, 'Mathilde', 海涅, "玛蒂尔德"(克蕾仙·尤琴尼·米拉) 201  
Heinzen, Karl, 海因岑, 卡尔 126-, 191-, 391  
Hell, Theodor (K. G. T. Winkler), 赫尔, 泰奥多尔 43-  
Henneke Knecht, "力大无穷的仆人海涅卡" 127-8, 391  
Herbert, C. -J., 埃尔伯, 克劳德·雅克 316  
Herder, J. G. von, 海德, 约翰·哥特弗利德 29, 82, 114, 126, 193, 278, 280, 282, 411, 424  
Hermes, J. T., 海尔梅斯, 约翰·提摩太乌斯 193  
Herschel, Sir J. F. W., 赫舍尔, 约翰 113  
Hervé, E., 爱尔威, 爱德华 355  
Herwegh, Georg, 海尔维格, 格奥尔格 41-, 55, 60, 65, 68, 151-, 165, 197, 200-, 211, 227-, 251, 372, 382, 391  
Herzen, A., 赫尔岑, 亚历山大 371, 384  
Hesiod, 亥西欧德 292, 301  
Hess, Moses, 赫斯, 莫泽斯 25, 57, 71-, 125, 172, 211



Heun, Carl, 见Clauren, H. 海因, 卡尔  
(见克劳伦, 亨)  
Hillmann, G., 黑尔曼, 格 22, 26注  
Hinderer, W., 兴德瑞尔, 瓦尔特 213注,  
217注, 222注  
Hirsch, Carl, 希尔施, 卡尔 395  
Hobsbawm, E. J., 霍布兹鲍姆, 埃里克·  
约翰 189-  
Hodde, L. de la, 奥德, 律西安·德·拉  
175-  
Hodgskin, T., 霍吉斯金, 托马斯 319  
Hoffmann, E. T. A., 霍夫曼, 恩斯特·  
泰奥多尔·阿马多 7, 15, 39-, 58, 90,  
373, 393- 396, 411  
Hoffmann von Fallersleben, H., 霍夫  
曼·冯·法勒斯累本 117  
Hohenzollern, House of, 霍亨索伦 195  
Holbach, P. H. D. de, 霍尔巴赫, 保尔  
·昂利·狄特利希·德 25  
Hölderlin, J. C. F., 荷尔德林, 弗利德利  
希 2, 58注, 285, 345  
Holtei, Karl von, 荷尔太, 卡尔·冯 117  
Homer, 荷马 1-, 26, 28, 43, 52, 118,  
129-, 155-, 169, 185, 211, 238, 251,  
257, 279, 281, 283-, 292, 301-, 311,  
334, 339, 361, 363-, 371, 386, 389,  
392, 401, 407, 409-, 423  
Hook, S., 胡克, 悉尼 116注  
Höppner, J., 霍普纳, 杰 59注, 60注, 61注,  
66注  
Horace 贺雷西 203, 267, 301-, 342,  
375, 385  
Houben, H. H., 胡班 66注, 150注  
Hugo, Gustav, 胡果, 古斯塔夫 39-, 52  
Hugo, Victor, 雨果, 维克多 170, 252,  
261-, 349, 380  
Hutten, U. von, 胡登, 乌尔利希·冯 228  
Huxley, T. H., 赫胥黎, 托马斯·亨利

422, 423注

Hyman, S. E., 海曼 100注, 148注, 331  
注, 341注, 379注  
Hyndman, H. M., 海因德曼, 亨利·迈  
尔斯 352, 381-, 402注

## I

Ibsen, Henrik, 易卜生, 亨利克 360  
Irving, Henry, 厄尔文, 亨利 395  
Isabella, Queen of Spain, 伊萨贝拉, 西  
班牙女王 240  
Israel, Joachim, 伊斯瑞尔, 约希姆 107-

## J

Jacob, F. H., 雅科比, 弗里德里希·亨  
利希 370  
Jacoby, Johann, 雅科比, 约翰 60  
James I, King of England, 詹姆斯一世  
(英王) 362  
Jameson, F., 詹姆斯, 弗雷德里克 346-,  
424注  
Janin, J., 让南, 茹尔 365, 374-  
Jean Paul, 见Richter, J. P. F. 让·保尔  
(见里希特)  
Jerome, St., 热罗莫, 圣 338  
Jerrold, D., 杰罗尔特, 道格拉斯 253  
Jockellied, 《约克尔之歌》 118-19, 416  
Johnson, Pamela Hansford, 约翰逊, 帕  
美拉·汉斯弗德 149注, 175  
Johnson, Samuel, 约翰逊, 赛米尔 249  
Johnston, W. M., 约翰斯敦, 威廉 7注,  
8注, 22注  
'Junius', “朱尼厄斯” 269  
Juta, J. C., 优塔, 约翰·卡尔 213, 217  
Juta, Louise (née Marx), 优塔, 路易莎  
(娘家姓马克思) 217注

## K

- Kaiser, B., 凯撒, 布鲁诺 250注, 362注, 395注
- Kant, Immanuel, 康德, 伊曼努尔 15-, 21, 33, 39, 47, 110, 206, 259-, 409注, 411注
- Kapp, E., 卡柏, 厄恩斯特 66
- Kapp, Y., 卡普, 伊冯 397
- Karbusicky, V., 卡尔布希茨基 111注
- Kaufmann, H., 考夫曼 206注
- Kautsky, Karl, 考茨基, 卡尔 66, 308
- Keller, C., 凯累尔 386
- Kepler, J., 刻卜勒, 约翰 390
- Kertbény, M. A. 凯特贝尼, 马利阿 371
- Kinkel, Gottfried, 金克尔, 哥特弗利德 171, 186-, 197-, 257-, 360, 372, 374, 401, 412, 414
- Kinkel, J., 见Mockel, Johanna金克尔·约翰娜(娘家姓莫凯尔)
- Klein, Gustav, 克莱因, 古斯塔夫 186注
- Kleist, E. C. von 克莱斯特, 艾瓦德 257
- Klopstock, G. F., 克罗卜史托克, 高特里卜·弗利德利希 60注, 115, 187, 419
- Kock, P. de, 科克, 保尔·德 193, 255, 318-, 393, 410
- Kolakowski, L., 阔拉阔夫斯基, 勒112注
- Kolb, H., 科尔布, 赫伯特 387注
- Körner, T., 克尔纳尔, 台奥多 217
- Korsch, K., 科希, 卡尔 418
- Kortum, Arnold, 科尔图姆, 阿尔诺德 156, 157注, 193
- Kotzebue, A. F. F. von, 科采布, 奥克斯特 192, 374, 376
- Kovalevsky, M., 柯瓦列夫斯基, 马克西姆 374, 395

- Krader, L., 克拉德尔, 劳伦斯 362注
- Kraus, Karl, 克劳斯, 卡尔 69
- Kretschmer, Paul, 克雷契麦尔, 保罗 20
- Krug, W. T., 克鲁格, 威廉·特劳戈特15-
- Kugelmann, Franziska, 库格曼, 弗兰契斯卡 66, 151, 381, 384, 397, 398注
- Kugelmann, Ludwig, 库格曼, 路德维希 203, 227, 348, 363-, 370注, 371注, 373, 378, 382注, 418
- Kurz, Isolde, 库尔茨, 伊索尔迪 387
- Kux, E. E. W., 库克斯 411注

## L

- Lafargue, Laura, 见Marx, Laura 拉法格, 劳拉(见马克思, 劳拉)
- Lafargue, Paul, 拉法格, 保尔 94, 181, 186, 241, 255注, 319注, 337, 367, 376, 380, 384, 386, 391-, 396, 397注, 399
- Lamartine, Alphonse de, 拉马丁, 阿尔丰斯·德 60, 162-, 169, 195, 257, 401
- Lamennais, F. R. de, 拉梅耐, 费里西德·罗贝尔·德 119
- Landor, Walter Savage, 兰多尔, 瓦尔特·萨维奇 343注
- Landseer, Sir Edwin, 兰西尔爵士, 爱德文 268
- Lane, H., 兰恩, 海伦 414注
- Langland, W., 朗兰德, 威廉 364, 383
- La Rochefoucauld, François, duc de, 拉罗什福考, 弗朗索瓦 153注, 376
- Lasker, Eduard, 拉斯克尔, 爱德华 371, 376注
- Lassalle, Ferdinand, 拉萨尔, 斐迪南 100, 175, 200, 202-, 207, 211-, 213-, 260, 348, 356-, 360, 372, 389, 391, 394, 399, 402, 405, 410, 413-



Law, John, 罗, 约翰 134  
 Leacock, E. B., 里考克, 爱 363注  
 Lee, Nathaniel, 李, 纳撒内尔 317  
 Lefebvre, Henri, 勒弗勃夫勒, 昂利 53  
 注, 111, 286-, 312注  
 Leibniz, G. W. von, 莱布尼茨, 哥特弗  
 里德·威廉 16, 195, 202, 268, 370,  
 397  
 Lemaître, F., 勒美特尔, 弗烈德里克  
 167, 251-, 359  
 Lenin, V. I., 列宁 352, 424  
 Leonardo da Vinci, 列奥纳多·达·芬  
 奇 114  
 Lermontov, M. Y., 莱蒙托夫 384, 397  
 Lerner, Laurence, 莱纳, 劳伦斯 79  
 Le Sage, A. R., 勒萨日, 阿·瑞内 176,  
 196  
 Lessing, G. E., 莱辛, 高特荷德·埃夫拉  
 姆 3, 25, 33, 47-, 55, 117, 204, 208,  
 231, 311, 369-  
 Lessner, F., 列斯纳, 弗里德里希 351注  
 Levasseur, R., 勒瓦瑟尔, 勒奈 71  
 Lever, Charles, 利维尔, 查理 255注  
 Lichnowski, F. M. von, 利希诺夫斯基,  
 费里克斯·马利亚·冯 264  
 Lichtheim, G., 李赫特海姆, 乔治 57,  
 407  
 Liebknecht, Karl, 李卜克内西, 卡尔  
 207-, 327  
 Liebknecht, Wilhelm, 李卜克内西, 威廉  
 61注, 207, 367注, 376, 379注, 387注  
 Lifshits, M., 里弗希兹, 米哈依 5注, 22,  
 30注, 32注, 33, 35注, 165, 221注,  
 259-, 289注, 304, 311注, 313注,  
 346注, 400注, 409  
 Lillo, George, 李罗, 乔治 75  
 Lincoln, Abraham, 林肯, 阿伯拉罕 269-  
 Lissagaray, P. O., 利沙加勒, 普罗斯比

尔·奥利维耶 387  
 Liszt, Franz, 李斯特, 弗朗茨 364注  
 Litt, T., 李特 130注  
 Livergood, N. D., 李威古德, 诺·戴 26  
 Livingstone, R. S., 李温斯通, 罗 192,  
 193  
 Lobkowitz, N., 洛勃科维奇, 尼古拉斯  
 345注  
 Locke, John, 洛克, 约翰 180  
 Loers, Vitus, 罗埃尔斯, 威特斯 1  
 Loewe, R., 卢威, 拉斐尔 370注  
 Longfellow, H. W., 朗费罗, 亨利·瓦  
 兹沃斯 390  
 Longuet, Jenny, 见 Marx, Jenny (daugh-  
 ter) 龙格, 燕妮(见马克思, 燕妮(女儿))  
 Lope de Vega, 洛贝·台·维迦 395  
 Louis XIV, King of France, 路易十四  
 91, 231  
 Louis XV, King of France, 路易十五  
 271  
 Louis Napoleon, 见 Napoleon III 路易·  
 拿破仑(拿破仑第三)  
 Louis-Philippe, King of France, 路易一  
 菲力浦 15, 150, 337, 353  
 Loustalot, E., 路斯达洛 99  
 Lovejoy, A. O., 勒夫乔埃 292注  
 Lubbock, Sir John, 拉伯克爵士, 约翰 362  
 Lucian, 琉善 48, 55, 65, 118  
 Lucretius, 卢克莱修 25-, 48, 55, 133,  
 292, 301, 401, 423  
 Ludwig I, King of Bavaria, 卢德威格  
 一世, 巴伐利亚国王 65  
 Ludwig, O., 路德维希, 奥托 218, 224  
 Ludwigslied, 路易之歌 262  
 Lukács, G., 卢卡契, 格奥尔格 33, 82,  
 98, 213注, 222, 259, 400, 424  
 Luther, Martin, 路德, 马丁 13-, 33注,  
 47, 178, 215, 225, 229, 261, 316,

376, 420

Lyndhurst, Baron (John Singleton Co-  
pley), 林德赫斯特勋爵 244

Lytton, Edward Bulwer, 1st Baron,  
利顿, 爱德华·布尔韦尔 253-, 257

## M

Macaulay of Rothley, 1st Baron, 马考  
莱, 托马斯·巴宾顿 268, 343

McClellan, G. B., 麦克累伦, 乔治 268

M'Culloch, J. R., 麦克库洛赫, 约翰·拉  
姆赛 333

Macherey, P., 马契雷 424

Machiavelli, Niccolo, 马基雅弗利, 尼古  
洛 56, 204, 207, 240, 258, 375注,  
384

MacIntyre, A. C., 麦肯泰尔, 阿·恰 25

McLellan, D., 麦克莱兰, 大卫 2注, 23  
注, 57注, 80, 82, 87注, 148, 273注,  
307, 308注, 372注

Maine, Sir Henry, 梅恩爵士, 亨利 361-

Malthus, T. R., 马尔萨斯, 托马斯·罗伯  
特 273, 316-, 320, 366

Manale, M., 马那尔, 玛格丽特 175注,  
348注

Mandeville, B. de, 孟德维尔, 贝尔纳德  
·德 319-

Mannheim, Karl, 曼海姆, 卡尔 123

Marat, J. P., 马拉, 让·保尔 148注

Marcus, Ludwig, 马尔库斯, 路德维希  
139

Marmontel, J. F., 马蒙台尔, 让·佛朗  
索阿 99

Marrast, Armand, 马拉斯特, 阿尔芒  
167

Marryat, Frederick, 马利亚特, 弗雷德里  
克 385-

Marx, Eleanor, 马克思, 爱琳娜 1-, 66,  
112, 207, 241注, 308注, 351, 360,  
383注, 386, 389-, 393-

Marx, Heinrich, 马克思, 亨利希 2, 4-,  
18-, 384

Marx, Jenny (wife), 马克思, 燕妮(妻)  
6, 9, 11, 19-, 56, 112, 136, 171,  
210, 216, 351, 384, 385注, 390注,  
393, 395, 397

Marx, Jenny (daughter), 马克思, 燕妮  
(女儿) 66, 209, 377-, 356注, 364注,  
386, 390, 391注

Marx, Laura, 马克思, 劳拉 13, 112, 209,  
266, 376, 379, 385-, 390注, 392,  
424

Matthäi, Rudolph, 马特伊, 鲁道夫 122

Mazzini, G., 马志尼, 朱泽培 190, 258

Mehring, F., 梅林, 弗兰茨 3, 13, 297,  
424

Mendelssohn, Moses, 门德尔森, 莫泽斯  
369-, 383

Merckels, W. von, 梅克尔斯, 威廉·冯  
382

Mészáros, I., 麦斯扎罗斯, 伊斯特万  
82注, 84, 313注, 373注, 402注

Metastasio, 梅塔斯塔西奥 239

Metternich, Klemens von, 梅特涅, 克雷  
门斯·冯 71, 148-, 254

Meyen, E., 梅因, 爱德华 188

Meyer, S., 迈耶尔, 齐格弗里特 146注,  
373注

Milde, K. A., 米尔达, 卡·奥 155

Mill, James, 穆勒, 詹姆斯 72

Mill, J. S., 穆勒, 约翰·斯图亚特 137

Miller, J. M., 密勒, 约翰·马丁 187

Milnes, R. Monckton, 1st Baron, 米尔恩  
斯, 理查·蒙古顿 242

Milton, John, 密尔顿, 约翰 157注, 310,



312, 365

- Mirabeau, G. H. V. R., comte de, 米拉波, 奥诺莱·加比利尔 45, 204-
- Mockel, Johanna, 莫克尔, 约翰娜 188-, 197
- Mohammed, 穆罕默德 172
- Moleschott, J., 摩莱肖特, 雅科布 210
- Molière, 莫里哀 48, 55, 86, 94, 96, 156, 157注, 168, 246-, 256, 353, 395
- Montaigne, M. de, 蒙台涅, 米歇尔·德 52
- Monteil, A. A., 蒙泰, 阿芒·阿利克西斯 91
- Montesquieu, C. L. de S., 孟德斯鸠 56, 236
- Morawski, S., 莫劳斯基, 斯蒂芬 99, 111注, 406, 413注
- More, Sir Thomas, 莫尔, 托马斯 342
- Morgan, L. H., 摩尔根, 路易斯·亨利 361
- Moritz, K.P., 莫里兹, 卡尔 411注
- Morris, William, 莫里斯, 威廉 133注, 333-
- Morton, A. L., 莫尔顿 134注, 333注, 334注
- Möser, Justus, 麦捷尔, 尤斯图斯 56, 83, 388
- Mozart, W. A., 莫扎特, 沃尔夫冈·亚马德 40, 112, 118, 157, 173, 255-, 268, 397注
- Müller, Adam, 弥勒, 亚当 291, 315
- Müllner, A., 缪尔奈, 阿道夫 16, 218注, 310, 378, 379注
- Münchhausen, K. F. H., Baron von, 闵豪森 202, 262
- Münzer, Thomas, 闵采尔, 托马斯 215, 222-, 225-, 230
- Murner, Thomas, 穆尔纳, 托马斯 127

## N

- Naas, R. S. B., Earl of Mayo 纳斯, 理查·萨·伯, 美奥伯爵 240
- Napoleon I, 拿破仑第一 15, 53, 168, 177-, 238, 240, 350
- Napoleon III, 拿破仑第三 167-, 177, 181-, 184-, 191, 201, 238, 252, 260, 262, 266, 270, 349, 353, 367, 375, 391
- Nechaev, S., 涅恰也夫, 谢尔盖 359
- Nechkina, M., 奈契基娜 243注
- Nero, Emperor, 尼罗, 罗马皇帝 354
- Newton, Sir Isaac, 牛顿爵士, 艾撒克 422-
- Nibelungenlied, The, 《尼伯龙根之歌》 261, 386
- Nicholas I, Tsar, 沙皇尼古拉一世 71
- Nicolai, Friedrich, 尼古拉, 弗里德里希 190-, 202
- Nicolaus, M., 尼古劳斯, 马丁 273注, 346注
- Nietzsche F., 尼采, 弗 43, 171
- Novalis (Friedrich von Hardenberg), 诺瓦利斯(弗里德里希·冯·哈敦贝格) 187

## O

- Offenbach, J., 奥芬巴赫, 雅克 332
- Origenes (Origen), 奥力金 80
- Ossowski, S., 奥索夫斯基, 斯坦尼斯拉夫 146注
- Ovid, 奥维德 1, 4, 15, 210, 316, 401

P

- Palmerston, Viscount, 帕麦斯顿勋爵  
233-, 238-, 242-, 247, 251-, 267
- Parny, É. de, 巴尔尼, 艾瓦里斯·德 94
- Patterson, S., 佩特森, 赛缪尔 146 注
- Paul, St., 圣·保罗 178
- Pazura, S., 帕祖拉 22注, 33, 411注
- Peel, Sir Robert, 皮尔, 罗伯特 249
- Pelger, H., 贝尔格尔, 汉斯 378注
- Pélissier, A. J. J., duc de Malakoff, 佩利西埃, 让·雅克 239
- Persius, 柏西阿斯 261
- 'Peter Pindar' (J. Wolcot), "彼得·品达尔"(约翰·沃尔考特) 261
- Petrarca, Francesco, 佩特拉克, 弗兰契斯科 7
- Petrović, G., 彼得罗维奇, 加约 123注, 405
- Petty, Sir William, 配第爵士, 威廉 343, 350
- Peuchet, J., 伯歇, 让 125
- Phelps, Samuel, 菲尔浦斯, 赛缪尔 395
- Philips, Antoinette, 菲利浦斯, 安东尼达 210-, 212注, 339
- Philips, L., 菲利浦斯, 莱昂 352注
- Pieper, W., 皮佩尔, 威廉 186, 202, 209, 364注
- Pindar, 品得 239, 244, 269-, 292, 319
- Pius IX, Pope, 庇护九世 164
- Plamenatz, J., 普拉麦纳兹, 约翰 54注, 112注, 296, 298注, 299注
- Plato, 柏拉图 1, 25, 33, 258, 285, 296, 334
- Plekhanov, G. V., 普列汉诺夫, 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 424
- Plutarch, 普卢塔克 28-, 248

- Pompey, 庞培 202, 209
- Ponte, Lorenzo da, 朋德, 罗朗索·达 157注, 268, 397注
- Pope, Alexander, 蒲伯, 亚历山大 261, 264, 358
- Potter, Edmund, 波特尔, 艾德蒙 337
- Potter, Sir John, 波特尔爵士, 约翰 243
- Prescott, W. H., 普雷斯科特, 威廉·希克林 302
- Prévost, C., 普莱窝斯特 65 注
- Price, Richard, 普莱斯, 理查 241
- Propertius, 普罗佩尔提乌斯 3, 304
- Proudhon, P. -J., 蒲鲁东, 比埃尔·约瑟夫 100, 131-, 134-, 275, 305, 325, 343, 365-
- Prutz, R., 普鲁茨, 罗伯特 41
- Ptolemy (Claudius Ptolemaeus), 托勒密, 克罗狄乌斯 47
- Pushkin, A. S., 普希金 302-, 384-, 410
- Pustkuchen-Glanzow, J. F. W., 普斯特库亨—格兰佐夫, 约·弗·威 13, 374, 414
- Pyat, F., 皮阿, 费里克斯 361

Q

- Quintana, M. J. 金塔纳, 曼努埃尔·霍赛 257

R

- Rabelais, François, 拉伯雷, 弗朗斯瓦 118, 261-, 392
- Racine J., 拉辛, 让 395
- Raddatz, F. J., 拉达兹, 佛里茨 200注, 411注
- Radowitz, J. M. von, 拉多维茨, 约瑟夫 264



Raimund, Ferdinand, 赖蒙德, 斐迪南  
156  
Ranke, Leopold von, 兰克, 列奥波特·  
冯 299, 343注, 392  
Raphael, 拉斐尔 112, 114, 175  
Raumer, F. von, 劳麦, 弗里德里希·冯  
366  
Raupach, E., 劳巴赫, 厄恩斯特 15-  
Reeves, N., 瑞夫斯, 尼格尔 7注, 15注,  
21, 67, 80注  
Régnier, M., 雷尼埃, 马屠朗 329, 376,  
385  
Reichardt, C. E., 赖哈特, 卡尔 100  
Reid, Mayne, 里德, 梅恩 250  
Rembrandt, 伦勃朗 175  
Renan, J. E., 勒南, 厄内斯特·约瑟夫  
371  
Reuchlin, J., 罗伊希林, 约翰 193  
Reuter, F., 罗伊特, 弗利兹 317  
Ricardo, David, 李嘉图, 大卫 133, 258,  
273, 300, 317, 320  
Richardson, Samuel, 理查逊, 赛缪尔 52  
Richter, Jean Paul Friedrich, 理希特,  
让·保尔·弗里德里希 116, 174, 414,  
420  
Riofrancas, M., 里奥佛朗哥斯, 马罗  
404注  
Roberts, Richard, 罗伯茨, 里查 279,  
331  
Robespierre, M. F. M. I. de, 罗伯斯庇  
尔, 马克西米利安 21, 71, 178  
Robin, P., 罗班, 保尔 392  
Roebuck, J. A., 罗巴克, 约翰·阿瑟  
235, 245  
Roscher, W. G. F., 罗雪尔, 威廉·格奥  
尔格·弗里德里希 212-, 318-, 340-  
Rossini, G. A., 罗西尼, 吉·昂 157  
Rotteck, Karl von, 罗泰克, 卡尔·冯

153  
Rousseau, J. -J., 卢梭, 让-雅克 2, 21,  
25, 33, 52, 56, 273, 367  
Roy, Henry, 罗伊, 亨利 337  
Rubel, M., 鲁贝尔, 马克亚米林 138,  
175注, 186注, 348注, 401  
Rückert, J. M. F., 吕凯特, 弗里德里希  
48, 424  
Ruge, Arnold, 卢格, 阿尔诺德 21注, 32  
注, 33, 41, 53, 56, 58注, 59-, 65-,  
69, 86, 130, 137, 141, 151, 185,  
190-, 193, 198, 201, 206, 360, 413  
Rumohr, C. F. von, 卢莫尔, 卡·弗·冯  
32  
Russell, John, 1st Earl, 罗素勋爵, 约翰  
234-, 238, 242, 254-, 257, 268  
Ryazanov, D., 梁赞诺夫, 大卫 60注

## S

Sainte-Beuve, C. A., 圣贝夫, 沙尔·奥  
古斯坦 375  
St. Just, A. LL. de R. de, 圣-茹斯  
特, 路易·安都昂 71  
St. Pierre, J. B. H. de, 圣比埃尔, 雅克  
·昂利·贝尔纳丹·德 209  
Saint-Simon, C. H., comte de, 圣西门,  
克劳德-昂利 365  
Sallet, F. von, 萨勒特, 弗里德里希·冯  
49  
Saltykov-Shchedrin, M. E., 萨尔蒂柯夫  
-谢德林, 米哈伊尔·叶夫格拉弗维奇  
359-, 384-  
Salvini, Tommaso, 萨尔维尼, 托马佐  
395  
Sanchez Vachez, A., 桑谢-瓦谢 291注,  
404  
Sand, George, 桑, 乔治 125, 135, 141

- Sannwald, R., 桑瓦尔德, 鲁尔夫 24注, 30注
- Sartre, J. -P., 萨特, 让·保 346
- Satire Menippée, 《梅尼培讽刺诗》 212
- Say, J. B., 萨伊, 让·巴 302
- Schelling, F. W. J. von, 谢林, 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冯 201, 411注
- Schikaneder, E., 希肯纳德, 埃马努埃尔 40
- Schiller, J. C. F. von, 席勒, 弗里德里希·冯 1-, 5, 13, 15-, 30-, 33, 36-, 49, 58, 80, 82, 95, 99-, 156, 157注, 164, 174-, 185, 187, 196-, 199, 202, 206, 211-, 215-, 224-, 227-, 250-, 260-, 274, 281, 285, 289, 310, 316-, 321-, 337, 345, 358-, 372, 374, 383, 391-, 400, 411-, 418
- Schläger E., 施累格, 爱德华 202
- Schlegel, A. W. von, 施莱格尔, 奥古斯特·威廉 3, 9, 33, 129, 249, 289, 411
- Schlegel, F., 施莱格尔, 弗里德里希 29, 251, 411
- Schlosser, F. C., 施洛塞尔, 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 364
- Schmidt, Julian, 施米特, 尤利安 212
- Schneckenburger, M. 施奈肯伯特, 麦克斯 378
- Schönaich, C. O. von, 雪恩奈希, 克利斯托夫·奥托 302
- Schramm, R., 施拉姆, 鲁道夫 188, 192, 262
- Schröder, F. L., 施勒德尔, 弗·卢 217
- Schweitzer, J. B. von, 施韦泽, 约翰·巴普提斯特·冯 365注, 366
- Scott, Sir Walter, 司各特, 瓦尔特 255注, 386, 396
- Senior, Nassau W., 西尼尔, 纳骚·威 302, 340, 350
- Seume, J. G., 佐伊默, 约翰·高特夫利特 377
- Sextus Empiricus,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 334
- Seydelmann, Carl, 赛德尔曼, 卡尔 327
- Seymour, Sir John, 西摩尔爵士, 约翰 255
- Shaftesbury, 7th Earl of, 舍夫茨别利伯爵 244
- Shakespeare, William, 莎士比亚, 威廉 1-, 15, 38, 39注, 45, 48-, 58, 63, 72-, 78-, 85, 99-, 118, 129-, 153, 156-, 168, 175, 179, 192, 194, 197, 202-, 206, 208-, 215, 224, 229, 233-, 241-, 261-, 264-, 268, 270, 278-, 281, 291-, 303, 310, 316, 327-, 337, 341-, 348, 353, 359-, 371, 374, 380, 384, 386, 390-, 395, 399-, 409, 414
- Shelley, Mary, 雪莱, 玛丽 392, 394-, 411
- Shelley, Percy Bysshe, 雪莱, 派尔西·毕希 396
- Shevchenko, T., 舍夫琴柯 385
- Sickingen, Franz von, 济金根, 弗兰茨·冯 226, 229
- Siebel, K., 济贝尔, 卡尔 200, 370
- Silesian Weavers' Song, 《西里西亚织工之歌》 67-, 141, 402, 411
- Simon, Ludwig, 西蒙, 路德维希 202
- Simpson, Sir James, 辛普森爵士, 詹姆斯 252
- Sismondi, J. C. L. S. de, 西斯蒙第, 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德·德 140, 241, 258, 349-
- Smith, Adam, 斯密, 亚当 133, 273, 300, 302-, 309-
- Smulkstys, J., 斯莫尔克斯蒂斯 373注, 374注



Socrates, 苏格拉底 29  
 Solger, K. W. F., 佐尔格尔, 卡尔·威廉·斐迪南 3  
 Sombart, W., 松巴特, 维尔纳 148注  
 Sophocles, 索福克勒斯 1, 231, 239, 255, 286, 301, 310, 330-, 341注, 357  
 Sorge, F. A., 左尔格, 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 372  
 Southey, Robert, 骚塞, 罗伯特 250  
 Spartacus, 斯巴达克思 209, 390  
 Spenser, Edmund, 斯宾塞, 艾德蒙 362, 419  
 Spieß, C.H., 施皮斯, 克·亨 187  
 Spinoza, B. de, 斯宾诺莎, 巴鲁赫·德 352, 369-  
 Stadler, P., 斯达得勒 54注, 341注  
 Staël, A. -L. -G. de, 斯塔尔夫夫人 33  
 Starkenburg, H., 施塔尔根堡, 汉斯 296-  
 Sternberger, Dolf, 施特恩贝尔格, 多尔夫 140注, 151注  
 Sterne, L., 斯特恩, 洛仑斯 15-, 36, 153, 261, 367  
 Steuart, Sir J. D., 斯图亚特, 詹姆士 316  
 Stirner, Max, 施蒂纳, 麦克斯 105, 112, 114-, 120, 122, 305  
 Stolberg, Christian von, 施托尔贝格, 克利斯提安·冯 333  
 Storch, H. F. von, 施托尔希, 安·卡 302, 313  
 Strauss, D. F., 斯特劳斯, 大卫·弗里德里希 33注, 43, 222, 228  
 Strick, F., 斯特里克, 弗里兹 144注  
 Strodtmann, A., 施特罗特曼, 阿道夫 188  
 Struve, Gustav, 司徒卢威, 克斯达夫 190, 192  
 Sue, Eugene, 苏, 欧仁 86-, 102, 104, 170-, 185, 195, 225, 320, 359, 399, 411-

Sulla Felix, Lucius Cornelius, 苏拉(鲁齐乌斯·称尔奈利乌斯) 355  
 Swift, Jonathan, 斯威夫特, 乔纳森 249-, 362, 391-  
 Szeliga (F. Z. von Zychlinsky), 施里加(真名弗兰茨·施里加·齐赫林·冯·齐赫林斯基) 86, 88, 91, 94-, 100, 104, 119, 399

## T

Tacitus, 塔西佗 1, 4, 263, 387-  
 Tasso, Torquato, 塔索 399  
 Tausenau, K., 陶森脑, 卡尔 192  
 Tawney, R. H., 陶纳, 里查·亨利 321  
 Taylor, Bayard, 泰勒, 巴亚德 78注  
 Taylor, Tom, 泰勒, 汤姆 317  
 Tennyson, Alfred Lord, 丁尼生, 阿尔弗雷德 390  
 Thackeray, W. M. 萨克雷, 威廉·麦克斯皮斯 121, 237, 252, 380, 395  
 Thiers, M. J. L. A., 梯也尔, 路易·阿道夫 353-  
 Thompson, B. V., 汤普逊 382  
 Thucydides, 修昔的底斯 1, 211, 319, 334, 340  
 Tieck, J. L., 蒂克, 鲁德维希 61  
 Tillyard, E. M. W., 蒂尔耶德, 优 292注  
 Tirso de Molina, 蒂索·德·莫里那 395  
 Tite (Sir), William, 泰特, 威廉 243  
 Titian, 铁相 114  
 Tocqueville, Comte Alexis de, 托克维尔, 阿列克斯·德 62  
 Townsend, Joseph, 唐森, 约瑟夫 316  
 Tracy, A. L. C. Destutt, comte de, 特拉西, 德斯托特·德 53注  
 Trask, W. R., 特拉斯克, 威拉尔德 287注

Treitschke, H. v., 特莱契克, 亨利希·冯 392  
Trilling, Lionel, 特里林, 里昂奈尔 81  
Troeltsch, E., 特鲁尔契, 厄恩斯特 321  
Trotsky, Leo, 托洛斯基 134  
Tsuzuki, C., 都筑 397  
Tucker, R. C., 塔克, 罗勃特 341注  
Tupper, Martin F., 塔波尔, 马丁 334, 340, 345, 348, 390, 401, 408  
Turgenev, I. S., 屠格涅夫 384, 397  
Tyrtaeus, 梯尔泰 258

## U

Uhland, J. L., 乌兰德, 路德维希 48, 261  
Ullrich, H., 乌尔里希 274注  
Ure, A., 尤尔, 安德鲁 350  
Urquhart, D., 乌尔卡尔特, 大卫 251

## V

Venedey, J., 费奈迭, 雅科布 201  
Vergennes, Charles Gravier, comte de, 维尔任纳伯爵, 查理·格拉维耶 271  
Véron, Louis, 维隆, 路易 181  
Vico, Giambattista, 维科, 卓万尼·巴蒂斯特 126, 207  
Vidocq, François, 维多克, 弗朗斯瓦·欧仁 94  
Vincke, G. E. F., 芬克, 格奥尔格 204, 264  
Virgil, 维吉尔 36, 156-, 212, 239, 261, 301, 316, 338, 342, 375, 385, 421  
Vischer, F. Th., 费舍, 弗·泰 221注, 259-, 282, 375  
Vogt, A., 福格特, 阿贝特 146注  
Vogt, K., 福格特, 卡尔 199-, 203, 260-, 308, 372

Volksbücher (German chap-books) 民间读物(德国民间小故事书) 95-, 238  
Volpe, G. della, 伏尔普, 加尔瓦诺·台拉 424  
Voltaire, F. M. A. de, 伏尔泰, 弗朗斯瓦·马利·阿鲁埃·德 2, 25, 36, 52, 55, 134, 202, 205, 236, 241, 249, 261, 271, 311, 342, 348, 353, 354注, 367, 376, 395

## W

Wachsmuth, W., 瓦克斯穆特 186  
Wackenroder, W. H., 瓦肯罗德 7, 61  
Wagener, H., 瓦盖纳, 海尔曼 204  
Wagner, Cosima (von Bulöw) 瓦格纳, 考希玛(冯·毕洛夫) 364注  
Wagner, Richard, 瓦格纳, 理查 153, 155, 172, 213, 247, 364  
Waldeck, B. F. L., 瓦尔德克, 贝奈狄克特·弗兰茨·利奥 204  
Walker, F. T., 瓦尔克, 佛兰克 378注  
Wallace, A. R., 华莱士, 罗勃特 316  
Walther von der Vogelweide, 瓦尔特·冯·得尔·弗格尔外德 261  
Walton, P., 瓦尔顿, 保尔 182注, 277注  
Watling, E. F., 瓦特林 330注  
Watt, I., 瓦特, 伊昂 274注, 335注  
Wayne, P., 魏恩, 菲利浦 326注  
Weber, Max, 威伯, 麦克斯 321  
Weerth, Georg, 维尔特, 格奥尔格 68, 150, 152, 165, 205, 382, 419  
Weinschwelg, Der, <酒鬼> 261  
Weitling, W., 魏特林, 威廉 86  
Welcker, F. G., 韦尔凯尔, 弗·格 3  
Wellek, R., 韦莱克, 莱奈 113注, 143, 401, 402注, 414注  
Werchan, I., 维尔汉 250注, 362注



Westphalen, Jenny von, 见 Marx, Jenny  
(wife) 威斯特华伦, 燕妮·冯  
Westphalen, Ludwig von, 威斯特华伦,  
路德维希·冯 1-  
Weydemeyer, J., 魏德迈, 约瑟夫 198-  
201注, 207, 218注  
Wieland, C. M., 维兰特, 克利斯特弗·  
马丁 251  
Wilde, Oscar, 王尔德, 奥斯卡 81  
Wilkinson, E. M. 威金逊 80注, 274注  
William I (Kaiser Wilhelm I), 威廉一  
世 157, 174-, 227, 375, 391  
Williams, Raymond, 威廉斯, 雷蒙得 295  
Willich, A., 维利希·奥古斯特 193-  
Willoughby, L. A., 威劳贝 80注, 274注  
Winckelmann, J. J., 文克尔曼, 约翰·  
约阿希姆 3, 15, 27, 29, 33  
Winkler, K. G. T., 温克勒, 希奥多尔  
43-  
Wirth, M., 维尔特, 麦克斯 335  
Wolcot, John, 见 'Peter Pindar' 沃尔  
考特, 约翰 (见“彼得·品达尔”)  
Wolff, Christian, 沃尔弗, 克利斯提安 16

Wolfram von Eschenbach, 沃尔夫拉姆  
·冯·埃森巴赫 187, 261  
Wordsworth, W., 华兹华斯, 威廉 411注  
Wrangel, F. H. E., Count von, 弗兰  
格尔, 弗里德里希·亨利希·恩斯特·  
冯 158  
Würzburg, K. von, 维尔茨堡, 康拉德·  
冯 118

## X

Xenophon, 色诺芬 301, 334

## Z

Zabel, F., 察贝尔, 弗里德里希 203,  
264注, 392  
Zasulich, V., 查苏利奇, 维 360  
Zuccalmaglio, F. V., 祖卡马利奥 20  
Zychlinsky, F. Z. von, 见 Szeliga 齐赫  
林斯基, 弗兰茨·齐赫林·冯 (见施里  
加)